

# 红军长征全史

杨成武



第五卷

## 星汉灿烂

——北上抗日先遣队和南方红军游击区战史

● 廖信春 主编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E491.7

51  
K264.406  
21  
25

# 红军长征全史

第五卷

## 星汉灿烂

——北上抗日先遣队和南方  
红军游击区战史

本卷主编 廖信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C

412840

(吉)新登字 12 号

红军长征全史

HONGJUN CHANGZHENG QUANSHI

全五卷

柏福临 刘喜发 主编

---

责任编辑：赵向荣 封面设计：李冰彬 责任校对：周长梅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138 号)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邮政编码：130024)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印张：66 插页 12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 650 千 印数：0 001--5 000 册

---

ISBN 7 - 5602 - 1842 - 3/K · 108 (全套)定价：98.00 元

书名题写 杨成武

顾问 叶 飞 刘建华

总主编 柏福临 刘喜发

本卷主编 廖信春

本卷编著 李雪枝 姜良芹  
吴永明

---

紅軍長征

千古流芳

李飛



南  
精

方 三 斗  
神 永 存

刘 建 华  
一九九六年六月



方志敏同志在狱中像。叶剑英同志在照片上题诗手迹。

血战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  
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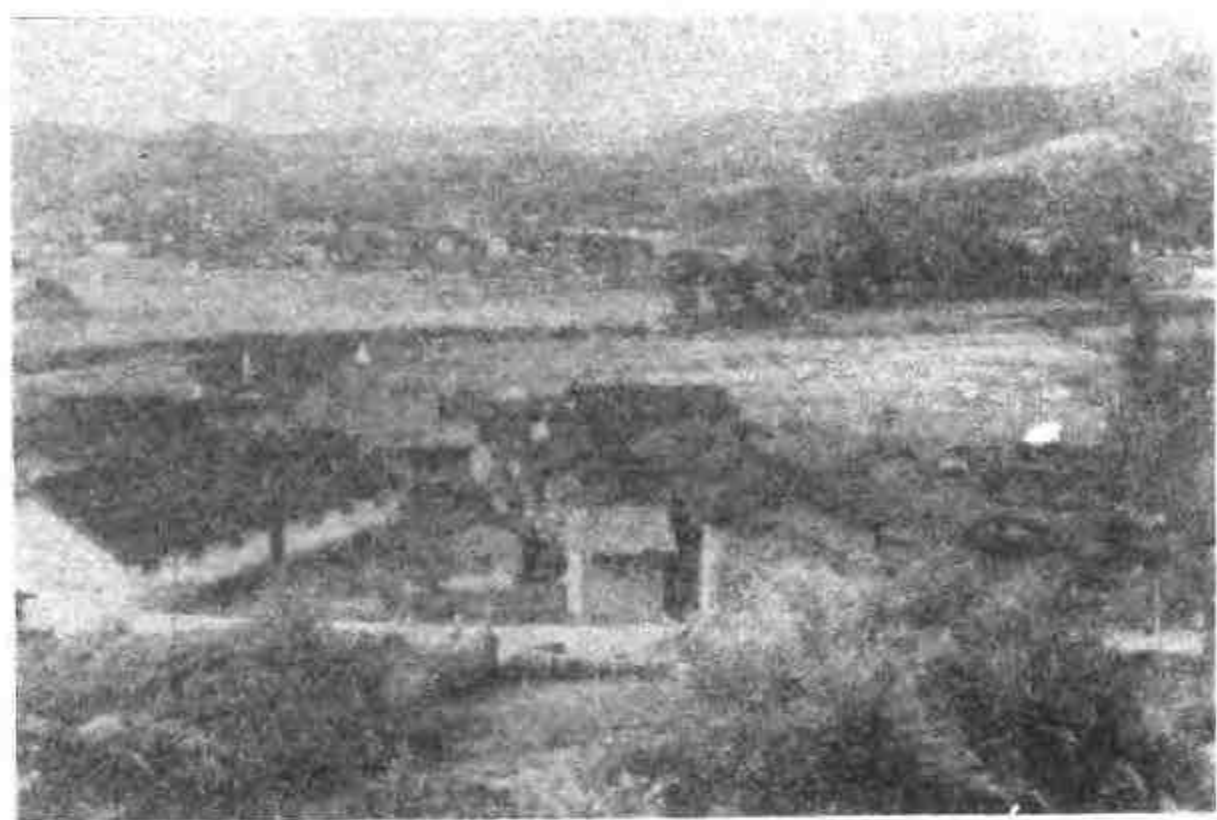


抗日战争初期的项英





冯白驹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闽西红军游击队的会合地与红色据点——永定金沙



黄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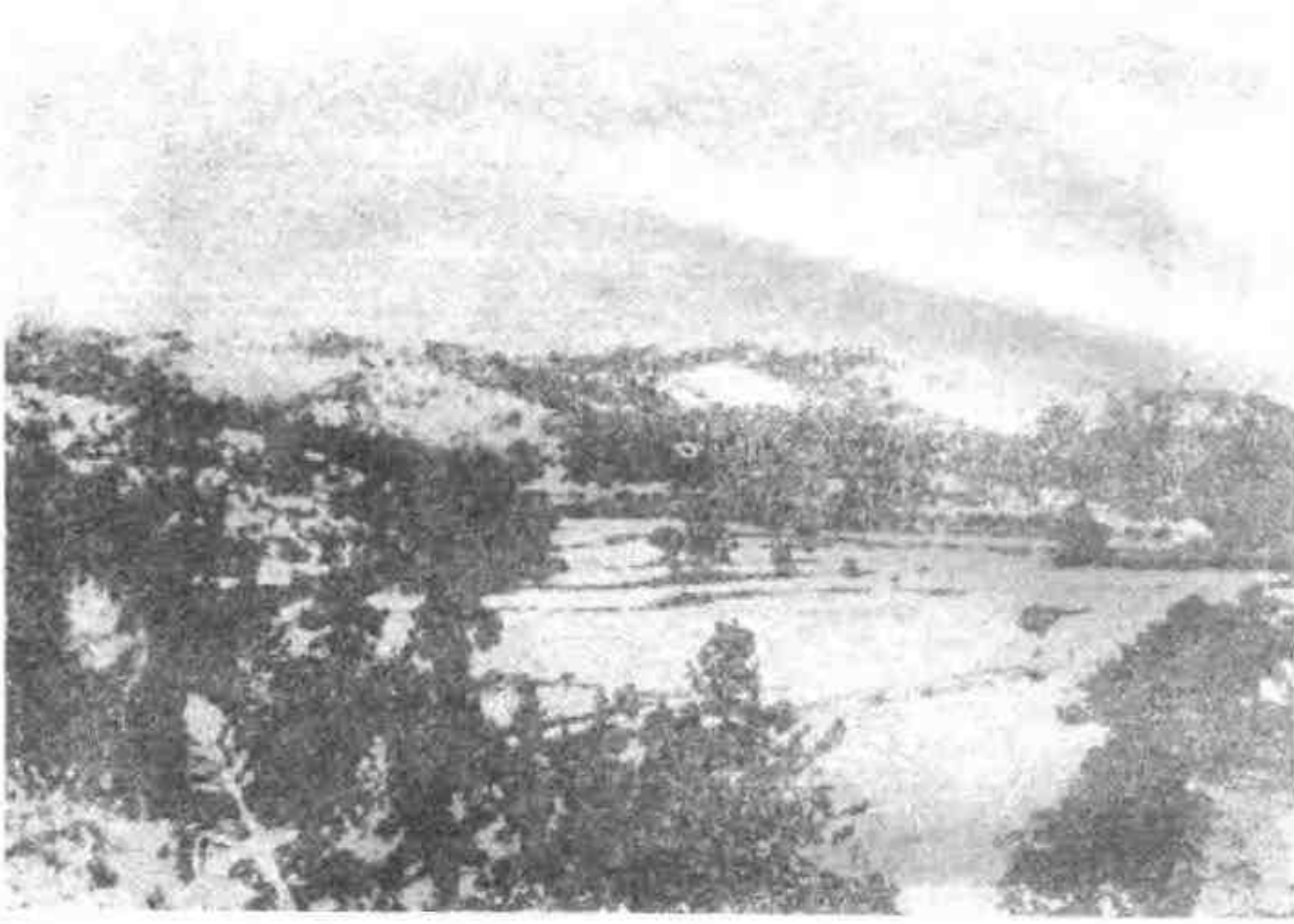
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红军挺进师  
和闽浙边临时省军区政委刘英



长岭会议会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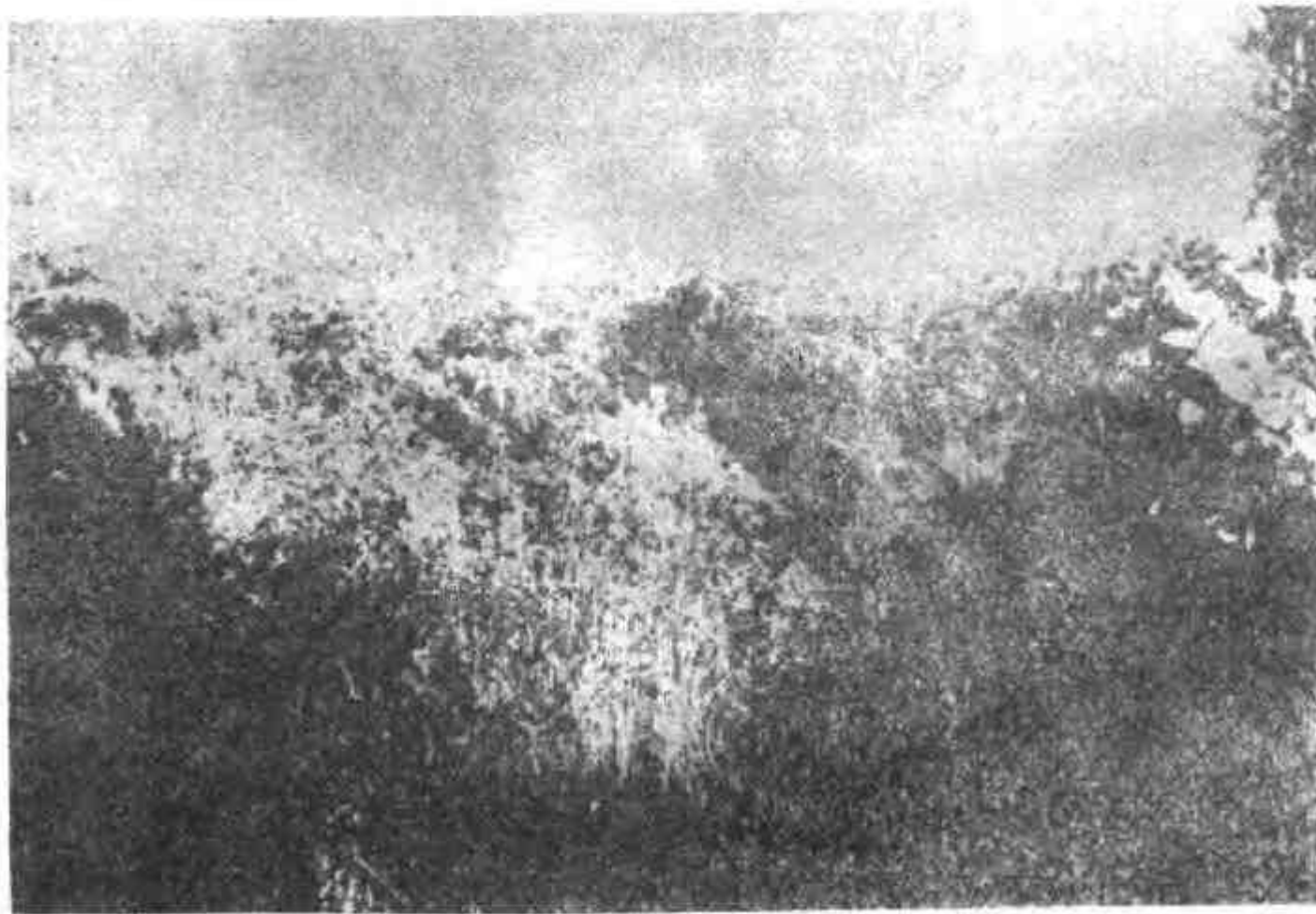
闽西游击队活动地区之一 —— 金丰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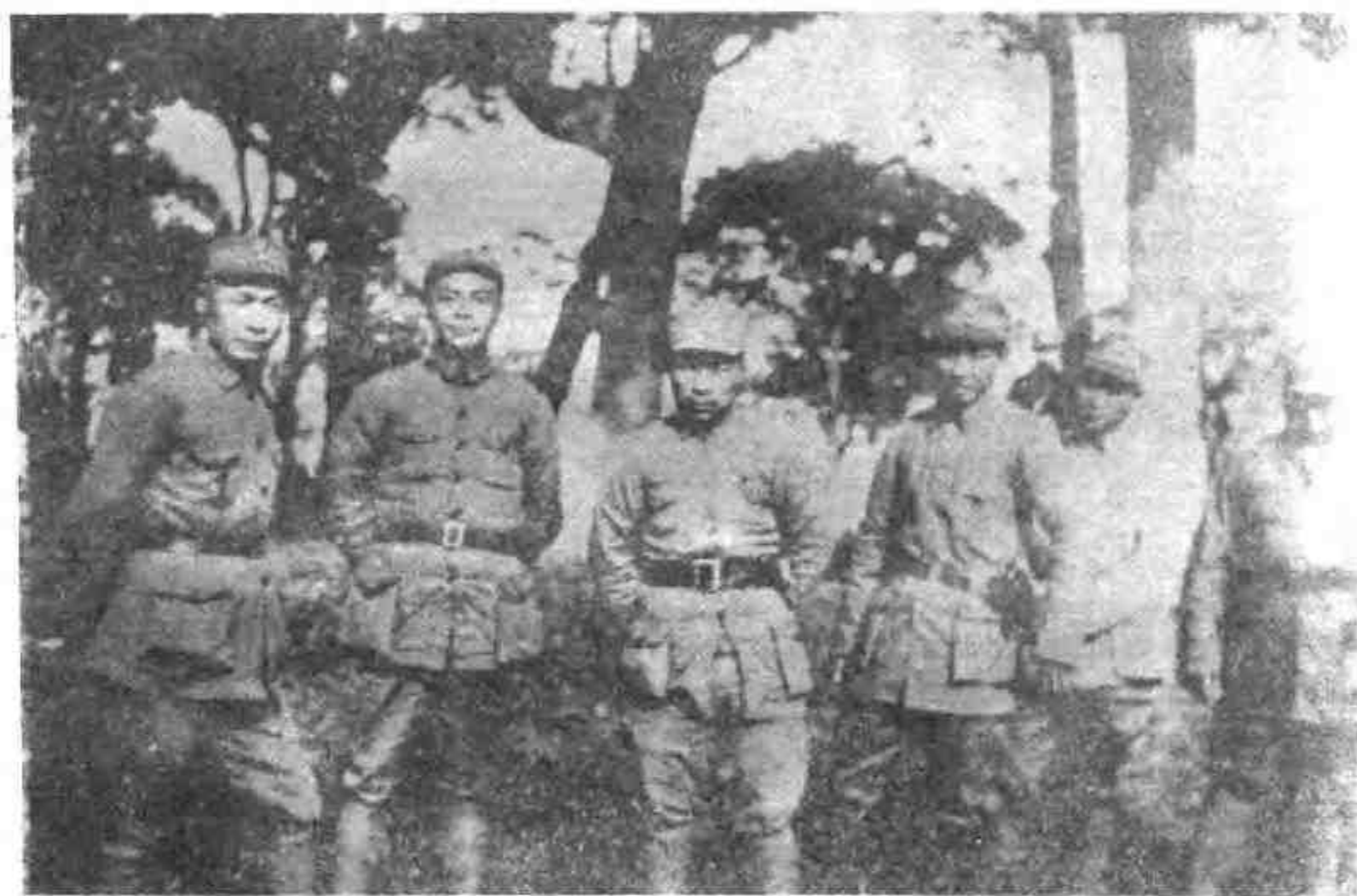




鄂豫皖游击区之一——金岗台山

琼崖游击区之一——母瑞山





陈毅和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部分干部于江苏漂阳县水西村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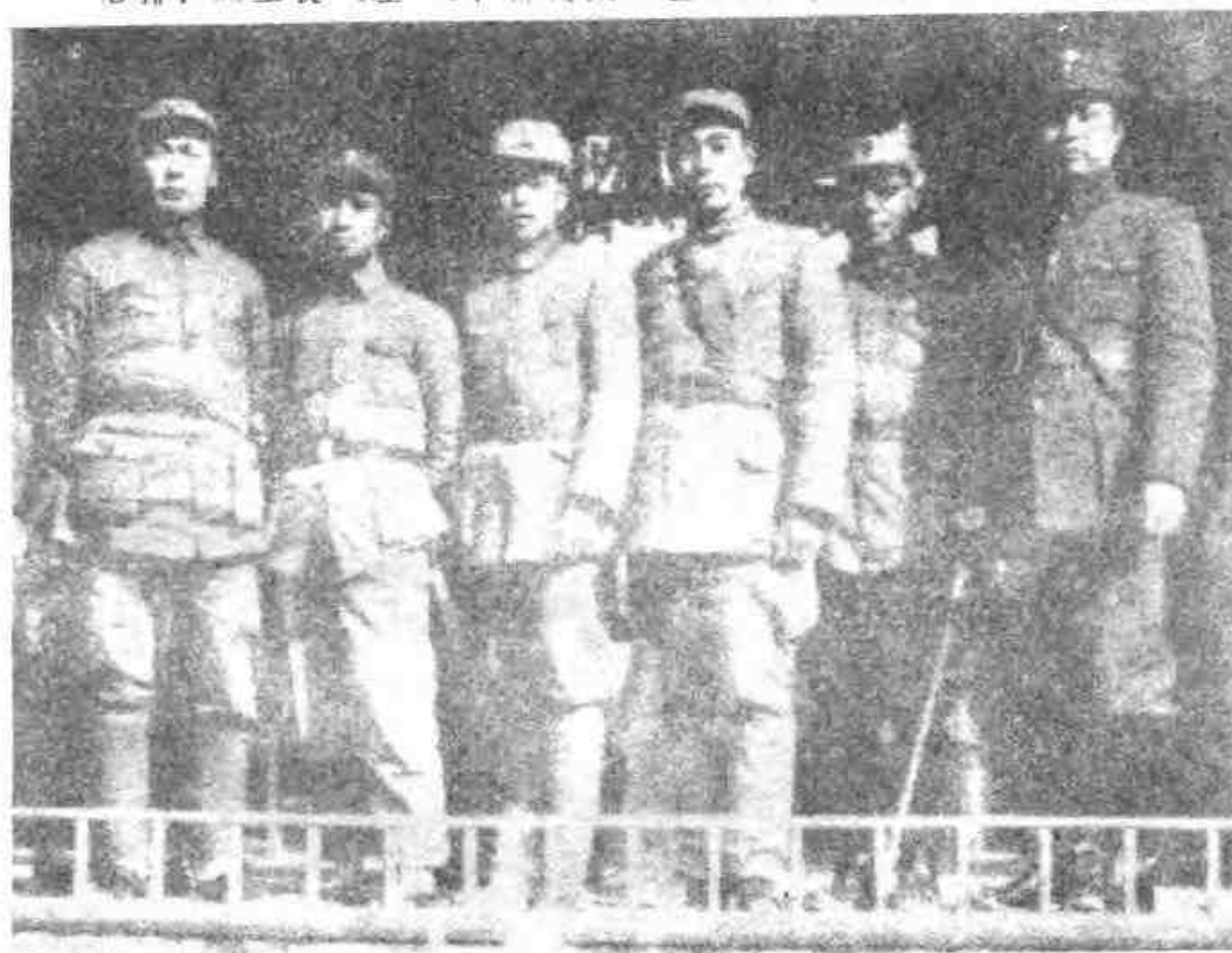
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部分干部

闽浙赣共同  
战斗的同志





1938年1月，部分南方游击区负责人于南昌新四军军部合影  
前排左起：张云逸、叶飞、陈毅、项英、黄道  
后排：顾玉良（左一）、薛尚荣（左三）、李步新（右一）



1939年周恩来副主席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  
右一叶挺、右三周恩来、右五粟裕、右六陈毅

---

## 目 录

前 言..... (1)

### 第一章 北上抗日第一军

一 红七军团..... (1)  
二 千里征战..... (9)  
三 怀玉山悲歌 ..... (31)

### 第二章 血战东南半壁红

一 粟裕、刘英临危受命 ..... (68)  
二 罗卓英兵发浙西南 ..... (74)  
三 神出鬼没打游击 ..... (81)  
四 党内分歧 ..... (87)  
五 奔赴抗日战场 ..... (90)

### 第三章 惜别赤都情意浓

一 留 守 ..... (95)  
二 转 折..... (110)  
三 突 围..... (133)

### 第四章 南国烽烟

一 梅岭星火..... (155)  
二 汀瑞边游击队..... (210)  
三 陈毅出山..... (229)

---



### 第五章 闽水苍茫

- 一 拳头与跳蚤的较量····· (258)
- 二 何鸣事件的前前后后····· (288)
- 三 从敌报上得知的闽东苏区····· (298)
- 四 巍巍武夷····· (310)

### 第六章 青山不老

- 一 战斗在武功山····· (331)
- 二 血染的红杜鹃····· (359)

### 第七章 椰岛风云

- 一 南天一柱····· (390)
- 二 峥嵘岁月····· (400)
- 三 为复兴民族而抗争····· (408)

### 第八章 红旗不倒

- 一 艰苦的历程····· (413)
- 二 战斗在敌人心脏····· (432)
- 三 便衣队：红色革命的摇篮····· (446)
- 四 曙光在前····· (453)
- 五 豫鄂边的红旗····· (466)

- 主要参考文献····· (469)

---

---

## 第一章 北上抗日第一军

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冲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中共中央极其秘密地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并为此派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出师皖南。

### 一 红七军团

1934年7月初，深夜。

黑沉沉的夜幕笼罩着整个大地，在福建古城通往江西瑞金的大道上，一支庞大的队伍正在匆匆地行进着，黑暗中如同一条飞腾的长龙。

这就是刚刚在福建连城接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紧急命令，星夜赶往首都瑞金待命的红七军团。

几个月前，蒋介石鉴于连续四次“围剿”红军失败的教训，特地请来了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为他出谋划策，发誓要消灭红军，踏平中央革命根据地。

在赛克特的帮助下，蒋介石制定了第五次“围剿”的新策略，在经过半年多的充分准备之后，亲自担任总司令，从容地调集了百万兵力，百架飞机，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

与此相对的是，在红军内部，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已被完全排斥，“左”倾领导人完全控制了中央各部门。

早在1933年初，临时中央就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博古、洛

## 2 星汉灿烂

甫等人先后抵达红都瑞金。同年9月，共产国际又派来了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

按照共产国际的规定，李德本是一位“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然而，他一到瑞金，便在博古、洛甫的极力推崇下，身兼“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几项要职，成为红军实际上的最高军事指挥官。

李德是一位“街垒战专家”，他把在苏联伏芝龙军事学院学到的军事理论全部搬到了中国战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便是他“军事才能”最淋漓尽致的发挥。在他的指挥下，红军全面实施“短促突击”、“两个拳头打人”、“御敌于国门之外”、“寸土必争”的作战方针，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断地以阵地战、堡垒战形式同敌人打硬仗，拼消耗，致使几个月间，红军损失惨重，兵日少而地日蹙。到1934年夏天，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纵横各近千里，缩小到各300余里。苏区周围，国民党重兵压境，并不断地向苏区中心步步进逼，军事形势已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局势险恶若此，红七军团却突然接到即刻“回师瑞金”的紧急命令，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军团几位主要负责人此刻各有各的猜测，但眼下谁也没有说出自己的想法。噤噤的脚步声掩盖不了沉默，间或可闻的虫鸣和蛙声，更加显出黑夜的寂静，听不到熟悉的枪声，也看不见战后的火光，黑夜像是一个谜，把一切都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令人费解。

“该不会是瑞金方面有什么闪失，调我们去增援吧？”年轻的军团长寻淮洲耐不住沉闷的气氛，悄悄地对身旁的参谋长粟裕说了一句。

寻淮洲设想的这种情况，军团的其他领导人又何尝没有想过！根据地的形势已经够险恶了，这会儿再出现任何不利的局面，他们都不会感到意外。对红军命运的忧虑，深深地困扰着大家。不

过，就在他们到达瑞金的当天晚上，这个谜底就被揭开了。

李德表现异乎寻常，很快就在他住的“独立房子”里接见了红七军团的主要领导。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几位主要负责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等也在座。

会议室的墙壁上挂满了各式军用地图。李德在选好的一幅地图前站定，举起手中的指挥棒，在闽浙皖赣几省的地界上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最后停在图上标示的皖南地区。

“这次要你们来，任务有两个，”李德缓缓地开了口，慢条斯理地说，“皖南几个县的群众正在举行武装暴动，需要你们火速赶往支援，这是其一。其二，现在的形势，我不说你们也清楚，小日本真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他们吞并了东三省，侵占了热河、内蒙，现在又在准备进攻整个华北。在中国南方，他们的军舰大炮与海陆空军，正在计划对福建省的直接占领。他们是想把中国变成殖民地，把中国人民变成亡国奴，永远受他们的剥削和蹂躏！”

李德的语调逐渐变得高亢，停了一会儿，他接着说：“因此，中革军委决定，指派你们红七军团立即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沿闽浙几省北上，沿途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最后目的地是皖南。军团原任职务不变。一个半月之内，必须赶到皖南！”随着大手有力地向下一挥，李德结束了他的讲话。

“这时候派我们北上皖南？”寻淮洲、粟裕等不禁对中革军委的这种决定大感疑惑。

这也难怪他们，如果这个任务是放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部署执行，他们谁也不会感到意外。因为在去年“福建事变”时，毛泽东就曾大胆地设想：“红军主力无疑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

#### 4 星汉灿烂

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sup>①</sup>

彭德怀的见解与毛泽东相似。他“写了一个电报给总政委转中央博古，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sup>②</sup>

毛泽东、彭德怀的正确建议被博古指斥为“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未予采纳。当时，临时中央“左”倾路线严重，以致坐失良机，把现成的盟友十九路军推向了失败的道路。

而现在，蒋介石已经倾全力四面攻打红军，中央苏区日益缩小，红军越来越被动。党中央却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出将红七军团远调人皖作战的决定，确实令人难以理解。

事实上，当时中央派出这支部队还有一个更加直接的目的，那就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回防，减轻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的阻力。

自广昌失守之后，红军节节败退，中央苏区岌岌可危，博古和李德虽然还在嘴上高喊着“誓死保卫每一寸国土”，但在事实上，他们也已意识到败局已定。情知无法再固守中央苏区，中共中央遂极其秘密地决定突围，进行“转移”和“退却”。

1973年12月，朱德在回答军事科学院的提问时曾说过，当时派遣北上抗日先遣队“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指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西南部转

<sup>①</sup>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6页。

<sup>②</sup>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4页。

移)。”<sup>①</sup>他们只能按照中革军委下达的任务来执行,对日作战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他们这样理解也是顺理成章的。

为着全局的需要,派出这样一支部队到敌人后方去活动,以便在红军主力转移时牵制敌人,这从战略指导上说,是正确的。只是,中央的这一决策在当时尚属绝密,只有少数几位高层决策人物知晓。先遣队的官兵们对此当然不可能知道。

为了使先遣队的行动更加师出有名,中共中央于7月15日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宣布:“在同国民党匪军的优势兵力残酷决战的紧急关头,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困难,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sup>②</sup>

当时中央直接交给先遣队的主要任务是:

“（一）到敌人的深远后方,进行游击活动,并在敌人最受威胁的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红七军团应在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旗帜下,经过福建而到达浙皖赣边行动,号召与组织一切抗日的友军,抗日的人民以及广大先进人士,一致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必须在党的彻底的武装群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口号下,宣传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进行各种反日反帝的民族解放战争。

（三）要在自己的行动中,最明显的表明着自己是有组织的、英雄的、守纪律的、先进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先锋队。

（四）在自己的行动中,应该表明自己是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倡导者和组织者。

（五）为着保证伟大的政治的军事任务的完成,先遣队必须最高度的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提高战士的觉悟和政治水平,提高

<sup>①</sup>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34页。

<sup>②</sup>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6页。

与巩固部队的纪律，应该不倦怠地吸收积极的革命分子加入自己的队伍，在胜利的作战中扩大自己的部队，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sup>①</sup>

按照中革军委的布置，红七军团在瑞金休整了几天，一切准备工作就绪，7月6日晚间正式出发。

红七军团是中央苏区主力红军中较年轻的一个军团，它的组建源于1933年9月的黎川之战。

黎川是中共苏区的北部门户，蒋介石为“铲除”中央苏区，第一步棋便是要夺下黎川县城。为此，他派出陈诚的三个精锐师——北路军第八纵队第五、六、七十九师朝黎川推进。驻守黎川县城的是闽赣军区司令员萧劲光，他手下只有一支70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

萧劲光有过多年的战斗经验，他知道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唯一的选择便是主动撤离。

萧劲光的迫不得已的一退，却被李德斥责为“不战而弃”、“仓皇逃脱”、“让部队听任命运的摆布”，李德严令萧劲光“收复赤色黎川”，红七军团便为此应运而生。

10月28日，根据中革军委发布的《关于改编红一方面军所属的独立军团的通令》，红十一军和赣东、闽北地方武装改编为红七军团，下辖十九、二十、二十一三个师。

寻淮洲被任命为红七军团军团长，萧劲光兼任红七军团政委。由于当时寻淮洲正率红五师随彭德怀、滕代远等忙于东方战线作战而未赴任，萧劲光便身兼三职。

红七军团组建后所领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钳制金溪方面的敌人，攻打浒湾堡垒阵地。浒湾在黎川西北，萧劲光率红七军团在浒湾与敌人打了一天一夜，以失败告终。

---

<sup>①</sup> 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1940年。

“左”倾中央借口萧劲光两次败绩，将他判处五年徒刑，开除党籍、军籍。红七军团也随之改组，由寻淮洲出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委，粟裕任参谋长，活动在闽西一带执行牵制任务。

在此后近一年的时间内，红七军团基本上处在东线作战，由于连续作战的锻炼，已发展成为一支擅长游击战、运动战的劲旅。但因连续行军作战的消耗，部队在接受先遣北上的任务时，只有4 000余人。

红七军团这支原来精锐的部队，到此刻也不免显得有些不堪重负了——虽然在休整期间，中央苏区为它突击补充了2 000多名新战士，使军团人数增到6 000余人，但是这6 000人中，非战斗人员（如军团直属的运输连、卫生队、担架队以及保卫局、供给部等）就占了约2 000人，此外，还有一个随军工作团。

4 000名战斗人员，分编为一、二、三3个师，实际上只有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3个大团。第一师师长胡天桃、政委李仕元分别兼任五十五团团长、政委，该师战斗力最强，是红七军团的主力。第二师师长王裔三、政委李仕清分别兼任五十六团团长、政委。第三师师长王永瑞、政委钱琪柱分别兼任五十七团团长、政委。每师配有一个直属重机枪连（包括一个步兵排）、一个侦察排、一个通信排、一个传令排、一个担架队和一个宣传队。

在武器装备方面，红七军团虽然在东线作战缴获甚多，但此时已全部上交，因而装备并不好。就数量而言，仅有长短枪1 000多支，一部分轻重机枪和六门迫击炮，不少战士仍然背着大刀、扛着梭标及迷惑敌人的假枪假炮。如“机关枪”就是用红毡包裹和涂上锅灰的茅竹管。就质量而言，也十分低劣，全军团仅有的1 000多支长短枪，一部分还缺“胳膊”少“腿”，有的甚至连“老鼠仔”（当时对扳机的俗称）都没有，而长枪又大多是些毛瑟枪，单粒快，最好的也不过是汉阳造，仅有的六门迫击炮，射程很短，威力不大。



红七军团不仅非战斗人员多，而且负荷的其他物资也不少。仅中央交付红七军团携带的160余万份宣传品就有380余担，连同部队的物资用具，多达500余担，行动十分不便。

抗日先遣队保持原有的军团领导体制，决断一切政治和军事问题的是“红七军团军事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三人组成：军团长寻淮洲，军团政治委员乐少华，随军中央代表曾洪易。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和参谋长栗裕被排除在军事委员会之外。

寻淮洲，湖南浏阳人，15岁投笔从戎。参加了著名的秋收起义，随毛泽东艰苦转战井冈山，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作战中，他英勇顽强，机智勇敢，屡立奇功，由战士升任班长、排长、连长、大队长、营长、团长。18岁时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第三十五师师长，以后相继担任了红四军第十三师师长、红十五军第四十五师师长、红一军团第三十一师师长、红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师长、红二十一军军长、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直至红七军团军团长。

在长期的斗争中，寻淮洲已由一名普通的农民自卫军战士成长为威震敌胆、独当一面的优秀青年将领。但当时“左”倾宗派主义风气盛行，他作为红军的老干部是不受信任的，因此，他虽是军团长，却并没有实权。

红七军团的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曾洪易和乐少华两人手中。他们两人都是在莫斯科喝过洋墨水的“正统”布尔什维克，是王明路线的忠实追随者。

曾洪易身材矮小，他在被任命为先遣队的随军中央代表之前，曾任赣东北苏区的中央代表兼省委书记。在那里，他标榜自己“百分之百的正确”，全面否定了方志敏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光辉业绩，完全以“左”的标准来衡量赣东北的工作，差点把个好端端的苏区全部断送掉。曾洪易被调到红七军团，更是身居要职，他不由得更加得意，处处颐指气使，俨然以“钦差大臣”自居。

乐少华则完全是一副少年得志，风流潇洒的派头。这也难怪，从莫斯科回国后，他一直仕途顺利，平步青云，年轻时就已得到军团政委的要职。他和曾洪易一唱一和，完全垄断了先遣队的一切大权。他们踌躇满志，丝毫也不把寻淮洲、粟裕、刘英等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将领放在眼里。先遣队日后的悲剧，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伏笔。

## 二 千里征战

### 东进，还是北上？

告别红都瑞金，红七军团再次踏上了新的征途。

6 000 人的队伍，绵延十余里，全军家当皆携带在身，就像一头负重的老牛，在崎岖的山路上逶迤前行。此去皖南，迢迢千里，照既定计划，部队将沿闽浙取道北上，所过之处大部分是白区。队伍沿途还得散发宣传材料，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而党中央所给的期限仅仅只有一个月，此行之艰辛，由此可以想见。

坐在马上的曾洪易，再不似刚出发时那般趾高气扬。几天的急行军，他已初步领略到了苦头。风餐露宿，马不停蹄，哪似他当闽浙赣苏区省委书记时那样舒适、惬意。幸而，在这里他仍是最高统率，权力欲的满足，多少弥补了一些艰苦环境所造成的遗憾。

然而此刻对寻淮洲、粟裕、刘英来说，却是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们比谁都清楚此行的吉凶莫测。且不说曾洪易、乐少华的妄自尊大和党中央于千里之外常常发来的各种脱离实际的命令，单就敌情而言，蒋介石岂能容忍红军在他的心腹地带任意纵横驰骋？对军团前途、命运的忧虑，深深困扰着几位年轻的领导者。他们时不时地陷入沉思：前进，到底意味着什么？

队伍出发近一个月，走过了长汀、连城、永安县境，攻占了大田县城，进入了闽中地区。在罗炳辉率领的红九军团的掩护和配合下，又攻下了樟湖坂，于7月30日胜利完成了第一步作战计划——抢渡闽江。

福建防备比较空虚，国民党的正规军绝大部分已调往赣边“剿共”前线，境内仅留下少量的部队驻防，多是些战斗力很差的土著军阀和反动民团，通常龟缩在县城据点或土围子里，对于红七、红九军团的行动构成不了大的威胁。

因此，在这期间，红七军团的行军和作战都是比较顺利的，所向披靡，士气甚旺。看来，照原定计划取道古田、庆元，北上浙西，进入皖南，当无问题。

可是，就在这时候，中革军委突然改变计划，电令红七军团由谷口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夺取福州。无奈，部队只好转兵向东。

水口，是福州西北方面的一个重要集镇，国民党福建闽江警备司令部所在地，由警备司令王敬修率部四个营于此扼守。红七军团攻取尤溪口和樟湖坂后，王敬修慌忙丢下水口“警备”，率部乘船顺闽江而下，逃往福州。

8月1日凌晨，红七军团兵不血刃，进占水口。

正在熟睡的水口群众听见外面有响动，起来开门一瞧，无不大吃一惊：街道上、屋檐下，到处躺着服装不一的官兵。他们不知道这些人究竟是什么来头，不敢贸然接近，于是又都悄悄地将门关了起来，从门缝朝外观望。

天亮后，寻淮洲下令部队清扫街道，使残破不堪的水口镇面貌一新，如同过年一般。

当天上午，军团部在水口镇召开八一建军节纪念大会。会上正式宣布：本部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对内仍称红七军团。

红军在闽中地区的突然出现，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震惊，福建省政府乱作一团。

国民党福建警备司令王敬久，慌忙丢下闽东和闽南泉惠防务，将部署在宁德、福安、霞浦和泉州等地的八十七师调回福州，命其主力向水口行动，控制沿江交通要道，以堵击红七军团东下福州，并出动飞机对水口进行轮番轰炸；“围剿”中共苏区的国民党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也急忙由漳州飞到福州“观察”；蒋介石又调在湖北整训的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由长江水路日夜兼程东进，经海运驰援福建；国民党海军陆战队第一旅也由九江乘“克安”号军舰回闽；至于泉州的罗振东部，延平的卫立煌部，永安的卢兴邦部，更是纷纷出动，企图围追堵截，将红军一网打尽。

中革军委关于“攻打福州”的命令，在红七军团内部引起了很大的混乱。

深夜，时钟已经敲过12点了，水口镇原福建省防暂编第四旅旅长钱玉光家的客厅里，依然吵吵嚷嚷，争论不休。围绕东进还是北上的问题，一场争论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乐少华同意向福州发起攻击。寻淮洲坚持自己的意见，寸步不让。

粟裕态度鲜明地站在军团长一边，他说：“我认为，攻打福州，分明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福州城内守备力量远远超过我们，我们硬攻，无异于以卵击石，这在战略上简直毫无可取之处，何况我们此次北上的目的……”

“你懂什么！”乐少华粗鲁地打断粟裕的发言，“攻打福州，是中革军委的决定，难道你敢违抗党中央的命令？”

“问题不在于谁的命令，我们需要的是正视现实，对革命负责！”寻淮洲针锋相对，毫不示弱。

“况且我们的部队也确实缺乏攻坚的思想和物质准备。”一直保持沉默的刘英，这时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这支队伍我当家！”乐少华蛮横地吼道：“谁反对我，谁就是反对政治委员制度！”他说着，向曾洪易瞟了一眼。

曾洪易站起身来，缓缓地点了点头，装腔作势地开了口：“同志们啊，你们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太严重了，动不动就是福州城城墙高大，工事坚固，敌人有陆、海、空三军，这有什么可怕的呀！你们没有看到人民的力量吗？何况福州城内还有我们的地下党组织进行策应。福州之战，正是向敌人显示我们力量的大好时机嘛！你们这样下去是十分危险的！”

“不要同他们多啰嗦了！现在付诸表决。粟裕、刘英不是军委会成员，没有表决权。”乐少华得意地宣布，“二比一，通过。”

寻淮洲再次表明了自己的不同意见。

攻打福州的决定就这样强行通过了。

从水口到福州，约70多公里，沿江的交通干道全部被敌人控制着，要进攻福州城，部队必须从北面大湖方向绕道开进。

8月2日，先遣队从水口出发，直奔福州。

蒋介石的军队当然不是吃素的，红军的一举一动都没有能逃出他们的视线。当天黄昏，国民党出动八架飞机到水口附近，对红军进行侦察轰炸。

先遣队从水口出发之前，部队曾召开攻打福州的动员大会，会上曾洪易情绪激昂，扯开嗓门向全军团官兵宣告：“再过几天，福州城就是我们的了！”战士们在他的煽动下，情绪陡涨，似乎福州之战已胜券在握。

一支军队诚然需要旺盛的士气，然而，这种激情一旦成为一种盲目的乐观，事情就要走向它的反面。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敌机飞过来了，紧接着的便是一阵疯狂的轰炸扫射，红七军团的战士们还没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看到几十个战友倒下去了——这支部队的防空经验竟是如此缺乏！

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曾洪易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懵了！这个平时气壮如牛，不可一世的太上皇，竟然如此胆小。要他指挥部队疏散隐蔽，显然已经不可能了。

参谋长粟裕果断地将部队带往安全地带。

轰炸很快结束了，清点人数，红七军团伤亡七八十人。尚未出战，就遭到这么大的损失，面对此情此景，寻淮洲、粟裕痛心、内疚、愤怒。曾洪易那种天下无敌般的自信也没了，他开始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敌人的疯狂。从此以后，他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是愁眉苦脸，就是大发牢骚，工作日益消极。而乐少华则日益专横粗暴，一意孤行。

8月7日，先遣队到达福州西北近郊，部队顾不上喘息片刻，当晚即向福州城发起攻击。

福州，城墙高大，工事坚固，城内驻有两个正规步兵团、一个宪兵团、三个炮兵营、一个骑兵连和一个新兵训练总队模范营，还有工兵与海军陆战队，及从黄田、水口一带逃去的保安团，城郊南台建有飞机场。

早在红七军团占领水口之日，国民党第八十七师五八一团就赶到福州，担负福州西北郊阵地防务，与原驻福州的第八十七师五二二团左翼衔接；炮兵训练处下辖的第一、二炮兵营则分布于镇海楼、象山、黄布楼一带，第三炮兵营在汤边附近占领阵地，星夜构筑工事；宪兵第四团担任南台警戒；保安处与公安局等担任城内警戒；新兵训练总队模范营为总预备队，置于东湖附近；福州附近各碉堡均派骑兵连分驻，可谓戒备森严，万无一失。

此刻，城内外守敌早已做好应战准备。他们凭借坚固工事拼命扼守，并以猛烈炮火对红军阵地进行轰击。

寻淮洲机智沉着地指挥战斗，指战员冒着敌方炽烈的炮火，勇猛冲杀。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再冲上去。经过一昼夜的强攻，红七军团攻占了大、小北岭和城北的主要街道。但也为此付出了惨

重代价，再这样打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寻淮洲提议，立即召开军团军政委员会紧急会议，研究对策。

曾洪易早就吓破了胆，主张立即撤离福州北上，与闽东红军和游击队会合。

乐少华坚决主张继续攻打福州，他高叫：“不攻克福州，誓死不撤！你们谁敢违抗中革军委的命令？”

寻淮洲非常气愤，但为了大局，仍然耐心地陈述自己的意见：“现在，敌人依托坚城与工事，又有飞机和大炮，而我们屯兵于敌人坚城之下，既缺乏攻城器械，又得不到福州地下党组织的策应，对于敌人的实力、兵力部署和工事构造等也一无所知。福州城这么大，如果继续攻打，就等于把我们的英勇战士往无底的深渊里推，将导致整个军团的覆没，这是对全军团指战员的生命极不负责任的表现！因此，我认为，无论从我们军团所担负的任务，还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作战原则来看，我们都应该立即撤离福州，转移到安全地带去！”

会上决定，把部队撤至北岭头一带，准备向闽东连江方向转移。

福州守敌通过空中侦察，发现了先遣队的行踪，急令所部五二二团向桃源侧面追击，妄图封锁通往潘渡的道路。

8月10日，先遣队第二师从正面向梧桐山高地进击，第三师从左，第一师从右包抄敌之侧翼。战斗从上午9点半开始，一直打到下午3点。红军一支突击小分队冒着枪林弹雨，突破敌人中央阵地，双方展开肉搏。这时，敌机从梧桐山掠过，看到山上的红旗，误以为主峰阵地已失，当即大肆轰炸，突击小分队全体战士与敌人同归于尽。

粟裕令主力适时出击，终于击溃守敌，并追至降虎附近。不料敌增援部队赶到，双方形成对峙。乐少华坚持阵地打法，虽给敌人以大量杀伤，但我方伤亡也急剧增加。

天黑以后，先遣队主力撤出战斗，由刘英等组织机关人员负责护送伤病员，乐少华、粟裕带一个连殿后掩护，经潘渡到达闽东游击区。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初入福建时，声势浩大，所过之处，敌人不知底细，大多闻风而逃。而福州战后，红七军团的实力完全暴露。8月15日，国民党《福建民报》以“福州严重的一夜，匪分两路进袭福州”的大字标题报道说：“7日夜袭我近郊白鹤亭、新店一带阵地时，匪之实力完全暴露”，“其主力不过3000之众，枪2000余支，并有轻机枪20多挺，大刀梭标，参什其间，以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之名义”，“企图牵制闽西国军之进剿”，“实现赤匪所谓围魏救赵之战术”。从此，敌人不仅不再害怕红七军团，而且倾全力对其围追堵截，它的前程更加艰险了。

### 从闽东到闽北

闽东，泛指福宁府的福安、霞浦、宁德、寿宁、福鼎五县与后来从中分出的特种区周墩（周宁）、柘洋（柘荣）以及凭地形自然延伸的连江、罗源、古田、屏南等县的大片区域，境内山高涧深，溪流交错，森林密布，物产丰富而交通闭塞，古人形象地描绘其为：“大海环其南，群山拱其北，东西横亘，藩维千里”，“重岭环海，三面形势奇险，为闽浙之左塞”，是个既便于防守，又利于回旋的地方，历来是反动政权统治的薄弱地区。

根据这里的特殊情况，早在1930年，中共福建省委就在福安和连江分别成立了中共福安县委与连江特委，1931年又派遣卓越的农民运动领导人邓子恢和有着丰富军事斗争经验的省委军事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等亲临福安、连江指导工农武装斗争。接着，又先后派遣任铁锋、叶飞、赖金彪、曾志等人前往闽东，协助开展工作。

1932年10月，福安、连江相继成立中心县委，到1934年2



月，又在福安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且建立起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第二团和第十三团，主要领导人任铁锋、叶飞、魏耿、杨采衡、叶如针、赖金彪、范式人等。这一年的4、5月间，中共福建省委遭敌破坏，闽东党组织和红军没有气馁，在失去上级党组织的情况下，于6月底召开福安中心县委联席会议，组成闽东临时特委，下辖福霞、霞鼎、安福、福寿、连罗、宁德、安德、福鼎、寿宁九个县委和一个福安白区特支，闽东的革命斗争蓬勃开展起来。

北上抗日先遣队进攻福州受挫，被迫移师闽东，中央交待，先遣队务必与闽东游击区取得联系。

时值8月中旬，地处亚热带的闽东地区，天气异常炎热，气温高达三十五六度。先遣队在经过福州、北岭、桃源三次恶战后，兵力锐减，伤病员剧增。由于缺医少药，医疗条件太差，伤员的伤口都在化脓、溃烂。行军所过之处是白区，根本不可能找到足够的民夫来抬担架。

因此，这支本已不堪重负的部队此刻就显得更为累赘了：七八百名伤病员均由干部、战士抬着走，一个伤病员至少需要两个人抬，一个人替换和护理。这支几千人的队伍几乎从头到尾变成了一支担架队！剩下的人员也就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了携带武器弹药和粮秣用具的任务。先遣队出发时，枪支本是严重不足的，可如今损兵折将，战斗中又缴获了一些武器，倒显得枪多兵少了！于是队伍中有一人背两支枪的，甚至还有挑着枪支的！重重负荷之下，部队的行动显得异常艰难，迫切需要一个适当的地方休整部队，安置伤病员。唯一的办法是尽快与闽东党组织取得联系。

就在先遣队努力寻找闽东红军的同时，闽东党组织也在多方打听中央红军的消息。

当寻淮洲率领红七军团渡过闽江，攻打福州的消息传到闽东后，闽东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立即派人到福州侦察和联络，中

共连罗县委于8月11日又派宣传部长陈元前往潘渡迎接，在阆市终于找到了盼望已久的中央红军。

闽东党组织找到了中央红军主力之一的红七军团，不啻久旱逢甘露；而红七军团在连战失利后找到闽东根据地，更是犹如鱼儿得水，鸟儿入林。

寻淮洲如释重负，他顾不上连续行军作战的劳累，当即召见陈元，要求闽东党组织立即发动与组织当地群众投入救护、转移伤病员的工作，陈元欣然受命。

伤病员安置妥善，部队稍事休息，就该考虑下一步的作战计划了。

根据闽东游击队的意见，为了打通宁德、连江等几块小游击区之间的联系，先遣队决定攻打罗源县城。

8月13日，在粟裕指挥下，抗日先遣队先头部队与连江独立十三团会合，而后，迅速进入离罗源城10里的白塔村。粟裕派了四名机警的侦察员与游击小分队一起，化装成乡下农民混入城内，一部分秘密隐藏作为内应，一部分走街串巷进行侦察，很快掌握了敌人布防的情况。

罗源号称凤城，面海背山，地形险要，是省城福州通往闽东的交通要道。这里城垣坚固，城门上均设有城楼。东门外地势平坦；南门外不远处是大山，一条小河自西南向东顺着城墙流去，河水不深，可以徒涉；西门外地势开阔，距城一华里的西门官与棋盘山隔河相望，互为犄角；城北是梅峰山，城墙越岭而过，北门在高山右侧，形势险要。

城内驻有国民党福建省保安第十一团等部共1000余人，其兵力配备为大、小西门两个连和两个机枪排；南门两个排；东门一个排；海军陆战队、县警备队和一个机枪排分布在北门和北门山上。

根据敌情，在下午召开的攻城准备会上，粟裕周密地作了部

署：独立十三团两个连攻打东门，得手后从城内向北门突进，红七军团以一个营攻打小西门，占领城北高地梅峰山，另一个营攻打大西门，占领街心古塔一带，而主力一个团则负责攻打南门。

粟裕发现：敌人以为南门开阔且有护城河掩护，易守难攻，故而防备薄弱，若攻其不备，定能收到奇效。于是果断地决定：东西门先为佯攻，待主力从南门突破后，再对东西分割之敌进行夹击。

罗源战斗，是抗日先遣队从福州、桃源两次正规作战以来，第一次事先进行详细侦察，充分准备，实行奇袭的战例。粟裕完成战斗布置后，信心十足地对连江独立十三团负责人说：“你们的任务是14日上午进城接管，可千万别迟到哟！”

当晚10时，天黑云暗，攻城各部队在寻淮洲、粟裕的指挥下，分三路开向了预定的地点。零时30分，战斗首先在西门和东门打响，南门部队利用东西门佯攻之机，迅速登上城楼，解决守敌后打开城门，点燃火把。埋伏在西门里的侦察员见状乘乱也打开了城门，西门迅速得手，继之东门亦登城成功。守敌突然遭到四面打击，乱成一团，纷纷缴械投降。红军大队人马潮涌进城，胜利的欢呼声响彻夜空。

战斗不到两个小时就得以胜利结束，全歼守敌1000余人，俘虏300多人，其中有国民党罗源县县长，警备队长，看守所和保安团的营、连、排长40余人，缴获步枪、轻重机枪数百支和大批弹药、物资。红军打开监狱，救出被关押的革命者和无辜群众40余人，罗源城里火把与红旗交相辉映，人们奔走相告，红七军团低落的士气又重新高涨起来。

14日下午，抗日先遣队继续向北挺进，在赤溪阳谷村与闽东独立二团胜利会师。寻淮洲与乐少华、曾洪易、粟裕、刘英一起会见了叶飞、詹如柏、范式人等闽东特委和独立二团的负责同志，寻淮洲向失去上级党组织领导仍然坚持革命斗争的闽东特委和独

立二团的同志们表示亲切问候，并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叶飞则代表中共闽东特委汇报了工作情况和拟建闽东红军独立师等问题。

会见之后，叶飞非常爽朗地说：“寻军团长，你们从首都瑞金远道而来，一定十分辛苦，现在到了我们闽东，就是我们的客人，你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凡是我们能做到的，一定义不容辞！”

寻淮洲沉思片刻，答道：“困难确实有，我们离开中央根据地，长途跋涉，转战千里，兵员补充缺乏来源，伤病员也无法安置，负担很重啊！”

“你们要不要补充新兵？”叶飞见状，主动地问。

寻淮洲颇为吃惊：“你们有办法？”

叶飞非常爽快：“别的办法是没有，苏区嘛，群众起来了嘛，这个没问题，你们要补多少新兵？”

“300行不行？”寻淮洲试探性地问。

“行。”叶飞回答得很干脆，“你们是有枪没有人，不像我们是有人没有枪。”

寻淮洲考虑了一下，接着问道：“500行不行？最好有1000，能不能在三天之内动员好送到部队？”

“没问题，不要说1000，3000也行。就是时间要长一些，大概需要一个星期吧！”

抗日先遣队在闽东游击区停留了三天，接收到新兵员1000多，部队的实力得到很大补充。

8月16日，中革军委来电，要求先遣队立刻离开闽东地区，北进寿宁、庆元，然后继续沿闽浙边境北上。

抗日先遣队在福建的行动，早已成为国民党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他们以四十九师为主力，不遗余力地进行围追堵截。此时的形势对先遣队来说，可谓是后有追

兵，前有守敌。要照中革军委划定的路线继续挺进，唯一的办法只有过关斩将，马不停蹄，争取早日进入闽北苏区。

从闽东到闽北，不远的路程，红七军团一路上却是战事频频：

8月22日，攻克福安县西部的穆阳镇，消灭敌军数百人；

8月28日，在浙西南击溃一个保安团，攻克庆元县城；

8月30日，又在竹口与浙江省保安纵队两个团激战，俘虏敌军200多人，缴获步枪数百支，轻重机枪十余挺，迫击炮二门。

不到半个月，打了三次胜仗，先遣队声威大振。9月初，终于进入闽北苏区东北的古楼一带游击区。

闽北苏区，以崇安为中心，是闽浙赣苏区的一部分。这里山高水险，地势十分险要。武夷山脉绵延起伏于闽赣之间，构成了一道边界武装割据的天然屏障，成为红军进可以出击，退可以隐伏的得天独厚的游击地带。

这里对于擅长游击战、运动战的红七军团来说，无疑如猛虎入深山，部队情绪顿时高涨起来，一路的劳顿一扫而光。

闽北苏区的领导人黄道，江西横峰人，192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历任闽浙赣省委组织部长、闽北特委书记，可以说是“老革命”了，在党内很有威望。

抗日先遣队到达闽北苏区，受到闽北人民的热烈欢迎。

黄道建议，先遣队可利用闽北苏区的有利条件作短暂休整，适当补充兵力，以利下一步行动。

寻淮洲反复思索着这里的有利形势并与粟裕、刘英和三个师的负责人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提请乐少华、曾洪易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进行讨论。

在会上，寻淮洲分析了当前的敌我态势及地理环境，指出：“自福州战后，敌人前堵后追，尤其是敌四十九师，一直跟在我们的屁股后面。如果不甩掉这个尾巴，对我们今后的行动极为不利。

现在我们到了这里，既有根据地依托，又有崇山峻岭可以利用，正好发挥我们军团打游击战、运动战的优势，抓住时机，乘敌不备打击或消灭四十九师。再者，我们一路行军作战，部队一直未能得到较好的休整。因此，我提议请求中央同意我们在这里进行短暂的休整，总结经验教训，补充一些新战士，并依托闽北苏区打一两个好仗，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有依托地向松溪、政和发展，把闽东、闽北连成一片，继而把浙南条件较好的庆元连接起来，创造更大的局面，然后跳跃式地向赣东北、浙西和皖南发展。这样，不仅可以鼓舞士气和扩大我们红军的影响，而且可以扩大闽北苏区，减轻中共苏区的军事压力。你们两位以为如何？”

寻淮洲说罢，曾洪易立即接话：“小寻的提议我一半赞成，一半反对。我赞成的是休整部队。因为，我们自出瑞金以来，已历时近两个月，一路行军作战，疲于奔命，不仅得不到休息，而且敌人前堵后追，这样下去，我们必将全军覆没，我们几个活过今天也不知能不能活过明天。现在，我们到了这里，应该而且必须进行较好的休整。我反对的是就地休整，更反对什么依托根据地打击或消灭敌四十九师。因为这里毕竟是游击区，战斗仍然时有发生，不利于休整。要休整，就要到闽浙赣大苏区去，这样才有效果，否则，毫无作用。而所谓的依托根据地打击或消灭敌四十九师，我认为完全是异想天开。这古楼游击区，根本算不上是什么根据地，更谈不上能够依托。”

“老乐，你的意见呢？”寻淮洲转向乐少华。

“我的意见很明确，就是照中央的指示办，没有什么好说的。”乐少华不阴不阳地答道。

既然会上没有统一的意见，会后当然便各行其是。

曾、乐、寻三委员各向中革军委发了电报，陈述自己的意见。曾洪易要求中革军委同意红七军团进入闽浙赣苏区进行休整，接着又发电报给闽浙赣军区负责同志，要他们立即派部队前往古楼

游击区迎接。

乐少华则反对红七军团休整补充，主张立即北上。

寻淮洲将军团广大指战员的心愿和自己的意见，如实地向中革军委作了汇报。

中革军委当即回电，对乐少华的意见予以支持和表扬，对曾洪易的主张予以严厉的批驳，对寻淮洲的主张予以批评，其中指出：“拟于闽北边区休息，这恰恰是敌人的企图，因敌人企图阻止你们北进。”

国民党的报纸每天都在大肆吹嘘“消灭共军多少多少人”，寻淮洲、粟裕、刘英的心里都明白，中共苏区的处境是越来越艰难了，先遣队也是前途堪忧啊！

其实，寻淮洲还有所不知，中革军委要他赶去支援的皖南暴动，此时早已失败，这个消息，中革军委已经知道，却并没有因此而将先遣队的行动路线作相应的改变，也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先遣队，相反地，仍是一味地按照原定计划制约先遣队的行动。

事实上，先遣队此时再去皖南已无多大意义，中央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已是迫在眉睫，按照中革军委派出先遣队的初衷，先遣队此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应该相应地转变为就近牵制敌人，以掩护中央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为此，应该让先遣队在较大的范围内以游击战、运动战的形式吸引和打击敌人。可惜，当时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已陷入严重僵化的状态，既不改正错误的方针，又禁锢先遣队的主观能动性，终于导致了先遣队日后的悲剧！

###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抗日先遣队违心地执行了中革军委的错误指令。在古楼游击区休整几天后，再次踏上了北进之途。

曾洪易因休整目的没有达到，又受到全军团指战员的反对，更加消极悲观，竟要求离开红七军团。

乐少华得到中革军委的赞赏，愈加飞扬跋扈，不仅不把军团其他领导放在眼里，而且对寻淮洲动辄斥骂甚至进行人身攻击，并不断向中革军委打小报告，造谣生事。

此时，中央规定到达皖南的期限已过，红七军团正准备向皖南急进之际，中革军委突然电令红七军团挺进浙西并执行两项“中心任务”：（一）对进攻赣东北红十军和闽北苏区的敌人后方进行彻底破坏；（二）在闽浙赣边境广泛地开展游击战，创建新苏区，破坏敌人后方交通，要求首先破坏龙泉、浦城、广丰、玉山间的公路、交通工具及电话线，进而破坏兰溪、衢县、江山、玉山间的铁路、火车站及玉山、常山、江山之间的公路，而对于原来赋予的去皖南的任务未作任何说明。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寻淮洲、粟裕、刘英疑惑不解，但又不得不执行。

9月9日，先遣队离开闽北苏区翻越武夷山，从浦城王村进入江山县境的岭下，然后经二十八都，越仙霞岭，过石门，于13日攻占江山县商业重镇——清湖镇，消灭国民党浙江保安团一个营，接着胜利渡过江山港，给敌以一定的威胁和打击。

但是，限于当时的装备、技术条件和当地的群众基础，要按照中革军委的要求在广大地段上破坏铁路、公路，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革军委仍不停地来电，批评红七军团“对保安团畏惧其截击是不对的”，“不须以急行军增加病员与疲劳，每日行二三十里”等等，弄得全军团的将士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执行不对，不执行也不对。

“老寻，敌人前堵后追，而我们却毫无机动权，常常挨批评，处处受制约，这样下去，如何是好？”粟裕焦虑地对寻淮洲说道。

“老寻，工作没法开展了。”刘英也犯难了。

下面的指战员更是牢骚满腹，议论纷纷：“军团长，不能再这



样继续下去了。我们拼了老命，中革军委仍然没完没了地指责我们，我们实在受不了。”

作为军团长的寻淮洲又能说些什么呢？他满腹的委屈无处诉，有劲使不上，有智无处用，如同一头健壮的水牛掉在一口深井里。但寻淮洲深知，个人的荣辱是小，革命事业最要紧。他一面耐心地向中革军委实事求是反映情况，一面默默地忍受着委屈，细心地劝慰开导战士们，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率部继续前进。

14日，先遣队炸毁贺村铁路桥和汽车站。次日，又破坏了杭头铁路和铁路桥，进抵江（山）常（山）公路的大陈地区，打垮国民党浙江保安第三、四、六团各一部共七个连的进攻，并于当晚派遣先头部队挺进常山。

常山，位于浙西山区，南接江山，北连开化，东邻衢州，西毗玉山，虽为山区，但水陆交通很便利。水路，有常山港与钱塘江水系衔接；陆路，有常（山）江（山）公路、常（山）衢（州）公路、常（山）华（埠）公路、常（山）玉（山）公路与毗邻各州、县相连。

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建立后，方志敏常率红十军与游击队活动于常山西北大山区，并多次进至常山西乡的草萍、球川一带，对国民党常山政权威胁很大。

国民党为了维持在常山的统治，除了在草萍、球川一带修筑碉堡和驻扎军队外，又在县城四周的后山、虎山、西峰等处增修了堡垒，补筑了城墙，加固了工事。

平时，常山县城驻有国民党地方武装基干队、警察、保安队250余人。第五次“围剿”开始后，国民党浙江省保安队副总指挥兼第三团团长蒋志英率浙保第三团、第四团和浙保独立营驻防于衢州、江山、常山、开化和江西的玉山一带；浙江保安处长俞济时亦频繁来往于衢、江、玉、常、开之间；此外，以往历届国民党常山县县长均由文官担任，而此时担任常山县长的却是黄埔军

校的第三期毕业生，曾任保安团团长的李文凯。可是，当红七军团进至大陈地区后，李文凯一面向外求救，一面慌忙将基干队和保安队分据各碉堡，结果常山县城仅有几十名警察防守，兵力十分空虚。

寻淮洲得悉这一情况，连夜派遣一支以五十六团第三营为主的先头部队共500余人，兵分两路袭取常山。一路沿常山港边西行，至白马桥击溃了刚从衢州调来的专署军官团100余人，然后迅速从东门进入城内；一路从南门排水沟进入城内。

李文凯带着副官从县府大门口出来察看情况，见有不少部队向他迎面奔来，他以为是自己的部下，便大声喝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干什么？”

他的勤务兵还比较机灵，一看势头不对，赶忙拉了拉他的衣袖，李文凯如梦初醒，慌忙转身逃进县府。

城内的敌人见红军入了城，纷纷逃往后山，钻进碉堡内疯狂射击。红军得知县城后山上有从华埠方向开来增援的敌人一个营，于是主动撤离常山县城，在木棉岭留下一个连警戒衢州和常山方向的敌人，其余从原路返回大陈。

16日，红七军团奉命从大陈出发，17日进至常山芳、芙蓉一带。

当日，中革军委电令：红七军团在未执行已赋予的破坏杭江铁路及附近公路的任务前，禁止继续北进。次日，中革军委却又改变主意，电令“应即向遂安前进，以袭击方法占领该城，并确保于我军手中”，并规定以遂安为中心，于安徽边境的淳安、寿昌、衢县、开化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区，尔后再向浙皖边境的歙县（即衢州）、建德、兰溪、江山、屯溪地域发展。

中革军委的这一系列批评和指示，特别是要求红七军团以遂安（今属浙江淳安县）为中心建立苏区，完全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寻淮洲、粟裕、刘英等无不为此大伤脑筋。

遂安位于新安江上游，距离杭州约 200 公里。这地方虽是山区，但处于衢江、兰江、新安江三角地带，江水较深，汽船可以通到建德、兰溪，还有浙赣铁路和公路干线，交通方便，对红军的游击、隐蔽都十分不利；而且，那里地瘠民贫，居民多以竹木为生，产粮很少，难以解决部队的给养；尤为重要的是，当地根本没有党的工作基础，却是赣东北逃亡地主的聚居之地，反动势力很大，因此，不论从政治条件看还是从自然条件看，以遂安为中心建立根据地都是不适宜的。

就在这时，国民党第四十九师、浙江保安第一、第二纵队以及新增调来的补充第一旅王耀武部，从几个方面加紧对先遣队追击和“围剿”，基本形成了一个包围圈。敌人扬言：三日之内，要将红军全部消灭于遂安白马地区。

派出去的侦察员很快就回来了，侦察结果表明，除了上述情况外，国民党还把云南的第七师从闽浙赣边剿共前线调来浙西，由蒋介石心腹俞济时指挥追击红七军团。蒋介石下了死命令：获战绩者赏；行动迟缓，畏缩不前者以贻误军机论罪。俞济时先前曾被蒋介石给予记大过和撤职留任的处分，眼下为了撤销处分，捞回乌纱帽，他亲自坐镇遂安调兵遣将，准备在遂安露一手。

侦察员说完，从怀里掏出一封从敌兵身上缴获的密信。寻淮洲展开信，只见上面写着：“你们 18 人要坚持下来，今晚有大批国军来白马。”

敌情严重，红七军团处境十分危险。如果继续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迎战来敌，那么，等待红七军团的就只有全军覆没。

千钧一发之际，寻淮洲挺身而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现在我们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只有不顾中革军委的指令，浙江是绝对不宜久留了。我决定，部队立刻向皖南和皖赣边转移！”

粟裕、刘英立即表示赞同。

曾洪易自出闽北就消极抵触，连日来又见敌人加紧围追堵截，

天上时有敌机侦察轰炸，他吓得魂不守舍，夜间常做恶梦。当寻淮洲提出向皖南和皖赣边行动，他也表示同意。

持反对意见的只有乐少华，他说：“北攻遂安，并以遂安为中心创建新苏区，这是中革军委赋予我们军团目前的任务，我们必须坚决执行。向皖南和皖赣边行动，这是违抗中革军委的命令，实行退却逃跑路线，我坚决反对。”

寻淮洲气得满脸通红，但他知道，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便按捺住愤怒，心平气和地对乐少华说：“政委同志，你能不能冷静一些，不要动不动就扣帽子好不好？你有理就在桌面上摆嘛！现在敌情这么复杂，单凭我们这几千人，这么些装备能在遂安站稳脚跟，能以遂安为中心建立起根据地吗？何况去皖南也是中革军委给我们规定的最终目的地。所以，我考虑再三，……”

寻淮洲还没有说完，乐少华猛地站起身来，拍着桌子吼道：“寻淮洲，你的话有完没完？不管你怎么说，要去皖南和皖赣边，休想！我是军团政委，有权决定军团的一切。”

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此刻，任何一点让步都可能招致全团的覆没，寻淮洲也跟着拍案而起，大声而又严肃地说道：“乐少华同志，这是商讨军务，不是骂街，请你注意一下自己政治委员的身份，更不要以势压人。我告诉你，我是军团长，负责全军团的军事指挥，为了圆满完成中央赋予我们军团的使命，也为了保全这团几千人的生命安全，我坚决反对攻打遂安，主张立即转向皖南和皖赣边行动。”

乐少华一听，更是暴跳如雷，他猛然抓起自己喝水的土饭碗摔在地上，只听得“嘭”的一声，土饭碗被摔得粉碎，继而一脚踢翻板凳，圆睁双眼，左手叉腰，右手指着寻淮洲咆哮道：“寻淮洲，我再一次警告你，不打遂安去什么皖南皖赣边，是违抗中革军委命令的退却逃跑行为，我要报告中革军委，你可要负责任。”

“大丈夫敢做敢当。我身为军团长，共产党员，为党的事业，

为全军团人的生死存亡，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何况负责是我的职责。至于你要向中革军委汇报，这是你的职权，你去汇报好了。不过，我也要警告你，不顾客观实际情况地瞎指挥，将导致全军团的覆没，是对党、对人民的极大犯罪，是拿全军团几千人的生命开玩笑，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寻淮洲豁出去了。

寻淮洲说罢，乐少华就怒气冲冲地跑出去了。曾洪易呢？他默不作声，对于这种场面已司空见惯，再说，他已无精打采，自顾不暇了。

当晚，寻淮洲即率先遣队连夜跳出重围，向皖赣边界转移。

红七军团突然转向皖南和皖赣边行动，大出俞济时的意料之外，他连日来费尽心机编织的罗网毫无作用。惋惜之余，他急忙下令第四十九师兵分两路追击，同时电告驻皖南屯溪的国民党第十五军军长刘茂恩加强戒备，企图再次罗织大网，将红七军团一网打尽。

9月23日，是农历八月十五——中国民间传统的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红七军团的几千指战员谁不思念自己的父母妻儿，盼望与家人团聚？作为军团长的寻淮洲，自投笔从戎以来，已离开家乡，离别自己的父母兄妹和妻子七年有余，从未有过任何联系，此刻，他也萌发出思念之情。可是，眼下斗争如此残酷，就是能给战士们打个牙祭，能够正常指挥作战，也就心满意足了，哪还敢奢望与家人团聚呢？

然而，紧追不舍的敌人，就是在这样的良宵佳节也没有丝毫休战之意，他们于当夜向红七军团的宿营地鲍家村、陈村进行袭击，与粟裕率领警戒送驾岭的部队遭遇。

国民党第四十九师兵分两路，占领送驾岭左、右两侧的山头。

在两面受敌的情况下，粟裕沉着应战，一颗流弹飞来，恰好击中他拿枪的右臂，他忍痛撕下一截衣襟，将负伤的臂膀连同陷在肉里的弹头紧紧缠住，继续指挥战斗。

由于敌人分占了两边的山头，粟裕很快想到一条克敌制胜的妙计。他命部队悄悄撤出，两边的敌人不明真相，见对面的山头火力密集，都以为红军已占领了对面的山头，就拼命地向对方射击，结果，两股敌人互相扫射了一夜，死伤枕藉，直到天明才发觉红军早已无影无踪了。

第二天，红七军团翻越60里大连岭，进入安徽南部的歙县石门、狮子石等地。

安徽是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区。1934年初，原省主席陈调元调任赣、闽、粤、湘、桂五省“剿匪”预备军总司令，由“杀人魔王”刘镇华接任省主席职务。

红七军团挺进浙江后，蒋介石命刘镇华严密布防，阻止红军进入安徽。刘镇华将自己的基本部队和政治资本第十五军驻扎于皖南的屯溪一带，严密防范。

红七军团进入石门、狮子石一带后，刘镇华即令第十五军军长刘茂恩以一旅之众前往拦截，9月25日在石门与红七军团遭遇，寻淮洲率部勇猛掩杀，经两个小时激战，将敌击溃，毙伤俘敌300余人，另俘壮丁队200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寻淮洲获悉皖南的驻军情况，即率部翻越白际山，于30日进抵皖赣边的段莘（婺源县北）地区。

这里距原定的最后目的地皖南已经不远，至此，红七军团方知要他们赶来支援的皖南几县的暴动早已失败，有些干部和群众分散活动在山里坚持斗争。

红七军团在转移的路上，碰到皖赣特委和当地游击队的领导同志，根据他们的意见，红七军团继续西进到黎痕地区。路上并不轻松，先后在查湾、流口、鸦桥、黎痕等地数次与敌遭遇，幸好损失不大，反面缴获不少武器弹药。皖赣苏区又给红七军团补充了500多名新战士。至此，先遣队在经历了浙西一段艰险转战之后，开始出现了转机。

皖赣边和皖南比浙赣边和浙西的条件要好得多。

在地形上，皖赣边有鳧江、白际山，皖南有黄山，既有大山区，又有丘陵地，河道也很浅，可以徒涉，便于部队隐蔽和游击。经济上，这一带也比较富裕，盛产粮食，部队的给养不成问题。这里的文化教育也比较发达，稍大一点的村子都有报纸，便于了解国民党的动向。

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有党的工作基础和影响，群众普遍觉悟较高，为游击战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条件。先遣队决定，在这里停下来，开展游击战争。

为此，寻淮洲直接发电报向中革军委请示：红七军团留在皖赣边开展游击战争，与当地的党组织和游击队密切配合，争取在休宁、婺源、祁门一带消灭尾追之敌，扩大皖赣苏区，寻机入浙行动；为便于机动作战，将部队整编为四个营，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在敌人进攻的严重情况下，允许军团自主地解决一些问题。

军团的这些建议，都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的正确意见和要求。然而，当时中央的“左”倾领导人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见，他们就是不予批准。10月15日，中革军委再次来电，命令红七军团立刻从皖赣苏区转移到闽浙赣苏区进行整顿补充。

去闽浙赣苏区，曾洪易求之不得，乐少华更是坚决执行。寻淮洲与粟裕、刘英商量后，一致认为：皖赣边有发展条件，而进入闽浙赣苏区要通过几道封锁线，部队得承受很多不必要的牺牲。于是，17日，寻淮洲去电向中革军委请示：如红七军团今后仍需北上皖南，则不如不去闽浙赣苏区，而以主力向以雷湖、柯村为中心的石埭、太平、祁门、休宁等皖南游击区行动。

次日，中革军委复电表示同意。可还没容寻淮洲、粟裕乐上两天，中革军委又电令红七军团仍要去闽浙赣苏区。

如此反复折腾，全军团上下无不为此大伤脑筋，但又无法抗拒，只得遵命立即向闽浙赣苏区转移，经浮梁、德兴之间，进入

闽浙赣苏区的重溪地区。这一去，又演绎出了后来的无数艰险与悲壮。

红七军团自瑞金出发到进入闽浙赣苏区，转战闽、浙、赣、皖四省的几十个县镇，历时近四个月，行程1600多公里，尽管受到中央“左”倾错误的指导和曾洪易、乐少华的干扰，但是，全军团广大指战员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和勇敢顽强的革命精神，连续行军作战，击退了敌人无数次的围追堵截，打了不少胜仗，粉碎了敌人消灭先遣队的企图。

先遣队沿途还尽可能地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救亡政策和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部队虽然减员较大，但沿途给各游击区留下了1000多名军事骨干，到达闽浙赣苏区时还保持了约3000人。广大指战员用血汗写下的这一段战斗历程，必将永垂青史。

当时“左”倾领导者按照主观主义、冒险主义的战略意图来衡量红七军团的北上行动，认为他们没有完成“促使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的任务，还把曾洪易个人的退却动摇同寻淮洲及广大指战员的光辉战斗业绩混淆起来，给这支部队扣上“染上了机会主义”、“执行了退却逃跑主义”等等荒诞的大帽子，这些确是不符合事实的错误结论。

### 三 怀玉山悲歌

#### 重溪改编

闽浙赣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后，较早建立起来的一块比较著名的革命根据地。几年来，苏区从小到大，百折不挠，红旗一直在这里高高地飘扬着。

闽浙赣苏区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是方志敏。



方志敏，1899年出生在江西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一个世代务农的大户人家。祖父生有七男两女，全家有三四十口人，耕地200余亩，其中有100多亩是向地主租种的客田，每年要缴纳租谷200多石，全家男子凡能下田的一律下田，小孩则要放牛、砍柴、捡柴。妇女在家弄饭洗衣、喂猪养鸡、织麻纺纱，在全家的辛勤劳作下，生活勉强可以过得去。祖父去世后，叔伯们便各立门户，方家也随着败落下来。

方志敏的父亲方高翥是位勤劳朴实的农民，年轻时曾与人合伙做茶叶生意，后因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价格惨跌而亏了本，被迫回乡务农。方志敏的妈妈金香莲，是位善良谦和，持家勤俭的女性。

祖父在世时，方家家训甚严，一家人勤俭劳作、和睦相处。这样的家庭环境使方志敏从小就养成了刻苦耐劳，乐于助人的高贵品质，在四邻八乡中颇受赞誉。

方志敏自幼聪明过人，读书十分用功，悟性和记忆力很强，一向很受先生的赏识和同学的敬佩。他的几任塾师都将他视为奇才，以致方家虽捉襟见肘，方高翥也不忍让儿子就此辍学，而是忍痛变卖祖田，多方求贷，将志敏送到外地求学。

弋阳高小毕业后，方志敏来到南昌，就读于“南昌甲种工业学校”，此后又转入九江南伟烈大学。读书期间，方志敏就已显出了卓越的组织才能和过人的革命见识，他在学校里领导组织革命团体，发动学潮，校方对他深为头痛。方志敏也开始在弋阳、南昌、九江等地小有名气。

然而，六年的离乡外出求学，已给家里增加了一笔巨大的债务，父母早已不堪重负。而且，读书期间，方志敏过于操劳，早早地就染上了肺结核病，并且从此种下了病根，他不愿意再给家里增加负担，于是辍学回乡。

1922年，方志敏怀着积极要求改造旧社会的宏愿，来到了中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在上海，外国人的骄横跋扈，中国人的倍受凌辱，无一不让他感到怒火中烧。此时的方志敏，谋事无成，就学无着，寂寥长夏，赋闲沪滨，唯有以笔寄情，并向一些进步刊物投稿，从而结识了一些革命志士，开始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8月，他经赵醒侬的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方志敏受组织派遣，返回江西领导农民运动，任中共江西区委委员兼农委书记，江西省农民协会委员兼秘书长，主持省农协工作。在斗争实践中，方志敏逐渐成长为优秀的革命领导者。

1927年底，他领导发动了弋阳、横峰农民暴动，虽遭失败，但方志敏从中悟到了建立根据地和革命军队的重要性，此后他便开始着手这些工作。其间，数次受挫，方志敏临危不乱，苦心经营，每每挽革命于危难之际。肺结核、痔疮屡次发作，苦不堪言，他亦无暇顾及。

1929年3月初，中共信江特委正式成立，方志敏任代理书记。10月，信江苏维埃政府成立，方志敏被选为主席团执行主席，至此，信江革命根据地形成，各项建设事业也初见成效。特别是军事斗争方面，方志敏领导的红军连续打破了国民党军的五次局部“围剿”，使红军部队在战火中不断壮大，由一支地方武装发展成为正规红军——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

1930年7月，中共信江特委与赣东北特委合并，成立了直属党中央的赣东北特委，闽北苏区亦划归赣东北特委领导。随后，又建立了统一的政权机关——赣东北特区革命委员会，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此时，遵守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决定，赣东北红军扩编为红十军。

1930年夏至1932年冬，在方志敏等领导下，红十军积极活动，鏖战沙场，两次出击赣北，两次挺进闽北，接连粉碎了敌人

对根据地的多次军事“围剿”，巩固和发展了赣东北根据地，开辟了闽浙赣根据地，盛极一时。

其间，方志敏先后担任红十军政委，赣东北省委常委，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主席团成员。由于他的卓越领导和突出贡献，中华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授予他一枚勋章。

1933年1月，红十军奉中革军委的命令南渡信江。在贵溪与中央红三军团一部会师，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属红一方面军建制。同年10月，红十军扩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七军团。闽浙赣苏区随后又成立了新的红十军，此后便有老十军、新十军之称。

新十军成立后，立刻投入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但由于“左”倾领导者在战略战术上的根本错误，反“围剿”斗争未能取得胜利，闽浙赣苏区已日益缩小，斗争日益艰难。

就在这时，方志敏忽接中央来电，称由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已损失过半，现进至闽浙赣苏区的德兴、重溪休整，责成方志敏立即前往该地，组织更强有力的先遣队北上。

方志敏深知这一使命责任重大，而红七军团又是以红十军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心中也十分惦念那些老战友，接电后，立刻偕同省委、省苏维埃、省军区的领导，赶赴重溪。

红七军团的战士们一进入闽浙赣苏区，即被当地的群众亲切地称为“老十军”。而今，又见到了过去朝夕相处的老战友，他们无不百感交集。

方志敏来到重溪，一眼就见到了当年那个在闽浙赣苏区任省委书记时“左”得出奇的曾洪易，虽然此前方志敏早已知道曾洪易是先遣队的中央代表，可是此刻猛然看见，仍不免有些吃惊。

这个口口声声标榜“百分之百正确”的人，在苏区曾大搞肃

反运动，全盘否定赣东北的工作，曾坐在葛源的风子里，闭起眼睛，强令红军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强攻堡垒，那成百上千个战士的生命都是他这种盲目的瞎指挥葬送的。

然而，眼前的曾洪易，早已没了当年的神气劲，耷拉下来的眼皮，仿佛在暗示他的“不如意”。

“你们辛苦了，”方志敏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礼貌地向曾洪易伸过手去。

“唉，革命总是要吃苦的哟！”曾洪易无精打采地应和着。

时间紧迫，方志敏无暇去考究曾洪易的突变，就马上邀集先遣队的领导和闽浙赣省的领导一起开会，商讨重建先遣队的工作。

曾洪易发言总是走题，尽讲丧气话，弄得会议不得不改变议程，先对他进行必要的批评，并致电中央，报告他的惊慌、动摇情绪。中央立即复电，宣布撤销其中央代表资格。

会议得以正常进行后，迅速研究并决定了先遣队的改组和干部配备：

新红十军与先遣队合并，组成红十军团，由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师，将原红七军团编为十九师，寻淮洲任师长，聂洪钧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如痴任参谋长；新红十军的二十八师、二十九师编为二十师、二十一师。二十师的师长、政委由刘畴西、乐少华兼任，二十师师长胡天桃。

新先遣队的整个北上抗日行动，由方志敏代表中央全盘负责。

至于曾洪易，再随军虽然是不合适了，他也不愿再随军，便留在苏区，按中央的决定，让他主持闽浙赣省委的工作。

先遣队的行动方向，仍是浙西、皖南。分两路进军，由红十九师先向浙西进发。

这时，党中央和中央主力红军已经仓促地退出了中央苏区，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长征。先遣队以后的行动就由留在中央苏区的中

央分局直接领导了。

当时敌情非常严重，中央苏区丧失了，闽浙赣苏区的中心葛源也危如垒卵。方志敏匆匆赶回葛源，对闽浙赣苏区如何坚持斗争的各个方面都作了具体部署。1934年11月24日，他含泪告别苏区，率领先遣队的二十师、二十一师，向皖南进发。

方志敏走后不几日，葛源即被攻陷，这当然是预料中的事，按方志敏的部署，也不是死守葛源拼消耗，而是以留下新十军的三十师为主力，以磨盘山为中心，机动灵活地开展游击战争。这样虽然艰难，但只要审时度势，坚持斗争，待机再起还是可能的。

哪知，这时的曾洪易已被吓破了胆，尽管手中还掌握有一个师和许多游击大队，但他仍感到朝不保夕，一心想逃跑。首先，他以“苏区粮食困难”为由，命令红军战士疏散回家，再以“共产党员应该以身作则”为要求，强迫党的干部也离队回家。此时，干部、战士的家乡多已被敌人占领，他们一回去，便惨遭屠杀。接着，曾洪易又进一步以“游击队、赤卫队不会作战，而且暴露目标”为由，将几个地方武装全部解散。这些人脱离组织之后，再也没有力量抵抗反动派的压迫了。他们有的被杀害，有的逃亡异地他乡，还有的被迫自首，甚至不得不为反动派做事。

曾洪易把根据地丢光了，把军队遣散了，然后溜之大吉。不过，他这一溜，可不是溜往闽北躲藏起来，而是溜去南京，向国民党自首告密，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叛徒。

一场轰轰烈烈、生机勃勃的闽浙赣苏维埃运动，就这样被葬送了。

这些事，方志敏知道吗？不知道，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红十军团组编后，中央军委给它的任务是：军团部和红二十、二十一师留守闽浙赣苏区，打击“围剿”之敌，保卫老苏区；红

十九师与军团政治部为先遣队，出动到浙皖赣边，打击“追剿”之敌，开辟新苏区。

对于重溪的人事调整，寻淮洲的内心十分痛苦。他痛苦，并非为自己由军团长降为师长，职务的升降在战争年代是常有的事，一向心胸宽阔的他绝不至于如此狭隘。令寻淮洲痛苦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好端端的一个中央革命根据地，竟被“左”倾错误领导者折腾得精光；红七军团的北上行动，自己作为军团长，既无军事指挥实权，却又左右受制，进不能，退不得，空有一腔热血，一身本事竟无以施展！更使他挂怀的，是新组建的红十军团前途堪忧。

事实已经再明白不过了：

中央明知曾洪易与方志敏扭着干，曾将方志敏创建的一个好端端的闽浙赣苏区搅得一团糟，却又委以他闽浙赣省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的重任。终于使一代人的辛勤创业付诸东流。

红七军团中有一个专横跋扈的乐少华本以够呛，现在倒好，调走了曾洪易，却又调来了刘畴西。

刘畴西是黄埔军校的第一期毕业生，到过苏联学习，参加过东征、北伐和南昌起义，在叶挺的部队中任过营长，团参谋长等职务。说起来应该是一个既有理论，又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干部。可是实际上，却是一个只知机械地执行中革军委的指示，根本不考虑实际情况的教条主义者。

为完成中革军委下达的“开辟新苏区”的任务，红十九师必须首先冲出闽浙赣苏区。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入闽浙赣苏区不易，出去更难。当初，寻淮洲建议，为避免不必要的伤亡，红七军团不入闽浙赣苏区。可是，中革军委坚持己见，非要他们去那里整顿不可。而今，好不容易进入闽浙赣苏区，却又下令红七军团杀将出去，岂不是又要付出更大代价？

然而，军令如山，虽早已吃够了瞎指挥的苦头，这时的寻淮洲所能做的，唯有再一次的忍辱负重，尽力为之！

11月18日，寻淮洲奉命率领十九师从江西德兴乌如墩出发，向浙皖赣边进发。部队翻越怀玉山，经玉山的道塘、朱坞，于21日通过敌封锁线进抵常山的草萍、中坊一带，准备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夺取常山城。

红十九师的行动令国民党始料不及，浙保纵队副指挥蒋志英立即率所部两个团从玉山驰援常山。

敌情突变，袭取常山已不可能，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军事指挥员，寻淮洲深知随机应变的重要性。以前在红七军团时，受到曾洪易、乐少华的束缚，给先遣队造成了许多无谓的牺牲。这次，红十九师是单独行动，终于摆脱了曾洪易、乐少华的干扰。

有了自主权，寻淮洲相信他已胜利了一半，他决定先将敌人拖一拖，然后瞅准机会给其狠命一击。

十九师进抵常山十里山附近后，突然兵锋一转，北折至常华公路，然后过常山港，经芳村、芙蓉等地，23日攻占遂安白马市，毙伤俘敌十余名。蒋志英闻讯后，亲率浙保两个团自常山匆忙尾追而来。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蒋志英自投罗网，上次我们便宜了他，这回非好好治治他不可！”寻淮洲兴奋地对聂洪钧、王如痴说道。

白马市是千里岗大山之中的一个小镇子，周围山峦起伏，连绵不断，距开化、常山、衢州、遂安、淳安城都较远。两个月前，寻淮洲曾率红七军团途经此处，对这里的地形比较熟悉，他再一次仔细地察看了一遍，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逐渐在胸中形成。

这天早晨，两架敌机飞临白马市上空来回侦察，未发现红军任何踪迹，扫兴而归。

蒋志英于是放心地前进，大摇大摆地走近白马市。

“他娘的，追了大半天，连个共军的影子也没见着，歇歇气再说。”蒋志英气急败坏地说。

哪知，他们刚刚歇下，突然四下里枪声大作，喊杀声、手榴弹爆炸声震天动地。

“不好，中了共匪埋伏。快，抢占太平山。”蒋志英还算聪明，赶紧大声命令道。

然而，太平山并不太平，寻淮洲早已在此布下了天罗地网。

战斗打响后，红十九师一部于乳洞山制高点以猛烈火力居高临下压制敌人，一部从里湖、白马左右两翼迂回包抄。蒋志英虽拥有两团兵力，又有优势装备，但在红十九师的突然攻击和勇猛分割包围下，乱成一锅粥。

打到天黑，蒋志英手部负伤，无心恋战，率残部狼狈窜回常山。红军乘胜追击十余里，毙伤俘敌100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

白马大捷，红十九师军威大振。寻淮洲获悉离白马不远的分水县城国民党守备力量十分薄弱，仅有一些地方保安队。寻淮洲召集团、营长会议，决定迅速出击分水。会后，十九师经由上坊，渡新安江，翻探汉岭，于29日进入分水县城。

分水县城（今浙江桐庐县武盛镇），地处浙西山区，距徽州80公里，离浙江省府杭州不过百里。寻淮洲计划，迅速攻克分水，然后佯攻杭州，以声东击西的战术牵制敌人兵力，乘机越过杭徽公路，进军徽州、威逼芜湖，震慑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

红军突然进逼分水，国民党分水县长钟诗杰寝食难安。据《分水县志》记载，钟诗杰“事先调集自卫队以图固守，并急电省府乞援，浙保处长俞济时先派省军二连来，继由五独立旅旅长耀武率领抵桐庐”，接着又“急遣邑人余昌麟（自卫队队长）飞骑驰桐，悬王争进，王乃溯天目溪兼程上。”

由于分水县城地处国民党统治的心腹地带，缺乏党的工作基础，



要获得对方的情报十分困难，敌方的这些布置寻淮洲无从得知。然而，久经沙场的寻淮洲凭经验想见，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交通和通讯便捷，敌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

因此，当部队进抵分水县合村时，寻淮洲即将部队集合于豪山小学的操场上做了简短的战斗动员，并派遣侦察连和战斗力较强的五十五团先行出发，沿天目溪西岸向分水县城前进，强调沿途注意敌情变化，随时报告。

侦察连和五十五团袭取三里亭，活捉防守该地的七八个国民党警察和一个巡长，可是，在离分水县城不到三公里的山脚下遇到大量国民党正规军的堵截，激战四个多小时，因天色已晚，敌情不明，地形不利，于是除留下小部兵力在南堡一带阻击，牵制敌人外，其余由原路撤回原地与主力会合。

当先头部队与敌人激战之时，寻淮洲已率十九师主力到达百岁坊一带。得悉敌情变化后，寻淮洲下令部队就地驻扎，并提审俘虏，方知堵截之敌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王耀武补充第一旅。该旅编制七个团，共有六七千人，是1933年后由保定编练处的三个补充旅改编的，军官大多是中央军校的毕业生，士兵多为北方人，武器装备较好，但战斗力并不很强。

根据突变的敌情，寻淮洲与聂洪钧、王如痴和各团主要负责人研究决定，放弃攻打分水县城的计划，准备转移。

王耀武以为红军畏惧逃窜，令部队倾巢追击。当日上午，其先头部队追至离百岁坊仅三华里的新村附近，遭到防守盘龙山的红五十五团的有力阻击，仓皇退据富家村。

王耀武旅获悉红军还在百岁坊，即在富家村口和村中筑起两道防线，并在各要道口埋设了鹿砦，以防红军袭击；同时派遣部队抢占了盘龙山右前方的金子山，企图居高临下压制盘龙山的红军。

“真是欺人太甚，赵参谋，立即通知各团团长、政委来师部开

会。不给王耀武点颜色瞧瞧，他不知道马王爷长着几只眼。”寻淮洲愤怒了。

不一会儿，各团主要负责人都来到了师部。

会上，寻淮洲对敌情进行了仔细分析，指出：“王耀武旅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数量、装备占了优势，但它刚组建不久，新兵多，战斗力并不强，而且长途跋涉，人困马乏，对这里的地形并不熟悉。现在，它依仗人多势众，装备好，对我们步步紧逼，以为我们会畏惧逃跑，然后乘机吃掉我们。我想，我们来个将计就计，利用王耀武的骄横，杀他个回马枪，压压他的嚣张气焰，以改变我们目前的被动局面。”

寻淮洲的主张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会后，寻淮洲进行了周密的战斗部署：以十九师一部占领金子山对面的凤凰山，牵制敌人，其余兵分两路：一路从金子山正面强攻，吸引敌人的火力，一路悄悄绕到金子山侧背，出敌不意打击之。

经几小时激战，十九师攻占了制高点，王耀武闻报，大发雷霆，下令夺回制高点，但连续几次反扑，均未得逞。

寻淮洲抓住战机，乘胜反击，敌人乱成一团，纷纷逃窜。王耀武见状，拼死组织抵抗，终于稳住了阵脚，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与敌对垒拼消耗，红军拼不起，寻淮洲也决不会干。深夜时分，寻淮洲见打击王耀武的目的已经达到，便留下小部队以断断续续的枪声迷惑敌人，率主力乘黑夜向皖南转移。

第二天，也就是12月1日，度过难熬之夜的敌人以为红军还在阵地上，便在两架飞机的配合下，发起进攻，结果却连个红军的影子也未见着。

此时的红十九师早已进至与昌化交界的天子岙、桥坑、青坑口和湍口一带。王耀武师的尾追被摆脱了，红十九师的行动重新获得自由。

红十九师在湍口宿营，准备摸清敌情后，进入皖南。寻淮洲找到师部作战参谋赵春和，对他说：“敌人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今晚，你带一个侦察班去监听一下敌人的电话线，看看敌人有什么动静，有情况立即报告。”

果然不出寻淮洲所料，当晚，赵春和等人从敌人的电话线上截获重要情报：国民党浙江保安司令部与安徽保安司令部通话，妄图阻挠红军进入皖南，组织两省“联防会剿”，电告安徽保安司令部派军队到昌化白果庄袭击红军，阻挠红军越过杭徽公路进入皖南。

寻淮洲听罢赵春和的报告，思索片刻后说道：“敌人不让我们过杭徽公路，想在白果庄偷袭我们，没那么容易，我们就来个反客为主，要敌人偷鸡不成反失一把米！”

12月2日上午，红军在湍口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并当场处决了七名土豪劣绅。会后迅速挺进白果庄，抢占了马头山制高点，在“两山夹一线”的杭徽公路新民桥至横溪的侯头村，设下了袋形伏击圈。

下午4时许，国民党安徽保安司令部果然调集近千名保安队员，分乘18辆汽车开过新民桥，钻进伏击圈。寻淮洲当即下令烧毁横溪桥堵住敌人的退路。

保安团一看大势不妙，慌忙弃车过河爬上沙头村后的童山，与红军形成对峙，双方展开激战，战至午夜，十九师歼敌一营，俘敌70余人，缴枪70余支。

十九师乘胜越过杭徽公路，于次日进入安徽绩溪县之阴山、岭脚下、半岭亭一带。此处距徽州府不远，沿途不断有群众报告：徽州防备十分薄弱，仅驻有国民党一个连的兵力，请求红军攻打徽州。

这可是个歼灭敌人，扩大红军影响的大好时机。徽州府，是国民党在皖南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地，打下徽州，其影响可想

而知。以十九师3 000之众攻打敌一个连防守的徽州城，犹如探囊取物。

然而，机智的寻淮洲稍加思忖，便可知此事万不可为。因为，徽州紧靠屯溪，而屯溪是敌人在皖南的剿穴，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刘镇华在此设“主席行营”，他亲自坐镇屯溪，手中握有一个正规军——第十五军和安徽保安团，他们就驻扎在屯溪及其附近。

如果红军贪便宜攻打徽州，屯溪之敌人必倾力来援，红十九师近期连续作战，已是疲惫不堪，若还要死打硬拼，只怕凶多吉少，后果不堪设想。

寻淮洲认定这样的“便宜”捡不得，感到目前最要紧的，是抓紧时间让指战员进行必要的休整，以利再战。

12月5日，经过两天休整的红十九师精神抖擞地继续北上，穿越“江南第一关”，过伏岭，翻歇岭，于次日进抵旌德县白沙。

白沙距离旌德县城仅七公里，而旌德是国民党在皖南统治的薄弱地区。旌德县城离屯溪、芜湖都较远，防备非常薄弱，不仅没有正规军，就连保安团、自卫队和治安警察也为数寥寥。

旌德县县长彭树辉闻听红军来了，派出十几人的自卫队去离县城不远的五里亭堵截，整天紧闭城门，坐以待毙。

可是，以十几个人的自卫队去抵挡3 000英勇骁将，岂非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不过，这十来个自卫队员来到五里亭，远远望见红军如潮水般涌来，赶紧溜之大吉。寻淮洲很快挥师攻城，一举而下，县长逃之夭夭。

攻占了旌德县城，吃不愁，穿不愁，而且地处偏僻，相对安全。按理，连续行军作战的红十九师该好好休整休整。然而，心系救国大业和先遣队全局的寻淮洲更知道，红十九师指战员的体力业已恢复，此刻不是再休息的时候。第二天，寻淮洲率十九师离开旌德县城，经泾县、宣城之间北上，威胁芜湖，震惊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

就在寻淮洲率领红十九师转战浙皖边的同时，方志敏率领的另一路先遣队人马——红十军团军团部及第二十、二十一师也在一路苦战，北上皖南。

十九师从闽浙赣苏区出发后不久，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军区电令红十军团：根据敌人对闽浙赣苏区“围剿”日趋严重的形势，红十军团立即率领红二十、二十一师转到外线，同十九师会合，在开化、遂安、衢县、常山之间集结兵力，争取以运动战消灭敌人，创建浙赣皖新苏区。为了统一领导红十军团，中央军区决定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和刘英五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以方志敏为主席，随红十军团行动。

11月24日，红十军团在葛源的红军操场举行出征誓师大会。会场上人山人海，从80老翁到几岁孩童，莫不为红军的即将离去唏嘘不已。

面对家乡的父老兄弟，面对这些过去几年中为红军做了无数牺牲，一起并肩战斗的好战友，方志敏心潮澎湃，喉咙像被什么卡住了，哽咽难言。

以往，东游西击，红军也常常离开苏区。但苏区人民最后总是能在胜利的欢呼声中迎回自己的队伍。这一次，红军苦战经年，仍不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主力再撤离苏区北上，苏区人民怎能不忧心忡忡？

部队走过葛源溪沙滩，踏上红军桥，眼看就要离开葛源了，这时，耳听一片呜呜咽咽的哭声，眼望拉住双手的父老，牵住衣角的孩子，战士们一个个都放不下心，迈不开脚。

方志敏讲什么好呢？敌人已从四面八方围拢，前线只有地方武装在应敌，用不了几天，这块红色的革命根据地就会失陷，尽管对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已作了应变的安排，但留下了这个忽左忽右的曾洪易，他实在有点不放心。闽浙赣苏区已经吃够了他那“左”的苦头，如今，谁知道他又会“右”出个什么结局？

内忧外患，多灾多难，方志敏只有眼含热泪，从心里发出话来：

“父老乡亲们，兄弟姐妹们，打败日寇，回来相见！这一天，一定会来到！”

一阵北风吹过，“呜呜”声中，似乎夹着苏区群众那如怨如诉的歌谣：

国民党像个什么样，  
日本尖兵打到长江，  
既不打仗也不抵抗，  
急急急急退呀退呀退……

“还要退到哪里去？”方志敏禁不住要骂出声来。

对日寇一味退让，对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红军步步进逼，这就是国民党蒋介石的治国方针。先遣队北上抗日的征途中，时时处处都有国民党设下的封锁线，逼得先遣队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红十军团从葛源出发十多天，经过苦战，于12月12日，进入自然景观胜地黄山。

黄山，层峦叠嶂，奇岩怪石，云雾缭绕，再配上别处少见的绝壁苍松，构成了奇、险、深、幽的胜景，确实迷人，难怪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赞叹：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但是，先遣队是行色匆匆的赶路人，他们一个个心头似火烧，哪里还有旅行家的闲情逸致？

红十军团很快越过黄山，到达古竹溪。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军团部电令寻淮洲率领的红十九师立即回师黄山，与二十、二十一师会合，归还建制。12月13日，红十军团三个师在汤口胜利会师，继而经乌泥关进到黄山东麓潭

家桥宿营。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急电调整部署，增派五个师、二个独立旅、四个保安团，还有宣城一带的地方武装，分成三路，自北而南，向黄山扑来，妄图将先遣队一举消灭于皖南。

敌情严重，刻不容缓，方志敏当即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讨论对策！

### 血战谭家桥

“必须迎击敌人，不迎击，就不可能在皖南立住脚，就不可能完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的预期目的！”方志敏召开军政委员会议，作出决定。

“必须迅速消灭方志敏部！否则，我将不能集中力量围攻、消灭共产党主力。”这是国民党北路“剿匪”总司令顾祝同对部下训话时再三强调的。

实际上，这是蒋介石下的决心。先遣队北上后，沿途在闽浙皖赣广大地区散发北上抗日宣言，申明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赢得了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推动了群众性抗日运动的发展。蒋介石深为恐惧，遂调集各路人马围追堵截。一时间，对付闽浙赣苏区和先遣队的兵力增至20万以上，可这又影响了他的“追剿”部署，因此严令顾祝同，务必克期奏功。

20万军队按驻剿、堵截、追击的部署展开，驻剿主要是对付闽浙赣苏区，堵截、追击主要是对付先遣队。

堵截部队在皖南有一个军两个师四个旅，每个旅三个团；在浙西有两个保安纵队，每个纵队三个团。追击部队有五个师、两个独立旅，四个保安团，分左、中、右三路围追过来。中路是一个师加王耀武补充旅和一个保安团，已于12月13日紧紧地尾追至汤口。

这时，先遣队总共只有1万余人，不及敌人一个师的兵力，而

且武器装备低劣，弹药缺乏，又脱离根据地，不占地利人和，要迎击敌人，非常困难，连刘畴西也不敢再提他的分路抵御的硬拼战术。

军团部主要负责人经过仔细研究，决定以一直在当地坚持斗争的皖南独立师和游击队迷惑、牵制敌人的左右两翼，红十军团全力攻击敌人最突出的中路前卫部队，然后乘机突破敌之中路，继之寻机打击敌之左右两翼，摆脱被动局面。

这一仗，是红十军团会合后的第一仗，事关先遣队能否在皖南立足和红十军团的存亡，必须打好。

问题是各路敌人相距不远，最突出的王耀武旅离其友邻部队也不过七八小时的路程，要击溃或消灭这股敌人，只有选择有利地形，实施伏击手段，出其不意，速战速决。位于黄山东麓的乌泥关至谭家桥段公路，是旌德、太平、歙县三县的交叉点，南有乌泥关隘口和石门制高点，北面一路小山坡，公路两侧又是森林山地，地形十分险要，是打伏击的好地方。面王耀武已达汤口，次日必经乌泥关、谭家桥向太平追击。前不久在分水被红十九师打得溃不成军的遭遇战，至今仍在王旅官兵中留有阴影，打不起精神，如今，红军集中三师之众，实施伏击，取胜是有把握的。

12月14日凌晨1时半，刘畴西指挥部队在离谭家桥10里的地方，沿公路两侧设下埋伏。二十师、二十一师在右侧，准备作正面攻击；十九师在左侧，待正面打响后，拦截敌归路或防敌向太平方向溃逃，力求全歼王旅于黄山脚下。

按这个部署，红十九师没有放在主攻位置上。对此，寻淮洲、方志敏、粟裕、刘英等持有异议，认为红十九师擅长打运动战，野战经验丰富，战斗作风顽强；而二十、二十一师则缺乏野战经验。可是，军团长刘畴西却顽固地认为二十、二十一师的战斗力比十九师强，坚持按他的部署实施。

当日清晨6时，王耀武指挥所部从汤口出发，以其第二团为



前卫，其余按旅部直属队、第三团、第一团顺序向太平方向开进，俞济时亲率一个保安加强营紧随其后，进行督战。

上午9时多，敌前卫部队第二团进至乌泥关，粟裕事前特意布置了一些老百姓在公路两侧，有的砍柴，有的种地，也有的在公路上自由行走。

敌团长周志道见四周没有任何可疑之处，便放松了戒备，只下令部队在公路上作行进间射击进行火力侦察。后续部队见前面无事，竟在红军的伏击圈内作行进间休息。

眼见敌人歇在公路上，喝水的、灌酒的、哼小调的、相骂的，吵吵嚷嚷，先遣队指战员们高兴极了：敌人照我计划行事，这胜利是手心里捏住啦！

“沉着，不要暴露目标，等敌人行进时再打！”指挥员的命令在阵地上飞速地传递着。

忽然，“砰”的一声，有人走火了。接着又是“砰砰”两声接连走火。

目标暴露，敌人拼命抢占了乌泥关前的六三〇高地，居高临下，向红军伏击部队射击。

失去突然攻击性和有利地形，红军想夺取六三〇高地，组织几次仰攻都没有得手。

原来，蒋介石向在追剿红军抗日先遣队的部队下了死命令：奋勇作战面获绩者赏；行动迟缓，畏缩不前者，以贻误军机论罪。

俞济时接到这个督令电文，顿时紧张起来。他曾因对抗日先遣队作战不力，先后受到了记大过和撤职留团的处分，若再来个“贻误军机”，乌纱帽丢了事小，恐怕连脑袋也保不住。因此，俞济时只有严令王耀武：“务必加倍努力，打几个胜仗，挽回军誉，否则严惩不殆！”王耀武已经吃过败仗，虽未受罚，但总记着帐，深怕再“贻误军机”而两罪俱罚。当他发觉中了红军的埋伏，知道生死成败在此一举，因此下死令作战，谁也不敢临阵脱逃。先

遣队的第一次冲锋，就将周志道打伤，他手下不少人见红军冲来，纷纷后退，周志道情知一退即溃，有命也活不了，就咬紧牙关，一面命司号员赶紧吹号求援，一面带伤坚持指挥战斗，硬是将后退的士兵督回阵地。

敌司号员一吹号，即暴露了目标，粟裕眼疾手快，抬手一枪，将其击毙在地，但号音已发，敌人增援的两个营及时赶到，一个反冲击，将红军的攻势压了下来。

先遣队第二次冲锋，冲上六三〇高地山头，双方肉搏了40多分钟，又被敌人预备队赶了下来。王耀武这时也急眼了，调集所有的迫击炮和机关枪，轻重火力一齐向红军阵地猛轰狂扫，硬是将红军压住了。

刘畴西在这时才想起了红十九师，即在电话中命令寻淮洲率部出击。但十九师主力被刘畴西置于陡峭的峡谷之中难以出击，好不容易冲了上来，但为时已晚，二十、二十一师阵地已被冲垮，乌泥关及其制高点亦有近一个团的敌人在死死据守。

乌泥关，原名乌泥岭，传说是宋朝有位爱国将领为抵御金兵入侵在此凿壕设关而得名，它是一个抵御外侮的古战场。

乌泥关制高点，事关这次战斗的成败，红十九师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取乌泥关制高点。当下，寻淮洲调集全师所有的轻重机枪和几十名特等步枪射手，组成密集的火网，压制制高点的火力。尔后，他一手执一把盒子枪，一手握着一把大刀，声如洪钟般地喊道：

“十九师的全体同志们，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为了战斗的胜利，跟我冲啊！”

这呐喊声，红十九师的战士是多么熟悉，每当关键时刻，寻淮洲都是这样亲自带领部队冲锋，每每大奏奇效。

一阵猛攻之后，乌泥关制高点是拿下了，可是寻淮洲却在激战中被一颗流弹击中了腹部，血流如注，当即昏倒在地，鲜血染

红了他的衣裤，肠子流了一地。

此时，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阵地上枪弹纷飞，卫生员只能对他的伤口进行简单地消毒处理和包扎。寻淮洲昏昏沉沉地躺在简易担架上，脸色苍白，两眼深陷，战士们轮流抬着他转移。一路上，山路崎岖，担架颠簸得十分厉害，寻淮洲的伤口不时裂开，血流不止。

12月16日，年仅22岁的寻淮洲终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临终前，寻淮洲念念不忘的还是抗日救国大业，他喃喃地告诫着战友们：“为抗日救国奋斗到底，北上抗日……北上……抗日！”

寻淮洲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的牺牲，使红军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年轻将领，先遣队的战士们失去了一位好领导；他的牺牲，是中国革命事业的巨大损失！

1938年5月，寻淮洲的老上级，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在寻淮洲的墓前对随行人员和群众激动地说：“青山有幸埋忠骨，寻淮洲同志是红军青年将校，以游击战斗著称，毕生为革命利益、民族利益，英勇奋斗，光荣牺牲，我们要完成其遗志，以东线胜利，驱逐日寇，回答先烈，庶几无愧……”

寻淮洲倒下了，然而战斗仍在继续。接着，红二十一师师长胡天桃阵亡；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身负重伤；二十一师政委也倒下了；团、营、连三级指挥员的伤亡更大。

眼看部队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方志敏痛心不已，同时也深深地感到内疚。

先遣队的领导班子，原在曾洪易的带领下就很不团结，从瑞金出发，一路争吵，开起会来，不是拍桌子瞪眼，就是摔杯子大骂，几乎没开过一次圆满的会议。会上如此，会后的行动，自然就更不会协调，甚至有几次战斗都是在打响后又因有人不同意而

命令部队撤回。如今，虽然好一些，但成见未消，方志敏作为这支队伍的主要负责人，必须小心翼翼地维护这种不巩固的团结，现在，仗打成了这个样子，一个个窝着一肚子火，稍有不慎，就可能爆发一场内争，导致离散，因此，他唯有一切都忍着，只能考虑一个问题：是撤出战斗还是再打下去？

撤，似乎不可。这是先遣队能否在皖南立住脚的关键性一仗，不胜而撤，计划就会全盘打乱，以后行动将更加被动。

那么，与敌人打对峙仗呢？先遣队打不起这种仗，时间也不允许。可不可以在敌后续部队赶到前，再次组织强攻呢？但部队损失已经不小，尤其是将领伤亡严重，再次强攻，取胜的把握很小。

这时，忽然传来军团政治委员乐少华忿然率领保卫队向敌人冲击，胸部中弹负伤的消息，方志敏立时感到，部队已失去控制，不能再打下去了，他马上召集主要将领紧急开会。会上，大家一致认为，敌人的后续部队即将赶到，先遣队应赶快撤离。

决胜未赢，先遣队忍痛撤离了谭家桥。

### 被困怀玉山

先遣队在皖南实在立不住脚，不得不决定暂回闽浙赣根据地，待休整补充后再打出去。方志敏率部退出乌泥关，经旌德到达泾县的茂林镇，在那里安葬了寻淮洲的遗体，然后向太平县的柯村前进。不巧，行至陶村时，又与敌军一个团遭遇，本可将其一举歼灭，可军团长刘畴西，却只用一个营去迎击，打不过再上一个营。这种加油式的指挥，使这次歼灭战又打成了消耗战。最后，刘畴西一看消耗大了，想一撤了事。只气得许多负伤的干部从担架上跳下来，要求率队冲上去，将敌人消灭。刘畴西不答应，还是撤了，并且从此畏敌怯阵，消极避战，使部队越来越被动，把不少指战员都急哭了！“不积极打赢敌人，怎能在皖南立足？”有些战士更直骂他是“纸上谈兵的军团长”。

方志敏早就向他直接指出过指挥上的失误，他不听，其他领导干部批评他，他也置之不理，于是，先遣队的处境变得更加被动了——敌人在后面追，红军在前面跑，翻山越岭，马不停蹄地奔跑了十多天，也无法停下来，部队疲劳不堪。

好了，总算进入柯村苏区了。大家都以为，可以在这里歇一歇，喘口气了。

然而，小歇可以，大歇却不能！

柯村苏区，是新近才发展起来的小苏区，方圆不过百里，先遣队若在此大歇，势必引来敌入的大举围攻，这块难得的根据地一下就完了。

方志敏来到这里，不禁感慨万分。去年4月，他开过一期白区工作训练班，结业后，选派了一些同志来皖南开辟新区。其中，有葛源区的区委书记刘毓标，他带了一个300多人的游击大队到皖南活动，不过用了半年的时间，就把苏维埃运动推进到祁门、贵池、太平等县，建立了以柯村为中心的根据地。他又想起，这一带是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如果在四年前的第一次反“围剿”时，曾洪易采纳他的建议，将红十军开到皖南来发展新区的话，那么，情况肯定比现在好得多。

良机已失，追悔无益。因借鉴而追悔可以为师，因埋怨而追悔徒增懊恼。

方志敏不愿再想下去了，只觉得不能给柯村苏区留下明日的追悔，只能留下明日的希望。因此，不仅应该赶快离开这里，将敌人引走，而且应该给刘毓标他们提供尽可能的帮助。于是，他和先遣队的领导统一了认识，连夜把刘毓标找来。

“明天我们就走！”方志敏说。

“这么快？才两天啊！”刘毓标感到十分突然。

“再呆下去，就不好了。我们商量过，给你们留下个侦察营，加上原来的游击大队，立即组成皖浙赣独立团，由你担任独立团

的政治委员。毓标同志，今后一段，会十分困难，你们不要莽撞，也不要畏缩，坚持住这一段，革命高潮一定会到来的！”

刘毓标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泪“潏潏”地滚落下来，老首长的关心使他感激不已，先遣队的处境又使他难过万分。在昏暗的油灯下看着方志敏的脸，心里更不是滋味，原来一张英俊的方脸，如今被老长老长的头发压得这样瘦削，一脸的灰釉，让人心疼。

“志敏同志，你，你要多多保重啊！”

方志敏见他流泪，开始有点奇怪，一听这话就笑了，说：“我很好，现在痲病都不发了，只不过痔疮有点讨厌，不过，这也不碍事。倒是你自己要多注意呢，留个好身体，为革命多出力！”

第二天天不亮，先遣队就走了。

先遣队离开柯村后，转战在东流、祁门、休宁、太平、泾县、石埭、秘浦、青阳等地。打过一些小胜仗，但小打小闹，阻不住敌人的攻势，还是难以立下脚跟。

从当时的形势看，采取正规军打运动战的方法，已越来越不利，要坚持长期斗争，关键是将正规军变为游击队，从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但是当时领导上还没有向游击战转变的认识，又缺乏积极寻机打歼灭战的思想，因而始终未能摆脱被动局面。

没有根据地的依托，部队不仅越拖越疲，而且只有消耗没有补充，子弹已经很少了，粮食也非常困难，寒冬腊月，大雪纷飞，战士们还穿着单薄的衣裳，这如何坚持下去？方志敏和先遣队的领导都认为，在目前的情势下，部队不进行一番休整补充，要战胜七倍于己的敌人，摆脱困境，争取主动，是办不到了，与其这样被拖垮，不如暂回老根据地，重整旗鼓，再打回来。

1935年1月10日，也就是谭家桥战后的第27天，先遣队的全体指战员迈着沉重的步伐，离开皖南，沿浙西的天目山脉向赣东北的怀玉山区进发。

然而，先遣队的这一行动，很快被敌人发觉。赣东北“剿匪”总指挥赵观涛急电俞济时：“红军急待整理补充，有窜回‘老巢’之企图，已令各封锁线防守部队严加防范。着各追击部队加紧追击，务将敌人歼灭于封锁线以外。”

先遣队走过开化杨林，翻越几重高山，于1月12日到达港头村。部队又累又饿，便停下来烧饭吃。可是饭还没有煮熟，敌人的大队人马竟抄近路追上来了。

仓猝间，部队一下被打成了两截。前一截800余人，是由军团机关人员、伤病员、后勤人员以及缺乏弹药的迫击炮连、重机枪连组成的先头部队，他们摆脱敌人后，即在方志敏、乐少华、刘英、粟裕的率领下，兼程赶到化婺德苏区；后一截，是大队主力，由刘畴西、王如痴率领。他们在突围后竟认为敌人一时追不上来，不愿早起赶路，磨蹭到10点钟才启程，一路磨磨蹭蹭，行动迟缓。

方志敏率先头部队原拟于下午3时冲开乐平、常山封锁线，可整整一天过去了，就是不见刘畴西率部赶到，派人前去催促和接应，没料到刘畴西的回答竟是：

“部队疲倦，本日不能继续前进。”

就像一滴水掉进滚油中，先头部队立刻炸开了锅。

“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时间就意味着生死存亡，刘畴西简直太不像话！”

“作为军团长，难道连兵贵神速都不记得了！”

“战场上瞬息万变，不能再等下去了！”

“我们等齐了，敌人可能也等齐了，再要通过封锁线，怕就难了！”

方志敏听着大家的议论，对何去何从，一时难下决断。派出去的侦察兵回来报告，国民党浙江保安纵队五团连夜从星口向西南疾进；“追剿队”正全速南下；王耀武旅已进至杨林、东坑口；第四十九师向西南插入上、下庄一线；第二十一旅从遂安南下

马金。

敌情异常严重，方志敏浓眉深蹙，数九寒天，额头上也沁出了汗珠。

“不等了！”方志敏“霍”地站了起来，把手一挥，说：“你们今晚就领着队伍冲出去，冲出去就是胜利！我，留下来接应他们！”

大家一听，都呆了，方志敏留下来，这怎么可以？

当然，按照刘畴西那种带兵的方式，不留下一个得力干部，帮助他采取果断行动，赶紧通过封锁线，大队主力很可能陷入危险境地。但方志敏是整个行动的最高领导，怎可自己留下？

“让我留下！”粟裕突然站起来，激动地说。

“赞成！”乐少华立即附和。他重伤未愈，当然是不能留下的。

“不，我是主要负责人，不能丢下大队主力先行突围！”方志敏主意已定。

大家都明白，今晚通过封锁线，阻力不大，一冲过去，便可进入老苏区，尽管敌人也在那里“围剿”，但立足的条件好多了，留下来，就意味着至少还要在敌人的封锁线以内多呆一天，危险的程度可想而知。方志敏坚持要自己留下来，很明显是把生死重担挑在自己肩上。

“志敏同志不能留下，留下我最合适！”粟裕再一次请求。

“明晚两部就可以会合，志敏同志可以放心！”大家也一齐劝道。

“不管怎么说，也该是我留下！少华、刘英同志负伤，由粟裕同志率队突围。时间不等人，就这样决定了！”

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粟裕明白，已经不需要再争了。

风更猛，雪更大了。

“出发吧！”方志敏平静地下着命令。

队伍开始缓缓地移动。风雪迷漫中，方志敏带着十几名警卫



人员，慢慢地挥动着手。

粟裕猛然转回身来，紧紧地握住了方志敏的手。

“你们一定要连夜冲过封锁线，在十大坪占领阵地，准备粮食，于明晚配合地方武装，掩护主力突围！”

方志敏再一次叮嘱粟裕。

800 人的队伍迅速消失在夜幕中，封锁线上很快传来了交火的枪声，方志敏听了一会儿，枪声并不激烈，估计突围无甚大碍，他松了口气，憔悴的方脸上微微地露出了笑容。

刘畴西、王如痴率领的大队主力，由于行动迟缓，果然又被追敌赶上。等方志敏连夜越岭过溪，钻进怀玉山上找到他们时，部队只剩下 2 000 来人。

方志敏心如刀绞，而刘畴西不好意思地避开了他的视线，连句自我批评的话都没有。

“现在该怎么办？”方志敏问。

“赶紧突围！”

几千人的代价，总算叫他们认识了“赶紧”两个字。方志敏不再讲什么，也没时间再讲什么，便“赶紧”组织力量，朝乐常封锁线突围。

然而，敌人已源源而至：四十九师、二十一旅、浙江保安团，足足有 14 个团的兵力，蜂涌包围过来，2000 多名红军被团团挤压在纵横不过 15 公里的狭小地区。

这时的先遣队战士们，饥饿、疲惫且不说，每个人手中的子弹都已寥寥无几，哪里冲得开这样的包围圈？

等候在封锁线上接应的粟裕、乐少华、刘英等急坏了。他们当晚率队突破封锁线，回到老苏区以后，便立刻根据方志敏的指示，准备粮食，布置掩护主力突围的各项准备工作。可他们等啊等，直等到日落西山，夜幕降临，封锁线上仍是毫无动静。

“恐怕是凶多吉少了！”突围出来的先头部队不得不作最坏的

猜测。

就在这时，粟裕接到了方志敏的来电：明天从另一条封锁线通过。

总算有了消息！

又等了一夜，大队人马还是没有出现。更糟的是，电台联系也中断了。

粟裕盼哪、盼哪，一天、两天、三天……隐隐的炮声终于完全沉寂下去，方志敏他们还是没有来。

难道主力部队已被消灭了？

这倒还没有，不过，时间既已留给了敌人，机会也就留给了敌人，此时，2 000 人的队伍正被不知多少倍的敌人围困在深山老林里。方志敏临危不乱，量力而行。白天，并不莽撞组织突围，只是奋力组织抵抗，到夜间，才不动声色地率队钻出敌人的包围圈，一气跑到玉山、上绕边境，给粟裕发了一个电报。可是，在这里还是冲不开敌人的封锁线，只得重新折回。这时，电台也被打坏了，无法跟粟裕他们联络了。失去了接应，使得突围更加困难，几天来，先遣队连续七次冲击，都未能成功。

现在，他们几乎要失去战斗力了。一连几日，包括方志敏在内，都已经没有一粒米下肚，只是胡乱地找些野菜、竹笋充饥，再也没有力气向敌人喊杀了。

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呵气成冰，他们的身上只穿着几件单衣，手脚冻僵了，冻肿了，冻烂了，扣扳机都感到困难；而弹仓里也只剩下几颗子弹，不敢轻易和敌人对阵了。

怀玉山岭岭相间，相传有 99 个山谷，部队在山上兜来兜去，几次同敌人遭遇，杀退一批，又上来一批，战斗人员已经越来越少了。

1935 年 1 月 15 日，阴历年关将近，方志敏拄着棍子，率队爬上了皖赣交界的南华山。

南华山，高峻陡峭，怪石嶙峋，山岩披冰戴雪，树枝挂满冰凌。

队伍经过一片竹林，只听得积雪压竹，格格作响，那被压弯了腰的竹枝，却依然傲霜御雪，迎风摇曳。

方志敏见此情景，不禁有感于怀，黄山之松，不在绝壁，焉得那样苍劲？南华山之竹，不迎风雪，焉得这等坚韧？一首小诗随即脱口而出：

雪压竹头低，  
低下欲沾泥；  
一朝红日起，  
依旧与天齐。

这诗句在队伍中传诵着，战士们的胸中都回旋着一股激情：冲出去，御外侮，雪国耻，复兴中华民族！

敌人又追到南华山，先遣队只有折向西南分水关，深夜12点，他们摸到源头游击区。在这个游击区里，也同样见不到一个人影，国民党过于狠毒，见人就杀，见屋就烧，在包围圈内制造无人区。

多少天来，先遣队找不到向导，在深山老林里全靠地图指路，靠日出日落辨方向。

这一回，真是万幸，先遣队总算见到一个人。但却是位60多岁的瘫痪老人，根本不能走路。不过，这位瘫痪老人很愿意为红军带路，老人布满沧桑的脸上显示出他对红军的信任，他说：“这一带的山山垄垄我清楚得很。前而是高竹山，过高竹山有条山垄叫金竹坑，两边山上，也有敌人的堡垒，不过不要紧，山垄里的草深着呢，过多少人也望不到，过了金竹坑，通向古镜头，就进入老苏区了。”

这，是一个绝处逢生的机会。

方志敏、刘畴西、王如痴略一商量，决定抬起老人，从金竹坑封锁线突围。

果然，两边山上都有敌人，他们在黑夜不敢出堡垒，就一齐向山垄里乱开枪，这一开枪没打到别人，偏偏打到刘畴西，他的右手本已有伤，这一回又打到左手，他再也无法抓支撑物爬山了，没办法，只有抬着他走。

摸到金竹坑，一个碉堡挡住了去路。

“什么人？口令？”敌人听到动静，厉声吆喝着，并开始放枪。

突击队指挥员很不沉着，一看敌人已发觉，立刻掉头后撤，后续部队以为敌情严重，也连忙跟着往回走。方志敏、刘畴西弄不清发生了什么情况，只好带队撤回源头。

这一撤，便决定了命运。

事实上，金竹坑封锁线，敌人只有一个连，完全可以硬冲过去。一冲过去，就像鸟出牢笼鱼入水，广阔天地任遨游了。可惜，失去了耳目的先遣队，无法弄清敌情，终于失去了这个最后的良机，酿成了一场历史悲剧！

1935年1月23日，方志敏作最后一次努力，将剩下的部队整编成一个团，命二十一师参谋长乔信明担任团长，率队向八磔分水关突围。

不料，守在八磔堵截的敌人正在等着。

一接火，先遣队的弹药就打完了，拼刺刀又没有力气，哪里突围得过去？敌人见有机可乘，气势汹汹地反冲过来。这时，一路尾追着的敌军也赶过来，红军腹背受敌，危险万分。

方志敏和乔信明当即分兵抵御，硬顶了五个小时，只要再顶一会儿，太阳就会落山，天一黑，就有希望。可是，从三亩、八亩方向，忽又拦腰打来敌人的四十九师，先遣队支持不住，一下子被打散了。

还好，天很快黑了下來，敌人不敢在夜间短兵相接，纷纷撤

下山去。

方志敏心知：趁此时收拢部队，连夜突围，尚有一线希望。

他挺立山头，大声叫喊：

“同志们，出来啊，向我靠拢！”

可是，只有山谷在回音。

他又点燃两堆大火，继续大声呼唤：

“同志们，快出来啊，向我靠拢！”

四周全是敌人，方志敏这样点火叫喊，无异于自我暴露，要知道，他，作为“著匪”，身价值8万。在南昌、安庆、福州，在各乡镇，到处都张贴着这样的悬赏告示：

“凡生擒或献出‘赤匪’方志敏头颅者，赏洋八万。”

如今，方志敏自己站出来大喊大叫，敌人岂非求之不得？但方志敏已顾不得这许多了。黑夜过去就是黎明，收拢部队，突围出去，便有希望。

“同志们，出来啊，向我靠拢！”

伏在树林中，伏在草丛里的战士，终于听到叫喊声，看到了火光，走地走，爬地爬，向方志敏靠过来了。方志敏数了数，总共只有80多人。还有那么多的战士呢？也许是睡过去了，再也起不来了，也许是隔得太远，看不到火光，听不到呼喊，不可能来了。

80多人，足有一个连啊，已不算少了！只是四面八方也不知究竟有多少敌人。方志敏带着这80多人满山寻找缺口，都给碰了回来。

天亮了，战士们只有再隐蔽下来。哪知，天一亮，敌人便开始点火烧山，一时间，满山烈火熊熊，浓烟滚滚。

乔信民被烧出来抓走了。

刘畴西被烧出来抓走了。

王如痴被烧出来抓走了。

许许多多的战士，都被烧出来抓走了。

方志敏还没有被烧出来，但敌人搜他，等于在搜“八万元”，哪个肯善罢干休？

“你说，方志敏躲到哪里去了？”敌人逐山逐垄，逐树逐草地搜了个遍也没有找到方志敏，只好追问被俘的战士。

每个战士的回答都是：“不知道！”

“不说，毙了你们！”

一个个战士都挺着胸膛。

其实，乱叶覆身的方志敏，此刻就躺在附近的树林里，他眼睁睁地看着战士们一个个被敌人抓去，心里不知有多难过。

他在狱中所著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

我躲在树林里，真是心痛如刀割！几次想拿起枪向自己脑壳上放枪自杀。但转念：自杀非共产党员应采取的行动，这次遭到了失败，就悲观不干了吗？不，还是要干！损失了这部分队伍，凭着咱们半年一年的努力，仍是很可以恢复起来的，怕什么！悲观什么！总要记住这次血的教训，努力的干！废餐忘寝的干！不怕不成功的！本来我是可以到白区去暂避一下，但念着已有一部分队伍回赣东北，中央给我们的任务又刻不容缓的要执行，所以决心冒险很快转回赣东北，一方面接受中央的批评和处分，开会总结皖南行动，作出结论，同时，整顿队伍，准备再出。因此，我与刘畴西同志冒雨冒雪，不分昼夜的爬山越岭，要偷过敌人的封锁线！虽然七天没有吃饭，饿得两脚走不稳，扎破脚；虽然整天冻得发抖，虽然每晚不得睡眠，人是疲劳到万分，但我总是咬紧牙关，忍受下去！吃不得苦，革不得命，苦算什么，愈苦

愈要干，愈苦我越快乐，想至此，我独自微微地笑了。反动派呀！反动派！这次，我们若能逃出罗网，我们要与你拼一死命！不打倒你，我们是不会休止的呀！我躲在树林中冻得浑身发抖的时候，总是独自细声的自语！

敌人一连几天搜不到方志敏，都以为他神通广大，已经远走高飞，没奈何，只得停止搜山，准备撤回。

不料，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叛徒一句话出卖了他：“方志敏没有走，还在山上。”这个人，就是方志敏的警卫员魏长发。这个可耻的叛徒也没得到什么好下场，1949年江西解放后，就被人民抓住镇压了。

于是，敌人再度细细地搜山，搜了六个小时仍没有发现什么，只好收兵回营，可就在临撤退时，两个敌兵无意中发现了她。

方志敏终于被俘了，时间是1935年1月27日，地点在怀玉山陇首村。至此，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除在粟裕率领下突围出去的800人外，全军覆没。

### 铮铮铁骨 耿耿忠心

两个国民党匪兵抓到方志敏，欣喜若狂。他们想，像方志敏这样一个“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大官，身上总该有个千儿八百大洋的，这回，可要发财了！

于是，他们兴冲冲地搜开了。从方志敏的上身搜到下身，从袄领捏到袜底，不料，除了一只怀表和一支自来水笔之外，连一个铜板都没有。两个匪兵只得用怀疑的眼光看了方志敏几遍，然后泄气地喝道：“走吧！”

方志敏冷笑着跟着他们走了，在狱中就此写下了感人肺腑的名篇《清贫》，文中写道：

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地用之于革命事业。这在国方的伟人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而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

方志敏呕心沥血十余载，临被俘，两个国民党士兵搜到的就是这“两袖清风”，留给后人的，则是这篇激动人心的《清贫》！两天后，方志敏被押到国民党四十三旅七二七团团部。在这里，方志敏写下了他那篇著名的《自述》：

方志敏，弋阳人，年三十六岁。知识分子，于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第一次大革命，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曾任江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潜回弋阳进行土地革命运动，创造苏区和红军，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斗，革命意志益加坚定。这次随红十军团去皖南行动，回苏区时被俘。我对于政治上的总的意见，也就是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见。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我这几年所做的革命工作，都是公开的，详述不必要，仅述如上。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晚八时

这篇《自述》，意在表明自己的心迹，劝国民党不要再对他做无功之劳，其耿耿忠心，溢于言表；铮铮铁骨，跃然纸上。

然而，蒋介石深知方志敏在闽浙赣几省乃至全国的影响力，如



今，红军主力突围北上，要最后消灭，尚需花费相当的力气，而浙皖闽赣边界的方志敏余部，又仍在顽强抵抗，很有些伤脑筋，要收拾民心，要稳定局势，方志敏正是用得着的人。

蒋介石对方志敏施行诱降的主意已定，各种毒辣的手段便一招一招地使出来了。

戴上脚镣、关入囚车、游街示众，想必可以大灭方志敏的威风。于是，从上绕到弋阳，再到南昌，一路的“游”过去，结局却是大出国民党当局的预料。

当时一家美国报纸的记者对在南昌举行的一次“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情形作了如下报道：

豫章公园周围都排列着警察队伍，街上架着机关枪，谁也不准从路旁跑入街心，戴了脚镣手铐而站在铁甲车上之方志敏，其态度之激昂，使观众表示无限敬仰，周围是由大队兵马森严戒备着，观众看见方志敏后，谁也不发一言，大家默然无声。即蒋介石参谋部之军官亦莫不如此。观众之静默，适足证明观众对此气魄昂然之囚犯，表示无限之尊敬及同情……当局看来，群众态度之静默，殊属可怕。

当敌人的铁甲车载着方志敏离去的时候，群众也纷纷离开会场，那个美国记者接着写道：

群众随即开始骚动，表示不平，但是机关枪口早已向着群众的胸膛头颅瞄准……

游街示众是这个结果，方志敏一被押回监狱就受到一番残酷的拷打。拷打又怎样？连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也说：“方志敏的态

度非常强硬，看他至死也不会动摇的。”

严刑拷打看来是无法令方志敏屈服了，国民党当局又想用高官厚禄来引诱方志敏。

前往监狱对方志敏劝降的说客，好似车水马龙，走了一批，又来一拨，上至国民党政府要员，下至弋阳乡绅，甚至华装艳服的年轻女人、耶稣教堂教士也一齐上阵，还是无济于事。

“赣东剿匪司令部”司令赵观涛，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书记俞伯庆，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副处长钱协民、主任顾祝同先后出马，但除了碰一鼻子灰而外，一无所获。

于是，蒋介石亲自上阵了。

方志敏和蒋介石曾见过面，握过手，打过交道，坐在一起开过会。大概是这一层关系，蒋委员长也格外“开恩”：对方志敏委以“江西省主席”的重任，交换条件只不过是“在报纸上登一则脱离共产党的启事”。

方志敏呢？他早已写下了《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作为对蒋介石的回答：

投降？你国民党是什么东西！——一伙凶恶的强盗，一伙无耻的卖国汉奸！一伙屠杀工农的刽子手！我们与你们反革命国民党是势不两立的。你法西斯匪徒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项，决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的！

蒋介石至此再也无计可施，只好下达“秘密处死”的命令。这个命令，由他的亲信陈诚批在电报上。

死则死矣，只是还有一件事未能做好，那就是他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等十几篇文稿和信件，共计 13 万字，还没有全部送出。

“血性文章血写成，党人风格万年贞。”方志敏在这些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文章中，回顾了自己从事革命斗争的道路，总结了当时政治军事指挥上的很多经验教训，对党的工作具有重大的借鉴作用。

方志敏一直在物色能将他的文稿安全送交党中央的人选，由于王明路线的影响，当时党在白区的地下组织几乎全部遭到破坏，地下党的同志一时是找不到了，方志敏只有从自己身边的人入手。

看守所的秘书凌凤梧，文书高易鹏，同被囚禁的国民党军法官胡先生深受方志敏的感化，是最合适的送稿人选，方志敏将文稿全部托付给了他们。

后来的事实证明，方志敏没有看错人，这些文稿绝大部分都安全地送到了党中央。

心事已了，离死神也越来越接近了，方志敏却感到一阵轻松，他在回答上海《字林西报》一个记者的提问时说：

“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不惜生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为民族独立而奋斗！因此，我很高兴为自己的信念而牺牲！”

方志敏又在狱中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死后，我流血的地方或在我瘳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可视为我的精诚寄托吧！在微风吹拂中，如果那花左右摇摆，那就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

这是方志敏在个人生死攸关之际写给党和战士们的告别词，情真意切，正气浩然，像一首壮丽的史诗，名垂千古，永昭日月！

1935年8月6日，凌晨，东方欲晓，细雨濛濛，年仅36岁的方志敏，被敌人杀害于南昌市下沙窝。

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和叶剑英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面

对狂暴的白色恐怖，办事处的全体人员经常用方志敏坚贞不屈的伟大精神自勉。叶剑英还在方志敏的一张遗照上慨然题诗：

血战东南半壁红，  
忍将奇迹作奇功；  
文山去后南朝月，  
又照秦淮一叶枫。

这是对方志敏战斗一生的真实评价，烈士泉下有知，当可瞑目矣！

---

## 第二章 血战东南半壁红

### 一 粟裕、刘英临危受命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兵败怀玉山，几千将士血洒疆场，只有粟裕、刘英率领的部分突围人员，一路披荆斩棘，回到了闽浙赣根据地。

不久，中共闽浙赣省委向他们传达了苏区中央分局转来的中央指示：

以先遣队突围部队为基础，迅速组建挺进师，由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治委员，立即率部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并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

粟裕站在寒风中向东方望去，连绵起伏的群山遮住了他的视线，一股复杂的感情油然而生。

去年，北上抗日先遣队曾在浙江度过最困难的阶段，与国民党的围追堵截进行了艰苦斗争，所到之处播下许多革命的种子，一旦条件成熟，它们就会发芽、开花，形成难以估量的巨大力量。但是，粟裕也清楚地知道，浙江是蒋介石的家乡，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反动势力强大，党的工作基础薄弱，挺进师能不能排除千难万险，在那儿立脚生根，发展壮大，是摆在他和刘英这两个年轻指战员面前的严峻课题。

寒风阵阵袭来，仿佛还裹挟着怀玉山的硝烟，同方志敏分别

的情景，又一次浮现在栗裕的眼前。那一双坚强有力的大手，那两道深邃坚定的目光，包含着多少信赖和期待……

栗裕心潮起伏，无法平静。遥想自己当年为逃婚出走，离开地主家庭，只身闯荡江湖，继而投笔从戎，参加叶挺的“铁军”，南征北战，屡立战功，由一个不起眼的小兵直升至今日的师长。其间，几多奋斗，几多艰辛，至今想来犹历历在目。激烈的战斗中，历险无数，数次负伤，最后总是以自己超人的毅力，沉着的指挥，使之化险为夷。对于先遣队的失败，栗裕至今仍痛心不已，他知道，是中央的“左”倾错误指导和先遣队部分领导的盲目顺从直接断送了先遣队。如今，主力红军已被迫长征了，各根据地正蒙受着敌人惨无人道的“清剿”，革命正处于低潮中，自己和刘英在此刻被委以重任，此去浙江，真可谓任重而道远啊。

栗裕慢慢地踱回屋里，刘英政委正在等他。

两人交换了一下眼色，什么也没说。栗裕摊开地图，手指轻轻地在瑞金点了一下，随即慢慢向西移去——“国民党主力正被我中央红军吸引于北上途中，那么这边兵力相对就比较空虚了。”

他的手忽又滑回瑞金，在福建打了个弯，转而向北，闽北、浙西、皖南、皖赣边……这不正是先遣队走过的道路吗？“先遣队失败的教训不就是因为没有分散打游击的认识和决心吗？如果我们此次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不打正规战而打游击战，那么……”

栗裕越说越兴奋，眼睛放射出异彩，手指飞快地围着浙江画了个圈，最后落在了一块等高线非常密集的山地上。刘英看到，上而从右到左斜标着一行大字“仙霞岭”。

对于这块地方，刘英当然十分清楚。1930年这一带曾经爆发了群众武装暴动，革命的火种尚未熄灭。这里还有一个青帮组织，其头目对国民党的统治反抗已久，干的是劫富济贫的勾当。挺进师曾经与他们有些联系。因此，这里群众基础比较好，尤其是这儿与闽东、闽北、闽浙赣几块游击根据地互为犄角，便于互相支

援。去年先遣队经二十八都、石门进占清湖镇时，他正带两营分途破坏浙赣铁路呢！那里的崇山密林，曲折小径无一不是打游击的好地方。刘英不禁在心里暗暗佩服粟裕的独到眼光。

就这样，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地区，便定为挺进师创建游击根据地的第一个目标。

说起挺进师，还真有点寒碜。

挺进师的主体是先遣队的突围部队，其中包括一个迫击炮连，一个机关枪连（已经没有炮弹和枪弹）和二十一师的第五连，再就是一些康复了的轻伤病员，以及政治部、供给部、保卫局的机关人员，共400来人，再加上闽浙赣独立师第一团的100多人，总人数不过500多，显然，这只是一个小团的兵力。这500多人被编成了三个支队和一个师直属队，支队实际只相当于连。人数虽不多，但全体干部、战士都是从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过来的，人人都有一颗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有一身好功夫。在挺进师的后面，有千千万万的浙南人民的支持。想到这些，粟裕、刘英对前途充满了信心。

2月底，挺进师全体指战员抱着继承先烈遗志，开创新游击根据地的坚定信念，誓师出征。

刘英政委在誓师大会上慷慨陈词：“同志们！我们挺进师马上就要离开这块洒下我们先烈无数鲜血的红土地，踏上新的征程了！我们去打游击，不是说我们失败了，而是去投入另一种战斗！革命虽然暂时处于低潮，但我们的党中央还在，中央主力红军还在，闽浙赣省委也还在，我们先遣队的不少老同志不是还都站在这里吗？共产党还在领导中国革命，红军是杀不光的，革命烈火是扑灭不了的！”

会上宣布了挺进师的行动路线：由闽浙赣根据地南下，先到闽北根据地，和那里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再去浙江。

早春季节，乍暖还寒，而挺进师的将士们心里却个个都燃着

一把火，他们仿佛已看见了不远处的春天。

出师伊始，挺进师就显示了它的精干——全体将士一鼓作气，以一夜140里的急行军，翻过灵山，渡过信江，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达了闽赣边境。

然而，在这里遇到的意外情况，却使刘英、粟裕大吃一惊。

按理说，他们的行动只通知了闽北党组织，请他们派人接应，外人根本无从知晓，可是他们一踏进福建地界就遭到了敌人的伏击。

粟裕临危不惧，细察敌情，发现敌方只不过是一些杂牌保安团而已，遂果断下令组织反击。

敌人做梦也没想到，迎来的这支游击队，竟比正规军作战还要漂亮。只一个回合，伏击者就被打得落花流水，落荒而逃。

挺进师没有什么人员伤亡，但仅有的一部电台被打坏了，这在当时简直是无法弥补的损失，从此，他们就失去了同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联系。

在闽北，他们多次遇敌，就是没有找到事先联系好的闽北同志，这情况让人好生奇怪。

几天以后，他们在一些偏僻的村口和凉亭柱上，发现了敌人贴的布告和宣传品，其中一份用卑猥语言写成的“劝降书”竟赫然签着原闽北军分区司令李德胜的名字。

真相大白了，正是这个可耻的叛徒，向敌人出卖了挺进师行动的计划。

既然断了与当地党组织的联系，粟裕与刘英决定：以挺进师自己的作战行动，打开进军浙西南的通道，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吸引和调动敌人，乘隙北上。

这可是粟裕的拿手好戏。

三四月间，粟裕指挥挺进师在浙闽边境进进出出，往返作战，一会儿打到江山，一会儿又打到泰顺；一会儿打到松政，一会儿



又打到云和。再不然就在武夷山、洞官山区兜上几个大圈子，搅得敌人风鹤频惊，惊恐不安。

几个回合后，敌人判断，红军必将在龙泉河以南的浙闽边境立脚，遂将龙泉河以北的浙江保安团纷纷南调，并令福建的新十师和第五十六师北进，妄想南北夹击，一举消灭挺进师。

4月下旬，敌人终于在斋郎地区找到了飘忽不定的对手，以为这下大功告成了，浙保第一团团团长李秀，闽保第二团团团长马洪深为此举杯相庆，乐不可支。

粟裕感到斋郎地区的有利地形是一个歼敌的好战场。这一仗，直接关系到挺进师能否顺利打进浙西南的通道，所以必须审慎从事，容不得半点马虎。

前一阶段，挺进师大范围的运动作战，都是为了创造、寻找这一歼敌良机，现在战机已到，强烈的责任感使他不得不对自己精心制定的作战计划，再作一番周密而细致的思考。

鸡叫两遍了，粟裕仍然没有丝毫倦意。这时，派出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地主武装大刀会已率先出动，正向斋郎地区靠近。

大刀会本是当地乡、保长和土豪劣绅组织起来的一种民间组织。其中大小头领都是一些游手好闲分子和流氓地痞。他们以学艺为名，诱骗老百姓入会。声称有了本领，外不受欺，内可保家。在浙西南和闽北交界处的区域，小的村庄几村组成一“会”，大的村庄单独成立一“会”。

信徒入会时，由大刀会头领择好黄道吉日，要求入会者斋戒沐浴，虔诚跪拜，一字一顿地俯首起誓：“一经入会，恪守会规；生不退堂，死为会鬼；如有食言，五雷轰顶……”

反动头领唆使会徒们来打红军之前，先是装神弄鬼，画符诵咒，泡制法丹，蒙会徒吞食，说是吃了“法丹”，就会得到天神的保佑，枪弹不入。

28日上午，手持刀枪，斜挎黄色符带的大刀会会徒，口里念

着咒语，漫山遍野地向挺进师阵地呼啸而来。

按照粟裕事先的布置，战士们一面架好机枪准备，一面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

先是一阵排枪向其上方打去，接着红军开始喊话：“老乡们！我们是红军！我们同穷人是一家人！”

可是，喊声像被风刮跑了似的，会徒们还是一个劲地冲来。200米、100米……情势十分危险。一些武装头目，点传师之类的家伙，狂叫着：“冲啊！红军的枪打不死人！”

粟裕把手一挥，又一阵排枪打去，顿时撂倒好几十个，迷信的谎言顿时破产。几个分队趁势从侧翼杀出，挥刀砍倒许多顽抗的会徒。这帮乌合之众，何时见过这等阵势，还没到中午就完全瓦解了。

这时，浙保第一团李秀部骄纵轻进，一下子深入到红军阵地前沿，他们不等闽保第二团赶到，就想冲上来抢头功，粟裕要大家让敌人靠近再打。

一阵排枪之后，前面的保安团丁倒下一大片。粟裕眼看李秀气急败坏地在指挥作战，甩手便给了他一枪，李秀捧着一只断手嗷嗷大叫。粟裕趁机指挥部队掩杀过去，浙保第一团折损过半，残部仓皇逃窜，挺进师一口气追击了15里。

这时，刚从东南方烂泥村赶来的闽保第二团见势不妙，不敢接战，向南遁去。

这一仗，共歼灭李秀部500余人。

斋郎之战，是挺进师进入浙闽边后的关键性一仗。浙江保安团在以后一段时间内退守自保，不敢蠢动，一些反动地主也纷纷离开浙西南，致使龙泉河以北地区比较空虚，挺进师因而获得了开辟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有利时机。挺进师进军以来的第一个作战任务——打开进入浙西南的通道，胜利完成。

## 二 罗卓英兵发浙西南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挺进师选择了龙（泉）松（阳）遂（昌）东西两片地区作为建立第一块游击根据地的基本区域，并将部队改编为四个纵队，二个独立支队。

第四纵队留在龙泉河以南继续活动，借以牵制南面敌人；由第一、第二纵队担负开辟基本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其余各部由粟裕率领北进，活动于浙赣铁路以南的龙游、金华、永康、丽水、遂昌之间，迫使敌人北调，从而使一、二纵队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挺进师的前身本是赣东、东北的子弟兵——红十军，是长于打游击的，后来奉命调往中央苏区，先后整编为第十一军和第七军团，在几次反“围剿”中，千里转战，渐渐疏于游击而转变为一支长于野战的正规军团。

现在要分散打游击，又要从头学起了。

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

一开始，师部派一名团级干部带一支小分队出去活动，期限为半个月，在预定地点与主力部队会合。可是，过了三天，这支部队就跑回来了。别看才去了三天，人也瘦了，眼睛也凹下去了，胡子也长了，而且无论如何也不肯单独行动了。

不会打游击，就凭区区500人，怎么可能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站稳脚跟？

刘英和粟裕深知这个问题不解决，挺进师不可能有前途。

于是，他们组织部队学习打游击。办法是有意让一支支部队出去活动。一次只出去三天，三天后，在约定地点会合，会合后再出去，然后增加到五天、十天、半个月……

单独出去活动的次数多了，应付各种困难的办法就有了，这

就是打游击战的本事。

挺进师还碰到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浙江是新区，群众对红军了解甚少，而且浙南方言甚为难懂，红军与群众难以沟通，由于国民党长期的欺骗宣传，群众对红军有点望而生畏。听说红军来了，常常吓得躲起来。有时，连一个向导都找不到，筹措粮食给养更是困难。

为了得到当地群众的了解和支持，挺进师曾采取一种看似笨拙实则非常有效的办法。

红军快要进村时，侦察员化装成逃跑的群众，口里喊着：“红军来了！红军来了！”群众也跟着跑出来了，侦察员再把群众拦下来，向他们说明情况，请他们带路，讲定每带10里路给一块银洋。

这样，群众既得到了利益，又明白了道理，军民之间逐渐得到沟通。

挺进师每到一个地方，总是先打击反动武装，摧毁地方政权，继而发动群众，没收地主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农、青、妇以及赤卫队等各种革命群众团体，一个崭新的红色游击根据地便在浙南引人瞩目地出现了。

4月16日《东南日报》报道：“浙省无匪迹……治安绝无问题。”可是转瞬之间，来自仙霞岭的霞光，已映照得浙西南一片火红。两个月后的《东南日报》又惊呼：“松遂龙各县大半赤化”，“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甯浙后，匪化已波及全省，以目下形势论，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之匪，若当局未能迅速肃清，前途实堪可虑。”

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对红军实行“清剿”，妄图消灭红军于立足未稳之际。

当时国民党在浙江的正规军都调去对付各省红军特别是中央红军主力，只保留四个保安团，省府当局调集这四个团及各地保安大队，还向南京借调一个税警团，共约八九个团，分四路向浙

西南扑来。

对于敌人的反扑，粟裕早有思想准备，他参照前一时期的斗争经验，将主力分成南北两路跳出去，转入敌后，牵着敌人的鼻子，把他们调出中心区。

南路部队向西南出动后，粟裕亲率主力北上，日夜兼程直指汤溪县城，敌人拼命加固城防，准备死守，红军突然兵锋一转，折向了遂昌门阵，在门阵大张旗鼓地开展革命宣传、斗争土豪劣绅。

敌人刚回过味来，红军又杀奔上阳而去，等敌人进逼上阳时，粟裕却又指挥部队进袭南坑了，就这样辗转游击了半个多月，把革命的烈火一直引向了浙赣铁路线。

浙赣铁路受红军威胁的危言不脛而走，各地告急文电如同雪片般飞至杭州，搅得黄绍竑头昏脑胀、坐立不安。

“进剿”计划眼看要破产，黄绍竑无奈之际，打起了“推行新运，抚慰灾民”的旗号，带着一个仕官教育团前来助威。

这一期仕官教育团集中训练的是浙江各县的基干队和常备队长，他们是浙江保安队的反共骨干。仕官教育团装备精良，黄绍竑将其视为“怀中利剑”。

6月20日，黄绍竑亲率此团前往金华。

这个消息很快被挺进师侦察得知。

粟裕在心里暗叫：“歼敌的机会又来了！”

他在敌人必经之路预先设下埋伏，以逸待劳，给仕官团以突然打击，先在宣平北乡歼其一个整连，接着又奔小溪口，再歼一个连。两个连的装备均为挺进师所得。

黄绍竑遭此打击，匆匆跑回杭州，其秘书长对记者发表谈话时，承认“目前形成此剿彼窜，兵去匪来之形势”。

此次“清剿”遂告失败。

至1935年8月，挺进师已发展到近千人，扩编为五个纵队和两个独立支队，加上地方工作人员，共2000余人，此外还有地方

武装千余人，在浙江站稳脚跟的初步目标业已实现。

鉴于保安团的失败，蒋介石决定调用他的主力部队来进行“围剿”。

国民党军委会在七、八月间，先后任命卫立煌和罗卓英为“闽赣浙皖四省地区剿匪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其总指挥部在赵观涛任总指挥时，设在江西上饶，着重对付北上抗日先遣队，以后一度移驻福建南平，重点对付闽赣边境。7月下旬，移驻浦城，9月中旬移驻浙江江山。

该总指挥部制定的《第一期清剿计划》（国民党认为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只是红军的“残余”，故名“清剿”，而不叫“围剿”），确定这次“清剿”要以边区大部对付粟、刘，授权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统一指挥。

1935年8月，罗卓英集中了32个整团约六七万兵力，连同地方武装号称40个团，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发起了大规模的“清剿”，并构筑了两道碉堡封锁线，以求切断挺进师转向闽北、闽东的退路。

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尤其是对付剿共专家罗卓英，粟裕确实感到异常棘手。他仔细回顾了自己所经历的大小数百次战斗，没有找出这样的范例。

但是南征北战的丰富经验使粟裕明白，战争的精髓就在于机动灵活，对游击队，更应该是这样，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游而击之。

经过认真讨论，挺进师决定留下第二、第五两个纵队就地坚持战斗，其余主力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破敌人的“清剿”。

9月下旬，粟裕率部从龙泉、道太以东国民党第六十七师和第十一师的接合部——哈湖偷渡龙泉河，突破了敌人的云（和）龙（泉）封锁线，进入浙闽边境地区。

红军主力突围的消息传来，狡诈老辣的罗卓英用铅笔敲着脑袋沉思良久，他深知以数万大军去追捕不足千人的游击队，难以奏效。他想“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浙西南游击区是人浙“赤匪”的唯一立脚点，“我若把他们的老巢来一个一窝端，……”，他传令：以一个师（约五个团）的兵力追堵粟裕大部队，其余几十个团仍死死拮住浙西南中心区。

9月19日，罗卓英开始血洗浙西南，这次大清洗先后延续了8个多月，直至次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罗卓英被调往湖南，才暂告结束。

挺进师主力已撤走，留在浙西南的都是小股游击队。罗卓英深知，这些分散的“共匪”人数虽少，但神出鬼没，极难捕捉，再采取过去那种拉长战线，穷追猛打的方式，显然是不适宜了。

他的办法是：实行全线封锁整个游击区域，以营为单位编成“搜剿队”，以梳篦方式漫山遍野来回“清剿”；强迫山区群众搬到平原地带，实行移民关村政策，割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并逼迫群众协同烧山、搜山。罗卓英此举意在将游击队全部打死或饿死在深山老林中。

这一招果然厉害，留在浙西南的挺进师第二、第五纵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鲜血染红了仙霞岭的沟沟坎坎。

在国民党大部队、小部队、正规军和地方武装的全力进攻下，游击区一块一块地失陷，人员伤亡越来越严重；

师部政治部主任曹富武牺牲了；

二纵队政委洪家云牺牲了，纵队长李重才牺牲了；

龙浦县委书记，三纵队政委方志富牺牲了；

一个又一个战士牺牲了……

剩下的战士们只有各自分开，三人一伙，五人一群，白天隐蔽在靠近敌人据点的山头上，夜间到一个约定的地方集中。

游击队员们如今面对的，已不再是如何消灭敌人，而是如何

使自己生存下去的问题了。

躲在深山密林里，可以暂时躲过敌人的搜索、烧山，却躲不过艰苦的自然条件向他们提出的生存挑战！

国民党一个师长曾经断言：“我们不打他们，饿也要他们饿死在山上！”

仅仅“移民并村”还不够，国民党军所到之处，百姓全被赶走，房子烧光，粮食不能留下一粒，连青菜也要拔光。

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彻底割断红军与群众的联系，其实，他们永远也不会理解红军和群众那种血肉相连的深情，不管敌人封锁得多严，山下的群众仍然千方百计地支援山里的红军。

源头山有个叫老大的老人，一家人被强迫搬进国民党的白岩据点，但他为援助红军，特地向保长请假，说是上山看守包萝。他一回到山上的草棚，就磨起了包萝，给隐蔽在深山里的红军送饭。

一天，保长带兵搜山，发现老大草棚里的蒸笼蒸过包萝饭，便把他带回据点严刑拷打，老大守口如瓶，最后竟被活活打死！

从此，敌人的封锁变得更加严密，游击队的生活也更加困难了。游击队员只能摘一些野菜、野果子充饥，吃了野果子，大家的胃一个劲儿地往外冒酸水，说不出的难过，等酸水冒光，肚子又饿了，只好再吃。天气好时，尚可借敌人烧山、烧棚的条火，烤点青包萝、苦菜、萝卜吃。可是转眼间，秋去冬至，山上的包萝都收割运下山去了，野菜也枯死了，只能挖点萝卜下脚啃啃，甚至挖出鼠洞，与貂鼠争食。

吃得困难，住也苦不堪言。

山上山洞虽多，但都不能住，因为山洞是敌人搜查的重点目标，大部分时间，游击队员们只能露宿，青天作帐，大地当床，和衣而卧，枕戈待旦！

游击队员们编了一首顺口溜：



身无冬衣夜无被，  
日无粮食饿肚皮，  
野草萝卜来充饥。  
敌人“清剿”消灭我，  
同你一命拼一命，  
打死你一个不亏本，  
打死你二个赚一个。

.....

苦是够苦了，但革命的意志却从未丧失过。游击队员知道，中央主力红军尚在转移途中，红军不会被消灭，他们总有一天会像久别的孩子投入母亲的怀抱一样，重新回到大部队中去。日夜萦绕他们心头，鞭策他们的，便是那句他们笃信不移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留得这副有用之躯，日后沙场效命，才更是一个真正的铁骨男儿！

何况浙西南还有那么多时时刻刻关心他们的人民群众！

有一次，搜山的烟火和诱降的喊声，离几个游击队员的隐蔽地越来越近了。游击队员们敛声静气，已做好了拼它个鱼死网破的准备，千钧一发之际，一个苍老的声音炸雷般响起：“这里都是石头、大树，又没有茅草可烧，大树是我们的命根，你们把它烧掉了，我们要不要活下去！”

搜山队被他这么一喝，竟往旁边去了。接下来的几批搜山队，也都被他拦走了，最后，只剩了他一个人。

老人对着游击队的隐蔽地自言自语地说：“大树啊，大树，你是我们的依靠，有我们在，你不要愁，天黑下来就好了。”

躲在树丛中的游击队员们无不热泪盈眶，有这么多鱼水相依的群众，何愁斗争不能胜利！

就凭着一种对革命的信念、顽强的斗志，千百万群众的支援，

这些红军战士在游击根据地基本丧失的情况下，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把浙西南的革命火把传了下来。

当粟裕、刘英率领挺进师主力部队跳出重围，开辟浙南根据地，再回来寻找原来的第二、第五纵队的战士时，先后有几十个人从各自隐蔽的山头、小村钻了出来。战友重逢，恍若隔世，大家抱在一起，泣不成声。粟裕看到他们，心中百感交集。他为自己的战士吃尽人间苦难而心疼，又为他们终于坚持下来了而骄傲。他千言万语无从说起，只深情地说了句：“真难为你们了！”

### 三 神出鬼没打游击

粟裕、刘英率领的挺进师主力撤出浙西南中心区，南渡龙泉河以后，敌人的追堵部队虽然只有五个团，不及其“清剿”兵力的1/6，但仍10倍于红军，加上反动保安团和地方武装的配合，挺进师的处境仍是十分艰险。

红军只有与追踪的敌人往返兜圈子，周旋于浙闽边区的景宁、庆元、松溪、政和、建阳、寿宁、福安等地，战斗频繁而艰苦。

10月5日，挺进师和闽东特委领导的游击队会师于寿宁。

这是继上年先遣队北上途经闽东与他们会师之后的又一次大会师，故而群情振奋，激动不已。

双方领导人很快就共同抗敌取得一致意见，成立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刘英为书记，粟裕为组织部长，叶飞为宣传部长兼少共临时省委书记，并相应成立了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粟裕任司令员，刘英兼政委。

鉴于罗卓英正集中力量“清剿”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临时省委决定，立即着手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除北渡瓯江的第一纵队加紧向括苍山南北地区发展外，重点放在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

浙南地区，主要是指瓯江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东濒东海，南

接闽东，山岭连绵，地形险要，离浙赣线较远，国民党统治势力比较薄弱，对开展游击战比较有利。

挺进师组成了“突击队”和“牵制队”，分头开展活动。

“突击队”由刘英负责，主要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带领便衣队、短枪队坚持于基本地区，大力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根据地的建设。

“牵制队”由粟裕率领，在广大范围内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牵制和打击敌人，以掩护基本地区的建设，并扩展新区。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基本地区得以巩固，在大块游击根据地周围还建立了若干小块游击根据地，其外围又有许多条件较好的游击地点。

在此期间，粟裕带领部队南北转战，经常把活动重点放在对敌威胁最大，对外界影响最大的浙赣铁路南侧，甚至对汤恩伯的老家武义，陈诚的老家青田，蒋介石的老家奉化也常常进行搔扰。

挺进师的东游西击令蒋介石大为发火，悬赏巨金捉拿“金来”、“苏群”、“余良”等“共匪”首领，其实，这些都不过是粟裕的化名而已，当然，蒋介石的“通缉”是不可能有任何效果的。

到1936年底，挺进师再次由几百人发展到一千五六百人，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达数千人，活动范围扩大到30几个县。

就在1936年冬，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迫接受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照理，蒋介石应该立刻停止对南方各省游击队的“清剿”、“围剿”，然而，蒋介石言行并不一致，在停战谈判的同时，他还搞三个“北和南剿”的计划，积极调兵遣将，企图趁机一举消灭南方各省的红军和游击队。

为此，蒋介石任命第四路“剿匪”总指挥刘建绪接替上台还不到两个月的张发奎，担任闽赣皖浙四省边区主任，又派CC系骨干分子宋家骅接替黄绍竑任浙江省主席，还调浙江省保安处副处

长蒋志英到温州地区主持“剿共”。

刘建绪原来是湖南的一个小军阀，曾在湘鄂西和湘黔边同红二方面军作对多年，是贺龙将军的手下败将。

浙南游击区的活动范围比浙西南大，刘建绪不可能再采取罗卓英全面包围、反复梳篦的方针，而只能以拉网式的由北而南，由西而东，由外围到中心的逼进包围的方针，企图将挺进师赶向东南，在浙南狭小范围内聚而歼之。

刘建绪调集新五师、五十六师、十九师、六十三师、独立二旅和九旅、八十师一个团等正规军7万余人，再加上省保安团、自卫队和警察、便衣队等共10万余人，气势汹汹地向游击区挺进。所到之处构筑工事，建碉堡，逐步缩小包围圈，并强迫老百姓组织“联防剿共”队，配合放哨、守夜、搜山，到处张贴“通共匪者杀！”“为共匪带路者杀！”“替共匪送粮送信者杀！”“窝藏共匪伤病员者杀！”的布告。

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浙南地区。

由于有了前段斗争的经验，粟裕、刘英决定：除留下地方游击队在原地坚持斗争外，挺进师化整为零，分散行动，保存实力，待机再起。

两年来的游击生活，早已把挺进师的指战员锻炼成了游击“高手”，他们采取兜圈子、大小圈、“8”字形、“5”字形、电光形、回马枪、东去西返、早出晚归等多种游击方式，飘忽不定，出没无常，使敌人大感头痛。

不过，国民党“围剿”部队人多势众，惊险的场面是屡见不鲜的。

1936年冬的一天，粟裕带着一支小部队，用“截尾子”的办法，打掉了敌人一个排。所谓“截尾子”，就是派人守在敌人行军的岔路口，待其大部队通过，只剩下“尾巴”时，移动其路标，将“尾巴”引入红军设伏地带。

不料，这回前边的敌人行动迟缓，听到伏击的枪声，立即掉头追过来。

粟裕带领游击队迅速转移，被敌人追到一条山沟里，前面一个据点挡住了去路。

那时，红军和国民党穿的都是一样的灰军装，只是帽子不同，粟裕急中生智，立即命令部队化装。

粟裕带头将袖管、裤管卷起，把帽子攥在手里当扇子扇风，嘴里哼着小调，径直向敌人据点走去。

“哪一部分的？”国民党哨兵喝问。

“永嘉保安司令部三营八连。”粟裕流利地回答。

“从那儿来？”

“唉，在大顺北被共军打了一个伏击。”

“上哪儿去？”

“上芝溪头集中。”

“你们司令叫什么名字？”敌哨兵显然还有点不放心。

“许蟠云。”粟裕显得有点不耐烦地答道。

没有一点儿破绽，哨兵把手一挥，示意可以通过。

粟裕一进据点，立刻指挥大家从后面溜出去，等敌人发现有诈，出门追来，红军早已脱离了险境。

《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游击队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不了解敌情，盲目乱转，也许一不小心就转到敌人的包围圈去了。因而找些敌方的报纸看，偷听敌人的电话，对挺进师来说是每天少不了的。

有一次，粟裕带领一支小分队袭击了一个乡公所，抓到了伪乡长。

“卑职……噢，小……小人有罪。”乡长战战兢兢地说。

粟裕命令道：“你马上给县长打电话，说你这里很紧张。”

“小的不敢。”乡长直打哆嗦。

“立刻照办！”粟裕用枪抵住他的后腰：“就说请县长赶快派部队来。”

乡长吓得拿起电话，结结巴巴地向县长报告。

县长回话：“我这里哪还有什么部队哟，县里的部队早都开到庆元去了。”

了解这些情况后，粟裕率部队三绕两绕越过了敌人的封锁线，直奔龙泉河。

这一带，龙泉河由西而东，松阳溪则由西北流向东南，在丽水的大港头、碧湖之间，两溪会合，形成一个三河口。

粟裕率部过了龙泉河后继续北进，准备再过松阳溪。

当晚，瓢泼大雨，山洪爆发。本来小小的松阳溪，突然变得河水汹涌，加上天黑，他们找不到渡口，没能过去。

天亮以后，敌人来了。游击队被卡在两溪之间二三十里宽的“三角架”里，十分危险。

小分队只好返回龙泉河，他们找到一条船，刚跳上去，隐蔽在旁边房子里的敌人突然钻了出来，向他们猛烈扫射。

粟裕发现中了埋伏，立刻跳下船，带领大家，沿着溪边，边打边跑，躲过了这股敌人，可是，从北面追来的敌人又向“三角架”包围过来，粟裕急令大伙儿钻进树丛里隐蔽。

敌人一边搜，一边喊：“看到了，我看到你了，赶快出来！”

粟裕知道这是他们在虚张声势，暗示身边的战士“别出声”。由于游击队在暗处，加之大雨滂沱，敌人怕挨冷枪，不敢乱闯，一直挨到天黑，终于空手而归。

敌人撤走后，粟裕从树丛里钻出来，组织部队泅渡过河，谁知他一下水，就被一个漩涡卷住了，无论怎样挣扎都游不出来，眼看就要被吸到水底。幸而旁边的战士发现他们的首长不见了，连忙手拉手在水中结成一道人链，由最前面的战士递给他一个伞柄，才把他从漩涡中拉了出来。

这一天一夜，小分队走了180里路，连续打了七仗，几次死里逃生，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

这一时期，由于敌人也摸出了一些对付游击队的经验，前堵后追，挺进师的生活更加艰苦了，常常是几天几夜得不到片刻休息。

在一次，粟裕和他带领的小分队被敌人连续追了三天三夜，到达一个秘密隐蔽点后，他一觉竟睡了40小时。

一两天吃不上饭也是常事。有时怕暴露目标，不能生火，就吃生谷子，生谷子吃了不消化，大便拉不出来，就相互用棍子扒肛门。但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挺进师也从未气馁过。

夜晚，当敌人缩回据点时，他们常在深山密林中唱歌、拉胡琴、吹笛子，战士们最爱唱《三大纪律》、《中央红军野战军》，有时还在《海呀海》的民歌中填进新词。遇上打了胜仗，月色又好，战士们还在林中空地上跳起舞来。

粟裕作为挺进师的最高军事指挥官，一言一行都起了表率作用。在加入先遣队之前，粟裕的右臂就受过枪伤，并没有全愈，身体一直很虚弱，后来战斗中脚踝中弹，一次夜行军跌入深沟又扭伤了腰，这已是粟裕第六次负伤了，战士们要用担架抬他，他总是坚持不用，好长一段时间都是拄着拐杖行军。

1937年5月之后，刘建绪对浙南的“围剿”进入最残酷的阶段，但这已是黎明前的黑暗了，因为此时，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日本的入侵终于把国民党蒋介石逼到了“最后关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大敌当前，国共两党终于握手言和，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停止对南方八省游击根据地的“清剿”。到1937年9月，国民党当局对浙南游击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宣告结束。这次“围剿”历时8个月，浙南军民为此付出了无数生命和财产的代价，浙南的红旗一直擎在挺进师手里。

## 四 党内分歧

由于电台被打坏，挺进师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对遵义会议的精神一无所知，只能根据自己对形势的理解和过去的经验来决定方针。这样，挺进师的两位主要领导刘英和粟裕便在许多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挺进师到达闽浙赣后，与闽东游击区联合，如前所述，成立了刘英为书记的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由粟裕为司令员、刘英兼政委的闽浙临时军区。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刘英在挺进师对敌斗争和建立浙西南根据地的实践中，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表现出了坚定的革命立场。但他也把过去一些“左”的作法搬到省委工作上来。

粟裕和刘英的最初分歧产生于对根据地的建设方针上。

挺进师到达浙西南后，基本沿用中央苏区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并公开发展群众组织，公开建党、建政。

粟裕考虑到浙西南根据地纵横不过几十里，时时面临强敌的“围剿”，目标太突出，难以经受敌人反复持久的打击。在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应从实际情况出发，适当地调整政策，团结中间阶层，对上层分子根据不同表现区别对待，以孤立敌人。但是，当粟裕提出这些意见时，刘英反感地说：“粟裕同志，你这是在否定浙西南的工作，要小心不要再犯‘右’倾错误！”

粟裕为人一向诚恳质朴，顾全大局，刘英反应如此强烈，他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接着，在军事斗争策略上，两人又产生严重分歧。

1936年3月，刘英坚持要挺进师回到根据地中心区活动，但粟裕认为敌人的“清剿”尚未结束，挺进师主力仍应在大范围内游击，如果钻到包围圈中去，正是敌人求之不得的，势将遭到毁



灭性打击。

刘英派出了一个他信任的人到挺进师任政委，坚持要部队开进中心区。

粟裕坚决抵制了这个意见，这使得粟、刘分歧在部队中传扬开来。此后的“叶飞事件”终于使矛盾激化了。

刘英开始是想以省委名义把叶飞留在浙南工作，以便全面控制闽东游击区，但粟裕考虑到叶飞是闽东游击区的主要负责人，把叶飞留下，对闽东工作不利，因而反对这个意见。继面，刘英想以省委组织部长的安排来留住叶飞，并借此撤掉粟裕组织部长职务，由于受到抵制而没有实现。

1936年秋天，粟裕忽然接到一张刘英派人送来的书面命令。他接过一看，只见命令上写道：

粟裕同志：

兹以临时省委的名义命令你，近日内必须邀请叶飞到你的驻地与你会面，并在会面时将其扣押，解送到省委。如拖延或用其他方式影响此命令的执行，都将被看作是对抗和分裂省委，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以何种名义召叶飞前来，由你自行确定。

闽浙临时省委书记 刘英

刘英还派来一支武装，监督执行这个命令。粟裕十分震惊。他想到，在江西苏区“左”倾路线横行期间，许多好干部就是这样被非法押走后，一去不复返的。

从感情上说，粟裕不愿把党内斗争敌对化，但从组织原则出发，他执行了刘英的指示。但是在把叶飞押往省委的路上，遭到敌人的伏击，叶飞乘机逃脱。随即，闽东宣布退出临时省委。临时省委宣告解体。

这次押送叶飞遭伏，疑点很多。这是否出于粟裕的精心安排呢？因为粟裕明白叶飞此去凶多吉少，一旦叶飞不测，不但闽东游击区的前途不可预料，还极有可能发生闽东与浙南两方面的武装冲突。当时都已失去和上级领导的联系，各游击区各自为政，本来就相互的不服气，加上“左”倾统治时期错抓错杀积下的仇怨，局面可能变得更加不可收拾。而且，粟裕是极为欣赏叶飞的，认为叶飞是个对敌斗争很有一套的同志，还曾向叶飞请教过游击战争中的战术问题，两人的私交也不错，粟裕素以理智和谋略著称，以他的聪慧要设计这一幕悲喜剧，当然是不费力气的。

麻烦的是，刘英正是这样想的，他认定叶飞的逃脱是粟裕的诡计，于是立即召开紧急省委会议。

“今天我们开会，讨论叶飞、黄道分裂省委，粟裕参与其事的问题！”刘英怒气冲冲地宣布。

因叶飞等闽北、闽东同志已宣布退出临时省委，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粟裕便成为斗争的唯一目标。刘英把粟裕关了起来，派了一个班专门看管，并天天进行批判活动。

在一个星期的关押当中，粟裕想到敌情如此严重，又失去了同中央及上级党组织的联系，现在跟闽东、闽北的关系又破裂了，根据地在敌“围剿”中已遭到严重摧残，感到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分裂了。于是从团结和斗争的大局出发，粟裕作了违心的检查，表示以后一定要坚决服从刘英和临时省委的领导。刘英见目的已达到，而浙西南的军事又少不了粟裕，于是放他过关。

从此以后，粟裕和刘英就分开活动，两人都心存戒备，会面都各自带着自己的武装，而且不敢住在同一个房子里。

1937年上半年，浙南第二次反“围剿”中，两人失去联系，直到1937年10月才又重新会面。

## 五 奔赴抗日战场

1937年9月。

秋季的门阵地区，枫叶红遍，松涛阵阵。在山峦起伏的密林深处有一座寮棚，用松脂点燃的灯火在秋风中忽明忽暗。粟裕身披军衣，背靠着柴草堆正在苦苦思索。

近日来国民党“围剿”游击区的行动开始缓和下来，但是从金衢平原却不断传来各种消息和谣言，说什么“共产党投降了，红军被收编了”。这是怎么回事？粟裕随手翻动了一下身边摊着的一堆陈旧的报刊，其中有敌方的报纸，也有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弄来的进步刊物，遗憾的是都已过时太久了。

他想起上海一些进步刊物曾经透露过党中央的《八一宣言》等内容，联系传闻的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两广事变”、“西安事变”等消息，再加上刘建绪的“围剿”势头确实要比几个月前减弱了许多，会不会是国共两党有再次合作的可能性呢？粟裕和临时省委早已断了音讯，也不知道他们那边有什么举动。

两天前，粟裕派出一支小部队到国民党控制区去侦察，还没有返回，下一步，部队该怎么行动呢？远处传来哨兵喝问口令的声音。

粟裕踱出寮棚，林间黑影绰绰，向寮棚奔来。粟裕非常熟悉自己的队伍，他确认这是出外侦察的小分队归来了。

侦察参谋和几位连排干部来到跟前，粟裕将他们让进寮棚，火光摇曳中，瞥见他们兴奋的神色，粟裕知道他们此行一定带回来了好消息。侦察参谋开始绘声绘色地报告，粟裕听得不住地点头，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浓。

那天，几位侦察员化装成国民党的军队，一路上没碰到任何麻烦，大摇大摆地来到龙游县溪口镇，径直走进镇公所。镇长见

状，不住地向他们点头哈腰，敬烟倒茶，唯恐照顾不周。化装成国民党军官的红军侦察排长，首先自我介绍说：“我们是省保处蒋志英处座直接指挥的部队，在山区剿匪，正节节胜利，忽然接到上峰命令，要我们撤出山区开赴抗日前线，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要给你们县长打个电话，了解一下具体情况。”镇长喏喏连声，亲自拨通了县政府的电话。

“我是县长”，县长说，“现在国共合作啦，红军已改编为八路军就要开拔抗日了。省保安处蒋副处长也已从温州返回省里复命，这几天报纸上都登了。”

问明了情况，镇公所已为侦察员们备下酒菜，豪饮美食了一顿，侦察员们又搜集了一些报纸，连夜赶回汇报。

粟裕心中非常高兴，一时竟没了倦意，战士们走后，他打开刚送来的各种报纸，看了很多国共合作抗日的消息，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渐渐在头脑中明朗化了。

第二天，粟裕对部队作了形势报告，并交待大家要百倍提高警惕，严防国民党趁机使诈；同时派人下山，去寻找临时省委和刘英。几天后，粟裕和临时省委联系上了。派去联络的人员带回了刘英给粟裕的亲笔信。

从信中粟裕得知，临时省委已于1937年春同上海党组织建立了联系，接着又通过上海党组织与中央取得了联系。1937年4月，在刘英的主持下，以临时省委和省军区的名义向浙江国民党当局发出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电文。

其时，刘建绪已奉蒋介石之命，在报纸上公开表示与共产党和平谈判。双方代表在鳌江进行了三天的谈判，但国民党方面毫无诚意，竟无理要求红军下山接受“改编”，临时省委寸步不让，对方见阴谋不能得逞，便拿出蒋介石“停抚进剿”手令相威胁，谈判随即破裂。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刘建绪又给临时省委送来亲笔信，要求

重新谈判，临时省委遂派代表到温州同国民党浙江当局谈判，9月16日，双方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

联络员还讲述了谈判中的一个插曲：国民党方面代表“四省剿共”党政处主任邓仞指着刘英在谭家桥战斗中负伤的右手，明知故问：“请问，刘先生向来用兵有方，这是如何负伤的呢？”

刘英大笑起来：“这手么，是被恶狗咬伤的，邓先生有所不知，我自幼喜欢打狗的，经常打得这些畜牲头破血流，这手被咬伤一点，又算得什么呢？”

几句话，说得邓仞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很是尴尬。

接到刘英的信后，粟裕根据临时省委的意见，给国民党遂昌县长发出信函，要求他派代表到门阵地区与红军谈判。

不久，国民党遂昌县政府的代表来到门阵，向粟裕递交了县长的回信，敦请粟裕率领红军游击队下山，进城共商合作抗日大计。

粟裕对那个代表说：“为了共同抗日，我们愿意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停战谈判。但是我们有三个条件。第一，我们将开赴浙南根据地，你们沿途不得留难；第二，我们已经停止了打土豪，你们要给部队补充弹药和给养；第三，合作不是投降，改编不是收编，双方是平等合作，要保持我军的独立性，我们暂时不进城。”

那个代表表示愿意回去报告，并尽快给予答复。

几天之后，谈判在门阵举行。

双方自我介绍后，便在方桌两侧各自入座，虽说是和平谈判，但同桌而坐的是血战了10年之久的死对头，因此气氛显得很紧张。不过，因为有国共言和的大前提在，谈判进展还算顺利，双方达成协议，国民党方面完全同意了粟裕提出的要求，欢迎红军下山。

当红军队伍整整齐齐地出现在县城的时候，城里百姓扶老携幼、争相观看。队伍经过杭州时，浙江省省长黄绍竑设宴招待了

粟裕等红军将领。

黄绍竑打量了粟裕半天，仍然怀疑地问：“你就是粟裕？不像！不像！”

粟裕幽默地说：“黄省长一定以为我是青面獠牙吧？”

“那倒不是。”黄绍竑仍然摇头，“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瘦弱的书生。”

他接着又说：“粟裕你这个人呀，实在不可思议，我打你时，年复一年，东征西讨，不知费了多少力气，连你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可是和谈一开，城里乡下到处都是你的人！”

和谈成功，粟裕接着便率部到浙南平阳与刘英率领的临时省委和挺进师主力会合。长期分散在各地活动的游击小分队，也都相继赶到了平阳北港的山门街。

战友们重逢，个个眉宇间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和重逢的欢快。刘英、粟裕点验了部队，共有四五百人。两人相对，感慨万端。三年前，挺进师初建时，人数与此相当，然而其成员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红七军团、红十军团的老骨干剩下的已经不多了，新补充的大多是上海、温州的知识青年和当地的工农子弟。

令刘英和粟裕感到快慰的是，早在1934年7月就已接受的先遣北上的任务，至今终于可以问心无愧地上交一份圆满的答卷了。寻淮洲、方志敏，还有许许多多的先遣队英灵，当可含笑九泉矣！

“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念我烈士，万古垂青。”这是刘英为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中死难烈士所写的悼词，对此，全体为赴国难，英年早逝者当之无愧！

挺进师经过整顿，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队”。为了加强抗战力量，总队部在大墩村举办了党员干部训练班，在山门街小学开办了抗日救亡干部学校，部队补充了新兵，开展了形势教育和抗日军事训练。

1938年3月，党中央决定，由刘英主持浙江省委的工作，带

领部分武装人员和干部继续留在浙江开展抗日民主斗争；由粟裕带领“抗日救亡总队”开赴皖南参加新四军的战斗行列，并以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的部分人员组成战地服务团随部队行动。

3月18日，粟裕率领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和战地服务团，由平阳山门出发。

一路上群众箪食壶浆，夹道欢送，部队途经瑞安、泰顺、丽水、松阳、遂昌、龙游、常山、开化等地，经过20多天的长途跋涉，到达安徽歙县的岩寺，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正式走上抗日前线。

---

---

## 第三章 惜别赤都情意浓

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造成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可是，辛苦经营了6年的红土地，红军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 一 留 守

蒋介石一再宣称：“日本人侵略是外来的，好像是从皮肤上渐渐溃烂的疮毒；土匪捣乱是内发的，如果内脏有了毛病，这实在是心腹之患。因为这个内疾不除，外来的毛病就不能医好，而即算医好，也还是无济于事，到了最后，病人还是要断送在这个心腹内疾。”如果“先将这个心腹之患彻底消除，那么外面的皮肤小病，一定不成问题。”<sup>①</sup>这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依据。

于是，在四次“围剿”接连失败之后，蒋介石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这一次，蒋介石是下定决心永除所谓“心腹之患”。他不顾“亡国灭种”的危险，不顾国人的斥骂，孤注一掷，丧心病狂地向苏区进犯……

众寡悬殊、斗争残酷的“围剿”与反“围剿”的厮杀，在苏区土地上展开了……

#### 博古“开脚一走就丧失了主动权”

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几乎就在我到达的同一天，传来了黎川失守的恶讯……”

---

<sup>①</sup> 《蒋介石秘录》下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81～382页。



黎川，中央苏区东北面的一个小县城，东依俊秀的武夷山。黎川之战，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前哨战。

此时蒋介石刚开始施行他策划了一年多的“围剿”方案。蒋介石选择的首要进攻目标，便是中央苏区的北部门户黎川，由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陈诚担任主将。陈诚率领三个精锐师——第五、六、七十九师，朝黎川县城推进，来势凶猛。

当时红军主力在朱德、周恩来率领下，正在福建跟国民党十九路军作战，驻守黎川的萧劲光手下只有70个兵。

当陈诚率三个师进攻黎川时，萧劲光不得不率队撤出黎川县城，退到城外60里的溪口。

消息传到瑞金，博古勃然大怒。他高喊要“御敌于国门之外”，夺回黎川，保住国门。他命令彭德怀率三、五军团迅速从福建回江西御敌。

10月上旬，红军在黎川东北的洵口打了一个遭遇战，歼敌一个旅，取得了胜利。本来应该把这一仗当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序战，引导战争向胜利的方向发展。可是，李德、博古急于要“收复赤色黎川”，竟贸然命令红军去攻打敌人有坚固设防的硝石，红军连战数日未克。10月下旬，再命令红军去打敌人固守的资溪桥，也未获胜。11月中旬，又命令红军进攻浒湾。这时，彭德怀身患疟疾，冷透骨髓，三军团交由彭雪枫指挥。战斗第三天，敌人在十几架飞机掩护下，以装甲车开路，终于冲破了红军的防线。红军伤亡重大，被迫撤出战斗。

黎川失守，本是敌强我弱形势下的常事，却被扯到“罗明路线”上去，扯到毛泽东头上去。

浒湾失利，主要是三军团没有打好。彭德怀主动向前总说明了情况，申明“责任不在萧劲光”。可是，打击的拳头，仍然落到萧劲光头上。萧劲光这样说及当时的情景：“浒湾失利后，博古同志他们想整彭德怀同志，但不敢动他，就把战斗失利的罪名加在

我的头上。他们下令撤了我的职，调往前总审查。”

李德更是力主对萧劲光实行惩罚，下令审判萧劲光。于是，萧劲光成了“军内的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前总主办的《铁拳》杂志出了《反萧劲光机会主义专号》，刊载顾作霖等人批判萧劲光的文章。

1934年1月6日上午，瑞金最高临时军事裁判庭召开公审大会，萧劲光被押上法庭。法庭上一片紧张气氛。在书记员宣读对萧劲光的控告书之后，萧劲光据理争辩：“我手上的兵都调走了，敌人一个军三个师，我怎能守住黎川呢？再说上级也没有让我死守黎川。我到差不多被敌人包围的严重情况下，才带领七十余人的教导队撤出，这有什么错呢？”

可是，法庭根据李德的意见，仍坚持判处萧劲光五年徒刑，开除党籍、军籍。

萧劲光被关起来的时候，贺子珍来看他，向他转告了毛泽东的话，使他在最困难的时候得到鼓舞。毛泽东说，你应该撤退，做得对！对你的处罚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王稼祥的支持。王稼祥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判决书要他审批。王稼祥拒绝签字！

李德坚持要判处萧劲光五年徒刑，以压倒毛泽东和王稼祥。博古对此事已无能为力，借口工作忙，不再过问此事。李德无奈，对萧劲光的审判，才从轻处理。

黎川失守后，红军在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东突西击，陷入被动地位。毛泽东批评他们说：“开脚一走就丧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的办法。”<sup>①</sup>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21页。

### 坐失良机，节节败退

蒋介石胃口大开，在夺得黎川城之后，正欲发动进一步“围剿”，一桩突然事变，搞得他抚掌顿足，坐卧不安。

1933年11月20日，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抗日反蒋。这对于蒋介石来说，不啻晴天霹雳，

十九路军一向被蒋介石视为异己，为了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1933年初蒋介石把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去打红军。他的本意是让十九路军和红军两败俱伤，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如意算盘会落空。

蔡廷锴、蒋光鼐领导下的十九路军受过中共影响，又曾高举抗日的旗帜，在打不过红军，又后退无路的情况下，终于下定决心，举行兵变，实行“联共反蒋抗日”。

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急得几天几夜未曾合眼，不得不从江西急调11个师入闽讨“逆”。

蔡廷锴、蒋光鼐积极寻求与中共取得联系，希望得到支持。红军如能同十九路军联合起来，对粉碎蒋介石大军的“围剿”十分有利。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次主张与十九路军联合。可是中共临时中央“左”得厉害，把盟友推向了敌人一边。

12月5日，临时中央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声称福建政府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正是为了要维持这一统治，为了要阻止全中国民众的革命化与他们向着苏维埃道路的前进！

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坐失了一次打破“围剿”的良机，他们拒绝将红军突进到以上海、南京、杭州之间为中心的苏浙皖

广大地区作战，对北面之敌采取守势，而把红军主力西调去进攻永丰地区敌人的堡垒区，十九路军成了一支孤军。这正中蒋介石的下怀。接着，蒋介石亲飞福建西部，就近指挥，同时派出海空军封锁福建海口。

在蒋介石大军压境，“银弹”飞舞之下，十九路军孤军无援，所辖五个军中的四个军倒戈，投降了蒋介石。

1934年1月15日，福州易帜，降下了“上红下蓝三横条，正中嵌一颗五角黄星”的“中华共和国”的国旗，重新升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历时两个月的福建事变，不过是昙花一现。蒋介石也长舒了一口气……

博古非但不能把握有利战机，更为糟糕的是，在1934年1月中旬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作了《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强调：“只有进行一个坚决的斗争，反对主要的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度，党才能够发展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会议重新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是张闻天、周恩来、项英、王稼祥、毛泽东、陈云、张国焘、朱德等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有刘少奇、关向应、邓发、凯丰等人。

中共中央设立了中央书记处，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为书记，博古负总责。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四位书记，亦即政治局常委。

李德作为列席代表出席了会议。他在会上作了关于实行“短促突击”的军事建议。会议错误地认定中国存在着“直接革命的形势”，第五次反“围剿”是“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的决战。这次会议，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战争形势急转直下。

1934年的初春，还是寒风呼号的时节，江西的红土地上就像

雨后春笋般冒出成千上万个怪物来。<sup>①</sup>这是蒋介石采用赛克特的建议，实行堡垒政策，建造了各种各样的碉堡，什么碉楼、堡垒、桥头堡、护路堡、墟寨等等，将中央苏区团团围住。用陈诚的话来说，他们建碉堡是给池塘筑坝，然后“抽干塘里的水，捉塘里的鱼！”

消灭了十九路军之后，蒋介石立即调集四路大军，回师“进剿”中央苏区。

东路军，蒋鼎文为总司令，由闽北向闽西推进；北路军，为主力，顾祝同为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由北线向赣南推进，正面进攻中央红军；西路军，何键为总司令，由湖南向西推进；南路军，陈济棠为总司令，由广东朝北推进。

苏区的天空顿时乌云翻腾，烟尘滚滚，正如鲁迅诗中所说：“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殒。”<sup>②</sup>

从1934年1月下旬起，红军在福建的建宁、泰宁一带节节抵抗，与敌周旋三个月，未能取胜，被迫后撤。随后，陈诚命罗卓英率11个精锐师朝广昌进击。国民党军采取以守为攻的战术，以碉堡政策向前推进。从甘竹到广昌40华里，平均每天只进展四华里，简直不是打仗，而是“滚战”。红军采取的战术是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以己之短击人之长，兵力消耗极大，而又无法挡住敌人，广昌大战势所必然。

广昌在黎川之南、宁都之北，县城座落在群山之中，盱江左岸，是中央苏区北部重镇。照毛泽东以往的打法，应该主动放弃广昌，另找出路，寻机破敌。

如今，军权握在李德手里，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他

---

① 一般材料认为国民党筑的碉堡有3700个，但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的统计资料是14000个。

② 白下，即南京——引者注。鲁迅：《赠画师》、《集外集》，第127页。

一个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当时的地图多为草图，不够准确，李德也不问清楚，所以他的指挥往往与前线的实际情况差距很大。图上看来只有100里路程，他不问是山路还是平路，也不给部队留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敌情、气候和自然条件等等困难都不考虑，只凭比例尺测量地图上的距离，以此来推算路程，定下到达目的地和投入战斗的时间，又常常不留余地，因此给前线作战造成极大的困难。李德因此得到“图上指挥家”的谑称。对于广昌，李德更是一意孤行，一定要死守。

一个志在必得，一个非守不可。于是一场空前残酷的战争，不可避免地发生在广昌。

1934年3月21日，博古签发了《中央、军委、总政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命令指出：“我们的战斗的任务，是在以全力保卫广昌。”

广昌城里，贴着这样的大字标语：“为着保卫赤色广昌而战，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要么胜利，要么死亡！”“拒敌于国门之外！”“决不放弃苏区寸土！”

博古、李德不懂以柔克刚，硬拿鸡蛋碰石头，调集了红一、三、九军团的九个师，在广昌城防线上修筑大量土木结构的堡垒，幻想以此来打破敌人的进攻。

决战从4月10日开始。这时，国民党军队对蒋介石新军事原则的运用已臻于成熟，凭借优良的装备，从四面八方向广昌猛打猛轰。清晨，他们出动三四十架飞机先行轮番轰炸，再用德国普伏式山炮、野炮和一〇二口径的重迫击炮轰击，炸弹、炮弹倾盆大雨般朝守军阵地落下。在狂轰滥炸下，红军的“土堡垒”飞上了天，红军战士死伤惨重。

到了下午，眼看炸的差不多了，国民党步兵才出面进攻，占领阵地，立即构筑工事。第二天又重复昨天的“操作程序”。如此这般，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红军在城北要冲长生桥苦战几天之后，因伤亡太大，寡不敌众，被迫退入广昌城内。

4月20日，国民党军开始总攻广昌县城，“从上午八、九时开始至下午四时许，所谓永久工事被轰平了。激战一天，我军突击几次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在李德所谓永久工事里担任守备的营，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未出来。……”<sup>①</sup>

红军付出了重大代价，终于没能打破围攻，4月28日，广昌失守。

李德指挥的广昌战役一败涂地，红军伤亡5500多人。而国民党军队借助于碉堡和飞机、大炮，伤亡大为减少，只死600余人，伤1800余人，不及红军的一半。

正当博古、李德在战争中不断碰壁，已临破产的时刻，身为一军团团长的林彪，却竭力鼓吹李德的“短促突击”。

林彪在1934年6月发表《论短促突击》一文，断言“短促突击，不仅能取得战术上的胜利，而且能够取得战役上的胜利。”说什么“如果不相信这种短促突击的战斗……而忽视这种战斗，则更是危险的有害的。”他还拼凑了实行“短促突击”的26条具体措施，为“左”倾军事路线出谋献策。在推行军事教条主义方面，起了很坏的作用。

占领广昌之后，国民党军队的气焰更为嚣张。

6月，蒋介石分兵六路，向中央苏区腹地大举进攻。

博古、李德继续采取单纯防御、“短促突击”的战法，也将红军分为六路：红三军团的两个师迎战从泰和向兴国进攻之敌；红八军团在古龙岗以北抵抗敌军的进攻；红三军团在白水镇与石城之间阻敌；红一军团和红九军团等在连城、朋口以西抗击敌军向长汀的进攻；红五军团在头陂抵抗敌军向宁都的进攻；红二十二

<sup>①</sup>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0页。

师在会昌筠门岭抵御南线之敌。

这是典型的军事平均主义。

8月初，红军为了阻止敌人从广昌向南推进，在从广昌去石城的高虎垅山地，进行了大规模的阵地防御战。红军凭着满腔的仇恨与怒气，以血肉之躯同优势之敌拼搏，杀伤汤恩伯部4 000多人。接着，又在高虎垅以南的万年亭筑碉堡防御，歼敌1 000余人。但红军伤亡也很惨重，阵地也先后丢失。红军将士对李德这种处处被动挨打的战法非常不满，他们称“短促突击”的作战方针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战士们愤慨地说：

“过去的几次反‘围剿’，打了许多恶仗，不但从来也没有这么大的消耗，而且还壮大了许多倍。”

“现在摆在这里挨打，真气人！”

“这样‘阵地防御’下去，结果会怎样呢？”

彭德怀曾当面批评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痛”，李德听后暴跳如雷，大骂彭德怀“封建！封建！”

到1934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已进行了一年之久。战火已烧到根据地核心地区，疯狂的国民党军队像洪水泛滥一样，从四而八方涌来。红军战无可战，退无可退，不得不突围远征。

### 殷勤握手别梅坑

在红军主力突围之际，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另设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央办事处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

随主力长征，固然艰险重重，但留下来更危险。因为红军主力转移之后，几十万国民党大军在围攻得逞之后，势必再次“扫荡”，直至“剿灭”红军。当时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是：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的有主力红二十师（2 000余人），地方红军独立第三、第七、第十一团；江西、赣南、闽赣、福建等军区分别指挥的一



些独立团、营，共16 000余人<sup>①</sup>；连同政府机关、伤病员，共约3万人。看起来，留下的人数并不算少，但有枪的人少，多数战士只能持大刀、梭标为武器。1935年1月27日，项英在关于中央苏区情况给博古、朱德、周恩来的综合报告讲道：“独立师、团……平均梭标占二分之一”<sup>②</sup>，特别是老弱病残及两万多伤病员还需要别人来保护和照顾。用这些力量来应付50万国民党大军，简直是不可能的。谁留，谁不留，中共中央作了仔细的思索，最后决定的名单是：

留下的中央局委员有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五人。后来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增加了邓子恢、张鼎丞、谭振林、梁柏台、毛泽潭、汪金祥、李才莲七人为委员。

他们的分工是：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陈毅任中央办事处主任，贺昌任军区政治部主任，陈潭秋任组织部长，瞿秋白任宣传部长，李才莲任少共中央分局书记。

随后，中革军委在转移途中，于10月22日致电项英：“中央军区应从22日起即宣布成立”，项英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及闽浙赣五个军区（闽北分区在内）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与二十师和十军”。中革军委要求中央军区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迅速扩大地方武装，镇压反革命，同时前运粮弹，后运重伤病员。<sup>③</sup>

按中革军委指示，各部负责人是：第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政委杨英，辖第七十一、七十二团。江西军区司令员李赐凡，政委曾山，辖独立一、二、三、四团。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政委

① 《土地革命战争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411页。

② 《项英关于中央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35年1月27日。

③ 《中革军委关于成立中央军区发动群众开始游击战争的指示》，1934年10月22日。

钟循仁（后为阮啸仙），辖独立第六、十、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团、登贤独立团、赣粤边军分区（李乐天任司令员兼政委）、杨赣军分区（罗孟文任政委）。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政委钟循仁，辖独立第十七、十八团、瑞金军分区（司令员刘连标，政委杨世珠）、宁化军分区（政委温含珍）。福建军分区司令员龙腾云，政委万永诚，辖独立第十九、二十团、第三作战团（司令员兼政委朱森）。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方志敏，辖皖南军分区（司令员周成龙，政委柳真吾）、皖赣独立师（师长匡龙海，政委王丰庆）、第三十师（师长倪宝树，政委李伯钧）、皖南独立团。浙南挺进师，师长粟裕，政委刘英。闽北分区党委书记黄道，辖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政委黄道）、闽北独立师（师长黄立贵，政委卢文卿）。中央军区直辖独立第三、七、八、九、十一团。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军团长刘畴西，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辖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师。

当时赋予中央分局的任务是：牵制国民党军，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苏区和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使进占苏区的敌人不能顺利统治下去，准备在有利条件下配合红军主力反攻，恢复被国民党占领的城镇和地区。<sup>①</sup>

对于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决定，博古是在非常匆忙之中作出的。决定之后，既没有向领导干部说明情况，更没有向广大战士和群众作好动员。相反地，博古、李德以所谓军事上要保密，强调要等红军主力渡过赣东，进入白区以后，才准许宣布红军主力转移的消息。因此，红军主力为什么要转移？何日出动？将去何方？是否很快就会回来？红军主力走了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将怎么办？这些人人深切关注的问题谁也不知道，甚至项英、陈毅也被蒙在鼓里。

<sup>①</sup> 《土地革命战争纪事》，第411页。

陈毅是1934年8月28日在兴国战役中，坐骨中弹受伤，此后一直住在医院里。医院虽有X光机，却没有电源，拍不成片子，也就无法做手术。10月9日，陈毅的勤务员水生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立即命令警卫员跑步去告诉电台的值班人员：立即把充电机送到梅坑红军医院；又写了一张字条，叫水生交给院长，让他无论如何要争取时间，给陈毅做完手术。拖了40多天的手术终于做成了。

1934年10月10日傍晚，陈毅正在病房里与水生聊天。忽然，门“吱呀”一声被推开，全身戎装，留着一大把黑胡须的周恩来大步走了进来。

很久了，陈毅一直没有见到周恩来。今天突然见面，要说的话该有多少啊。但局势如此，陈毅的心情十分沉重，有话也不知从何说起，他的嘴唇歛动了几下，见周恩来眼里布满血丝，眼眶发黑，面庞消瘦，脸色憔悴，知道他操劳过度。

周恩来告诉陈毅：“红军主力就要走了。中央决定让项英和你们一些同志，留下来坚持斗争。要你留下来是因为你能打仗，懂军事，可以帮助项英。”<sup>①</sup>

周恩来是了解陈毅的。

1921年周恩来在法国巴黎时，就知道在四川来的勤工俭学学生中，有个叫陈毅的人。陈毅出生在1901年8月26日。这年，中国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1910年，10岁的陈毅就被卷进辛亥革命的漩涡。他剪去头上的辫子，随兄弟数人投身到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中。20岁时，陈毅赴法勤工俭学，在巴黎，他不仅悉心研读了《资本论》、《剩余价值论》、《反杜林论》等马列著作，还积极参加了进步的青年组织“工学世界社”，从此，陈毅走上了政治活动的道路。在1921年勤工俭学学生的“二·二八”

<sup>①</sup> 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斗争中，陈毅作为组织者之一，开始显示他的勇气和才能，而在反对北洋政府的借款斗争中，陈毅的如椽之笔更发挥了它的投枪作用。勤工俭学学生的斗争遭到法国政府的镇压，陈毅正因为在这些运动中表现突出，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

1927年8月，陈毅参加南昌起义，后来与朱德一起带领队伍开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陈毅任第十二师师长，后任军政部主任。之后，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与毛泽东、朱德等人一道，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期间，陈毅历任军长、军政委、江西军区司令、军团司令等职务，对创建、巩固、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巨大贡献。

陈毅明白周恩来说这话的全部涵义。他无比坚定，充满信心地回答：“请党放心！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只要我陈毅一息尚存，就一定坚持斗争，坚持到你们打回来，坚持到最后胜利！”

周恩来离开之后，陈毅不顾腿痛，奔到窗口，凝视着他最崇敬的老战友，无比激动地挥着手，直到他的身影完全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长征前夕，中央许多领导人是在梅坑话别的。

梅坑，在瑞金县城西南，是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所在地，中央“红星”纵队进行长征的出发点。

1934年10月上旬的一天傍晚，何叔衡因留下不走，在梅坑住地备了一壶水酒，外带一碟花生米，约请即将远征的老战友林伯渠为其饯别。两人促膝对酌，彻夜长谈。

林伯渠和何叔衡、董必武、徐特立、谢党哉并称“苏区五老”。林伯渠，名祖涵，湖南临澧人。他早年参加同盟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长，在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国民党“一

大”后，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和农民部长，北伐战争中担任第六军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7年林伯渠参加了南昌起义，并担任财政委员会主席。起义失败后，他化装潜入香港，从日本到达海参崴，与徐特立、何叔衡、叶剑英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来留在苏联远东边疆中国苏维埃党校任教。

1932年下半年，正当蒋介石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时，林伯渠断然放弃在苏联安定的教学生活，回国参战。他于1933年3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后又兼任财政部部长。这次他奉命长征，担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

何叔衡为中共创始人之一。1931年秋，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他根据党的指示，经香港、广东等地辗转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瑞金。时值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何叔衡被任命为中央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兼任内务部代理部长和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组织上考虑到何叔衡年及花甲，不堪远征之劳，把他留了下来。

何、林两人一个是弄政法的，一个是搞财经的。两人在叶坪、沙洲坝共事期间，亲密无间，情同手足。长征前夕，两位老同志一去一留，今后能否再见都难说，相见之下，心绪格外沉重、惆怅。

没料到，两人在梅坑聚首竟成诀别。1935年2月，何叔衡随同瞿秋白、邓子恢一行从瑞金梅坑出发，转移至闽西上杭县水口镇附近的小径村时，不幸被地主武装“民团”包围，何叔衡突围负伤后，为了不拖累同志，纵身跳崖，壮烈牺牲，实现了他生前“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谢觉哉后来赋诗赞叹曰：

叔衡才调质且华，独辟溪径无纤瑕。  
临危一剑不返顾，衣冠何日葬梅花。

……

1934年10月12日那天，阴霾满空，炮声隆隆，红军主力部队的战士们即将离开老根据地了，他们是多么依依不舍啊！在这里他们整整战斗了六个春秋。六年，在时间的长河里不过短暂的一瞬，但对红军来说，却是多么不平凡呀。他们忘不了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在这里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烈士们，忘不了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项英和博古、洛甫（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领导人话别时，心情是异常激动而沉重的。他是多么想和他们一起出征啊！可是，党中央已决定他留下坚持斗争，他只能坚决地服从，并表示：一定和中央分局的同志一起，领导中央苏区军民，为保卫苏维埃事业而奋斗到底。

面对扶老携幼前来送行的人们，红军将士们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眼含热泪，挥手告别。他们想要说些什么，但声音早已哽咽了：请回吧，亲爱的乡亲们，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队伍缓缓地出发了，战士们眼里滚动着泪珠，纷纷挥手向父老兄弟姐妹们告别，向老根据地告别。人们又一次涌过来，依依不舍，泣不成声……

陈毅在水生搀扶下，走到村口，靠在一棵几人抱不拢的樟树上，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忧虑地望着红军渐渐消逝的背影。

秋风拂过，树枝猛烈地摇曳，墨绿的樟树叶子发出“哗哗”的声响，仿佛在说：“刮吧——风啊，我已经经历了数不尽的寒冬酷暑，无论萧瑟的秋风，还是凛冽的朔风，都不能把我摧毁，我总是这样浓郁长青。风啊——你刮吧，刮吧，我自岿然不动。”

陈毅举目遥望，耳边传来群山松涛的吼声……

## 二 转 折

### 蒋介石被迷惑了

10月的江西，正是秋高气爽桂子飘香的季节，赣南的红土地上却弥漫着悲壮凝重的气氛。

党中央离开瑞金后，留下中央苏区这个残局就由项英、陈毅等来收拾了。

10月13日，项英同陈毅、陈潭秋、贺昌、瞿秋白等就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等问题，分别作了交谈。

14日上午，项英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分局第一次会议。陈毅被用担架抬进会场。陈潭秋、贺昌、瞿秋白等均出席，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各部门留在苏区的主要负责人也列席了会议。

会上，项英传达了党中央、中革军委赋予中央分局的任务和各项要求，正式宣布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成立。

项英讲道：“同志们，党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能否胜利地进行战略转移，关系到现时全党、全国革命人民最根本的利益。我们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和党政干部，一定要认清这个革命大局，开展积极的行动，掩护、策应党中央和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

“我们作为共产党员，作为革命军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命令，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是我们必须遵循的组织原则和行动准则。因此，我们首先要考虑怎样做好对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转移的掩护工作。”

项英最后讲道：“同志们，失败是暂时的，只要主力红军在湘西打几个胜仗，建立了新苏区，势必要吸引更多的敌人过去。那时主力红军跳到外线，回过头来作战，我们里应外合，肯定能粉碎敌人的进攻，恢复失去的苏区。”

项英的讲话,表明了他坚定的组织观念和对党的赤胆忠心,但也看出他对整个斗争形势的严重性是估计不足的。陈毅却有不同看法,想反驳项英这种对形势过于乐观的估计,鉴于党中央赋予中央分局的临时任务,他决定还是等主力红军走出困境再与项英详谈。

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留守红军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执行掩护、策应任务:

第一,阻击骚扰敌人,迟滞敌人的进攻。10月中旬,主力红军在向赣南集结时,独立第七团在石城、头陂地区骚扰敌人,阻击敌罗卓英、樊松甫两个纵队向头陂集中,当罗卓英、樊松甫两个纵队向宁都地区筑垒前进时,独立第七、第一团积极开展游击战,破坏敌人的筑垒,迟滞敌人的进攻。独立第十一团在石城以南地区开展游击战,阻击敌人。

10月21日,主力红军在龙布——韩坊一带全线出击,迫使粤军余汉谋纵队从重石、版石、新田、古陂、韩坊向安远、信丰、南康撤退。当主力红军乘胜追击时,赣南军区独立第十四团进占韩坊、古陂,独立第十五团和独立第六团进占安远城,第一大队与江西独立营进至重石、版石和龙布一带,保卫队和独立第六团一个营进至新田地区,恢复苏维埃政权。同时,大田游击队到信丰河西岸破坏敌人堡垒,长洛游击队到大埠圩东岸长演坝一带打游击。

11月初,粤军余汉谋纵队在南雄、大余、横江、铅厂等地域追击主力红军,这时,赣南军区独立第六团和独立第十四团便乘虚深入到安远、信丰、南康地区,开展游击活动,骚扰敌人。红二十四师则在汀州以南河田地区积极活动,迟滞国民党军李延年纵队前进。

第二,保守红军转移的秘密,封锁消息,制造假象迷惑敌人,隐蔽红军主力出征的战略意图。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之前,中



央政府的全套机构仍保持原来的样子，各部门的留守人员照常办公，接待来访群众，处理正常的公务。这样迷惑敌人的时间愈长，对党中央和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则愈有利。

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由于它原来每周都要和人民群众见面两三次，现在能否和大家照常见面，是一件关系保密的大事。项英和分局宣传部长、《红色中华》报编委会主任瞿秋白作了研究，确定利用各单位的来稿，继续出版，报头、印刷跟以前一样。为了引人注目，还在报头上标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sup>①</sup>以此来告诉人们，共产党和红军仍在苏区。这样做，对内可以安定军心、民心，对外可以迷惑敌人。

蒋介石以为主力红军仍在中央苏区，继续大筑碉堡，命部队徐徐推进。

47年之后，当时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的谭震林回忆说：“南方游击战，在红军长征之初，牵制了蒋介石的兵力，使我主力部队得以大踏步地前进……”<sup>②</sup>情况确实如此。

北路国民党军至10月底，才确知红一方面军已突围西进；东路国民党军到11月上旬，还以为中共中央和政府机关仍在赣南；国民党《中央日报》11月3日刊登消息，说原在瑞金的中共中央机关已“迁往于都”；蒋介石直到11月中旬，才弄清红一方面军主力西移的战略意图。

蒋介石气急败坏地命令部队不要再“步步为营”，而要长驱直入了。

10月26日，国民党军占领苏区重镇宁都。

11月10日，国民党军占领红都瑞金。

<sup>①</sup> 《中共党史资料》第19辑，第243页。

<sup>②</sup> 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第2页。

11月17日，国民党军攻占于都。

11月23日，国民党军攻占会昌。

中央苏区的全部县城沦入敌手。

国民党部队一下子几乎占领了整个中央苏区。

一向把共产党视为心腹之患的蒋介石，这一下可得逞了。他在中国的北方开门揖盗，把大片山河拱手送给日本人，对南方的共产党、红军将士和工农革命群众却咬牙切齿，发誓要斩尽杀绝。

蒋介石在南北将领会议上叫嚷：要“掘地三尺”、“斩草除根”，决不让苏维埃政权“死灰复燃。”<sup>①</sup>

1934年的初冬，寒风格外凛冽。

11月下旬，以顾祝同为主任的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成立，下辖八个绥靖区；另有陈诚的驻赣预备军总指挥部；加上本地的豪绅地主反动武装，共同对中央苏区实行“整治”。

如同豺狼虎豹般的国民党军队杀红了眼睛，在“大乱三天，大杀三年”，“屋换石头人换种，笞帚也要过三斩”的口号下，所到之处，不尽男女老少，只要“有可疑的就杀掉”，上至八旬老翁，下至三岁孩童皆不能幸免。杀人手段骇入听闻，如刀割、火烧、烟熏、活埋、挖眼、剖腹、分尸、千斤吊、单边吊、灌辣椒水、向钉板床、零刺碎尸、沉潭落井、铁丝穿手心、烧红铁通肛门等数十种酷刑，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反动派开始时杀人以人头计数、报功，后来杀人太多，就以耳朵计数、报功。赣南人民的罪魁黄镇中率部残杀数万人。在反动派的血腥屠刀下，许多地方全被杀绝，全村被杀光，原来充满生机的中央苏区，顿时血流成河，腥风飘荡。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中央苏区有80万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蒋介石在其“剿匪报告”中不得不供认“剿匪之地，百物荡尽，一望荒凉；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

<sup>①</sup> 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第3页。

留之壮丁，阡陌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

### 陈 项 论 战

中央苏区隐没在云幢雾幔中。天气，也是如此地变幻无常，一会秋雨迷茫，一会雨过天晴；刚才还阴云密布，转眼太阳破云而出。

中央分局机关驻在瑞金西边的西江，四周是连绵的广阔山区，小河如练横穿而过，云雾终年覆盖，山中灌木郁郁葱葱，是个便于隐蔽的好地方。

主力红军西征后，项英派担架把陈毅抬到西江住下，劝他安心养伤；又派最好的医生、护士给他治疗，需要什么药，只要搞得到，就叫人千方百计去搞。项英每天几次到陈毅屋里来看望，有时还亲自端来饭菜，看着陈毅一口一口地吃下。

在前往西江的路上，陈毅曾看到红军和老倭们在挖战壕、筑土堡垒，陈毅莫名其妙。原来这是项英决定坚守铜钵山区根据地，准备与国民党军决一死战。陈毅简直气昏了，差点大喊一声：“你们还没有吃够第五次反‘围剿’的苦吗？”

唉，跟红军喊又有什么用呢？关键是项英脑于里的问题没有解决。项英一直把希望寄托在想象中的红军主力大捷上。

项英原名项德隆，又作德龙、飞龙，化名江钧、张成、韩应、江俊，笔名夏英，1898年5月出生于河北省武昌县一个职员家庭里。

项德隆的祖籍是武昌县舒安乡项家村。祖父因会种花、植盆景，就由乡下搬到武昌城涵三宫落户，以种花卖花为生，当地人称他家是“项家花园”。父亲项天卫是县里管理钱粮簿册的职员，为人忠厚老实。母亲夏氏善良贤惠。项德隆有二兄一妹，自己排行老三。

项德隆7岁那年，开始进入武昌育才小学读书。他聪明伶俐，学习刻苦，作业认真，还很注意练习小楷毛笔字。几年后，当他

看到父亲忙得不可开交时，就经常利用课外和晚上时间，帮助父亲誊抄钱粮簿册。这一来，既减轻了父亲的劳动负担，又练就了一手漂亮的行书字。从幼时的劳动实践中，项德隆养成了办事认真仔细、一丝不苟的性格。

1921年11月，在武昌城模范大工厂（纺织厂）当工人的项德隆从《劳动周刊》上知道了包惠僧的名字，并与他取得联系。

初次交往，包惠僧就对项德隆产生了好感，认为他很不平凡，有思想，有抱负，特别对工人运动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包惠僧非常高兴，决定派他主管筹备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sup>①</sup>

江岸位于长江北岸，是京汉铁路南段一个大的铁路地区，有车站、机务段、车辆厂、修理厂、材料厂等单位，和长辛店、郑州一样同为总段。这里居住着3000多名工人，他们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残酷压迫、剥削甚为不满。因此，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确定把建立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作为当时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一个重点来抓。

1921年12月，项德隆离开模范大工厂，前往江岸龙王庙，担当起筹建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的重任。从此，他开始了职业工人运动的生涯。

1922年4月，中共武汉党组织召开会议，讨论项德隆入党的问题，由他本人汇报了自己的家世和对党的认识，入党介绍人包惠僧着重介绍了他参加革命后的主要表现。经过讨论，组织上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次会议后，项德隆更是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好久也没有回家去看一看。包惠僧三番五次地催他回家去看望母亲。而他却说：“我在家时，是母亲照顾我，我没有照顾她老人家，她很健康，她能生产自给，不需要我赡养，我出来了，

<sup>①</sup>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5页。

她还省些事，我也忙，所以没有回家看看。”项德隆就是这样一个人，只顾革命工作而不顾家、不顾个人的人。

一次，江岸车辆厂工人黄宝成乘上下班的交通车回家时，被总查票程炎、巡长姜道生等打得遍体鳞伤，然后关进大智门车站警务段。程某人还扬言：“什么俱乐部，我姓程的不吃那一套，老子打了、押了，看你俱乐部能把我怎么样?!”这是蓄意向工人俱乐部挑起事端，气焰嚣张。黄宝成的妻子跑到江岸工人俱乐部找到项德隆，哭诉了事情的经过。

项德隆一听，气愤异常，立即和俱乐部几个干事商量对策。他认为，程炎、姜道生殴打关押黄宝成一事，是关系到工人俱乐部能否存在下去的政治事件，必须坚决斗争。一来可以打击资本家狗腿子的嚣张气焰，教训那些敌视工人俱乐部的家伙；二来能提高工人的觉悟和地位，为工人俱乐部撑腰。项德隆的主张，得到俱乐部骨干和工人群众的坚决支持。

项德隆连夜起草了《京汉铁路南段工人俱乐部宣言》，揭露程炎等人无理殴打和关押工人的罪行，向当局提出查办凶手、赔偿损失、鸣放鞭炮赔礼道歉等合理要求，表示：“倘或不能达到目的，我们誓不罢休，即全体停止工作，牺牲一切，和程、姜拼个死活，也在所不惜。”

第二天上午，工人俱乐部《宣言》在武汉三镇广为散发，并寄往各铁路工会。与此同时，工人俱乐部积极组织进行罢工的准备。

工人们团结战斗的决心，使江岸车辆厂法国厂长杜拉克大为吃惊，他害怕事态扩大，急忙打电话给京汉铁路南段局长冯沅，要他马上解决。冯沅当即责成车务处长汪奎龙，答应工人俱乐部提出的全部条件。

项德隆在江岸铁路工人俱乐部门前召开欢庆大会，有数百名工人兴高采烈地来到会场。会上，汪奎龙郑重其事地向工人们赔

礼道歉，连连鞠躬作揖，表示答应工人俱乐部提出的全部条件。一向为非作歹的“活阎王”程炎和姜道生，也不得不低头认罪。

这次反击程炎、姜道生的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工人俱乐部声誉赫起。工友们个个喜笑颜开，第一次感受到组织起来的力量。工人们激动地说：“俱乐部是我们工人的家，我们工人的靠山，今后谁再敢欺负我们，就要像对活阎王一样来对待他。”

不久，江岸工人俱乐部正式改为江岸铁路工会，项德隆为书记。

那时，项德隆经常化名“夏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工人运动，入党后便把化名与本名合起来为项英。从那时起直到他牺牲时止，都叫项英这个名字。

项英长期在白色恐怖情况下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为工人的翻身解放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他参与领导了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5年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二月罢工和1927年初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被誉为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

在中央苏区，项英以极大的精力从事苏维埃政权建设，做了大量工作。

1934年10月间，项英临危受命，和陈毅等留守中央苏区。项英后来回忆说：

“1934年决定把主力从江西撤出，毛泽东和朱德到西部去了，留下我在江西统帅党和军队。”

可是，开始时项英对整个斗争形势的严重性是估计不足的，同时也为中央赋予的“保卫中央苏区”的任务以及坚守“三角地区”，保守秘密等规定所束缚，对独立自主地坚持斗争考虑不够，没有及时转变斗争形式。

主力红军走后，项英认为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并非不利，未被敌人占领的连成一片的苏区还有25 000至30 000平方公里，另外一些是被敌人或多或少截断的还存在苏维埃地方政权的“岛

屿”。把这些地区都算在内，留下的居民仍有二三百万人。因此，“项英并不气馁”，而且“显得非常乐观”。

项英受博古、李德思想的影响的确太深了。对此，陈毅心急如焚，下决心找个机会同项英好好谈谈。

一天，项英给陈毅送来一碗荷包蛋。陈毅皱皱眉头：

“伙夫搞什么鬼？同志们生活那么艰苦，为什么……”

项英打断他的话，一本正经地解释：

“是我叫做的。老陈，吃好一些、多吃一些，养好伤，我们还要大干一番咧。”

陈毅一听“还要大干一番”，心里一急，禁不住粗声大气地说：

“同志，你睁开眼睛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什么形势！”

形势的确相当严重：参加五次“围剿”的国民党军，除薛岳、周浑元两纵队向西尾追外，仍有十几万屯驻苏区各地。樊嵩甫、李延年两纵队正从北面和东面向根据地心脏地带压缩，企图把红军包围在狭小地区内，来个“瓮中捉鳖”，然后再空出手来，分区“清剿”地方革命武装。

陈毅深吸了口气，说道：“主力红军如果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实行外线作战，打胜仗并不是不可能的。前几次反‘围剿’战役，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就连续取得了胜利，发展了苏区，壮大了红军。但是，现在形势变了，第五次反‘围剿’由于指导思想是单纯防御的，结果遭到了失败。特别是这次转移，更是一种搬家式的逃跑行动，坛坛罐罐什么都带，丧失了军队的机动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如果不彻底改变领导，要打胜仗是很困难的，也不可能建立新苏区，反攻更是不可能的。”

陈毅把问题说得这么尖锐、严重，项英真有些接受不了，反而说他“情绪不好，悲观失望”<sup>①</sup>。

① 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第3页。

陈毅提醒项英说：“蒋介石的兵力大大超过我们，他用一部分兵力去追堵主力红军，而以另一部分兵力留在这儿专门对付我们。我们不能依赖主力红军，应当独立自主，作坚持斗争的打算。”陈毅提出要迅速把干部和部队分散，开展广泛灵活的游击战争。他说：“红军二十四师和游击队应立即分散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各个县去，作为游击战争的骨干。这样可以保存一批相当可观的力量。高级干部如瞿秋白、陈正人、周以栗等有病，还有一些不能走的知名人士，最好让他们穿上便衣，到白区去隐蔽起来。坚持打游击，他们是吃不消的。”

但项英热衷于大兵团作战，他要“创造新的师、新的军团”，把地方的许多游击队改编为独立团，将那些勉强出院的伤病员，都用来充实红军第二十四师，要同敌人打硬仗。他说：“我们有主力第二十四师，再加上七个团，这十个团可以消灭敌人一个师。”

陈毅不赞成这种作法，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请不要忘记，正是这种死打硬拼的战术，把中央革命根据地搞垮的。”

项英仍不以为然。项英是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重大问题必须由他决定。他没有及时采纳陈毅的意见，在转折的紧要关头，竟然错过改变局面的时机。那时国民党的军队，因为在历次反“围剿”战争中吃过苦头，被红军打怕了，所以在第五次“围剿”中特别谨慎。现在红军撤了，他们一时也还摸不清虚实，不敢贸然急进。他们对红军主力的转移，曾作过种种判断，耽心是共产党设下的圈套。因此，北路敌人仍然用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垒战法，步步为营，小心翼翼地试探前进；而南路敌人则已撤回广东自保。这个时机有利于红军实行分散打游击的转变。

这个时机被错过了。

特别遗憾的是，项英受中央“左”倾领导者的影响，强调军事上保密，没有及时对干部和群众进行宣传解释，作好政治动员，



使许多人盲目乐观，天真地以为红军不久就会带着俘虏和缴获的武器凯旋归来。

“工农剧社”的演员照常演出，歌唱“胜利的号炮”，群众冒雨观看节目，真是一派“升平景象”！

不出陈毅所料，本来就严峻的形势，一天比一天地紧张起来了……

### “伸着脑袋往老虎口里送”

1934年11月21日，国民党进攻会昌。

这天，侦察员喘着大气跑来，报告项英说，国民党东路军侵占瑞金后，气焰十分嚣张，扬言要在几天内拿下会昌，宣布他们的“全面胜利”。其第三师现在正沿着绵水，顺着大路向会昌进犯。

项英为了“兴奋中央革命根据地群众，提高他们的信心”，<sup>①</sup>决定打一个大仗。

陈毅劝阻说：“敌人正找不到我们的部队，你要大打，岂不正合敌人口味。这就叫伸着脑袋往老虎口里送。”

项英踌躇满志，哪里听得进。他命令红二十四师和瑞金独立营马上出发，埋伏在谢坊的湾塘冈伏击敌人；命令会昌、寻乌游击队在正面牵制敌左翼部队。

红二十四师和瑞金独立营的指战员连奔带跑，抢在敌人前面进入阵地，埋伏在大路边的丛林、山石后面。

敌第三师大摇大摆地走过来，松松垮垮，不成队形。

项英一声令下，红军战士们早就憋着一肚子气，立刻射出了仇恨的子弹。

敌人没有防备，顿时乱作一团。

经过一个多小时激烈战斗，处于红军交叉火力下的敌人终于

---

① 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第6页。

顶不住了，狼狈溃逃。

项英高兴地连连说道：“大兵团作战就是解决问题！”一些红军战士也大叫：“过瘾！过瘾！”

谢坊一仗歼敌半个旅，但也削弱了红军自己的力量，尤其是暴露了留守根据地的主力——红二十四师的目标，这是最失策的。

国民党军吃了大败仗，却是又惊又喜。惊的是本以为红军主力全部都向西突围走了，没想到还真留下不少，而且武器装备这么好；喜的是终于发现了红军的踪影，正可以集中力量，一举“剿”灭。

于是，国民党军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调集四个师兵力，紧紧跟踪红二十四师，此后红二十四师怎么也甩不掉这只尾巴，非常被动。国民党军还加紧构筑堡垒封锁线，将苏区分割成无数小块，使留下的各地党政机关和红军部队被一一围攻，受到很大损失。

不久，项英得到消息，江西军区独立团在东固被敌人打败，军区司令员和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都被敌人捉住杀了头；曾山带领的二团和十四团会合后，与中央分局失去了联系；坚持在安远、信丰的红军部队在粤军打击下，退到于都南部同赣南省委会合，仍未脱险，接二连三吃败仗。

于都以北的红军部队败逃一尽，换来的到处是白军。

为了缓和敌军攻势，1934年11月7日，以陈毅、梁伯台名义签署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布告》（第一号），广为张贴散发。

白军士兵弟兄，多是工农出身。  
受了军阀压迫，才来进攻红军。  
三年离乡背井，永别儿女双亲。  
残杀自己弟兄，究竟为谁牺牲。

修筑马路堡垒，天天辛苦不停。  
于饭两顿不饱，军餉克扣干净。  
于今天寒地冻，棉衣还没上身。  
受尽官长打骂，当作牛马畜牲。  
可恨国民狗党，代表资本豪绅。  
出卖满州华北，半个中国送尽。  
高叫无力抗日，屠杀革命人民，  
不管中国灭亡，围攻苏区红军。  
我苏维埃政府，工农自己政权。  
工人增加工资，八时工作一天。  
打倒豪绅地主，农民分地分田。  
实行反帝抗日，大队已经先遣。  
野战红军出动，决要对日作战。  
白军士兵弟兄，莫听军阀欺骗。  
切勿烧杀抢掠，你我本无冤仇。  
协同群众游击，大家打成一片。  
杀死反动官长，加入红军作战。  
实现自由解放，革命反日分田。  
工农兵大团结，胜利就在眼前。

中央曾作过决定，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消息必须等主力渡过赣江到达大余之后才能宣布。中央政府办事处的这张“布告”，第一次宣告红军已经远征，远征的目的是“实行反帝抗日”，这在根据地和敌军营垒中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12月1日，中央政府办事处发布了第三号布告，要求中央革命根据地人民继续使用红军钞票，以稳定市场贸易和人民正常生活。

12月20日，中央政府办事处发布击杀叛徒的《紧急命令》：

“革命叛徒是万恶的帝国主义、国民党最忠实的走狗，是我工农阶级的死敌，应以坚决手段来击杀这些叛徒，这是目前战胜敌人，保卫苏区最主要的条件。”

《紧急命令》规定：凡属革命叛徒和反动分子，“概处死刑”、“没收其财产”。对于“因受敌人欺骗走入敌方，甚至被迫加入民团等反动组织，只要不积极帮助白军团匪等进攻苏区，不参加反革命工作，一概不加追究，欢迎回来革命”；被敌人包围截断不能走出的群众，“只要不帮助白军团匪工作，均仍然为自由的苏维埃公民”；“苏区群众往白区做生意或做工等，应经乡苏（区）报告转苏区（区苏）审查批准。”

《紧急命令》政策界线分明，对稳定民心士气有一定效果。

但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员的陈毅，此时关心更多的是军事战略和战术。当时红军能控制的，只是被敌分割的若干村庄、山岭，几十万敌军时时刻刻在找寻一切可能打击的目标。

面对强大的敌军，陈毅认为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是失败者。承认失败才能找到挽救失败的方法，在新的形势下开展新的斗争。

谢坊战斗后敌人的加紧追剿，对项英的思想是一个触动，他开始战略上有所转变，并派出一批得力干部去各地加强领导。其中：派中央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兼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回闽西地区加强领导。张鼎丞偕同范乐春、刘永生、陈茂辉等，随即从瑞金赶赴闽西。

调闽赣省委书记赖昌祚到瑞（金）西地区组织中共瑞金特委，并任书记。调赣南省委书记钟循仁到闽赣省委任书记。调原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阮啸仙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派原中央政府土地部部长胡海回吉安东固地区，组织中共公（略）万（安）兴（国）特委，并任书记。派少共分局干部李鹤鸣到胜利县（后转到公略县），参与领导当地的斗争。派中共赣南省委组织部长罗孟文

到杨赣特委，任书记兼杨赣军分区政委。

为加强赣粤边地区斗争的领导，建立中共信（信丰）康（南康）赣（赣县）雄（南雄）特委和军分区，并调一个营的红军开赴赣粤边，开展游击战争。该特委和军分区于12月初在于都县的小溪正式成立，由原在赣粤边坚持斗争的李乐天任特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调赣南省委宣传部长杨尚奎任特委副书记。

这批领导干部在出发前，项英同他们分别谈了话，说明形势的严重性，要求他们和各地的干部一起，紧紧依靠群众，武装群众，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和反动派作坚决斗争。

然而，这种转变只是局部的，项英一时还不能完全接受陈毅的正确意见。直到1935年1月，项英还继续组织五个团的兵力去攻打敌四个营固守的据点，结果再次遭受严重损失。

1935年1月，国民党军罗卓英纵队主力和第八师窜到于都、会昌，从东面、南面向红军“最后坚持的阵地”——中央分局所在的铜钵山区西江、宽田、公馆一带发动进攻。

罗卓英，字尤青，别号慈威，1896年生于广东省大埔县。自幼喜史地、擅诗文，投笔从戎，并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炮科毕业。1924年罗卓英参加广东革命军，任第一师炮兵连连长。

在五次“围剿”中，罗卓英作为陈诚“土木系”的主将，领兵打仗，极为卖力，虽然多次败北，但蒋介石没有怪罪他，仍委以重任，并把日后除“心腹之患”的重任交付于他。红军长征后，他担任驻赣绥靖预备军军长，代陈诚率领预备兵团、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和第十八军，对留下来的红军及苏区人民进行疯狂屠杀。

罗卓英宣称：“彼等虽属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对红军怀有不共戴天之仇，立志“斩草除根”。

项英下决心保卫铜钵山根据地，命令二十四师到赣南省，配合独立三团、十一团打击敌人，以保持赣南省和会昌河两岸的

联系。

二十四师到达牛岭时，敌人两个营刚刚离开此地，才走出10多里。师长周建屏一时兴起，命令独立三团跟踪追击敌人，想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再来一个“谢坊大捷”。

独立三团奉命急追，大步奔跑，距离敌人越来越近。敌人发觉后面有追兵，见前面有个村子，立刻跑步钻进去，埋伏起来。

红军战士们刚刚气喘吁吁地接近村边，忽然，敌人轻、重机枪一齐开火，端着枪从隐蔽处冲出来，杀伤一大批红军战士，将独立团的队伍冲散。敌人继续猛冲，正在懵头懵脑向前追赶的二十四师，猝不及防，一下子被冲散了，师长周建屏负伤。杨英政委急忙收集部队，组织抵抗，好不容易才稳住阵脚，将敌军打退。

这一仗，红军五个团主力部队竟被敌人不足一个团兵力打垮了，师长负伤，伤亡五六百人。这是主力红军离开苏区之后空前未有的败仗，所谓“最后坚持的阵地”也失守了。<sup>①</sup>

形势更加严峻了。

牛岭战斗后，国民党军队气焰愈发嚣张。北面敌军萧乾部第十一师、驻瑞金会昌一带的冷欣部第四师以及王仲廉的第八十九师等直逼瑞西县。形势急剧恶化，连分散游击也已经来不及了。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及赣南省委、省军区、红二十四师等机关、部队，均被包围在于都县南部的禾丰地区。

面对严酷的现实，中央分局于1935年1月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今后的行动方针。会议由陈潭秋主持，陈毅作中心发言，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用不着争辩了，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打游击去。”

陈毅的意见得到陈潭秋、贺昌以及出席扩大会议的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袁血卒等人的支持。陈潭秋问瞿秋白有没有意见，瞿

<sup>①</sup> 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第7页。

秋白对陈毅的发言也表示支持。

接二连三的失利之后，项英意识到把希望寄托在红军主力回师已经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经过反复考虑，他也同意了陈毅的意见，并委托陈毅根据开展游击战争的精神，起草一个文件下发。

陈毅在文件中进一步提出了两个主张：一个主张“是要分散。中央苏区会有大风暴，要度过这个风暴，必须要小组式的分散。敌人说我们‘散匪’，我们就是要散。”另一个主张是夺取敌人组织起来的所谓“自首大队”的领导权。敌人进入根据地不久，他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把情况搞清楚，“我们派人去当个大队长，把‘自首大队’领导起来。”<sup>①</sup>

陈毅认为只要做到这两条，红军就一定能坚持下来。

然而，这些正确意见，特别是依靠崇山峻岭坚持游击战争的指示，已经难于传达下去了。

敌人的严密封锁使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与各省、县隔断了联系，唯有靠近于都宽田的瑞西县委接到并贯彻了这一指示，成立了一支以钟得胜为队长的游击队。

陈毅亲自找了钟得胜谈话，耐心地分析了当前所处的困难形势和分局采取的斗争方式。陈毅反复强调说：“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大山头搞小组织，分散打埋伏。但无论如何不要脱离武装，不要离开大山大岭。”

钟得胜接受陈毅和中央分局指示，带了一支游击队，在最艰难的岁月里长期活跃在闽赣边的大山岭中。

为了确定行动方针，以保存有生力量，1935年2月初，中央分局在于都黄龙的并塘村连续召开会议。

会上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集中基干部队向西突围，转

---

<sup>①</sup> 陈毅《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见《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页。

到河西井冈山一带另图发展；另一种意见是背靠于南向南发展。

向西不符合中央意图，且粤敌封锁了两道河流（信丰河、大余河），此时北面东面都有强敌，并筑有严密的堡垒封锁线，穿插很成问题。

两种意见不能统一，项英犹豫不决，拿不出妥善办法，主张请示中央。2月4日、5日，中央分局连续向中央发报，一面报告中央分局的意见分歧，一面请中央和军委立即答复中央苏区斗争的行动方针。电文如下：

中央：

（一）根据目前形势确定我们的行动方针，我们两个意见：

（1）保持有生力量，留少数部队及人员继续在中区活动，大部集中过东河。但目前情况能否过了，尚成问题。

（2）部队以团为单位分散，主要方向如湘赣、饶和浦、闽赣。分局随部队行动，继续在中区领导斗争。

（二）对各个苏区的领导，以后成大问题，如何解决。以上请立复。迟则情况太紧张，则愈难。

分局 五日<sup>①</sup>

同时，项英以个人名义向中革军委发电请示：“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是坚持现地，还是转移方向，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如何，均应早定。”“请中央及军委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sup>②</sup>

就在项英焦急万分，举棋不定之时，党的遵义会议召开了。

<sup>①</sup> 《中共党史资料》第22辑，第11页。

<sup>②</sup> 《中共党史资料》第22辑，第10页。



### 中央二月来电

历史记录了解红军长征的时刻表。自从1934年12月12日通道转兵之后，红军如同长了“飞毛腿”，前进的速度是惊人的：

12月15日，攻占黎平。

12月30日，进入乌江南岸猴场。

1月3日，飞渡乌江。

1月7日凌晨，攻下遵义。

这下子，把蒋介石的几十万“追剿”部队远远地甩在乌江以南、以东地区，唯一进展较快的薛岳所部“中央军”，忙着抢占贵阳去了。驻守黔北的贵州地方部队“双枪兵”，根本不是红军的对手，闻风丧胆，一触即溃。这样，红军进入遵义后，终于有了喘一口气的机会。

本来，在黎平会议上，就已经决定“相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机会终于到来了。在遵义，有了半个多月相对安定的日子，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供了条件。

遵义，贵州的第二大城市，黔北的中心。当年的遵义不过三四万人，在穷乡僻壤的贵州已算是很繁华的了。遵义是座古城，唐代设有遵义县，明代设遵义府。那时候，遵义属四川省，直至清朝才属贵州。遵义的城墙是用红砂石砌成的，并不高，倒是几座城门楼台飞牙出檐，看上去有点气派。

1月9日下午，红军分批入城。在“红军之友社”的组织、鼓动下，遵义城里许多青年学生、老百姓涌向南门关，站在丰乐桥头夹道欢迎中央纵队进城。丰乐城是进入南门关后的第一座横跨湘江的石拱桥，建于清朝咸丰五年，桥头有“接官亭”，向来是迎送贵宾之处。如今桥头响起了锣鼓声、鞭炮声。群众振臂高呼：“欢迎红军！”“欢迎共产党！”

毛泽东未进遵义城之前，跟中央保卫局局长邓发打过招呼，他

要跟张闻天、王稼祥住在一起。邓发遵命，把张、王、毛安排在易宅楼上，而楼下则住着他们三人的随行人员——秘书、警卫员、卫生员、炊事员。

长征开始之后，李德就发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常在一起，先是称他们“三人核心”，后来干脆攻击他们是“新的三人团”、“地下三人团”。此时，毛泽东完全不必置理李德的风言风语，跟张、王同住一楼，以便于共商大事——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清算博古、李德的军事教条主义。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是1921年中共一大以来最为重要的一次会议，它成为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开幕了，此后，红军又成了“朱毛红军”。遵义会议后，新的中央对中央苏区的斗争极为关注。

收到项英的电报以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立即讨论了中央苏区的问题，并于2月5日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发来了“万万火急”的电报。全文如下：

（万万火急）项转中央分局：

政治局及军委讨论了中区的问题，认为：

（甲）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斗争的前途是有利的。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

（乙）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

（丙）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军事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先

此电达。决议详情续告。

中央书记处

1935年2月5日<sup>①</sup>

1935年2月13日，中央又给中央分局发来了“万万火急”的指示电，即《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游击战争致中央分局电》，指出：

“放在你们及中央区全党面前的任务是坚持游击战争，是动员广大群众同游击战争坚韧地、顽强地反对敌人的堡垒主义与‘清剿’政策。应该承认中区目前环境的严重性，但应该认识中区的斗争对于全国仍然有极大的意义。”

“必须首先把这一斗争胜利前途的坚信放在你们及全体同志心目中，并向广大群众解释明白。”

中央分局必须“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提出“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并具体指导七点：

（一）一连人左右的游击队，应是基干队的普通方式，这种基干队在中区及其附近，应有数十百支，较大地区设置精干的独立营，仅在几个更好的地区设置更精干的独立团。依此部署之后，把那些多余的独立团营，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的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结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短小精干是目前的原则，同时普遍发展群众的游击组，把多余弹药分配给群众，最好的干部到游击队去。

（二）游击队应紧密的联系群众，为群众切身利益斗争，给养依靠群众及部队自己解决。

（三）在边境及敌后有计划的部署游击战争。上犹、崇义、南山、北（山）、油山、兴、龙、饶、埔、和（指广东省的兴宁县、龙川县、饶平县、大埔县和福建省的平和县）等处要加派精干部

<sup>①</sup> 《中央书记处致项英转中央分局电》，见《中共党史资料》第22辑，第12页。

队及好的领导人去，在这些地方开展游击战争，将给中区的斗争以极大的帮助。湘南游击区也应由你们去加强它。但不应以庞大部队远出，而应以相当部队依傍着中区配合发展。依野战军及红十军的经验，如你们以大部队远出，是没有胜利保障的。

（四）彻底改变斗争方式，一般都应由苏区方式转变为游击区的方式。要加强秘密工作，使与游击战争联系起来，占领地区，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蛮打硬干，过分损伤自己是错误的，分兵抵御是没有结果的。突出运动和勉强使用纸币目前都不适宜了。

（五）极大的给以地方党及游击部队以独立领导权，并培养他们这种能力，即使长期隔断，也要能独立存在。庞大的机关立即缩小或取消，负责人随游击队行动，得力干部分配到地方去。分局手里应有一独立团，利用蒋粤结合部，在赣南、闽西一带转动，最忌胶着一地，地方领导机关亦然。

（六）确切地进行瓦解白军工作，把这工作放在支部及游击队工作的头等重要地位。

（七）选派许多适宜的干部到白区去，汕头、厦门、香港、上海及其他地方的工作，你们都应该设法去建立。<sup>①</sup>

这就是著名的中央“二月来电”。

项英、陈毅多日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

2月17日，项英、陈毅主持召开中央分局紧急会议。项英在会上强调：事到如今，只有突围，冲杀出去，才有希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项英完全接受了陈毅的意见。

项英、陈毅根据“二月来电”，决定将部队分九路突围。具体部署是：

（一）独立红七团随李才莲由会昌穿过封锁线，转至闽赣根据

<sup>①</sup> 《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的指导》，见《中共党史资料》第22辑，第13~15页。

地。如有可能再转到博生县（宁都）以北，开展游击战争；

（二）红二十四师的四个连，随陈潭秋、谭震林到闽西与张鼎丞的队伍会合，坚持闽粤边游击战争；

（三）由汪金祥率红二十四师的三个连，到寻乌南部和焦岭、平远、武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四）由李天柱、孙发力等人率红二十四师的四个连，依靠寻南原有的游击区，向东江发展，与古大存取得联系；

（五）派红二十四师的两个连向于都南挺进，建立于南游击区，并与信（丰）南游击区打成一片；

（六）由龚楚（后叛变）、石友生率红二十四师的七十一团（约九个连），从南安江、油山转至湘南，收容红二十四师失散队伍，在该地发展游击区；

（七）由徐鸣率红军独立第三团，到湘赣边传达指示，在该地开展游击战争；

（八）留红军独立第六团在赣南，由蔡会文、阮啸仙、刘伯坚领导的赣南军区指挥，进行游击战争；

（九）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直接统率红七团（周建屏为团长，杨英为政委），在根据地穿插游击，并与各根据地取得联系，指导工作。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和委员陈毅、贺昌，随红七团行动，其余机关工作人员，派到各地和各部队去工作。<sup>①</sup>

危机达到顶点，转折的准备也告完成，最后的突围就要开始了……

---

<sup>①</sup> 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第9～10页。

### 三 突 围

####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连天烽火炮声隆，  
惜别赤都情意浓。  
重围突破万千重，  
挥戈直指油山中。

赣南省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的这首激情澎湃的诗句，生动地再现了当时中央与局机关及其所属部队从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的情景。

1935年2月，数十倍于红军的国民党部队，把狭小的口风山团团围住，妄图一口吃掉这支陷入严重困境的红军队伍。东南边，有蒋介石五虎大将之一蒋鼎文指挥的东路军九个师一个旅重兵压境，十八军已固守在于都徐未丰、上坪等区乡外的所有城镇乡村。南部，“南天王”陈济棠的南路军各师已占领信丰、南康等县。水路，国民党把赣江中上游划为三路：（一）丰城至三曲滩；（二）三曲滩至江口；（三）江口至信丰。每段派驻大量兵力，控制、封锁所有渡口，并组织巡查船只日夜游弋。

在蒋介石看来，对红军留守机关和红军部队的“根本摧毁”将“达于一旦”。

面对紧张的局面，陈毅在中央分局会上作了冷静的分析：

“红军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之后，整个革命形势正走向低潮。目前，我们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现在看前途，好比看云遮雾绕的山峰，是看不清楚的。但是透过迷雾，还是可以看到一些。首先，我们的党战胜‘左’倾机会主义，端正了路线，举起了抗

日的旗帜。而日本军阀呢？‘人心不足蛇吞象’，占了东北，一只脚伸到华北，等它在华北站住了脚，一只脚就会伸到蒋介石的南京去。蒋介石一时还不敢公开投降，大敌当前，毛泽东同志率领的主力红军建立了抗日根据地，革命形势就会起根本的变化。中国这只大象是不会甘心被吞掉的，抗日战争迟早要爆发的，我们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就是胜利！

“我们要对新的形势有足够的认识，要冷静地面对现实，彻底改变旧的领导和斗争方式。必须按照‘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积蓄和保存力量，准备进行长期、艰苦的敌后斗争。”

接着，陈毅引导大家回顾、总结谢坊和中岭战斗的经验教训，分析了以大兵团与强敌死打硬拼的危害；同时，列举了充分发挥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进行斗争的巨大作用。

陈毅简短而精辟的讲话，使同志们眼界开阔，心里亮堂起来。大家打心眼里佩服陈毅既看到目前的不利形势，又不被眼前的暂时困难所迷惑，高瞻远瞩，看到革命的发展前途。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红军到了非走不可的生死关头。

突围之前，中央政府办事处面临一个严重任务，就是疏散和安置伤病员。当时留在根据地的伤病员，经紧急治疗，大部分已经出院，随院转移到仁凤地区的尚有2000余人。如何安置这些为革命流了血的红军伤病员，不仅关系到他们的自身的生命安全，而且关系到军心民心的安定。

项英考虑再三，认为眼下做好伤员的疏散隐蔽工作，只有陈毅最合适。陈毅本身就是一个重伤员，与伤员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且陈毅在部队里有很高的威信，又善于做说服工作。

陈毅拄着拐棍，步履艰难地走进了战地医院。他还来不及把受伤的那条腿移过医院的门槛，能走动的伤员便围了过来。在几分钟前，医院里还是叽叽喳喳，大叫大嚷，现在顿时平静下来了。

不用说，陈毅看出了伤员的心思：他们多想跟部队一起突围啊。陈毅以慈父般的眼光，凝视着含着泪花的伤员，然后沉痛地说：

“中央革命根据地暂时失败了，非转移不可，但中国革命肯定要胜利。革命的火种是扑灭不了的，革命的高潮一定会到来，但我们现在的处境很险恶，同志们，我们要体谅革命的困难，让队伍轻装前进，更快地突破敌人的围困。”

陈毅接着说：“我们决定对伤员进行疏散、转移。同志们可以回家或者到老百姓家里去，打游击也行，种田也好，待到革命形势好转时，欢迎大家重回部队。”

说到这里，陈毅提高了声调：

“同志们疏散以后，千万要珍重。我们要经得起胜利的考验，更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万一遇到敌人，要不怕牺牲，不幸而非牺牲不可时，也只能牺牲自己，千万不能叛变。我们牺牲了，只要有同志还活着，将来一定会给我们报仇的。要坚决相信胜利不属于反动派而一定属于人民。”

伤员们听了，都难以抑制自己内心的激动，纷纷表示：

“只要革命有希望，我们就安心留下来。”

“只要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们，我们就有办法对付敌人。”

在面临如此严重危险的时候，只有最坚强的红军战士，才会有这样的英雄气概。

随后，陈毅派人把地方上的干部和群众请来，把重伤员交给他们，亲切地说：“你们把这些为革命，为人民的解放流了血的同志带回家去，做儿子也好，当女婿也好。他们伤好了，你们家里就多了一个劳动力，革命也多了一颗火种。”

陈毅的话音刚落，地方干部和群众就四散开来，热烈地涌向伤员住处，你扶一个，他背一个，有的甚至搀一个又背一个。老太太们一听伤员可以做儿子，做女婿，特别高兴、积极，半天功夫，2 000 多名伤员都被接走了。这种军民同心，共度难关和子弟



兵认亲的动人场面，恐怕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为了减轻群众安置伤员的困难，部队除给每个伤员发放几块银元和一些药品外，陈毅还给接待伤员的每个家庭送去5斤盐。那时敌人封锁很严，盐是很珍贵的。

为了确保伤员的安全和更好地治疗，县苏维埃政府还专门作了10条规定，诸如绝对保守伤员秘密；每个伤员必备一个火笼，一床被子；每三天帮伤员洗个澡，生疥疮的一天洗两次等等。

随后，陈毅和项英决定中央分局只保持项英、陈毅、贺昌三个人的集体领导，其他领导干部立即分散转移，赶赴各地领导斗争，有病的则去各地就医。陈毅和项英对老弱病残干部的安置十分重视，想尽各种办法加以安置。他们认为，这些老干部是党的骨干，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是为革命操劳而患病的，需要有尽可能好的条件治疗和休养，而当时中央苏区局势严重，无法给他们找到养病的地方，必须让他们到白区找合适的地方治疗。

中央分局决定：正在患病的江西省苏维埃副主席陈正人去香港治病，陈的未婚妻彭儒陪同前往。项英亲自看望病重的陈正人，说明形势，交待有关事宜。陈正人对组织上的关心非常感谢，表示完全同意组织上的安排，随即化装经梅县、汕头转赴香港。和陈正人一起赴白区养病的，还有红一方面军原政治部主任周以栗等。

长期患病的分局委员瞿秋白，年已60多岁的原中央政府内务部部长何叔衡，同分局委员邓子恢等一起，由一个排的武装护送，经福建、广东、香港转赴上海就医。因形势紧张，项英还决定将怀有身孕的妻子张亮安排随同瞿秋白一行去福建。2月11日，瞿秋白一行从于都县黄龙区井塘村启程。

项英对妻子的安置很是矛盾：让张亮留下吧，险恶的环境不允许，还有以后分娩怎么办？思前想后，最后还是忍痛分离。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去竟成永别！

部署停当后，2月19日，项英致电博古、朱德、周恩来，报告当时敌情的同时，汇报了贯彻中央指示的简要情况，称：正在布置部队向赣南、福建突围，已“彻底检查了工作与错误”，分局待各部队出发后，率部队辗转活动于赣南、闽西。<sup>①</sup>

2月21日，项英再次致电朱德、周恩来、洛甫（张闻天），报告部队工作情况。电称：为加强对各地游击战争的领导，陈潭秋已去广东的饶平、大埔和福建的平和地区，开展白区工作；汪金祥已率红二十四师四个连到导乌南部一带游击；李才莲已率独立第七团到闽赣军区游击，原赣南省苏维埃副主席王善孚已随队到兴龙游击。挺进的部队一部出发，一部准备陆续出发。赣南、福建形势紧张，地区狭小，活动愈来愈困难。

2月23日，项英接到中央书记处给中央分局的电报。这是正在指挥主力四渡赤水的党中央从贵州省仁怀县大坝地区发来的。中央要求：游击的部队必须绝对轻装，一切供给应取之于活动的地区；干部应分散到游击队、被占领区或白区工作；各级干部“万一被敌人冲散或隔断时，应有决心独立进行工作，顽强奋斗”；必须特别反对关门主义，反对机械地使用老苏区的一切办法的倾向。

从1935年2月中旬开始，被围困在仁凤山区的近万名红军和地方干部，经过整编，即按中央分局部署陆续出发，分头突破国民党的“人造围墙”。各路部队突围的情况如下：

（一）李才莲率领独立七团，于2月下旬从瑞西铜钵山区出发，向闽赣边突围。部队行至瑞金九堡遭到敌人阻击，与敌激战，队伍被打散。李才莲率领剩下的部队转移到闽赣边，因情况变化，未能与闽赣省委取得联系，只好回到铜钵山区，与瑞西特委书记赖昌祚会合。赖昌祚、李才莲率领瑞西独立营一部在瑞金观音崇一

<sup>①</sup> 电报抄件，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带进行游击活动，被敌包围，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李才莲在战斗中牺牲。赖昌祚等少数人突出重围，在汀瑞边坚持游击战争。

(二) 陈潭秋、谭震林率领的红二十四师的四个连，于2月底突围到达福建省委驻地长汀四都，后经河田、朱畚、才溪、紫金山等地，突破敌人重重封锁与围攻，4月底到达福建永定县，与张鼎丞部会合。

(三) 汪永祥、李天柱率领的两支部队，从于都南部出发，穿过安远、会昌边界，于2月25日到达安远和寻乌的清溪一带，遇到粤敌独立第四师堵击。部队与敌激战3日，损失重大。汪永祥、李天柱等率领余部二三十人于月底到达寻乌南部，与周建屏部会合。同年5月，李天柱牺牲。

(四) 龚楚、石衡中、史犹生率领的红七十一团，从于南未丰地区出发，于2月24日到达信丰安息、极富地区，被粤敌余汉谋部第二师发觉，遂派教导团两个营追击，并派一个营从万隆、罗塘出崇仙堵截，2月25日，红军在极富地区与敌激战后，突围至信丰油山，后转至湘南（龚楚后来在湘南叛变投敌）。

(五) 徐鸿、张凯率领的独立三团从于都南部的小溪地区出发，于2月25日到达赣县王母渡渡河，部队渡过一半即被敌人发觉，被截为两半。张凯率部六七百人在杨雄附近与敌激战后，根据项英电令，转回于都南部，再向信丰南部突围。3月4日，到达信丰石背，又遭敌堵击，尔后折向安远岗头，再次被粤军第四师截击、封锁。3月上旬末，张凯和随从行动的原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陈正人夫妇及周以栗等，率100余人到达安远和寻乌南部山区，与周建屏、李天柱两部会合。独立三团团团长徐鸿在突围中牺牲。3月下旬，活动在兴宁的罗屏汉，率游击队六七十人来安、寻地区，与张凯等会合。5月间，陈正人、周建屏化装离开安远，经梅县、潮汕到达香港。周以栗在转赴白区途中遇敌，不幸牺牲。

(六) 毛泽潭率领红二十四师一个连，于2月中旬从于南未丰

出发，经会昌白鹅、小窑到达闽西，原拟与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率领的部队会合。4月26日，毛泽潭在瑞金红林地区与敌作战中英勇牺牲。

(七) 赣南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王孚善，率领“兴龙寻安县革命委员会”工作人员和挺进营400余人，于2月中旬从于南未丰出发，经会昌、安远边界向寻乌方向突围。2月29日，在安、寻交界之分水岭，遭粤军独立四师一个团袭击包围，经7昼夜激战，部队伤亡极大。王孚善率50余人突围，不幸中弹牺牲。

红二十四师七十团和独立六团是最后突围的两路兵马。

### “我为中国作楚囚”

1935年3月5日，太阳西坠，暮霭很快就笼罩着上坪山区。人们在盼望着夜幕早点降临。

阮啸仙、蔡会文、刘伯坚、梁柏岩、陈丕显等率领的独立六团以及赣南省级机关和“工农剧社”、《红色中华》报社等200余人，原拟在于都南部坚持游击战争。因国民党军分南北两路向未丰、黎村进攻，便决定突围到三南（龙南、定南、全南）与信丰活动。

由马岭到观音渡一线的国民党部队是粤军余汉谋部，在数量上五倍于红军，装备很好。他们用碉堡严密控制的地方，正是红军必经之路。独立六团要冲过云河、马岭和中岭这三个主要关口，尤其是中岭第三号堡垒，可能要付出重大的代价。

蔡会文决定：以重机枪连到中岭抢占制高点，以掩护先头部队，拿下敌第三号堡垒；省军区司令部、省级机关和警卫连，编在队伍中间；另以一部殿后，担任后卫和做收容工作。

入夜，天空突然布满了乌云，伸手不见五指，接着，倾盆大雨劈头打来。这正是红军行动的良机。

部队从上坪山区开始突围。红军战士们冒着大雨，一个跟着

一个，过山谷，翻山腰，沿着羊肠小道蜿蜒前进。

部队接近一个村庄时，突然前面响起了“啪”、“啪”的枪声，先头部队立即向两旁散开，侦察班进入村庄搜索，原来是一些流氓地痞组成的“靖卫团”，误认为红军是白军，鸣枪以示“欢迎”。

蔡会文听了侦察班的报告，笑了一笑说：“在白军进村时，神神鬼鬼都出来了。好吧，我们来个‘顺手牵羊’，把他们一网打尽。”“靖卫团”在不知不觉中被全部解决。

队伍到达畚岭时，东方刚刚露出曙光。蔡会文下令稍事休息，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密集的枪声，红军竟钻进了敌人布好的“口袋”。原来，驻中岭、仁凤的粤军的两个团在当地“铲共团”的带领下，封锁了畚岭地区。

突围中，阮啸仙不幸牺牲。阮啸仙，广东河源人，1921年加入共产党，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阮啸仙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农委书记，历届广州农民讲习所政治教员和第三届农讲所主任，参与领导了广东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阮啸仙曾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并被委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他出生入死，不避艰险地为党工作，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跟随阮啸仙的警卫员余虎，一见到蔡会文，抽噎着报告了这一不幸的消息。

蔡会文望着群山，脸色阴沉。他轻声地说：“圣地埋忠骨，浩气贯长虹。阮啸仙同志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同我们永别了，让他们留在革命根据地的土地上吧！他们将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众寡悬殊的情势下，年轻英俊的蔡会文，把被打散的部队再度集中起来，沉着而机智地指挥作战。他命令早已抢占中岭以东高地的重机枪连，用炽烈的火力从侧背打击敌人，接应后续部队前进；命令阻击班从西面斜插第三号堡垒，坚决把它摧毁。

先头部队碰上了硬钉子，打得异常艰苦，后续部队也遭受敌人的猛烈袭击。3月7日凌晨，刘伯坚在安远塘村的鸭婆坑指挥部

队突围时，不幸负伤。刘伯坚身材魁伟，本来目标就大，加上骑着一匹白马，更加引起敌人的注意。先是他的坐骑负伤，他迅速地跳下来，带着战士们向敌人猛烈扫射，一鼓作气冲过了第一号堡垒和第三号堡垒。当他们冲出山坳到达信丰的塘村时，不幸他的左腿又被一颗流弹击中，失去了行走的能力。这时，他的警卫准备架着他走。可是，刘伯坚还没有来得及把他的手搭上警卫员的肩膀，警卫员也中弹倒下了。刘伯坚孤胆向蜂涌而来的敌人射击，最后子弹打光了，曾被敌人悬赏5万元的刘伯坚落入了敌人的魔掌。

刘伯坚被俘后，敌人把他从信丰小汾解押到大余监狱。在囚禁期间，他抱定“一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的决心，义正严辞地拒绝了敌人的种种威逼利诱。敌人毫无所获，于是把他从大余监狱移往绥靖公署候审室。在移囚的路上，刘伯坚昂首迈步，镇静自若，从容地走过大街。随后，他留下了一组气吞山河，脍炙人口的《带镣行》：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作。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在狱中，刘伯坚曾写下了一组长诗《移狱》，以明心志。其中一首写道：

檐角瓦雀鸣啾啾，镇夜啼跃不肯休。  
瓦雀生意何盎然，我为中国作楚囚。

3月19日，月明风清，牢门深锁。面对惨淡的铁窗月色，刘伯坚又慨然命笔，写了一首《狱中月夜》：

空负梅关团圆月，囚门深锁窥不得。  
夜半皎皎上东墙，反映铁窗皆虚白。

这是刘伯坚留给后人的最后一首绝笔诗。

敌人用尽了各种手段，无法使刘伯坚屈膝移志。于是，粤军驻赣第六绥靖区司令官余汉谋电请蒋介石核准，对刘伯坚下毒手。

临刑前，国民党军法处长问他有什么后事要办，刘伯坚说：“有！我要写封家书，交待我的子孙后代，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还有，我死后要把我葬在梅关，我好站得高看得远，看到革命的烈火到处燃烧！”

蒋介石的法律中强调“民生”，定了这么一条法律：答应死囚临刑前的要求。军法处长无奈，只得给了他纸和笔。于是，刘伯坚写了临刑前的两封家书。一封给凤笙大嫂，一封给妻子王叔振。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叔振同志：

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直寄陕西凤笙大嫂及五、六诸兄嫂。

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的事业。

我葬在大余梅关附近。

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

此致

最后的革命敬礼！

刘伯坚 3 月 20 日于大余

这封家书，浩然正气，动人心魄。正如宋任穷所说：“刘伯坚这个人真了不起，快要上杀场了，还是那样镇定自若的写家书，信上的字迹和笔画，跟平时工作的字迹和笔划一模一样，一点都没有改变。”

3 月 21 日午时，一辆囚车开往大余县城北郊的金莲山。中共杰出的革命家、诗人，无畏的共产主义战士刘伯坚，随着三声枪响，英勇就义，年仅 40 岁。

刘伯坚于 1923 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赴苏联学习，1926 年 8 月，奉党的指示，与邓小平等偕同冯玉祥回国，任冯玉祥领导的国民联军总政治部主任，为团结冯玉祥和夺取北伐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曾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红军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

“西北军中驰令誉，红军帐里足良猷。百战何尝计苦乐，劳生为解万民忧。”刘伯坚那尽忠共产主义事业的情怀，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经过几天几夜的战斗，蔡会文领导的 1 800 多人的队伍只剩下 80 多人了。

战士们冲破敌人的重重包围，夜行晓宿，行进在桃江之畔的丛山之中。

这一带是白区和游击区的交界地，到处是反动地主的堡垒，“靖卫团”在前面拦路，强敌在后面尾追。白天，团丁到处搜山，乱放冷枪；入夜，庄庄火把通明，岗哨林立，不时地有一伙人荷



枪实弹，装腔作势，有时还放一阵土炮。

蔡会文指挥部队避实就虚，翻山越岭，日夜兼程，朝西南方向的桃江折去。一过江，就是赣粤边游击区的边缘。

国民党军为了阻挠红军渡江，把渡船都破坏了。

快到江边了，蔡会文找来了当地的老俵。他们说：“我们这里过去红军常来常去。前些时候，地主豪绅回来，说是红军被消灭了。这就没有天理了，我们就是不信。果然你们红军又回来了。”

黎明，在老俵们的热情帮助下，红军找到渡船，在王母渡顺利地渡过了桃江。蔡会文展望桃江两岸，仰首高咏：

三月渡桃江，江水滔滔不绝。

休道人饥马乏，三军心似铁！

过关斩将敌胆寒，破贼围千叠。

指顾油山在望，喜遂风云合！

部队在靠近赣信公路的一个小山包里停下来休息。战士们疲劳不堪，往地上一倒，就睡得“鼾声起，梦儿迢”了。

过了些时候，余虎引来大龙区委负责人，蔡会文和陈丕显会见了他们，他指点着山影说：“那些高高的山峰就是我们英雄的游击根据地油山！只要两天的路程，就可以到达油山的中心区了！”

油山，梦寐以求的油山，在那蜿蜒不尽的梅岭山脉中，已经隐约可见了。大伙儿的眼角挂着喜悦的泪珠，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大龙区委负责人说：“这里是游击区边缘，有我们的群众，他们已经给你们弄来一些吃的东西。”

不一会儿工夫，战士们吃上了群众送来的米饭、稀粥、山芋，大家已经挨了几天饿，吃起来感到格外香甜。

经过一夜休整，黎明时部队继续行军。逢山爬山，遇水涉水。

夜行晓宿，向着赣粤边的中心地区行进。

在苍茫的暮色中，部队终于来到了油山密密的丛林里。特别令人高兴的是，他们在特委机关意外地见到了项英、陈毅。

### “贺名播幽燕”

项英、陈毅带领的红七团是九路红军中最后离开仁凤山区的。

仁凤山里蕴藏着丰富的钨砂，解放后成了人民政府管理的矿区。但在当时，却只有深山密林，羊肠小道。3月里，南方雨多，所以原定的突围计划，是下午3点钟集合出发，趁着下雨，在黄昏时候下山，乘天黑抢渡于都河渡口，一举冲出敌人的包围圈。

突围前，项英电请中央批准，并对今后的工作给以指示。但一直到下午3点钟，电台还没叫通。这个电台是最后一次发报了，最后一次和中央联系了，突围以后，电台带不动，就要丢掉了。大家紧张地期待着这最后一次联系。

天渐渐阴上来了，山下响着敌人的炮声，部队焦急地等待着。再延迟不走，可能就来不及了。

电台仍在“嘟嘟”地向中央呼叫，项英、陈毅在焦急地等待着，贺昌不得不带领两个营先行出发，留下一营给项英和陈毅。

先头部队一下山，就遭到国民党军第八师的伏击，部队一下就被打垮了。贺昌转移到会昌的石含村，把打散的部队收拢起来，他面带刚毅，字句铿锵地对战士们说：“现在是考验每个共产党员，尤其是干部对共产主义事业忠心的时候，是考验对党对人民的忠心的时候。每个同志都要不避艰险，冲出重围去！”

刚收拢起来的部队，在贺昌的带领下，奋勇地渡过了会昌河。可是，敌人就埋伏在河的对岸，部队又一次陷入重围。部队再次被打散，贺昌身负重伤。这时，敌人逐渐逼近，叫嚷着要捉活的。贺昌临危不惧，不甘心为敌所俘，他高呼着“红军万岁”的口号，用枪膛里的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光荣的一生，年仅29岁。

贺昌是山西离石县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大革命时期就是一个职业革命家。曾当选为党的五大、六大的中央委员，先后参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历任中共南方局、北方局书记。王明上台后，贺昌遭受打击。为了更好地锻炼自己，他请求到中央苏区从事群众武装斗争。

1931年11月，经党组织批准，贺昌由吴德峰护送，到达中央苏区的兴国县，协助县委书记李坚真开展根据地的建设工作。

在兴国工作期间，贺昌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从实际出发，领导兴国人民大力开展经济建设，切实地解决群众的困难，使兴国县的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深得苏区人民的爱戴。兴国因而成为中央苏区的模范县之一，受到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表彰。

1932年2月，贺昌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时因总政主任王稼祥工作繁忙和受伤有病，贺昌几乎承担了政治部所有的日常工作，倾注全力从事红军的政治工作。

贺昌主政威严，办事认真，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政治部的所有文件和指令，贺昌都要亲自过目、审批。工作之余，他还经常给红军大学讲课，作形势报告，为《红色中华》、《红星报》撰写文章。

1934年1月8日至12日，贺昌同王稼祥主持召开了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会后，贺昌发表了《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一文，刊登在苏区中央局的机关刊物《斗争》上。该文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中央红军三年来的政治工作经验，阐述了政治工作与红军发展的关系，提出在新形势下红军政治工作的任务。他在文章中明确地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观点，这是党的历史文献上第一次正确论述红军政治工作地位和作用的科学论断。

贺昌牺牲后，陈毅挥泪写下《哭阮啸仙、贺昌同志》一诗：

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  
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

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  
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全。

### 巧遇曾纪才

电台“嘟嘟，嘟嘟嘟，嘟嘟”不停地呼唤，仁风山下响着敌人的枪声。时间过得真慢，一分一秒竟显得有一天那么长，10分钟、20分钟，1个小时，蜗牛一样慢慢地往前爬。等待出发的战士都静静地坐着，伸长脖子向电台看，心里急得火烧火燎……

天渐渐地阴了下来。突然，电台发出强劲的呼号，终于叫通了！战士们像久旱逢甘露高兴的跳起来。电键紧张地跳动，项英把突围的部署和有关情况，向中央作了详尽的报告，随后收到了中央的回电。可是，由于密码更换，电文译不出来，不知道中央回电的内容。接着，项英、陈毅命令埋掉电台，烧毁密码。从此，便同中央中断了联系。

这天晚上，阴雨濛濛，项英、陈毅带领苏区最后一队人马开始突围。天漆黑漆黑的什么也看不见，大家只能摸索着走路，走一步，跌一跤，开始还在路上走，后来路也没了。陈毅拄着拐杖走在队伍前面，也是一步一滑，跌跌撞撞，倒是爬的时候多，走的时候少。

好不容易下了山，不巧还是和敌人遭遇上了。300多人的部队被打散，陈毅和项英也被分开了。陈毅放心不下，沿着突围原路寻找，直摸到天亮才回到突围的出发地——上坪。陈毅伤口未愈，行动尤为艰难。项英也担心陈毅的伤腿，转身返回去找。爬了一夜，拂晓前终于回到了上坪。两人相见，又惊又喜。部队也集合到200多人，只好在上坪一带和敌人绕圈子。这时，中央政府办

事处的秘书长谢然之叛变，敌人把他的口供印成传单，用飞机散发。传单上说，项英眼睛近视，夜里不能走路；陈毅腿部受重伤，不能行走。通告各部，抓到项英、陈毅，赏洋5万元。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减轻部队压力，缩小行动目标，项、陈决定由另外几位同志指挥部队，他们自己则带着少数警卫战士，另行突围。

项英、陈毅几次突围都没有成功，他俩都不是本地人，路也不熟，要是冒险化装偷渡，很可能被人识破，送入虎口。计议了很久，一点办法也没有，准备在山下暂时隐蔽起来。

捱到下午，忽然碰到一个人。这个人蓬头乱发，面黄肌瘦，光着脚，拄着个棍，头戴一顶不知是从哪里拣来的钢盔，破钢盔上净是烟火熏的烟灰。这个人一见陈毅，便一把拉住，“首长啊，首长啊！”失声大哭起来。

他叫曾纪才。五年前，陈毅在信丰创办红军干部学校，时任信丰牛颈地区区委书记的曾纪才，年方17岁，毅然报名从军。在红军干校学习期间，陈毅的政治课使他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干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在二十二军工作。二十二军奉命开赴吉安，陈毅留下1/3的“种子”在赣南坚持地方斗争。曾纪才被任命为新设立的代英县县委书记。这时候，却意外地碰到他了。

陈毅紧紧地握着曾纪才的手，亲切地安慰他，劝他不要哭，问他怎么到仁风山区来的。曾纪才坐下来，沉重地诉说了近来的遭遇：“我在代英县当县委书记，人家来检查工作，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斗了我很久，这也错误，那也错误，把我的职务也撤了，罚我到红军里去抬担架。抬了两三个月，说我工作还不错，升为担架队长。红军主力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叫我押一批土豪劣绅送往外地。走到半路，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土豪劣绅跑了一半。这一来可糟了，更加证明我是右倾机会主义了。红军主力走后，地方上不要我，给我一张写明是严重右倾机会主义者的介绍信，谁

看了都不肯收留，这里推，那里推，眼看就要把我推出革命队伍了。”

“为什么不回家乡去？”陈毅问。

“拿着这种介绍信，回家乡又怎么办？家乡的土豪劣绅跟我仇深似海。我全家都被反动派杀害了，房子也叫反动派烧了。我离开党，离开革命队伍，还有什么去处？”曾纪才心情非常激愤，接着说：“听说红军主力走了，老首长留下没有走。我想找到老首长也许能收留我。我一路找到瑞金，瑞金县城被敌人占了，又打听到老首长退到仁风山来了。我拿着这个钢盔，一路讨饭，讨到饭，就用钢盔热一热吃，讨不到，就把钢盔戴在头上遮风雨，好不容易到了这里，总算找到老首长了。我就是死也要死在革命队伍里！”说着又哭了起来。

陈毅深情地倾听着曾纪才的诉说，对曾纪才十分同情和爱惜，但他只能说：“中央革命根据地失败了，将来会总结经验教训的。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也就不用计较了。现在我们在一起，打游击好了。”

曾纪才激动万分，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又聆听到了首长亲切的教诲和收留，怎能不感动呢？

项英、陈毅把突围的计划告诉了曾纪才，问他这一带的路熟不熟？

曾纪才说：“路我熟哇。正面过河怕不行，可以绕到上游去偷渡。我有把握。”

陈毅听他这么讲，高兴地说：“哈哈，我想起一句诗来了，叫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就这样，陈毅、项英、曾纪才及警卫员等七人结成一个战斗小组，在曾纪才带领下，昼宿夜行，直奔油山。

### 登上油山

1935年3月中旬，赣南山区，乍暖还寒，濛濛细雨之中，远处已隐约现出一条曲曲弯弯的“白带子”，那是桃江。桃江之水出自三南浔山涓涓之泉，清澈如镜，可冰寒入骨。

3月13日晚，陈毅等一行七人摸到桃江东岸。这里有一个渡口，对岸是王母渡。

王母渡位于赣县与信丰之交，是一个只有19户人家的小圩镇，但是，它是桃江上中游的一个重要通道，是河东通向油山的重要渡口。国民党部队派有重兵驻守，每天上午8点钟开渡，下午5点封船。船上、岸上都有武装盘查，晚上一律不准渡客。

陈毅等人蹲在东岸，仔细观察国民党驻军的活动和盘查过往行人的情况，心里盘算着渡河方案。第二天，即3月14日，是王母渡赶墟的日子，通往渡口的道路上，赶墟的老百姓挑着柴火，背着背篓，提着篮子，拎着鸡鸭，络绎不绝。

陈毅决定利用这一机会，混进群众中，智渡桃江。然而，七人中有两个是外乡人，项英是湖北人，操一口湖北腔；陈毅不仅操着浓厚的四川口音，而且他当年任二十二军军长时，司令部曾在这里驻过，经常露面，更易暴露，这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

然而，事不宜迟，东岸险象环生，不渡过江去是没有出路的。陈毅沉思后对项英说：

“你要最后上船，最先上岸，先上岸的搜得马虎，容易混过去，他们不认识你是个有利条件，我可能有人认识，所以后上岸。”

陈毅的这一着是他仔细观察国民党部队搜查过往行人后想出来的：

“你们上了岸，我一个出了事，就往河里跳。”

“他们会开枪的。”项英说。

“那就管不得那么多罗，我会泅水，往下游，万一打死也就算

了嘛，但我还要挣扎，不能那样便宜的死。不过你们无论如何一定要到油山上去。”

最后他又补充说：“如果我能闯过去，我们到油山再见。”

按照陈毅的吩咐，项英等先后往渡口走去。项英在一个当地农民的呼应下，以一个小学教师的模样挤在人群之后上了船，坐在船中间，陈毅坐在船尾，各有一名警卫员站在身边。

船到对岸，人们急于下船，蜂涌上岸，敌兵招架不住，简单摸摸就过去了。走在前面的，因为太挤，检查得更马虎。眼看项英已经登岸，陈毅从船尾上跳下来也混进人群。也许正是有人认出了陈毅，他们有意推推搡搡，哨兵也差点被挤倒了。就在哨兵“他妈的，他妈的”的骂声中，陈毅被几个大汉挤上了岸。敌人万万没想到，能得5万元赏银的陈毅的“人头”，今天就从他们的眼皮底下顺利地通过了。

过了王母渡，来到曾纪才的家乡牛颈，这里是游击区，敌人防范甚严，曾纪才一行白天不敢露面。在离他家10里路的山上隐蔽起来。

曾纪才全家被国民党杀光了，只剩下个老岳母还在。这位老婆婆的儿子是红军，随中央红军长征走了。女儿嫁了曾纪才，被杀害，她一个人在家里艰难度日。曾纪才准备半夜里到岳母家里看看。

天黑以后，曾纪才他们一行摸了10多里路，到了一处独家独院的小房子。曾纪才回过头，对陈毅耳语说：“到了。”于是，陈毅闪开身，背贴院墙，观察左右的情况，曾纪才走过去轻轻敲门。

“嘭、嘭……”

老婆婆从床上坐起来，侧耳听听，听真了有人敲门。她决心不理睬，重新躺下去。

“嘭嘭，……”

老婆婆翻个身，脸孔朝墙。



“开门呀——我是戊戌子，戊戌子回来了。”曾纪才说出自己的小名。

老婆婆心里一惊，从床上坐起身子。

“娘，我是戊戌子呀——快开门吧！”

老婆婆把两腿垂下床沿，打算去开门。刚要下地，忽然想起前两天的事，心里又犹豫起来：开吧，要是上了国民党的当怎么办？不开吧，这声音真像戊戌子呀。她左右为难了，两天前发生的那件事，蓦地浮现在眼前……

前天晚上，月儿挂在中天，惨淡的清光透过窗户，洒进屋里。老婆婆和衣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老是想念儿子，猜摸女婿的去向。忽然，听到村里狗叫，她恍恍惚惚觉得是儿子回来了，爬起来，走到门边，扒在门缝上向外望，一串黑影朝她家这边移过来。忽然，黑影停住了。只听一个声音说：“是这儿，只要老家伙一开门，你们就抓住她。”

“团总，要是她不开门呢？”

“废话！不开门就再去别家。”

“哎呀，是还乡团的人，他们要干什么？”老婆婆一阵慌乱。

“嘭、嘭、嘭”传来轻轻的敲门声。

“他们还懂得敲门？一向不都是大喊大叫，踢破门板往里闯吗？”老婆婆心里打了个问号，决心看看他们到底在耍什么把戏。

“嘭、嘭……”

“叫门，学像点。”一个声音说。

“娘——”立刻有人小声叫起来，“听不出吗？我是你儿子呀——我带队伍回来接你出去享福呀——”

老婆婆全明白了。她轻手轻脚走回屋里，端起马桶，爬上楼梯，把屎尿向门外倒下去……

曾纪才又在门口小声叫：“我是你女婿戊戌子呀，娘，开门吧。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看你，你怎么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了？”

屋子里，半点动静也没有。

陈毅拍拍曾纪才的肩膀，冲他摇摇头，把嘴附在他耳边说：“不要为难他老人家了。”接着，走到门缝处，嘴对着门缝，小声说：“婆婆，打扰你了。我们真是红军啊！我们就在后边山上的竹林里，你要有心的，早上去跟我们打一个招呼，我们决不害你。”

项英、陈毅、曾纪才等这天夜里就住在山上。山下就是牛颈，白天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广东军出操。

不一会儿，听到山下有人咳嗽。一个老婆婆东张西望地提个篮子上山来了。她走来走去地悄声喊着：“戊戌子！戊戌子！”项英、陈毅趴在大桃树下的草窝里，曾纪才溜到她身后，看见她身后没人，才迎过去和她见面。老人家见了日夜挂记的女婿，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

从老婆婆的口中，知道哪些人被杀了，哪些组织被破坏了。土豪劣绅控制得很严，村子里实行三家联保。人民的心是向着革命的，就是被镇住了。

在老婆婆坚决要求下，晚上，曾纪才带着陈毅、项英来到老岳母家。老婆婆杀了一只关养的阉鸡，又不知从哪儿弄来几条鱼，做了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给他们吃。

从老婆婆那里得知长安圩有个交通站。

第二天一早，太阳隐在东边山谷，把万道金光射向蔚蓝的天空，给缕缕白云抹上一层鲜红的颜色。

道别时，老婆婆笑咪咪地送了他们一句吉利话：“天都红了，你们准定好福气。”

曾纪才带着项英、陈毅，告别了老婆婆，在交通员的接应下，胜利地到达油山。

3月底，陈毅、项英先后与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中共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和赣粤边军分区司令员兼赣南特委书记李乐天、副书记杨尚奎等会合。陈毅豪迈地说：“国民党吹牛说已经把我们

消灭在仁风山区了！嘿，我们却在油山上说话啦！”

从红军主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5年3月留守部队和机关突出重围，这是一个过渡时间，是个转折点。陈毅说：“过渡时期结束了，新的斗争方法——游击战争开始了。”<sup>①</sup>

---

① 陈毅：《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3页。

---

---

## 第四章 南国烽烟

“大军西去气如虹，一局南天战又重。”主力红军长征后，项英、陈毅领导的南方红军游击队，面对着强大的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漫漫岁月在参天的古树，高耸的峰峦，没山的竹林和莽莽的杂草中流逝，英勇的红军游击队非但没有在绝境中被打垮，反而更加壮大。

### 一 梅岭星火

#### 长岭决策

蒋介石的嗅觉也真灵，各路红军游击队刚在油山会合，他就觉察出情况不妙，火烧眉毛似的又是策划，又是调兵，恨不得把赣粤边游击队一口吞掉。

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得到蒋介石的指令以后，马上调他的三个师从于都南部防线移到赣粤边，军部驻在江西大余，三个师分驻广东南雄和江西的大余、信丰一带。江西保安团不甘落后，也从赣州开到南康，要为广东军阀助一臂之力。4万大军蠢蠢欲动，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绵延数百里的大庾岭，雄踞赣粤两省边界。在大庾岭的东端，有一座海拔2000多米的巍巍高峰，便是著名的油山。它座落在大余、信丰、南雄三县的接壤处，横跨江西、广东两省，毗邻湖南。四周群山环抱，山峦起伏，竹木参天，莽莽苍苍，郁郁葱葱，真是“千峰转不尽，十里万重山”。

油山属五岭山脉的梅岭。梅岭上的梅关，是江西通往广东的

要隘，大余古商道最著名的驿站。梅关的险阻，曾被历史上许多文人墨客咏叹过。自从唐朝宰相张九龄在梅山壁岩设立“南粤雄关”以来，这里就成为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现在，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年月，那高耸入云的峰峦，挺立着的参天古树，漫山青翠的竹林，齐腰深的茅草，都成了红军开展游击战争的“风水宝地”。

早在1925年，这个地区就有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1926年冬至1927年春，南康、信丰、赣县、上犹、崇义、龙南和南雄等地，先后建立了工会和农民协会。八一南昌起义后，朱德、陈毅等率领一部分部队经过这里，给群众留下了部分枪支弹药。到1928年，这些县先后建立了工农政权，扩大了革命武装，其中的红二十六纵队，后来就成为陈毅组建的红二十二军的一部分。

1930年3月，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率红四军转战到这里。毛泽东在大余县第14中学召开干部和群众会议，进一步推动赣粤边区的革命斗争。

年年征战，岁岁烽烟。1932年3月，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时，广东军阀陈济棠派其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部侵占信丰、大余、南康，赣粤边苏区遭受蹂躏。苏区军民不畏强暴，三个县都组织了游击队，坚持革命斗争，后来实力不断发展，并沟通了北山、南山、崇义、上犹地区，赣粤边区就成了游击根据地，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西南屏障。

1934年6月，为了统一领导和指挥赣粤边的革命斗争，赣粤边军政委员会成立，李乐天为主席。

李乐天是广东南雄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中共赣南特委领导的武装暴动，任游击大队负责人。1931年以后，一直领导赣粤边游击大队。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经过五岭山区一带，受到赣粤边人民的盛情接待。

1934年12月初，李乐天根据项英、陈毅的指示，率领机关干部和一个营共700余人，趁红军长征经过赣南，国民党惊魂未定之机，突然跳出合围圈，渡过桃江，横穿信康公路，翻越信丰和南康边界的大山，于12月下旬到达廖地树，与原在那里坚持斗争的信康赣县委和油山游击队会合，成立赣粤边特委。特委以油山为中心，积极开展游击斗争，保持了近千人的队伍。

1935年4月初，陈毅一来到赣粤边特委驻地的草棚里，李乐天就向他汇报了赣粤边游击区几个月来的斗争情况。为项英、陈毅转移到油山作战奠定了基础。

留守中央苏区的队伍一批批突围来到油山，加上原来的游击队，上千人集中一起，使山区空前地热闹起来。然而，这并非胜利时的兴旺，而是失败后的假象。老倭看见这许多队伍列队上操，扛着他们没有见过的武器——花机关、歪把枪，还以为这是一支很强的力量，不知这时战士们的思想情绪，就像阴晴不定的天气，充满着矛盾。

国民党正在集中力量“清剿”苏区，很快就会来搞这块孤立于白区的红色山头。革命已经转入低潮，在强大敌人的重重包围下，在远离党中央而且中断一切联系的情况下，今后的斗争如何坚持？人们的心里，充满忧虑、苦闷、迷惘……

江西根据地失败了。这次失败，比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要惨得多。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很快发动了震惊南部中国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各地大小上百次起义；这次失败，把一个偌大的中央苏区丧失了，唯一的希望只剩下红军的长征，但红军究竟到了哪里，一点消息也没有。

1927年的失败，几万人被屠杀，农民群众尚未大遭殃；这次失败，几十万人被血洗，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苏区。

游击区里，天天要对付敌人的“清剿”，被“围剿”的资格都

没有了。当时国民党报纸称陈毅为“陈毅股匪”。有的战士问：“陈毅股是谁？”陈毅说：“那就是我。股者，一股两股，不成名堂之谓也。”

过了几天，国民党报纸又登出“陈毅散匪”，那战士又问：“陈毅散又是谁？”

陈毅说：“也是我，股的资格也不够了，是谓之散。这样更好，目标小，少麻烦。”

“围剿”变成了“清剿”，“清剿”又变成了“搜剿”，革命力量愈来愈削弱，斗争愈来愈艰苦，环境愈来愈险恶。

当时，“左”倾冒险主义的流毒尚未肃清，在一部分人中存在着死打硬拼的盲动主义情绪。有的人抱着“只要挺过几个月，主力红军就会回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不切实际的想法，主张“再由小到大，搞个大苏区”。原信康赣雄军分区参谋长向湘林煽动说：“中央苏区失败了，我们在山里打埋伏是可耻的，不如拼掉几个算几个。”

早在上油山之前，向湘林就曾经不顾实际坚持正规红军大部队活动的方式，将军分区的部队摆开来，吹号集合，点名出发，一心要和敌人硬碰硬。更有甚者，向湘林不舍得丢掉他骑的那匹大白马，结果敌人就沿着那匹马的蹄印追踪，大白马无形中成为敌人的向导，使队伍屡遭袭击，伤亡很大。后来传来消息，这个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向湘林堕落为可耻的叛徒。

也有的人经受不住失败的考验，存在着悲观失望的情绪。他们主张消极打埋伏，找人上山深林密的地方蹲起来，不露面，不做工作，不打仗，坐等新形势的到来。他们说：“红军主力不派队伍回来，我们就不能和敌人作战，作战就会失败。”

在这暗晦莫测、动荡不安的时候，陈毅、项英深深地感到，制定正确的方针，统一大家的思想，增强部队的团结，乃是当务之急。

项英、陈毅到达油山后，为了保密，开始使用化名。项英化

名叫“老周”，陈毅化名叫“老刘”。当时，不少人听他们讲话，看他们处理问题，感到他们站得高，看得远，水平高，分析问题准确果断，但很久以后，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

1935年4月上旬，项英和陈毅在大余县河洞乡的长岭村召开干部会议，即著名的“长岭会议”。

李乐天、杨尚奎、蔡会文、陈丕显和赣粤边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李国兴，中共赣粤边特委书记刘新潮（刘建华）及机关、部队的连以上干部约70人参加了会议。

项英主持会议并作报告。他指出：“中央苏区虽然丧失了，但主力红军的存在和游击战争的进行，必将推动新的革命形势的到来。要反对一切悲观失望，要坚决地进行游击战争。”

陈毅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瞻远瞩，给参加会议的干部们描绘了一幅光辉灿烂的前景。

在会上陈毅提醒说：“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革命的现实是困难的，现在还不是最困难的时候，更困难的局面还要来的。”

针对盲动主义情绪，陈毅提出：

“跟敌人死拼硬打，拼掉一个少一个，正符合敌人消灭我们的意图。留下的战士虽然数量不多，但他们是革命的‘血本’，是经过大风暴锻炼过的革命种子。保存下一个战士，将来局面开展了，可以当连长、营长；保存下一个县委书记，将来可以当一个省委书记，怎么能把他们放在炮筒子里轰掉呢？”

针对那些悲观失望的人，陈毅回顾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艰苦转战，重新创业的历程。他满怀信心地说：

“我们留下一点火星，也要烧遍万里江山，不要看这点力量小，这是新生的力量，会发展壮大的。共产党所开辟的根据地，一个个都是用菜刀、鸟枪搞起来的，任何人都要经得起考验。今天我们这里就有上千人，还有主力红军在外边，只要我们不犯错误，能充分利用地形，紧密依靠群众，开展灵活的游击战争，还怕不能



坚持到胜利吗？”

项英、陈毅的讲话，拨开了笼罩在人们心头的云雾，大家认清了革命的形势，看到了光明的前途，大大增强了坚持游击战争的信心和勇气。

长岭会议根据项英、陈毅的讲话精神，制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斗争方针。

会议确定以南岭山脉为依托，以油山、北山为中心，把赣粤边游击区划分为五个分区：

油山区——地处赣粤两省交界，横跨信丰、大余、南雄三县。从雄余边界的梅岭到信康边界的莲花窝，长达八九十公里，宽三四十公里，形成一个长条的半月形地带。这里重峦叠嶂，竹木丛生，接近城市，紧靠平原，山谷里散布着小村和稻田，世代居住着勤劳朴实的农民，是赣粤边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

北山区——在南雄县西北帽子峰的周围。这里有很广阔的原始森林，走上几天都看不见人烟。山上的野兽很多，野猪成群，间或也能看到虎豹，蛇特别多，夜里躺下去，早晨起来常发现大蛇就盘在身边。山里没有人家，但山外老百姓经常来。打猎的，造纸的，采菇的，烧炭的，都得进山。这里产的香菇很有名，叫北菇，行销赣南和广东，因此采菇成为当地人民谋生的主业。项英、陈毅刚来的时候，就住在这个山里。

信康赣区——包括信丰、南康、赣县部分地区，中心在大龙，大部分为丘陵地带，人口比较稠密。这个地区是游击队长曾纪才的家乡，以后，曾纪才又回到这个地区活动，他在这一带英勇善战，著有声威。敌人指名捉他，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敌人审讯他时，他说：“不用问了，我就是曾纪才。”

“山里还有多少游击队员？”敌人喜形于色，赶快追问。

“数不清！”

敌人发现上了当，以后一再对他百般威逼，直到折磨至死，铁

骨铮铮的曾纪才始终未吐一字。

南山区——在龙南、全南、定南、信丰和南雄交界处，主要是山区。

上犹、崇义区——在江西、广东、湖南三省交界地区的诸广山区，大部分是森林地带。这个山区距离赣粤边游击战争指挥中心油山较远，分出去以后不久就断了联系。

长岭会议对分兵游击作了部署，将赣粤边的红军游击队分成四个大队和若干小队，每个小队由十多人，二三十人组成，以便于分散活动，开展小规模、分散的游击战。部署如下：

由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率两个大队，向崇义、上犹县边境和湖南省的汝城、桂东县一带发展，建立游击区，并设法与中央军分局参谋长龚楚及湘赣省委取得联系。项英随后得知，蔡会文于当年5月在崇义县赤水仙召开干部会议，成立了中共湘粤赣特委和湘粤赣游击支队，陈山任特委书记，蔡会文任游击支队长兼政委；1935年10月，部队在桂东小水山桃树窝一带，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突围中，蔡会文亲率警卫班首先渡河，不幸牺牲。

蔡会文是湖南攸县山田村人。他年轻英俊，机智勇敢，能诗善文，文武双全。

蔡会文从小就向往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随后上井冈山，曾任中国工农红军连党代表。1930年任红军第一军团第三军政治委员，1931年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1932年任湘赣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和红八军政治委员，1934年任赣南军区司令员。

蔡会文对党忠心耿耿，指挥作战果断沉着，他那崇高的英雄形象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

黄成则（队长）、张日清（政委）率一部分队伍，向三南（全南、龙南、定南）发展，同时加强大龙地区的工作。

油山区留下部分队伍，项英、陈毅带领一部分队伍坐镇北山，

全面领导赣粤边游击战争。

会议决定，赣粤边军分区机关撤销，特委机关分散，由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刘新潮等负责指挥。当环境恶劣时，特委领导人将分散到各地，直接领导各地游击队开展斗争。

会议根据分散活动的需要，确定以油山为中心，建立秘密交通联络网，以保持中央分局特委与各游击队、县委的联系，实施对各地游击战争的有效指挥。其主要干线是：一条由油山伸向三南，一条由油山伸向梅山，再由梅山到北山，各地区还建立了自己的联络线。这套联络系统，是游击区的生命线，都派有对革命最忠诚、最可靠的人来组成。

长岭会议，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这次会议根据党中央“二月来电”所确定的工作方针、部署和措施，对赣粤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具有重要意义，它为实行向游击战争战略转变，为游击队忍耐艰苦，坚持长期斗争，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正如陈毅所说：“绝大部分都接受了这个方针。他们相信党，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积极地投入了游击战争，在残酷的斗争中，茹苦含辛，流血牺牲，表现了最大的勇敢和坚定。”<sup>①</sup>

长岭会议后，项英和陈毅把指挥机关设在云雾缭绕，高不见顶，树木遮天的北山帽子峰一带。

4月下旬的一天，项英和陈毅等率游击队100多人在北山的棚洞遭到国民党军和土匪武装周文山部的袭击。当天夜里，项英和陈毅研究决定，机关人员和部队进一步分散，以缩小目标，利于与敌周旋和隐蔽。他们还决定，为便于隐蔽，防敌袭击，以后进山搭棚，不住民宅。从这时起，游击队就和房子告别，而在山林里过着流浪生活了。

---

<sup>①</sup> 陈毅：《忆三年游击战争》（1959年2月）见《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27～228页。

长岭会议后不久，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华北事变。蒋介石大力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1935年6月，“何梅协定”签订。在全力围追主力红军和南方游击队的同时，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一系列卖国条约。1935年6月，当《何梅协定》的消息披露后，陈毅登上大庾岭，慷慨激昂地赋诗一首：

大庾岭上暮天低，  
欧亚风云望欲迷。  
国贼卖尽一杯土，  
弥天烽火举红旗。

#### 敌不防备我偏来

敌人已经作好了对赣粤边游击区“清剿”的准备。

前段时期，敌人集中兵力对付中央苏区，搞得差不多了，才把注意力转到赣粤边来。得知红军游击队在油山上扎下了根，蒋介石恨得咬牙切齿，急令余汉谋出马“清剿”。

余汉谋是广东军阀陈济棠第一军军长，为巩固广东地盘及向赣南发展，他积极执行蒋介石的命令。

余汉谋的“清剿”措施是：首先，在东面的桃江，北面的漳水，南面的淡水，驻兵扼守所有渡口，构成第一道封锁线；在四击公路线上密筑碉堡，重兵控制，构成第二道封锁线；再从公路到山边，村村设据点，构成第三道封锁线。然后，采取梳篦式的频频搜山，实行“树砍光，屋烧光，人杀光”的三光政策。敌人经常分兵几路，带上军犬、探照灯进山，或者在山林倒上煤油纵火烧山，烧得野猪、鹿子、獐子、长蛇等到处乱跑乱窜。此种景象，正如陈毅所说：

满山抄，  
草木变枯焦。  
敌人屠杀空前古，  
人民反抗气更高。  
再请把兵交。<sup>①</sup>

这种部署的制定，据说是余汉谋通过对蜘蛛的研究而得出的启示。一次，他手下的一个师长找余汉谋汇报工作，余府上下到处找遍，才在后院靠围墙的一间破屋里找到他。当时余汉谋正在窗前翘首呆立，那师长非常惊讶，问道：“军座，你在这里做什么？”

余汉谋回道：“我在此观八卦阵，喏，你瞧！”说时用手朝窗框外一指。

那师长顺手势望去，见屋檐下挂着几个大蜘蛛网，他莫名其妙地问：“什么？蜘蛛？”

余汉谋的豆鼓眼闪着诡谲的光：“你知道蜘蛛是怎样结网的吗？他结得非常巧妙。刚才这一只，我瞧着它从屋檐挂下一条长线，身子吊在下面荡秋千似的一荡，荡到对面树桩上，搭起一道天桥，于是来回拉了几根粗丝作骨架，再在中间拉了许多车辐般的线，这两种线是没有粘性的。然后，它再用很粘很软的细线拉同心圈，一圈比一圈大，最后织成了这个网。”

“你研究这个很有用处吧？”那师长讨好地问。

“大有好处！”余汉谋把头一昂，说：“我给你讲几个典故。当年汉高祖在荥阳兵败，躲进一口古井，把井口的蛛网撞破了，蜘蛛马上又织了一个。追兵来到这里，一看蛛网封口，以为没人躲在里面，去别处搜查，汉高祖因而对蜘蛛十分器重。18世纪，苏格兰的布鲁斯带兵打仗，败了六次，他在山洞中看见蜘蛛结网，一

<sup>①</sup> 陈毅：《赣南游击词》，见《陈毅诗稿》，第13页。

次次被风雨所破，仍不灰心，破了六次，最后终于结成。他得到启发，重整军马，也终于取得胜利。这都说明蜘蛛虽小且丑，在人类历史上却起过作用。它织网的技术非常高超巧妙，传说伏羲氏当初制作网罟，就学过蜘蛛结网；唐朝妇女在七月初七，还喜欢把蛛蜘藏在盒中，向它乞巧哩……”

“想不到军座对小小蜘蛛也进行了考证。”那师长大加吹捧。

“它不仅织网巧妙，而且捕虫手段高明。你瞧，它独坐八卦阵中，虫一落网，便扑过去，咬它一口，用毒液将虫麻痹，然后缠上粘丝，再大的虫也逃不出罗网。我原先以为它是把虫吃掉，经过观察才发现，它是用嘴把一种液体注入虫体，使虫肉和内脏化成汁，然后它像喝肉汤般吸干，所以蛛网上总是挂着许多吃剩的虫壳。”

“哦！”师长还是不明其意。

余汉谋这才言归正传地说：“俗话说得好，‘不做网的蛛蜘捉不到虫’。现在我们对红军进行清剿，就是要织成这样巧妙的网。”

“原来如此！”那师长对余汉谋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样，余汉谋拜“蜘蛛”为师，自以为他的三道封锁线和各种搜山“技术”已经编成了一张“蜘蛛网”，把个赣粤边游击根据地网得严严实实，连飞鸟也别想飞出去。他趾高气扬地向报界宣称：“三个月内，保证消灭共党游击队！”

南方的梅雨季节开始了，散不去的雾，撑不开的天，毛毛细雨，淅淅沥沥，漫天飘洒，无休无止。

面对余汉谋“织”下的“蜘蛛网”，陈毅胸有成竹。他与项英商量说：“斗争的形势和条件变了，我们在政策策略上也来个转变。余汉谋织了网，我们就想办法破他的网。脑筋一转弯，方法就来了。像我们四川抬轿的多，他们很会拐弯，看看到了拐角的地方，前边一个停下来，后端就转过来了。”

为了打击余汉谋的嚣张气焰，项英和陈毅采取“以游击队为

骨干”，和“不脱离生产的游击小组及革命群众”相结合的斗争形式。在地下党的配合下，指挥游击队，避实就虚，声东击西，四方活动，牵着敌人鼻子转，灵活机动地进行小规模、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敌人要打找不着，我们要打看得准。然后游击队跳出封锁线，袭击敌人的后方据点。

乌径在油山正南方向，座落在距油山40多里的雄信公路边，是个蛮大的圩镇，有上百户居民。国民党反动派在这里设了一个区公所，是他们“清剿”油山的后方据点。

开始时，余汉谋认为赣粤边游击队的部队在油山，因而集中兵力“清剿”油山；不久，发现北山有游击队活动，又以为游击队主力在北山，赶快把部队开过去，无暇顾及乌径，乌径只驻有邱桂兴的一个靖卫团，戒备并不很严。

在一个万籁俱寂的漆黑夜晚，一支全副武装的游击队向山外急进，当雄鸡叫过三遍时，这支队伍已神速地走完近百里的路程，来到乌径附近隐蔽下来。

“啪，啪，啪！”轻微的巴掌声响过，乌径地下党来接应了。接着，游击队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了镇子里的区公所。

说来真巧，三个游击队员刚要走过去拍门，就听见院门“吱呀”一声打开了，由门里歪歪斜斜地走出个瘦长条家伙，嘴里还干不净地哼着下流小曲儿。院门随即在他背后“咣当”一声关上了，并传出插门闩的声音。

三个游击队员箭步跳过去，扯着瘦长条的衣领，把他提起来，同时用手捂住他的嘴，用枪筒对着他：“邱桂兴在哪里？”

瘦长条打个酒隔：“你问团总……”

“快说，我们是游击队！”

瘦长条大吃一惊，满肚子的老酒都变成冷汗渗出来，“饶……饶命，在……在和区……区长打牌。”

“你是什么人？”

“副官……”

“很好。你去把门叫开。”游击队员用枪筒在他胸口上点了点说，“老老实实，不然它是不留情的！”

“是，是，不敢不敢。”

瘦长条被游击队员们押到大门前，敲起门来。

“使劲！”

“是，是……”

“砰砰”的敲门声更响了。

“什么人呀？”有个女人的声音。

“说，找团总的。”游击队员又捅他一下，轻声吩咐。

“我，找团总。”

“哟，副官呀！你不是刚走吗？怎么又转回来了？”里面响起开门闩的声音。

“有……有急事！”

门刚打开，跟过来的游击队员一齐冲进去，把那女的撞倒在一边。她要喊，一个游击队员晃晃驳壳枪，吓得她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

十几个游击队员不费一枪一弹，活捉了靖卫团总和反动区长。游击队从天而降，邱桂兴好久没有回过神来，游击队员威严地对他说：“没想到吧，团总先生，快跟我们走，叫靖卫团和区公所的人快集合！”

邱桂兴摇晃着吓软的身子，在游击队的押送下，来到靖卫团驻地。路上都是游击队的岗哨，一挺机枪正对着靖卫团的大门。邱桂兴一看，心里全凉了，只好乖乖地发出命令，叫靖卫团向游击队缴械投降。整个战斗只用了半个小时。天亮前，游击队撤出了乌径。

天亮后，乌径的居民小心翼翼地打开大门，探头东张西望，呵，到处贴着红绿标语，有的署名“红军游击队第三支队”，有的写着



“第八支队”，有的写着“九大队”。

江西老俵们想红军，盼红军，一看到标语，就一传十，十传百，闹得满城风雨，很快传遍赣南。不久余汉谋就得知了这一消息。余汉谋大吃一惊，急调在山里的“清剿”部队到乌径来对付“红军大队”。

陈毅得此消息，乐得哈哈大笑，说：“奇袭乌径捅了余汉谋的‘网’，我们再捅几下，这只老‘蜘蛛’就会晕头转向了。”

北山的游击小分队首先袭击了大庾县城附近的游仙圩。游仙圩有个又高又厚的土围子，四周的碉堡很坚固，布满了枪眼，外面又横着一条很宽的水沟。

晚上，游击队员偷偷地隐蔽在土围子附近的树林里。然后，派出一部游击队员故意从土围子不远的地方通过。通过时，又是大声讲话，又是打手电筒。果然，土围子里的敌人朝游击队开枪了。随着枪声一响，几个游击队员“哎唷！”“痛啊！”地叫喊起来，土围子里的敌人信以为真，立即打开土围子的门，越过壕沟，冲了出来。这时，事先埋伏在附近的游击队员见“蛇”已出洞，立即开枪猛击，直打得敌人哇哇叫。

这一仗，全歼敌人一个班，缴获长短枪十余支，炸毁了碉堡，顺利结束了战斗，游击队员无一伤亡。

西华山，位于大余县城西面十多里路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大钨矿，不仅储量丰富，而且钨矿质量很高，惹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眼红，纷纷争夺采矿权。

余汉谋原本就是个见钱眼开的财迷鬼，当然不肯放过这个赚大钱的机会，于是趁着在这里驻军的机会，赶紧在西华山成立个矿警队，以维护矿区安全为名，企图武装霸占矿山。矿警队在余汉谋心目中的分量及其实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陈毅偏要羞辱这只“老蜘蛛”，命游击队大队长曾彪带领十几个游击队员，袭击西华山钨矿局矿警队。

这天，游击小分队头戴斗笠，腰束布巾，扁担上套着绳索，吊着饭袋、烟斗，化装成为挑钨砂的短工，悄悄地来到矿警队附近的树林里隐蔽起来。

天近黄昏，矿警队照例在操场集合听队长训话。突然，隐蔽在树林里的曾彪“叭叭”连开两枪，正在训话的矿警队长应声倒下。游击小分队立即冲上去，把矿警队团团包围起来：“快举起手来！”“缴枪不杀！”

矿警们不知所措，乖乖地举起双手。这时，曾彪手执双枪，对俘虏们说：“我们是红军游击队，特奉命前来收缴枪支，不要你们的狗命，但谁敢抗拒，莫怪我子弹不留情！”

一部分游击队员用绳子把收缴到的枪支、弹药捆绑起来；另一部分游击队员点火烧碉堡。

刹那间，碉堡上空浓烟滚滚。

消息很快传到国民党军部，余汉谋叫苦连天：“共产党真神呀，北山明明有一团游击队，就是找不到他们！”

矿工们则兴高采烈地说：“红军游击队真神呀，搞得白军团团转。”

为了安定军心，余汉谋立即下令撤回正在游击区“清剿”的部队，保卫他的大本营，这只“老蜘蛛”被游击队搞得晕头转向，不得不把“三个月消灭游击队”的期限改为半年，以后又把半年改为一年。

红军游击队接连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陈毅欣然命笔：

讲战术，  
稳坐钓鱼台。  
敌人找我偏不打，  
他不防备我偏来。  
乖乖听安排。

## 北山事件

在反“清剿”斗争中，红军游击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不是盲目地有仗就打，而是有目的地打，“赚钱就来，赔本不下”，“不打硬仗，不攻坚”。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

在一般情况下，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游击队尽量避免和敌人正面交锋，以免遭受损失。但由于情况突然变化，或者时间没有算准，游击队也会和敌人遭遇。这时，游击队就立即分散隐蔽，到大树林里，深草丛中，水坑里或乱石后边躲藏起来，有时也到老倭家里暂避一下，甚至到地主乡绅家里“借宿”。只要沉着机智，敌人就不易搜到。

有一次，陈毅和他的警卫员在从北山回油山途中，突然和敌人遭遇，便急忙埋伏在路旁水沟的芦苇里。敌军排长搜索时，把芦苇一翻，正好把陈毅盖得更严了。

敌人搜了半天，只拣到一个包袱，看到里面是衬衫和书籍，惊奇地说：“啊！共党苦成这个样子，还念书呢！”<sup>①</sup>

为了引诱陈毅他们出来，敌排长故意高喊口令：“哼，土匪都跑了。集合，回去！”哨子一吹，人马杂乱，像是真要开拔似的。其实，一个排的敌人，只走了个把班，大部分留在原地守候。

陈毅和警卫员早就看穿敌人的把戏：河岸边长着齐齐整整一行丝茅，有风吹，应当一排一齐动；可是现在，大多数丝茅不动，只有少数的晃动几下，显然是敌人藏在那里。

直到日头快落山，敌排长发火了：“妈的，有本事的出来干！”这帮家伙，想抓游击队员领赏，却又希望自己面前不要藏着游击队。他们担心游击队的枪口对着自己，虽然气势汹汹，却是心虚胆怯。常常因为碰见一条毒蛇，踏着一个马蜂窝，就哗然逃窜；有

<sup>①</sup> 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第52页。

时一只野兽也会引起他们一阵骚动，敌枪齐发，以壮胆量。而林中的藤蔓荆棘，不时挂破他们的衣衫，地上的树蔸利石，不时刺伤他们的脚踝，也使他们怨气冲天，詈骂不休。

敌人施展种种诡计，胡搞一套，毫无所获，最后像打了败仗似的，倒挂着枪回去了。

余汉谋为了寻找红军游击队，总结了三种方法：听响声，看烟火，跟脚印。他命各部组织谍报队、守望队、观火队，派出便衣侦探，装扮成打猎的、采香菇的、烧炭的、砍柴的和挖竹笋的，窜到山里探听动静，察看有无游击队的足迹，到山顶观察有无游击队烧饭的炊烟，躲到山林草丛里窃听有无游击队说话的声音。一有“情况”，他们立即报告上司，调来军队“清剿”。

针对敌人的这些做法，游击队也随机应变。“有路不走，没路就走”，一般不走大路走小路，后来敌人在小路上也设伏，游击队就专拣没有路的地方走，或者爬山越岭，下雨天就在水沟里走，以免留下脚印。晚上走路，不点火把，不用手电筒。煮饭时，要求做到“白天做饭不冒烟，夜里烧火不透光”。正是：

休玩笑，  
 耳语声放低。  
 林外难免无敌探，  
 前回咳嗽泄军机。  
 纠偏要心细。

有时也制造假象，游击队员上山时反穿鞋子，故意留下脚印，让敌人朝相反方向跟“踪”寻找。有时到离游击队驻地很远的山上点火，让敌人去“围剿”一通。

余汉谋“清剿”处处碰壁，便想到其“主子”蒋介石所创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伎俩。为了欺骗群众，敌人到处张贴标

语、布告，散发传单，造谣诬蔑红军游击队“杀人”、“放火”，是朱、毛赶走不要的“土匪”。

老奸巨滑的余汉谋深深懂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赏洋5000元捉拿陈毅、项英，1000元捉拿队长，50元捉拿队员，缴枪一支赏30元。这还是余汉谋同他的两个副官为陈毅、项英人头赏格进行一番争论之后定下的数目。

敌人还利用“攻心”战术，到处张贴“劝降书”，许下游击队员投诚给予多少好处的谎言。还送钱给老百姓，或拿糖果给小孩吃，企图以此利诱他们报告游击队的活动情况。

尤其恶毒的是利用叛徒对游击队进行破坏。1935年10月发生的“北山事件”，就是余汉谋利用叛徒龚楚破坏特委领导机关的一个大阴谋。

龚楚原是中央军区的参谋长。1935年2月中旬，他奉命带领红二十四师的七十一团，从于都南部突围，经南康、油山、大余、北山等地，到达粤北乐昌、湖南宜章附近。5月2日，他率部转移到郴县黄茅时，受不住敌人“清剿之苦”，率部叛变，投靠了余汉谋。龚楚丧尽天良地亲手打死了与他一同突围的团政委石右生，作为他叛变投敌的见面礼。

为了邀功，龚楚又向敌人献媚说：“现在赣南的游击队员，官最大的是项英、陈毅，我有办法把他们搞到。”余汉谋喜出望外，当即命人取来500光洋，并当场封他为“剿共游击司令”，给他配备了一支拥有30多人的卫队和精良的武器。然后给他一个紧急任务：在游击队不知他叛变以前，带领一小队“铲共团”化装成游击队，前去破坏特委领导机关，捕捉项、陈二人。

龚楚诺诺连声：“卒子不过河，不起作用，我愿舍生人死，为军座效劳！”

1935年10月13日，龚楚率领他的假“红军游击队”，由粤北仁化，顺着他原来走过的路，摸到了领导机关原驻地北山的天井

洞，先后同天井洞的秘密交通员赖文泰、驻在天井洞对面山上的游击队长兼政委贺敏学、游击小队长“猛张飞”刘矮古以及红军指挥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等接触，在他们面前大吹大擂自己在湘南扩大游击区的“战绩”，声称他这次回来，是为了接项英、陈毅过去，加强对湘南游击区的领导。

龚楚骗取信任后，通过何长林擅自发出一个会议通知，要游击队干部和后方人员到北山天井洞来开会。当一些游击队干部陆续来到天井洞后，贺敏学问龚楚：“会场的警戒布置了吗？”龚楚点点头。原来他早已派武装把会场包围了。

贺敏学进入“会场”时，见四周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全是一色快枪和驳壳枪，感到气氛不对，便转身要走，突然两支驳壳枪对准了他。结果，30多名游击队干部当场牺牲，只有八九个人带伤冲出会场，逃离虎口。贺敏学身中数弹，滚下山岗。何长林贪生怕死，禁不住龚楚的威胁和利诱，成了龚楚的帮凶。

龚楚虽然获得了何长林这条走狗，但按照秘密工作原则，游击队各个单位之间彼此不发生横向联系，因此，项英、陈毅的具体住处，何长林也并不清楚。

龚楚、何长林继续伪装成“红军游击队”，寻找项英、陈毅的住处。他们在山里逡巡了几天，经常碰上国民党军的搜山队伍，几次险些发生误会，好在带了余汉谋的证明，才得以顺利通过。

这天，龚楚一伙经过跌杀水，爬上山背一条小径，正走着，忽然听见前面传来微细的脚步声，龚楚耳尖，先听到了，立即把队伍隐没在路边灌木丛后。不一会儿，果然来了一个老倭装束的人，斜背一把油纸伞，肩上搭个小包袱。来的不是别人，是陈毅的侦察员吴小华。

吴小华刚从大梅坑买米回来，走着走着，忽然从路边闪出了一伙人。吴小华并不知道龚楚、何长林已叛变，因此对龚、何毫无戒备，一看龚楚在里面，忙问：“你们怎么来了这里？”

何长林对吴小华说：“龚参谋长刚从湘南回来，有重要事情向老周（项英化名）和老刘（陈毅化名）同志汇报，请你带路。”

吴小华身为陈毅的侦察员，怎会轻易带他们上山。便说：“参谋长有什么事，可以写封信，我给你转去。”

龚楚急躁地说：“你这个人真古板，写信要耽误多少时间，现在是什么时候呀！”

吴小华问道：“你到底有什么急事？”

龚楚说：“我的事不能随便告诉你。老周、老刘在哪里？这个总可以告诉我吧！”

吴小华摇摇头。

龚楚见从吴小华嘴里套不出情况，决定先发制人，脸色一沉说：“你怎么这样不相信同志，哦，我明白了，身为老刘的侦察员，却在这里大摇大摆，不是脱离组织当了逃兵，就是被敌人抓住反了水。你是进山刺探军情的！”

勇敢机智的吴小华不愧为陈毅的侦察员，就在与龚楚的谈话中，很快发现了这个叛徒的破绽。根据特委规定的联络制度，各游击队与特委联系必须通过交通站。他将计就计，装作受了天大的冤枉似的：“你打乱话！走，我带你们上山去见他们。”

一路上龚楚不断打听山上的情况，他问吴小华山上有多少人枪。吴小华故意吓唬他：“河东来了一支游击队，有300多人枪。”

快到哨所了，吴小华一把挡住龚楚说：“参谋长，请你等一等，我先去报个信，免得哨兵误会，自己人打起来不好。”

“有你在，怕什么？”何长林说。

“有我在也不顶事。司令部有命令：凡接近岗哨，不得超过三个人，否则，哨兵就可以开枪。”

龚、何一时不知其意，便点头同意了。

吴小华走到叛徒看不见的地方，便拼命朝哨所跑去。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哨兵说：“快、快，快通知特委，山下有人。”

“砰，砰，砰！”哨兵连鸣三枪，向特委机关发出警报。

龚楚听到枪声，知道上了当，立即命其队员把各处路口封锁起来，妄图活捉项英、陈毅，向其主子邀功。

项英、陈毅当时正在下棋，听到枪声，立即转移到后面的山上隐蔽起来。

龚、何由于不知指挥部到底有多少人马，不敢贸然进攻，临近傍晚，才带着人马上山，他们找了许久，在密林深处找到一个临时竹寮，只见地上留有柴灰，一块石板旁有一只遗落下来的棋子“将”。龚楚捡起在手上掂弄了许久，紧紧攥在手心里，喃喃地说：“将？唔，将！他跑不出我的手掌！”他在山上放了一把火，恨恨地带着队伍下山了。

项英、陈毅安全脱险。

他们分析：“既然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指挥机关，一定会对北山进行‘清剿’。”于是，项、陈率少数人决定向油山转移。

向油山转移时，由于没有向导，又要避开大路，日夜在深山密林中穿行，在树丛和荆棘中前进。遇见陡壁，就抓住岩缝里的粗藤往上攀；遇到下雨，山路滑，摔跤那是常事。陈毅拖着负伤的腿，有时一滑就滑很远，项英风趣地说陈毅“坐飞机”。他们测定大致的方向，先向大梅关前进，然后再经梅山到油山。

项英、陈毅一行偷越梅关是一天深夜的事。他们越过梅关后，继续前进数里到仙人岭时，实在太累，就在避风处稍事休息。大家头朝广东，脚向江西，躺下就睡着了。醒来，陈毅风趣地说：“我们真了不起呀，一身压着两个省中呢！”<sup>①</sup>说得大家笑起来。陈毅乘兴一气呵成，写下《偷渡梅关》的诗篇：

敌垒穿空雁阵开，连天衰草月迟来。

<sup>①</sup> 《元帅的风采》，第250页。



攀藤附葛君须记，万载梅关著劫灰。

对偷越梅关，项英后来在回忆时是这样记述的：“……乱爬乱走，爬到第二天清早3点钟时，才到达梅关（张九龄修的梅关）最高峰上。大家沿途跌跌乱爬，已是疲劳不堪而不能继续走路了，于是大家就在梅关高峰露营，久已闻名的梅关，不料这夜我们高卧上面，赏玩无穷的妙境。”<sup>①</sup>

### 严冬过后绽春蕾

“北山事件”后，敌人加紧了对北山的“清剿”。北山的党组织、交通站和游击队没有来得及转移，遭到很大破坏。北山区委只剩下区委书记袁达郊和交通员张理生坚持工作，其他人均已逃离该地。所幸在“北山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陈毅便派两名侦察员分头通报了油山和信康赣两地的党组织、游击队关于龚、何叛变的情况，使他们早有防范，龚、何行骗未能得逞。

在艰苦斗争环境下，如何巩固内部，防止叛变事件的发生成了摆在陈毅、项英面前的又一难题。

有的人把苏区肃反中的错误做法搬到游击区来，主张“无情斗争，残酷打击”。对表现不好或讲怪话的人，就开会批判斗争，对动摇逃跑的人，则采取极端的镇压手段。夜间站岗放哨，怕一个人靠不住，便放二三个人，弄得相互间疑神疑鬼，互相戒备。

陈毅、项英反对这种极端的做法。陈毅说：“开小差的，抓回来就杀，听到讲怪话的就斗争，那是自己挖自己的墙脚嘛！靠这种做法是没法巩固队伍的，这是国民党的办法，我们共产党无论如何不能采用。革命是自愿的，决不强迫，不能逼人家干革命，更不能绑着人家干革命。”“这样做恰恰造成了内部的恐怖、疑忌，破

<sup>①</sup>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82～83页。

坏了团结。”

项英也与游击队员促膝谈心：“现在我们处在最困难的时期，广东军队和地方武装几万人马把我们围困在狭小的山区内，我们和上级的联系中断了，和各个根据地也联系不上，我们留在这里坚持斗争的同志随时有被打死、饿死、病死的可能，我们要有随时为革命而牺牲的准备。但是，我们只要剩下一个人，也要顽强地坚持下去，共产党的红旗不能倒，游击队的旗帜不能倒，革命的火种不仅消灭不了而且还会燎原燃遍万里江山，黑暗总会过去，光明必然会到来。当然，在这种艰难的时刻，总会有少数人经不起考验，开小差的，叛变的都有可能发生。不过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除掉了砂子，金子会更加闪闪发光。”

陈毅又讲到：“能坚持的当然应当坚持，愿意回家的，可以发给路费。但出去了，要站稳立场，不要叛变，不要去当反革命。不要翻脸为仇，危害革命，不要不辞而别，要握手告别，后会有期，出去呆不住，愿意回来的还可以再来。至于我个人，党交给我的任务是在这个地方坚持斗争，就剩下我一个人还是要干。”他劝大家要注意革命气节，看到革命的光明前途，他在《赣南游击词》中写道：

莫怨嗟，  
稳脚度年华。  
贼子引狼输禹鼎，  
大军抗日渡金沙。  
铁树要开花。

陈毅还特地写了一首诗赠给战士们：

二十年来是与非，

一生系得几安危？  
莫道浮云终蔽日，  
严冬过后绽春蕾。<sup>①</sup>

陈毅、项英的坚定态度和谆谆教诲，在战士中反响很大，立即有人表示：“你能坚持，我们为什么不能？”“我们也要坚持到底，决不动摇。”不少人感动得热泪盈眶，原来思想动摇的，也坚定下来了；有坚持要走的，也表示走后不背叛革命。

巩固内部，还要坚持红军的优良传统，坚持官兵平等，实行经济民主。有一个时期，钱曾经是项英、陈毅极严重的精神负担。从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的时候，他们带了一大笔钱，都是些金子。到达油山后，这些金子一直由他俩缠在腰里。冬天衣服厚还可以掩饰，到了夏天，腰里就凸出来了，有人就在背后对他们的腰部指指点点。这在当时斗争复杂的情况下，难免有被谋财害命的危险。

项英和陈毅反复考虑了很久，分开背吧，若是让品质不好的人背，便等于给他发旅费；继续瞒下去吧，已经瞒不住了。怎么办？一次，部队集合，部署作战方案，正要散会，项英和陈毅叫住了大家。只见他俩每人从腰间解下了一条“腰带”，接着，把里面的东西“哗哗”地倒在桌上。

项英说：“同志们，这是党组织给游击队的活动经费，是从中央根据地带来的，党要我们负责保管。我们个人是绝对没有乱用过一分钱，总共就这么多，是准备在特殊情况下应急用的。”

桌上一堆黄金，闪射出耀眼的光芒，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黄金上。

项英、陈毅生活非常俭朴，他们和大家一样，一个月12块钱。

① 《陈毅诗稿》，第11页。

项英那时身体不太好，可他总是忍耐着，坚持着，不表露出来，不愿意拖累大家。他有病，叫他吃药，总是不肯吃，说要留着急用。当时药品奇缺，仅有的药就是几盒“万金油”，几瓶“剂众水”和几包“八卦丹”，拉肚子也就是吃“剂众水”。

谁都清楚，陈毅拖着伤腿来到油山后，长期风餐露宿，往往白天隐蔽，晚上转移，尤其是阴雨季节，路滑泥泞，陈毅总是皱紧眉头咬紧牙关坚持行军。警卫员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多次请求陈毅花钱买些药品进行治疗。但陈毅总是笑着摇摇头：“哎，钱一定要用在最需要的地方，我的腿还能坚持。小鬼你不要瞧不起瘸子嘛！古代有八个神仙，其中一个叫铁拐李，就跟我一样是个瘸子。他的本领可大哩，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结果数他的神通最大。我还听方志敏同志讲过，赣东北有个农民起义的领袖，也是一条腿有毛病，本事却大得很，当地群众都把他传神了，送他一个外号叫‘飞天拐子’。你瞧，他们一个能漂洋，一个能飞天，难道我还不能爬山。”警卫员拿他没有办法。

一次，陈毅带着警卫员去南雄参加县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一路上，他拄着拐棍，一跛一跛，步履极为艰难，警卫员走过去扶住陈毅，问道：“老刘，又是伤口发作了吧？”

“是有点矛盾，我想走快，可它却不让。”陈毅指着伤腿说。

天近黄昏，好不容易走到了县委住的棚子。陈毅汗水湿透了全身，卷起裤腿一看，脓水直往伤口外流，腿红肿得很厉害。

陈毅趁开会的人还没有到齐的机会，叫警卫员端来一盆水，将伤口洗了洗，他拉着警卫员走到树林里，警卫员不解其意。只见陈毅找了两棵挨近的树，把受伤的那条腿横绑在一棵树干上，身背靠着另一棵树，两手按着红肿的伤腿，咬紧牙，“嗨吱！嗨吱！”地挤了起来。脓和血水沿着伤口一股一股地向外流，挤出的脓和血水足足有半碗，疼得他汗水直往下流。

“小鬼，过来帮帮忙。”陈毅招呼警卫员。

警卫员见他疼得脸色都变黄了，怎么也不忍心去挤。

陈毅说：“小鬼，快挤呀，这次不彻底消灭，它下次还会‘反攻’的。”警卫员只好把脸转向一边，闭上双眼，使劲挤着伤口。忽然，“当、当”两声，两块碎骨掉在盆子里。

陈毅高兴地说：“哈哈，原来是这两个坏东西在里面作怪哩！”

陈毅用盐水洗净了伤口，把白布条涂上游击队的“万灵药膏”——万金油，用竹签把它一点一点地塞进伤口里去。从此以后，他的伤腿居然好了起来。

……

陈毅深情地望着生死与共的游击战士，铿锵有力地说：“我们有责任告诉大家，万一我们在战斗中牺牲了，尸首可以不要，但这批经费无论如何要带走，这是党的经费，人民的血汗，千万不能落在敌人手里！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我提议交给部队中最可靠的人带。”

战士们说：“党的经费应该让最可靠的人保管，最可靠的人就是你们哟。”经过项英、陈毅这么一解释，就使大家知道这些钱是怎么回事，从而消除了影响内部关系的一个因素。后来，就是这些黄金，使项英横遭杀身之祸。皖南事变后，项英、周子昆等在茂林一带山区隐蔽。一天，项英在山洞外洗澡，警卫员刘厚总发现了“腰带”的秘密，顿生谋财害命之心。是夜，刘厚总悄悄爬起来，掏出驳壳枪，朝着熟睡的项英连开两枪，周子昆正想坐起来，胸口也中一枪，他们俩人当场牺牲。刘厚总将项英、周子昆身上携带的黄金、钞票搜出来，匆匆下山逃走。

项英和陈毅还通过组织学政治，学文化，学军事，提高了游击队员的素质，增强了游击队的凝聚力，使游击队得到巩固和壮大。

当时在项英身边担任炊事员的萧平权、交通员曹秀英，1986年在《在项英同志身边》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项英同志十分关心干部和战士的学习。他经常对我们说：“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文化水平都很低，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就不能很好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很好地领会党的方针政策，也就是难挑起革命的重担。”他还和我们开玩笑，说将来革命胜利了，组织上如委托你担任领导干部，你没有文化那怎么当呢！<sup>①</sup>

在残酷的斗争中，陈毅、项英依靠政治思想教育，来巩固队伍，战胜敌人，赢得胜利。

### 小小帕儿情意长

余汉谋连续数月的“清剿”未能消灭游击队，恶毒的“诱饵龚楚”计谋也没有抓到项英和陈毅。他本已黔驴技穷，无计可施，谁知一天早上吃饭时，他盯着白生生的饭又想开了。饭？一条更为恶毒的计策在余汉谋的脑中酝酿而出。

他的“高明招数”便是封坑——严密的经济封锁。

敌人把游击队经常活动的村庄烧光，强迫群众连人带粮全部搬出山外，并入山边和山外的大村庄，集中编为保甲，只准每月初一、十五进山砍柴，由保甲长严密监督执行。

国民党江西第四行政督察区“清剿”计划写道：

封锁匪区断匪接济绝匪粮食，促其崩溃俾肃清容易，其办法另定之。<sup>②</sup>

①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332页。

② 《江西省第四行政督察区“清剿”计划》，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430页。

余汉谋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公然杀气腾腾宣布：

“各乡米谷不得运入山中，以济匪粮，如查出或拿获，立即枪决”。“各乡查有济匪、通匪、窝匪者，限一星期内一律送来部讯办，否则以该乡里长庇匪论罪。”<sup>①</sup>

接着，国民党地方政府专门制定了《封锁匪区纲要》，颁布了《断匪接济办法》：

凡接近匪区最前方各地之商店，其货物只准人民零买，不准整批发卖；

至于粮食、食盐、药品以及汽油、煤油、电料、钢铁、紫铜、白铅、硝磺等，更是“绝对的一律禁止输入匪区”；

即使是群众自己必需的油、盐、布、电池等生活物资和日用品，也只能限量购买，如果多买，即以“通匪”，“济匪”论处，轻则坐牢，重则杀头。

敌人妄图用这种封锁加恐怖的政策，断绝红军游击队的物资来源，把游击队困死、饿死在空山之中。

赣南大山区，特别是高山顶上，一到冬天，气候寒冷，白雪铺地，冰凌串串，寒风凛冽；而开春则是淫雨霏霏，一个月见不到几个晴天；春寒长，秋冻早，夏天也往往是夜凉如水，露浸寒肤，人常被冻醒。游击队员没有棉衣棉被，唯一御寒的就是一条毯子。山区竹木随手可得，但怕被敌人发现，谁也不能烧起篝火

<sup>①</sup> 《余汉谋部颁布南雄绥靖办法》，见《广州民国日报》1935年6月2日。

取暖烘衣。在异常恶劣的条件下，游击队一方面要和敌人作斗争；另一方面又要和大自然作斗争。正如陈毅所说：

风击悬冰碎万瓶，野营人对雪光横。  
遥闻敌垒吹寒角，持枪倚枕到天明。<sup>①</sup>

在那“恶风暴雨住无家，日日野营转战车”的岁月里，红军游击队不得不常年累月地鏖战于穷山绝岭，在吃无粮，穿无衣，住无房的艰苦环境中，过着“野人般的生活”。陈毅说这“是我在革命斗争中所经历的最艰苦困难的阶段。整年整月的时间，我和我的同伴，没有房子住，在野外露营。大风大雨大雪的日子，我们都在森林和石洞里度过，风餐露宿，昼伏夜行，是我们生活的常规。”<sup>②</sup> 项英在其《自传》中也曾记道：“有两年时间，我在夜间从未脱过衣服，我的士兵也是这样，我们在得到警告几分钟以后，就得准备采取行动。我们不能在村镇里睡觉，而是在山上树林里过夜。”

红军游击队初到油山时，还可以在偏僻的地方找些小房子住，后来房子被敌人烧掉了，只好风餐露宿。雨天，大家撑把伞在大树底下，背靠背地坐着睡；晴天，就往古坟的石板上一躺，仰卧着看星星月亮，与天地同归了。

有一次，南康贤女埠区的区委书记病了，刘新潮带着游击队的陈医生和通讯员从信丰上乐出发，去给区委书记看病。当他们三人走到茶园凹时，陈医生去小便，刘新潮与通讯员边走边等，过了一会儿不见人来，他们便回头去找，竟发现一只老虎在路旁不远的树林里吃东西，药袋子撒在路旁，附近血肉模糊，游击队仅

① 陈毅：《雪中野营闻警》1936年冬，《陈毅诗稿》，第114页。

② 陈毅：《给罗特生同志的信》，1942年3月18日。



有的—名医生，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老虎吃掉了！

在敌人连续“清剿”最紧张的时候，特别是在大雪之后，与山外群众联系完全断绝的情况下，游击队吃不上饭是常事，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甚至有时两三天也吃不上饭。

一次，陈毅与敌人猝然遭遇，他一个人在茅草丛里躲了三天，挨了三天饿。第一天，他把随身带的盐，拌和着山上的糯米草（江西老俵把它当作喂猪的好饲料）咀嚼。第二天，他饿得爬不动了，想到沟边取水也没有力气了，只好静静地躺着。幸好第三天警卫员宋生发找到了他。

为了坚持斗争，游击队员们只好用野草充饥。情况不太紧张时，他们也积极想办法“改善生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晚上出去捉蛇、捉山鸡，有时还去捅马蜂窝，掏蜂蛹吃，山上也有野猪、山羊等，但怕打枪暴露目标，只好同它们“和平共处”。

一天晚上开完特委会议后，陈毅一身轻松，带着警卫员聳牯、宋生发等人去捉蛇。几个人带着四支电筒，一个人手上一根木棍，一路寻去。

聳牯、宋生发等没学过捉蛇，既不懂看蛇路、识蛇粪、找蛇洞，也没有防治毒蛇的药。他们只知“打蛇打七寸”，一发现蛇，就乱棍齐下，把头砸烂。

陈毅比较有经验，他看了笑着摇头：“你们这是打蛇，要学会捉蛇才好，我来捉条给你们看！”他一路寻着，不久发现一条碧绿的蛇横卧在草丛中，被手电一照，抬起了头，正要梭行，陈毅迅速用一个带短叉的树棍叉下去，正叉在它的颈部，聳牯立即接过陈毅手上的电筒，帮着照明。陈毅这才看清它的头是三角形的，尾巴焦红，惊叫一声说：“啊！我还以为是无毒的青竹标，原来是竹叶青！不怕你，越毒我越要制服你！”说时左手握棍，换出右手，用拇指与食指，捏住蛇颈两侧，提了起来，那蛇立即扭动着，用身子盘缠在陈毅手臂上。它睁着红眼，吐着舌头，本来紧贴上颌

的两颗毒牙，此时竖直起来，但无论它怎样竭力挣扎也无法咬到陈毅的手指。

队员们看了，有的担心，有的开心，想不到“老刘”捉蛇还有两下子。

陈毅提着蛇给大家看：“瞧，它嘴里有一对毒牙。让我来缴它的械！”说着接过聋牯递来的一根树枝，把蛇头靠在树干上，用树枝拨开蛇嘴，把毒牙撬掉了。聋牯掏出一根细麻绳，绑了蛇颈。

接着，陈毅又用另一种办法捉了一条赤练蛇。他先用棍子叉住蛇身，迅即抓住蛇尾提起来，连续抖动几下，那蛇就全身瘫软，无力反抗了。

这样，他们一路连打带捉，一共抓了十多条蛇。回到宿营地，陈毅兴致勃勃，挽起袖子笑着说：“杀蛇也是一门手艺，我给它来个剥皮拆骨。”说着，提起那条竹叶青的头，往树上一挂，在小马灯的光照下，用一把小刀划开蛇颈周围的皮，然后细心地把蛇皮往外翻，再往下蜕，顺当地把蛇皮剥离到肛门边，就不再剥下去，连皮带尾部割下不要。蛇皮一去，从圆筒状蛇身腹部裂开一条缝，长条形的心肝内脏袒露出来。陈毅取出蛇胆，接过聋牯准备好了的一茶缸水，把胆往舌上一放，喝口水一仰脖子就吞下去了。毒蛇胆是样好东西，蛇越毒胆越好，可以清火明目，山里人捉住蛇，多是这样随割随吞。

接着，陈毅开始拆蛇骨。他在蛇身的背部开个口子，然后像撕布般撕成两边，再细心剔起有薄膜的骨头一扯，一长列排骨就从肉中分离出来，剩下的是洁白的纯肉。

聋牯他们看了，也都学着动手，先剥蛇皮，再吞蛇胆，然后拆蛇骨，一个个干得很有兴趣。

次日，大家吃了一顿味道鲜美的蛇羹。陈毅特地叫人盛了一大碗，送到项英棚里。

在反“清剿”，反经济封锁的斗争中，项英、陈毅领导游击队

和各地党组织，不畏强暴，英勇机智，闯过许多难关，陈毅曾用明白如话，饶有风趣的诗写道：

天将晓，队员醒来早。  
露侵衣被夏犹寒，  
树间唧唧鸣知了。  
满身沾野草。

天将午，饥肠响如鼓。  
粮食封锁已三月，  
囊中存米清可数。  
野菜和水煮。

日落西，集会议兵机。  
交通晨出无消息，  
屈指归来已误期。  
立即就迁居。

夜难行，淫雨苦兼旬。  
野营已自无篷帐，  
大树遮身待晓明。  
几番梦不成。

天放晴，对月设野营。  
拂拂清风催睡意，  
森林万树若云屯。  
梦中念敌清。

叹缺粮，三月肉不尝。  
夏吃杨梅冬剥笋，  
借取野猪遍山忙。  
捉蛇二更长。<sup>①</sup>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群众和游击队心心相印，息息相关。不管敌人的手段多么狠辣，红军游击队只要与群众结成生死联盟，敌人是奈何不了的。

1936年2月初，赣粤边出现了多年罕见的大雪封山。余汉谋为彻底消灭赣粤边的红军游击队，决定向游击区发动更大规模的“清剿”。他下达密令：“要组织一万民众，自带柴刀，火柴和七天的口粮，随军搜剿。违抗命令者，以通匪论罪。”

项英和陈毅截获了这一密令，并对其进行了研究认为：大余、信丰和南康的敌人，不属同一建制，大余是余汉谋的第一师；信丰是余汉谋的第二师；南康是保安队，他们之间不可能协同行动，这些情况和特点要很好利用。项、陈决定来个将计就计：

首先，领导机关进行疏散、隐蔽。项英率特委机关从信丰境内的潭塘坑一带，移至信丰、大庾交界的钟鼓岭隐蔽，工作人员撤出山外，把棚子全部拆毁，消除目标。

其次，组织游击队挺进到敌人后方袭扰。当国民党进山“抄剿”时，游击队潜入粤军后方放冷枪，贴标语，袭击乡公所，抓土豪，骚扰粤军驻地，闹得粤军首尾难顾。

再者，动员和领导群众对抗搜山。

在余汉谋的指令下，粤军强迫大余、信丰、南康等地群众携带斧头、火柴和粮食，分八路向油山游击区进行梳篦式大“搜剿”，每路有粤军或保安团一个连监督，号称“万人大搜山”，妄

① 《赣南三年游击词》，《陈毅诗稿》，第13页。

图将树砍光，使游击队无处藏身。

一天，红彤彤的太阳蹲在东边山头上。雪后的群山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异常清美。山路上出现了一长串老倭，他们人人肩扛竹杠子。隐蔽在茅草中的游击队员看到老倭们身后头戴钢盔，手持刺刀的粤军，明白这是敌人的“万人大搜山”开始了。

老倭们被敌人押到半山坡，一个个都很卖力气地挥动柴刀，砍得竹子、树干震天响。奇怪，砍了半天竹子怎么没倒几棵？仔细一看，老倭们在用刀背敲树。游击队员们禁不住掩嘴偷笑。

“追呀，那边有只狼——”

“快打銃，一只野猪。”

敌人急了眼，“叭”、“叭”、“叭”地朝天开枪：“不准赶狼，打野猪，快砍树！……”

下午，砍山的老倭们把顺手捡的大柴小枝，扎成捆，用竹杠子挑着，被敌人押着往回走。这时，老倭们边走边唱起砍柴的山歌：

呃哟来——呃！

歌送么妹红绫帕，

小小帕儿心意长哟！

……

老倭们在“告诉”游击队：敌人要走了。

等他们走得看不见影子后，游击队员走过去侦察了一番。地上除了砍倒的竹子和树干，还有不少竹杠子丢在地上。

陈毅拣起一根竹杠子，感觉比平常要重，拔掉一端的塞子，把竹杠子倒过来。“哎呀——”原来，竹杠子里装满了白灿灿的大米。

“啊呀——我交了好运，是咸鱼。”

“盐、盐，是盐呀——啊，还有情报。”

大家高兴极了，有的笑，有的跳……陈毅双手叉腰，久久地

望着老倭们消失的方向……

晚上，敌人进了“乌龟壳”以后，游击小队又带着刀具，把电线割下来扔到水塘里，并在电线杆上贴上：“红军游击队第×支队第×大队”的标语。被裹胁进山的群众便跟粤军闹：“你们要我们来搜山，游击队却搜到我们家里去了。我们不搜了，要回去保家。”粤军士兵在山里日晒雨淋，蚊虫叮咬，也叫苦连天。

敌人生怕游击队端掉他们的老窝，加之搜山没有成效，便提前把部队调出山，把被他们胁迫进山的群众解散。

敌人出山，游击队回山。

敌人的“万人大搜山”只折腾了三天，又失败了。

当1936年春播来到时，中共信康赣县委根据项英的指示，组织游击队员和地下党团员发动群众到粤军军营里请愿，要求回山春耕。粤军无奈，只好准许群众回到山里搞生产。这样，游击队又和群众结合在一起。余汉谋封坑的阴谋也告破产了。

红军游击队在坚持斗争中，一个根本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式，就是把立足点放在群众工作的基础上，紧密地依靠人民群众进行反“清剿”。陈毅说：“敌人根本的致命伤，就是我们与群众相结合。”<sup>①</sup>并指出：“在那样艰苦残酷的斗争中，没有人民的积极支持，没有与人民群众生死与共的团结，要想坚持下来是不可能的。”他譬喻说：“我们的全部地盘就是这么几个‘岛子’，但是我们有着浩瀚的海洋作依托，那便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杨大伯是南雄县石满区附近一个贫苦忠厚的农民，已经60多岁了。不管敌人封锁多严密，他总有办法把游击队需要的东西买到手。杨大伯设法把粮食装在竹筒里，把米糕缠在腰上，把新鞋穿在脚上，把烟丝装满烟口袋，给游击队送去。

一年秋天，游击队托他去买传单纸，却一去几天不回，李乐

<sup>①</sup> 《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234页。

天便派人去他家联系。一进门，只见他儿媳妇在饮声恸哭，小儿子也低头抹眼泪，大儿子非常激动地说：“同志，国民党杀不完我们的人，我爹死了，还有我两兄弟！”

原来杨大伯这次到镇上去，由于叛徒告密被抓去了。他在监狱里受尽酷刑，敌人把老人的胡子一根根拔光，然后把他活活地打死在寨门上，连尸首也不让收。

杨大伯死后不到一个月，他的小儿子又因为给游击队买布，在成衣铺被敌人捉住，也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杨大伯的大儿子，决心要为亲人报仇，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谁料想工作不久，竟又落入了敌人的魔掌。

群山环抱，密林遮天的大庾县彭坑，在背山面水的山沟边，有一户独门独户的茅屋，这就是周篮嫂的家。

周篮嫂是个苦大仇深的中年妇女，为人忠厚，又很能干。油山建立游击根据地，她当了游击队的地下交通员。陈毅、项英等来到这里活动时，就住在她家后山上一所小茅棚里。

周篮嫂经常提着竹篮子，假装上山打猪草把油盐菜米送到陈毅住的草棚里。过端午节那天，那提着一篮粽子，高兴地送给陈毅他们吃。陈毅看着这些香喷喷的粽子，深为感动地说：“大嫂，这叫我们怎么感谢你呢！”

“看你这位同志说的，你们要不是为我们穷苦老百姓翻身，请也请不到你们到这大山沟里来呀！”

陈毅呵呵地笑道：“大嫂，你叫什么名字呀？”

她叹了口气说：“唉，这叫我怎么说呢，我从小生在穷人家，还没有取过什么正名，我姓周，小名叫三弟子。”

“闹革命嘛，男女平等，你也该有个名字呀！”陈毅风趣地说，“你常提着这只篮子给游击队送东西，你革命，篮子也革命。这样好吧，你就叫周篮怎么样？”

从此以后，游击队的同志都亲切地叫她周篮嫂了。

一次，陈毅的腿伤复发，周篮把他接到家里养伤。有一天傍晚，陈毅坐在周篮家屋后树底下的石板上看书，警卫员坐在旁边擦枪。突然，周篮家养的狗狂叫起来，周篮抬头一看，一群国民党兵正朝这边走来。

这时，周篮正蹲在门前沟边洗衣服，要赶回屋通知陈毅已来不及了，情况万分紧急。她急中生智，捡起一块石头向狗抛去，大声叱喝：“叫什么，士兵老爷来了，他们会把你打死的。”陈毅一听，知道敌人来了，赶紧从屋后上山，钻进了树林子里。当晚，陈毅翘起大拇指夸奖周篮：“大嫂，你真有法子，当得一个诸葛亮哟！”

像周篮嫂这样的事迹，还有不少。

一次，敌人搜山，来到了项英、陈毅住的草棚前，陈毅已外出，项英来不及躲藏，一位妇女把项英隐藏在附近几米处的草堆里，敌人抓住这位妇女用枪托毒打，要她交出大头目来，她一句话不说，被抓走了。一路上，她不断高喊：“白狗子来了！”“白狗子来了！”陈毅正好外出归来，闻声绕道而走，项英也化险为夷。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群众舍生拼死地支援游击队的故事是说不完的。群众与游击队的这种情谊，是经受了长久的战火锻炼，决不是偶然的。陈毅满怀革命激情，热情地歌颂了这种骨肉情谊：

靠人民，支援永不忘。  
他是重生亲父母，  
我是斗争好儿郎。  
革命强中强。<sup>①</sup>

### 为 我 所 用

1935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由东北扩展到华

<sup>①</sup> 陈毅：《赣南游击词》，第13页。



北，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下降到次要地位。以一二·九运动为起点，全国抗日民主运动一浪高一浪。此时，中央主力红军已经长征到达陕北。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重要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1936年2月，红军渡河东征，开赴华北抗日。

1936年6月，正当红军游击队处境非常艰苦的时候，一个奇怪现象出现了，过去每隔三五天就要进山骚扰一番的粤军，已有六七天不见影子了。各条交通线送来情报，外山群众也纷纷进山报信，都说：“粤军撤回广东去了！”而且走得彻底，所有辎重物资都搬走了，看样子不打算回来了。

究竟出了什么事？突然而来的，想也没想过的好事，从天而降，一下倒弄得大家惊喜不定，迷惘不解。

游击队员们在草丛中三个一伙，五个一堆，纷纷议论起来。有的猜是敌人调防，粤军一走，别的什么军会来接替；有的猜是敌人的诱兵之计，明去暗伏，伺机袭击。……众说纷纭，谁也拿不出什么根据。

项英和陈毅在一起进行分析，推测是敌人内部出了事变。他们急需查阅国民党的报纸，立即派人去各交通站查寻，次日便看到了赣州和南昌的报纸。

原来，广西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广东粤系军阀陈济棠等，利用华北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怒潮，联合发动了“两广事变”，公开宣布抗日反蒋。

于是队员们又转而议论起两广事变来，争论陈济棠是真抗日还是假抗日，两种对立意见，各执一词，相持不下。最后，大家要求项英和陈毅来解答。

为了统一思想认识，部署新的斗争，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召开了有省委负责人、游击队长、交通站长参加的干部会议。

项英在会上分析了“两广事变”的原因和性质，“主要由子日

本进攻华北与红军出山攻打日本，更加推动了全国抗日运动的高涨和对于南京政府不抵抗主义的反对，同时两广军阀与蒋的冲突的加剧，于是两广军阀利用抗日的名义实行反蒋。”他提出要利用粤桂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积极开展游击活动，壮大革命力量。

会议提出了“变军阀战争为抗日的革命战争”的口号，并决定以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的名义发表《为两广事变告群众书》。

会后，游击队宣传队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他们把《为两广事变告群众书》和各种标语、口号分路张贴，甚至还把这些宣传品贴到了国民党的乡公所、联保办事处的门上。一时间，赣县、南康、信丰、大余、南雄和三南等县城圩镇，都贴有鲜明而又及时的抗日反蒋宣传品，不仅震惊了敌人，而且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人们纷纷传告：“共产党的传单！”“共产党没有被消灭，红军游击队还在！”

游击队趁此机会积极开展对敌斗争，适当集中兵力打击保安团和地主武装，以扩大游击区，并派人到游击区外的一些城镇开展工作。

1936年6月23日，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这是中国人民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传统节日。“两广事变”之后，赣粤边地区的局势平稳，红军游击队指战员和当地群众一样，也在欢欢喜喜地包粽子。潭塘坑的地下党员李绍仁，知道项英不喜欢吃带咸味的粽子，就特地给他做了几个白水粽子送去。项英见自己吃的粽子与大家吃的不一样，就问李绍仁是怎么回事？李绍仁对此作了说明，这是他自己亲手做的，没有咸味，正是项英所喜欢吃的。项英非常高兴，边吃边对李绍仁说：“感谢你们，感谢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和支持。”

当天晚上，刘新潮乘着淡淡的月色，带着游击队员悄悄地向大余县的新城进发。五个队员按照刘新潮的吩咐，扛着事先做好的假人先行，选择山丘土埂隐伏行动。

新城敌人的前哨岗楼，突出在一个地势较高的土丘上，视野宽阔，里面有三个保安队士兵放哨。粤军撤走后，保安队加强了戒备。这时一个外号叫小丁子的士兵，站在了望孔前，发现前面田野里有六七个人影，成散兵线向前移动，他立刻叫醒旁边的两个人来看，那两个人一看，立即鸣枪报警。

镇边三个碉堡都惊动了，一齐朝黑影开火，步枪、机枪，“砰砰”、“哒哒”地打了一阵，不见还击，也不见动静，于是停止了射击。

夜又归于沉寂，碉堡里的士兵重新入睡。一两个时辰后，前哨小丁子又发现黑影向前摸来，他叫醒那两人，又鸣枪报警。碉堡里的士兵急忙起身，摸着枪就打，打了一阵不见动静，又都撂枪睡觉。过了一个多时辰，小丁子又鸣枪报警，碉堡里的敌人睡不着觉，都起了火，咒爹骂娘地问是哪个当班，要把他吊三天三夜不让落铺。

小丁子是新兵，两眼圆睁了半夜，眼皮都撑不开，要求旁边二人轮换。这二人都有点来头，一个是中队长的表弟，倚着靠山，推辞说：“能者多劳，还是你看下去！”另一个是老兵油子，倚老卖老：“这个我看得多，你年纪轻，多练练眼力。”

小丁子没法，只得再向了望孔张望，看了一会儿又见黑影上来，他怕自己眼花，擦了又擦，看了又看，对二人说：“你们来瞧瞧，到底是不是人影？”那二人张眼瞧了一会儿说：“是，没错！”小丁子赶紧鸣枪报警。

这一次，三个碉堡都没有回声。不久，保安中队长气冲冲地一脚踢开前哨岗楼的门，叱问：“你们今晚到底开什么玩笑？”

小丁子立正恭敬地报告：“是发现游击队的影子，才、才报警的！”

中队长朝外张望了一会儿，沉静的田野，除了远山近树，什么也没有，他突然转身对小丁子掴了一记耳光：“你看花了眼，再

要乱报警，我关你的禁闭！”说完返身急急地走了。

小丁子摸着发烧的脸，另两个人都嬉笑着说：“这熊掌的味道我们尝得多了。”“打多了脸皮厚了就不怕啦！”

过了一个多时辰，已经是五更天了，小丁子困得要命，又不敢闭眼。他发现前面又有人影移动，一摸脸上，似乎还有些火辣辣的，这一次他不敢轻易报警。看了许久，人影消失了，过了一会儿，人影又活动了。他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又怀疑是神鬼狐仙作祟。他不敢作声，连旁边两个人也不敢惊动。

过了一会儿，门又被踢开了，他心惊肉跳地站起身来，以为中队长又来了；然而进来的却是五六个身着便装的人，手上的枪指着他说：“游击队优待俘虏！”

刘新潮把俘虏交给几名留下策应的队员，自己带着队伍沿土埂下的一条大路，像利箭般奔向镇边，顺利地解决了三个碉堡，进镇占领了中队部，活捉了中队长。

天亮时，全镇都知道游击队不响一枪打进来了，有钱人家闭门不出，贫民、店员、手工业工人则出来探望。只见街上贴满了红绿标语，署着许多番号，什么“油山游击队第三纵队”、“大队”、“五纵队三大队”……不知游击队有多少人。

游击队收缴了敌人的枪支弹药，打开土豪的粮仓，把粮食散给了穷人。这次新城保长碰巧不在家，没有抓到他。

王坑，位于大庾县板棚下（游击区）与池江镇（白区）赤白交界处，是油山地区最大的一个山谷，也是板棚下去池江必经之地。王坑的王保长一向以保护全坑的安全为名，强迫老百姓出钱买枪买弹，并设工厂自造土枪土炮，组织反动武装，他经常带领国民党军队搜山。粤军走后，他严密封锁交通要道，盘查从游击区到池江的过往行人，并威胁当地群众说：“见‘土匪’来了，不打锣报告，就要杀你一家子。”由于王保长积极反共，游击队在王坑一带开展工作特别困难。

陈毅、项英认真作了分析研究，认为王坑的位置很重要，不把它变成游击区，对坚持油山游击战大为不利。王坑的群众多数是向着共产党的，只要除掉王保长，王坑一带的工作就能开展起来。陈毅说：“我找了很久，才找到一个这样的保长。这个人有特色，他有个儿子参加了靖卫团，跟游击队作战，被我们报销了。王坑这个地方地理位置又好，我们何不让他做个‘两面派’呢？”

“你是说，把他争取过来？”项英参加革命以来，看的做的都是两个阶级营垒的搏斗，阵线分明，虽然有俘虏政策，也只是把放下武器的敌人释放。

“这有啥子不好呢？让他当敌人的保长，给我们办事！”陈毅说。

“哦，这就是变被动为主动。”项英融会贯通，立刻悟到这是在革命形势变化时，应当随之而来的策略上的转变。

于是，陈毅决定亲自走一趟。

当夜，陈毅带领几个游击队员悄悄摸进了王坑。群众早已睡下，巡逻放哨的也回家了，全村一片寂静。

王保长这家伙，别看他钱多得很，可在外表上，却装得像个穷苦老倌。他懂得树大招风的道理，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只把岗哨派到坑外，防止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和游击队进坑，自己从不带保镖招摇过市；他又住简屋陋室，穿戴平平常常，日常就拿这些欺骗老倌，说：“我的生活跟大家一样，也是缺吃少穿没钱用，所以要大家出钱买枪，完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了保护全坑的安全。”陈毅正是抓住他装穷相，不要武装保护这个特点，才拿定主意大胆进村的。

陈毅等来到王保长家，轻轻地敲门。

“谁呀？”一个女人的声音。

“自己人，有事找保长。”一个队员装着团丁的腔调回答。

停了一会儿，门开了半扇。一个队员端着驳壳枪，一个闪身，

迈进了屋里，把枪口对准那个女人，厉声喝道：“不许动！”那女人吓得面如土色，两手捂着嘴巴连连倒退。

陈毅大摇大摆地走进里屋，打亮手电筒一看，王保长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正呼噜呼噜睡得香呢。

“快起来！”一个游击队员用枪筒朝王保长脑袋上一捅。王保长从睡梦中惊醒，张口结舌，“你们是……”

陈毅对惊魂未定的王保长说：“王保长，你不是常带国民党兵上山找游击队吗？今晚我们自动上门来了，你打算怎么办？”王保长一听是游击队，吓得全身抖得筛糠一样，赶忙从床上爬了起来，哆哆嗦嗦半天说不出话来。他那死灰色的脸上翻着白眼，瞪着他的老婆：“还不快到外面把狗关起来。”

陈毅一听就知道王保长的险恶用心，冷然一笑，厉声说道：“是关狗，还是叫人来捉我们？你的人都在做好梦，顾不上你了。”

“嘿嘿，哪里，哪里，不敢，不敢……”王保长说完，又对他老婆狠狠瞪了一眼：“还不快把灯点上！”

陈毅从容地点上一支烟，说：“敢不敢，由你自己决定，今晚我们是来和你谈判的，万一出了问题，可别怪我们对你不起罗？”王保长吓得呆若木鸡，耷拉着脑袋说：“是，我有罪……”

陈毅泰然自若地拉过一把木椅坐下，炯炯的目光盯着王保长，开始审讯：“你带白军搜过几次山？”王保长浑身发抖，不敢回答。

接着，陈毅历数了他的一条条罪状，厉声喝问道：“你够不够死罪？”王保长顿时面如土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长官，长官，……”王保长老婆也跟着跪在地上，嘴里叫着，把头磕得鸡啄米似的。

陈毅站起身来，指点着王保长的额头：“实话告诉你——国民党上百万军队我们都见识过，你这个小小的保长，几支土枪土炮，还想消灭我们？真是以卵击石，不自量力。我问你，愿意死还是愿意活？”

王保长一听问他愿死愿活，把头磕得“嘭嘭”响，连声哀求：“愿意活，愿意活……”

陈毅回到椅子上坐下，正告王保长：“既然愿意活，就要答应我们几个条件：第一，不准再带国民党军队搜山；第二，游击队员到坑里来，不准报告；第三，游击队和群众下山买东西或路过这里，不准盘查扣留；第四，你要经常向我们传递情报，不准有半点虚假。”

王保长只顾保命，哪管得了那么许多，陈毅说一条，他生怕“是”字答慢了，一连串地答道：“是、是，一定、一定，保证、保证……”

陈毅向他宣传了党的政策后，说：“我们讲宽大，不杀你，若是你说话不兑现，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小心你的脑袋！”说罢，陈毅叫游击队员把枪插进腰里。王保长一看，长长吐出一口气，大献殷勤，叫老婆烧菜做饭。

吃完饭。陈毅一语双关地说：“王坑距我们的游击区只有几步远，今后见面的机会多着呢。”

王保长是个江湖油子，当然听得懂这话的意思，又是拱手又是哈腰地说：“有用之时，一定效劳，一定效劳……”

从那以后，王保长果真变成了“两面派”，不断向游击队传送情报，王坑就成了“黄色村庄”（介于赤白之间）。这样一来，一方面，既应付了敌人的差使，还可通过他们去了解外面的情况，进行宣传，做瓦解敌军的工作，为将来时局的发展作准备；另一方面，保护了群众的利益，加强了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争取了广大群众的支援，使游击战争得以长期坚持。

接着，游击队先后袭击了大余的青龙、池江、留地；南雄的里栋、水口、乌径、邓坑、北山、新镇；信丰的九渡、大小窝、黄泥排等圩镇敌人的驻地，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在信康赣游击区，信丰游击队在刘符节、刘新潮的领导下，从

游击区中心的上乐、潭塘坑一带，分路出击，一路向大余新城；一路向信丰大小窝、九渡、长安、禾秋等圩镇，一路向南康贤女埠等地发展，打击保安团和地主武装，取得很大成果。

在北山游击区，“北山事件”后，红军游击队、地方党组织、交通站都遭到严重破坏，活动处于停滞状态。两广事变后，信康赣游击队第二中队到北山与当地红军游击队会合，攻打民团，缴获了一批枪支和军需品，重新打开了北山斗争的局面。

在“三南”游击区，崇仙、南山、三南游击队合编为三南游击支队，邓金莲任支队长，张日清任政委。游击队打土豪、烧炮楼、处决劣绅、惩罚保长，使得这一带的民团、保甲长不敢轻举妄动，游击队活动范围扩大了。

在油山游击区，由于敌人残酷地“清剿”，该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损失较大，特别是“火搜山”时，党的干部和游击队曾一度转移，敌人乘机造谣，说红军游击队被消灭了，中共南雄县委和油山游击队通过广泛宣传，夜间深入乡镇贴标语，使群众识破了敌人谣言，同时，陈毅将北山游击队调到油山地区，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团匪，以机动灵活的战术攻打敌人据点，恢复了油山地区的工作。

两广事变后，党的白区工作也有了新的起色。特委在大余新城建立了地下交通站，先后在大余、南雄县城开设了“糖铺”，在龙南县城开设了“铜匠铺”，作为地下工作的据点。另在于都县城开设了一家“裁缝铺”，作为与中共苏区建立联系的联络点。

项英对各地游击队和党组织在两广事变后的积极行动，以及取得的成就甚为满意，认为它标志着赣粤边游击战争进入一个新阶段。

### 新的考验

1936年7月，蒋介石收买了陈济棠的空军司令黄光锐和第一



军军长余汉谋。黄光锐率飞行员40余人分驾数十架飞机投靠蒋介石，余汉谋也发表通电拥蒋。陈济棠被迫下野逃往香港。蒋介石随即任命余汉谋为第四路军总司令兼广东绥靖主任。9月，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妥协，发表和平通电，表示服从国民党中央，两广事变遂告平息。

赣粤边较为平静的形势，只持续了两个月左右，又变得紧张起来。蒋介石委派中央军戴岳第四十六师来到赣粤边再次发起“清剿”。

戴岳，原是国民党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手下的旅长。在第一次“围剿”时，十八师覆灭于龙冈，他只身逃脱后，上书蒋介石，提出一套对付红军的碉堡政策，第五次“围剿”时这一政策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印发给各路部队官佐，一时间国民党大筑碉堡，戴岳也因而得到“碉堡专家”的称号，不久就提升为师长。由于他参加了五次“围剿”的全过程，积累了一套反共经验，加之为人颇有心计，因而这次派给他一个师，接替粤军对游击队的“清剿”重任。

戴岳一到赣粤边，就使出毒辣手段，以堡垒政策为主，辅以隔离和瓦解的政策，三管齐下。

面对国民党中央军新的进攻，红军游击队内部少数动摇分子由乐观变为悲观，错误地认为革命无胜利希望，失去斗争信心。项英、陈毅在信丰的油山召开干部会议，指出：两广事变虽为蒋介石所解决，但它阻止不了抗日革命运动的发展，只要我们相信和依靠群众，正确运用游击战术和斗争策略，就一定能粉碎国民党军新的进攻。<sup>①</sup>

会议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形成了一个决议（称为“九月决议”）。决议号召各游击队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建立抗日统一战

<sup>①</sup>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第196页。

线，并将游击战争和统一战线结合起来。决议指出，做好群众工作和加强白区工作，是粉碎国民党进攻的两个基本条件。要巩固和扩大游击队与广大群众的联系，动员群众力量，粉碎国民党筑碉堡、建民团、编“铲共义勇队”的阴谋。决议规定了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强调党既要正确执行阶级路线，又要积极做争取国民党军的工作，要求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搞统一战线，开展“两面政权”的工作，游击队转到白区活动，开辟新的游击区。“九月决议”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打破国民党军新的“清剿”指明了方向，为以后进入联合抗日新阶段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项英和陈毅决定了采取“孙行者钻到铁扇公主肚皮里去”的战术，派人打入到国民党正规军和民团、“铲共团”的内部做工作，进去之后广交朋友，不断扩大，扩散，使许多地方都有游击队的耳目。

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积极领导群众开展新的斗争。国民党强迫群众在山里修碉堡，便组织群众一拖再拖，或派些老弱妇孺应付，以延误时日。有时等碉堡快要筑成时，游击队在一个晚上把它炸掉了。结果许多地方的碉堡筑了好久，也没有筑起来。敌人无法，只好派军队去筑。群众对出钱办民团，更是拖延和抗拒。对搞起来的民团，就设法派人打入，掌握枪支使它不为国民党所用。

打入敌人内部的工作也很有成效。漂潭钨矿局的矿警队里，有11名矿警成为游击队的人。信丰潭塘坑的锡坑村，国民党筑了炮楼，驻上民团，游击队派进去的人很管用，敌人稍有动静，就托人将情报传出来，游击队从容不迫地转移，或乘机伏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

这样，国民党尽管严加封锁，仍未能将游击队困死、饿死，看来戴岳也无能为力了。

这时，一个奇怪的现象又出现了，第四十六师的搜山行动忽然停止，未修完的碉堡也停工不修，部队却缩进了据点。

这迹象有点近乎“两广事变”后的粤军。游击队员纷纷猜测，有人估计敌人很快会撤走，有人猜测是敌人换防，也有人分析是敌人在搞什么新的花招，制造假象麻痹游击队，然后将要发动更大的进攻。

究竟外面发生了什么情况？项英和陈毅急忙派人找王保长，要他去搞最近的国民党报纸。王保长带来了一些香港的进步报刊，从《工商日报》上才知道，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抓起来了。特别使大家兴奋的是，从报刊上看到了瓦窑堡会议的报导，才知道一年前中央就提出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而且在四个月前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提出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救国的建议。

“西安事变”的消息，振奋人心，大家奔走相告，很快传遍了赣南城乡各地。

随后，项英、陈毅在油山召开了各游击区负责干部会议。他们在讲话中强调说：“从中国革命发展形势看，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抗日高潮很快就要到来。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反动派的阶级本性并没有改变，国民党反动派依旧要消灭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我们绝不能有片刻的松懈。”

会上经过讨论，拟定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斗争口号，并通过了《抗日高潮与我们的任务》的文件。

项英、陈毅估计国民党军队将会发动新的进攻，要求大家提高警惕；同时，把北山游击队从油山调回北山，并将信丰两支游击队转移到北山地区，与北山游击队会合，努力筹款，以迎接新的斗争。

果然，蒋介石采取的是“北和南剿”的策略，不承认南方还有中国共产党的武装，他回到南京，惊魂初定，就违背诺言，下达密令：“务必乘中央与共方谈判之机，消灭共方之武装及地方组织。”蒋介石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把散处在南方八省的游击队

消灭。

接着，蒋介石调集了大批国民党军队对南方各省游击区进行了疯狂的进攻。其中，以反动军阀刘建绪为闽浙皖赣四省“剿共”总司令，率领十几个师的主力部队，向闽浙皖赣边的游击区进行大规模的围攻；以第五十师进攻湘鄂赣游击区，继续以国民党第四十六师进攻赣粤边游击区。

蒋介石又一次扬言要在三个月内消灭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以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削弱人民抗日的力量。“西安事变”后，全国范围内的内战虽已停止，南方各省游击区面临的形势，不是趋向缓和，而是顿时显得更加紧张了。

1937年2月11日是春节，赣粤边正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国民党第四十六师在保安团、“铲共义勇队”的配合下，向赣粤边游击区发动大规模的“清剿”。重点是信康赣地区。

项英、陈毅获得国民党的“清剿”计划后，当即布置了反抄山的措施：立即拆除所有搭盖的棚子，机关工作人员到山外隐蔽；游击队转移到山外，配合当地的秘密游击小组，袭击敌人的后方；警告保甲长不得胡作非为。另外，特委还专门抽调了一批队员，组织几支宣传队，奔赴各地，宣传“大敌当前，枪口对外”，“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革命主张。

部署停当，项英对中共信康赣县委书记刘新潮说：“好嘛，敌人进山，我们出山，同他们换个防好了。”于是，他和刘新潮同警卫班长胡大炳，警卫员曾忠山、丁上淮等一行五人，用兜圈子的办法同敌人周旋。

2月下旬，项英一行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来到大余县新城平原的鹅湾里村。村子处在章水东岸，西岸的新城是一个大集镇，是国民党的区署所在地，有保安队驻守。项英他们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住了三天三夜。

第一天，项英他们在天黑后进村，来到鹅湾里村一个老倭家

里。本来，刘新潮已向老俵交待要保密，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可他们刚进来，就有人来看望他们，而且越来越多，向他们问寒问暖，问这问那，还有的送来红薯干、花生、米果等，像接待亲人一样，他们高兴地说：“反动派造谣说他们在深山密林里住久了，骨瘦如柴，满身長满了毛，像野人一样。现在看到你们，我们放心了。”

群众的热情关心，使项英他们感到无比温暖，但警卫员看到人来得这么多，觉得很危险，就建议转移到别处。刘新潮也有同感，但当他同房东商量时，房东说：“不要紧，你们放心，这里没有坏人。”项英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转移不好，会伤害群众的感情。于是，他们当晚就住在那里。

第二天上午，突然村南狗叫得厉害，是几个敌人进村了。警卫人员顿时紧张起来，因为他们力量单薄，带的都是短枪，且离敌人据点很近。项英很镇静，让警卫员丁上淮找房东。房东说不要紧，随即将他们引到楼上的夹壁墙里隐蔽，半小时后，房东来告诉他们：“刚才是几个白狗子路过这里，抢了几只鸡就走了，没事。”

事后，项英和刘新潮商量，决定转移到北面四里地的周屋村。刘新潮带着警卫员先到周屋，通过地下党员联系，找到一个开明绅士家里。这位开明绅士开始说离国民党军驻地太近，太危险，有些难意。刘新潮作了说明：“正因为这里离国民党军驻地近，不至于引起注意，所以我们才考虑到这里来。”经刘新潮这样一说，绅士也就答应了。项英对刘新潮的考虑和说明，很是欣赏。

第二天晚上，项英一行五人由地下党员领路来到绅士家。绅士家过道间的楼上堆放许多甘蔗渣，就安置他们睡在那上面。

这个过道过往的人很多，门口是个晒场，白天很多人在那里晒太阳，拉家常。他们五个人在楼上既不敢大声讲话，又不敢咳嗽，连大小便也在楼上用尿桶接。事情也真凑巧。谁知那只尿桶

有漏，透过楼板，竟滴到一个过往的人头上了。那人很不高兴地在下面大叫起来：“谁在上面屙尿！”

绅士赶忙出来道歉，搪塞说：“是前几天房子漏雨，我用尿桶接漏，忘记提下来，滴在你身上了，对不起！”

那人说：“是尿，不是水，还有臊气哩！”说着走开了。

项英他们在楼上听了楼下的对话，又惊又笑。不一会儿，绅士上楼把漏的尿桶换了，这场虚惊才算过去。

国民党军这次进山抄搜，因没有发现什么情况；群众也嫌“过年乱走不吉利”，吵着要回去，加上传说山外发现了游击队，因而原定五天的进山抄搜，只三天就撤兵回营了。

当信康赣地区军民进行反“清剿”时，各地红军游击队作了积极的配合，打击民团，捉拿土豪，有力地配合了这里的反“清剿”，反搜山斗争，不幸的是，中央军区参谋长李乐天，在这期间遇难。当时项英、陈毅考虑到三南地区的斗争特别艰苦，便派李乐天带着游击队小队长“猛张飞”和一个管理员、两个交通员，前往三南指导工作。

李乐天他们到达三南地区后，没能与当地党的地下交通站和红军游击队联系上，在山上住了四五天，随身带的干粮也吃光了，警卫员下山到小河附近弄饭吃，不幸被国民党保长发现，他们便在小河一带布置了暗探。

第二天，当李乐天和随行人员下山时，被敌包围起来。为了掩护“猛张飞”等随行人员，李乐天单独与敌人周旋。最后他被足足一个连的兵力团团围困，李乐天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当李乐天遇难的噩耗传到游击队时，他的妻子、女游击队员吴丙秀抹了抹眼泪，对她的战友陈妹子说：“姐姐，你们不要替我难过，我挺得住的。我们南雄有首山歌：‘砍了竹子有竹笋，拗了竹笋有竹根。’只要把游击战争坚持下去，总有出头的日子。”

吴丙秀是丙辰年生的，子是取名“丙秀”，丙秀与李乐天青梅

竹马，从小在一个村子里长大。婚后，丙秀受丈夫的影响，参加了游击队。1937年4月的一个晚上，丙秀在小汾开展工作时，住在一个姓黄的老百姓家里。天未破晓，从南雄来的“铲共团”突然包围了小汾。丙秀为了不连累群众，急忙从屋后的一个菜园突围，翻越围墙后被蜂涌而来的“铲共团”杀害。

李乐天夫妻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用鲜血谱写的光辉业绩，永垂不朽！

在这一时期，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已遍及全国，团结抗战的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广泛响应；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虽然处境依然非常困难，但相对来说，比前两年要好些，而且有反“清剿”斗争的丰富经验，应付比较自如。敌四十六师的两次大规模的“清剿”，在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打击之下，又失败了。敌人的部队无可奈何地从信康赣山区撤回去。

### 梅岭脱险

1937年4月底，叛徒龚楚、何长林又阴谋策划了一个梅岭事件。

从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之后，红军游击队已经在密林深山里转战了四个年头。除了突围前收到党中央的两份电报以外，南方各游击区就一直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项英、陈毅与南方其他游击队之间的联系也完全被隔断。

微石终能填血海，大军遥祝渡金沙。  
长夜无灯凝望眼，包胥心事发初华。

在那漫漫的长夜里，陈毅曾多次写信给鲁迅和茅盾，多方寻求同中央联系的途径。可是，一封封信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一天，赣粤边特委接到内线交通员黄亚光送来的一封机密信。

信中说：党中央派人来了，带来了重要指示，要负责同志到大余城南一个饭店里会面。写信人是陈海。

陈海，又名陈宏。原系湘鄂赣苏区派出做兵运工作，在国民党第五十师当兵，并当上了政治训导员。后因身份暴露逃到赣南，通过关系找到中共信康县委。1935年10月，与赣粤边特委接上了关系，被派入粤军余汉谋部继续做兵运工作。两广事件后，又转入国民党第四十六师做兵运工作。陈海曾多次上山汇报工作，还带来一些香港、上海出版的国民党报纸。

听到党中央派人来了的消息，大家都喜出望外。陈毅看信后，和项英商量了很久。他对这封信是怀疑的：既然中央来人了，为什么不把他带上山来？可是又一想，如果真的来了人，我们不下山会面，那不就错过了和中央联系的机会！

明知此行有风险，急切的心情促使陈毅决心亲自进城，准备先查清陈海的虚实，再见机行事。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陈毅穿上一件长袍大褂，装扮成一个教书先生，只带了熟悉道路的区委书记黄占龙前往大余县城。项英等人则留在梅岭斋坑等候消息。

陈毅进县城后，没有直接去“广启安”糖铺，而是先去陈海家看看动静。他俩来到陈海家门前，见一妇女正在洗衣服。黄占龙估计她是陈海的老婆，便问：“陈海先生在家吗？”她连头也不抬，神气十足地答道：“到团部去了。”黄占龙把“团部”误听为“糖铺”。

陈毅和黄占龙一起，直往广启安糖铺走去。刚拐弯，不禁一怔，只见一队国民党兵从另一个方向朝那个“糖铺”走去。两人急忙躲进一茶馆，若无其事地坐下来喝茶。这时，在“糖铺”工作的老曾走了过来，悄声地对陈毅说：“陈海叛变了！昨天他带着国民党兵把店里的黄亚光也抓走了。你们快走吧！”

这时，大街已经开始戒严，国民党兵正在街上盘查行人。陈毅使了个眼色，黄占龙立刻起身，转入小巷，穿过一家老百姓的



小屋，从小路绕出城去，顺原路往回走。他们刚翻过一座大山，发现对面山上到处是国民党兵。为了便于隐蔽，两人分道而行。

原来，陈海向项英、陈毅汇报工作后，在离开梅岭的途中被捕叛变。他讲出了红军游击队在大余县城的“广启安糖铺”、地下交通站和内线交通员黄亚光，以及赣粤边特委的情况。龚楚、何长林为讨其“主子”的欢心，便利用陈海，设下圈套，假称中央来人，诱骗项、陈下山。

陈海把信送出后，便在大余县城等候游击队负责人下山。一时没有等到，他便带着国民党军队包围了红军游击队的指挥机关驻地——梅山的斋坑。

当时，项英的警卫员曾忠山正值岗哨，发现敌人包抄时，立即鸣枪报警，项英、杨尚奎、陈丕显、刘新潮等闻声冲出棚子，躲进草莽深处。敌人搜索不着，只发现一个女交通员彭妹子，任凭敌人殴打、折磨，彭妹子不曾透露半点秘密。到傍晚时分，敌人毫无所获，只得把彭妹子押到大庾交差。

正当国民党队伍往山下走时，陈毅刚好辗转回到梅山。他不知道斋坑已经出事，所以一个人信步走着，迎面正撞到下山的国民党兵。陈毅被一把抓住，要他带路“去抓陈毅”。

陈毅把两手一摊，推说道：“我是外地人，对这里的路不熟悉。”

“不是本地人，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我在城里教书，到这里来买点茶叶。”陈毅知道梅山盛产茶叶，不慌不忙地回答。

“少罗嗦！教书也好，买茶叶也好，先给老子带路！”一个白军把枪栓一拉。

无可奈何，陈毅只好往回“带路”。白军军官听陈毅说是教书先生，又见他很从容，也就相信了。便一路走一路与陈毅攀谈起来，显示自己有点学问。

陈毅一边与敌军官搭讪，一边寻找机会脱身，陈毅看见一个

茅厕，便借口肚子痛要上去茅厕。陈毅钻进茅厕，一猫腰就从茅厕后面的山坡潜入一个山洞里隐藏起来了。

国民党军等了一会儿，不见“先生”出来，便进茅厕察看，看到茅厕后有个大破洞。这时，他们才明白过味来，这位“先生”器宇不凡，很可能就是他们日夜要找的游击队“大头子”。于是，立即调兵层层包围梅岭，放火烧山，一时间烈火熊熊，眼看就要烧到陈毅潜藏的山洞了。陈毅紧握着子弹上膛的手枪，一动不动，两眼盯着洞外近在咫尺的敌人，作好了突围的准备。

谁料天下真有这等巧事，正当万分危急之际，忽然天上乌云翻滚，狂风大作，雷电轰鸣，哗啦哗啦落下倾盆大雨，很快把火苗浇灭了。敌人淋得像落汤鸡，怏怏不乐地走了。陈毅藏在山洞，眼看大难临头，却被一场狂风暴雨救了驾。事后他风趣地说：“这真是托马克思在天之灵啊！”

陈毅怕敌人会“杀回马枪”，到了午夜，才走出山洞，一口气走了30多里，越过几重山，来到斋坑北面的山里。

果然，敌人知道梅山住有游击队的领导机关，第二天天刚亮，就出动四个营的兵力重重包围了梅山。敌人带着军犬、探照灯，在梅岭日夜搜剿，整整折腾了20多天，仍一无所获，只好又放火烧山，悻悻而去。

在梅山被围困期间，陈毅躲在山洞里，眼看无法突围，生死存亡也许就在此时了！陈毅慷慨启笔，写下了豪气冲天的“绝笔”——《梅岭三章》：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陈毅草就诗词后，即藏在衣底，准备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敌人摸不清虚实，不敢贸然行动。每当夜幕降临时，陈毅就乘机转移，在梅岭与敌周旋。身上带的粮食吃光了，就用手挖开地皮，找出一些白色的丝茅根，放在嘴里咀嚼。这样坚持20多天，最后终于跳出包围圈，转移到南雄游击区。

梅岭脱险后，陈毅和项英等会合，再次领导各地区党组织和游击队，粉碎了敌四十六师的又一大规模“分区清剿”。

1937年7月初，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鉴于“分区清剿”仍无济于事，便将保安团一部配给各县作政治警察队，准备作新的进攻，正在此时，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第四十六师对赣粤边游击区的“清剿”，被迫于7月11日停止。

至此，项英、陈毅和中共赣粤边特委领导的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终于度过了艰苦的岁月。

## 二 汀瑞边游击队

### 走出“虎狼窝”

汀瑞边游击队，系指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以后，坚持在长汀、瑞金边界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

长汀，位于福建省西部；瑞金，位于江西省东南部，互为邻省邻县。汀瑞边界以武夷山脉横断其间，汀、绵两江分贯其境。这里山高林密，地形险要，土地肥美，物产丰富，是开展游击战争

的好地方。瑞金号称“红都”，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说古代建县时掘地得金，遂称“瑞金”。瑞金位于武夷山西侧，是丘陵地带。

1927年8月，朱德在南昌起义失利后，带着部队南下，曾攻占瑞金。此后，红军又多次占领过瑞金，不过，据守的时间都不长。1931年9月下旬红军进入瑞金，从此在这里站稳了脚跟。

1931年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节，这天被选定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日子。因为担心蒋介石部队的飞机会前来轰炸，欢庆活动特选在夜里。

入夜，往日各家门户紧闭，黑漆漆的瑞金县城，忽地冒出一团团耀眼的火光。人们手中举着用废旧竹杆和篾索做成的火把，也有很多人手中提着灯笼。灯笼有红色、黄色的，有的灯笼上贴着红五角星和镰刀斧头图案。

人们涌上街头，汇成一条闪光的河流，朝着城东北流去，流到离县城六公里的小村——叶坪，汇聚在那儿的谢家祠堂。

谢家祠堂又大又高，始建于明朝，那木柱、板壁都已变成棕褐色，今日却热闹非凡。祠堂左侧的防空洞里，一台发电机在隆隆作响，使挂在祠堂里的一串串小灯泡射出明亮的光芒。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正中挂着一面红旗，旗上是五角星和斧头镰刀图案，右侧是马克思像，左侧为列宁像。用红布做成的横幅上写着“工农堡垒”、“民主专政”。大门口的横幅上则写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中华工农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全苏一大）在叶坪村谢家祠堂里召开。全苏一大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诞生，定都瑞金，改瑞金为“瑞京”。这样，瑞金成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

那座谢家祠堂里，用木板隔成一个个小房间，每个房间只有一张乒乓球桌那么大，门口挂着一个“××人民委员会”的牌子。

每一个小房间，便是一个部的办公室。虽说那一间间简陋的办公室，还不及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个部的传达室，但今日的一个个部却是由那一个个小房间发展而来的。

长汀是闽西重镇，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成立的地方。

1929年5月19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二入闽西。毛泽东第一次到闽西的时候，一位文雅而精明的青年男子从上杭县城北上，前往长汀县城寻找他。此人名叫邓子恢。在闽西一带，组成了一支以伍中豪为军长，他为政治委员的革命队伍，后编为红十二军，留在当地继续斗争。红四军再入闽西与红十二军会师。1930年6月，在长汀，以红四军为基础，和红三军、红十二军合编，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朱德为总指挥。这“政治委员”一词，是周恩来沿用苏联红军建制，改掉了红军中原设的“党代表”。自从毛泽东出任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于是人们就称他为“毛委员”，在此以前，人们对他的习惯称呼为“毛党代表”。

瑞金、长汀的人民群众勤劳朴实，政治觉悟高，在扩红支前，发展生产方面作出了显著的成绩，有力地支持了苏维埃政权。

1934年10月，驻在长汀、瑞金的红军正规部队随着大部队西征，进行战略转移。

中央分局根据当时中央指示，把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划为最基本的游击区和最后的坚守阵地，将汀瑞边游击区，划为河东、河西两个作战区，以绵江为界。

河东区属福建军区领导，辖武阳、王田、日东、云集、合龙、下肖、城关、下州和福建长汀的古城、四都、濯田等地，以火星寨、白竹寨为基点；河西区属中央分局直接领导，辖于都宽田、沙兴、基银坑，瑞金木不、禾安、九堡、下宋、官仓、黄柏、隘前、渡头、瑞林，宁都黄石贯、碓坊等地，以铜钵山为基点。

随着主力红军的长征和敌人进攻的加紧，“三角地区”也坚守

不住了。1934年11月1日，国民党军李延平部占领长汀。11月10日，占领瑞金。

敌军迅速控制了交通要道，日夜不停地构筑碉堡、战壕、炮楼，网罗土豪劣绅，组织民团、还乡团、铲共团、“剿共委员会”、“没收委员会”等反动组织，严密保甲制度，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不到一个月时间，汀瑞边的区、乡、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大批区乡干部、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江西保安第四团团团长欧阳江，在瑞金武阳一夜之间就屠杀500多名革命群众。长汀四都楼子坝有个村庄143人，只剩下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整个村子被洗劫一空。在“茅草过火石过刀，扫帚筛子也过斩”的反动口号下，汀瑞地区很多村庄成了“无人村”、“血洗村”，其惨状目不忍睹。

1934年12月，留守红军部队接连遭受重大损失之后，项英同意了陈毅关于战略转移的意见，并由陈毅起草一个文件下发，命令各地转入游击战争。由于许多地方被敌人隔断了，无法联系，只有瑞金县委接到了文件。

接到中央分局指示后，瑞金成立了党的特委，中央分局调闽赣省委书记赖昌祚任特委书记，钟天禧任保卫局长，钟德胜任少共特委书记。同时成立瑞金县游击司令部，刘连标任司令员，杨世珠为主席兼政委，邱世桂任副司令员。

瑞金特委下辖瑞金、两江、瑞西三县党组织。当时瑞金特委领导下的地方武装，每县有一个独立营，共1000多人。以县独立营为基础，各县有若干区游击队。瑞金县15个区，都成立了以党团员为骨干的游击队，每队100人左右。

福建军区对闽赣边的游击战争也作了准备。1934年11月，由福建军区出面，把长汀的古城区与瑞金的陶阳区合并，成立陶古区委、区游击队，由彭胜标任区委书记兼游击队政委，胡荣佳任区委副书记兼游击队司令。陶古游击队共有120余人，在汀瑞边

界开展游击战争。与此同时，福建军区还决定成立汀瑞会县游击司令部，由张开荆任司令员，周桂生任参谋长。并组建了汀瑞会县独立营，共300多人。

1935年2月，形势十分严峻。中央分局党政军机关及所属部队，被敌人包围在仁凤山区。接到中央“二月来电”，项英和陈毅组织部队分9路突围，离开了狭小的仁凤山区。

此时，瑞金县游击司令部也被敌人围困在瑞金的安治前。

中央分局及所属部队突围后，瑞金特委和瑞金县游击司令部就同中央分局失去了联系。

1935年3月，敌人以三个师的兵力，向铜钵山区发动疯狂的“进剿”。敌人除用严密封山、移民并村及烧杀抢的“三光”政策外，还伪装成红军游击队，四处残害百姓。

敌人供认：“自本师到达瑞金后，除组织侦探网外，另有游击队之派遣。其方式不一，或一日派遣数次；或数日派遣一次；或于拂晓前，或于黄昏后派遣；或取迂回道路，或埋伏待机；或冒雨急袭，或夜袭；总是利用天候地形情况而变更部署，用当地民众以为向导，……”<sup>①</sup>真是无所不用。

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和假游击队的频繁活动，红军游击队被困在山上多时，过着“天当被，地当床，野菜野果当主粮”的野人般的生活。

敌人扮作“游击队”活动，常常半夜去敲群众的门，只要群众开门，敌人的回答便是“刺刀”、“坐牢”。老百姓真假难辨，只好关门自保，把所有来人拒之门外。这给红军游击队带来很大的困难。一次，游击队又断粮了。铜钵山山麓有一户老猎人，游击队初来时，曾找他买过粮食。现在饿了两天没办法，钟得胜带着几个队员去找他，老人一粒粮食也不给。赖昌祚对钟得胜说：“要

<sup>①</sup> 国民党陆军第十师特别党部1935年1月编辑出版《收复瑞金纪事》。

做政治工作嘛，动员他支援。”钟得胜说：“说破嘴皮也没用，不信你自己去看看。”赖昌祚不信，决定亲自出马。次日天黑后，他带着钟得胜等一班人下山。待他们一接近茅屋，狗便狂吠起来，柴门立时“吱呀”一声关上了。走到屋前时，狗从窠洞钻进屋，但仍在里面狂叫，一会儿被主人轻声喝住了。

赖昌祚上前敲门，边敲边说：“老大爷，我们是游击队，过去你支援我们，我们十分感谢。现在有事找你，请开开门！”

老猎人瓮声瓮气地回道：“过去怪我瞎了眼，没弄清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共产党游击队嘛！”赖昌祚诚恳地说，“请打开门来吧！我们有话跟你谈。”

“就在外面谈吧！”里面人毫不客气。

赖昌祚便耐心地进行宣传，说了许多革命道理，说得口干唇焦，里面仍无反应。

赖昌祚问：“老大爷，你听到了没有？”

“你们到底要做什么，直说了吧，不要吵人瞌困。”

赖昌祚只得说：“我们已经断粮三天了，请再支援一点粮食吧，可以多给你一些钱。”

屋里人干脆地回道：“没有！莫说我们自己吃粮困难，就是有粮也不给你们。用金子换也不给你们。”

“这么说，你变了！”赖昌祚声音有点发颤。

屋里人说：“我是变了，过去怪我自己瞎了眼。废话少说，快走，不给就是不给。”

屋里从此再也没有声息，大概老猎人上床睡觉了。

赖昌祚喟然长叹一声，带着队员垂头丧气地走了。

归路上，钟得胜劝赖昌祚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与其在山上饿死，不如下去开展斗争。”

赖昌祚说：“我们当然不能坐以待毙。我另有主意，明天再说。”



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和摆脱如此恶劣的环境，赖昌祚决定，部队由铜钵山向河东突围。否则，可能全军覆灭。突围中，因集中行动目标大，很快被敌人发现，遭到炮火的阻击。除钟天禧领导的政治保卫局和钟得胜领导的县委机关冲出了封锁线外，其余部队又退回铜钵山区。

赖昌祚决定把部队分成三路，进行分散突围：第一路由邱世桂、赖昌祚带领，经下宋、野山嶂到白竹寨；第二路由独立营营长杨世发带领，经石罗岭、黄鳊口至福建；第三路由刘连标、杨世珠带领，经观音寨、黄柏至太阳山。

在突围过程中，刘连标为掩护战友而英勇牺牲；杨世发、杨世珠被冲散，与游击队失去联系；邱世桂回到武阳转入地下工作；赖昌祚带领部分游击队员辗转至瑞金西南部的丝茅坪，与钟得胜会合。经过两次突围，部队由1100余人减到200余人。

1935年5月，由瑞金特委书记赖昌祚主持，在丝茅坪召开了为期半天的瑞金县委扩大会议。会议认为，部队集中活动，容易暴露目标，粮食给养困难，必须分散活动，化整为零。赖昌祚提出“保存实力，分散活动”的方针。

这时，汀瑞边的游击队共有五支：赖昌祚、钟得胜领导的瑞金游击队；胡荣佳、彭胜标领导的陶古游击队；刘国兴领导的武阳游击队；张梯等领导的兆征县游击队；张开荆领导的汀瑞会游击队。此外，中共中央分局委员李才莲率领的独立七团，因去闽赣不成，也来到汀瑞边，与赖昌祚、钟得胜等会合。他们在失去上级领导、互相隔绝的情况下，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独立自主地开展了游击战争。

### 艰苦卓绝散复聚

陶古游击队系由陶古区（瑞金县的陶阳区与长汀县的古城区合并而成）所建立的一支队伍，原属新成立的兆征县委领导。但

国民党第三十六师侵占长汀后，兆征县委被破坏，县独立营被打散，队员只剩下张梯、刘某等五人，于1935年4月找到并加入了陶古游击队。故游击队一直由陶古区委领导，彭胜标任区委书记兼游击队政委，胡荣佳任区委副书记兼游击队司令员。游击队下设三个排，一个侦察班，共120余人。

1935年春，敌人对汀瑞边的游击队实行分区“清剿”。为了保存力量，陶古游击队全部转移到猪仔寮山上隐蔽。猪仔寮山，晴天的打扮是头戴云帽，腰缠雾巾；一到梅雨天，就全身隐没在天际，一片迷茫。当时，福建省工农民主政府副主席张世垣叛变，他知道游击队的底细，游击队只好日夜不停地向深山密林里转移，想尽一切办法摆脱“追剿”的敌人。

花草萋萋，泉水咚咚，云幔雾帘，人烟隔绝，这里没有敌人，游击队有如置身于缥缈虚无的世外仙境。可惜的是，这里十分缺乏他们生存的必需物资——粮食。因为这里没有群众。

游击队员每天夜晚都住宿在森林里。没有棉衣，更没有棉被；几天吃不到一粒米，下雪天连野菜也找不到。100多人全靠竹笋、野菜、野果充饥。

对这样艰苦的生活，战士们没有一句怨言，但对光跑路不打敌人，却不满意，不断地向彭胜标提意见：

“跑到什么时候为止啊！”

“红军可没受到过，这种窝囊气！”

战士们这话对彭胜标触动很大，他那原来就瘦瘦的脸越来越长了，一对机灵的眼睛深陷下去。显然他比谁都焦急。

一天，部队到达一个地方休息，布岗之后，战士们就呼呼地睡起来了。彭胜标绕着树林看了一遍，100多个战士个个头发有2寸长，年轻人也长出了老长的胡子，嘴唇由于缺乏营养爆起一层层干皮，嘴一动就显出浅红的血丝。他们都经过战斗的考验，是革命的本钱呵，怎样才能为明天的战斗保存好这一批力量呢？

“100多个战友……”彭胜标不断地思索着，突然思想一动：“难道100多人都想不出好办法吗？”

在一个大山坳里，游击队召开了民主生活会。经过民主讨论，作出了既反对拼命主义，又反对逃跑主义的决定，首先要摆脱敌人，保存有生力量，然后尽一切力量与群众取得联系，展开群众工作，逐步扩大根据地和活动范围。与此相适应，规定了一套迷惑敌人和摆脱敌人的办法，如每次出发分成几路前进，规定了各个集合点，下雨、下雪时行动由少数人把脚印弄乱，分几路回队等等。

1935年夏，敌人以为游击队已被逼得无路可走，被困死在山上了，于是就把主力撤走，只留下各县的保安团和一个以叛徒王才梯为首的特务组织——别动队来对付游击队。

游击队得知这一消息，真是又恨又喜，恨的是数月以来，敌人欠下的累累血债还没偿还，就让他们撤走了；喜的是龙出海、虎离山的生活就要结束了。

为了打响下山第一炮，彭胜标和胡荣佳经过缜密的考虑，选择了猪仔寨山下的苦竹联保办事处来开刀。

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游击队来到苦竹外围。这时正是敌人的“太平盛世”，他们撤最后一班岗哨时，正好作了游击队的向导。

游击队在月亮的阴影下绕过敌人的碉堡，随着“向导”进了联保办事处，先取了武器，一阵吆喝，就拖出了几十个人。他们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哀求饶命，嘴里还不住地喊“老彭”、“老彭”。原来这些人中有几个过去和彭胜标一起工作过，而后来成了叛徒。

奇袭苦竹联保的故事像春风一样，吹遍了根据地，人们掩饰不住内心的高兴，议论起“红军回来了”的消息。游击队又趁热打铁，一连干掉了几个联保办事处，杀了一批恶霸与叛徒。部队情绪日见高涨。

1935年10月下旬，张开荆带领汀瑞会游击队剩下的8个游击队员来到了猪仔寮，找到了陶古游击队。

张开荆，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周恩来的学生。他是江西吉水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团政治委员，游击纵队司令员，红十二军第三十四师政治部主任，福建军区动员部长等职。主力红军长征后，福建军区组建汀瑞会独立营，张开荆任营长。在敌人大规模的“围剿”过程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独立营被敌人冲垮，只剩下张开荆等16个人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到长汀猪仔寮一带寻找自己的队伍。

张开荆领导着这支16个人的小队伍，常常夜行昼伏。特别是雨天，正是他们行军的好时机。雨声大，游击队走动时的脚步声全湮没在大雨中。四面是敌人，稍有不慎，随时都有遭到“剿杀”的危险。但是，敌人戒备最严的地方，也是他们最易麻痹大意的地方。张开荆就利用敌人这个弱点，出其不意地从他们的心脏里穿过去。由春天走到夏天，从穿棉袄到穿单衣；由炎夏走到凉秋，山间枫叶碧绿变为丹红。

终于，张开荆带领剩下的八个游击队员来到猪仔寮，找到了陶古游击队。八人中还有一个年轻的女游击队员，她就是张昭娣。闽西的妇女最会唱山歌，就是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她也经常轻轻哼唱：

日头落山心莫慌，夜里没日有月光。  
月光没了有星子，星子没有天大光。  
不怕雨来不怕风，不怕天寒又地冻。  
待到梅花报春讯，深山树木尽退冬。

经她一唱，游击队顿时生气勃勃，群情高涨。

张开荆他们被单独编成一个班。从此，陶古游击队扩大到50

多人，40多条枪，成为汀瑞边游击队中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一支。

狡猾的敌人总是制造种种障碍阻止游击队的发展。有一次，国民党第十师开来后，驻了几天就走了。等敌人走后，游击队来到山下活动。但刚到一个村庄，群众就跑光了。再到另外的村子里，情形也是这样。这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白军这次进山，到处伪装“红军游击队”。一天晚上，一个叫癸根的敌排长带着一排“红军”，来到猪仔崇山边的雷坪村。癸根命令他的一排人马分散到各户群众家。然后，他亲自带着一个小兵来到一户老百姓家。

癸根对老婆婆讲：“大娘，我们是红军游击队，在山上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吃的了，有吃的么？”

老婆婆应声“有”，起身去一角取一只篮子，从中拿出五六个野菜米果，分送给癸根二人。

癸根接住咬一口，粗糙而带苦涩味，下不了咽，不再咬第二口了。他踱到老婆婆面前问道：“你家还有什么人？”

老婆婆说：“儿子到你们队伍里去了，只有我和媳妇两人在家。”

“媳妇呢？”癸根走到竹筋泥壁隔开的住房前，探头望望里面，见有两张铺，不由面露喜色。

老婆婆不自在地应道：“她，她回娘家去了。”

癸根看她神色不对，也不说什么，背着手出棚去小解，绕棚走了一圈，发现一侧有道老屋土墙，与棚壁形成夹层，上面推着茅柴。他心中有数，回到棚内，直奔有夹墙的地方，拉开一块篾笪，钻进上半身，拉出一个人来。用电筒一照，是个十七八岁的女人。他一手搂抱着，伸过头去就要亲。

那媳妇惊叫着挣脱癸根的手，躲到老婆婆身后去了。老婆婆要不是亲眼看见，简直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她举起颤动的手，指

着癸根说：“你，你怎么能做这种事！”

癸根说：“游击队也是人，要吃，要睡，要女人！我们在山上实在熬得苦，你媳妇又在这里抛荒，让开吧！”

“你，你们变了！”老婆婆气愤地叫起来。

“我们问来如此！”癸根回道。

“那，那你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哪里去了？”老婆子怒问。

“那是明处宣传的，暗处嘛，谁也免不了这个那个。你让开吧，别这么小气！”癸根说时用手一拨，老婆子跌撞到一边去了，他抓住那媳妇的手就拖，媳妇死命赖在地上，他便俯身抱起，进泥壁后面的卧室去了……

这天晚上，散处在各家的匪徒，都干了坏事。他们像怕光的山鼠，天亮前就集合走了。接着，敌人到处造谣说：“红军变了”，“杀人不眨眼”等，破坏游击队与群众的血肉联系。

这使游击队更进一步认识到群众工作的重要性。游击队刚出山时只想到“报仇”、“报仇”，没有更多的注意群众工作，以至被敌人钻了空子。

怎样瓦解敌人的基层政权，攻破敌人的阴谋呢？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游击队先后抓来一些联保主任，给他们定了五个条件：（一）随时给红军送情报；（二）红军来时不准向国民党报告，走了再报告；（三）不准压迫老百姓；（四）保护红军家属的安全；（五）帮助红军买弹药、药品、手电等。从此，汀瑞边的形势渐渐好转起来，游击队真像蛟龙归大海一样的自由自在了。

1935年12月，游击队又先后三次攻打蓝田联保办事处，打死了伪保长，缴获长短枪20余支。这些斗争影响很大，不仅团结了基本群众，还争取了一些保甲长为游击队办事。

与此同时，游击队的党组织还开展了建立健全地下党组织的工作，一些失掉关系的党员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有了群众又有了地下党，游击队真如猛虎添翼。大股敌人来

了，游击队就上山；敌人走了，游击队又下山，找机会干掉几个联保办事处，不断扩大游击区，发展游击队。

陶古游击队发展壮大消息，传到瑞金游击队和武阳游击队，对他们鼓舞很大。

1935年5月底，瑞金游击队迁到王田。不久，游击队被敌发现，折向九堡，在大柏地冬瓜窝与敌人两个团遭遇，因寡不敌众，钟天禧和部分游击队员在战斗中牺牲，中央分局委员李才莲也不幸遭叛徒杀害。部队回到九堡，依然在山上隐蔽。

为了统一领导，游击队合编为一个大队，由钟得胜任大队长兼政委，温华桂（温端兴）任党支部书记。大队下设三个分队，由杨洪才、梁桂荣、刘德胜任分队长。

6月底，游击队从九堡折回大柏地乌坑，找到了地下党员廖森章，并通过他与地下党负责人邓友鹏取得了联系。邓是个“白皮红心”的人，从他那里了解到敌人的一些情况。在廖森章的安排下，游击队在乌坑休整了一个多月。

这时，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钟德胜率队在瑞金至宁都的大柏地公路上，伏击了一辆国民党的军车，打死了敌团长谢存道以及敌士兵十多个，缴获长短枪十余支，取得了铜钵山失败以来的第一次胜利。

同年10月，瑞金游击队从乌坑转移到罗汉岩活动，队员有50余人，在这里建立了立足点。游击队杀了附近村庄的三个罪大恶极的地主，击毙合龙伪乡公所的五六个乡丁，没收了王田大地主李秀珍的粮仓，大灭了豪绅地主的威风，大长了游击队的士气。

1936年夏，游击队被敌人发现。钟得胜带领游击队撤出罗汉岩，向福建长汀上下稳地一带转移。特委书记赖昌祚因患严重胃病，被秘密留在罗汉岩的一块大岩石下养病，由颜炳南、熊德效、温华桂、傅伯全护卫。一天，颜、熊、温外出执行任务，傅伯全竟起谋财害命之心，将赖昌祚杀害，并将赖身上的钱物洗劫一空。

赖昌祚的牺牲，是汀瑞边三年游击战争的一大损失。

1936年冬，瑞金游击队几经折损，仅存30余人。但人员精悍，装备齐全，除长枪外，还有1/3的游击队员配有短枪，战斗力较强。

武阳游击队系由武阳区、下州区两支游击队合并而成，武阳区委军事部长刘国兴任司令员，有男女游击队员100余人，30多支枪，活动在武阳的猪坑一带。

1934年底，敌人对武阳游击队进行“清剿”，强迫移民并村，搞“十家联保”，实行经济封锁。由于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被暂时切断，生活得不到接济，游击队日夜隐蔽在山上，只好摘野果，挖野菜充饥，没有房子住，就砍竹、割草、剥杉树皮搭寮（棚）代替，生活非常艰苦。

1935年3月，敌人“清剿”到猪坑，游击队转移到勾脚山。为了减少伤亡，刘国兴决定精简人员，特别是女队员，规定愿回家或投亲靠友都可以，但一定要保守秘密。经过几番动员，2/3的队员含泪离开了游击队。留下的30多个游击队员，继续在武阳附近的山上隐蔽。

由于敌人采取“梳篦式”的战术，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搜剿”，使游击队员难以避开敌人的锋芒，以致有些队员牺牲了，有些失散了，有的叛变了。到1935年5月，游击队员只剩下刘国兴等三人。不久，又有一个队员牺牲。刘国兴和另一名游击队员，凭着崇高的革命理想，顽强的革命意志，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继续在山上坚持奋斗一年多，好不容易保住了武阳游击队这面革命红旗。

西安事变以后，驻瑞金的国民党正规军陆续撤出，驻在各区的保卫团先后调往县城，武阳一带出现空隙。刘国兴抓紧时机，扩大队伍。他先找到几名失散的游击队员，后又吸收几名年轻力壮的新队员，共计十五六人。于是，武阳游击队又重新活跃起来。

1936年12月20日，刘国兴率队攻打小布坑联保办事处，击



毙地主刘国保和伪干事一名，打死打伤敌兵七名，缴获了食盐等一批物资。此后，又逐渐恢复了武阳、梅岗、王田、四都等地下党区委组织。

### 党代表来了

西安事变后，国内形势发生变化。1936年底，驻瑞金的国民党正规部队第三、第四、第十、第八十九师先后他调，只留下黄镇中部的独立第三十三旅，加上各区的反动武装，共千余人。从此，汀瑞边的形势日趋缓和，游击队也在斗争中得到巩固与发展。

1937年1月，瑞金游击队和武阳游击队先后来到猪仔寮，与陶吉游击队会合，组成有近百人，80多支枪的汀瑞游击支队。支队长为钟得胜，政委是胡荣佳，参谋长为周桂生。

汀瑞游击支队组建后，经过整顿，变被动防御为主动进攻，向敌人展开了新的斗争。

青山埠是闽赣公路上的一个军事要地。这里山高林密，地形险要，又居于长汀县城和古城区所在地的公路上。国民党长汀县政府在这里设了一个据点，派了40多人枪扼守。来往行商和过路行人到了这里都要“检查”，无不被其敲诈勒索，真是“鸟过也要拔根毛”，远近群众无不恨之入骨。

1937年3月，汀瑞游击支队决定攻打青山埠，拔掉这个反动据点。鉴于敌人装备精良和易守难攻的不利条件，游击队计划利用敌人换防之机加以智取。

一天，40多名游击队员化装成广东军的一个班，民团三个班，在胡荣佳、钟得胜、彭脏标、杨洪才的带领下，大摇大摆地开往青山埠“换防”。正巧古城反动民团一个班先行到达，他们看到“广东军”来了，规规矩矩地在一旁向“广东军”行礼。游击队借口要验古城民团的枪，当他们接受验枪时，被全部缴了械，乖乖地做了俘虏。同一时间，化装成“民团”三个班的游击队员迅速

冲进炮楼，夺取了枪支弹药，并将炮楼付之一炬。

这一仗，游击队一枪未发，抓了30多个俘虏，缴了30多支枪，千余发子弹，拔掉了这个作恶多端的敌人据点。周围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打下青山埠后，游击队转移到武阳的大苦竹村，准备突袭武阳区公所。

武阳是瑞金的一个大圩镇，位于瑞金至会昌的要道上，三面临水，只有南面是陆地，易守难攻。武阳区公所驻在镇边的一个大院里，四周是围墙，里面有一栋楼房，有一个排的保安团驻守。

1937年7月3日晚上，汀瑞游击支队将72名队员分成两个梯队，一队隐蔽在区公所隔壁一个地下党员家里观察敌情，另一队埋伏在区公所一座旧炮楼里伺机接应。

4日，是武阳圩日，第一梯队的12名队员混在赶圩的人群里，趁敌人吃早饭之机，冲向区公所门口，一枪就打死了哨兵。第二梯队闻声接应，立即冲进区公所，敌人来不及组织抵抗，就被游击队打死了四五个。区长郑科洪在一片混乱中逃跑了，其余全部做了俘虏。在战斗中，游击支队分队长梁桂英中弹牺牲。

武阳战斗，震惊了敌人。黄镇中部向武阳猛扑，企图彻底消灭游击支队。游击支队根据“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术，再次化整为零，撤出武阳，分散活动。钟得胜带领部分队员转移到日东、横江、罗汉岩一带；胡荣佳带领部分队员转移到长汀的四都、濯田一带，刘国兴率领部分队员疏散隐蔽在武阳一带，继续扰乱敌人。

已是1937年七八月间了。汀瑞游击支队从血泊里成长壮大起来。但他们好像与世隔绝一样，早已同江西、福建党组织失去联系，得不到上级指示，也不了解党中央的新精神。游击队就像远离母亲的儿女一样，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党。

一天，彭胜标在一张老俵包盐用过的报纸上看到了国共和谈

的消息，接着又看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消息。游击队虽然早就希望能开赴前线抗日，却不相信能和国民党合作。

10月间，敌别动队司令王才悌忽然派人到四都附近山上送了一封信，说定要和游击队“谈判”。

为了从国民党的口里探听一下党中央的下落，游击队答应“谈判”。为避免意外，游击队大部分队员隐蔽在山后，到处设立了军事哨，等待着国民党“代表”的到来。

在一个晴朗的上午，山下两个穿长袍的人，带着一副挑子走上山来。挑子上装着烟酒、花生等“慰劳品”。

上山之后，那两个人故作殷勤地问道：“哪位是胡、彭长官？”

“他们不在！”一个队员说道，“有话就谈吧，我们代表他们。”

“是、是。”其中的一个奸笑着自我介绍说，“我们是王司令派来的，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王司令的意思是我们先划定地区，互不侵犯……”

“这样也好，不过我们不大相信，因为我们没有接到指示。你们要是能说明我们党中央在哪里，并拿出证明文件来，我们才相信。”

一句话把他们问愣了：“这个……鄙人不知。鄙人只是奉王司令命令来谈判的，现在日本打得紧，务以国事为重，共同抗日，所以……”

看样子要说出党中央所在地是不可能的。这次接触，虽然游击队还不知道党中央在哪里，但清楚地感觉到党的力量更强大。

1937年秋，钟得胜率部分游击队员途径九里岭三箭脑时，接到地下党送来的一份情报，获悉臭名昭著的汀州“刮地皮专员”秦振夫的老婆随带几辆汽车的财物，由武装人员护送回赣州老家。

游击队决定在路上设埋伏，截缴赃物，把专员老婆捉拿为人质，罚款罚枪，以示惩戒，不许他再反共和敲诈老百姓。

这天上午10时许，长汀方向开来一队汽车。当汽车进入伏击圈时，游击队员一齐向汽车开火，汽车当即被打翻。一个战士不小心，一枪就把专员老婆打死了。游击队缴获了车上全部东西，遗憾的是，没有人质，无法对秦振夫罚款罚枪了。

事有凑巧，这一仗竟帮了游击队的大忙。当时，国共合作刚刚开始，项英、陈毅正在同国民党江西地方当局谈判。秦振夫抓住“三箭脑”伏击汽车一事大做文章，一面向项英、陈毅、张鼎丞“告状”，一面登报诽谤游击队破坏抗日。这样一来，陈毅他们才知道汀瑞边还有红军游击队的活动，遂派出代表前来传达中央指示。

11月底的一个上午，鸡毛信一阵风似的由边界传来，陈丕显来到了汀瑞边。

陈丕显，曾化名阿丕。福建省上杭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闽赣省军政委员会团代表，共青团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兼儿童局书记，共青团闽赣地区中心县委书记，共青团赣南省委书记。

中共赣粤边特委成立时，陈丕显也是成员之一。项英和陈毅所以确定陈丕显参加特委领导，是因为他当时虽然只有19岁，但参加革命时间早，一直从事青少年工作，善于联系群众，在斗争中表现勇敢坚决，工作经验丰富，是个很有作为的“红小鬼”。

11月初，陈丕显到了瑞金。他先去拜会了国民党瑞金县县长谢寿如，递交了项英、陈毅开具的介绍信。尔后，谢寿如回拜了陈丕显，一面虚伪地表示欢迎，一面又提出要红军游击队快下山。

陈丕显察觉出他们企图借机吃掉游击队，遂正色厉言地指出：“根据项英、陈毅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达成的协议，你们有义务为我提供方便，及时与汀瑞边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我是奉项英、陈毅之命而来，汀瑞边红军游击队的行动，当然只能听命于项英、陈毅。”对方的阴谋未能得逞。

第二天，在瑞金党组织的帮助下，陈丕显顺利进山到达汀瑞边游击司令部驻地，见到了胡荣佳、彭胜标、钟得胜、张开荆等，游击队员闻声而动，一起拥簇到司令部来问候党的代表，打听中央的消息。

陈丕显向大家传达了党的指示，并告诉大家，党中央和毛委员现在住在延安。战士们一个个欢喜若狂，跳着笑着，流下了高兴的眼泪。大家情不自禁地唱起了瑞金民歌：

黄田旁，  
粟坑县，  
白竹寨是全盛时。  
白竹寨上飘红旗，  
白军到处受我欺。

嗣后，陈丕显返回大余池江。彭胜标随同前往，并向陈毅汇报了汀瑞边游击队三年来的斗争情况，请求了有关谈判和整编等问题。陈毅向彭胜标作了具体指示后，彭胜标即返回汀瑞。

11月间，彭胜标、胡荣佳、钟得胜等前往瑞金县城，与国民党军政当局谈判。由于汀瑞红军游击队和中共瑞金县委本着合作抗日，共赴国难的精神，顾全大局，不记前仇，所提关于改编、集结、筹划给养等条件合理，使国民党瑞金当局代表无法拒绝，终使谈判成功。

根据谈判协议，1937年12月，在瑞金县城河背街溪子下成立了“驻瑞金办事处”，萧忠全为主任；汀瑞边游击支队的番号改为汀瑞边抗日游击支队，以钟得胜为支队长，胡荣佳为政委，周桂生为参谋长。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成立。中共闽粤赣省委派谭震林前往南昌，向新四军军部汇报请求工作，接受关防

命令。

1月15日，谭震林一行抵达瑞金县城，当晚即在汀瑞抗日游击支队瑞金办事处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布置部队北上和后方留守等问题。

会议开到下半夜时，遭到国民党三十三旅的突然袭击，办事处主任肖忠全被枪杀，与会的50余名干部战士被无理关押。第二天，三十三旅又抢走了胡荣佳、钟得胜等人的印章，假造命令，企图调游击队入城缴械。幸亏游击队得到消息，及时转移，使顽固派阴谋未能得逞。

“瑞金事件”发生后，项英马上给熊式辉发出一封急电，抗议反动分子在瑞金背信弃义的行为，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人员。在新四军军部的再三交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从19日起陆续无条件释放了全部被扣押人员。

1938年2月下旬，汀瑞游击支队在彭胜标等的带领下，突破反动派的封锁线，绕道荣坑、楼子坝、水口、古田等山区，开往龙岩白上集中，大部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三团二营。

### 三 陈毅出山

#### 血雨腥风终有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震撼了中国大地，抗日的怒潮席卷全中国。

大敌当前，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关头，每一个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无不热血沸腾。国民党“清剿”部队奉命收缩到几个大据点，固守待命，游击队也停止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活动。南方人民革命斗争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早在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就决定

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和新政策。

1936年2月，红军组成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渡过黄河，准备开赴河北直接对日作战。

与此同时，中共还开展了对驻在陕西的西北军、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

4月，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举行会谈。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结成了“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

5月，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从山西撤回陕北，发表“五·五”回师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郑重表示：“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统一战线如像1925—1927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

中共中央关于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的倡议，在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为了使全党了解放弃反蒋口号的必要性，1936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专门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情况，在政策上作出的重大变动。

此时，国民党蒋介石的对日态度也有所改变，由过去“绝对不抵抗”而渐露抗日姿态。

1935年1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但如果“最后关头”到来，那也只得“放弃和平”，决心“牺牲”。

1936年7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进一步表示：“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态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欲望毫无止境，国民党南京政府在1935年底开始试探，要求苏联的援助，并设法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正如蒋介石后来所写道：“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

此后，国共双方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秘密接触。特别是在宋庆龄的帮助下，牧师董健吾于1936年2月下旬，带着国民党当局要求同中共中央谈判的信息，秘密来到陕北瓦窑堡，会见了中共中央领导人，接通了国共两党中断了十个年头的联系。

但蒋介石的本心还是要反共。他所说的“中共问题的解决”，是要共产党向国民党投诚，解除武装，接受改编，然后“以政治方法解决”。

于是，蒋介石在解决“两广事变”之后，立即腾出手来，调集重兵，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新的“会剿”，并亲自到西安逼迫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剿共”，扬言一个月消灭陕甘地区红军。张、杨目睹民族危机不愿继续“剿共”，终于酿出张、杨逼迫蒋介石抗日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到“联蒋抗日”阶段。

1937年2月至9月，中共中央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朱德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蒋介石、



宋子文、邵力子等人，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举行多次谈判。

全国性抗战开始后，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

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布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建立，标志着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早在1937年2月，周恩来在西安谈判时就向顾祝同提出过，他建议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民团式保安团，甚至表示“千人以上的队伍就如此”。同时，要求国民党停止进攻南方游击区。蒋介石不同意，他坚持“北和南剿”的方针。

从西安事变到卢沟桥事变，是“南方游击队更困难的时期，即是说国民党军事当局和陕北红军进入和平谈判的状态，而对于和陕北红军在政治上一致的南方红军却采取更加猛烈的‘围剿’，企图在短时期内完全加以消灭，这应验了蒋介石的不承认主义，既可‘孤立’陕北主力红军，又可消除‘心腹之患’。”

这时的项英、陈毅，仍被围困在油山上。

1937年7月下旬，游击队通过同情者之手，买到了香港出版的一批进步书籍，特别是从一本名叫《新学说》的书刊中，看到毛泽东当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摘要。其中讲道：

“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日，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党曾经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表示愿意以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之武装暴动的方针等四项条件，换取国民党停止内战，实行抗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被迫开始‘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

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sup>①</sup>

游击队同党中央失掉联系两年多了，此时看到党中央对形势分析和政策调整的指示，队员们真像久旱逢甘霖一样的高兴。正如项英后来所说：“看到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整党的政策的指示，我们如获至宝一样，那种高兴的心情真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因为有了它，我们再讲国共合作，就有根据了。”

根据毛泽东的报告精神，项英和陈毅、杨尚奎、陈丕显、刘新潮等一起开会，认真地研究了形势，认为必须改变工作方式。接着，以项英的名义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的文章，以促成南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

中共中央对南方游击区的斗争极为关注，对在极艰苦条件下长期坚持游击战争保存下来的红军游击队十分珍视。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说：“这是 we 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

因此，在国共两党的高层谈判中，周恩来等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同国民党方面进行针锋相对而又非常灵活的斗争，力争把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中国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1937年7月23日，周恩来在延安接见美国记者彼森，在回答关于国共谈判问题时，说道：“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举行了五次谈判会议。我们仍在南方一些游击区活动的部队，成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南京企图把他们缴械，瓦解掉。这我们不能同意。”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南京、杭州及长江下游地区岌岌可危，形势逼人。领导这一地区的广大人民奋起抗战，成为迫不及待的神圣任务。这里人口稠密，地域广阔，资源丰富，具有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壮大人民武装力量的良好条件。为此，周恩来等人又在南京谈判中，再次向国民党提出统一整编南方各省

<sup>①</sup> 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第11页。

区红军游击队，开赴华中敌后抗战的建议。国民党迫于形势需要，又怕游击队“扰乱后方”，终于同意了这一建议，但也包藏着借日军之手消灭红军游击队的祸心。此后，南方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开始了与当地红军游击队合作抗日的谈判。

### 难能可贵的县官

十年争战后，国共合作又。  
回念旧时人，潜然泪沾袖。

抗日是中心，民主能自救。  
坚定勉吾济，莫作陈独秀。

这是陈毅在1937年8月写的《国共二次合作出山口赞》。陈毅在词的上半阙，回顾了已经过去的十年内战，谴责国民党内战政策和屠杀政策造成的空前悲剧；词的下半阙，是对刚刚到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理解，指出在实行由内战转为外战的关头，既要抓住主要矛盾，推进民主，合作抗日，又要防止以为合作抗日之后就没有阶级斗争了，对于国民党可能危害抗日，实行反共的行为丧失警惕性，重蹈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覆辙。

为了及时地指导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斗争，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其要点是：

（一）“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较大的红军游击队“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但必须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

（二）未与国民党政府及当地驻军确实谈判好以前，则我们的一切武装部队，可以自动改变番号；用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各

义，根据党的新政策，进行独立的活动；继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以灵活的游击行动，去发动与组织人民，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捉杀汉奸，扩大党的新政策的影响。

（三）在取得与国民党驻军停战谈判机会后，即用大力量，利用时机，进行整顿与训练，并掩护当地群众工作。用一切方法提高部队每个战斗员的政治水平及坚定的意识，防止一切收买利诱分化的阴谋。

（四）关于部队给养问题，在未与对方谈好以前，我们可采取由富有者募捐的方式募集钱粮。只有确实是汉奸的财产，才采取没收的办法。

（五）各游击区为着实现党的新政策，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保存与扩大革命的支持点的目的，应该“配合当地实际情况，灵活的全面的改变自己的一切工作。”

在政权问题上，“争取地方政权实行普选的民主制度”，“取消苏维埃的制度，采取国民党现有的政权组织形式，用普选的方法选举保甲长、分区长，保障政权实际上仍在党的领导之下。”在土地问题上，“停止没收地主土地财产，注意改善群众的日常生活，争取团结群众在党的周围。”在群众工作问题上，“原有苏区及游击区域已有的群众组织，应保持其存在与巩固。加强群众组织的民主化与党的领导，改善群众的工作方式与方法，使之成为团结广大群众的组织。”对于国民党的军队，“采取争取其广大官兵共同抗日的方针。”关于党的组织工作，要求“普遍建立党的秘密组织”，但“必须改变党的领导方式与方法”，举办党校与训练班，“有组织有计划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重新训练党的干部与党员。”

这一指示，为南方各游击区的党和红军游击队进行谈判斗争，以及开展政权、土地、群众、党务等各方面的工作，提供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灵活的斗争策略。

8月8日，项英、陈毅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的名义，正式发表《赣粤边共产党游击队联合宣言》。宣言指出：赣粤边共产党游击队为争取民族解放，挽救中国的危亡，愿意放弃对政府的敌对行动，停止游击战争，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愿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合作抗日；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进剿”游击区，允许民众有抗日自由，早日实现谈判，达成合作抗日协议，让红军游击队开赴前线抗日。

8月15日，项英、陈毅又发表《告赣南民众书》，在群众中宣传合作抗日的重要性，号召大家团结一致，共同抗日。项英、陈毅又赶抄了许多份抗日宣言，分寄给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江西省政府和大余、信丰、南康、南雄等县政府，以及上层社会人士。“经过很久的斗争，才由大余县用快邮代电承认合作抗日并愿与我们真正正式协定合作条件，我们才开始和平谈判。”

在沟通国共两党的谈判中，陈毅称赞为“难能可贵的县官——大余县县长彭育英，起了特殊的作用。

彭育英，江西万安县人，兄弟七人中彭育英排行第六，中学毕业后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思想较为开通，有正义感。回国后加入政学系，与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有深交，后台很硬。为对付粤军在赣南尤其是在大余的强霸，熊式辉派他任大余县长。任内正值红军三年游击战争，彭育英在贯彻上峰指示，与项、陈交战的同时，也为红军顽强机智英勇抵抗的精神所感动。他认为这种军队是前所未闻的不可战胜的军队。为此，彭育英常向熊吹冷风说：“与红军打仗还是要留点后路，不要做绝了。”

开始，熊式辉也不以为然。三年过去了，游击队却是愈“剿”愈多，熊觉得彭育英说得倒也有道理。特别是经过1937年3月至5月的军事“围剿”，红军依然挺立在油山上，他自感军事手段并非万能之策。

正当熊式辉一筹莫展之际，中国西北角上的红军改编为八路

军，相峙十年的国共两党重归于好，重新合作。形势推动他不能不考虑改变对红军游击队的态度。于是他在省府之下设立了一个所谓的“招抚委员会”，命赣南专署保安司令马葆珩为主任、彭育英为副主任，开始了与红军游击队的对话。

彭育英闻悉中共赣粤边特委发表的宣言，喜出望外，期望早日找到项英和陈毅，他于8月中旬写了第一封信寄往广东南雄县石灰窖。恰巧，这封信七转八转，落到了陈毅手上。彭育英表示愿与游击队首领陈毅谈判。为了表示诚意，他还希望陈毅选择合适地方先见个面，创造和谈的良好气氛。

陈毅与项英商量后决定：由陈毅亲自下山去见彭育英，会见地点选在赣粤边界广东一侧的钟鼓岩。

钟鼓岩地处江西大余县的西南方，广东南雄县的北面，离两个县城都有百里多路，山不很高，远看岩石重叠，四面峭壁，无路通向山顶，只有岩脚一洞口，沿洞内溶岩盘旋而上。到了山顶，在巨石底下有一山洞，洞口朝东，所以叫接东岩。这个岩洞不大，里面只能坐两个人，具有重要意义的谈判就在这里进行。

彭育英租了西华山矿上的一辆黑色小汽车，清晨从大余县城出发，10点钟到达钟鼓岩。他们在寺庙里吃罢早饭坐等了几个钟点，仍不见陈毅的到来。

钟鼓岩脚下有座寺庙，庙内有一个和尚叫曾广桃，江西万安人，原是区苏维埃主席，后来当了红军，长征时因病留下，在老区呆不下去，逃出在此出家当了和尚。陈毅和彭育英的第一次接触就是在他的暗中斡旋下安排的。

其实，陈毅早就出来了。多年遭受国民党磨难的共产党人，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不幸，他们到达目的地后并没有直接进钟鼓岩，而是隐蔽在对面的密林深山上。

曾广桃利用彭育英一行吃早饭的时间，把周围的一切又作了细心的观察，在确认安全有绝对保障的情况下，派人到对面山林

里报讯，把陈毅接下山来，又亲自领陈、彭两人盘山而上，安排在接东岩岩洞里会了面。为纪念陈毅和彭育英第一次会面的地方，后来人们把这迎接日出之岩洞改为“接陈岩”。

这次谈判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和保安团撤离了池江板棚一带，停止了武装进攻；游击队也停止了打上豪。梅岭山上听不到枪声了，紧张的空气为之一扫，山上山下显得十分平静。

8月27日，彭育英又派人送给项英、陈毅“感秘代电”专函，要求派人到大余县池江进行谈判，并表示通电湘粤赣边各县军政当局解除封锁，示以诚信。

9月3日，陈毅以“快邮代电”复函彭育英，信中说：“我辈虽处深山，在敝党中央及特委领导之下，早已为抗日工作多所准备。……（特委）代表一、二日后可达余城。”对国民党某些顽固官员对红军游击队的造谣诬蔑给以驳斥。信中写道：

……何如昨日得里东唐营长及信丰第六区陈区长两信，谆谆以抗日救国相属望足资感佩外，复谬承其厚爱，以自新纳降投诚相责难，同时并以赏金名利免死不咎以往为饵，复引何长林、李丙生等无耻叛徒之前例，信誓旦旦良足私感。但揆诸党派联合抗日之精义，又不禁令令人失望。夫不以友党友军视我，则立场既乖，前嫌未释，‘剿匪’之旧观念不除，又焉能表示抗日联合之真诚。敝党不敏，出生入死为革命奋斗近二十年，不为帝国主义之凶焰稍屈，又焉能毁政治节操以图名就利乎？夫无气节卖党求荣之辈，如某某等，其自新之日，即脱离共党之时，界线显然，岂可强同。且此辈既无气节，复又贪生怕死，他日万一日敌深入，摇首变为汉奸，自意中事。敝党素和善与人同之义，我愿此辈革面洗心努力抗日。但

为抗日阵线巩固之计，对此辈我应有所戒惧也。<sup>①</sup>

陈毅立场坚定，大义凛然，敌人无隙可钻。

彭育英接陈毅复信后，认为“共产党抗日之意志尤为坚定”。他立即复函特委，约定9月8日在大余池江“派员会商，届时陈毅代表该会如期到达，育英派政府秘书鲁炯雯代表前往。”

1937年9月8日，陈毅与鲁炯雯谈判，达成协议如下：

- (一) 大余县政府负责“电请本省行政区各县停止武力游剿”；
- (二) “各县共党人犯息即予以开释”；
- (三) 共产党“要求地方各界化除歧视意见，统一抗日意志”；
- (四) 红军“游击队视人数枪支多寡，编成正式国军”，准备开赴抗日前线；
- (五) 红军原有政训及军事指导人员息予保留；
- (六) 湘鄂皖闽赣粤等省游击队“由项英、陈毅负责”召集改编；
- (七) 双方商定，9月11日由大余县政府派员陪同陈毅前往赣州，与军政当局谈判，“最后决定改编手续，刻日实施。”

1937年9月11日，彭育英承包了一部广东利通公司的汽车，亲自陪同陈毅前往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江西全省抗日义勇军编练处副主任熊滨，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马葆珩举行谈判。

当陈毅到达赣州时，全城出现许多油印的宣传品：

“欢迎共产党代表前来商谈抗战合作事宜！”

“共产党代表陈毅莅临，赣南民众热烈欢迎！”

陈毅走到哪里，哪里的人群就响起热烈的掌声、欢呼声、口

<sup>①</sup> 《陈毅致国民党大余县县长彭育英信》（1937.9.3），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



号声。

待车子停稳，第四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派出参谋迎候。参谋请陈毅前往专署大院，陈毅说：“衙门不好进，还是住旅店吧！”便在中华旅社住下。当晚，陈毅在彭育英陪同下来到专署大院，与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他们先后谈了两天。

谈判桌上，陈毅谈笑风生，不卑不亢，通情达理，顾全大局，而在原则问题上当仁不让，针锋相对。陈毅除对国民党“收编残匪”一类的恶意宣传给予义正严辞的揭露以外，还与国民党第四十六师的代表展开了一场舌战。那位代表竟在谈判桌上大言不惭地说：“无所谓国共合作，这种说法英、美不习惯。”陈毅当即质问他：“你代表谁？代表英、美吗？”他慌了手脚：“对不起，这不是兄弟的意思，我们中央党部的文件指示我们这样讲的。”陈毅愤怒地站了起来，说：“你要是代表英、美，就没有资格和我谈判。我们的队伍要下山，你挡不住！进赣州，你挡不住！形势变了，你的脑袋也得变。”“是，是，很对，很对。”那人连忙歉意地表示。

谈判期间，大叛徒，原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受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派遣，妄图拉拢陈毅。他一再宣称，他是环境所迫，没有办法才走这条路的。接着，便荒谬地说：“现在我们总算走到一块来了，只不过我比你早来了一步。中国搞共产主义，还远不是那个时候。”

陈毅听了，满腔怒火，拍案痛斥了这个叛变革命，出卖灵魂的无耻之徒，并严正表明：“我是代表共产党来和国民党谈判的。国共两党平等合作，决不是屈膝投降。……”<sup>①</sup>陈洪时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赣州谈判达成红军游击队改编办法九条，基本内容如下：

（一）项英、陈毅等部红军游击队经过协商同意在9月底以前

<sup>①</sup> 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第126页。

在大庾县池江附近集中：

(二) 集中改编后的一切经费给养由江西省政府发给；

(三) 改编后的所有干部准由该部保请省政府委用，但政府须酌情派人参加整理与训练；

(四) 改编后暂定名抗日义勇军第七游击（支）队，待全部改编完竣后，呈请编为正式国军；

(五) 改编后绝对服从政府的一切命令；

(六) 集中改编期内由政府令各县政府及各部队予以通行便利，并停止进剿，但游击队也要严守纪律，不得有反政府活动；

(七) 改编前由省政府先发国币若干，以为集中时的给养；

(八) 所陈意见双方分别呈请核示办理；

(九) 其他事项可派代表来赣随时商定。

协议签字仪式之后，国民党第四行政公署举行宴会。当地党政军要员和地方绅士头面人物都到齐了，新闻记者也带着镁光灯来凑热闹。古色古香的宴厅，异常肃穆，只偶尔有人耳语几句，气氛显得紧张而神秘。厮打了十年的对手，现在坐在一起干杯，要不是外敌当前，实在不可思议。

还是一位记者打破沉默，发问道：“陈先生这次下山，不知有何感想？”陈毅环顾四座，含笑回答：“要谈感想，也没有什么。只是有一点我很不满意。以前我在井冈山的时候，贵省府出赏巨额买我的头，花红是2 000；我到了中央苏区，花红一下子涨到50 000；红军长征后，我退到赣粤边打游击，你们的出价从50 000元跌到5 000元，后来又跌到了200元。200元就想买陈毅的人头，未免太瞧不起人了吧！”

在座的人听了相对愕然，马葆珩陪笑道歉：“对不起，对不起！那是过去的事，两军交战，各不相容，难免，难免！”一位老绅士接嘴说：“今后化干戈为玉帛，百姓幸甚，国家幸甚，此所谓兄弟阅于墙也！”

陈毅直言点破道：“据说你们总裁，把共产党比作心脏病，把外寇当作皮肤病，所以西安事变后，还必欲置南方游击队于死地而后快。谁知我们这些人是骨头，啃又啃不动，吞又吞不得，没得法子才同意谈判。如果说这也是兄弟之争的话，那国民党这位兄长未免过于狠心，太没有手足之情罗！”这一席话，说得座上人俯首无言。宴会就这样在尴尬的气氛中结束了。

赣州谈判后，为了解决南方其他地区游击区改编问题，国民党当局要求项英到南昌谈判。

9月24日，项英乘坐熊式辉派来的汽车前往南昌，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谈判。

项英到南昌后，从报纸上得知中共中央代表博古和八路军代表叶剑英正在南京同国民党政府谈判，当即给他们发去电报，并请他们转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原文是：

久别以来，音信断绝。现为改编各边区部队抵达南昌，……闻诸兄在京，特此电达，请派人来弟处联络。如有电复及来人，可到省保安处找。<sup>①</sup>

博古接到了项英的电报，真是喜出望外。他将电报转报党中央时，还附了以下两句话：“我们日内派交通带《解放》周刊及文件去，并去电约其来京。”

项英后来回忆说：“从此以后，我们与中央取得联系，以至得到中央的领导，使失掉中央领导，困居在山林中过野人的生活而与敌人斗争三年的我们，结束了旧的斗争生活，好似重见天日，直接在党中央领导之下，而为当前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而奋斗。”

<sup>①</sup> 《新四军文献》（一），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项英在南昌得到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全党同志书》等重要文件，他很快地领会了中央独立自主提高警惕的指示精神，在谈判中如鱼得水。通过南昌谈判，解决了赣州谈判遗留问题和其他南方地区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问题。

9月27日，项英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上发表了演说。

29日，项英又以中央分局名义发表《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正式传达党中央决定，将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救国武装，要求各地游击队按时集中听候改编。信中写道：

日本积极侵略，民族危机已到最后关头，我们因民族危机紧迫，为挽救国家的兴亡，为救民族的解放，以求全国一致，共赴国难。余遵照最近党中央宣言，已正式宣布将游击队改称抗日救国的武装，统一于国民政府指导之下，效命杀敌。各队接到信后，立即集中听候改编，以使追随全国友军和八路军之后，为挽救国家危亡和民族解放而作英勇的斗争。<sup>①</sup>

项英还宣布在南昌月宫饭店设立“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由陈毅负责进行联络各地游击队改编事宜。

熊式辉为了表白政府合作之真诚，以求共产党红军游击队早日下山，他答应并立下手令到第一监狱提释了所有政治犯。被国民党政府关押了三年之久的方志敏夫人——缪敏，随项英回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怀抱。在大余贫民医院治疗好水肿病之后，缪敏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项英与国民党江西当局谈判的成功，标志着南方国共合作的

<sup>①</sup> 《新中华报》1937年10月4日。

成立，并给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奠定了基础。南方游击队出山抗日，受到全国人民的赞扬，殷切地希望他们能早日开赴前线打退日本侵略军，各人民团体和知名人士，纷纷来电祝贺，就连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对共产党坦诚合作的精神也表示钦佩。9月27日，国民党中央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给项英、陈毅拍来的电报称：

顷接赣省政府电告，两兄敌忾同仇，情殷抗日，殊为钦佩……嗣后，借重之处必多。目前改编贵部一切手续，请就赣省政府接洽办理。

此间，陈毅欣闻八路军平型关大捷，感慨万千，吟诗一首：

抗日旌旗战局开，大军东出薄燕台。  
南方豪杰风雷动，团结救亡下山来。

### 番号“新四军”

1937年10月12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正式转发蒋介石的电报，明确将“鄂皖边区高敬亭部”、“湘鄂赣边区傅秋涛部”、“粤赣边区项英部”、“浙闽边区刘英部”、“闽西张鼎丞部”，均“统交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这是在国共两党关于合作抗日、改编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谈判之后发表的。后来，10月12日这一天就成为新四军的建军节。

殊不知，南方红军游击队的隶属及番号的确定，却是经历了一个充满斗争的曲折过程。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实行“北和南剿”方针，使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直到淞沪战起，蒋介石被迫抗战，急需调动兵力上前线。终于同意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建议，但坚持军官正职一线由国民党方面担任。周恩来以退为进，称赞这

“是极好的楷模”，建议全国两党所有军队均按此办理。蒋介石才觉得上当，乃表示“军长由我们选派，其余军官由贵党决定人选。”经过一番争执，最后决定由一位无党派人士充任军长。8月，周恩来在上海偶遇阔别10年之久的叶挺，谈及由他“改编游击队”的设想，叶挺欣然应允。<sup>①</sup>

叶挺系北伐名将，广州起义后流亡德国，后在澳门定居。抗日烽火与第二次国共合作，复燃起他重跨战马，挥刀杀敌，保卫祖国的赤诚心愿。于是，他告别妻儿，来到上海，寻机报国。接着，他去苏州，通过张治中与蒋介石接通电话，请缨出山。

蒋介石认为叶挺脱离中共已经10年，由他来改编中共领导的红军游击队，调虎离山，开赴抗日前线，自然得体，既可排除共产党的军长人选，又可抓住叶挺和这支新编部队。至于军队番号，蒋介石同意叶挺所提建议，继承铁军传统，沿用“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蒋介石唯恐时机稍纵即逝，急忙下令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名义，于9月28日发出通报：“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6日，蒋介石又电谕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闽赣边等地游击队由叶挺“编遣调用”。蒋介石这种单方面抢先公布军长人选的作法，是要使共产党陷人被动。叶剑英当即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汇报。

10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南方各游击队集中改编方针，发出重要电报指示：“在一切问题解决而实行将内地若干的游击队集中之时，该集中部队领导指挥及其作战，国民党不得干涉，不得插入任何人。”<sup>②</sup>

中央对叶挺的态度是：“叶挺须来延安，在他完全同意中央的

<sup>①</sup> 《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38页。

<sup>②</sup>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云逸、南委、博古、剑英电》，1937年10月1日。

政治、军事原则后，可以去闽粤边（或闽浙边）指挥张鼎丞部（或刘英部）以此为基础扩大部队。”<sup>①</sup>

从10月5日至18日，中共中央拟把部分游击队集中改编为一个军，并考虑让叶挺指挥。因为形势发展很快，已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长的叶挺，正在南京与博古、叶剑英接洽，急待答复，叶挺表示“如延安不同意，仍可辞职”。

19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博古、叶剑英，要他们摸清何应钦是否同意将叶挺之新四军隶入八路军建制，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受党指导，不受国民党干涉，是否愿意到延安接洽一次。如能办到，则经过叶挺整编南方游击队，并集中各游击队之一部成为一军是可以的。

21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复电：“叶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并说叶挺过一两日即起程来延安。

11月3日，叶挺抵达延安。叶挺的到来，使党中央在新四军军长入选和部队隶属关系问题上，迅速作出决策。叶挺一到延安，就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接见。毛泽东向叶挺详细介绍和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解释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说明了共产党掌握人民军队领导权的必要性，还问及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叶挺深受感动，表示“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下工作。”<sup>②</sup>他说：“我认为暂不宜恢复党籍。我作为无党派人士可以自由地与国民党官员交往，调解两党矛盾和为新四军向老蒋要军费。”

中共中央在党校举行了欢迎叶挺将军的大会。毛泽东致欢迎词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

<sup>①</sup>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云逸、南委、博古、剑英电》，1937年10月1日。

<sup>②</sup>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37年10月3日。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

叶挺在延安的表现，使中共中央放了心，完全信任这位军长。

在叶挺离开延安前三天，毛泽东即把对新四军其他领导人员的安排意见电告博古：“决定新四军隶属八路军，编为两师四旅八团，拟项英副军长、陈毅政治主任，周子昆参谋长。军暂驻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sup>①</sup>

11月12日，叶挺由延安到了武汉，首次以新四军军长名义向新闻媒介发表谈话。接着去南京，为新四军编制问题见蒋介石。下旬返回汉口，在汉口大和街26号开始新四军的筹建工作。

南昌谈判后，项英先回大余县池江圩安排工作，然后取道南京、武汉、西安赴延安汇报工作。

1937年11月7日，项英抵达延安，党中央为项英专门召开欢迎会。党中央机关的一部分干部和抗日军政大学的一部分学员参加了欢迎会，张闻天、毛泽东和项英同坐在主席台上，叶挺也应邀上了主席台。

项英到延安接受将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新四军的任务后，在考虑编组原则等问题时，多次同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副部长李富春交谈，请他们为新四军配备一批干部，特别是有作战指挥和治军经验的团以上干部。他们均答应从中央、军委总部机关和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中物色一批干部派去。

中央给项英的干部，较早确定的名单有：红军总部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张云逸，广东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曾在国民党革命军张发奎部任师参谋长，参与领导百色起义，任过红七军军长、中革军委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等职。此时正在广州、香港等地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并已与叶

---

<sup>①</sup> 《毛泽东关于新四军编制与领导干部配备问题致秦邦宪电》1937年11月6日。



挺取得联系，可担任新四军的参谋长或支队长。<sup>①</sup>

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长周子昆，广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在红军中任过师长等职，可任新四军的副参谋长或参谋长，或支队长。<sup>②</sup>

抗日军政大学大队长冯达飞，广东人，1924年在黄埔军校一期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后担任过红军团、师、军领导职务，可在新四军主管培训干部的工作。<sup>③</sup>

李一氓，四川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后在中央苏区工作，早年就与叶挺、项英相识，可任新四军军部秘书长。

项英对调这几位同志到新四军工作很满意。

12月14日下午，也就是南京失陷后的第二天下午，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等问题。

项英在会上作了报告，其要点是：南方各游击区的主要情况，红军和游击队当时的分布；红军和游击队对党中央的基本态度，“各游击队对中央及朱（德）毛（泽东）信仰很好”；改编的原则，“各游击区将来要求得发展，须留三分之一的武装，并尽可能多留些，不要绝对集中”。这个原则，显然是根据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意图提出来的；改编为新四军的初步意见；对加强党和军事工作领导方面的建议。

毛泽东称赞项英的报告很好，提议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主要负责人和中革军委分会主席均由项英兼任。

此时，叶挺正就新四军的编组问题，在武汉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何应钦磋商，并多次致电毛泽东。

<sup>①</sup>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解放军人物分册，第9~11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112~113页。

<sup>③</sup> 《新四军事件人物录》，第252页。

就在12月14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这一天，毛泽东、项英联名复电叶挺：“新四军原则可照军何（按：何应钦）提议，作进一步磋商。”“长江以南各支队……可向东开，长江以北高敬亭支队暂留江北，不必北开，以便在该地准备沿江袭击。”“其他条件如前所商，尤不要军何派人。”<sup>①</sup>

这就对新四军的编组、部署和干部配备表明了基本态度，还特别强调新四军和干部配备，均由共产党方面负责，不允许国民党方面插手，从而为尔后在新四军部队中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组织保证。

项英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后，在南昌建立了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开始设在南昌民德路国民党省府前，月宫饭店二楼，门牌971号。12月中旬，迁至南昌书院街1号危家大屋内办公，由陈毅负责“总接洽处”的工作。

从湘赣边胜利返回后，陈毅来到南昌。他在南昌期间，总接洽处每日都要接待络绎不绝的来访者：有些人是从赣粤边、湘赣边、湘鄂赣边、闽浙赣边、闽赣边等游击根据地来的红军游击队代表；有些是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有些是从上海、南京、江浙等地撤退下来的党的地下工作者；还有些是前来询问亲人的烈士家属和红军战士家属。

来访者有的是为游击队的改编筹备各种军需物资，有的要求参加抗战，有的要求去陕北学习……一些群众团体和进步青年组织也前往找陈毅联系，要求指导他们进行抗日救亡工作。上海、南京、镇江、芜湖，还有北平、天津等沦陷区的一批批热烈要求抗日救亡的爱国青年学生，纷纷涌集到南昌，找总接洽处联系开展救亡运动。

<sup>①</sup> 《新四军文献》（一），第62页。

1937年12月的一个晚上，江苏丹阳和无锡青年救亡宣传队，在南昌工业专科学校举行一场抗日宣传晚会，当晚会快要结束时，报幕员向观众宣布：陈毅将军将要和观众见面。台上台下立即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陈毅在舞上出现了。他穿着一件灰布棉大衣，戴着一顶士兵帽，身材魁梧，体格健壮，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向大家讲话：

“同志们，中国地方大，人口多，农村广阔，有自给自足的经济，有共产党的领导，只要能坚持长期斗争，中国的抗日战争就一定能获得最后胜利。

青年朋友们，你们只有去争取中国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才有光明的前途。希望你们在抗战中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你们的业绩将光照千秋。”陈毅的讲话，使大家心明眼亮，受到很大的鼓舞。不少人立即报名参加了新四军。

新四军组编期间，在陈毅的具体指导下，江西的吉安、永新、大余、赣州、九江、宜春、崇义、修水、贵溪、都昌、铅山……以及邻省许多地方，先后成立了新四军办事处或联络处、通讯处、留守处等机构。

陈毅交给这些“处”的任务主要有三条：一是代表党和游击队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政治协商，解决红军游击队集训改编的有关事项；二是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三是监督谈判协议的实施，制止不利于国共合作的言论和行动。

新四军总接洽处，是中国共产党在南方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的总机构，对于推动中国抗日民主运动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 下山改编

1937年10月1日，项英由南昌回到赣粤边以后，立即召集负责干部会议，传达中央指示，讨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事宜。项

英还委派陈毅代表中央分局到湘赣边、皖浙赣边等游击区，传达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指示，联络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

10月4日晚，陈毅经赣州到达兴国，夜宿芳园旅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兴城旅夜倍凄清，  
破纸窗前透月明。  
战斗艰难还剩我，  
阿蒙愧负故人情。

这首诗长期以来人们难以释其真意。国共谈判进展顺利，在这大好形势下，将军为何夜宿兴城“倍凄清”？10月4日农历是九月初一，窗前哪来的“月明”？

原来在1932年春，陈毅由赣南特委书记调任江西军区司令员以来，夜以继日地为攻打赣州，为第四次反“围剿”奔波，30岁出头的大汉累得精疲力竭，生活上需要有一个伴侣关心和照顾。时为江西省委书记的李富春，组织部长蔡畅很关心陈毅，为他物色了一个对象，名叫赖月明。

赖月明是兴国杰村人，杰村成立苏维埃政府时任区妇女委员会改善委员会主任。1932年4月，在瑞金师范学习培训，毕业后分配在中共江西省委。当时的中共江西省委设在宁都北门的一条小巷子。不久，江西省军区所领导的地方红军，在配合主力红军取得水口大捷后，返回宁都，陈毅也从前线回到宁都作短暂休息。

最初是蔡畅找赖月明谈，直截了当地问她愿不愿意嫁给陈毅。赖月明开始不同意，理由是：陈毅是大干部，她还是一个小兵；陈毅30出头了，她才17岁。后来蔡畅把赖月明接到家里谈心，反复说陈毅这人性格好，官大而平易近人，岁数大很关心人。赖月明这才动了心。答应“看看”吧。

当李富春把这件事告诉陈毅时，陈毅生了气：“乱弹琴，你们干啥子嘛，我说了不结婚，你们操啥子空心。”李富春找陈毅整整谈了10次，他才勉强答应下来。

1932年9月，陈毅和赖月明正式结婚。陈毅本人毫无准备，李富春在婚礼当天才从外地把陈毅接回来。新婚之夜，陈毅想想也的确有些难为情，便关切地问赖月明今后有什么要求。赖月明见陈毅情深意切，便一口气提了五个要求：“第一，别人结婚都有一件羊毛衫，你要给我买一件；第二，别人结婚都有一个表，你要买个手表给我带；第三，你的文化高，教我学文化；第四，我还不是共产党员，你要帮助我做个党员；第五，……”

“你说嘛，有啥子不好说哩。”陈毅温和地说。

“快说嘛，快说。我能做到的绝不叫你失望。”见她还是不开口，急性子的陈毅连连催她。

“我们要永远在一起，永远……”赖月明见陈毅豪爽，有大丈夫气概，心里的话再也憋不住了。

赖月明提出的“五个要求”陈毅全答应了。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信守诺言，羊毛衫、手表都给她买了。每次出征回来，无论多么疲乏，他总要教赖月明认几行字。

1934年1月，陈毅借赴瑞金出席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机会，经省委组织部长蔡畅同意，亲自送赖月明进中央党校学习。在校期间，赖月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因工作需要，赖月明分配在石城县任妇女部长。

10月，获悉陈毅受伤转瑞金红色医院治疗，赖月明赶到瑞金，伴随陈毅并精心照顾。九天以后，陈毅以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的名义命令机关所有女同志、家属先行疏散，陈毅毫不犹豫地动员赖月明回到兴国家乡坚持地方斗争。

从生活上看，陈毅的确太需要一个亲人照顾。但是，为了立刻疏散机关、部队家属、女同志，以适应即将来到的严酷斗争，他

不能考虑对个人的照顾。于是，陈毅拿出身边仅有的4块光洋托新任兴国县委组织部长万香转交给赖月明，并以命令的口气要万香亲自送她回兴国杰村工作。

分别时，陈毅因大腿伤口开刀不久不能起身相送，他卧在床上紧紧握着赖月明的手，亲切地说：“你去吧，别难过，胜利之日再相逢，到时候我会来接你的，我们永远……”一别三年过去了。在那敌占区“石头过刀，人要换种”的血雨腥风的年月里，一个共产党领导人的妻子、女红军战士哪有立锥之地。残酷的战火，拆散了这对亲密无间的伴侣。

……

在实现国共合作、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这个历史性大转变中，陈毅冒着风险，历尽艰辛，奔走于各游击队之间，先后几次到过湘赣边、皖浙赣边等游击区。

陈毅1957年7月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在这种新形势下，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完成这个转弯。有的游击队不赞成统一战线，还要打。……我们派人到各游击区传达中央有关国共合作的指示，很快就搞通了。但是，也有一些游击队领导没有通，比如谭余保同志，在安福一带还打得很凶。这样，我在谈判中就不好说话。他们说：‘共产党讲停战了，可这里却不停。’他们说还要去‘剿’。我说：你们不能去‘剿’，你们去‘剿’就打起来了，我会找他们。”<sup>①</sup>

10月底，陈毅又一次到达安福、莲花一带，找到湘赣边省委和谭余保。经过苦心说服，湘赣边游击健儿才走出武功山、九龙山、武里山等深山密林，奔向指定的集中地点——莲花县的龙上村。1938年1月16日，按照东南分局的安排和部署，项英和曾山来到莲花县的龙上村，确定由段焕竞、刘培善率湘赣红军游击队

<sup>①</sup> 陈毅：《忆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1957年7月讲话。

主力编入第四军第一支队，留下一部分由谭余保领导在当地坚持抗日民主斗争。

陈毅亲自前往几个游击区的同时，还派了陈丕显、刘建华（即刘新潮）、杨尚奎等赴一些地区联络游击队下山集中改编事宜。

1937年11月初，陈丕显到达瑞金，在瑞金党组织的帮助下，找到了汀瑞游击队，工作很顺利。陈丕显返回瑞金后，又于11月5日去南雄。他以江西抗日义勇军代表的身份，找到南雄县长曾绳点和驻军师长，商洽处置“铲共义勇队”不良分子的报复行为。

陈丕显先给曾绳点送去一封信，信中写道：“最近在我党游击区周围之铲共义勇队中少数不良分子进行报复，屡次发生不幸事件。当国共合作正亲热之际，更在赣粤边敌军集中候令抗日之际，这些凶徒，实有意破坏国共合作，愿为奸细。弟除将各凶徒行动陈述如下外，特请贤明南雄县政府解押，以汉奸惩办。”尔后，陈丕显向曾绳点县长和驻军师长交涉，因为事实俱在，曾绳点只好立即打电报呈报上司，请求处理办法。

11月中旬，陈丕显到达三南陂头，碰上正在圩上买菜的三南游击队事务长张三木，即向他提出见游击队负责人。三南游击队政委张日清派人 against 陈丕显进行“考察”之后，张三木领着陈丕显来到全南县杨梅石游击队驻地，见到了张日清本人。

陈丕显把项英、陈毅的亲笔信交给他。张日清看完信，晶莹的泪珠夺眶而出。陈丕显在杨梅石住了两天，同他们详谈了当前的形势和项英、陈毅下山谈判的情况，要求他们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久，张日清将三南游击队集中到全南县杨梅石，随后开往大余池江改编，人员有100多。

刘建华是寻乌人，对罗屏汉和寻南工委的领导人熟悉。他带着中央有关国共合作抗日的文件和项英给游击队的信，从池江到安远，然后徒步从高云山、三标到达寻乌县城。第二天，他持大余县长彭育英的介绍信，见到了国民党寻乌县县长吕日东，说明

来意。吕日东表示帮忙打听游击队的消息。刘建华在寻乌呆了五六天，多方打听，也没有发现游击队行踪。

杨尚奎负责寻找北山游击队。他奔波数百里，在广东南雄的上嵩找到了北山中心区委书记袁达效。在袁的带领下，他终于找到了北山游击队负责人温风山，来到游击队驻地。

北山游击队有两个中队，80余人。他们对国共合作想不通。杨尚奎在北山住了十多天，针对战士们思想顾虑和实际问题，做了耐心细致地说服教育，终于使大家转到了合作抗日的道路上来。不久，北山游击队全部集中到了南雄县的中洞、上嵩。随后，在队长温风山的带领下，高高兴兴地来到大余池江集中整训。

为了便于部队整训和保持警惕，赣粤边特委把各地的游击队分散驻扎在池江章江南岸靠山临河的板棚下、弓里、小汾等地。先后到池江集中的有油山游击队、北山游击队、信康赣游击队、三南游击队、湘粤赣游击队，计500多人，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

池江上空，抗日义勇军的鲜艳红旗、迎风飘扬。章水两岸，嘹亮欢快的歌声，伴着滔滔江水，响遍大地。陈丕显、杨尚奎、刘建华等负责赣粤边红军部队的整训工作。一些战士对整编部队，改变番号，换发军装，在感情上一下子接受不了。有的战士见到放下国民党的军衣军帽，忍不住说：“‘五角星’（红军的五星帽徽）同‘十二角星’（国民党军的‘青天白日’帽徽）打了10年仗。现在要我们摘下‘红五星’，换上‘青天白日’，谁愿意呢？”有的还说：“我们红军制服就是再破再烂，穿着心里舒服，感到光荣。我就是打赤膊也不穿国民党的那‘黄狗皮’。”

陈丕显、杨尚奎、刘建华等对战士们进行了耐心地说服教育，告诉他们这是团结抗日、实现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需要。于是，他们勉强换上国民党军装；流着眼泪把为之奋斗多年的红星帽，珍藏在背包里。



为了在理论上提高大家的认识水平，陈丕显、杨尚奎、刘建华还给战士们上政治课，着重讲解什么叫统一战线？为什么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什么不在六年前建立统一战线？既然统一战线建立了，是否一切都统一，都没有区别了呢？统一战线中既然容许有独立的组织与主张，那么摩擦依然不能避免吗？摩擦既不可免，有什么办法去保持抗日呢？共产党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责任是什么？

基于“过去的残酷斗争只在游击战术上各有特长，对军事普通常识却感到不足”的状况，为了适应部队从游击战争转变到抗日战争的需要，陈丕显、杨尚奎、刘建华领导部队开展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

池江的弓里、板棚下，开辟了练兵场，战士们以饱满的革命激情，苦练杀敌本领，人人斗志昂扬，随时准备上沙场，打击日本侵略者。此时的大余池江圩一带，抗日救亡运动非常高涨，“这一时间是赣南最热闹的时期”。

赣粤边游击区和赣南老革命根据地的干部群众，看到自己的子弟兵下了山，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他们络绎不绝地前来池江探望。其中，有刚刚出狱的光荣战士，有亡命在外一直在寻找组织的共产党员，有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隐藏下来的党员干部，有饱尝辛酸的烈士家属。他们远道来到池江，就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多么高兴啊！

1938年春节，赣粤边群众掀起了一个慰问抗日义勇军的活动。“经过组织动员，写了上千封慰问信，做了300多双布鞋，筹集了200多双袜子，400多条毛巾……”<sup>①</sup>

赣粤边特委及时抓住有利形势，向广大群众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每逢池江圩日，杨尚奎都到圩上去讲演，宣传抗日形势和党

<sup>①</sup> 杨尚奎：《两年来的工作报告》，1940年2月17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的方针政策，激发广大群众的抗日救亡热情，扩大党的政治影响。特委还派人到老游击区、县城、大圩镇，开展宣传演出活动。

“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义勇军。”老区群众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纷纷动员亲人参加义勇军。赣粤边到处涌现母送子、妻送夫、兄弟争相参军的动人情景。在短短9个月里，部队比原来扩大了一倍多。

1938年1月，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由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赣粤边特委改为赣南特委，杨尚奎任特委书记。

---

## 第五章 闽水苍茫

福建是个古老而美丽的地方。在漫长的地质演变中，它历经“沧海桑田”的变迁，形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武夷山、雪峰山……山中杉松荟萃，云雾缭绕；婀娜多姿，气势磅礴的闽江，更是常令游人流连忘返。我们把视线转到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之后，留在当地的游击队艰苦斗争的历程。

### 一 拳头与跳蚤的较量

#### “你还是回到闽西去”

苏区干部好作风，  
自带饭包去办公。  
日穿草鞋干革命，  
夜走山路访贫农。

闽西革命根据地群众，经常用这首山歌来赞扬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

张鼎丞，1898年出生于闽西永定县一个贫农家庭，从小参加田间劳动，上学时断时续，到18岁才读完小学。他学过中医，教过书。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在当地开展农民运动。

1928年6月30日，在张鼎丞的指挥下，数千群众手持土枪梭标，肩扛土炮，浩浩荡荡从四而八方进攻永定县城。武装暴动队伍把个县城围困了三天之久。之后，他组建了福建省第一支红军

部队·· 红军营。

从1929年上半年张鼎丞开始配合红四军入闽作战。他先后担任县苏维埃主席、闽西苏维埃主席、福建省苏维埃主席、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土地人民委员等职，在闽西群众中享有崇高威信。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前夕，毛泽东曾对张鼎丞说：“你还是回闽西去，那里你熟悉，可以坚持，可以发展。”1934年底，陈毅、项英都同意他回闽西去打游击。他即与刘永生等，昼伏夜行，翻山越岭，冲破敌人重重封锁，回到上杭、永定苏区。

三年游击战争结束后，1939年7月，张鼎丞奉党中央之命到达延安。毛泽东一见到他，非常高兴地紧紧握着他的手，深情地说：“你回到家来了，路遥知马力。”

1941年皖南事变后，张鼎丞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七师师长（未到职）。他先后参加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放后，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四书记、国家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职。1981年12月16日于北京病逝。

张鼎丞无论在哪里工作，总是从党的事业出发，爱护干部、团结干部，他胸怀宽广，公道正派，一贯正确地执行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

闽西地区，面积32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面积的23%。它包括龙岩、漳平、宁洋、永定、上杭、长汀、连城、武平、归化、宁化、清流、平和等12个县，人口250万，其中80%以上是农民，百分之十几是做工的。<sup>①</sup>

闽西东靠博平岭，南与粤东毗邻，西与赣南接壤，北与建宁、泰宁相连，属于汀江流域和九龙江流域。全区山脉纵横，绵亘起伏，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大河小溪交错，地势险要、错综复杂。

闽西地处偏僻，大部分乡村在崇山峻岭之中，交通不便，信

① 《中共闽西特委工作报告》，1930年7月9日。

息不灵。当地民谣说：“上山入云巅，下岭到溪涧，对村喊得应，相通走半天。”山区与外地联系极少。这有利于红军的活动，而不利于国民党军队的“征剿”，土著军阀力量也不强。

闽西封建土地制度的压迫严重，据龙岩、永定、上杭、连城、长汀、武平六县调查，田地平均85%在收租阶级手里，农民所有田地不过15%<sup>①</sup>。加之帝国主义的入侵，使“闽西的手工业便逐渐破产，洋布战胜土布，洋纸打倒土纸，卷烟打倒了条丝。”<sup>②</sup>

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破产，劳苦群众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被迫卖田、卖屋、卖老婆的日益增多，许多人投入革命。

闽西同赣南一样，多为客家人聚居之地，民风淳朴。由于客家人受压迫更深，故其反抗亦烈，团结奋战的精神愈强。

早在辛亥革命时，闽西人民就参加了反清斗争的行列，光复了汀州等县城，赶走了残余清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时期，闽西的先进知识分子邓子恢等，便组织进步社团，创办进步刊物，传播马克思主义。从1926年起，闽西各县陆续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开展了工农运动，有力配合了北伐东路军的作战。

1929年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两次进入闽西，闽西各县普遍举行暴动，仅半年时间就创建了纵横300里，人口80万的闽西革命根据地。1931年秋，闽西与赣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那峥嵘岁月里，闽西的党和人民为中国革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主力红军长征后不久，闽西苏区除零星地区外，均被国民党军占领。

1934年11月，蒋介石下令撤销“围剿”军各路总部，成立绥靖区。任命蒋鼎文为驻闽绥靖主任，闽西划为第十绥靖区，后改为第二绥靖区，以卫立煌、李默庵为正、副司令员，指挥所部对

① 《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1929年7月。

② 《中共闽西特委工作报告》，1930年7月9日。

闽西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实施分区“清剿”。

国民党的兵力部署是：第三十六师驻长汀；第三师驻连城、上杭一线；第八十三师驻永安、宁洋、漳平一线；第十师驻龙岩、永定一线；第五十二师驻宁化、清流、明溪一线；第八十师驻漳州至龙岩公路线上；第四十五师驻长汀至连城一线；第七十五师驻武平。以上八个正规师加上保安团、民团等地主反动武装，共十多万人。

红军方面，红二十四师已调至江西，剩下福建军区及所属十九、二十团4000余人，活动在连城以西至长汀四都一线。另有在永安、宁洋、连城、漳平一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红九团1500余人和明光独立营200余人；在漳州至龙岩公路两侧区域开展游击战争的红八团500余人。以上三支力量不足7000人。反“围剿”失败后，红八团、红九团和明光独立营被敌分割，联系不上，福建军区无法对它们实行领导。

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斗争环境十分恶劣，闽西红军面临着严峻的局面。10月中旬，当敌东路军占领汀州，福建省委机关和红军部队退守到长汀四都的时候，毛泽潭（时任红军独立师师长，曾与福建省军区部队一起活动）、罗化成（时任福建军区后方留守处主任兼省苏维埃武装动员部部长）曾向福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万永诚建议：“放弃四都，将部队编成几个支队，四出袭击敌人，领导中心退到闽粤赣边深山中去。”万永诚拒绝了这一正确建议，继续执行“保卫苏区，等待主力回头”的错误方针，把省军区直属的红军独立第十九、二十团的主力和部分地方武装，集中到四都山上的狭小圈子里。万永诚命令部队天天埋伏山头，等待敌人的进攻，企图打一个歼灭战，幻想以此来改变不利局面。

1935年1月，蒋鼎文在漳州召开全省绥靖会议，制定全省第一期“清剿”计划。对闽西的“清剿”部署是：宋希濂第三十六师负责长汀一线，主要对付福建军区及所属部队；李默庵第十师

负责龙岩、永定、漳平一线，主要对付红八团；卢兴邦第五十二师负责宁化、清流、永定一线，主要对付闽赣军区余部；李玉堂第三师、刘戡第二十三师为预备队，各抽一个团配合第十师，一个团负责龙（岩）连（城）宁（洋）一线，主要对付红九团。2月间，宋希濂部向长汀四都发起猛烈进攻，并逐步缩小包围圈。万永诚固执己见，命令福建省委、省军区机关及第十九、二十团凭借山地死守，终因敌众我寡，被迫步步后撤。

4月间，所剩部队在会昌的松岗山被敌包围，万永诚和省委书记的许多领导人作战牺牲，红军战士大部分阵亡。福建省的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不复存在。

1934年12月，张鼎丞回到四都福建省委驻地，当即被分配到红八团，领导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保卫苏区的斗争。

张鼎丞与红八团团团长丘金声密切配合，避免与敌人死打硬拼，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同敌人周旋。红八团在敌人残酷的第一期“清剿”中，保存了有生力量，并在岩、永、杭三县地区建立了游击根据地。

1934年4月奉中革军委命令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红九团和明光独立营，在吴胜、方方等领导下，曾在永安、连城、漳平、宁洋等县打过许多胜仗，建立了巩固的红色游击根据地。

敌人发动第一期“清剿”时，为了避免占绝对优势的敌第八十师和第三师的猖狂进攻，方方领导红九团、明光独立营离开游击根据地，经永安、连城、上杭县境向龙岩挺进，于3月间胜利到达永定与红八团会合。

此外，在闽西各县也还有数十人以至百余人的游击小分队。主要有：上杭旧县岩下山由钟辉元、涂坤荣领导的上杭游击队；汉髻山由廖海涛领导的代英游击大队；永定溪南由范钦洪领导的永定游击队等。这些游击队，也先后与张鼎丞取得了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原省委已不复存在，张鼎丞便以中共福

建省委代表的名义，在永定下洋的月流召开红八团、红九团等领导干部会议。

张鼎丞在会上分析了红军主力转移以后中央苏区的形势，认为今后的斗争环境将很困难，要作好长期艰苦斗争的准备。张鼎丞最后说：“过去红八团和红九团的任务是在敌后打击敌人，破坏敌人的交通，拖住敌人的后腿，配合红军反‘围剿’，现在应转变战略思想，要尽量避免与强大敌人硬打硬拼，注意保存有生力量。”

会上根据方方的建议，决定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成立闽西军政委员会，作为闽西党政军的统一领导机关，张鼎丞任主席。

张鼎丞接受了大家的重托，并对红八团、红九团今后的活动方向作了指示：红九团主力应以永（定）、（平）和、埔（广东大埔）边为中心，积极向南发展；红八团则以龙岩为中心，巩固和发展岩永靖和岩南潮游击根据地，并相机向南发展。

### “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1935年4月，中共中央分局委员、原福建省委书记陈潭秋与原福建军区政委谭震林率领红二十四师一个营的突围部队，与先行突围的邓子恢，来到永定大阜，与张鼎丞领导的红军游击队胜利会师。

按照中央分局的疏散突围计划，邓子恢与瞿秋白、何叔衡一道，于1935年2月中旬离开瑞金九堡前往闽西，拟与张鼎丞会合。

邓子恢是闽西龙岩县人，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者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他和张鼎丞的领导下，闽西的土地革命如火如荼，很有起色，受到毛泽东的交口称赞。

1932年夏，邓子恢在漳州与毛泽东长谈后，接受中央政府的任命，前往瑞金就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兼财政部长之职。他具有强烈的高度责任感和忍耐性，忠于职守，勤恳工作，为减



少苏区的经济损失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他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力主开展经济建设，发展对外贸易，团结工商业者，反对侵犯中农利益，推动合作运动等等。

这些正确主张被博古无理指责为“向困难投降”的政策，是把财政部的收入“建筑在沙滩上”。更有甚者，博古还在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和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上公开点名批判，诬指邓子恢犯了“一贯的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错误，“对于苏维埃运动的胜利发生动摇”，“是无节气的小资产阶级分子”。

邓子恢在遭受“左”倾中央不公正的批判后，并未放弃自己的正确意见，仍然任劳任怨；积极工作，以党的事业为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完成开发苏区财源的各项任务。后来，项英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恢复了他的名誉。主力红军长征后，邓子恢被留在中央苏区，参加苏区中央局的工作。

1935年2月21日，邓子恢和瞿秋白、何叔衡以及项英的妻子张亮一行，在一部分武装人员的护送下启程。一星期后，他们到达长汀，队伍里又增添了曾经担任过中央妇女部部长的周月林。

从长汀到永定大约有四五百里路，一路山高路险，沟壑纵横。国民党在这一地区派出了大批正规部队和保安团，日夜搜山“清剿”，千百个“乌龟壳”构成一道道严密的封锁线。邓子恢一行为了安全，化装成香菇客商和随行眷属。

为了避开敌入的追袭，他们在福建军区一个排的保卫部队护卫下，小心翼翼地敌入的封锁线上穿行。

一天凌晨他们到达长汀濯田区露潭附近，前面一片宽阔的江水挡住了去路，这就是闽西第一大河汀江。这时，东方已经泛白，他们必须立刻渡过江去。好在这季节是枯水期，河水并不太深。邓子恢指挥大家安全地涉水渡过了汀江，黎明时分到达座落在崇山深处的小迳村。

经过一夜的艰苦行军，大家早已疲惫不堪，饥肠辘辘，邓子

恢决定在此稍作停顿，下午再继续前进。不幸的是，他们的行迹被当地地主武装“义勇队”发现。这一带是福建地方反动武装保安十四团钟绍葵部的“清剿”地区，归属驻长汀的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统辖。该团第二营营部就驻扎在小迳村附近的水口镇。营长李玉得到“义勇队”队长范连升的报告后，马上率部包围小迳村，并通知附近其他“清剿”部队向小迳村围攻。

护送部队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邓子恢当机立断，立刻组织队伍向村子对面的一座高山牛子仁崇转移，希望在那里打开一个缺口冲出去。当他们冲到山上时，敌人另一支部队已经从侧翼包抄过来，堵住了去路，情况万分危急。

年及花甲的何叔衡见激战多时，难以突围，感到自己年迈体弱，不愿牵累大家。他对邓子恢说：“子恢，我不能走了，我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说着就要夺警卫员手里的枪。邓子恢急忙说：“你千万不能这样！”此刻，何叔衡已是站在一处陡峭的山崖边上，就势向山下跳去。邓子恢一步枪去拉他，但已经来不及了。

何叔衡从山崖上跳下时，被敌人的机枪击中。敌特务连代理连长曾起和传令兵熊辉在山崖下发现了身负重师的何叔衡，从他身上搜出了500元港币的公款。这两个匪徒劫走这笔钱，又凶残地开枪打死了何叔衡。

经过激烈的战斗和奔走，瞿秋白自感体力不支，与周月林、张亮隐蔽到一处灌木丛中，准备等待机会再突围出去。战斗结束后，敌人在搜索时捉住了他们。

当夜，敌人吊打瞿秋白，逼问口供。瞿秋白镇定地掩护大家，化名林祺祥，乔装医生，张亮化名周玉莲，周月林化名陈秀林。敌人就把他们当作一般俘虏，关进上杭县监狱的一个集中营。

瞿秋白是江苏常州人，出身于一个破落的“书香之家”。1922年2月在莫斯科考察时，由张太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瞿秋白曾任党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大革命失败后，主持召

开了八七会议，在策划和组织南昌起义，秋收暴动的过程中也起过重要作用。他为党作出了重大贡献，却从不借以炫耀人前，而总是把自己起的作用放在别人后边。他多次对人说过：“搞农运，我不如彭湃、毛泽东；搞工运，我不如苏兆征、邓中夏；论军事，我不如贺龙、叶挺。”

有一次，一位他身边的警卫员说：“你宣传马列主义还是可以的。”瞿秋白听后摇头说：“这方面我比陈独秀、李大钊差远了。早在五四时期，他们就大声疾呼宣传改造中国必取马克思主义学说，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搞无产阶级专政。而当时我还没有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呢！”

30年代初期，瞿秋白身居险境，以病弱之躯，受党中央委托参加“左联”的领导工作，和鲁迅结为亲密战友，坚持文化战线上的反“围剿”斗争。临去苏区前夕，瞿秋白向鲁迅告别，促膝长谈至深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此当以同怀视之。”这是鲁迅亲笔书赠瞿秋白的一幅立轴，瞿秋白一直视为珍宝收藏着。他带着党的重托，带着挚友的嘱咐，离开了上海，前往瑞金。

抵达瑞金后，瞿秋白即到教育部主持工作。期间，他患有肺病，健康状况很坏。但他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地坚持工作，卧床处理文件，而且还常去看望患病的战友。

有一次，王稼祥感动地说：“你带病看病人，我们病好后一定去看望你！”战友们看见他瘦弱的身体，有时设法弄来一条鱼和几只鸡蛋，当煮好送到他跟前时，他总是盘问从哪里来的，推让着不肯吃。有一次，邓颖超从几里路外亲自跑来，送点面粉和白糖给他，并亲手煎了几张糖饼给他吃，算得上是最好的营养品了。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身患重病的瞿秋白被留在即将沦陷的瑞金。徐特立临行时看望秋白，秋白嘱咐他的身强力壮的马夫跟随徐老出征，并把自己的一匹好马给了徐老。

在上杭县监狱，瞿秋白以非党员医生的名义，于3月9日和

4月15日先后写了要求保释的《自供》和《呈文》，同时，还写信转给上海的鲁迅，请求设法营救。

鲁迅收到瞿秋白化名林祺祥的信后，急忙找秋白夫人杨之华商量营救办法。就在这时，敌报上却公布了瞿秋白被捕的新闻。

原来在4月10日，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在会昌松岗山战斗牺牲时，其妻子被国民党第八师俘虏叛变，供出瞿秋白在濯田被捕的情况，于是敌人便到处追查瞿的下落。

4月下旬，瞿秋白被解送汀州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师部，张亮、周月林被解送龙岩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在解送途中，张亮、周月林向敌人供出林祺祥就是瞿秋白。

于是，杨之华写了一封信同时给宋庆龄、鲁迅、茅盾、柳亚子、陈望道、郑振铎、周建人等人，请他们出面设法营救。

柳亚子给了杨之华一封回信，说：“接来信，怅然。孙夫人被监视，我亦一样。心有余，力不足，事与愿违。千万保重身体。”他们都曾为此奔走。但国民党反动派哪肯放过瞿秋白。

柳亚子先生为此一直极为伤痛愤慨。他在1949年3月18日由香港到北平时，在火车上和杨之华巧遇，写给她一首五律诗：

太息王丞相，无由救伯仁。  
遗书问真贗，热泪总酸辛。  
犹见僭亡史，相怜后死身。  
恩私何以报，尽瘁为斯民。

他在附记中再次提及当年未能营救秋白之事，说这是他“引为终身遗憾之一，甚愧他日无以见秋白于地下也。”

叛徒出卖瞿秋白后，蒋介石派特务从南京到长汀向秋白劝降，秋白岸然地说：“人爱自己的历史，甚于鸟爱它的翅膀，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特务阴险地劝秋白学顾顺章那样“识时务为俊杰”。

顾顺章原为中共党员，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被捕后叛变，做了国民党的鹰犬。

瞿秋白厉声斥敌：“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我情愿作一个不‘识时务’的人，不愿做一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

瞿秋白在狱中的一张照片上写下了如下题词：“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这并不是格言，也不是哲理，而是另外有些意思的话。”

由于劝降无效，蒋介石于1935年6月中旬，下达“瞿秋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的电令。

在杀害秋白的前一天，敌人拿出电报给瞿秋白看，对他说：“瞿先生最后应再三斟酌，如能回心转意，尚可望介公收回成命。”瞿秋白淡然一笑，断然说：“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已，是最大的光荣。”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高唱《国际歌》、《红军歌》，走向汀州西门外的罗汉岭刑场，最后高呼“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等口号，坐在地上从容就义。时年36岁。当天下午，瞿秋白的遗体由当地人民埋在罗汉岭下盘龙岗上。

邓子恢凭借地形熟悉，脱离险境，回到四都福建省委驻地。当时，正值陈潭秋和谭震林率领红二十四师一个营从赣南突围来到福建省委，准备去闽西同张鼎丞会合。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和战斗，于4月间到达永定大阜，部队仅存100多人。加上红八团、红九团、明光独立营等部队，闽西共有1000余人的红色武装。

1935年4月中旬，陈潭秋以中共中央分局代表名义，在永定溪南赤寨召开了闽西南党和军队领导干部联席会议。这是主力红军长征后，闽西南党、政、军领导人的第一次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陈潭秋、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方方、朱森、谢育才、吴胜、丘金声、丘织云、范乐春、廖海涛、刘永生、

魏金水、伍洪祥、郭义为、温仰春等。

陈潭秋传达了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给分局的电报指示，并在会上指出，根据目前形势和党中央最近的电报指示，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游击队，不宜再集中兵力打正规战，应当就地分散坚持游击战争。他说：“闽西南地处闽粤赣三省边界，境内高山峻岭多，地形很好，是坚持游击战争的好环境。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一批领导干部和群众有血肉相联的关系，深孚众望，各支红军游击队又有了游击战争的经验，只要我们依靠群众，游击战争一定能够胜利地坚持下去。”

会议经过反复讨论，一致赞成陈潭秋的意见，研究确定了党在闽西南斗争的基本方针和任务：“我们的战略方针只能是开展广泛的、灵活的、群众性的、胜利的游击战争。在军事上粉碎敌人的‘清剿’，保存有生力量，锻炼现有部队；在政治上保持党的旗帜，保持党与群众的密切关系；在组织上保持党的纯洁性、战斗性，保持各地领导骨干安全与团结。”

会议选举成立了闽西南地区最高领导机构，即把不久前成立的闽西军政委员会加以充实，改称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推举张鼎丞为主席，邓子恢为财政部长兼民运部长，谭震林任军事部长，郭义为任党务部长，朱森任参谋长，方方任政治部主任。委员除以上六人外，尚有吴胜、伍洪祥、廖海涛、罗忠毅、魏金水、丘金声、丘织云、刘永生、范乐春、谢育才、简载义、黄火星等。

在军事部署上，会议决定成立四个军分区，以发挥各部队独立作战的优势：以红九团第二营和明光独立营组成第一作战分区，罗忠毅任司令员，方方任政委，活动范围是龙岩、连城、宁洋三县地区；以红九团第一、三营和永东游击队组成第二作战分区，吴胜任司令员，谢育才任政委，任务是开辟永定、平和以及广东大埔、饶平各县边区，打通与闽粤边游击队红三团的联系；以红八团和龙岩的游击队组成第三作战分区，丘金声任司令员，丘织云

任政委，活动范围是龙岩、南靖、漳平三县；红二十四师 100 余人，卓林大队以及永定、上杭、新汀杭等县独立营，组成第四作战分区，坚持在永定、上杭地区活动，由张鼎丞、谭震林直接领导。

为了加强对各地工作的切实领导，并避免领导人过分集中可能遭受意外损失，军政委员会几位主要负责人实行分散活动。张鼎丞留在永定，邓子恢到永定东部金丰大山，谭震林到上杭，方方回岩、连、宁，吴胜和谢育才到闽南。陈潭秋因在突围战斗中受伤，经广东汕头至香港治病。

会议结束后，各部红军游击队按照会议部署，分头进入指定作战地区。从此，闽西南地区的游击战争全面展开。

### 李默庵“驻剿”劳而无功

1935 年春夏间，进占闽西的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李默庵，鉴于第一期“清剿”未能达到消灭红军游击队的目的，又投入更大的力量，发动极为残酷的第二期“清剿”。

在军事上，改变过去大兵团分进合击的战术，实行“驻剿”和“搜剿”。由“搜剿”部队在各机动地点往返逡巡，一旦发现红军踪迹，即四面八方进行“搜剿”、“追搜”、“围剿”。“驻剿”部队则分别钉在各城区、乡镇，广筑炮楼、碉堡，封锁交通，限制红军游击队的活动。配合“搜剿”部队实行“堵剿”、“追剿”。在此残酷严密的“清剿”之下，整个闽西地区的城镇、乡村、交通要隘，到处碉堡密布，公路纵横，敌军官兵耀武扬威，反动气焰极为嚣张。凶恶的敌人在搜不到或追不上红军游击队时，便实行烧山、封山，无所不用其极。

在政治上，采取残暴的法西斯统治，对当地居民实行“移民并村”、“隔离政策”，规定在“清剿”期间，群众不得进山，否则“格杀勿论”；强令山区 50 户以下的小村庄居民须全部迁移到大乡

镇居住，并且筑起炮楼实行监视。在村内强化保甲制度和连坐法，“一家通‘匪’，十家连坐”。同时，又颁布“自新自首条例”，实行对红军和革命分化瓦解政策。

在经济上，实行经济封锁。对老百姓“计口售粮”、“计口售盐”。“凡通匪、窝匪、济匪、知匪不报者，一律格杀勿论。”

在国民党军的淫威之下，各县还乡的恶霸地主、土豪劣绅，趁机进行“清算”、“倒算”，甚至对红军家属实行“斩草除根”、“杀人灭种”，以发泄他们对革命的刻骨仇恨。

李默庵是湖南长沙县人，早年和徐向前、陈赓、胡宗南、贺衷寒等考入黄埔军校一期学习。他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离开共产党，为蒋介石打天下立下汗马功劳，成为蒋的心腹爱将，被誉为又文又武的“全才”。然而，他参加“剿共”却没有多少成绩。1932年他在鄂豫皖一次作战中，差一点作了陈赓的俘虏。1934年率部参加闽西的“围剿”，由于处处小心，没吃大亏。主力红军长征后，他受命负责闽西的“清剿”；总想作出些成绩来，好向老头子交待。可是运气不佳，第一次“清剿”失败了，第二次便竭尽全力，企图彻底消灭闽西的红军游击队。

残酷“清剿”何所惧，艰苦卓绝举红旗。在残酷的第二期“清剿”中，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红军游击队，运用广泛的、灵活的游击战略战术，不断战胜敌人的“驻剿”、“堵剿”、“搜剿”、“追剿”，取得很大胜利。

活跃在龙岩、漳平、南靖之间的红八团，时而集中，时而分散，穿插于马路、碉堡周围，甚至在敌人的鼻尖底下活动，而不被敌人发觉。

他们特别善于声东击西，往往早晨在龙岩的黄坊、白土之间，而晚上却又转到了适中圩、三坪头、竹子板一带，过几天又出现在紫金山麓之赤水、石碑前周围。白天在山坑、马路上埋伏打军车，晚间又在东桥板放火烧飞机场。有时化装成白军，喊开碉堡



楼门，一举全部收缴民团枪支，有时又化装成挑担农民，收拾抽收“货担捐”的土豪劣绅，真是神出鬼没敌胆寒，胜利消息天天有。

1935年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作战参谋长朱森叛变，向敌人提供了红军游击队的活动情况。敌人借此大吹大擂，造谣说红军游击队已被消灭，红八团团长丘金声已被击毙等。甚至在报纸用通栏标题登载“闽西共匪业已全部消灭”的消息。李默庵还苦费心思，在龙岩城内四处张灯结彩，声言召开所谓“剿匪祝捷大会”。

为戳穿敌人的骗局，红八团团长丘金声亲自率领一个连红军战士，利用夜间敌人不备的时机，一举占领龙岩西门外的虎岭山，控制碉堡，接着冲进敌军医院，缴获了大批药品，并向伤兵宣传红军的政策。

丘金声在医院打电话给李默庵，警告他小心点，不要乱吹牛。李默庵目瞪口呆，慌忙派兵追击，但红军早已无影无踪。

红八团夜袭龙岩城的消息迅速传遍四方，人们编出顺口溜讽刺李默庵：

牛皮王，李默庵，胡说红军完了蛋。  
庆祝会，胜利捐，又想发财又升官。  
丘金声，真果断，带兵夜袭龙岩城。  
占医院，打电话，大炮司令吓破胆。  
又折兵，又赔钱，气死司令李默庵！

永定、上杭二县的红军游击队，在张鼎丞、谭震林、刘永生、范钦洪等的领导下，活跃于金沙、合溪、丰稔、庐丰、丰市、湖雷、溪南及永定城郊一带，使敌军八十三师和杭、永的地主武装疲于奔命，穷于应付。

一次，张鼎丞到永定县的红色基点村古木乡开展工作。古木

乡附近的山顶是敌人的碉堡，驻有一连敌军，在距离碉堡不远的山脚下有个山洞，张鼎丞就在山洞里住了几十天，了解敌情，布置工作，指挥作战。山上的敌人每天早上吹号出操，还叫喊“活捉张鼎丞！”可是，就在他们鼻尖底下的张鼎丞，却安然无恙。

由方方、罗忠毅等领导的红九团第二营和明光独立营，由于敌人的围困，无法进至军政委员会指定的作战区域。他们在与第一作战分区政治部主任温含珍领导的第十七、十八团留下来的少数红军部队会合之后，转入敌人后方的永安、清流、连南、宁洋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敌人为了消灭这部红军游击队，曾实行一套严密的“搜剿”和“追剿”办法。他们在搜山时，白天观烟火，夜间看火光，观察水坑中是否有菜叶、米粒、粪屎，河流上是否有人来往，遇密林以机枪扫射，逢草山放火焚烧，搜山则先以主力置于高峰，然后由下而上逐渐搜索。

勇敢机智的红军游击队，也总结出一套相应的办法来对付狡猾的敌人。如烧火用枯枝、细柴，使之不冒烟。夜晚烧火的时候，上下左右都围上军毡或草席，做到不透火光。洗米洗菜洗碗筷时不掉片菜、粒米。大小便随厕随埋，涉水过河注意不踏掉石头上的青苔。敌人烧山时躲在石头边，火烧不着，敌人追击就从山腰走，在高山密林中和他捉迷藏，使敌人看得见而抓不着，等到晚上才走开。

在斗争中，红九团第二营和明光独立营等红军游击队，不但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还消灭了许多地方武装，在连城、清流、永定、宁洋地区建立了新的红色游击根据地。

革命向闽南发展的红九团主力两个营，执行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开辟新的游击区与闽南红三团连成一片”的指示，常常采用远程奔袭的战术，结合便衣短枪活动消灭敌人。

1935年下半年，红九团主力在永定、平和、南靖、大埔、饶

平等县边境地区打了许多胜仗。后来，在平和县樊山地区与闽南红三团胜利会师，在闽粤边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曾在饶平的下善同广东军阀李汉魂部激战，击溃其一个营；在平和的刺牛岗粉碎敌八十三师一个团的进攻；在大小芦溪打破数路敌人的围攻。

1935年11月，红九团在强敌跟踪的情况下，从闽南回师闽西，一路上又遭到敌人的围追堵击，兵员损失很大。

当部队退到永定湖雷时，叛徒朱森带着敌人搜山，红九团被优势敌人所包围。指战员一连三天没有吃饭，没有睡觉，连续冲杀，团长吴胜等大部分指战员牺牲，政治部主任赖荣传仅带着几十个红军战士冲出重围，转移到金峰的深山密林里。不久，赖荣传也在反“清剿”战斗中牺牲。

红九团保留下来的50多名指战员，后来改编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直辖的特务大队，由原红九团一营营长赵群任大队长，原一营教导员张清辉任政委，在永、和、埔一带继续坚持斗争。

在敌人进行猖狂“进剿”的情况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为保护群众，采取了灵活、巧妙的斗争方式。过去，游击队在红色基点村贴布告、散传单，群众往往遭到反动派报复。于是，游击队便把布告和传单直接交给群众，让他们晚上贴出来，拂晓又撕下来送交联保主任，并沿途高喊布告、传单上所写的内容，用这样的方法，既达到了宣传的目的，又免于使群众遭受“通匪”和“知匪不报”的打击。

对于保甲制度，红军游击队起初曾主张打击、杀过一些保长。但在敌人的威胁之下，还得组织新保甲。于是，红军游击队便采取争取保甲长的策略，建立“黄色村庄”，利用保甲制度来掩护群众工作和群众斗争。

红军游击队还有意识地保存一些灰色据点，故意不在那里打仗，不在那里贴标语和公开发动群众斗争，使敌人不注意这些地方，以利于红军游击队刺探敌情，休整部队，安置伤员，采购物

资。

红军游击队的每一个胜利，都是与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红色基点村的群众为帮助红军游击队克服困难，用种种巧妙的办法，冒着生命危险，把平时节省下来的粮食、盐巴凑起来送给红军游击队，并及时地为红军游击队送信，报告敌情。

女共产党员陈客嫵，是当时红军游击队的一位接头员。她舍生入死，经常挑着一担特制加工的双层粪桶，把粮食和盐巴装在底层，上层装粪，一次又一次地为红军游击队输送物品。有时，敌人实在查得紧，她就利用上山砍柴的机会，腰间挂一个鼓鼓的蒲草饭袋。敌人看了有点怀疑，拿起饭包袱一掂，问道：“你一个人吃这么多饭？”陈客嫵回道：“早出晚归吃两餐，砍100多斤生柴，还要挑十几里路，这一点饭只够填肚角，你再加这么多，我也给你报销。不信，就打赌！”敌人被搞得无话可答，狠狠地瞪她一眼走开了。陈客嫵进山砍半天柴后，暗中把双层饭包打开，取出盛饭的里层饭包，藏在树间岩洞里，身上仍挂着一个空饭包，应付敌人。为了支援游击队，她空着肚子砍柴，实在饿得没劲，就采点山果充饥。

晚上，游击队收到饭包，拿到宿营地打开一看，饭里还夹着许多菜，她把过年省下来的一点腊肉也装在里面了。队员们高高兴兴地吃着，赛似过年。

陈客嫵不幸被发现抓住，残暴的敌人剥光她的衣服，用大束香火烧灼她的胸脯，割去她的乳房，在伤口上撒上盐巴，逼迫她供出红军游击队的下落。陈客嫵忍受百般凌辱和酷刑，她始终一言不露，敌人把她绑在柴堆上，以烧死相威胁。陈客嫵依然坚强不屈，面无惧色，最后在熊熊烈火中壮烈牺牲。

敌人以数万大军“进剿”分散活动的不足千人的游击队，无异“以拳头打跳蚤”，不能凑效，李默庵第二期“清剿”又以失败告终。

###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1935年底，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通过在上海的联络站与党中央交通站取得联系，得到了党中央“关于开展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指示。

1936年1月1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上杭双髻山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会议一致决定接受并执行中央关于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指示；确定把闽西红军独立第八团、第九团等部队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闽西南抗日讨蒋军，下辖第一、第三、第五、第七支队，各县游击队则改编为人民抗日义勇军；重新选举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机构，仍以张鼎丞为主席，增选邓子恢、谭震林为副主席。

1月3日，由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领衔发布了新编第一号布告。

1月5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又发布了抗日讨蒋纲领。这是由邓子恢执笔的一份极为朴实而通俗的六言体布告：

嗟我中华民族，危机一发千钧。东北四省沦亡，千万同胞遭残。……嗟我华北河山，做了满洲第二。日本野心不止，正在侵略福建。……蒋贼养兵百万，不去保卫国土。对日一枪不打，却来残杀民众，华北几十万兵，全数撤回“剿共”。……总要抗日讨蒋，愿与联合战线。即使区乡所长，以至地主富农。只要有心救国，不再压迫工农。本会不咎既往，凡事尤可商量，总之大敌当前，当此国家危亡。凡我爱国人民，必须集中力量。共同抗日讨蒋，大家各尽所长。争取国家民族，独立自由解放。

红军游击队的宣传员结合形势，编了许多新的山歌、小调，在

群众中传唱。当时，在闽西南地区的群众中，广泛地流传着一支宣传抗日救国的小调，名叫“七劝救国歌”：

第一劝来劝农民，国家要粮来养兵，  
你是有心来救国，耕田种地要认真。  
第二劝来劝劳工，铁厂打铁爱烧红，  
制造刀枪送前线，打得鬼子叫阿公！  
第三劝来劝商家，贩卖日货差又差，  
拿出银钱帮鬼子，制造枪炮打自家！  
第四劝来劝学生，敌人凶狠唔使惊，  
宣传大家打鬼子，收回失地好名声。  
第五劝来劝军人，莫怕死来莫贪生，  
开到前线打鬼子，勿再来打自家人。  
第六劝来劝女人，唔使烧香去求神，  
你是有心来救国，劝郎劝子当红军。  
第七劝来劝大家，人唔团结十分差，  
大家武装来抗日，要知有国才有家。

除了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外，红军游击队还全力进行武装宣传活动，在军事行动上改变过去的做法，如对碉堡民团只喊话不打枪；对乡、保长的反动行为采取先写信劝告、警告的办法，而不立即对他们实行制裁；对城市商人贩运货物实行保护；对富豪筹款改为力劝募抗日捐；对蒋介石嫡系的粤军，除被迫自卫外不主动进攻，并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愿与粤军合作抗日”等口号。

在抗日反蒋新局面迅速发展的形势下，闽西南各游击队愉快地渡过了1936年的新春佳节。在这前后，张鼎丞等都希望长期过着单身生活的邓子恢寻找一个革命伴侣，有利于他在目前艰苦的

游击战争环境中更好地为党工作。

邓子恢原先的夫人曹泉地，在先后生下三个孩子之后，由于长期过着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活，又受到国民党的监禁摧残，幼子夭折，身心受到严重损伤，不得不于红军长征前带着两个年幼的子女返回家乡，为了避免他们母子遭受反动派的迫害，邓子恢与曹泉地办了离婚手续。

春节前后，邓子恢与在石门炉机关工作的陈兰结了婚。

陈兰原名金娣，与邓子恢同乡，是个勤俭朴实的农村女青年。她出身贫寒，6岁就被卖到偏僻的石门炉山区当童养媳。红军长征后，她毅然上山投奔了游击队。在艰苦的岁月里，邓子恢和陈兰相爱了。结婚时，没有婚礼，也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新房就是座落在密林深处用竹片扎起的四面透风的山寮。

国民党当局没有因国难深重，民族危机而改弦更张，也没有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提出“抗日讨蒋统一战线”而改变政策。1936年春，又开始对红军游击队的所谓第三次“清剿”。

不过，由于红军游击队执行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工作深入细致，争取了许多保甲长和“白色碉堡”。他们有的表面上挂着国民党的招牌，实际上却为红军游击队服务，成为“白皮红心”；有的则严守中立，与红军订立了“君子协定”，互不侵犯。

所以，国民党军的第三次“清剿”，看似气势汹汹，实则虚张声势。两广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立刻调动大军南下，讨伐西南军阀。闽西国民党中央军也被急调入粤，征讨陈济棠。“清剿”也因此中止。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对两广事变进行了研究，认为：“两广事变是敌人内部的分裂。反蒋抗日的口号，和我们不谋而合，我们应该予以支持。蒋介石大军南下，战争可能像过去的军阀战争延续下去，一年甚至一年以上。”

基于此，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作出了《关于西南事变与目前的

紧急任务的决定》，布置全党紧急动员起来，进行如下工作：

（一）在军事上立即采取初步集中，集结自己的优势兵力，消灭苏区周围的反动武装，阻止蒋介石中央军向广东开进，配合两广军队反蒋。

（二）组织农村暴动，重新分田分山，彻底实现土地革命，成立公开或半公开的苏维埃政府机关。

（三）有计划有步骤的去争取游击队、游击组、自卫队整队加入红军中来，争取壮丁队及白军哗变暴动队伍变成红军。

（四）用最快的速度，实现每村一个游击组（15人），每乡一个游击队（30人）的口号，恢复苏维埃。

（五）组织壮丁队的暴动潮，号召群众不当壮丁，当自己的红军游击队员；号召群众起来焚毁一切炮楼，消灭一切堡垒；号召群众不当保甲长，枪杀反革命的联保长，打倒区乡公所。

蒋介石在平息两广事变之后，又腾出手来对付红军和南方各省游击队。9月26日，国民党的《福建民报》宣称：“驻闽绥靖主任蒋鼎文，自粤垣返漳后，决心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剿抚并施，闽西南剿匪军事，已积极布置。”

10月28日，蒋鼎文及其驻闽绥靖公署由漳州北迁建瓯。驻防闽西南的“中央军”各部随之相继北调。这样，由蒋鼎文亲手部署的第四次“清剿”计划，由于国民党军的换防，未得全面实现。

1936年11月上旬，被蒋介石收买的余汉谋第一五七师之黄涛部，第一五八师曹友仁部相继开入闽西南，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号下，向闽西南游击队大举进攻，是为第五次大“清剿”。

在军事上，粤军沿用“中央军”所采用的“移民并村”、“筑堡封锁”、“保甲连坐”等手段外，还着重采用分散伏击、远袭、夜袭、整营的拉上山去过夜，发现游击队，立即包围搜山。在政治上，粤军打着“抗日救国”的幌子，大搞欺骗宣传，说什么“中



央军”不抗日，广东军抗日，提出“欢迎红军下山来共同抗日”、“反对第三师的烧、杀、抢”等口号，而暗中却秘密刺探红军游击队情况，并利用叛徒打入游击队内部进行破坏，指使地主武装向游击队进攻。不久，粤军就大肆捕杀群众，全面展开了对红军游击队的残酷“清剿”。

在粤军入闽之初，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认为，粤军参加过两广事变，“受过西南抗日的洗礼，受过群众抗日的熏陶”，加上蒋介石对他们分化瓦解，闽西南又声援过他们，他们对红军作战会采取消极态度。于是，张鼎丞、邓子恢决定对粤军采取先打后拉的方针。

1936年2月，闽西红军三、五、七支队集中于永定湖雷、陈定坑一带，遭到粤军猛烈进攻。红军游击队拼死抗击，打退了粤军，但本身也受到较大伤亡，闽西南游击战争又一次陷入困难境地。

面对新的困难，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马上改变红军集中作战的方法，重新分散游击，尽快扭转被动局面。一方面在军事上开展灵活的游击战争，打破粤军的“清剿”；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对粤军展开攻势，进行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工作。

先是发出致粤军军官士兵的信，号召粤军官兵“立即停止对法西斯烧杀移民政策的执行，停止进攻抗日的红军游击队。”<sup>①</sup>并且宣布：只要粤军立即停止对红军的进攻，接受抗日的号召，红军游击队立即放弃敌对行动，与之订立抗日作战协定。

1937年1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又发出《为联合救国致闽西一切爱国志士的一封信》，诚恳希望与闽西南各界同胞及爱国志士“本着互相商讨之精神，泯彼此僭嫌之成见”，共同发起组织闽西南各界救国联合会，切实磋商闽西南抗日政府、抗日联军的

<sup>①</sup>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致粤军军官士兵的信》，1936年11月。

建立，以完成救国救省的任务。

由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及时变更方针，在粤军入闽“清剿”的三个多月里，粤军不断遭到红军游击队的打击，得到的“只是部队的逃亡、疲惫、死伤和社会舆论的反感。”

一天，三辆军车在上杭至龙岩的公路上疾驶。公路随山盘旋，一个急转弯，前面是一片丘陵，从路旁树林中走出五个粤军官兵，挥手拦车，军车“嘎”地刹住了。从中间一辆车的驾驶室，下来一名身材魁梧的少尉军官，向拦车人一打量，见为首的也是一名少尉，便问道：“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拦车的是廖海涛带着四名游击队员，他们穿着五套过去缴获的粤军军装。这时廖海涛上前回道：“粤军一五七师。你们是中央军路过此地？”对方傲慢地说：“正是！”

这时，一名游击队员上前两步，先发制人说：“此处已进入我师辖地，请出示证件。对不起，这是手续。”

对方不高兴地伸手从口袋掏出一封信，那队员接过看了，态度立时变得热情起来：“原来是孙连长，欢迎欢迎。”

那队员又指着廖海涛介绍说：“这是我们特务连吴连长。此地离龙岩还有50余公里，路不好走，弟兄们没吃午饭吧？我们在庙里做了饭菜等候，请饭后再走。”说话时指指路旁不远处的一座庙宇。

孙连长掏出怀表看一看，已经下午3点钟了，便对车上人员说：“好，下车吃饭。”

敌人跳下车，驾驶兵也走了出来，孙连长正要留下几个人守车，廖海涛说：“这里是我的地盘，不用担心安全。”

廖海涛在前面引路，告诉他们：“算你们有口福，昨夜打到一只猪，红烧一大锅，又香又烂哩！”这一说，敌兵争先向古庙走去，接近庙门时，果然从里面透出一股肉香味。

敌人进了庙门，廖海涛在后面大喊一声：“客人到！”埋伏在

殿堂和两廊的游击队员，同时奔出，用枪口对着他们。敌人知道中计，急转身想夺门而逃，廖海涛的粗大身子堵在门口，手上的慢快机枪张开机关对着他们，大声喊道：“游击队优待俘虏，举起手来！”游击队员上前缴了他们的枪后，那个孙连长懊丧地说：“想不到在这里受你们的骗！”廖海涛嘲弄地说：“谁叫你们嘴馋！我们可没骗你，说了请你们吃山猪肉，就请你们吃，并不悔口。”俘虏们虽然吃上了山猪肉，由于心情太坏，吃得索然无味。

1937年3月，粤军初进闽西时那种傲慢凶残的气势低落下去了，不能再进山向红军游击队发动进攻，第五次“清剿”随之结束。

红军游击队在反“清剿”战斗中由小到大，发展到3000人，党的组织建立了八个县委，即上杭、永定、龙岩、永和靖、永埔、岩永靖、岩南漳、岩连宁。

### 陈仪难不倒邓子恢

1936年12月中旬，张鼎丞、邓子恢得到一张汕头出版的《星体日报》，一行特大字号的标题赫然入目：“蒋介石西安被扣，张学良抗日主张。”从中，他们获悉了西安事变的消息。不久，他们又从香港来的报纸上读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新闻。

张鼎丞、邓子恢预感到中国革命已经进到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兴奋地揣摩着即将到来的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局面。

但是，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与中央失去联系已经一年多了。为了适应历史性的重大转变。大家一致认为迫切需要派代表向党中央报告工作，请求党中央对闽西南斗争给予新的指示。军政委员会当即派方方赴延安完成此项使命。方方出发不久，闽西南地区的局势因“西安事变”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1937年5月间，驻香港的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通过闽南红三团转来了给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一封信。指示：在目前新

的形势下，中央的方针已经由抗日反蒋变为联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立即在永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根据南委来信精神，在闽西南开展和平运动，推动粤军和国民党当局与红军游击队合作抗日。

张鼎丞、邓子恢以个人的名义，分别向漳州、厦门、汕头、潮州、香港、广州、南雄、赣州各地的同乡会、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同学、亲友等写信，陈述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顾全大局，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愿停止内战，停止土改，希望他们多方推动当局参加谈判，共同抗日。

这一步骤在闽西造成了一股强大的抗日声势，街谈巷论处处是要求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呼声，就连自诩反共十多年的龙岩大绅士郑笔生，也在闽西旅漳厦同乡会的一次士绅会议上说：“我反共反了十多年了，反不了，今天我也赞成和平，难道你们还有比我更好的办法吗？”

这时，原国民党十九路军的营长谢再发，从香港返回闽西家乡。谢再发出身贫苦，参加过福建事变，并曾与闽西共产党组织有过密切联系。十九路军被蒋介石瓦解之后，谢再发不愿受编，把跟随自己的几十个人转给了龙岩地方红军，只身前往香港避难。他这次回来，准备利用他与粤军的老关系，促成闽西南国共合作。

闽西南的国共合作抗日谈判，比赣粤边游击区的谈判要早三个月。为了在谈判中留有余地，争取主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先派谢育才与粤军作一次试探性接触。

1937年6月15日，谢育才在谢再发陪同下，由龙岩适中到达漳州，面见粤军一五七师师长黄涛，黄涛对红军代表的到来，虽然表示欢迎，但并未作出实质性的承诺。他要谢育才回到闽西去，同驻龙岩的他的部属四六九旅旅长练惕生作具体谈判。谢育才与练惕生达成练惕生与张鼎丞或邓子恢举行正式谈判的协议。

7月10日，邓子恢、谢育才在谢再发的陪同下，乘汽车进入龙岩县城。“群众闻讯，夹道欢迎，满城鸣放鞭炮庆祝。”

谈判在粤军四六九旅旅部举行。开始非常顺利，但最后在红军集中点编地点上发生分歧。邓子恢警觉到国民党坚持要红军集中在同一地点，包藏着阴谋缴械和扣留红军游击队的祸心，因而坚持红军分地集中。

正当谈判相持不下之际，从闽南传来红三团在漳浦陷入敌人预设的奸计，被包围缴械的惊人消息，邓子恢为此向粤军提出严重抗议，指责黄涛背信弃义的卑劣行径。为了顾全大局，防止亲日派从中捣鬼，邓子恢仍然克制了激愤的感情，坐到一起谈判。他指出：“由于贵军背信弃义，制造漳浦事件，部队很不放心，因此坚持分地集中。兄弟个人是相信在闽西不会有漳浦事件发生，但对部队很难说明。”

经过邓子恢坚决斗争，练惕生不得不同意了邓子恢的意见，订立了口头协定，商定红军游击队从8月13日开始，分别在白沙和下洋、芦溪集中。

7月29日晚，邓子恢与粤军代表练惕生，国民党专署代表张策安三方，在龙岩商会就正式谈判条文达成协议，签字生效。

8月中旬，闽西各地红军游击队基本集中完毕，下旬，部队分头在集中地点点编。这时，练惕生旅已离开龙岩开赴前线，国民党在龙岩成立师管区，由徐思宗任师管区司令。

点编那天，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派代表来到闽西，和徐思宗一起，由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办事处（国民党方面称之为“张、邓部队办事处”）主任谢育才陪同，来到红军集中地点点编，并分别代表军政当局讲话。

邓子恢在点编大会上以红军代表身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向全体指战员阐述了党和红军在目前形势下的斗争目标和战斗任务：

同志们，本年来我们所努力的和平，现在已经实现了，今天我们部队在此集中受政府点验，编成正规部队。我们现在已经抗日有路了，应该更加提高我们顽强抗敌艰苦奋斗的精神，加紧军事政治训练，使我们部队，成为更坚强的抗日武装。我们每个战士，应时刻准备着我们的血洒到华南抗日最前线去。……同志们，我们是阶级的队伍，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我们是在土地革命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我们没收过地主阶级土地和财产，我们打了不少土豪，过去我们是两个阶级的对立，但现在此民族危亡面前，这种阶级敌对现象，是不能容许的，民族利益高于一切，阶级利益应该服从民族利益。……同志们，和平已经实现，抗战已经爆发，配好我们的枪弹，磨利我们的刺刀，准备我们的血……进攻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拼个你死我活吧，我们要准备着比以前更残酷更艰苦的斗争，来完成我们抗日救国的艰苦任务，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胜利。<sup>①</sup>

可是，当红军游击队点编并换上国民革命军的服装后，徐思宗和国民党龙岩专署专员张策安秉承陈仪的意旨，玩弄新的花招，要红军游击队编为省保安团，才能发给军饷。

对此，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向徐思宗、张策安严正指出，红军游击队的番号只能改为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政府当局若不发放军饷，义勇军便不停止征借运动，徐、张只好承认这个番号。至于军饷问题，双方争执多时，最后才肯发给少量经费。

1937年10月初，在上杭白沙召开了中共闽粤边区代表会议，

<sup>①</sup> 《邓子恢同志在点编大会上的讲话》1937年8月。

由延安回来的方方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会议根据新的形势，决定撤销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选举成立了中共闽粤边特委领导机关，由张鼎丞任特委书记，邓子恢任宣传部长，方方任组织部长，谭震林任军事部长。

10月下旬，日寇侵占金门、厦门，漳州处于危急之中。10月28日，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给粤军一五七师师长黄涛、旅长练惕生等发出“快邮代电”，指出：“暴日横竹，金门失陷，消息传来，全闽震愤。……凡我军人，都应一致奋起，杀敌御侮，以救危亡。”强烈要求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开赴漳、厦抗日前线，与友军协同作战，抵抗日寇进攻。

陈仪通过粤军一五七师师长黄涛给义勇军发来电报，声称准备派汽车来接运部队到前线，企图将计就计，乘机缴红军游击队的械。

闽粤边特委经研究分析后，认为陈仪令黄涛派车来接运的用意不善，其目的是想重演“漳浦事件”，并吞红军游击队。于是，特委复电黄涛：“一、知道前线紧张，立即整装待发；二、行军路线：取道永定、平和转漳浦，到达东山前线，不经过漳州城；三、我们步行，请不必派汽车来接；四、划出一定防线，以便与粤军并肩作战。”同时，特委还大量印发《告别闽西父老书》，以示义勇军抗日决心。

黄涛接到电报后，知道义勇军不易就范，又害怕义勇军开到闽南扩大政治影响，于是只好打消吞并的念头，复电义勇军：“静待命令，不可擅自行动！”

然而，陈仪吞并之心不死，11月间，又派代表李伟夫专程到达龙岩，面见邓子恢，要邓子恢带队伍到龙岩城里接受“检阅”，阴谋趁“检阅”之机扣留这支抗日武装。

邓子恢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与丘金声只率领驻白沙的抗日义勇军1个营，开到龙岩南门外溪南飞机场附近安营扎寨，与龙岩

城隔河相望，为了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和绑架，他们在部队周围布置了严密的警戒，派出了联络哨。

第二天早晨，邓子恢与谢育才泰然入城，会见李伟夫。李伟夫一开口就要邓子恢跟他去福州见陈仪，并力劝邓子恢将部队改编为保安团。邓子恢早已成竹在胸，准备好了对付的办法。他婉言拒绝了陈仪的邀请，并说：“我们是服从上级的，编制大事，我们边区党委无权决定，兄弟个人不能作主。既然陈主席有这种意思，最好请他转请蒋委员长与党中央商定，兄弟一定服从。”李伟夫听了邓子恢这一番不卑不亢、柔中见刚的话，只得作罢，当天就离开龙岩，返回福州向陈仪复命。

陈仪恼羞成怒，指使龙岩专署专员张策安停发义勇军的军饷和经费。中共闽粤边特委便先向龙岩商会和地方富豪借军费，说明待当局发钱后立即奉还。用这样的办法，既解决了部分军费，又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

1938年1月，遵照新四军军部的决定，闽西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组编时约2000人。

1938年2月间，新四军二支队所属各部奉命从各地区移驻龙岩向白土集结待命。

白土是邓子恢的家乡，由于长期的国内革命战争，邓子恢很少回家，事实上，他早已无家可归。1929年和1931年，国民党军两次纵火焚烧了他家祖辈留下来的那座大院，连同他家附近五六户本族人家的房子也被夷为平地。如今，邓子恢以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公开返回故乡，乡亲们自然很高兴，都来看望他。

白土一时成了令人瞩目的抗日运动中心。

闽、粤、赣边区各地党组织，漳、厦、潮、梅的抗日党派和爱国知识分子，在海外的闽、粤两省的爱国侨胞，都纷纷前来寻找关系，或投奔红军参加抗日战争。

中共闽粤边特委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及时在白土办起了大规



模的训练班，培养抗日干部，或派往各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或充实二支队队伍。

这一行动把陈仪、张策安辈搞得寝食不安，想把二支队早早打发走，为此特地给二支队送来600元开拔“茶水费”。其用意是：“用三支香两张纸，送你们共产党红军快快上前线，让日本的飞机大炮消灭掉。”

1938年3月1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率领新四军二支队1000多抗日健儿，离开白土，北上皖南。留下方方、吴作球、魏金水、范乐春、刘永生、伍洪祥等领导闽粤赣省委坚持斗争。

## 二 何鸣事件的前前后后

### 到敌人银行去取款

闽南，大山连绵，著名的有魁仔石山、写山、梁山。山上草木葱笼，峰岩曲折，物产丰富，村落较多。平和、南靖、漳浦三县交界的魁仔石山，周围有好几百里，红三团的根据地就在这里。

早在1928年间，中共中央就派朱积垒领导和发动了平和县的武装暴动，揭开了闽南地区武装斗争的序幕。

中央红军入漳前，邓子恢、陶铸等曾经在漳浦一带活动过，撒布了不少革命的种子。闽西暴动的风云卷来，闽南立即蔓延起燎原大火，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们拿起武器，和地主武装搏斗，后来聚集成了一支不大的队伍，这就是红三团的前身。

1932年红四军打开了漳州，革命声势更似怒海狂潮，闽南的队伍四处活动，配合主力红军打击敌人。队伍越打越大，后来就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团。红四军拨给红三团一批缴获的枪支，并派严森平等人到这个团来负责军事工作。

主力红军撤出漳州的时候，红三团已经拥有7个连的兵力，在

漳浦、云霄、诏安、南靖等县的广大地区分散活动，不断取得胜利，并在厝仔石山上建立靖（南靖）和（平和）浦（漳浦）中心县工农民主政府，各区各乡也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随后，中共闽粤边特委成立，黄会聪任书记，何鸣、何浚、张敏等9人为委员，统一领导这个地区的党政军工作。

在厝仔石山周围，还有大片的游击区。漳浦东南滨海地区的梁山，是游击队经常出没之处。主力红军北上以后，红三团派一个连到梁山去发展队伍，组成了漳州人民抗日义勇军。

云霄、诏安之间的乌山，有游击队一个独立营在活动。这个营原来叫作红三大队，归中共广东东江特委潮（安）澄（海）沃（南沃）县委领导，在张敏的率领下，活动于广东澄海隆都和潮安秋溪区一带，在秋溪建立革命委员会。后来发展到饶平县的凤凰山、浮山一带，创建苏维埃政权，开展分田运动。

1934年冬，广东军阀邓龙光带着他的第九师再一次蜂涌进了凤凰山苏区。凤凰大山陷入血海里。

中共闽粤边特委指示红三大队迅速撤向福建边境，红三团又派去骨干，组成独立营，由卢胜担任营长，直属红三团指挥，直赴乌山开辟新的根据地。

1935年2月中旬，凤凰山忍住悲痛送别自己的儿女，红军战士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凤凰山苏区。在沉睡中被惊醒过来的森林，一程又一程地护送红军出了广东边境。西边，“凤凰髻”悲戚地隐没在蓝天远处；前面，乌山正伸出雄伟的双臂迎接着自己的主人。

当独立营向乌山转移的时候，红三团在南靖、平和、漳浦三县交界的埔尖山地区，干干净净地消灭了沈东海带领的伪保安团一个营。又乘胜打到乌山边境和独立营会师。两支红军队伍在一起，扫荡了乌山周围100多里的地主武装，根据当地群众的强烈要求，杀掉其中一个最反动的地主。这一仗，使乌山一带的工作迅速开展起来，豪绅地主纷纷逃往县城。

1935年，原在永定、平和、大埔边界活动的、各方领导的红九团，在靖和埔中心县苏维埃所在地帮寮乡同红三团会师，共同开辟了由平和到云霄、诏安一带的游击根据地。一贯被敌人隔断着的闽西南根据地，这一回连成了一片。

从1935年冬开始，蒋介石为了扑灭闽南革命斗争烽火，调国民党“中央军”三十师、七十五师和广东军一五七师先后驻防闽南“围剿”。先是集中兵力，重重包围，分进合击。由于敌人内部勾心斗角，谁都想保存实力，因此收效甚微。“合击”不成，敌人又实行“驻剿”，强行移民并村，以此来隔断红军与群众的联系，同时严密经济封锁，企图饿死、困死红军。

1936年春，环境更加险恶了，红军游击队有时连续几天吃不上饭。为了度过难关，中共闽粤边特委书记黄会聪，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提出继续以红三团和独立营为主力，普遍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清剿”，并决定在各地组织“漳州人民抗日义勇军”。要求红军部队既要会打仗，又要学会做经济工作，做群众工作，打好“政治仗”。闽南红军队伍立即分散开来，与地方工作人员组成工作组，深入村落，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

苏区原来的赤卫队员在高压下，大部分当了国民党的守望队。根据闽粤特委的指示，张敏、何浚等组织工作组，深入敌占区做艰苦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很快把守望队的大部分人争取过来。他们还做保甲长的工作，搞两面政权。平和县五南区23座炮楼，属于红军掌握的就有16座。全区九个保，有四个保长被争取过来，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

两广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调集大批军队向广东逼进。这时，闽南的敌人正集中兵力“围剿”平和根据地，云霄县城只驻着敌人一个保安团，比较空虚。正好这时部队的给养困难，卢胜决定在中元节袭击云霄城中央银行，从敌人的银行里搞一笔钱，既解决

给养困难，又配合主力粉碎敌人的进攻。

卢胜从独立营和红三团挑选 40 多名精明强悍的班、排干部和老战士，组成了一支便衣队，由他亲自率领进城。

中元节这天早晨，风和日暖，万里无云。通入云霄城的路上，男男女女挑着柴，提着篮，络绎不绝。卢胜带领便衣队，有的把驳壳枪插在柴草里，有的放在篮子里，扮成“阔佬”的就干脆插在腰里。他们夹在人群中，混进了云霄县城。城外，红三团和独立营、赤卫队共 500 多人，已在拂晓前赶到城西南的将军山脚下，隐蔽在甘蔗园里。

便衣队在向导的指引下，由陈松带领一部分人，秘密地包围了中央银行。其余的人，分散在银行周围，夹杂在赶集的群众中，控制街头巷尾的有利地形，以便掩护陈松他们的行动。

云霄城像往日逢集一样，十分热闹。战士们有的摆开了柴摊，同老乡们争论着价钱；但每个人的眼睛都在警惕地注视周围。卢胜选择了一个便于指挥的隐蔽街口。

“啊，赶集来啦！好久不见啦！”陈松走近卢胜的身边，像老熟人久别重逢一样地打着招呼。卢胜也假意寒暄了几句，和他并肩向一条行人稀少的胡同走去。

忽然，赶集的人乱跑起来。卢胜正感到奇怪，一眼看见通信员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

“有个同志买东西，一弯腰，不小心把枪从腰里掉了出来。老百姓一见就轰动了。”

“盯到了经理和出纳没有？”卢胜急促地问通信员。

“还没有。”

这新的情况，使卢胜紧张起来。他急忙看表，还不到 9 点钟。原计划战斗在上午 9 点钟打响，这时银行正在办公，便于行动，同时也好让城外的部队有时间小股小股地运动到离城更近一点的地方，以便接应。

情况突变，卢胜决定提早行动。他命陈松带领战士们迅速占领银行。陈松带领战士们冲进银行后，他把驳壳枪“砰”地一声向台柜上一放，厉声喝道：“谁是经理？我们是红军，来借一点军饷。”银行里的人，被突然出现在面前的十几支乌黑的驳壳枪吓呆了。虽然没有谁说话，但是目光却不约而同地偷偷斜视着一个胖胖的家伙。

陈松是个非常机警的人，他立刻认出那胖家伙是经理，一翻身跳过柜台，一把抓住经理的衣襟，用驳壳枪点着他的脑袋，厉声地说：“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把保险柜打开，饶你的命；否则我的子弹就不留情。”经理吓得哆嗦不停，立刻乖乖地把钥匙拿了出来。……

大街上，人们到处拥挤着、呼唤着自己的亲人，向城门口跑去。卢胜迅速向周围的战士发出准备战斗的暗号，占领了十字街口的一座小楼。当赶集的人们差不多全跑散的时候，卢胜带领战士们就把满街的柴捆堆放在路口上，堆成了一道障碍。然后在楼窗上端着枪，警惕地注视着敌人的来路。

不一会儿，远远的一队敌人，提着枪，沿着大街向银行跑来。突然，枪声大作，敌人刚拥挤到红军设下的障碍而前，便纷纷倒下。这时，通信员跑到卢胜面前，高兴地报告：“成了。钥匙拿到手了。”卢胜没等通信员说完，便急促命令道：“通知陈连长，钱拿到后，马上按预定计划向西北城门转移，控制城门，接应我们！钱要保护好。”

战斗持续了约一个小时，忽然从西北城门的方 向，传来一阵步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陈松他们占领了城门。敌人听到背后响起了枪声，更加混乱了。于是，卢胜便趁敌人犹豫不定的时机，带领部队向敌人投了一排子手榴弹，利用烟雾的掩护，敏捷地穿过敌人，直向西北冲去。

冲出云霄城后，陈松高兴地拍着一大包钞票对卢胜说：“我们

全团也用不了，应该分一部分给根据地的老百姓。”这时，又传来一阵枪声，战士们幽默地说：“这次提款没有带支票，他们发脾气啦！”

到1936年秋，闽南红军主力已发展到700多人，在各地组织的群众性的“人民抗日义勇军”也发展到1000多人。尽管环境险恶，红军游击队一直立于不败之地，使革命的红旗在魁仔石山、乌山、梁山上空高高飘扬。

### 漳浦事变

有良心的中国人难以想象，当卢沟桥边烽火漫天，台湾海峡战云密布，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一个重大的政治阴谋正在南京黄埔蒋介石的官邸策划着。

一个接着一个的秘密使节，经过美国、英国、德国的大使馆和日本人进行着“秘密和谈”。一道接着一道的“务必乘此中央与共方谈判之时机，消灭共方之地方武装及地方组织”的密令，从南京发到南方8个省份。

陈仪接到“着令一五七师即将何鸣部就地缴械”的电报后，立即部署实施。

两广事变结束之后，粤军黄涛的第一五七师开来闽南，开头两三个月没有对游击队采取军事行动。游击队以为敌人不敢出动，便麻痹起来，放松了戒备。游击队不了解，粤军所采取的战术和“中央军”不同。过去“中央军”实行“围剿”的时候，多是七八路军齐头并进，声势浩大，一路被打垮，其余各路也就跟着溃退了。

粤军的战术却有所不同。他们是先站稳脚跟，在各城市驻上部队，然后又占领村镇，对游击队步步进逼。这些部队白天照常出操、上课、打球，晚上却偷偷地派出一个连、一个排分散到路口要隘活动，打游击队的埋伏。这期间虽然没打什么大仗，但敌

人的这种分散伏击，却使游击队的交通网受到不少损失。

当时，特委书记黄会聪已离开闽南，书记职务暂由红三团政委何鸣代理。

一天，闽南特委接到情报，一五七师有向驻地进行合击的企图。特委决定分五六路马上转移，并且规定当夜一定要走到离原来驻地30里以外。何鸣带着一支驳壳枪队作为一路，到半夜才走了10里路，便不顾总部决定，擅自在平和县白沙附近大路边的树林里住下来。

第二天早晨，群众给部队送饭，被敌人侦察员跟踪而至。十一二点钟左右，敌人把他们包围起来。战士们都要打，何鸣不准，反而跟敌人喊话说：“请不要开枪，我就是何鸣，是来和你们谈判的！”敌人一拥而上，全部收缴了这支部队带的文件和枪支。所有人员也全给捉去了。

何鸣被捕后，与一五七师师长黄涛直接谈判。黄涛阴谋通过谈判来消灭红军，以达到他们在战场上达不到的目的。而何鸣只讲联合，不讲斗争，过高地估计一五七师的抗日情绪，对其阴谋毫无觉察。他认为抗战开始了，红军继续在山区里打游击，影响不大，想到城市去大干一番事业。

谈判当中，争论最激烈的是集中地点问题。一五七师要红军到漳州集中，闽粤特委主张驻在平和一带，这里靠近魁仔石山根据地，联系便利。双方争执不下。

于是，特委一面派人去南方工委请示，一面又派何鸣去一五七师师部交涉。

何鸣竟不执行特委命令，擅自答应驻在漳浦城内孔子庙。他回来宣布谈判结果，大家顿时哗然。特委立即在高坑召开扩人会议，代书记张敏（当时何鸣已被解除代理特委书记职务）等向何鸣提出批评。何鸣拒不接受，反而强调进城扩大影响是“中央的指示”，甚至拍桌子打板凳地叫嚷：“已经谈妥了，怎么好反悔？你

们要打就打吧，敌人在我们四周集结重兵，我们不下山他们就会进攻。破坏了统一战线，你们要负责任！”

张敏考虑到何鸣过去在工作上有一些成绩，又考虑到漳浦城离根据地还不算远，于是竟对他作了无原则的让步：同意进驻漳浦城内。

1937年6月，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一五七师订立了“六二六抗日政治协定”。红三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整编为七个连，一个团部，军事上受一五七师指挥。

在部队开赴漳浦以前，张敏作了许多防变的部署：把特委机关移到漳浦县境内，以便具体掌握进城的部队；特别组织了党的漳浦工作委员会，和部队一同进入城内，在原来白区工作的基础上，开展秘密活动；又把留下的武装，配备短枪，分给各县、各区掌握。

谁带部队进城呢？特委也曾作过一番考虑。张敏开始打算不叫何鸣去，但又因为委员中只有何鸣熟悉红三团，他长期以来就在红三团工作，就仍旧叫何鸣当团长兼政委，卢胜为副团长，王胜任参谋长。

7月14日，红三团按一五七师的要求进驻漳浦县城。

当天下午，游击队员詹开发突然来告诉朱曼平：一五七师有个名叫胡展光的连长，找到义和堂药材铺老板（红军的内线关系），要他无论如何找一下朱曼平，有事接头，朱曼平考虑再三，觉得不知来者何人，如果同他接头，就要暴露自己；但如果不理他，又弄不清究竟所为何事。

第二天，朱曼平在一个祠堂里和他相见。胡展光用平稳的口吻说道：“一五七师大部队不久就要开到，要警惕被他们解除武装！”

话一说完，没等朱曼平问什么，他便起身告辞了。后来才知道胡展光是广州中山大学党总支领导下的一个地下支部的书记。



漳浦事变发生后，中山大学党总支还就此谴责过闽粤边区特委。

朱曼平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化装连夜赶进漳浦城里通知何鸣。何鸣又用他傲慢的腔调，满不在乎地挥一挥手说道：“别再庸人自扰了！”他又指着朱曼平的打扮，嘲弄地说：“瞧你，穿得这样不尴不尬的！”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已经毫无一点警惕了。

敌人的阴谋按计划进行着，危险一步步逼进红三团。

16日上午，一五七师借口点名发饷，要红三团到县体育场集中。站好队，一五七师少将政治部主任张光前说道：

“现在要准备抗日，你们必须经过训练。第一步是徒步训练……”

话未说完，四周的国民党军队突然去掉伪装，露出密布的工事和几千个黑黝黝的枪口。

红三团指战员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只听见一片“卡擦卡擦”的子弹上膛声，和“拼了算了”、“打！”的怒骂声。何鸣慌忙出面阻止，说：“同志们，不要动，训练不一定要拿武器，大家要相信我，这是全国性的问题。不要起冲突！”

张光前又狞笑着威胁说：“弟兄们再不把枪放下，我们就要用机枪回答了！赶快放下！”

就这样，大错铸成，红三团近千名指战员被强行缴械了。

“漳浦事变”的发生，不仅是闽南中共领导的武装斗争史上的一次惨痛教训，也是红军史上仅有的一次悲剧，成为终身之恨。毛泽东曾向全党提到了“何鸣危险（被国民党包围缴械的危险）的警戒”。

与“漳浦事变”的同时，粤闽边特委机关，在诏安县的长埔、月港一带，遭到地方反动武装沈东海的袭击。特委代书记张敏以及云霄、平和、饶平、诏安各县的县委书记等12人被捕遭枪杀。这实在是和漳浦事变同样令人痛心的损失。

就在“漳浦事变”发生的当天晚上，卢胜、王胜率领一批干部摆脱敌人的控制，胜利突围出来，接着，又有不少战士以各种巧妙办法摆脱了敌人。在漳浦县溪南、下布、下楼等地党组织的配合下，很快集中了100多人。红三团又重新建立起来，卢胜为团长兼政委，王胜任参谋长。

9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派谭震林率一个加强排，来到闽南帮助和指导工作。谭震林在闽南一个多月，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游击队积极开展活动，回击敌人的进攻，扩大了武装，恢复了大片游击区。中共闽粤边区特委重新成立，并且发布了庄严的宣言：“任何敌人如果敢于攻击我们，我们必将采取坚决的自卫政策，予以还击！”

不久，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派张云逸与福建省主席陈仪谈判，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也派了代表邓子恢、谢育才和粤军谈判，向他们提出强烈的抗议，指出对方应该承担破坏“和平合作”的全部责任，并且要求他们无条件地归还闽南被俘人员和全部武装。国民党在政治上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不得不交还了300多支步枪。

这时，红三团发展到300多人，实力得到相当恢复。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938年初，红三团和闽南其他游击队，奉命到龙岩白土与闽西红军会合，正式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四团一营。卢胜任四团团长，王胜任参谋长，廖海涛为政治处主任。

1938年2月，走过非常曲折道路的闽南红军，与闽西、闽东、闽浙赣红军游击队一起，浩浩荡荡地开赴抗日前线。

### 三 从敌报上得知的闽东苏区

#### 土生土长的苏区

闽东苏区地处福建省东北部，包括福安、霞浦、宁德、福鼎、寿宁、周宁、柘荣、连江、罗源等县，以后又发展到古田、屏南两县。境内太姥山、白云山、鹫峰山绵亘其间。海岸线长达1500多公里，有着名的三都澳、福宁湾、罗源湾等港口，海域辽阔。北邻浙江，具备利用两省边界山地进行红色割据的条件。

闽东地处海隅，文化落后，能远去北京、上海等地念大学的青年学生很少，大多是在福州念中等学校的青年学生，如马立峰、杨而菖、叶秀藩、范浚等人，都是在1928、1929年先后入党，以后又受福州党组织的派遣，回乡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建党活动的。

马立峰出生在福安县马厝村的中农家庭，在福州理工学校半工半读，1928年参加革命互济会和反帝大同盟，1929年2月入党，和陈铁民、郭文焕等组成福安小组。是年暑假，马立峰在福安开展工作，发展小学时的同学詹如柏等入党，开始进行农村建党工作。

杨而菖，连江透堡人，1929年2月入党，1930年以透堡小学教员身份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同年12月连任连江县委书记。

叶秀藩，寿宁人，1929年在福州高等师范学校入党，1931年5月以寿宁墩阳小学校长的身份为掩护，秘密发展党组织，1932年11月寿宁成立特别支部，任特支书记。范浚与叶秀藩同时入党，回寿宁后任特支委员。

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农民运动。1931年8月成立了福安中心县委，马立峰任书记，指导福安、宁德、寿宁、

霞浦、福鼎五县党的工作。1932年底又成立连江中心县委，杨而菴任书记，指导连江、罗源两县党的工作。

1932年5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扩大会议强调福安党组织要马上组织游击队，要求“在农村中进行解决反动武装，帮助及发动农民起来斗争，要在这样的工作当中去创造新的苏维埃区域。”

会后，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亲自来福安指导工作。陶铸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广州起义时担任团参谋长，长期担任福建省委军事部长。9月14日，他在福安亲自组织了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随后又到连江，帮助杨而菴成立了闽东工农游击第十三支队。

叶飞是1932年下半年由福州中心市委派遣到闽东巡视工作的。

叶飞，1914年5月生于菲律宾吕宋岛的一个山区小镇上。菲律宾华裔很多，港口三宝颜就是华人聚居之地。传说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时到过这里，所以叫“三宝颜”。据明史记载：“福建商贩数万人，往往久居吕宋不返，生育子孙。”

叶飞的父亲叶孙卫，原是福建南安人，由于生计无着，飘洋过海来到菲律宾，娶菲律宾姑娘为妻。故叶飞的生母为菲律宾人。

1919年，叶飞随父亲回到了故乡——福建省南安县的金淘区深垵乡。这里距闽南古城泉州一天路程，虽然山清水秀，但人多地少，又是穷乡僻壤。几百年来，不断有人背井离乡，飘洋过海到南洋谋生。南安人性格剽悍、豪爽。明末清初，南安出过两个人物：郑成功和洪承畴，一忠一奸，南安人总是以他们的经历来教育后代。

叶飞在厦门读中学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8年冬，担任共青团厦门区委书记。1931年底，调任福州团中心市委书记。这一次他是以市委特派员的名义到闽东的。此后五年，叶飞一直领导着闽东的革命斗争。

自1932年至1934年8月，在叶飞的领导下，闽东党先后创建了7支革命武装。第一支队（福安）支队长詹如柏、政委马立峰；第三支队（宁德）支队长颜阿兰，1933年7月牺牲后，由谢丙成继任支队长；第五支队（福安）支队长任铁锋（后脱离）；第七支队（寿宁）支队长范铁民；第九支队（连江）支队长魏耿（后叛变），政委杨而菡。这就为闽东全区性武装暴动打下了基础。

当时，闽东没有懂军事的干部。1933年6月，由福州中心市委派赖全彪来闽东，才使闽东的干部对建军问题有个了解。赖全彪是广东大埔人，红十二军排长，彭杨军事学校的优等生。组织上选派他去苏联深造，途经福州时，因去海参崴的交通断了，中心市委便把他留下来，派送闽东游击队。他熟知人民军队的建设经验和战略战术。在他的指导下，闽东游击队在战争实践中，逐渐学会了打仗。

叶飞在一生的战斗生涯中，几经生死的考验。1933年冬天的一次，他几乎已经到了死神的怀抱。福安县有一个叫狮子头的地方，离县城约有60多里地，是个渡口。这个渡口有家客店叫狮子头客店，是一座孤零零的上下两层的木头房子。来往赛岐和福安之间的行人在这里登岸后，大多要在这家客店里休息、吃饭、等船，然后再上路。客店实际上是闽东地下党的一个交通站。

一天，叶飞中午12时到狮子头客店接头。他正在二楼吃饭，突然从楼梯口跑过来3个人，将他按住并开枪，叶飞头部中弹，倒在楼板上。他们搜去叶飞身上的手枪和笔记本，接着就走了。

叶飞脑子还清醒，听到有人下楼梯的声音，便抬头一望，这下坏了，原来只下去了两个，还有一个留在楼梯口正在察看死了没有。那人一见叶飞抬头，就大叫起来：“还没死！还没死！”并跑过来朝他又连开三枪。叶飞接受了第一次的教训，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头部、胸部、手臂都中了弹，躺的地方周围都是血，不由想到这次非死不可了。又躺了一会儿，一个念头突然在他脑

中闪现：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要想办法脱险，要离开这个地方！他憋足劲，顺着楼梯一级一级往下爬，一直爬到客店后面一座小磨房旁的小水沟边，再也没有力气了，昏了过去。等他醒来，已是半夜12点了。他被狮子头村党支部救起。

第二天，敌人派部队封锁了狮子头方圆十里内几个村子的路口，到处搜寻，整整折腾了一个星期。狮子头村党支部决定把叶飞送到山上游击队的根据地去。

他们想出一条妙计。那时福安农村的妇女还裹小脚，家境好一点的妇女回娘家要坐轿子。上路那天，叶飞穿上妇女的服装，他当然穿不进“三寸金莲”的小鞋子，就穿进两个脚趾，然后在膝上盖着一床棉被，只露出一点小鞋尖。这样，叶飞终于脱险了。

到达游击队根据地后，县委立即请医生给叶飞动手术，取出了头部的那颗子弹。胸部的那颗子弹无法取出，成为终身的纪念。

1933年11月，趁福建事变的机会，叶飞领导闽东各游击队发动了全区性武装暴动。到1934年1月，闽东党已控制了100多万人口的地区，创立了一整块红色根据地。这一时期是闽东苏区的“黄金时代”。

闽东苏区是在第五次反“围剿”的紧张气氛中诞生的，是全国最后建立的一块苏区。中共中央只是从敌人报纸上知道这里有党的活动，有红军，有苏区；它的创建不同于主力红军开辟的苏区，主要是依靠本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的英勇斗争，是土生土长的苏区。

1934年3月，由于叛徒的破坏，闽东苏区失去了和福州的联系。叶飞决定成立闽东特委，统一领导闽东的斗争。那时讲究工人成份，工人出身的苏达担任特委书记，叶飞、马立峰、杨而菖、詹如柏、曾志、阮英平、叶秀藩、郑宗玉等为特委委员。

1934年8月，北上抗日先遣队东进闽东时，寻淮舟曾向叶飞

建议，组建一支主力部队：闽东独立师。闽东过去没有成立师以上的军事指挥机构，主要是缺乏军事领导干部。抗日先遣队给闽东苏区留下 100 多名伤病员，团、营、连、排干部都有。这对闽东苏区来说，确实是一笔宝贵财富，闽东独立师因此得以成立，使闽东苏区到达鼎盛时期。

闽东苏区的全盛时期，为时不到一年。北上抗日先遣队主力在皖南失败后，国民党即抽调大批兵力，向赣东北、闽北、闽东各苏区大举“清剿”。闽东苏区邻近福州，更是首当其冲。

这就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开始。对各个苏区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但对闽东来说战争形势却没有改变。所以，从 1932 年 9 月算起，闽东进行了五年游击战争，这也是闽东地区斗争的一个特点。

1935 年 1 月，国民党军兵分四路向闽东苏区进行“围剿”。进攻福安地区的主要是新十师萧乾部；进攻连江、罗源地区的是八十七师王敬久部；进攻寿宁地区的是从山东调来的刘珍年师；另一个二十三师（刘和鼎部）和第四十师一部兵力在闽浙赣三省边界构筑封锁线，将赣东北、闽东、闽北地区加以分割。

1935 年 3、4 月间，敌人占领了闽东苏区的所有村镇，杀了許多人，然后搜罗一伙叛徒，拼凑了一批反动民团，强迫老百姓编好保甲，地主豪绅又作威作福起来。国民党军以为革命力量已经消灭，“清剿”任务已经完成，逐渐撤出了苏区。

独立师抓住这个时机，返回苏区进行反攻。闽东各地的游击队也积极活动。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红军游击队取得一连串胜利。

福安湄洋、松罗山区的革命群众，至死不从敌人移民并村的政策，纷纷跟着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游击队撤进深山密林，不少人后来就饿死在大山里。

在福寿交界的岗垅山区，人民群众在密林深处搭起了一间间

茅草棚，让特委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住下，然后在周围几十里的广阔地带巡逻放哨，一有敌情，就一个山峰一个山峰地用暗号报信。

有不少革命群众，被敌人抓住，严刑拷打，宁死也不泄露党和红军的秘密。为保护红军而惨遭杀害的群众为数不少。在那严峻的日子里，许多群众省下最后一点粮食，拿出被敌人洗劫后仅有的一件衣衫或棉被，来支援红军。

1935年4月中旬的一天，叶飞带领陈挺和师特务队共30多人，从福寿去霞鼎。陈挺带两名特务队员先行，约定如发现情况就鸣枪。晚上9点，陈挺一行到达交溪渡口。他们警惕地观察了一阵，便小心翼翼地趁黑向渡口摸去。突然，猛地有人大喊一声。糟啦，碰上了敌人潜伏哨！一时间枪声大作，陈挺带领一名战士退到六坑村，这时天快亮了，两人又冷又饿，便想在村西山上的一间旧草棚里歇一会儿。他们掀开草棚草帘一看，那里面竟睡着一位老人。老人翻身坐起，直愣愣地望着他俩。

“老乡，对不起，吵醒你了。”陈挺说明他俩是红军。看看老人的神色，似乎不大相信，便把昨晚在交溪遭遇敌人的情况相告，老人才放心。

“白军常到这里吗？”陈挺问。

“大前天有一队过路兵，说话叽哩哇啦的，听不懂。这两天倒没见过。”老人说完爬下铺，指着他那唯一的用木头架起来的茅草铺说：“你们歇歇吧！”

草棚里，靠门口有个土灶，一堆柴草，此外，就是那几根木头支起的铺了，上面堆着一团破棉被。

看看老人那不爱搭理的样子，陈挺不好多问，这草棚里安全吗？树林里虽然安全，夜里下了一场雨，到处湿漉漉的，没地方休息。陈挺犹豫着，掀开草帘，外面浓浓的白雾，一团一团翻滚着，四周的景物看不见了。根据经验，敌人搜山都在雾散之后才



开始，趁雾散之前这二三个小时，先在这里歇一歇也好。他俩把被雨水打湿的外衣脱下，身子一倒下，眼睛就睁不开了。

不知过了多久，突然，草棚外有人大声吆喝，一下子把陈挺惊醒了。

“里面的人出来！”

老人走出去了。

“这里有共产党游击队吗？”

“没有。”老人回答。

“棚里还有什么人？一块出来！”

陈挺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喉咙口。

“什么人也没有。”老人在门口回答。

“真的没人？”又听见敌人问。

“不信，老总自己来看，这破棚子只我这个老头，连一只老鼠都藏不住！”

老人眼看敌人走远了，仍背靠草棚，往前面眺望。他神态自若，仿佛没有发生刚才的事情。陈挺听到敌人已走远了，立即动手整理行装，正要掀开草帘，老人猛地用树枝抽过来，又听他朝远处大声喊道：

“你们的人已经过去了，对，前头那村上。”

原来路上又来了几个白军。待敌人都走远后，老人才走进棚里说：“你们赶快进后面的树林里，爬过这山岗，千万别走大路，这群黄狗到处盯着你们。”

直到这时，陈挺才看清老人的模样。他约60多岁，中等个子，身材瘦削，头上一顶破了几个窟窿的黑线套帽，身上的蓝布衫满是补丁。就是这位善良的老人，在危急关头，不顾个人的安危，机智地掩护了红军战士。

闽东的党和红军游击队就是这样，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到1937年，大部分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巩固。

### “甘薯被牛吃了！”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整个南方苏区都与中央隔断了联系，所以闽东苏区政策的转变是在1936年冬开始的。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闽东特委在政策上作了更大的改变：不提反蒋抗日的口号，只提抗日救国的口号，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团结起来抗日，并对国民党方面提出了谈判条件。

但直到这时，蒋介石仍不放过南方的红军游击队。1937年7月，叶飞带着独立师的60多人，已在连江一带活动。敌人获知，立刻派出一个加强连前来“围剿”。叶飞一行赶紧从连江一带向宁德老根据地转移。

敌军紧紧追赶，和游击队相隔只五六里。他们大叫大嚷：“追呀！消灭了红军回去领赏！”

叶飞带领部队翻过黄土山，爬上了亲母岭。他把那已经戴黑了的草帽向脑后一推，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水，望着山下自言自语地说：“好地形哪，好地形！”

亲母岭对面是黄土岭，一条清溪在两岭间由东向西流过，四周群山环抱，山下形似洗脸盆，而从黄土岭通往亲母岭的道路正从盆底上经过。战士们纷纷议论说：“这回可给敌人找了个好坟地啦！”

在叶飞的安排下，亲母岭外通往宁德、霍童、洋中三地的路口都派上“白皮红心”的保甲长。他们的任务是如果敌人来增援，就想办法缠住；周围数里的山头上，都布有群众。一面砍柴一面放哨；岭头松林里埋伏着步枪队；黄土岭左侧埋伏着驳壳枪队；桃坑乡的群众抬着土炮，扛着鸟枪、长矛，也来参加战斗。亲母岭上设下了天罗地网！

中午时分，亲母岭上静悄悄的，没有一个行人。不久，岭东侧小山头突然传来了喊声：“喂，甘薯被牛吃了！”这是事先规定

的暗号，是溪边村那个须发斑白的老大爷的声音。战士们忙将步枪子弹推上膛，驳壳枪打开机关，等待着敌人的出现。

骄横的敌人从黄土岭上翻过来的时候，一个个醉汉似地朝山下走来。他们的前卫到了山谷的小溪边，有的坐在岸边擦汗纳凉，有的竟洗起澡来。

敌人的后尾已经全部翻过黄土岭，进入了盆形山谷。突然，“叭叭叭”黄土岭左侧立刻响起了激烈的枪声，驳壳枪队在敌人的后尾首先打响了。敌人正在惊疑间，埋伏在亲母岭松林中的步枪队也一齐开了火，当即打倒一片。敌人见前后受敌，便向两侧的山头冲去。这时，四周山上的群众也一齐开了火，土炮、鸟枪响成一片，他们一面打，一面冲呀、杀呀的大喊。顿时杀声震天，山应谷鸣，敌人吓得魂飞魄散。

正当亲母岭混战一团的时候，果然不出所料，从宁德、霍童、洋中来了三支增援部队。那些“保甲长”便截住敌人，假献殷勤地报告说：“可不得了，那里有400多红军，中央军都被打散了！”敌人听说红军很多，谁敢跑去送死，便又顺原路回去了。

喊杀声震荡着亲母岭，无数的群众和红军战士从四面八方向山下冲杀，山谷里到处都是“缴枪不杀！”的喊声，吓得敌人急忙跪在地上举枪求饶。战士和群众就像在盆里抓小鱼似的，东一个，西一个，一会儿就把敌人搜光，连那个加强连的曹连长也当了俘虏。

战斗结束，白军一个加强连只跑掉三个人，共缴获了108支步枪、两挺机枪、五支短枪和大量子弹、手榴弹。

桃花乡几个村的老人、妇女很快送来了热气腾腾的饭菜，一个战士问：“你们做饭怎么这么快呀！”

“早就把饭做好了，等这里的枪声一停。我们就来了呗！”一个老太太笑呵呵地说。

“要是我们打不胜，你们这顿不是白做了吗？”

老太太生气地瞪了瞪蹲在河边的俘虏说：“他们呀，这里还有他们胜的！”

傍晚，战士押着俘虏，群众挑着枪支弹药，浩浩荡荡地开往桃花溪村。大家高兴地唱着：

我们是工农自己的队伍，  
我们在斗争中生长壮大，  
……  
谁敢向我们进攻，  
谁就一定在我们面前死亡  
……

被俘的曹连长东顾西望，莫名其妙，终于忍不住胆怯地问道：“你们究竟是红军还是老百姓？”

溪边村那个喊牛吃甘薯的老大爷用袖口使劲擦了擦刚缴到的步枪，昂着头，花白的小胡子翘了两翘，用眼角瞅着他说：“红军就是老百姓，老百姓都是红军，你懂吧！”

这次战斗打得敌人心惊肉跳，不久，八·一三抗战爆发，国民党当局不得不表示愿意与红军谈判。

### 范式人三下福州

1937年8月，上海战事紧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七十八、八十七、八十等三个师从福建调往上海抗击日军，国民党在福建的军事力量大为削弱，福州直接受到红军威胁。到这个时候，福建当局才不得不通过“福安抗日后援会”的郭文焕（中共福安城区地下支部负责人）同红军游击队联系谈判事宜。

国民党方面提出要叶飞亲自去福州谈判，对此，特委认真进行了研究。鉴于何鸣事件的教训，决定：“不宜由叶飞立即出面谈

判，如果国民党当局把叶扣留了，不好办，但也不能派一般人去，人家会以为我们没有诚意，因此决定派范式人同志作为全权代表去谈判。”<sup>①</sup>

第一次谈判地点在宁德县城，国民党方面由福建省保安处处长黄苏为代表。

国民党对于和平谈判并无诚意，妄图在谈判桌上获取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坚持要把红军收编为“保安师”。红军要“改”编，国民党要“收”编，一字之差，争执不下。那时，闽东红军游击队集中在宁德的桃花溪地区。国民党代表黄苏提出派人见叶飞，以便当面陈述意见。派来的人叫王调勋，是个叛徒，这使闽东特委不得不警惕起来。

特委决定在离宁德县城只有一天路程的半山边上的一个村子，安排王调勋同叶飞见面。因为这个地方位于边界，消息比较灵通。叶飞只带一个排的兵力在村子里，把主力隐蔽在村子周围五六里路的地方，以防不测。

果然，王调勋并不是真来谈判，而是来侦察的。就在王调勋走后的第二天拂晓，国民党省保安司令部的参谋长亲自带一个加强连，来袭击红军首脑机关。

红军游击队早有准备，埋伏在敌人的必经之路，等敌人走人埋伏圈，部队立即出击，不到一小时，就把敌人全部消灭，带队的那个参谋长也见了阎王。特委第二天立即派范式人下山，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他们哑口无言，说是误会，要求继续谈判。

第二次谈判，还是范式人去。黄苏却又推托他到福州和省主席陈仪面谈，又把谈判拖延下来。

不久，国民党福建当局鉴于日寇攻势日烈，福建沿海也日趋紧张，又派了一名中校团副来联系，指名要阮英平去福州谈判。国

<sup>①</sup> 叶飞：《故乡征战纪实》，第73页。

国民党福建当局还在妄想将闽东游击队收编为一个保安师。阮英平到达福州后，国民党代表想用师长的位置来收买他，当时就遭到阮英平严词拒绝。第三次谈判又没有成功。

9月中旬，上海战场形势更趋紧张，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重开谈判。由范式人再去福州，经过种种努力，终于在以下几个问题上与国民党福建当局达成协议：（一）闽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福建抗日第二游击支队；（二）国民革命军福建抗日游击支队由共产党领导；（三）划屏南县为游击支队驻区，100里内国民党不得驻兵；（四）以中共闽东特委的名义发表《国共合作共赴国难宣言》，并公诸报端。<sup>①</sup>

改编用的番号是闽东特委提出的，当时他们还不知道国共两党已达成协议成立新四军。听说闽西用了“抗日游击支队”的名义，所以也用了这个番号。

1937年12月，新四军在南昌设立办事处，然后请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派顾玉良参谋赴闽东和叶飞取得联络。叶飞随同顾玉良下山，经福州去南昌受领任务时，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在办公室会见了她，惊讶地问：“你就是叶飞？”

“是呀。”叶飞回答。

“你是个书生嘛。”陈仪情不自禁地说。

晚上，陈仪宴请叶飞，保安司令等人作陪。这位司令老是看叶飞穿的衣服，叶飞才想起穿的上衣就是他那被打死的参谋长的衣服。他想，让你们认出来也好，永远记住教训吧。

叶飞在南昌接受新四军军部命令，闽东游击队开到屏南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叶飞为团长，阮英平为副团长，全团共1300多人。

1938年2月14日，叶飞奉命率部离开了战斗多年的闽东，踏

<sup>①</sup> 叶飞：《故乡征战纪实》，第76页。

上抗日征途，留下范式人在闽东坚持新的斗争。

## 四 巍巍武夷

### 退出大安街

闽北地处福建北部的武夷山区，现辖南平、邵武、武夷山3市和建瓯、建阳等七县。革命战争期间，还包括江西上饶、铅山、广丰、贵溪，浙江的江山、庆山、龙泉，福建的将乐、建宁等广大边沿地区。其西北部为武夷山脉，绵亘千里，群峰叠起，雄甲东南。东北部的仙霞岭依偎环抱，与东南部的鹭峰山连臂拱卫，构成了一道天然屏障。这里南控闽江，北扼由闽通向浙赣的要道，进可四面出击，退可屯驻重兵，地形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素有“八闽屏障”之称。

1934年12月，蒋介石调遣10万大军，从东、南、西、北四个方面，对闽北苏区发动大规模进攻。东路之敌第五十六师入侵崇安上梅；西路之敌第二十一师占领邵武二都桥；而南路之敌独立四十五旅逼近闽北苏区首府大安的门户——四渡桥。

形势万分危急，中共闽北特委召开紧急会议。闽北特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黄道客观地分析了敌我态势，认为10万大军压境，若采取正面抵抗，死打硬拼，纯粹是拿鸡蛋碰石头，白白送死。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保存这支革命队伍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主张死打硬拼，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他指着黄道的鼻子说：“你怕死，你右倾！”

会议根据中央关于“闽北红军在原地坚持游击战，等待（或争取）主力红军总反攻的胜利”的电示精神，采取大多数人的意见，否定了李德胜的错误主张，作出实行战略转移的五点决定：

（一）闽北党政军机关随主力红军撤出大安；（二）依靠革命

老区开展游击战争；（三）撤退公开干部，建立秘密的党组织和地下联络网，继续领导群众斗争；（四）阻击国民党军，保证机关大队安全撤退；（五）通知各主力部队集中待命。

紧急会议的正确决策，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摆脱了“左”的干扰，挽救了闽北党组织和红军，也为三年游击战争的开展做好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这时，敌人已离大安不远了。黄道坚持留在最后撤离，尽管四面枪炮声不绝，他还是镇定自若地到各处检查，每到一处他都会特别关照一声：“别忘了给敌人留下‘见面礼’啊！”

“政委，‘见面礼’早留好了。”

“元旦到了，可要让敌人饱餐一顿喽！”黄道风趣地说。

路口、树下、门窗、锅灶等一切敌人可能或接触的地方，都安装了踏发、绊发的丝炮、地雷、手榴弹等杀伤武器。

寒风冷月，流水凄凄。离开生死相依的乡亲们，人人心里都像压了块石头。管理科长老王提着马灯，恋恋不舍地西照照，东看看，生怕落下什么必需的东西。

黄道怀着依恋的心情四处转了一圈，最后踏上了崇溪河对岸的红军操场。乡亲们早就在这里等候了，有的拿着鸡蛋、米果，有的拿着毛巾、布鞋，他们一边把这些东西塞给战士们，一边说：

“同志呵，早晚要小心，不要着凉啊！”

“同志呵，等着你们打回来啊！”

一位鬓发斑白的老婆婆拉住黄道的手，哽咽着说：“黄政委，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们，千万多保重。”

黄道眼睛湿润了，拉着老婆婆的手说：“我们会回来的！”

接着，他转过身，面对着朝夕相处的苏区群众，坚毅地说：“我们虽然放弃大安，但我们决不会放弃闽北！我们依靠武夷千山万岭，依靠闽北苏区的千百万人民，同敌人斗争到底，胜利一定属于不屈不挠的闽北人民。”



时间不允许再耽搁了，黄道含着泪水，举起右臂，向群众行了个军礼，带领最后一队人马，踏着月色，快步向深山走去。

第二天，为抢头功敌四十五旅的先头连闯入大安。大安死一般的沉寂，家家关门闭户，处处空空荡荡，骄蛮的敌人不知是计，总想捞点油水，像一窝蜂似的闯进大街小巷、店铺油房。一时间，地雷、挨丝雷、土炸弹响声不绝，仿佛是革命军民的怒吼声，给来敌以狠狠的一击。

此时，黄道等已经登上了大安对面的山顶，看着大安冒起了股股烟柱，说笑着争论谁的“见面礼”最“丰盛”。

敌人占领大安以后，施尽种种毒计，摧残苏区人民。地主恶霸、流氓地痞组织“铲共义勇队”，顿时像饿狼寻食一样，搜村清户，捕杀苏区干部，甚至连无知的孩童也不能幸免。一场浩劫之后，敌人勒令劫后灾民“移民并村”，赶入他们划定的封锁线内，以10户为一联保单位，大搞“连坐切结”，实行经济封锁，妄图割断人民群众和红军游击队的联系。

军事上，将所筑碉堡连成两道封锁线，北以甘溪、车盘、篁村、紫源、陈坊、花桥、冷水坑为一线；南以岚谷、坑口、大安、曹墩、皮坑、山岗、夫人庙、司前、蛇心隘为一线。<sup>①</sup>然后，东西南北划段对进，共设置了50多条封锁线，将闽北苏区分割成破碎小块。

闽北党政机关到长涧源、坑口一带，由于机关队伍比较庞大臃肿，尽管群众倾其所有，全力资助，也负担不起这支1000多人队伍的供应，再加上敌人的封锁，部队的给养就更加困难了。

为了适应战争环境的变化，黄道等决定对这支党政军混合的队伍进行整编，重建闽北独立师。部队的整编原则是：

（一）压缩机关与非战斗分队，增加部队战斗员；（二）除少

<sup>①</sup> 敌伪档案：《闽赣浙皖四省边区清剿总指挥部清剿工作经过详报》。

数的地方游击队编入独立师外，其他各县、区的独立营、游击队保持原建制不变，就地坚持斗争。

1935年2月，闽北独立师正式成立，师长黄立贵，政委卢文卿，参谋长张燕珍。独立师辖四个团，每团编制三个营。

整编后，独立师兵分两路向外游击，二、四团到崇、浦、光、邵、建等县边界活动；一、三团由黄立贵率领进入江西境内，连攻紫溪、杨村、湖坊、盖竺、浆源、港东等地，活跃在邵武、顺昌以及建（瓯）松（溪）政（和）边区。

独立师离开之后，特委和军分区机关便沿着武夷山脉，迂回转移到坑口一带。这时尽管经过整编，非战斗人员还是不少，行动起来目标大，机动性差，因而到处惹来敌人围追堵截，战斗越来越频繁，加之这时天气乍暖还寒，给养困难，环境艰苦。于是，一些政治上不纯和意志薄弱者，经不起考验，有的投敌，有的开小差。其中以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的叛变投敌，最为典型。

1935年2月的一天，队伍转移到铅山县篁村附近。黄道正在兴致勃勃地给大家讲他和方志敏在一起干革命的故事。忽然，有个战士匆匆跑来，递给他一张报纸；报纸上刊登了北上抗日先遣队失利和方志敏被俘的消息。他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同志们，十军不幸失败了，志敏和十军的一些领导同志被俘了！”黄道沉痛地说。

“打倒蒋介石！”不知是谁带头呼起了口号。

“打倒国民党！”

“向反动派讨还血债！”

口号声在山谷里回荡，黄道从悲愤中平静下来，擦了擦眼泪说：“我们的担子越来越重了，今后的情况一定会更艰苦，但只要我们经得住考验，形势是会扭转过来的。”

当天下午，敌人进入篁村，队伍转移到离篁村15里的东坑村。傍晚做饭时刻，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匆匆跑来告诉黄道说：

“老黄，我想到前沿去了解一下敌情。”

“好，早点回来，我等你吃饭。”黄道像平常一样诚恳地说，“噢，多带几个人。”

李德胜带了一个参谋长和警卫员黄富祥，径直向前沿阵地走去。半个小时后，黄富祥带着一个俘虏回来，8点多钟，参谋长也回来了。李德胜却始终未见回来。

黄道一直等到深夜12点多，感到情况不妙，便命令部队即刻向桐木关方向转移。

此时正值严冬子夜，天色漆黑，又下起了大雨。大家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着前进。最困难的要数抬电台的战士们，他们抬着笨重的电台器材，到第二天拂晓，才走了十多里路。

下午，部队赶到三港村，意外地同光泽中心县委书记吴先喜、独立师第四团政委彭喜财等率领的第四团一部会合。大家走得筋疲力尽准备稍作调整再走，还特意打了一条狗，准备加加餐。然而，还没喝完一杯茶，村后便响起密集的枪声。

吴先喜首先冲出门口，指挥电台的战士撤退，并率独立师第四团抢占村后的山头掩护。可是，抬电台的战士们走出村子1里多路，便碰上了敌人的迂回部队，无奈之下，只好忍痛把电台推到万丈深渊。闽北与中央的联系从此中断，时达三年之久。部队分头突围，分散隐蔽在三江周围的大山里。

敌军占领了三港，一连几天都有人喊叫：“我就是李德胜，你们快下山投降吧！”这下大家全明白了，李德胜投敌了，还带领敌人前来搜山。

第四天，敌人毫无所获的撤军了，大家陆续回到村里集合，重整队伍。闽北特委决定：任命吴先喜为军分区司令员。接着，部队转移到山坡背面的壕沟里，举行了声讨叛徒李德胜大会。黄道亲作一首《骂叛徒李德胜歌》：

李德旺，真混蛋，敌人进攻他惊慌。借口探敌情，  
公开去投降，带领敌人奔袭我们到三港。

贪生怕死最可耻，拖枪投敌黑心肠。骂声叛徒休猖狂，  
乌云一过出太阳，这笔血债要还偿！

同志们，不要怕，革命好比火炼金，真金不怕火，怕火非真金。

革命同志心如铁，任何困难不变心，不顾一切去牺牲，  
最后胜利属我们！

三港突围后，分区机关的坛坛罐罐，丢得一干二净，队伍彻底轻装。而在此时，正是党中央贯彻遵义会议精神，纠正王明“左”倾错误的关键时刻，对这一重大事件，闽北特委和红军一无所知，独立自主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 甘溪大捷

1935年是革命最艰苦的一年，饥饿像一只无形的恶狼，常常夺走战士的生命。

3月以后，情况更加严重。国民党军采取被陈诚称之为“抽干塘水捉大鱼”的“困死红军、渴死红军、饿死红军”的“三死”政策。在困境中，人民群众不顾生命危险，把自己舍不得吃的粮食和盐包在破布里，趁天黑挂在墙外，等着游击队来取。

崇安岗谷乡的王瑞娇，丈夫被敌人杀害，房屋被毁，敌人把她抓走，用她的小孩作人质，要她供出地下党员和干部名单，但她宁死不屈，守口如瓶，最后被敌人活活折磨死。

随着敌人控制的加强，红军与群众的联系越来越困难。

部队化整为零，几十个人一股，分散活动。敌人白天搜山，他们便找个无人烟的山头，睡大觉，夜里睡不着，就坐在山顶数星星。黄道利用这个时间给干部上课，讲政治经济学、哲学，讲闽

浙赣起义的经过，教唱革命歌曲，苦中也有乐。

粮食极度紧张，只好靠野菜充饥，当时有一种叫“苦叶菜”的野菜，战士们就四处挖来煮着吃。一次，战士小陈正在煮菜，冷不防背后有人问：“小鬼，煮啥好吃的？”

小陈抬头一看，是黄道，忙说：“煮苦叶菜给战友吃，看小汪都饿的快不行了。”

黄道俯下身子，用手摸着小汪的头说：“小汪，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有革命菜吃了。”

“革命菜？”小陈惊奇的抬起头看看黄道，随后会心地笑了。

菜煮好后，黄道便一口口地喂给小汪吃，一边喂一边和蔼地说：“敌人企图把我们饿死在大山，是苦叶菜救了我们的命，救了革命，将来革命胜利了，我把它放到博物馆，还要注上革命菜的名字。”

1935年4月的一天，黄道和吴先喜带领游击队转移到江西上饶县南乡，准备袭击民团防地甘溪。

黄昏时分，游击队的前卫排接近甘溪桥头的时候，突然，一阵猛烈的机枪火力从敌人碉堡里射出来，把游击队前进的道路封锁了。附近放哨的民团在大喊大叫：“不好了，红军打过来了，有40多人哩！”

吴先喜举起望远镜观察了一会儿，对黄道说：“老黄，情况有变，甘溪村里有敌人的正规军。”

“我也这样估计。民团哪有这么强大的火力。”黄道紧锁双眉，目光锐利地注视着前方说。

“是不是往回撤？”吴先喜征求政委的意见。

“不！”黄道果断地说：“天色帮了我们的忙，敌人只看见我们40多人的前卫排，大部队他们没有发现，是不是来个随机应变？”说着，他指指暮色苍茫中的金钟山。

“对，打埋伏！”吴先喜一推帽沿，立即传令后卫改为前锋，朝

金钟山撤退。

枪声停住了。敌人见天色已晚，怕吃亏，也不敢出来追击。

游击队拉进金钟山后，当地群众就向黄道报告说，甘溪新调来一个营，番号叫什么“河南剿匪总队”。吴先喜马上选择有利地形，布置埋伏。

第二天早饭过后，游击队前卫排40余人又在甘溪桥头附近出现，从碉堡出来300多人，像一条蠕动的长蛇，沿着山路追了过来。黄道看得真真切切，他默数着进入伏击圈里的人数：“一十、二十、……一百……二百……”心里简直乐开了花。战士们屏住呼吸，手指紧紧地扣住扳机，睁大眼睛盯着敌人。

待敌人绝大部分进入伏击圈，只听吴先喜大吼一声：“打！”机枪手立即射出一梭子弹。刹那间，四面同时响起了枪声。这时，游击队的前卫排也掉转头，朝敌人压了过去，堵住敌人的逃路。雨点般的枪弹打得敌人像被捅了窝的马蜂，在山坳里乱成一团。

战斗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红军游击队打死打伤敌军200多人，缴步枪200余支，轻机枪4挺，只有几十个人侥幸逃命。

午饭时分，战士们押着战利品，一路兴高采烈地唱着歌，庆祝突围以来打的第一个漂亮仗，老百姓都扶老携幼的欢迎大家，高兴地流出了眼泪。

继甘溪大捷之后，又有紫溪、杨树诸战，红军均有收获。敌人恼羞成怒，对崇安老游击区的封锁更加严密，经过并村，整个桐木关北至洋庄、东至曹墩周围几百里变成了“无人区”。

为了缓解崇安老区的压力，牵制和吸引敌人的兵力，1935年8月，闽北分区委在崇安县岚谷附近的黄龙岩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一）在军事战略上，改变单纯防御和内线作战的方针，实行战略防御与战略进攻相结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向敌后挺进开辟新的游击区；在军事战术上，保存有生力量，尽量避免打硬仗、打消耗战，但并不放过有利战机；（二）在政治上，允

许在敌占区实行“白皮红心”的两面政策，争取保甲长，争取大刀会，减少敌对势力；（三）在经济上，改打土豪为向土豪筹款，改分田废契为减租减息。

分区委扩大会议作出的这个“大胆挺进敌后，开辟新的游击区”的决定，按黄道在会上的通俗解释是：“敌人不让我们安安稳稳地呆着，好！我们就跟敌人换换防——你搞我的家，我也搞到你家里去！”

会后，除留下曾昭铭、汪林兴等少数人坚持崇安、建阳老根据地外，闽北红军游击队全力挺进敌后兵力薄弱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

### 打击外线，发展新区

1934年年底，正当闽北红军转入游击战争的时刻，刚建立不久的建（瓯）松（溪）政（和）革命根据地也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

1935年3月，建松政党组织的创始人杨则仕，在崇安的一次战斗中被俘，于建瓯黄华山下英勇就义。

5月，黄立贵率部进入建松政地区，攻克政和和东平，诛杀了西表等地的一批反动分子，击溃了300余众的反动大刀会的进攻，扩大了红军的影响。

9月，根据闽北区委扩大会议打击外线，开辟新区，广泛开展游击区的精神，闽北独立师第二、三团六七百人在饶守坤、王助的率领下，穿过崇安、浦城间的敌人封锁线，挺进建松政地区。部队边走边打，在一个月绕道行军七八百里，打了二三十仗，才到达吉田以西地区（建松政）。

部队在建瓯、政和边界的川石村，决定留下叶全兴率领的第三团，开辟建松游击区，第二团由饶守坤、王助率领继续向建瓯玉山方向挺进。

1935年10月，第二团几经转折，进入了建瓯县玉山乡的墟地村。玉山乡地处建瓯与屏南边界，方圆百余里，交通闭塞，易守难攻，敌军五十六师刘和鼎部虽驻守建瓯，但碍于环境险关要隘，鞭长莫及，对红军威胁不是很大。

但是，红军困难也不少：一是红军新来乍到、人地生疏；二是当地群众对红军不了解，因长期受地主和大刀会的欺骗宣传，不少人反对游击队；三是地主操纵大刀会甚多，几乎村村都有，红军每过一地都遭大刀会进攻，处境异常艰险。

部队在闽北几年革命战争中，跟群众结成鱼水关系，一到这里便尝到没有群众支持的滋味，如同陷入荆棘丛里，四面受刺，却又坐不下来，难过之极。部队一进村，老百姓便跑得干干净净，村子空空荡荡，想吃饭卖米都找不到人。不懂福建话，又找不到向导，近百名伤员，没有人抬，也没地方安置……

在这样异常艰苦的环境里熬过了二三个月，转遍了五峰山和白云山之间的大小村庄，风餐露宿，疲惫不堪，伤员增多，困难越来越大。

“像这样，别说开辟游击区，光拖就拖垮了。”有些战士动摇起来。

“还不如到浙南，打回闽东也不错，在这里受这窝囊气。”

饶守坤、王助听了也很着急，但不主张打回去。强调部队的任务是开辟新游击区。

此次教训使红军游击队认识到：之所以处处被动，关键是群众基础不好。若想柳暗花明，必须发动群众，取得群众的支持，面对群众勇气不够，信心不足，就很难与群众取得联系。

饶守坤、王助商量了一下，根据“集中以应付敌人，分兵以发动群众”的原则，决定以迪口为中心开展活动。

白天，部队以连、营为单位集中起来了，迎击来犯之敌；晚上，分兵深入农户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关心群众的疾苦，能



找一个找一个，能找两个找两个。

饶守坤带领一个侦察排到马地，这个小村子约摸有40多户人家，听说红军来了，都吓的跑光了，只留下五六十岁的老头子。饶守坤找到他们，向他们解释红军的政策和性质，说明红军是替穷人打仗的军队。从晚上7点多钟一直谈到凌晨3点，这几个老人才逐渐明白些了。一个说：“早知道你们是这样的部队，我们就不跑了。”

“我们尽力把村里的人都找回来。”另一个也随着说。

宣传工作收到明显的效果，群众陆续回家了。游击队又开展打土豪运动，把没收的东西分给群众。这样，逐渐和群众建立起感情。

有了群众基础，第二步便该是对付大刀会了。大刀会受敌人的欺骗和拉拢，经常袭击游击队，流血事件不断发生。但大刀会多数是贫苦农民，他们与红军的对立，主要是不了解红军之故。

王助决定从团结下层和瓦解上层两方面着手，抓住他们同地主武装之间的矛盾，争取他们站到游击队一边来。

“擒贼先擒王”，饶守坤、王助首先选择危害最大的以林熙明（又名林乃导）为首的林营开刀，他拥有300多人枪，是红军开辟游击区的绊脚石。对他们单凭说服、教育是不起多大作用的，必须结合军事压力，充分显示一下红军的力量。

1935年12月的一天，游击队集中兵力，在政和、建瓯边界的苏地村北面山下设下埋伏，将林营大刀会引入圈套，一举活捉会徒100多人。

有这100多个人作“人质”，游击队便有了谈判的条件。饶守坤、王助亲自对这些人做工作，从中查出一个林熙明的舅舅，放他回去，让他给林熙明带封信去。信上表示游击队愿意停战言和，与他交个朋友。当然口气也比较强硬：“若不明大义，再向我们进攻，我们不对这100多人的生命负责。”这些人都有老婆孩子，若

林熙明不重视这 100 多人，她们也不会答应，势必在大刀会中造成混乱。

这一着果然奏效，林熙明捎信来，表示愿与游击队的“头头”面谈。

饶守坤决定亲自去一趟。

傍晚，饶守坤带着一个连来到林营，看到村里前前后后都是人，穿着五颜六色的“法衣”，围着头巾，手执长矛等兵刃。

村口，林熙明带着一帮人出来迎接，他大约 30 多岁，中等身材，身体并不健壮，一张黄黄的脸，留着一抹短胡髭。原是政和县人，也是个贫农出身，后来被债务所迫，离乡背井，闯荡江湖，混进青红帮，后来发迹，控制了十几个村的会徒。

一见面，他俩开诚布公的谈起来，饶守坤先谈了自己的经历，全国的形势，共产党的性质和任务，最后把话题引向集中力量对付国民党统治上。

“一切坏根都是国民政府和军队，这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不说别的，单是纳税、抽丁这项就害苦了穷人。要是我们联合起来，打倒国民党，免除人民的负担，对你的弟子也有好处。”饶守坤特别强调抽丁问题。

“说，你说，说下去……”林熙明一听抽丁问题，便立刻暴怒，身子前倾，目不转睛地望着饶守坤。

“林师父身为一教之长，不能看着弟子们受气不管呀！”

“管，管！”他长叹一声，“不瞒你说，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们何不团结起来，咱们手拉手，肩并肩的干，力量不就大了？”

“对！”林熙明把水烟袋猛扔到桌子上，伸手抓住饶守坤的手说：“一言为定。”

当地群众听说林师父和红军饶司令言和了，许多事情便迎刃而解，伤员也有了治疗的地方，游击队衣食住行都有了依靠，更

重要的是部队可直接开展群众工作了。林熙明还派人晓喻建政边区各区的大刀会，不准袭击游击队。

接着，游击队与大刀会相互配合，先后打了几次胜仗。

有一次，敌人的一个保安团从政和向游击队进攻。林熙明便带着1000多人的大刀会兄弟正面迎击敌人，随即向后撤退，把敌人引入游击队的伏击圈。这一仗便吃掉了敌人两个营。

在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的基础上，红军游击队发动群众开展抗租、抗税、抗丁斗争，建立区、乡工农政权。

经过一年多的斗争，红军游击队几乎扩大了一倍。由原来的1300多人增加到2000多人，开辟了松溪、政和、古田、迪口等四五个县的游击区。

1936年6月，闽东北特委与军分区在建瓯墟地的樵村正式成立，特委书记王助，军分区司令员饶守坤，原来松政中心县委活动的区域与新开辟的游击区合为一体，形成了闽东北游击根据地。

在饶守坤、王助率部开辟闽东北游击区的同时，西出的一路红军在黄立贵、曾镜冰的率领下，也积极向邵（武）顺（昌）建（阳）边区推进。

为避免把大量敌人引入邵顺建地区，黄立贵率部绕道而行，边走边打。从岗谷经温林关进入江西，奇袭紫溪，攻占杨村，后又巧妙地甩开敌人的追踪，转向建阳黄坑向邵顺建地区进军。

邵顺建边地是邵武、顺昌、建阳三县的边界地区。这里山高林密，人烟稀少，“统”而难“治”，是开辟游击区的理想之地。

早在决定开辟游击区之前，邵武县委便积极向这一地区发展。县委书记刘新友率独立营两个连的战士，以二都桥经红柿一直打到麻沙界首、朱坊等地，直插茶埭、华家山。在华家山，地主民团和大刀会活动猖獗，红军屡遭伏击，只好撤回邵武二都桥体整。

在二都桥附近的黎源，刘新发率领部队同黄立贵率领的部队不期而遇，于是合兵一处，决定向顺昌方向推进。

然而，这一带的反共大刀会、九仙会与敌保团数十余众纠合在一起，早已在营口、麻沙、江坊、界首、书坊、晒口等地分兵把口，层层布防，控制了游击队南下顺昌、西进邵武的交通要道。针对这一形势，黄立贵当机立断，决计先给此地的大刀会和九仙会点颜色看看，压压反动气焰，打开通道。

游击队在建阳县麻沙乡的后山上设伏，引鱼上钩。

果然，迷信“刀枪不入”的麻沙大刀会、九仙会400余人，由地主民团压阵，个个手持梭标，身穿黄色八褂衣，头扎纸符，狂呼乱叫地冲进了游击队的伏击圈。

游击队前后夹击，不一会儿工夫，会徒就死的死，伤的伤，溃不成军。

麻沙一战，红军声威大震，大刀会“刀枪不入”的鬼话不攻自破，大大震惊了当地的会徒。

为了争取会徒，黄立贵派专人保护大刀会佛堂，对会徒不咎既往，对其家属一视同仁。在红军的宣传教育下，会徒们大为感动，大部分愿与红军结为盟友，为红军通风报信、站岗放哨，甚而帮助红军作战，共同对付敌人。麻沙一带形势迅速好转，书坊、江坊一带成了游击区。

在争取大刀会的同时，游击队也认真贯彻闽北分区委扩大会议的决议，坚持打击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对保甲长一般采用利用的政策；对一般豪绅地主采取筹款政策；对开明绅士采取自动送款，不予没收财产政策，尽量缩小打击面。

这些正确政策的实施，使红军游击队在新区站稳了脚跟。

1935年10月，中共邵顺建县委在建阳南门丁厝成立，下辖饶坝、桂溪、东游、华家山等区委，之后又逐步扩大。各地党组织及赤卫队，游击队也相继建立。

同年冬，为肃清邵顺建边区的反动势力，巩固游击区，闽北军分区司令员吴先喜率部进入邵顺建，给骚乱华家山、东湖区委

的大刀会以沉重打击，粉碎了当地民团企图发动反革命暴乱的阴谋，稳定了邵顺建游击根据地的局势。

1936年6月，闽东特委军分区成立。黄立贵任特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

8月，曾昭铭、马长炎等率部深入将（乐）建（宁）泰（宁）地区，建立将建泰县委，开辟了将建泰游击区。

至此，闽中游击根据地得以正式形成，成为闽北游击战争的又一支点。

资光贵边区系金溪、资溪、光泽、贵溪四县交界地带，又是福建、江西两省交界的边缘地带，这里地广人稀、森林茂密，山村犬牙交错，国民党地方政府权属不明，乃至互相推诿，多所鄙弃；加上当地群众基础较好，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老苏区，有利于游击战争的开展。

1935年9月，独立师四团执行闽北军分区的“打击外线，开辟新区”的方针，在军分区司令员吴先喜和原光泽独立团政委刘文学的率领下，从建阳黄坑出发，进入资光贵地区。

游击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攻占光泽的柴家，成立了柴家区委。后又转向资溪的昌坪和贵溪的冷水坑一带活动，随后扩大到白沙坑等地。

不久，柴家区委扩大为资光贵中心区委，刘文学任书记，下辖柴家、昌坪、冷水坑及贵南方面三个区共六个区委。

后来，吴先喜率部返回闽北，刘文学就地坚持斗争。

鉴于处境险恶，又与闽北分区委失去联系，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刘文学决定采取隐蔽斗争的方式，秘密发展党组织，积极扩大游击区。

敌人的报纸帮了大忙，1936年初，黄道从中获悉失去联系的刘文学仍在资光贵坚持斗争的消息，十分欣慰，忙派吴先喜、鲍永泉率200余人的第四纵队去寻找刘文学。

两支队伍几经周折，终于在贵溪闽坑会合了。资光贵中心区委扩大为中心县委，书记吴先喜、副书记刘文学、组织部长鲍永泉。

两军会合后，力量倍增，附近的一些反动民团均被肃清，原来隐蔽的游击活动也转为公开。

1936年6月，游击队转到资溪县城附近，获悉县城只有为数不多的民团把守，吴先喜、鲍永贵决定攻打资溪县城。

战斗刚刚打响敌人便纠集十几个团的火力，以金溪、贵溪一线杀气腾腾地向资溪扑过来，把游击队团团围住。战士们拼命冲出重围，撤到金溪五里峰后又陷入敌围，经过激战，伤亡1/3，吴先喜在突围中身负重伤。

此次行动对敌情估计不足，又欠全面考虑，只看到资溪城防空虚，而没有看到金溪、贵溪一线的保安团和地方民团，他们虎视眈眈，等游击队一露面，便包抄过来，致使游击队损失惨重。

鲍永泉收拢了被打散的部队100多人，由于敌人天天搜山烧山，无法在当地立足，被迫拉到外线休整。吴先喜则转移到板木坑一带养伤。

此时，黄立贵正活动在邵顺建边区，得知吴先喜受挫的消息，立即派陈仁洪率领一支部队，迅速进入资光贵地区，以解燃眉之急！并指示陈仁洪：能战则战，不能便撤回闽北，只求吸引敌人的兵力，避免更大的伤亡。

陈仁洪一部，边行军边打仗，经过长途跋涉，于9月下旬来到冷水坑地带，一举消灭敌反动武装六七十人。

吴先喜得知消息，即派人接头，两支队伍在闽坑附近的坂宋岭会师了。资光贵红军游击队士气为之大振，他们吸取以往失败的教训，决定分兵深入敌占区，以打乱敌人的兵力部署，粉碎其围剿，扩大游击区。

1936年冬，游击队一夜急行百余里，突袭贵溪花桥，歼敌五六十人。接着又袭击了饶桥，歼灭当地民团百余人，缴枪50多支。

敌人被游击队声东击西，神出鬼没的打法搞的摸不着头脑了，哪里还有余力去实现他们的“围剿”呢？经过积极的游击活动和群众工作，游击队恢复并巩固了资光贵游击根据地。

三块新游击区的开辟与恢复，缓解了崇安老游击区的压力，闽北的游击战争形势开始好转。

1936年1月，张发奎接替卫立煌，任闽浙皖赣边区“剿匪”总指挥，统率罗卓英第十八军、刘和鼎第三十九军、张钫第二十路军及地方民团，重新对边区发起“总会剿”。

闽北游击区又面临新的威胁，根据中央在红军开始长征时下达的“闽北红军注意和闽东叶飞同志的部队取得联系”的电报指示，黄道命黄立贵、曾镜冰率独立师一团主力到闽东北地区，寻找叶飞，联合闽东和浙西南红军游击队，配合粉碎敌人的“新围剿”。

黄立贵部在建瓯的后坪会合独立师三团的五连，半月后进驻政和县洞宫山的乐坪村。

洞宫山是政屏中心区委活动的中心地带。独立师一团来时，正值新春佳节，当地群众热烈欢迎红军，慰劳红军。正月初三，一团拔除楼坪敌据点，为这一带群众除去了一大祸害，随即公开打出旗号，分路出动寻找闽东红军。

1936年2月，闽东红军100多人在叶飞的率领下，在乐坪村同闽北红军胜利会合。

闽北、闽东红军首次相聚，山村一片欢腾。叶飞与黄立贵促膝面谈，相互介绍各自游击战争的情况，并本着联合统一、相互支持的共同愿望，商定在洞宫山召开闽北、闽东联席会议。次日，叶飞率部回闽东，黄立贵率部返崇安。

1936年4月，黄道在黄立贵的护送下，到达政和县洞宫仰头村，与先期一天到达的叶飞会晤，两双大手久久地握在一起，两旁的战士都为这次胜利会见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黄道向战士们解释说：“你们知道，敌人搞个闽浙赣‘总会剿’。他们勾结起来对付我们，难道我们红军不会联合起来对付他们？”

在仰头村的一个大山洞里，黄道、叶飞等举行了三天的联席会议。

后来，由于形势紧张以及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闽北、闽东未能实现真正的统一。

1936年6月，黄道等由政和返回崇安，在岚谷宣布成立了闽赣省委。省委书记黄道、组织部长曾镜冰，下辖四个分区委和四个军分区：

一分区（闽北分区委）书记汪林兴，司令员熊家才，辖崇安、建阳、广浦、上铅等县委；二分区（闽中分区委）书记黄立贵兼司令员和政委，辖邵顺建、邵将泰县委和邵光特委；三分区（闽东南特委）书记吴先喜兼司令员，副政委刘文学，辖资光贵中心县委；四分区（闽东北特委）书记王助，司令员饶守坤，辖建松政中心县委和迪口县委。

闽北独立师所属四个团改为纵队建制。

1936年6月，闽赣省委、省军区等领导机关乘“两广事变”爆发，国民党军队频繁调动之机，连续发布了《闽赣省军区政治布告》等训令和布告，推动游击战争向纵深发展。

到年底，闽北游击根据地得到很大发展，形成了崇安、建阳、浦城、广丰、上饶、铅山、金溪、资溪、贵溪、光泽、邵武、顺昌、南平、将乐、泰宁、建宁、建瓯、松溪、政和、屏南、周宁、青宁、庆元、龙泉、江山等20多个县的广大游击区域，闽北独立师也由原来的四个纵队发展到六个纵队，是为闽北三年游击战争全盛时期。



### 漂泊的船儿终于靠岸了

1937年1月，蒋介石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机，玩弄“北和南剿”的政治伎俩，重新集结部队“清剿”南方红军游击队。

闽、浙、皖、赣四省“剿匪”总指挥也匆匆换马，由刘建绪接替张发奎，采取军事政治双管齐下的策略，扬言要在二三个月内消灭红军。

接着，敌第七十五、七十六、三、四十五师和独立第六旅等分别从光泽、邵武、建阳、浦城、广丰、崇安进攻资光贵、邵顺建、建松政等游击根据地。

2月间，吴先喜带领第四纵队在光泽柴家活动时，被敌人优势兵力所包围，鲍永泉迅速指挥队伍突围，吴先喜等全部阵亡。吴先喜的牺牲，使闽北党和红军失去了一位优秀领导人。

黄道率省委在武夷山的主峰猪母岗，一边坚持战斗，一边派遣省工联会主席吴华友，携带闽赣边区游击战争情况报告到山外寻找党中央。

1937年2月，吴华友几经辗转，终于在香港找到党中央代表朱挺，并寄回来了党中央的重要文件——《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关于抗日救国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和《东渡宣言》。

接到文件，黄道心中万分激动，兴奋地对战士们说：“好了，好了，我们这只在大海中漂了几年的船终于接到方向了。”

黄道组织省委干部群众认真学习文件，引导大家讨论形势，把思想认识从反蒋转到联蒋抗日上来，要求各地红军及革命组织大力宣传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和企图占领福建的阴谋，号召“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国人，不论职业、团体、宗教信仰、政治派别，一致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抗日民族革命战争。”

3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闽赣军政委员会成立，黄道任主

席。号召人民“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参加到反日阵线上来。”

之后，黄道分别向光泽、崇安、邵武等地的国民党地方当局发出一致对外的呼吁信。信中简述了国家危难形势，希望他们能以民族利益为大局，停止进攻红军游击队的一切军事行动，一致抗日。

然而，国民党地方当局却依照蒋介石的密令，拒绝谈判不说，还常用优于红军十几倍的兵力进攻游击区，游击队每仗打的都异常残酷。

一天，黄道站在猪母岗上，感慨万千。国难当头，山河破碎，蒋介石却依然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吴先喜等民族精英壮志未酬身先死，此恨何时消，他想起了民族英雄岳飞，愤然口诵一首《满江红》：

中华民族，到今朝，万分危急！向北望，满蒙华北，已非畴昔！暴日铁蹄遍地踏，傀儡组织如林立，看同胞痛苦已受尽，如奴隶！不抵抗，尽退出，睦邻合，史可耻，还有辱国的协定和议，大好河山频出卖，爱国同胞横遭逮，这是谁甘心当汉奸，蒋介石！义愤填膺，谁能做，亡国奴隶！誓拼我，热血头颅，一雪此耻！抗日怒火正燃烧，救国呼声遍地起，任强盗汉奸的压迫，难止遏！抗日的，是同志，当汉奸，是吾敌！擎起那神圣的抗日旗帜，恢复失去的土地！争取民族的独立，与世界劳苦的兄弟，手相携！

1937年9月20日，黄道按照党中央和项英、陈毅的指示，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写信给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以民族大义为重，慷慨陈词：“我辈

向以抗日救国为自信，对于救亡图存工作，决不后人。”同时，就谈判问题提出三点原则立场：

（一）愿将闽北红军改名为抗日义勇军，实行抗日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取消苛捐杂税；（二）允许闽北红军与朱德、彭德怀通讯联络，请求并服从他们的指示；（三）谈判未开始之前，红军首先停止军事行动，停止打土豪，国民党军也必须从崇安县境包围红军之地域撤出。并“将与抗日有意义的地区”划归红军游击队。

由于陈词恳切，建议具体，形势有利，谈判于9月下旬开始进行。双方几经洽谈，达成协议。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在南昌成立，黄道奉命任办事处主任，同时担任中央东南分局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

1938年2月初，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来到铅山县石塘，传达军部命令，将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

从此，闽北红军开始了新的战斗。

---

---

## 第六章 青山不老

湘赣和湘鄂赣是中央苏区的两个重要侧翼，当中央红军还鏖战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沙场上时，他们便开始进入了艰苦的游击战争时期……

### 一 战斗在武功山

#### 我们就这样完了吗

盛夏的横石村，一连几日骄阳似火，热不可当。

湘赣军区司令员彭辉明望着这寂静的小村，迎着难得的徐徐清风，却怎么也排遣不了心中的烦躁。他揉揉疲惫的双眼，极目向南眺望，远处是一些不知名的小山丘，疲乏地横卧在苍茫的暮色中；再远处，就应该是井冈山了吧？想到这儿，好像众山已压上他的心头一样，沉重的感觉是如此的清晰。

已经记不清楚有几个难眠之夜了，彭辉明的心头日甚一日地沉重，让他寝食难安。想到日益严重的革命形势，他怎么也舒展不开那紧锁着的眉头。

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致使红军屡战不利，打破第五次“围剿”已无希望。1934年2月，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永新城被敌人占领，其余地区也不断被敌人分割成若干小块。7月23日，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给湘赣省委发出训令，“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的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苏区”。训令指出：红六军团撤出湘赣转移到湖南

中部，是考虑到湖南的革命力量薄弱，游击运动没有广泛地开展起来，使湘敌得以集中全力向湘赣苏区进攻；湘赣苏区已紧缩，敌人正加紧封锁和包围，特别是加强对西线的封锁，企图阻止红军向西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红六军团继续留在现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之危险，而且粮食及物质供应将成为尖锐的困难，红军及苏区之扩大受到很大限制，这就使得保全红军有生力量及捍卫苏区的基本任务都发生困难。要改变这种状况，主力应离开现有地区转移至更加广大与有自由机动可能的地区作战。

为此，在经过充分准备之后，红六军团于8月7日，在独立四团的引导下，由江西遂川的横石和新江口一带出发，踏上了西征的征途。

主力离开后，留下坚持斗争的就只有五个独立团了。其中独立第五团人数较多，约1500人，独立一团人数最少，仅200多人，其他三个独立团每团只有三四百人，五个团共3000多人，加上县区武装，总兵力不过5000人。而它面对的，却是十数倍于己的敌军，身为湘赣军区司令员的彭辉明怎能不心情沉重？

湘赣游击根据地处于江西、湖南两省边界的罗霄山脉北段，包括江西的安福、莲花、永新、吉安、宁冈、萍乡、宜春、分宜，湖南的酃县、茶陵、攸县、醴陵等县。1927年毛泽东率领红军上井冈山，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局面，边区各县农民暴动四起，先后建立了工农红色政权，扩大了革命武装。1931年8月，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在永新成立。

从地理形势来说，湘赣苏区是中央苏区的右翼，国民党历来视其为心腹大患。此番趁主力红军西征之际，更是纠集重兵前来“进剿”。

当时盘据在湘赣边区的国民党军，计有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驻吉安），李韞珩的第五十三师（驻安福），罗霖的第七十七师

(驻遂川、泰和)，王东源的第十五师(驻莲花)，朱耀华的第十八师(驻茶陵)，这仅仅是正规军；参加“进剿”的还有江西保安第四、六、十三团，以及还乡恶霸地主组织的民团、义勇队等。这些部队运用碉堡政策，控制着茶陵、莲花、安福、永新等县的公路交通要道，在湘赣边区四周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彭辉明一边想着严峻的革命形势，一边慢慢地向前踱着，嗅嗅野花，看看落日，看似闲适，其实脑中却在积极地思考着，他再次将敌我双方的实力进行了一番比较，是啊，五个独立团的兵力的确是太少了，怎样部署方能使有限的兵力发挥出最大的效果呢？

彭辉明十分熟悉自己的队伍，他权衡再三，决定：派遣独立一团(团长刘日，政委旷彪)活动于永新、莲花、安福一线；以独立二团(团长宋何子、政委王子真)活动于安福、分宜、新余、吉安一线；独立三团(团长刘启明、政委刘培善)活动于安福、永新、莲花、萍乡、宜春一线；独立四团(团长李宗保、政委旷珠权)活动于遂川、泰和、宁风、鄱县一线；独立五团(团长曾开福、政委谭富英)跟随省委行动。他要运用这五路人员在敌人的包围圈内兜圈子，袭敌扰敌，保存自己。

敌人的目标是彻底消灭湘赣苏区的党和军队。把兵力分散、隐蔽、游击不定才是保存有生力量的最好手段，想到这儿，彭辉明意识到应该马上向省委汇报自己的兵力部署思路，因此，脚步不觉加快了。

早在红军六军团准备突围西征的同时，湘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及省军区就及时进行了调整，由陈洪时、谭余保、旷光明、姚厚德、旷进媛、王用济、张云逸等组成湘赣省委常委委员会。由于张云逸、姚厚德未到职，后补彭辉明、谭汤池两人为常委。省级党政军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是：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副书记谭余保；湘赣省苏维埃主席谭余保，副主席肖行麟、刘燕玉；湘赣

省军区司令员彭辉明，政委陈洪时，参谋长周杰；共青团湘赣省委书记王用济；湘赣省妇运书记旷进媛。

省委马上同意了彭辉明关于五个独立团的兵力部署，新的战斗就要开始了。

敌人疯狂地叫嚣：“清洗匪区，换过人种，换过谷种，茅房要过火，石头砍三刀。”分兵几路杀进湘赣苏区，一时间，腥风血雨，天昏地暗，形势异常严峻。同时，国民党当局也吸取了以前单以军事手段“围剿”的教训，秉承蒋介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训令，在政治经济上也采取了很多有力的措施，给边区造成了强大的压力。

国民党每占领一地，便大搞移民并村，保甲连坐。把山上的群众赶到山下，把小村的群众并入大村，并设立“联保办事处”、“清乡委员会”等机构；制定连坐制度，如“一家通匪，十家连坐”；“一家窝匪，十家同祸。”

与此同时，对红军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特别是食盐、粮食等，实行定人定量定期定点购买；其他生活日用品，如鞋、布匹、火柴等也要限量购买，不许自由商贩在封锁区内做买卖，百姓也不得带物上山，否则便是“通匪”、“济匪”了。实行这些措施的目的，就是要把红军同人民群众隔离开来，把红军饿死、困死。

敌人重兵压境，步步紧逼，层层进剿，湘赣苏区的面积日渐缩小；加上陈洪时坚持实行死打硬拼战术，使红军作战越来越被动，减员十分严重。在敌人的“铁壁合围”和“梳篦战术”之下，红军腾挪跳跃的回旋余地日见狭窄。

面对被动而危急的局面，彭辉明、谭余保等人开始意识到必须改变斗争策略，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山高林密的武功山区，提出以整个武功山区作为回旋余地开展游击战争，保存革命有生力量。

武功山，黝黑的山脉绵延起伏，呈南北走向的山体纵横160余

公里。其主峰向鹤峰（亦称金鼎），海拔 1918 米，太平山、相子山、棋盘山、五里山、杨梅山、铁境山、陈山、谷源山、七都山、明月山等大小数十座山峰环峙四周，好一个险要所在。主峰向鹤峰离安福县城仅 50 公里，退可凭险而守，进可伏势而动，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

彭辉明、谭余保等省委领导在认真地分析敌我双方形势，参考当地群众意见的基础之上，作出了进军武功山的决定。之所以选择武功山为游击中心，是基于以下理由：

第一，武功山地势险要，回旋余地大。以白鹤峰为中心，游击半径可达 400 公里。武功山位于湘赣两省交界处，南可连接赣南、湘南，西可与湘鄂赣苏区沟通，越过赣江则可直通中央苏区。这种地理位置也为红军利用湘赣两地敌人之间的矛盾，保存自己，打击敌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第二，武功山区党组织建立早，群众基础好。早在大革命初期，安福、莲花、永新、宁冈四县便联合组建了赣西农民自卫军；毛泽东率领红军建立的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就在该地区；这里的人民群众长期在频繁的斗争环境下生活，生性机敏灵活，不怕牺牲，能耐劳苦。

第三，武功山下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鱼米之乡；山上盛产竹笋、香菇和各类野果、野菜，这可是缺粮充饥之宝。

武功山从此要肩负起一个伟大的使命了。

1934 年 11 月，江西保安第四团的两个中队偷袭省军区驻地袁家村，红军独立第三团仓猝应战，虽击退了来敌，自身也伤亡很大，再加上袁家村的暴露，省委连夜转移到百里以外的安福境内长源头、芦台一带。

12 月下旬，国民党第五十三师联合莲花、萍乡、宜春、安福四县保安团跟踪而至。独立第三、第五团与敌展开阵地战，但战士的英勇抵挡不住优势的暴力，省委又连夜转移。不过这一次转



移的目标再也不是富裕和交通便利的村庄，而是越过武功山最高峰来到深山区，也就是观音形、双田坪一带。

至此，湘赣苏区已全部丧失，可是革命的旅程仍在向更艰险处延伸。

其时，国民党军第二十三师、二十八师、五十三师、六十三师等“进剿”部队已相继调离湘赣边区，西行尾追红军主力长征部队，只剩下第十八师在湖南境内，截断红军向湖南方向移动的去路；第七十七师罗霖部坐镇武功山区，担任“进剿”湘赣边区革命力量的任务。

彭辉明的腰板挺得直直的，略带茶色的脸庞因为瘦削而显得更加棱角分明，更加刚毅，然而他的内心此刻却如万针攒钻一般疼痛，本来敌军“进剿”兵力已大为减少，正是部队在深山喘息休整的好机会，可是省委书记陈洪时仍沿袭李德、博古那套“左”倾工作办法，把部队集中起来，白天公开行动，四出烧碉堡，打民团，贴标语，或突出筹粮，这等于是在“进剿”敌人而前的自我暴露。由于频繁的、无休止的行军作战，风餐露宿，冰冻雨淋和饥饿劳累，部队减员很大。

对省委书记陈洪时的作法接受不了的，还有省苏维埃主席谭余保。朝夕相处的战友大量伤亡，整天东奔西跑，狼狈不堪，这些无不让他感到揪心地难过。他想，还是去找彭辉明商量一下，看看采取什么方法来扭转这一败涂地的局势。但彭辉明这时却在百里之外的莲花打游击。对于省委派彭辉明等人率独立三团、五团去莲花打游击，以减轻敌军对武功山压力的决定，谭余保是有看法的，这分明是以卵击石啊！

“三团、五团回来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小红军向沉思的谭余保喊道。谭余保早就交待，一有三团、五团的消息就立刻向他报告。

谭余保欣喜异常，高声叫道：“老彭在休息吧？待会儿我要找他好好聊聊。”

“彭司令员牺牲了。”小红军低声说道。

“啊！”谭余保不禁叫了一声，慢慢的又转过身来，遥望着莲花方向，呆呆的立着。小红军也不敢出声，一时寂静异常，只有山风和悲哀充胀了整个天空。

1935年2月，刚刚过完旧历年，天气异常寒冷，山上风雪交加，石岩下的冰凌有几尺长。彭辉明受省委派遣，率独立三团、五团从武功山附近的双园坪出发，到莲花游击。

红军的行动很快为敌人掌握，江西保安第十团和保安第四团受命联合“剿匪”，他们将总部设在莲花高洲塘下，计划由高洲进至五里山虎头岭一带“清剿”红军游击队。

虎头岭是五里山中的一个村庄，有二三十户人家。旧历年底，国民党在这里大搞“移民并村”，把虎头岭的房子统统烧毁，把群众赶下山去。因此，这一年群众都逃到山下的闪石、暖水江一带的亲戚家里过年。春节过后，为了春耕生产，群众又陆续地搬回山去，砍茅草，剥杉皮，在被敌人烧毁的废墟上，重新搭起茅棚，顽强地生活下去。

彭辉明率部队来到虎头岭时，已近黄昏，天气又冷，便在虎头岭宿营。

江西保安十团和保安四团探听到红军向五里山一带移动，便从高洲出发，由南边山下探索前进，由南边山经天心豹到观音形，上山后，路越走越险，山峦重叠，林深涧险。敌人却有些心寒胆战，途中抓到一个砍柴人，问红军过了多少？砍柴人伸出一个巴掌说，听说是五团，敌人一听，以为红军来了五个团，吓得魂飞魄散，不敢前进，只好就地宿营，准备第二天探实消息以后，再向虎头岭进击。红军在虎头岭山上放了一个排哨。天亮的时候，大雪纷飞，哨兵发现一片白茫茫的山坡下有几个小黑点，不断地蠕动着。哨兵喊口令，对方没有应声，哨兵急了，端起枪，“砰！砰！砰！”放了一排枪。枪声一响，敌人便从四面八方向红军阵地扑来。

接着“嘟嘟——”响起小号声。独立三团、五团立即展开应战。一时机枪声、手榴弹爆炸声交织成一片。

战斗一开始，敌人凭借人多势众，又有三架机枪掩护，很快夺去了虎头岭制高点阵地。接着，分左右两路向红军包抄前进。这时，红军处于极为不利的形势：前面是一片山坡，敌人可以居高临下；后面是村子，红军必须掩护群众。在这种情况下，彭辉明镇定自若，不顾个人安危，将手枪一挥，高喊道：“同志们！冲啊，跟我把前面的敌人消灭掉！”

听到彭司令员略带广东腔的普通话，战士们犹如猛虎下山，一个劲儿地往前冲，猛攻之下，敌人难以抵御，阵脚大乱，开始后撤。

突然，彭辉明身子一晃，一颗流弹击中了他，但是他自己知道，在这种时候，全军主要负责人一动摇，敌人就会马上反扑过来，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咬紧牙关，忍住剧痛，坚守在指挥岗位上。从早上到下午4点，红军一举攻下了虎头岭前面的几个山头，敌人彻底垮下去了。

战斗结束了，红军缴获颇丰。战士们欢庆胜利的歌声、笑声响彻山谷。

就在这时，团部传来了不幸的消息——彭辉明司令员在战斗中身上五处负伤，抢救不及，流血过多，壮烈牺牲。

正在走着的战士停下了脚步，歌声、笑声消失了，代之以悲伤的哭声。

彭辉明安详地躺在用松枝扎成的担架上，全体战士集中站在他的灵前，哭声、抽泣声响成一片。

彭辉明，广西人。1929年参加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人领导的百色起义。1931年随红七军进入湘赣革命根据地，历任永新县赤卫大队大队长，红十七军十一团团团长，第三分区司令员，湘赣军区司令员。他是一颗正在迅速上升的将星之才，却在27岁的大好年华中不幸陨落了。

谭余保悲愤不已，心中暗暗叫道：“为了生存，一定要改变斗争方式！”然而，情况并没有因为彭辉明的牺牲和谭余保的悲愤而改变，形势还在继续恶化。

彭辉明牺牲没几天，省委和独立三团、五团在观音形被敌四六〇团袭击，仅有的一部电台被打坏。从此，湘赣边区与党中央和红六军团的联系中断，给以后的工作造成了巨大的困难。接着，独立团向湘南进军，在茶陵晓田村与敌第十八师遭遇。一仗下来，独立五团伤亡惨重，二营减员过半，只得撤销建制，剩余人员编入一营和三营。尔后，一营由团长曾开福率领向桂东方向行动，三营由团政委谭富英率领向桂阳方向行动。当这支湘赣边区唯一的主力部队辗转回到武功山区的时候，已由原来的800多人锐减到100多人。

敌军的强大压力，己方力量的迅速萎缩，使一些意志不坚定者灰心丧气、惶恐不安。终于，在斗争环境极端恶劣的情况下，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陈洪时可耻地做了叛徒。

湘赣边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的叛变，使舆论哗然，极大地动摇了士气，同时给其他一些意志薄弱者树立了一个绝好的“榜样”。紧接着，省军区参谋长周杰、莲安萍县苏维埃副主席尹学鉴等人也相继“投诚”了。

这些人一投敌，便转而为虎作伥。

陈洪时叛变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于同年6月18日、19日、25日在《江西民报》上连续刊登陈的“投诚”消息，散发他的《反共宣言书》，他还向蒋介石投送“效忠书”。然后他带着地方保安团上山“清剿”红军游击队，深得主子赏识，委任他为“湘赣边区招抚员”，专做“招降”工作。

陈洪时的叛变，使湘赣边区各地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全部情况暴露无遗，边区各地党组织大部分被破坏，边区武装力量被分割包围，整个湘赣边区的斗争陷于极度混乱、濒临崩溃的局面，

湘赣边区的革命火焰眼看就要被扑灭。

许多战士悲愤地说：“我们就这样完了吗?!”

### 天降大任于斯人

陈洪时的叛变投敌并非偶然。

早在部队从永新突围时，陈洪时就不愿随部队出发；省委机关进山后，他害怕过艰苦的生活，又提出将省委搬到安源去做城市工作，由于谭余保等的坚决反对才作罢；省委转移到太平山后，他便开始了投降的准备工作。

先是他借口吵闹省苏维埃政府分开行动，要谭余保和政治保卫局长刘发云前往湘南去联络游击队；接着，他又策划将省委机关工作人员全部支开。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陈洪时便于6月14日秘密带着随行人员及枪支弹药、密电码、军用地图、文件、省委公章等物件，拍屁股开溜了。

这些情况，正在前往湘南途中的谭余保当然是毫不知晓的。可是，事有凑巧。那天，谭余保、刘发云行至茶陵花棚村时，刘发云借口进村了解情况，而后竟一去不复返！谭余保敏感地意识到南去的行动已经暴露，遂果断地作出决定：立即返回武功山。当走到莲花和攸县交界的棋盘山时，恰巧遇到荣攸莲县委书记吴金莲，谭余保这才知道：陈洪时已经叛变了！

武功山当然是不能再回去了，谭余保强压心中的愤恨，将省委和各游击队可能遇到的情形在脑中通盘地考虑了一遍。如今，省委的主要领导中，死的死，降的降，还有些下落不明，各游击大队不知还剩下多少人。这种时候，如果没有一个人挺身而出，收拢部队，力挽狂澜，等待湘赣红军和游击根据地的，就只有全军覆灭的命运。谭余保想到此，一股强烈的使命感在胸中油然而生，他清楚地意识到，领导湘赣人民继续高举红旗，斗争下去的重担已经历史地落在了自己的肩上。

时年36岁的谭余保，湖南茶陵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1926年正式走上革命道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具有豪迈、坚韧不拔的性格，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日趋成熟，由一个不起眼的小兵而历任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区党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湘赣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财政部长，直至今天的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长时期的营养不良再加上连续几天来的夜不成眠，殚精竭虑，谭余保两眼深陷，脸上毫无血色，许久未曾修理过的头发乱蓬蓬的覆在头上。

坐在棋盘山上临时搭起的小棚子里，谭余保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找回失散的部队，一定要挺下去！”

他回过头去，对身后站着的警卫员吩咐道：“立刻下山去把吴金莲找来！”

不大一会儿，吴金莲来了。

谭余保对他说：“老吴啊，我已经考虑好了，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收拢部队，统一思想，你马上动员荣攸莲的全部力量，尽最大的可能把失散的部队都给我找回来！”

几天之后，省政治保卫局侦察部长谭汤池、省委挺进队队长兼政委刘培善、红五团团团长曾开福、参谋长段焕竞……相继来到了棋盘山。

谭余保激动地拉住他们的手，良久，才说出一句话：“你们辛苦了！”

经过一番艰苦的筹划，1935年7月，谭余保在棋盘山主持召开了湘赣省干部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曾开福、王用济、谭汤池、段焕竞、刘培善等40多人。

谭余保在会上激动地说：“同志们，革命不会失败的，总有一天会胜利！虽然陈洪时叛变了，但是湘赣的革命红旗决不会倒！你们几十个人，历尽艰险，从各地赶来棋盘山，便是明证！”

“我们有党的领导，有主力红军的配合，有富于革命传统的苏区人民的支持，有大山、有森林，我们还有几百名经受过考验，得到广大群众支持的红色战士，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就能战胜困难，打败敌人，就是一支永远不可战胜的力量！”

会议分析了当时边区斗争的形势，统一了大家的认识，制定了“保存力量，稳步发展，以待时机”的方针，确定了今后的行动方案，其主要内容是：

（一）宣布撤销原省委、省苏维埃和省军区，组成以谭余保为书记，曾开福为副书记，龙珍、刘培善、王用济、段焕竞、颜福华、谭汤池等为常委的临时省委；同时成立湘赣省军政委员会和游击司令部，谭余保兼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和游击司令部政委，曾开福兼任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和游击司令员。

会上还确定了其他领导人，他们是：肃反委员会主任颜福华，组织部长谭汤池，秘书长陈永祥，参谋长段焕竞，政治部主任刘培善，团省委书记王用济，省妇运书记陈珍媛等。

（二）开展反动摇、反叛变活动，肃清陈洪时叛变的影响，对投降变节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

（三）重新确定以武功山为依托，相邻地区为回旋之地开展游击战争，采取隐蔽分散，保存实力，不死打硬拼的斗争策略，和既有分散，又有集中的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

（四）决定发表《告群众书》，揭露陈洪时等人叛变投敌的可耻行径，鼓舞边区军民振奋革命精神，坚定革命信念，在湘赣临时省委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清剿”。

最后，谭余保斩钉截铁地说：“湘赣边区是毛泽东同志亲手建立的根据地，走了陈洪时，带不走老百姓的心，竖在这里的红旗决不会倒！”

“不会倒！”

“永远不会倒!”40多人的吼声响彻群山。

会后不久，湘赣边游击司令部收拢了失散的部队，重新整编为两个支队六个大队，以一个多月的时间集中力量开展了反动摇、反叛变的斗争。临时省委的口号是：“不怕死，不动摇，执行党的方针，紧紧依靠群众，坚持斗争到底，胜利必属于我们!”全体干部战士的思想认识很快得到统一。

这时的国民党得意非凡，早在棋盘山会议前夕，国民党“清剿”部队就声称湘赣红军游击队已被“肃清”，接着，国民党罗霖部第七十七师等“清剿”部队先后撤出武功山区，湘赣红军游击队的主要敌人便只剩下了地方的反动保安团，压力顿时减轻了许多。

### 走出低谷

棋盘山会议之后，湘赣临时省委，吸取了前阶段斗争的教训，逐渐掌握了游击战争的精髓，既注重建立根据地的坚实基础，又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依托根据地，避实就虚，声东击西，积小胜为大胜。从此，湘赣边区游击战争逐渐走出低谷，由衰转盛。

随着斗争形势的好转，更多的新区被开辟出来，被破坏的农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秘密组织也相继恢复。

但是也有些新区的工作开辟不久，就经常遭到敌人的破坏。在离攸县草田30里的小村子里，有一个敌人军事机关的侦探，名叫罗根元，他暗地里操纵着当地的“埃手团”、“守望队”、“清共委员会”等各种反动组织，经常屠杀红军游击队和革命群众，对游击队威胁很大。

游击队下决心要搞掉他。可是他出没无常行踪不定。如果事先布置不周密，仓促行动，反倒会坏事。游击二大队决定派荣攸莲中心县委妇女部长李发姑和女战士冯秋姑先下山侦察。

这天傍晚，发姑和秋姑化装成两个富商的女儿，天快黑时下



山了。

罗根元住的一栋房子在山沟里，门前有棵大树。发姑和秋姑进去时，只有老太婆在家。屋里的陈设，正和一般农民家里一样，只不过养着很多鸡罢了。若不是事先打探好，真难相信这便是那个“秘密侦探”的家。

秋姑装作有钱人家子女的派头，见了老太婆就嚷：“喂，给碗茶喝喝！我们是赶路的。”

“锅里有，自己舀吧！”老太婆显然不大在乎。冷眼看了两人一下。发姑朝秋姑努努嘴，向老太婆问道：“老太太，你贵姓啊？”

“姓罗！”老太婆爱理不理的。

等秋姑喝完水后，发姑故意站起来说：“走吧，还有一段路要赶哩。”

秋姑听说要走，马上用双手按住小腹说：“姐姐，不能走了，我肚子疼得厉害。”

“那就歇会儿吧。”发姑又坐了下来。接着，便和老太婆闲扯，“你家里几口人啊？”

“还有个儿子，没回来。”

“今天回来吗？”

“这可不知道！——你们从哪里来的啊？”老太婆很机警。

“我是官田‘陈盛记’家的——这是我表妹。我们到亲戚家去。”

“陈盛记”在这一带是最有名的商号，出发前，游击队已详细了解了“陈盛记”的许多情况，作好了伪装自己的充分准备。

“姐姐，我痛，不走吧。”秋姑趴在凳子上呻吟着。

“好吧，明天赶早走。”发姑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

“不行啊，别处去过宿吧！”老太婆冷冰冰地说：“我们这地方不给外人住。”

发姑装着没听清，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光洋，递给老太婆说：“请你给我们做碗饭吃吧。”

老太婆一面说着“不要这么多”，一面却将钱接了过去。她犹豫了一会儿又说：“吃完饭，你们还是走吧。我这是为你们好啊。”

“为什么？”发姑问道。

“上个月，来了个男子汉，也是在这里过宿的，不知怎的，半夜里我那儿子就开枪把他打死了。前些时，还有个妇女，也说走不动就在这里住宿。我儿子从她贴胸的地方查出个什么纸条来，硬说人家是‘土匪婆’，用柴刀宰了。”

发姑强压住胸中的怒火，故作平静地回答：“我们是陈盛记家的人，不怕他。”

“等他回来后，你们可别多说话。”老太婆叮咛道，“阿弥陀佛，谁知道他会不会得罪陈家的人。”

正说着，“呼”的一声，虚掩着的门被踢开了，但却没见人进来。

“回来啦！”老太婆悄悄地说。

又过了一会儿，才轻悄悄地进来一个人。约三十二三岁，黑脸膛、矮个子；上身穿件对襟夹袄，下身穿了条灰布裤，打扮并不十分突出。

一进门，罗根元就用狐疑的眼光上下打量着两位不速之客。老太婆抢着说：“这是官田陈家的，走亲戚路过。小姑娘肚子痛，打算宿上一夜再走。”

罗根元没说什么，面对敞开的大门坐下来。老太婆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摆上一壶酒和一盆清蒸整鸡。

罗根元呷了口酒，右手撕下一只鸡腿，左手解开上衣的纽扣，腰间露出两把乌黑发亮的短枪来。

秋姑嚷着肚子痛，要上厕所。她出去没一会儿功夫，顺手将放在门外的一把伞拿了进来。这是事先和游击队联络的暗号，表示罗根元在家里。

罗根元慢慢地啃完鸡腿，突然把脸一沉，冲着两人说：“真神

面前烧不了假香，好汉眼里揉不进沙子。在姓罗的头顶上飞的雀儿，没有个太太平平过去的，姓罗的好说话，有两个家伙可不饶人！”他拍拍腰间的驳壳枪，一脸狰狞，逼近秋姑说：“老实些还能活命，究竟是哪儿来的？说！”

“官田陈家的！你是什么人啊？”发姑装作害怕的样子。

“不许你说！”他拍拍秋姑，“你这个肚子痛的说吧！”

“我们身上只带了5块光洋，你要就拿去吧。”秋姑像个不懂事的孩子似的，哭丧着脸说。

“哈哈，真他妈的是受过训练的，装得可真像！快说，是干什么的？”

“到大表姐夫家去。”秋姑说。

“什么大表姐、二表姐的，陈家刚死了人，还走亲戚？！”

“没仇没冤的，你咒人做什么？”

“哈哈，还说是从官田陈家来的哩，连陈家的红白喜事都不清楚。”

“你才不清楚哩。上个月我大表姐出嫁，你说是办丧事。”秋姑理直气壮地说。

罗根元“嗯”了一声后，又坐回原位专心致志地喝酒啃鸡了。谁也不知道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该是游击队出现的时候了，但没有一点动静，发姑的心开始剧烈地跳动，该不是游击队中途出了什么岔子吧？怎么办，不能坐失良机啊！

就在这时，发姑突然瞥见门口有个黑影一闪，罗根元猛地踢翻桌子，吹灭了灯，伸手要拔枪。发姑和秋姑立刻一左一右地拼命抓牢了他的两只胳膊不放。

这时，游击二大队队长罗维道已经站到他面前，用短枪对着他说：“别动！我们是红军游击队！”

这个罪大恶极的“杀人魔王”终于伏法了。

这一时期，活跃在武功山地区的湘赣游击活动更为频繁，采取白天隐蔽，夜间出击，以小分队寻找敌人薄弱环节，进行奇袭，攻其不备，出奇制胜。

1936年6月23日，游击队一大队的四个连在段焕竞、刘培善的指挥下，连夜奔袭吉安油田区公所，一举消灭了数十名敌人，群情振奋。段焕竞和刘培善商量后决定，利用战士们高涨的热情，再唱它一出好戏。

段焕竞抓起桌上的电话，拨通了英村区公所：“喂，这里是油田啊，二区长明天要视察陂头地区的工作，将路过你们那儿，届时你们要整队欢迎。”

电话那头传来“嗯嗯”的答应声。

天亮了，一大队的三个连押着俘虏在后，另一个连换上刚缴获的白军军装，由连长刘别生率领，大摇大摆地开向英村。

数十名列队欢迎的敌军，还没来得及鸣号迎接，就糊里糊涂地被红军缴了械。两批俘虏碰到一起，惊奇得互相瞪大眼睛，莫名其妙。

段焕竞走到俘虏面前，大声宣布：“我们是红军！”

“红军？”俘虏们一时竟不敢相信，“红军不是早就被我们肃清了吗？难道你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这样一打，红军的影响是扩大了，可是，敌人的警惕性也提高了，地主武装和保安团队又开始集中力量，大举向游击队发起进攻，重新施展开封锁、“围剿”，烧、杀、抢、掠的故伎。

游击队重新陷入艰苦的境地。

隆冬季节，白雪皑皑的深山里，找不到石洞，找不到合适的宿处，游击队员们随便找块平坦的地方，将雪扒开，而后再将被积雪压倒的野草扶起来，东西交叉地结成一个网罩，顶上加把雨伞，一座“雪屋”就算建成了。

有些战士干脆在两棵距离不远的大树树丫上密密铺上一排细

树棍子，算是“双树吊铺”。

由于长时间的缺衣少食，战士们一个个面黄饥瘦，“长发垂肩”，胡子老长。

有个战士为此赋诗一首：

盖的云雾天，铺的白雪地。  
吃着野草根，有颗赤诚心。

食盐和粮食是最棘手的问题。当时每人身上存有十来颗盐粒，嘴里实在淡得难受，便用舌头舔两下。几天见不到一粒米，那更是常事。

有一次，整个武功山区被国民党严密封锁了。省委和游击队被困在山里，接连三天粒米未进，只有靠野菜度日，大家已饿得头昏眼花。

谭余保也不例外，他作为湘赣省委和游击队的最高领导者，历来都是身先士卒，从不允许给自己搞一点特殊化。

这天，山下的一个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给游击队送来了一瓷缸大米。谭余保如获至宝，立刻叫炊事员把它煮成稀饭。

稀饭煮好后，炊事员却难了，“僧多粥少”，不知该怎么分配好，只好去请示谭余保。

谭余保指示：凡战斗人员，每人先分一碗。

炊事员给谭余保也端来一碗稀饭，谭余保登时拉下脸来：“怎么搞的，我不是说了，只有一线战斗人员才能喝这稀饭吗？我不是一线战斗人员，这稀饭绝不能喝！”

谭余保历来是个说话算数的人，炊事员知道，再劝下去也是无济于事，只好眼含热泪，默默地端着这碗稀饭走开了。

就是在这么艰苦的战斗生活中，湘赣红军游击队员也从未被压倒过，从未丧失过生活的乐趣。1936年冬天，在谭余保的主持

下，在武功山上还举行了一次简朴，却又别开生面的“山间婚礼”。

段焕竞和李发姑在一年多的并肩战斗中，逐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这一点，谭余保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决心亲自为他们办喜事。

这天，段焕竞来找谭余保汇报工作。谭余保笑呵呵地拉过段焕竞：“焕竞啊，工作的事先不忙说，我看，你的终身大事也该解决了把？”

段焕竞低着头，满脸绯红：“全听谭主席的安排。”

谭余保乐了：“好，我看今天就是好日子，趁着同志们都在，就给你们把事情办了吧。”

说着，谭余保回过头，对二大队队长罗维道说：“快去，把发姑找来！”

一会儿的功夫，发姑来了，看到段焕竞也在，心里顿时明白了什么，踌躇着站在门口，不好意思进来。

“发姑，”谭余保看着她，“进来烤烤火吧。”说着，从身边挪出一个位置来。

“今天，我们游击队里要办一件大喜事。”谭余保说罢，朝段焕竞和李发姑看了一眼。

俩人都低着头看自己的脚尖，满脸通红。

“两年来，游击队里办喜事，算你们头一次，这也说明了斗争形势在逐渐好转。”谭余保抽了一口旱烟，接着说，“敌人形容我们说，‘残匪生活陷入绝境，以致人人自危，军心涣散’，其实，这正说明敌人永远也不会理解我们，他们不懂得，我们共产党人是最善于安排生活的，就是再艰难些，也不能使我们陷入绝境，使我们从心理上丧失正常生活的能力！因为，我们是共产主义战士。”

谭余保叫人填好两张苏维埃时留下的“结婚证书”，递给段焕竞和李发姑，说：“一切还照苏维埃的规矩办理。祝你们成为……”

对模范的革命夫妻，今后好好努力，共同前进！”

在场的人，一个接一个走过来向他俩道贺，一片融融的欢乐之情在小屋里荡漾。

“走吧，到‘洞房’去。”罗维道催促道。

所谓“洞房”，其实不过是一座用杉树皮和竹竿搭在山腰的棚子。“洞房”里生着火，大家嘻笑着拥进去。

谭余保拿出4块光洋，派人到山下去买了几只鸡和一二十斤牛肉、猪肉来，结婚喜宴即刻开席。

这时，忽然从外面匆匆走进一个人，附在谭余保的耳边低声说了些什么，谭余保向李发姑看了一眼，犹豫了一下，说：“是不是可以考虑另外派人去？”

发姑立刻明白了，她轻轻地对坐在身边的段焕竞道：“有任务，我得马上出发。”

说完，她快步走到谭余保面前：“谭主席，还是我去！”

“好吧！”谭余保用眼色征询着段焕竞的意见，然后又转向发姑，“好吧，你去一趟合适。”

段焕竞拿过那条准备当被子用的布单递给发姑，叮嘱道：“发姑，路上小心……”

木棚子外，狂风卷着雪花，发姑披上那块布单，向段焕竞深情地看了一眼，便踏着雪，匆匆地上路了。

他们当时并未想到，这一别，整整半年，别时大雪纷飞，见时，已是酷暑季节。

多少年后，当他们已是两鬓斑白，再次忆起当年的“新婚之夜”，心中还不免感慨万千！

就是这样靠着游击队员们百折不挠的精神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湘赣游击队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打垮了敌人千百次地进攻，游击区域扩大了，枪支弹药增多了，游击队也壮大起来了。

到1936年底，整个武功山区已成为红军游击队自由往来的地区，游击战场逐渐向山下深入扩大。这年的12月12日，湘赣红军游击队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扩大影响，在武功山下的三江村将部队再次改编，恢复湘赣独立团的番号，由段焕竞任团长，刘培善任政委，黄炳光任特派员，原来的大队称连，省委也从深山里迁了出来，迁至三江附近的罗家屋。

1936年这个严寒的冬天终于过去了，当春天再次来到武功山的时候，坚持在各地的游击队，又活跃起来了。

1937年3月9日，安福县洲湖镇地下党的同志匆匆地来到独立团三连连部报告说：“国民党安福县县长朱孟珍到洲湖镇布置‘围剿’，你们能不能乘机打他一家伙，给老百姓解解恨？”

来入接着说：“洲湖镇的保安团和政府官员，除了敲诈勒索，抓人杀人，就是打牌酗酒。有时，晚上连岗哨也不放，现在正是打他们的好时机啊！”

洲湖是安福的一个大镇，国民党县政府就设在那里，驻有保安团的一个中队。

湘赣独立团团团长段焕竞立即决定，从二、三、四连里选调100名精壮队员，采取长途奔袭的办法消灭洲湖的反动武装，打烂国民党的县政府。

这天黄昏，云雾迷蒙，相隔一丈就看不清人影。段焕竞和刘培善估计，洲湖守军绝对不会想到红军会在这样的天气来搞突袭，肯定疏于戒备，部队应立即行动。

大雨如注而下，雷电交加，100多个游击健儿，借着闪电的光亮，飞奔洲湖镇。

80多里的急行军，只用6个钟头就结束了。

在雷雨声中，只见几个黑影窜到了上坪跟前，接着又是几个黑影跳进围墙。不一会儿，亮光一闪，木栅门打开了，部队悄悄地进入土围子，国民党的哨兵还在岗亭里打盹，就一个不剩地做



了俘虏。

部队进镇之后，刘培善立即带着二、四连的人按照原定计划包围了驻在岗楼里的保安中队，段焕竞带着三连冲进县政府。

顷刻间洲湖镇就像一锅开水似地沸腾起来，到处是枪声、小号声，镇上的群众知道红军来了，也都打着火把呐喊助威。

战斗很快结束了，国民党保安中队全数被歼，在俘虏群中，人们找到了那个罪大恶极的县长朱孟珍和保安中队代队长欧阳根，在群众的要求下，这两个杀人魔王被就地枪决。

没收的粮食、被服、家具，全部分给了当地的群众，齐集在县政府里的群众，高举火把齐声欢呼：“红军万岁！”

洲湖一仗，使红军游击队声威大震，群众奔走相告：“红军又回来了！”国民党安福县政府立即向省政府拍去急电，声称：“千余共匪，进攻安福，县长殉难”，国民党江西省政府都为之震惊！

此后，湘赣临时省委和红军游击队一直活跃在萍乡、宜春、安福一带，有效地保存和壮大了自己，有力地分化和瓦解、打击了敌人，掌握着斗争的主动权。

到1937年7月，由于游击队司令员曾开福叛变，省委和部队的主要力量迁往铁镜山和九陇山一带。

### 险些杀了陈毅

卢沟桥战场的隆隆炮声，震撼着中华大地。上海战场的抗日浪潮，席卷了亿万神州，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成为大势所趋。八路军、新四军相继建立，奔赴抗日前线。到了这个时候，已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三年之久的湘赣游击根据地，对全国形势的发展仍然一无所知。

今年秋天，临时省委感觉国民党的“围剿”势头似乎开始减弱了，气氛变得颇为异常，便特意派人前往吉安侦察。侦察人员带回了几张传单，其中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国共合作宣

言》等宣传品。

但有谁能相信这是真的呢？三年来，游击队已经吃够了国民党的苦头，多少红军游击队员死在他们的枪炮之下？多少革命群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现在要国共合作，可能吗？临时省委得出的结论是：警惕再警惕，千万不能受敌人的欺骗。

11月中旬的一天，守卫在独立团驻地九陇山山口的一个战士，突然向连部发出了发生紧急情况的信号。

接着，一乘四人抬着的轿子朝着山口走来，轿子前后左右还跟着轮替抬轿的轿夫和国民党卫兵。山口哨位上的战士们严阵以待，警惕地注视着来人。

“站住！”游击队员厉声地命令着。

轿子在哨位旁边停住了，从轿里从容走出一位英姿焕发、气宇轩昂的人来，他头戴一顶博士帽，身穿一套中山装，脚蹬一双黑皮鞋，鼻梁上还架着一副黑色太阳镜，看上去仪表端庄，举止不凡。

游击队员看到这位不寻常的来客，拉动枪栓，大声喝问：“你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来？干什么的？”

“从吉安来。”他用清晰的四川口音平静地回答。

“到哪里去？”游击队员们又是一声喝问。

来人摘下墨镜，把游击队员们打量了一番，微笑着说：“找谭余保同志。”随即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哨兵，名片上印着“陈毅”两个字，旁边一行小字是：“四川乐至”。

接着，陈毅对游击队员说：“请带我们到谭余保同志那里去好吗？”

当时，国共合作已经实现，一些游击根据地已根据形势的转变，自觉地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实现了合作。像湘赣游击根据地这种至今还与国民党当局处于对抗状态的情况已经不多了，为此，党中央特派陈毅作为全权代表，到湘赣游击区联络商讨出

山抗日事宜。

陈毅为了安全上山，特意作这身打扮，并由国民党卫兵出面护送，沿途可以省却许多麻烦。

陈毅交付了轿夫的工钱，打发轿夫和国民党卫兵回去，然后随游击队员们上了山。

到了山上，段焕竞和刘培善接待了他。

一封由项英签名的介绍信，摆在松树做成的桌上。信上写着：特派陈毅同志来你们这里联络国共合作事宜。

段焕竞和刘培善看过介绍信后，半信半疑，而项英的签名又是事实，他俩顿时没了主意。“要提高警惕”这几个字，又不时在他们脑际闪过。

就在两个月前，有一个自称是湘赣边区党委派来的联络员到了山上。这家伙走后不久，就开来了大批国民党军队，向游击队进攻。现在陈毅以这副装束突然来到，他们不能不产生怀疑和特别警惕。说不定国民党军队马上又会尾随而至！因此，部队当晚即加强了戒备，并把陈毅转移到另外一个山头上。

陈毅开始向他们讲解当时的国内形势，逐条地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说：“现在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族矛盾已超过了阶级矛盾。党中央指示我们，要国共合作，一致对外，集中力量打日本鬼子，坚持南方八省的游击队，要有计划，有步骤地下山去。”

说得是有道理，但是蒋介石也是这样想的吗？他可是连做梦都在想着要消灭红军的啊！特别是在眼前，山下就屯驻着国民党的军队，怎能轻易下山呢？

“你有证据吗？”刘培善试探着问。

“没有。”

“为什么只你一个人来？”

“多带人太危险。”陈毅顿了顿，又说：“你们现在的任务只有

两个，一是停止打仗，二是整训改编军队。你们要相信我。”

可是，前不久湘赣省委的来信中还明确指示：没有省委的指示，切不可接受改编。

这样，更没有人敢相信陈毅是代表党中央来的。相反，在他身上，叛徒的疑点倒越来越多。

大家坚持要陈毅交待叛党的经过。因为不久前报纸上曾刊登过：“江西共产党首领陈毅投诚”的消息。他们还要陈毅把这次“勾结”敌人进攻湘赣边的经过讲出来，以便得到宽大处理。

陈毅反问道：“反动派的报纸你们也相信吗？！”

段焕竞和刘培善于是连夜召开会议，讨论陈毅提出的整训和改编问题。两人商讨了半天，还是不敢妄下断语，但又知此事关系甚大，遂决定将陈毅送到省委，由谭余保亲自处理。

第二天，陈毅即被秘密送到铁镜山临时省委住的棚子里。不久，即有几个游击队员过来，不由分说地把他给捆了起来，吊在棚子的这一边，而竹棚子的那一边，省委正在研究怎样处理他。

彼此只隔一道竹墙，说话的声音一清二楚，那边，省委讨论了很久，最后决定：“杀！”陈毅在竹棚子这边听到，大喊：“不能杀！杀掉我，你们要犯大错误！”

第二天，棚子四周坐满了人，就像要公审犯人一样。

谭余保从棚子一边走出来，在场的均对他肃然起敬。

陈毅见这人身佩驳壳枪，头戴红军帽，手里拿着根竹根做的长烟管，便开口问道：“你就是谭余保同志吗？”

“谁是你的同志？我知道你早叛变了！”谭余保答。

“我是代表党来的。”

“你代表哪个党？代表国民党？”

“我是陈毅。”

“我早晓得你的名字。嘿，你在井冈山那个时候，集合队伍讲话，我拖个梭标来听你讲，从猴子讲到人，从天上讲到地下，从

井冈山讲到全世界，一讲几个钟头，讲得头头是道。你过去讲的话，你自己还记得吗？”

“我讲什么啊？”

“讲革命，就是要革命，不要投机嘛！可你现在怎么样？你要不供出怎么投降蒋介石的，就要杀头！”

“你抗不抗日？”陈毅反问道。

“我抗日，马上可以抗日。”谭余保答道。

“你愿意抗日就好办！”陈毅感到高兴的是，他和谭余保之间开始有了共同语言——“抗日”。

谭余保接着说：“不过，要我抗日，得有个条件：恢复井冈山八县的根据地。”

陈毅笑着说：“你们见识之浅也！同志哥啊，你就只看到那八个县。今天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我们在抗日战争中要争取领导权，将来抗日战争胜利了，全中国就是我们的，不只井冈山那八个县。”

“这个还讲得有道理。但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这个口号很奇怪。只有阶级斗争，哪有阶级合作？只有‘苏维埃救中国’，怎么可以取消苏维埃？”谭余保进一步提出他的疑问。

“过去提的‘苏维埃救中国’的口号是对的。现在民族矛盾上升了，国内的矛盾下降了，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高于一切。因此，我们运用‘抗日救中国’这个口号来代替‘苏维埃救中国’的口号。我们要实现国共合作，争取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陈毅作了明确的解释。

“我们历来讲阶级斗争，你却讲阶级合作。你就是第二国际，就是叛徒。我们历来讲‘苏维埃救中国’，你却要取消苏维埃，这就是要灭亡中国。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你却要把军队拉出给蒋介石。”谭余保忍不住抽出烟管，敲打着陈毅的脑壳：“你就是个叛徒。”

“改编红军，取得给养，红军将会有更大的发展，这对于我们更有利。革命的阶段不同了，就要有新的策略来适应新的形势。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陈毅忍痛坚持阐明党的主张。

“你们知识分子就是道理多。可敌人一来你们就带起队伍跑了，逃跑就是机会主义。平常你东一指示，西一指示，可连续三年，却连一条指示也没有！”谭余保生气了。

陈毅声明，红军主力北上抗日以后，他先是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后转移到赣粤边打游击，并没有逃跑。并说：“我讲的这些政策，是党中央的决定，不是个人的意见，你可以派人下山看一看。你有意见，可以向中央讲。现在，叶剑英同志在武汉，项英同志在南昌，……”

“项英、叶剑英，我不管，你就是斯大林、毛泽东派来的，我也要把你抓起来。”谭余保情绪相当激动，一时竟说漏了嘴。

陈毅抓住这个机会，以高屋建瓴之势，侃侃而谈：“你们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游击战争，我非常佩服。骂我是叛徒，我也不见怪，你们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很难突然接受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也是不难理解的。但是，我讲项英、叶剑英派来的，你不管；毛泽东、斯大林派来的，你也要抓起来。谭余保同志，你已经离开党的原则立场了！”

接着，陈毅而向大家，郑重地说：“你们大家坚持游击战争是应该的，当土匪就不能干！谭余保，你是共产党员，就不能枪毙我！你是土匪，就枪毙我，枪毙吧！”

“好家伙，你这个叛徒还满嘴硬呢！”谭余保说罢哈哈大笑，接着又命令马上把陈毅押走：“不许叛徒在这里宣传机会主义理论。”

接下来的两天，陈毅一直被绑在山上的小竹棚里，谭余保每天必来一次，要陈毅老实交待叛变经过。

第三天晚上，谭余保又来了，小声对陈毅说：“坦白交待，我给你保密，决不公开，并且绝对保持你的地位，怎么样？”

陈毅平静地说：“我在这里已经五天了，给你讲道理也没用，只好教训你。你坚持游击我赞成你，很光荣。你是个农民，搞成这么个队伍，很不错，对抗日很有用。但你考虑的没有道理，你可以派人到吉安、南昌、延安去查一查，我这次来究竟是为共产党工作，还是为国民党工作？你是这里的主要负责同志，你就必须对湘赣边区的革命负责，对边区人民和边区游击队的前途负责。不过像你这样搞下去就会妨碍抗日救国的大事，你对不起党，也辜负了湘赣边区广大人民群众和游击队对你的信任。你要对历史负责！”

谭余保有点动心了。为了不露声色，他马上结束了这场“舌战”。当即派专人去吉安调查陈毅的来历。

谭余保思来想去，总觉得陈毅性情豪爽，一身正气，胆识过人，这决不是任何叛徒可以伪装得了的。然而，他同样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水火不相容的国共两党又合作了呢？”

谭余保考虑了两天两夜。这时，派到吉安去的交通员回来报告说：吉安确实有个“新四军办事处”，办事处的工作同志明确表示，陈毅是代表党上山联系的。交通员还背来了半麻袋的《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为了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等文件。

听了交通员的汇报，看了党中央的文件，谭余保激动得热泪盈眶，连声说：“我鲁莽，险些误了大事。”他亲自给陈毅松绑，抱歉地说：“你来这里几天几夜了，真对不起。”随后，他拉着陈毅的手，热泪纵横：“今天终于见到亲人了！自从任弼时、王震、肖克同志率领红六军团主力离开湘赣边出发长征以后，彭辉明同志牺牲了，陈洪时叛变了，我们留在这里，很难支持这个局面，请你不要见怪。”

陈毅坦然地说：“你是个坚决的老革命，是个好同志！我脾气不好，请你不要见怪。今天的问题是，我们要赶快下山。”

谭余保接着向陈毅讲起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战斗经历；讲他们怎么起义，怎么上山，怎么隐蔽，怎么发展，从晚上一直讲到天亮。

第二天，湘赣临时省委开会，请陈毅作指示。陈毅说：“你们下山后抓住时机，招兵买马，扩大队伍。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要是抗日爱国的就欢迎。”

不久，湘赣边区的游击健儿，告别了掩埋战友的坟墓，走出了掩护他们坚持斗争的武功山、九陇山、五里山、中心山、柑子山、杨梅山等深山密林，奔向指定的集中点——莲花县的垄上村集合，然后开至神泉进行整编。

部队在神泉休整两个多月后，除留下部分指战员外，其余 300 多人被改编为新四军一支队二团队一大队，在大队长段焕竞、政委刘培善率领下，于 1938 年 2 月奉命开赴抗日前线。

1937 年 12 月，湘赣临时省委改为湘赣特委，谭余保任书记，继续留在湘赣边区坚持斗争。

## 二 血染的红杜鹃

### 罄竹难书滔天罪

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交界地带，群山连绵，峰峦险峻，河流交错，森林茂密。每到春天，漫山遍野都会开遍红艳艳的杜鹃花，当地老百姓把它叫“映山红”。杜鹃怒放季节，远远望去，一团团、一簇簇，殷红如血，人们说：“是烈士的鲜血染红了这满山的红杜鹃。”

早在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不久，湘鄂赣边区的人民就在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的领导下，以破竹之势，连续掀起秋收暴动、平江起义、土地革命，建立起了巩固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



根据地包括湖南省的平江、浏阳、醴陵、长沙、湘阳、岳阳、临湘；湖北省的通城、崇阳、通山、阳新、大冶、蒲圻、咸宁、嘉鱼、鄂城；江西省的铜鼓、修水、万载、宜春、萍乡、宜丰、武宁、靖安、德安、奉新、高安、上高、永修、瑞昌等县。全境横宽300余里，纵长千里，位于武汉、长沙、南昌三个省会之间，北临长江，东有南浔路，西有粤汉铁路，南有株萍铁路，是中央苏区的一个重要战略地区。

湘鄂赣苏区建立以后，不断发展壮大，连续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四次“围剿”。但与全国其他的革命根据地一样，第五次反“围剿”不幸失利。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主力被迫长征。随后，湘赣、湘鄂西、鄂豫皖等苏区的主力红军也都陆续北上。这样，湘鄂赣苏区和一直战斗在这里的红十六师不但与中央主力红军失去了联系，与友邻苏区在战略上的配合与策应也大大削弱了，湘鄂赣苏区正式进入游击战争时期。

国民党的企图是趁主力红军撤走之际，集中大量兵力，分割包围各苏区，一举将红军所谓“残余”部队消灭干净。

湘鄂赣苏区已被分割成了若干块游击区，国民党进攻湘鄂赣的兵力，除何键、熊式辉、陈继承、朱耀华、陈光中、岳森等部正规部队，还有湖南、湖北、江西的保安团，总兵力数十倍于红军，其对付苏区人民和红军的手段阴险毒辣之极，令人发指。

（一）采取碉堡政策，层层封锁，重重包围，步步为营，分割苏区。

凡属战略要地，交通要道，高山隘口，乃至城镇和重要村庄，都筑有碉堡，建立据点，分兵把口；在苏区的内地，只要还有群众住的地方，都派兵布阵，安下钉子，对游击区半游击区的中心点更是以碉堡群重重包围。

敌人企图以碉堡政策来切断红军与群众的联系，镇压苏区人民的反抗，堵截红军的行动。

他们以碉堡为依托，大规模地向苏区进攻，每年数十次，每次七八天或十几天不等。主要目标是消灭红军主力部队、领导机关和破坏根据地的设施。

### （二）推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国民党的口号是：“宁可错杀三千，不要漏掉一个。”在一个时期内，反动派杀红了眼睛，进入苏区后，不管男女老幼，逢人便杀。杀人的手段也极为残酷，骇人听闻。

有的婴儿被抓住两条小腿，活活撕为两半；有的群众被敌人用棉絮捆绑，浇上煤油，活活烧死；有的红军战士被活活剁为肉浆；有的被剖腹，挖出心肝，当作下酒菜；有的被敌人用烧红的铁盆戴在头上烧死；有的妇女，被国民党士兵集体强奸之后，割了两乳，凌辱至死；更多的是被活埋、被吊死、被熏死、被打死……

浏阳县双洞乡大光洞花塘，一次活埋 99 人；茨火洞一次活埋 88 人；住有 12 万人口的平江县连云山一带，被杀得尸横遍野，断绝人烟；

在临湘岳姑大山一带，国民党过去杀人以人头来计数，以人头来示众，以人头去报功，后来杀人如麻，就以耳朵计数，以耳朵示众，以耳朵报功，有一次，仅仅割下的耳朵，就有两箩筐！

国民党军见粮食就抢，见牛就拉，见猪就杀，见鸡就抓，见衣服就拿，见锅就打烂，见灶就拆毁，甚至把未成熟的稻子也割倒。

在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摧毁之下，苏区许多村庄片瓦无存，鸡犬不留，田野荒芜，野猪豺狼成群结队，出没无常，每至晚间，狼嚎虎啸，此起彼伏，闻者无不毛骨悚然！

### （三）强迫移民，推行保甲制度和联防连坐。

国民党对苏区的群众，通通强迫迁移，有的移到他们的碉堡附近，有的移到县城，有的移到市镇或公路旁边，通过保甲制度和联防连坐，严加控管，稍有反抗，即行镇压，以此来割断人民

群众与红军游击队的联系。

国民党还有更绝的一招，那就是，利用叛徒，进行“招抚”。

湘鄂赣的敌人，利用大叛徒，原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孔荷宠，纠集了大小叛徒和走狗 2 000 多人，分驻在修水、铜鼓、平江的苏区和游击区周围，设立“招抚”机关，散布各种谣言，张贴各种威胁、利诱的布告，红军队伍中一些不坚定分子就此投降叛变者，屡屡有之。

这些叛徒对红军的危害绝不亚于国民党军队的正面进攻。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苏区和红军的干部、组织、装备、工厂、机关、医院等情况，知道群众中什么人参加红军了，什么人掩护伤员了，什么人给红军送信、带路等等，在国民党“围剿”、“清剿”红军的作战中，作了极其可耻的帮凶。

国民党对湘鄂赣人民所欠下的累累血债，真是罄竹难书！

### 敌人带来的绳子全部用来捆了自己

1934 年夏天，在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中，湘鄂赣苏区进入了艰苦的阶段。

蒋介石亲自下达手令，限三个月内消灭湘鄂赣苏区。

一时之间，汤恩伯部主力第十五师王东原部、第十九师李觉部、第六十二师陶广部、第五十师岳森部、第七十七师罗霖部、第二十六师郭汝栋部，在湘鄂赣苏区建起了四道严密封锁线，对红十六师和湘鄂赣省委机关实行“最后”的“清剿”。

在敌人的强大攻势下，苏区大部分地区被占领。红十六师损失惨重，仅剩 200 余人，临时编为一个营，革命受到严重摧残，这一事件当时称为湘鄂赣省“六七月事变”。

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望着激战后的战场，湘鄂赣省委书记陈寿昌心如刀绞，这是自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创建以来，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昔日一同创

业的战友，今已大半长眠地下，幸存的 200 人，有的只凭着一股子蛮劲，要冲出去为死难战友报仇，有些竟灰心丧气，闹着要回家种田！

作为省委主要领导的陈寿昌，此刻心里比谁都明白，这种精神状态若再持续下去，只要敌军来一次小小的冲锋，这 200 来人就会所存无几，“湘鄂赣苏区”的名字，也就会永远地从历史上消失了……

几百万苏区人民和红军战士辛苦创建起来的老根据地，陈寿昌无论如何也不愿让它就此毁于一旦。200 人，少是少了点，可是，只要还有人在，就意味着希望还在！

陈寿昌快步回到平江黄金洞何家垅省委机关驻地，宣布：立即召开省委紧急会议！

会上，确定了湘鄂赣苏区党在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恢复与壮大红军，避免与敌正面交锋，以平江、浏阳、铜鼓为中心根据地，抽调干部到各地去收集武装，开展扩红运动。

会后，省委副书记傅秋涛被调往鄂东南重建红十六师四十六团，鄂东南道书记黄加高被调到鄂东南河北地区恢复红十六师四十八团。

几个月间，扩红运动大见成效，红十六师迅速地恢复到 1500 多人。

这期间，省委书记陈寿昌在激战中壮烈牺牲，给红十六师造成重大损失。此后，由傅秋涛代理省委书记和军区政委。

扩红运动中，苏区盛传着“半条床单”送子参军的故事：

平江县黄金洞有个老大娘叫易冰凤，她把自己唯一的儿子送去参加红军，临走的时候，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老大娘只好把仅有的一条床单交给儿子，儿子坚决不要。最后，母子各分一半，儿子带着半条床单参加了红军。

队伍壮大了，士气重新振作起来，前方也开始传来捷报。

高视，是鄂东南山区的一个乡镇，它地处修水、武宁、崇阳、通山四县的交通要冲，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省委决定，全力攻下高视，将修、武、崇、通苏区连成一片。完成这个任务，当然非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六师师长徐彦刚莫属。

徐彦刚，原在中央红军工作，是前四次反“围剿”中的常胜将军。他中等身材，体魄健壮，皮肤黝黑，显得非常威武。

徐彦刚的皮带上总是挂着一支德国兵工厂最新出品的大型手枪——因为形状有点像木匠用的曲尺，他的部下就戏称它为“曲尺”。

这样的手枪，在当年，是被视为珍宝的，因为它的射程比较远，打的准，打起仗来管用。徐彦刚的这支“曲尺”与众不同的是上面刻有“李明”两字。这位蒋介石的嫡系师长，在第四次“围剿”中，连人带枪一起被徐彦刚缴获了，手枪也就自然地易主了。出发前，徐彦刚在全师干部大会上做了报告：“我们红十六师重振旗鼓，还没有试露锋芒。高视这一仗，必须打胜！只有第一仗打胜了，第二、第三仗才能跟着取胜！”

徐彦刚讲到这里，略微提高了嗓门：“同志们，当前的处境，是敌强我弱，而且悬殊是很大的，这就要我们时刻警惕，决不可轻敌，更不能打无把握之仗，要打就必须稳操胜券！”

队伍向高视出发了。

在镇前的大路边，敌人依山险筑有一个大型碉堡，驻有一个保安中队，以红军大部队对付这么点儿人，拔掉这个碉堡，当然不成问题。

可是徐彦刚并不这样做，他将红军的主力部队埋伏在高视通往崇阳古岭方面的大路边，利用两侧的天然山川工事，布置了一个“口袋形”阵地。同时命令侦察连换上敌军的服装，设法接近高视镇前面的碉堡。侦察员们都以为这又是智取碉堡的老战术。可是，又错了。

徐彦刚说：“你们把碉堡围住后，严密地监视起来，不要硬攻。”说到这里，他做了个钓鱼的手势：“这样，才能用碉堡这块‘饵’，引出古岭的‘鱼’！”

古岭驻有国民党的正规部队，是离高视最近的一个据点。

侦察连接受了这个新奇的任务，穿上国民党军服，大摇大摆地朝高视镇走去。

敌人也像是徐彦刚指挥的，一切都按他预定的计划在行动：碉堡被围住，守敌不敢顽抗，但也不投降，只是拒守以待援军。

数小时后，古岭的那个加强连，接到命令，果真前来增援了。增援军急匆匆地出动，像只瞎眼苍蝇，一头跌进红军的预设阵地。

从捉到的俘虏口中，查到这个加强连乃是东北军一〇五师所属。

徐彦刚跑遍前沿各个阵地，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敌人的动态，见他们行动迟缓，用枪作手杖，互相搀扶着上山，明显地是不习惯山地作战。

徐彦刚沉思了一会儿，果断地下令：“停止射击，部队严密监视敌人，请所有的政治工作人员，立即到这里集中！”

徐彦刚指着对面的山头，说道：“被围的敌人确实是一〇五师，杂牌部队。自从东北沦亡，一〇五师就被千里迢迢南调到反共前线。蒋介石妄想使红军和杂牌军两败俱伤，这些情况，东北军官兵当然清楚。我们现在就设法加深敌人之间的矛盾。”

这时，红军阵地的枪声已经停息，对方大约是感到难以理解，他们的枪声也开始稀疏，等待动静。

战地政治工作会议很快结束，敌工人员分散到各个前沿工事里，用话筒喊起来：

“东北军兄弟们！真正的中国人不应该自相残杀。我们红军的子弹要留着打日本强盗，所以不向你们开枪了。”

敌人的枪声也跟着停止，周围显得分外寂静。

山谷里悠悠回荡着敌工人员越说越激昂的声音：“蒋介石丧权辱国，出卖东北三省，又把你们调到反共前线，借内战来消灭你们。现在日本强盗又一步步逼进关来，妄图把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全变成亡国奴，东北军兄弟们，有良心的中国人，在这国难当头之际，怎么能够自己人打自己人？”

敌工人员讲到这里。话头一转，集中到关键问题上来了：“弟兄们，东北是中国的！日本强盗占领后，现在正在那里掠夺你们的财富，屠杀你们的爹娘，奸淫你们的姐妹，想起这些事情，谁能吃得下饭，睡得着觉？”

讲了一阵，又唱起那支悲壮的“流亡三部曲——松花江上”。

当山风把“爹娘啊、爹娘啊！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的歌声吹到对面时，山头上隐隐传来了压抑着的哭泣声。

徐彦刚感到时机成熟，命令敌工人员立即展开正面攻势。

敌工人员喊道：“东北军弟兄，下山来吧！我们携起手来，枪口一致对准卖国贼和日本强盗，打回老家去！收复东三省！”

接着，红十六师的战友们又像大合唱似地齐声高呼：“红军欢迎东北军弟兄！欢迎东北军兄弟和我们一致抗日！打回老家去！”

为了消除对方的顾虑，徐彦刚首先派出红军代表到对方那里去谈判，谈判非常顺利，不到半个小时即告结束。

一〇五师的这个加强旅全部投诚，红十六师杀猪备酒，盛情款待。除了自愿留下当红军的，其余的一律由他们的连长带回原部，这些人，以后都成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

高视镇前碉堡里的守敌，得到这个消息，也在当天黄昏前，缴枪投降。

第二天天刚亮，寿昌县苏维埃送来一个紧急情报：修水方向来了一股敌人，已查明是国民党五十师三〇〇团，兵力有4个营，约2000多人马。

国民党五十师师长岳森，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三〇〇团团团长是岳森的妹夫，可称做嫡系的嫡系，部队每月发双饷，装备就更不消说了，这个三〇〇团向来狂妄之极。

红十六师立即出发迎击。徐彦刚对部队做了极简要的动员。他脸色铁青，满腮短须根根直竖：“对什么样的敌人，打什么样的仗，对待三〇〇团，只有彻底歼灭，讨还血债！”

红十六师四十六团一个营，由营长袁立生率领，从侧翼的一条山路先行。大队则沿着大路，向大源桥急进。

临走时，徐彦刚特别向袁立生嘱咐：“我们的武器，远不及这股敌人，你们先头部队可能和敌人突然遭遇，所以你营应以战备姿势搜索前进，发现情况，先发制敌，让敌人的火器发挥不了作用，让我们的马刀，大显一下威风！”

事情又如徐彦刚所料，敌我双方的先头部队，在大源桥左侧的山路上遭遇了。

红军早有思想准备，全营数百把马刀“哗”地出了鞘，反射着阳光，有如数百道闪电，往敌人的脑袋上直砍下去。

国民党军对白刃战一向畏惧，现在又遭这么突然的冲击，马上乱了阵脚。

红军越战越猛，敌人开始往山下溃窜，双方主力部队在山下接上火。袁立生带着部队追到山下，正好堵住敌人主力部队的后路，敌人前后受击，更加慌乱，右翼的敌军首先被消灭，红军抢占了敌人的一个制高点，发现那里原来竟是敌人的重机枪阵地！

残敌龟缩在最后一座小山包上顽抗，因为地势陡峭，红军三次冲锋均未得手。

徐彦刚调整策略，亲自布置，将刚缴获的轻重机枪全数集中起来，架在制高点上。

一声令下，小山包上断枝横飞，碎石乱舞。顽抗的敌人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东逃西窜。



机枪声一住，军号紧接着如狂风怒吼。徐彦刚高举他的“曲尺”，呼喊：“冲啊！同志们，报仇的时间到了，不要放走一个敌人！”国民党三〇〇团，终于全部被歼，无一漏网。

高枧初战，以红十六师大获全胜告终。随后，红十六师转到平江黄金洞，进行了短期休整。

这个时候，四十六团、四十八团得到补充，四十七团得到恢复，部队武器装备大为改善，军威大振，士气高昂。

1935年4月间，红十六师乘势继续向鄂东南行动，为此决定在平江的虹桥打一仗。

虹桥是个山区小平原，以前是苏区，敌人占领后，作为“进剿”的前哨据点，变成了游击区。

虹桥镇后面有个小高地，约有300米长，200米高，敌人构有防御工事；前面是一大片开阔地，道路交错，田野纵横，中间有一条小河，可以徒涉。2000米外是丘陵地带，通向长寿街。

离虹桥不远的长寿街，驻扎了国民党第十九师陈铁侠旅的两个团。十九师师长李觉，是赣西“剿匪”总司令何键的女婿，陈铁侠又是李觉最得力的干将，被吹嘘为“常胜军”。这次奉命追击红军，他们每个人都带有一根绳子，说是要来绑活的，他们早已在长官面前夸下海口：“这次要活捉十六师的人。”

红十六师在师长徐彦刚的指挥下，从平江黄金洞出发，当天到达长寿街附近，很快便把长寿街、木瓜至虹桥两地的交通切断了，电话线也割断了。

徐彦刚决定，以声东击西战术给敌人以措手不及的一击。他先派部队包围木瓜之敌，但并不真正攻击，而暗中派人到虹桥侦察敌人动向。

木瓜的头目余虹是当地人，他躲在碉堡里，既不出来应战，也不投降，只命机枪手拼命地向红军射击。

木瓜并不是红十六师的主要作战目标，与余虹这样久耗，势

将影响红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徐彦刚当机立断：“我们也来试试敌人常用的招数。”不一会儿，派出去的人抓来了余虹的母亲和弟弟。

徐彦刚将他俩带到木瓜城下，让他们对着碉堡喊话，劝余虹趁早投降，但毫无作用。

时间已不容再拖延，徐彦刚命人将大堆柴草搬运到碉堡脚下，举起火把，作势欲点。余虹这一下可慌了手脚，带着一个中队乖乖地缴械投降了。

这时，红十六师主力已把虹桥之敌包围两天了。

虹桥的守军也像木瓜守军一样，只是缩在碉堡里，等待长寿街的援军到来。

从木瓜赶来的徐彦刚把余虹带到虹桥碉堡下，命他喊话：“长寿街已被红军包围，优待俘虏，缴枪不杀！”一连喊了三遍，碉堡中毫无动静。

徐彦刚分析，他们仍在等待援兵。又过了一会儿，碉堡中传出话来：“后天上午10点过后再缴械投降。”

“好吧，就等后天上午10点，让他们输得心服口服。”徐彦刚命部队就地宿营，后天10点之前不再发起攻势。

三天很快过去了，长寿街的援军一个没到，虹桥守敌眼看希望断绝，只有缴枪投降了。

红十六师带着俘虏来到后山上，登高远眺，只见长寿街的援军正向虹桥开来。据侦察员报告，来敌乃是第十九师李觉部的两个团。

徐彦刚观察完地形，迅速召开连以上干部会。接着又以支部为单位开了党、团员会，以连为单位开了士兵会，讨论作战方案。

他将红十六师四十八团及师部重机枪连，布置于虹桥后山小高地，利用国民党构筑的防御工事，作为正面迎击。师部和四十六团、四十七团及特务营，隐蔽在虹桥后山的森林中，待机歼敌。

骄横的敌人自恃装备精良，来势凶猛。一个团从对面丘陵地带直冲出墩，另一个团留在山坡上，利用碉堡向红军射击，作为掩护。进犯的敌人过了河，与留在山上的敌人，距离越来越远。

徐彦刚心中暗喜，他对大家说：“消灭敌人的时机到了，等他们冲到山下，再打它个落花流水！”

徐彦刚一声令下，手榴弹、机关枪齐响，顿时弹如雨下。冲到前面的敌军被打得七零八落，大部被歼。

红十六师各部乘势冲下山去，穿田墩、过小河，杀声震天，直指对面山上的敌人。敌人溃不成军，红军乘胜猛追，深夜10点多钟才返回长寿街附近宿营。

这一仗，红十六师打死打伤敌军五六百人，俘虏100多人，缴枪400多支，各种军用物资也缴获颇丰。

战斗结束后，红军打扫战场，处理战俘，发现这些俘虏每人身上都带着绳子，于是故意问他们：“打仗又不是上山砍柴，你们每人带根绳子做什么用啊？”

俘虏苦着脸回答说：“我们的长官说，捉到你们怕跑掉，就用绳子捆起来。”

战士们相视一笑，又问道：“那现在做什么用呢？”

俘虏们尴尬地说：“那就只有捆我们自己了……”

“敌人带来的绳子，全部用来捆了自己”，一时之间在苏区传为佳话。

1934年下半年至1935年上半年这段时期，正是国民党集中兵力大举“围剿”中央苏区和追击主力红军的时候，分布在湘鄂赣苏区一带的力量相当薄弱，红十六师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采取积极行动的方针，有力打击了敌人，保存了自己，全师发展到5000余人，游击队也有很大发展，苏区也得到恢复，部队士气大振，人民欢欣鼓舞，这是三年中的全盛时期。

### 怎么忘了“骄兵必败”的古训

高视、虹桥的惨败令蒋介石大为恼火，一纸“限期剿灭湘鄂赣共匪”的紧急命令，落在赣西“剿匪”总司令何键的办公桌上。

时在1935年的五六月间，中央苏区主力红军早已西去，原先“围剿”中央苏区的汤恩伯、樊松甫部主力此是倒显得有些过于清闲了。蒋介石一声令下，该两部立刻被调到了湘鄂赣苏区。

对国民党来说，此时正是一举“消灭”湘鄂赣苏区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红十六师的三个团及省委机关全部集中在南江桥、钟坪一带休整，红军多少有些连胜之后的骄傲轻敌的迹象。

何键一拍桌子：“此时再不动手，更待何时？”

于是，原先分驻在湖南长沙、平江、浏阳，江西万载、铜鼓、修水，湖北通城、崇阳等地的国民党军都同时接到了“立刻向南江桥、钟坪集中包围”的命令。

几月之内，红十六师的南江桥、钟坪驻地周围，一个严密的大包围圈就形成了。包围圈周围的封锁线是一层一层，大小数十道，新建的碉堡不计其数，山被挖得稀烂，树被砍得精光，大小道路都设置了防御工事和障碍物，真是把地形都改变了。

国民党包围湘鄂赣苏区的总兵力数十倍于红十六师，立志一举全歼红十六师。最为可悲的是，敌人的大包围圈都快要形成了，圈中的红十六师尚且丝毫不觉，每日里仍像往常一样，只进行些战术演习和整训部队的活动。

“那个部队挑炮弹、挑子弹的很多，都是担子队伍，真是打不得。”黄金洞、浏阳的老百姓看到荷枪实弹的国民党部队都在议论纷纷。红十六师开始感觉情况不对了，侦察兵的报告令全师大为震惊。

在强敌的严密包围之下，是突围保存有生力量，还是死守拼光呢？战争无情地向湘鄂赣省委和红十六师提出了这样生死存亡

的严重问题。其实，谁心里都明白，只有突围，才是唯一的生路。

省委机关迅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突围，打出去！会上决定的突围方案有两个，一个是：由钟坪、南江桥出发，经过修水突围，到修、铜、宜、奉边，一直到高安、奉新，打开几个县市，建立一个苏区，停个把月，视情况变化，能立足就坚持下去。如果情况实在严重，就沿罗霄山脉暂时到湘赣，以至中央老苏区，然后再视情况，打回湘鄂赣来。这一方案如果不能实现，则由通城到崇阳，从通山、阳新、鄂城过长江，到鄂豫皖的大别山。如果在湖北不能突围过长江，就改由修水、武宁到赣西北的永修、瑞昌、德安。

部队一到修水县的渣津西北一带，就撞上了敌人严密的封锁线。红十六师没有炮火，只有把机枪集中起来，攻打敌人的碉堡。

国民党的碉堡就是专为对付红军而建的，每座碉堡外都有几道封锁线，构成严密的交叉火力网，红十六师硬冲了几次，人员伤亡惨重，却又怎么可能冲破这层层封锁呢？

一道封锁线还没有突破，国民党第四师又从通城方向赶来增援了，眼看突围过去的希望更加渺茫了，红十六师只好于当夜返回白沙桥，与国民党第四师打了四五个钟头，直打到半夜，敌人的照明弹打过来，红军战士们没见过这玩意儿，一下子都懵住了，敌人的枪炮可是不长眼的，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了……

当夜，省委决定改用第二个方案突围。

红十六师越过幕阜山的天岳关，转到通城县的盘石和云溪一带，决定分三路由通城的麦园突围。

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六师师长徐彦刚带领四十六团为中路，走在前面；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傅秋涛带领省委机关，省保卫大队改为特务团随机关前进；军区参谋长严图阁，军区副参谋长郭子明，省委组织部长刘玉堂带领四十七团为右路；红十六师政委方步舟（后叛变），师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副师长魏平率四十八团为

左路。

时值深夜，黑漆漆的天幕把一切都包裹得严严实实。红十六师从通城的麦园与修水之间突围，要通过麦园到通城的一条河。

照预定计划，三路人马在夜幕的掩护下，全部突围过河，问题是不大的。然而突围的结果，却颇有些出人意料。

中路的四十六团已经突围成功了，接下来的本来应该是省委机关的特务团。然而，世上事常常难如人愿，夜里行军中途休息的时候，有一个理发员不知怎么回事，竟然睡着了，跟在他后边的人也就跟着睡着了，前而的部队早就走了，他们还不知道，等到他们睡醒了，发现先头部队已经不在了，赶紧起身追赶。但是，他们在过河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休息了一夜的敌人此时精神抖擞，猛烈的机枪严密地封锁住了突围地带，特务团的团长刘海山牺牲在河里，部队没能过去。

结果，除四十六团和四十八团的一部分过了河外，其余部队都没能渡河成功。特务团只得转回云溪石岭，在那儿碰到了四十七团以及四十八团掉队的一个连，共有1700余人。

国民党对红军“必欲除之而后快”，就在红十六师的这1700余人准备重振旗鼓，再次突围的时候，国民党的两个师分别从白沙岭和天岳关围追堵截过来。

无奈之际，红军大部队只有使出游击战的拿手好戏，同敌人捉起了“迷藏”。

红十六师在云溪山岗上，从北向南走；敌人在云溪山下的山沟里，从南向北走；红军忽然又走下山坳，截击敌人的队尾，打死几个敌人，缴了几条枪，又继续翻山越岭。

近日来，部队日夜不歇，爬山战斗，疲劳至极，头顶上有敌机追击扫射，地而上又有敌人前堵后追，大包围加上小包围，四面八方都是敌人，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

红军也不是铁打的，他们也需要吃饭，需要休息，可眼下，整

个部队又累又饿，而且随时都有被消灭的危险。

一些人开始动摇了：“我们该往哪里去呢？”

“我们能救出十分之三吗？”

作为这支部队最高指挥官的傅秋涛，此时更是忧心忡忡。说实话，他心里对这1000多人的命运也是没有一点底，可是，他知道，在这种紧要关头，国民党并不是红军的最大敌人，自己的悲观动摇，才是致命的敌人。

正在这时，驻平江三眼桥的一个国民党团长，写来了一封诱降信：

傅秋涛先生：

你们被我们中央军打得七零八落，你率残部想逃窜到哪里去！本部从三眼桥至献钟15里，配置7个营，看你们从哪里通过。希你率部属人员携械前来投诚，才是生路。本团长乘中央以宽大为怀、既往不咎之精神，不加过问，还可嘉奖。如果执迷不悟，只有死路一条，悔之晚矣。莫谓言之不先，望三思之为要。

真是“火上浇油”！此刻把握不住，那就是全军覆没的命运！傅秋涛决定利用敌人这封信，揭露敌人的阴谋，从而达到稳定军心的目的。

傅秋涛当众朗读了这封诱降信，然后朗声说道：“敌人的阴谋就是希望我们军心动摇，从而将我们一举歼灭！同志们，我们不上他们的当！”

停顿了一会儿，傅秋涛接着说道：“对付敌人，一是斗，二是斗，三还是斗，没有坚决的斗争，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哪怕只剩下了一个人，一条枪，也要打出去，突出去就是胜利！”

趁着群情激奋，傅秋涛当场布置了再次突围事宜，选定三眼

桥和燕岩之间最熟悉的地带，趁夜晚立即行动。

鉴于上次突围的教训，部队加强了组织工作，下了死命令，宣布：“谁害怕、犹豫、动摇，谁就受军纪制裁，只有前进，才是出路！”规定：行军中要肃静，要轻步，不掉队、不说话、不吸烟、不打电筒，遇敌要沉着，坚决给予迎头痛击。省委机关干部，全部分配到各连队。

部队以特务团为前卫，由梁金华、王得胜等率手枪队、保卫队开路突围；机关干部为本队；四十七团为后卫。1700多人的队伍，静悄悄地，一个紧跟一个，通过了三眼桥和燕岩之间的大路，穿过了六七十个土围子和碉堡，越过了敌人设置的重重障碍，渡过了雷家滩的一条河，突围宣告成功。

尽管红十六师损失惨重，但革命的力量毕竟保存下来了。

省委机关又回到了黄金洞，在通城突围时失散的四十六、四十八两个团的幸存人员也陆续回到了黄金洞。

他们的情况是这样的：徐彦刚率四十六团、四十八团在通城突围之后，没有遇到大股敌人的追击，他们到达了鄂东南的通山县高湖地区，决定就地恢复和发展苏区。然而，国民党的大部队并没有就此放过他们，很快跟踪而至。

徐彦刚率四十六团从阳新的黄颡口沿长江而下，经瑞昌，转战于靖安、永修交界山区。被数十倍之敌围困，部队伤亡严重，徐彦刚在战斗中不幸身负重伤。

徐彦刚继续留在部队中带兵显然是不可能的了，组织上安排他到云居山去养伤。徐彦刚把部队交给了团政委明安楼。临分别前，徐彦刚再三嘱咐明安楼：“这支部队是湘鄂赣革命的本钱，你一定要把部队带回黄金洞，交给党，交给湘鄂赣的人民，坚持下去，我只要还活着，就坚持在这一带斗争，你们以后来找我。”

徐彦刚带着警卫员和卫生员离开了四十六团，到了永修、靖安交界的云居山。不料，同去的一个营长突然叛变了，带着敌人



的便衣队，用斧头砍死了徐彦刚。

徐彦刚的牺牲，是红十六师的又一重大损失。

红四十六团到此时只剩下了六七十人，三挺机枪，明安楼不负重托，将他们带回了黄金洞。

由通城突围出去的四十八团，在渡江时与徐彦刚分开了，他们在返回阳新的时候，正遇到敌人主力部队，重兵压来，部队遭到很大损失，最后只剩下了钟期光、魏平等 16 个人回到黄金洞。

一个团只剩下了六七十人，另一个团只剩下 16 人，一年多的艰苦经营几乎全部付之东流，望着眼前这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回到黄金洞的几十个人，傅秋涛的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似的，连句慰问的话都难以说出口。

傅秋涛强自镇定了一下情绪，拍了拍明安楼的肩头，沉痛地说：“彦刚同志走了，他是好样的，我们一定要为他报仇！不要灰心，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红十六师的三个团终于又会合了，但原来的 5 000 人只剩下 1 700 多人。

### 开不败的杜鹃花

傅秋涛心痛如刀绞，这次的惨败，怪谁呢？

要怪，也只能怪省委和红十六师自己，几次小小的胜利之后，就开始麻痹轻敌。“骄兵必败，骄兵必败……傅秋涛，难道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吗？”傅秋涛用双手猛捶了几下自己的脑袋，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让心里好过一点儿。

“除了麻痹大意，我们的根本策略也是有问题的。”傅秋涛继续着他的反思。

“红军主力长征以后，国民党进攻各苏区的力量也相对更集中了，本来，我们湘鄂赣苏区也应该适时地把大块的根据地转变为小根据地，把正规战转化为游击战，以保存力量为最主要的目标。

可我们，还是同敌人打硬仗，拼消耗，还把三个团集中起来进行整训，正好给了敌人集中歼灭的大好时机，……”

但是，也不能全怪他们。省委与中央的联系早就中断，除了知道主力红军已撤离中央苏区，别的情况，省委和红十六师都是一概不知的啊！

省委也曾多次派人去寻找党中央，然而每次都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他们如同失去了母亲的孩子，一切都得自己去摸索。

不过，“吃一堑，长一智”，这场斗争虽然代价多了点，毕竟革命的力量还在，湘鄂赣的红旗没有倒！

突围以后，湘鄂赣苏区的局面更加恶化了。

敌人由大举进攻转入了分兵、分区、分期的“清剿”，一个月一次、两次、三次不等。国民党把湘鄂赣地区划分为三大“清剿”区。50户以下的村庄建立一个碉堡，50户以上的村庄建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碉堡，“进剿”更加频繁，“驻剿”更加突出了。

国民党在“清剿”区内，大肆砍树烧山，意在让红军无藏身之地，有时还在“清剿”区之间，实行联合“清剿”。

本来，湘鄂赣苏区地处三省交界处，三省敌人内部矛盾重重，有地区与地区的矛盾，有正规军与地方军的矛盾，还有嫡系与非嫡系的矛盾，都想保存自己的实力，常常配合不好。红十六师过去就常常利用这些矛盾，江西的敌人来进攻，就往湖南跑；湖南的敌人来进攻，就往江西跑，使之无可奈何。

如今，国民党搞起了联合“清剿”，越过了省与省，县与县，支点与支点间的界限，给红军造成了很大困难。

“清剿”的手段甚为灵活、毒辣，在小块的苏区或游击区，常以精干的小部队，进行搜山和打埋伏；在较大块的苏区或游击区，就配备较多的兵力，封锁包围，反复“清剿”；甚至也会以打游击的方式，偷袭苏区的县、区机关和医院。

有一次，省委机关转移到九岭枫树坳底下的抛石，天刚拂晓，

遇到敌人包围搜山。

游击队员们分散隐蔽在森林中，国民党兵不敢深入，就到处掷石头、打枪、叫喊、吹哨子，嚷了半天，突然就安静下来了。

一个炊事员以为敌人已经走远了，就离开了藏身的草丛，结果，一枪射过来，他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倒下了。

在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斗争就越来越残酷。对红军来说，在这样的条件下，生存下去就意味着胜利。

湘鄂赣省委吸取了上次惨败的沉痛教训，开始自觉地向游击战转变。

在湘鄂赣边区，群山环抱，层峦叠嶂，竹木葱茏，“千峰转不尽，十里万重山。”在这里能藏能打，本是个开展游击战争的天然地带。

在敌人大举“清剿”之下，湘鄂赣省委不再单纯采用死打硬拼的战法了，而改用精干的游击队和游击小组的形式，依靠群众，实行大游小击，出没无常，飘忽不定，专打弱小之敌。敌人进山，红军出墩；敌人进攻红军的根据地，红军就向敌人的铁道边、公路边、大城市附近等深远后方袭扰；敌人集中，红军分散；敌人分兵，红军又相对地集中，击敌弱点；红军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打击敌人；大敌来了，红军就走；小敌来了，红军就打；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

游击区和敌占区的群众，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掩护红军的活动。苏区的老大娘们都懂得用来掩护红军的各种暗号。

“细伢崽！你要多扒柴呀！”这是暗示红军，有敌来，不要到她的家里去。

“牛吃菜了，快去牵开哟！”这是告诉干部，敌人在这里，你赶快走开。

“细伢崽！你捆柴回来吧！”这是说敌人走了，可以到她家里去吃饭或办事了。

老大娘带着浓浓乡音的亲切呼唤声，不知为游击队帮了多少忙。苏区人民视红军如自己的亲生孩子，骨肉相连，为掩护红军、支援红军，自己的身家性命都可抛舍不顾！

山上的杜鹃花又开了。这是战士们最珍爱的花。它们漫山遍野、绚丽如朝霞地开放着，为死去的烈士致哀，为活着的英雄壮胆，鼓舞他们顽强地活下去！

当时，吃饭是一个大问题。根据地人口稀少，战争频繁，生产有限，1935年至1936年期间，有半年的时间，红军游击队的官兵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没有粮食，只能“靠山吃山”，竹笋、松子、山杨梅、野胡桃、野芥菜、糯米草，等等，得到哪样吃哪样。没有油、没有盐，就用山上的五倍子花泡水当盐吃。白水煮辣子是好菜，煮竹笋是好饭，这就是游击队员的年夜饭。

他们就是这样勒紧裤带过日子，连续两三年，几乎每天都是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

穿的盖的十分困难。原先发的军服早已在长期的摸爬滚打中变了模样，能穿的所剩无几，战士们只有再次开动脑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打了土豪，就穿地主的衣服，用地主的布来做衣服；抓了俘虏，国民党的军服改装一下也能穿。于是，游击队整个成了“杂牌军”，战士们的穿着、样式不一，新旧不一，长短不一，各色各样。

战士们每人都有针有线，能缝能补，没有鞋穿，自己会打草鞋，还会缝被子，作袜子，制帽子等，可说是多才多艺。

被褥很少，就拿稻草当褥子，树叶当被子，在北风呼啸之夜，战士们找个隐蔽的地方，砍柴烧火，围火而卧，面火的一边身子犹如夏天，热烘烘，烤着皮肉；背火的一边身子犹如冬天，凉冰冰，冻得发抖。战士们硬是咬着牙，挺了下来。

住房子又是一个大问题。人总是要休息的，休息就得有个窝子，房屋都被敌人烧光了，有也不敢住，只好利用天然条件来解

决。

游击队员住的房子，式样繁多。第一种是利用山岩、石洞的石房子。这种“房子”，屋顶漏雨，地面高低不平，有的里面净是青苔，冬天住着冷冰冰，夏天倒挺凉爽。第二种是茅草盖起来的棚子。这种房子冬天最暖和，但要特别注意防火，一不小心，不仅烧了人，引来了敌人那就更麻烦。第三种是竹棚子。南方竹子多，可以选择斜坡地段，先用竹子搭起轱子，周围插上竹子当墙，房顶更妙，将竹子锯成五六尺长，劈成两半，打掉竹节，仰一块、俯一块盖成房顶。这种房子既通风，又透光，适于夏天住，战士们戏称它为“琉璃瓦”小洋房。但是建这种房子有个问题，劈竹子响声很大，像枪声一样，容易被敌人发觉，必须掌握劈竹子的艺术。先将竹子劈开口，用水泡湿后再劈，响声就小了。第四种是布棚子。每个人用自己的床单或油布，在四个角上都作一个绊，用树枝或木杆，把布撑起来，像庙会中摆布的一个个货摊一样。用白布单还要特别小心，上面必须用茅草或树枝伪装起来，以免暴露目标。第五种是用两三把雨伞打开，利用雨伞做房顶，构成一个小房子，这种房子只能遮头，不能遮身，刮大风就吃不消了。

在天晴暖和的时候，战士们甚至什么房子也不建，画地为营，几个人背靠背地就睡起觉来，一有情况，立即转移。

当时为了解决住房问题，每个机关都备有镰刀，每转移到一个新地方，马上就选择地点，不分官兵，一齐动手，盖起房子来。

敌人经常放火烧棚子，不过游击队员们不怕这一招，这里烧了，那里马上又盖起来。烧了又盖，盖了又烧，再三再四，似乎房子也有前赴后继的精神。

两条腿是游击队员的本钱，走路是他们的战术，他们靠走路打击敌人，靠走路坚持斗争，大路不能走，走小路；小路不能走，自己开路走。在有露水的时候，如果早上走，容易把露水碰掉，就在夜里没有下露水以前走。下雪天，走过的路，要用扫帚把脚印

扫掉，如果原来有走过的脚印，就照着旧脚印走。

敌人非常狡猾，常常在草地上结草做记号，有人走过去就会碰开，不过这点小小的把戏早就被游击队员们识穿了，他们走过以后，仍然把草扶起来，照样打上草结，这样，敌人就发现不了。

在敌人眼里，游击队员个个都成了“来无影，去无踪”的草上飞。走路的艺术，这世上怕是没有谁比他们掌握得更好的了：上山不奔，下山不蹶；上山用脚尖，下山用脚跟。

就是这样，红军游击队员们在荒山、丛林中，风里、雨里，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一年、二年、三年，整整三年啊！湘鄂赣省委和红十六师硬是在这种恶劣环境中挺了下来。他们饥餐野果，渴饮山泉，生活几乎近似于原始人。在国民党残酷无比的搜山、“清剿”中，不知有多少人倒下了，留下来的默默地掩埋好战友的尸体，继续战斗，顽强地生存下来。就像山上的杜鹃，年复一年地开放着，红艳艳的。

### 新的斗争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实行“北和南剿”的方针，因此，当西北局势正在趋于缓和的时候，南方却比任何时候都更紧张了，湘鄂赣苏区当然也不例外。

于是，在湘鄂赣苏区，国民党军队骤然增加了几个师，他们以团为单位在苏区一住就是一两个月，叫做“驻剿”。同时，还利用叛变分子，设立专门的“招抚”机构，软硬兼施，双管齐下，妄图在国共合作正式建立之前，尽量把南方革命力量消灭掉。

因此，从西安事变后到卢沟桥事变前的这半年时间，是湘鄂赣三年游击战争中最黑暗的时期，国民党把游击队包围在深山丛林中，天天打，月月打，没日没夜地打，枪炮声一直没停过。于是，红十六师的战士们在黎明前，一批接一批地倒下去了……

可是，突然有一天，国民党的枪炮声完全沉寂下去了，国民

党的军队也开始陆陆续续地从山上撤走了。

山上的游击队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侦察员在山下侦察了很久，带回了国民党近期的报纸，湘鄂赣省委这才了解到：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国共要实现合作了。

湘鄂赣苏区的军民，对党中央的合作抗日政策，当然是衷心拥护的。可是，这个时时刻刻在心里念叨着的“党中央”，却怎么也联系不上，犹如在茫茫大海中航行的孤船，失去了航标，真不知哪里才是正确的航向？

湘鄂赣省委为此多次召开会议，专门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

在讨论过程中，大家基本肯定了这么三条：

（一）抗日是党的一贯主张，红军主力长征北上，就是为了抗日，红军在长征中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二）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活捉了蒋介石，党中央出来调解，和平解决，这就有可能促进国民党合作抗日。

（三）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关头，共产党人要动员一切力量，团结抗日。

基于这些认识，省委决定，自觉转变策略，与国民党当局实现停战谈判。与此同时，国民党也开始了他们的停战步骤。

1937年7月15日，国民党第五十师派了一个姓蔡的副团长，来到了湘鄂赣苏区，要求和红军“接洽”谈判事宜。“接洽”的结果，双方约定18日正式开始谈判，地点确定在平江嘉义镇的关帝庙里。为防国民党玩弄阴谋，红军加强了戒备。

红军谈判小组由傅秋涛、钟其光、涂正坤三人组成；国民党方面以第五十师一个姓朱的旅长为首，还有平江的县长和县党部书记长等。

第五十师是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向来以“剿共得力”受宠于蒋介石，就是这个姓朱的旅长，前些日子，还到湘鄂赣苏区“进

剿”过一次，他们的枪口、刀口上，沾满了烈士的鲜血。

谈判开始了，平江县党部的书记长抢先站起来，伸长脖子，咽了口唾沫，挥着一双麻秆似的手臂，像念经似的高声说道：“我们中华民族，必须贯彻一个主义，坚持一个政党，拥护一个领袖，这是一个原则！我们的，蒋委员长——”

说到这里，国民党的全体谈判大员，忽然齐刷刷地都从椅子上直立起来，两腿一夹，“啪”地一声来了个立正，像中魔一般。

傅秋涛正在吸烟，他悠然地向半空中喷一口烟，和钟期光相对微微一笑。

这位县太爷讲了半天，翻来覆去就是“原则”、“主义”、“政党”、“领袖”几个词，与谈判的主题没挨上一点边，傅秋涛实在感到他有些讨厌了，不得不打断他的演讲，平静而坚定地说：“你累了，歇会儿吧。你刚才说的话，我们以为都是多余的，你有你的国民党，我有我的共产党；你有你的领袖蒋介石，我有我的领袖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河水不犯井水，和谈判根本无关！”

说完，傅秋涛转向那个旅长：“朱旅长，还是你谈谈吧！”

“好，好。”那个旅长似乎早就在期待着这个时机，欣然接下去发言。

看起来，他和那个书记长之间，早已存在着矛盾。果然，在休息的时候，这个朱旅长找到了傅秋涛，用眼色暗指着那个书记长，说：“这家伙就是讨厌，昨天我们开会，他是那三句话，今天同你们开会，还是这三句看家话！”

傅秋涛立刻意识到，应该抓住这个矛盾，谈判才会更加顺利。傅秋涛向他建议，红军单独和国民党军队谈判，他非常高兴地答应了。

军队的谈判进行得很顺利，一般的细节问题基本上都得到解决，到最后留下了三个大问题，都是事关全局的关键所在，朱旅长说他无权决定，建议红军代表到浏阳师部去和他们师长直接



商谈。

傅秋涛接受了他的建议，决定亲自前往浏阳谈判。

谈判小组的出发日期定在4天之后，动身前，钟期光说：“国民党到处嚷嚷我们是‘匪’，到处造谣说我们已被‘剿得走投无路，狼狈不堪’。这次进城去，我们搞得神气些，叫他们好好瞧瞧！”

“对”，涂正坤点点头说：“打扮得体面些，让老百姓看到了，也可以扩大点政治影响。”

于是，谈判小组突然缝制了七套线布新军装。颜色是藏青的，保持着红军军服的老传统。八角帽上，缀着一颗红布剪成的五角星，随行的四个警卫员都打着绑腿，腰扎装满子弹的崭新九龙带，挎一支乌亮的驳壳枪，枪柄上拖着鲜艳的红流苏。

从平江义口到浏阳，中途要经过平江县城，朱旅长一定要谈判组在平江他们的旅部休息一下，吃顿午饭。

傅秋涛和钟期光、涂正坤商量了一下，认为答应他们也无妨。于是汽车径直朝平江县城开进去，本来汽车可以驶过城门洞，直到旅部门口，但是为了和三年来给了游击队无数支援的平江人民见见面，谈判小组决定徒步进城。

平江的百姓听说红军进城了，一时之间，街道上，巷子里，人山人海，大家踮起脚跟，伸长脖子，带着又惊奇又喜悦的神色望着眼前的这几个活生生的“红军”。

傅秋涛、钟期光、涂正坤不时地扬起手，向两旁的乡亲们招呼，微笑着向他们点头，虽没有来得及说上一言半语，但大家的心意都是相通的，共产党和红军不但没有被“剿尽杀绝”，反而如此仪表堂堂地出现在“国军”旅司令部驻守的重地——平江城里，并且在三年游击烽火中锻炼得比过去更坚强了。

吃过午饭，汽车已等候在大门口，在原来那辆旅行车前面，还有一辆黑色小汽车。姓朱的旅长让傅秋涛等三人上了小汽车之后，自己也钻了进去。

那个朱旅长的马弁颇为机灵，当他的“主人”还没有在车内坐稳，他就抢上两步，开了前面的车门，占住了司机旁边的座位，这样一来，四个警卫员，就一个也上不了车了。这是不是国民党有意安排的阴谋呢？警卫员们的手都不约而同地摸到了枪套上。傅秋涛看出了他们的心思。从车窗内探出头来，对警卫员们使了个眼色，说：“你们上车去吧。”

四个警卫员没法，只得走进那辆旅行车。汽车开了半个来小时，开上了一个盘山道，前面的小汽车比较轻便，很顺利地爬到了山坡的分水岭上，一会儿就不见了。

不见了小汽车，警卫员们心里立刻不安起来，警卫员吴泳湘在司机的肩膀上轻轻拍了两下，对他说：“劳你驾，开快些，追上去！”

司机点着头，慌乱地说：“好的，好的。”

谁知，他的话还没说完，发动机“扑、扑”吼了两声，汽车开不动了，警卫员们更加警惕起来。

吴泳湘厉声问道：“怎么啦！”

车内的空气立即紧张起来，司机的双脚拼命地乱踩了几下，两只手东摸这个钮，西拉那个栓的。可是，车子还是死死地一动也不动。

“真不巧，机器出了点毛病。”司机转过脸来，又是抱歉又是惊惶地解释着，“小毛病，不碍事的，我马上可以修好。”说时，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渗出来，他也顾不上擦汗，打开车门，走到车头旁边，打开机舱上的铁板，把头埋在里面修了起来。

警卫员们也跟着下了车，那个长脖子国民党书记长也在这辆车上，帮着司机说好话：“咳，咳，小毛病，汽车难免的。咳咳，马上可以修好……”

总算还好，发动机很快又“突突突”地响起来。大家上了车，这次，司机可不敢怠慢了，驱车如飞，很快追上了前面的小汽车。

看上去，小汽车中的人们都安然无恙，压根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警卫员们悬着的心才算放下。

下午三四点钟，汽车到达浏阳县城，到了师部门口，姓朱的旅长抢先下车，为傅秋涛打开了车门。

刚站定，在迎接的人群中，有一个穿军服的走上前来，朱旅长忙在中间介绍：“师座，这位就是傅司令。”

五十师师长岳森摘下白手套，伸出右手和傅秋涛握了握手，又竖起大拇指，说道：“傅司令，岳某佩服！”

傅秋涛微微一笑：“岳师长言重了。”

岳森的这句话，要说他完全是装腔作势，也未免冤枉。因为他率领的这3万“正规军”，再加上杂牌军、地方保安队，还有另外两个正规军，加起来不下十五六万之众，对付不足千人的湘鄂赣红军，“剿”来“剿”去，不但没有“斩草除根”、“消灭干净”，相反，红军仍旧到处在活动。今天的这个场面，岳森恐怕连做梦都不会想到，又怎不叫他感到钦佩呢？

岳森把谈判小组迎到一间会客室。会客室外，有一条走廊，4个警卫人员，就站在走廊门口，一面观察周围地形，一面警惕地提防着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

走廊的外面挤满了国民党士兵，个个探头探脑，瞪着好奇的眼睛直瞅着这几个红军战士，有的还咕咕噜噜地说着什么。

的确，红军在他们眼中实在是太“神”了！几年的较量，有些人甚至连红军的面都没碰到！这回，正好让他们仔细瞧瞧，看看红军是否像他们的上司宣传的那样，长着红眼睛，绿眉毛，披头散发，青面獠牙。

谈判就定在当天晚上。按照岳森的提议，地点选在小山坡的凉亭里，警卫员不随同上山。

吃过晚饭，天已经全黑了。谈判正式开始。

傅秋涛第一个发言：“岳师长，抗战救国，全民大事，我建议

我们抓紧时间，就着手谈条件吧。”

这次谈判，本来就是为解决上次嘉义谈判时悬而未决的三大关键问题，因此傅秋涛来了个开门见山。

岳森缺乏对奕的诚意，没有思想准备，被傅秋涛这么直截了当地一问，显得有些慌乱，只是说：“对，对，岳某也是此意。”

接下来，由涂正坤宣讲红军方面的三个具体条件。

岳森把一支未点燃的香烟，夹在手指间来回转动，久久不吭一声。

“岳师长，你的高见？”傅秋涛客气地追问一句。

岳森抬起头，慢吞吞地说道：“这三个条件，确实是要紧的。这样吧，就按照会议通常的程序，后提议的先来讨论。”

第三个条件，即释放在押的政治犯。既然双方议定合作，政治犯毫无疑问是要无条件释放的，所以岳森满口答应：“这条件明天就可以兑现。”

可是，岳森接下来又来了个“不过”，他说：“我们方面许多工作做得很不好，政治犯和刑事犯常常判错，我看是不是由你方提个名单，我们就按名单去办。”

很明显，岳森是在使花招，他的目的无非是先骗去名单，再暗地里将名单上的人（国民党总认为被红军提到名字的，都是重要人物），偷偷地杀害一部分，然后说：“根本没有这个人。”

红军当然不会上这个当。钟期光说：“岳师长，你给我们出了个难题。说句笑话，岳师长能不能列出一个十年内战中，被我们俘虏的‘国军’人员名单呢？”

岳森假装被逗笑了，以此来掩饰自己的窘态。

傅秋涛严肃地说：“我看就这样决定吧，各监狱和拘留所，一律按现有的登记册，全部释放你们所认为的政治犯。这件工作，明天一早我们就派人分别进行。——岳师长，要是你同意这么办，我想还是抓紧时间，我们来谈第二个条件吧。”

岳森只好说：“对，对，岳某也是此意。”

第二个条件，部队集中，番号改为“湘鄂赣红军抗日游击支队。”

多年的教训，使岳森最为头痛的是红军的分散活动，红军分散在山上，总数和实力无法捉摸。红军一集中，在他看来，自然便于对付。说不定在什么时候，还可来个聚而歼之，因此满口答应。事实上，集中以后的红军从人数上讲，也是不容他小看的。

红军集中以后的指挥权，岳森知道陕北中央红军和国民党谈判时已有常例，这个问题已没有再计较的必要。

但岳森还是有些不甘心，抓住部队的名称问题作起了文章。

红军方面提出，集中以后的红军，应该叫做“湘鄂赣红军抗日游击支队”，岳森不同意，他说：“我看这‘红军’两字，实在是多余的。”

傅秋涛等深知，这决不是两个字眼的小事，而是事关我党我军独立性的原则性大问题，决不能作丝毫让步！

钟期光站起身来，严肃地说道：“岳师长，湘鄂赣将会有许多抗日游击队，由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就只有一个支队，为了避免混淆，勾掉‘红军’两字，就必须加上‘共产党’三个字。”

岳森没有理由反驳，只得同意保留“红军”两个字。至于改编后，红军的军费问题，岳森说：“这件事，我岳某无权作主，须请示武汉上峰。”

最后一个条件是划定特区，驻扎军队。

岳森的回答是“也须请示武汉”。说完，连打两个哈欠，表示想睡觉了。

傅秋涛考虑，这经费和划出特区的问题，岳森也确实难以作主，于是就由涂正坤简要地将一些具体问题述说一遍，岳森都一一点头表示同意。

浏阳谈判，就此结束，国民党在过去十年“围剿”中没有得

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也同样没有得到。

8月20日，湘鄂赣省委又派刘玉堂、黄耀南到武汉行营去谈判。董必武也到了武汉。至此，湘鄂赣省委才与党中央直接联系上。

谈判由董必武负责，没费什么周折，很快获得成功，红十六师被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

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湘鄂赣省委和红十六师，最后还保存了近500名党员干部，390多名战士，共有近900人，经过半年整顿，队伍扩大到1100人。

1938年1月，新四军第一团开赴抗日前线，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战争洪流。

---

## 第七章 椰岛风云

琼崖（海南岛）位于我国的最南部，屹立于浩瀚的南海之中，面积 33 920 平方公里，是我国仅次于台湾岛的第二大岛。它北隔琼州海峡，与雷州半岛相对；西临北部湾，与越南为邻；东为菲律宾的吕宋岛；南面则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隔海遥望。从地理位置看，它是祖国南方前哨，既可控制南海交通要冲，又能扼两广出入咽喉，是我国南部海疆的要塞，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岛上中心腹地山高林密，以五指山为最高峰，海拔 1 800 多米，“宛如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在革命战争年代，海南人民孤军奋战，坚持 23 年红旗不倒，犹如天涯海角的昂天巨石，屹立于南海之滨。

### 一 南天一柱

#### 革命火种传椰岛

五四运动之后，在各大城市读书的琼崖籍进步学生和侨居海外的华侨，把各地出版的一些宣传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报刊图书，如《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等，通过各种渠道逐渐流传到海南。这些报刊杂志，对马克思主义在海南岛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很快，从云南讲武堂毕业回琼的热血青年徐成章与冯平、王器民等人，就在海口创办了《琼崖旬报》。该刊明确提出以“改造琼崖”为宗旨，介绍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欧洲社会主义学说”，积极鼓吹革命，反对封建，提倡男女平等，

婚姻自由等等，在海南岛人民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21年冬至1922年初，中共中央先后派党、团员吴明、罗汉、鲁易、李实等人到琼崖开始革命活动。他们到琼崖后，在琼山、海口、琼东等地以教书为职业掩护地下工作。很快与琼崖党员毛孟屏及先进青年徐成章、徐天炳等人结合起来，打开了工作局面。他们以《琼崖旬报》、《琼岛日报》和学校为阵地，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922年，共产党人在海口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琼崖分团，随后，通过琼崖学联和琼崖青年互助社，开展了一场反列强、反军阀的斗争。

1923年下半年，盘踞海南的反动军阀邓本殷下令取缔青年学生运动，解散学联，对进步学生和教师大加迫害。在高压之下，多数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先后离琼到大陆各地，或从事革命活动，或学习革命理论。这其中，被党中央选送到苏联留学的杨善集归国后成为广东青年运动的领袖。

杨善集和徐成章、周士第、洪剑雄等在广州成立琼崖少年同志会，创办《新琼崖评论》；莫同融（荣）、柯嘉予等在北京组织琼岛魂社，创办《琼岛魂》；王文明、叶文龙等在上海组织琼岛青年社，创办《琼岛新青年》等等。这些活动，不仅团结教育了各地的琼崖青年，培养了大批革命人才，而且通过他们办的刊物，在琼崖广大青年中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

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琼崖人民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共产党人在琼崖领导了反对军阀邓本殷的革命斗争。

邓本殷是粤军陈炯明部的一个旅长，1920年冬率军进驻琼崖，任琼崖善后处处长，在海南岛建立起最黑暗的统治。当时，琼崖苛捐杂税繁多，名目达200余种。如田亩捐每亩收银7元，房屋捐每间收银1元3角，人头税每丁收银1元等。此外，还公开卖官鬻爵，排长卖价六七百元，连长2000元，营长6000元，县长则要万元以上。全岛城乡烟馆林立，赌场遍地。当时有人形容：



“现在琼崖全境简直像一个赌馆一样了，梅花、番摊遍地都有，赌徒、游民触目皆是。”有人根据旧时词令填词一首：“自民国以来，政局不宁，武人专政，国事日非……农荒于野，工业废弃，商业凋蔽，而军阀土匪又藉名抽捐勒税，洗劫村舍，匪过也如梳，兵过也如栉。寡人妻，孤人子，独人父母”。陵水一带更有民谣唱到：“乌云压压把天遮，穷人租债重如山；年关三十又来到，抱仔哭啼心如麻；乌云压压把天遮，荒年卖仔去逃命；求得清风来相助，干柴烈火照路行。”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琼崖人民渴望着革命风暴的到来。

1924年6月1日，在琼东县嘉积，美国牧师冯卓殊被土匪所杀，邓本殷随即派陈凤起赴琼东县，以缉拿凶手为名进行“清乡”，对人民群众恣行烧杀。他预先买了毛笔300余支，作为捕人枪毙时写令之用，并向人民说：“非杀同这笔数一样多，决不放手。”嘉积百姓闻声逃避一空。陈凤起纵兵四出盘查，先后捕杀无辜群众180余人，震惊全广。琼籍学生纷纷集会，声讨邓本殷，历数其祸琼罪恶，并发出誓言：“此獠不去，誓不罢休。”

反对邓本殷的革命浪潮日益高涨，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团体来指导。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由广州新琼崖评论社、上海琼崖新青年社、北京琼岛魂社等发起，于1925年4月7日在广州召开琼崖革命团体代表大会，成立了琼崖革命同志大同盟，确定其任务是：“联络革命团体，造成革命的伟大力量；用革命的大势力，打倒琼崖的军阀，及其所勾结的帝国主义；建立国民政治，以全力谋琼崖被压迫民众的利益，同时努力于全国全世界被压迫民众之解放。”同盟选举王文明、杨善集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王文明任执委常务委员，主持工作。先后参加大同盟的有20多个团体，其中有新加坡、暹罗等处琼崖华侨组织的革命团体。在“驱邓运动”中，革命大同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26年2月初，伴随着国民革命军南征的胜利，中共琼崖特

别支部在海口成立，罗汉任特支书记，委员有王文明、冯平、李爱春等。特支成立后，即以战斗的姿态开展斗争，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壮大革命力量。到同年秋天，全琼除感恩县和昌江县外，12个市、县都建立起党、团的基层组织。

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口市竹林邱宅（现海口市新华区竹林里131号）召开。会议由王文明主持，中共广东区委派杨善集出席会议进行指导。大会讨论了琼崖党组织的主要任务，选举产生以王文明为地委书记的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从此，琼崖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琼崖这个孤岛上进行着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

在中共琼崖地委的领导下，琼崖掀起了大革命高潮。工人成立了总工会，把革命从改善劳动条件，增加工人福利，提高工资的经济斗争，推进到反对压迫，争取解放的政治斗争。农民成立农民协会，并组织自己的武装——农民自卫军，打击乡村的土豪劣绅，地主恶霸，使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农民协会在组织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反对贪官污吏等斗争的同时，还在广大乡村兴办平民学校，号召男女老少一律免费入学。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广东的国民党反动派跟着发动四一五政变。4月22日凌晨，琼崖反动派也向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

4月21日晚，琼崖警备司令黄镇球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决定采取反动行动，其“清党”方案是：（一）定于本月22日凌晨开始“清党”；（二）所有共产党的机关及其组织的团体、学校等负责人都在逮捕之列，并查抄其名册、文件等；（三）各地捕获的人犯财物即将其解来琼崖公学，由监护队看管；（四）第一营负责文昌、定安、乐会等处，第三营负责澄迈、临高、儋县等处，机关枪连负责海口市，特务连侦察队负责琼山县，监护队负责共产党办的琼崖公学校；（五）各部队行动时要请当地国民党部派人协

助……

原来，在广州发生反革命事变后，中共广东省委就蒋介石叛变问题给琼崖地委发出紧急指示，指派冯振藩、孙成达到琼传达。与此同时，敌人屠杀共产党人的“清党”密令亦由国民党右派分子邢觉非带回。敌我双方带信的人员，搭的都是广州至海口的一艘轮船，同时于4月21日上午抵达海口，中共带信的同志因对府（城）海（口）地区不甚熟悉，登岸后经过一番周折，才将紧急指示送到琼崖地委。指示大意是：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琼崖党组织要做好准备，绝对不能让敌人破坏我党组织和获得党的机密文件。党、团负责人离开，党的领导机关和工作人员必要时可撤到农村。王文明接到指示后，立即分头通知府海地区的一些主要负责人，暂离机关，潜伏待命。尔后，王文明等人撤到东会县第四区农村。但是由于时间仓促，许多同志来不及撤离而罹难。

在这次事变中，被捕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有2000余人，被杀害者500余人。许多革命者在临刑前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那英勇不屈的精神，慷慨激昂的声音，令刽子手们胆寒。敌人为了禁止他们呼喊口号，竟惨无人道地向他们灌注烈性毒药，毁其喉，灭其声，然后杀害。在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下，不少地方出现了尸骨遍地，焦土废墟，满目凄凉的惨状。从此，黑暗代替光明，盟友变成了敌人，整个琼崖被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遭到失败。

### 琼崖出了个冯白驹

革命进入低潮之后，一部分人经受不住考验，自首叛变了；一些人对革命失去信心，回家当了农民，或者逃到南洋另谋生路。但坚定的共产党人，革命战士，并没有被敌人所吓倒，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揩干净身上的血迹，又继续前进了。

冯白驹就是其中一位出色的无产阶级战士。

1905年5月，冯白驹出生在琼山肥大山乡长泰村。父亲务农，兼营开采小型石场，经济上略为宽裕。白驹自小就在村中念私塾，14岁那年进入高小，念完三年，继入旧制中学，结业后赴南京投考东南大学，未被录取，在该校补习半年。1925年下半年转赴上海大厦大学，攻读半年预科。1926年初，冯白驹参加学校闹学潮，反对腐败教育，辍学返家，结束了学生时代。

日显衰败的家庭对他寄以厚望，希望他能在政府机关中谋到一官半职，为家门增光。然而冯白驹走的道路与家人的愿望相反，尽管遭到责骂，也丝毫没有动摇他的决心。在海口，冯白驹找到儿时的好友、中共地下党员李爱春（时任国民党琼山县委员会主任委员），要他介绍革命工作。李爱春介绍他到海口郊区农民协会办事处当主任，从此，冯白驹踏上了革命征途，开始了漫长的革命生涯。

1927年4月22日，当血雨腥风弥漫城镇街头，革命者的头颅高悬城门路口时，冯白驹冒着生命危险潜入府城寻找党组织。几经周折，找到中共琼崖地委书记王文明。王文明向他传达了地委的决定：鉴于李爱春同志英勇牺牲，地委决定成立琼山县委，由冯白驹任县委书记，深入农村，组织武装，反击白色恐怖。

年方22岁的冯白驹，不顾环境险恶，走村串户联络地下党员和农会的骨干分子。他一次又一次摆脱敌人的追踪，找到陈秋辅和冯裕江，组建了琼山县委。

县委成立时，作了三项决议：（一）三人分头到各区去，联系从海口、府城撤回农村的党员，建立各区委和乡的党支部，发展党员，领导群众斗争；（二）开展宣传活动，揭露反动派的滔天罪行，建立了村革命政权；（三）立即组织短枪队，镇压首要反动分子，打击反革命气焰，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积极开展武装斗争。

随后，冯白驹组成一支20多人的短枪队伍，利用各区乡收集

的私家武器，选择琼山县东部敌人力量较薄弱的乡团为打击目标。6月间，他指挥短枪队偷袭树德乡下田炮楼，打死团丁数人，缴获3支驳壳枪。继而，他又组织农民群众和农军1000多人，连续捣毁白石溪炮楼，袭击大陂市，攻克道崇团局。这一系列斗争吹响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琼崖武装斗争的号角。

1928年5月，特委调冯白驹出任澄迈县委书记。冯白驹有时化装成牛贩子，有时扮作风水先生，一村一村地去寻找被打散的党员。经过一年艰苦细致的工作，各乡的支部重新建立起来了，在此基础上重建区委和县委，澄迈的工作局面终于打开了。

这时，琼崖特委受“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决定将特委机关搬进海口市，以城市为中心，发动兵变，幻想通过夺取城市政权达到夺取全琼革命胜利的目的。不到一年，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特委机关被敌人全部破坏，特委书记黄学增和其他干部牺牲。

冯白驹从一个在海口做小贩的交通员那里首先得悉特委被破坏的消息，立即召开澄迈县委紧急会议。他果断地说：“特委机关是全海南的党组织，是工农红军的领导中枢，我们要和各县委马上联系。想办法重建特委。”会后即派人到各县去协商，冯白驹亲自跑了琼山、安定、琼东等几个县，找到各县领导同志，并到母瑞山找到正在病中的王文明（时任琼崖苏维埃政府主席），研究重建特委事宜。

1929年8月中旬，由王文明和冯白驹为召集人，在母瑞山的内洞山，召开了各县委代表联系会议。会上，冯白驹分析了琼崖的革命斗争形势，他指出：革命运动就像大海的潮汐，有高潮也有低潮。革命的挫折就像退潮，退潮过后便是来潮。特委损失的教训，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王文明首先赞同冯白驹的意见，阐明迅速选举产生临时特委的必要性。经过20多位代表讨论，一致选举王文明、冯白驹等九位同志组成中共琼崖临时特委。会议还做出决议：党的工

作以广大农村为中心，迅速恢复被敌人摧残破坏的各级党组织，巩固和发展农村山区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发展壮大红军，坚持武装斗争。

1930年1月，琼崖特委派冯白驹偷渡琼州海峡，到香港找广东省委汇报工作。省委立即选派他前往上海参加党的会议，在那里，他第一次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代表党中央鼓励他说：“你们琼崖党抓住红军，抓住农村革命根据地，抓住苏维埃政权，这三件大事很好，今后，只要紧紧依靠群众，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坚持斗争，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会后，广东省委派邓发偕冯白驹一起回到海南，指导工作。1930年4月，冯白驹在母瑞山主持召开了琼崖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由于王文明病逝，到会代表一致选举冯白驹为特委书记，从此，冯白驹从先辈手中接过红旗，肩负领导琼崖革命斗争的重任。

这次会议成为琼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起点。到1930年春末，全琼人民武装队伍已发展到五六百人，红军独立团扩展为两个营。特委发动群众，配合红军，在全琼各地掀起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红五月”活动。

“红五月”计划的重点，是围攻“团猪”运动。“团猪”是琼崖百姓对反动民团一类的地方武装的蔑称。反动民团经常到乡村征粮勒饷，收取苛捐杂税，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群众恨之人骨，故称之为“团猪”。围攻“团猪”，办法有两种，一是把敌人的炮楼碉堡包围起来，用装沙的“土坦克”作掩护，把洒上煤油和辣椒粉的柴草运到炮楼碉堡底下，点火熏烧，群众称之为“蒸猪”。另一种办法叫“壁围”，就是趁夜间用蓆席架起一层长长的壁作掩护，然后挖地道，通到炮楼碉堡底下，从炮楼里发动进攻。

1930年8月，琼崖红军已扩大到14个连，共1300多人，冯白驹在母瑞山上正式宣布成立琼崖工农红军独立师，委任梁秉枢为独立师师长，杨学哲为政治委员，参谋长王天俊，政治部主任

潘霖，下辖两个团，一个独立营。不久，琼崖独立师被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红军独立师的建立，使琼崖武装斗争发展到一个新水平，有力推动了琼崖第二次土地革命高潮的到来。到1931年底，在冯白驹的正确领导下，红军独立师迅速发展到了2000人，成为一支坚强的革命武装力量，连同苏区各县、乡基干队、赤卫队，全琼有革命武装七八千人，琼崖的武装斗争进入全盛时期。

### 红色娘子军传奇

在琼崖几千年文明史上，妇女的地位是十分低下的。她们连正式的名字都不能有，小时叫什么“阿大”、“阿二”，出嫁后则以娘家地名称呼，如“嘉积嫂”、“文昌嫂”、“定安婆”……，家谱和墓碑上用娘家姓称某氏。然而，随着革命的发展，琼崖广大城乡普遍建立了基层妇女解放协会，广大妇女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她们迸发出高度的革命热情，勇敢地向封建宗法制度、伦理观念提出了挑战。她们剪去长发辮，扔掉裹脚布，冲出家门，走进学校和识字班，学习新文化、新思想，破天荒地像男人一样取了自己的名字。

琼崖独立师成立后，为了满足妇女强烈要求参军的愿望，1931年3月，中共琼崖特委批准，先在乐会创建“乐会县赤色女子军”一个排，由乐会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直接指挥。琼东、乐会、石宁一带苏区的妇女受此影响，也积极要求参军。于是，琼崖特委决定成立“女子军特务连”，正式划归独立师第三团建制，这就是闻名中外的“红色娘子军”。消息传开后，苏区妇女奔走相告，马上有数以百计的青年妇女报名参加红军，后经组织严格审查批准，共有100名精干的女青年成为光荣的娘子军战士。

5月1日，在乐会县第四区赤土乡内在村的红军操场上，召开了万人大会，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

军特务连，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的第一支女子军连队，也是琼崖有史以来第一支妇女武装队伍。女子军特务连采取三三建制，全连三个排，每排三个班，每班10名战士，连长为庞琼花，指导员王时春，一排长冯增敏，二排长庞学莲，三排长黄敦英，全连共103人，除了两名年纪较大的庶务、挑夫和一名小号兵是男性外，其余都是苦大仇深的农村妇女。

红色娘子军成立后，师部委派女教官王少梅指导军事训练。她们不怕苦，不怕累，经常在烈日下摔打滚爬，苦练杀敌本领，军事素质提高很快，涌现出不少神枪手。师部给娘子军的任务是站岗、放哨，保卫红军师部和苏维埃政府领导机关，看守犯人，必要时也配合红军主力作战。由于当时敌人经常进犯，战事频繁，红色娘子军先后参加了攻打文市、学道、中拜、分界等战斗。特别是在沙帽岭战斗中，红色娘子军机智灵活地配合了团主力作战，打出了军威。

当时，驻乐会县中原镇的国民党乐万地区“剿共”总指挥陈贵苑，经常领兵袭击乐万苏区。红军第三团决定诱敌深入，加以围歼，便于6月16日大张声势离开乐会苏区向万宁县城进发。但当天夜里，又悄悄撤回来，埋伏在中原镇通往根据地的必经之道——沙帽岭的峡谷山林里，娘子军担任正面阻击敌人，诱敌人深入的战斗任务。敌人不知是计，27日，果然兵分两路气势汹汹地向根据地扑来。当看见红军阵地上全是女兵时，他们得意忘形地狂叫：“谁抓住女兵，就赏给谁当老婆。”面对猖狂的敌人，战士们一面沉着应战，一边按计划伪装退却。当敌军做着美梦进入红军主力埋伏圈时，突然遭到红军猛烈打击，顿时乱成一团。陈贵苑慌忙组织突围，但已经迟了，在绝境中一个个成为红色娘子军的俘虏。另一路敌军听到枪声大作，慑于红军威力，知难而返。这一仗，红军毙敌100余人，俘敌70余人，缴枪146支，子弹1000多发，这次作战，以连为单位计算缴获数量，娘子军排名第一。从



此，娘子军的英名传遍全岛。

随着红色娘子军声威大震，苏区妇女更加羡慕娘子军，要求参军的妇女越来越多。特委决定将女子军特务连从乐四区调往琼东四区，在红军独立师师部担任警卫任务，归红一团建制，抽出一个排，吸收女青年扩编为女子军特务连第二连，归红二团建制，由黄敦英、庞学莲分别担任连长和指导员。下辖两个排，约60人。一排长由李占香担任，二排长由王振梅担任。

红色娘子军除了担任作战任务外，平时还配合当地苏维埃政府到各村开展活动，是一支十分活跃的宣传队。他们经常深入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启发群众觉悟，动员亲人参军参战。并且还向民团家属宣传党的政策，通过家属动员团丁向革命队伍靠拢。由于她们勤奋积极的工作，经常受到上级嘉奖。

不幸的是，在琼崖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中，娘子军战士大部分英勇牺牲了，一部分失散了，连长、指导员等被俘人狱，第一连、第二连先后解体。这支组织完整，纪律严明，作战勇敢的妇女武装队伍，尽管战斗历程只有一年多时间，但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史上的创举，也是世界妇女争取解放斗争的光辉典范。红色娘子军为唤起当代妇女的觉悟，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 二 峥嵘岁月

### 革命摇篮——母瑞山

琼崖革命根据地的恢复和扩大，苏区土地革命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和仇视。1932年春，杀人魔王陈汉光率领所属三个团一个特务营，在空军第二中队一个分队的配合下，向琼崖苏区和红军进行第二次大规模“围剿”。明媚的南国春，被战神拖进了火与血的狂涛里。

国民党集中强大兵力，步步紧逼，向苏区压缩。飞机掠过田野和村庄，几乎贴着椰林树梢，发出刺耳的轰鸣怪叫声，朝红军阵地俯冲下来，肆无忌惮地扫射和轰炸。炸弹的巨大爆炸声在山谷中久久地回响，大地在颤动着。

在情况万分危急的时刻，琼崖独立师日夜兼程，从四面八方向母瑞山集拢。母瑞山是五指山东延的一支山脉，面对着海南岛的重镇嘉积市，山顶终日云雾缭绕，树林遮天蔽日。1927年，海南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火种在这里得到掩护，又从这里掀起革命的狂澜，冲击着反动的统治。如今，琼崖的革命战士又要在这里和敌人周旋。

敌人把母瑞山重重包围起来，妄图把红军全部消灭在这片千年老林中。激战不分昼夜地持续了十几天，敌人无法攻上山，但也没有撤退的迹象。

在断断续续的枪炮声中，琼崖特委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情况很显然，敌人竭其全力来围攻红军，目的在于与红军主力决战。如果死守母瑞山，孤军奋战，最终会陷于弹尽粮绝境地。特委决定由独立师师长王文宇、政委冯国卿率主力部队突围，分散敌人，击破敌人对母瑞山的围困。

夜里，留守山上的特委书记冯白驹，苏区政府主席符明经，秘书长王业嘉等领导同志久久地站在山头上，听着突围方向发出的爆豆般的枪声，看着那拖着长长的红尾巴的流弹飞舞。干部战士没有一个人合眼，谁能不为自己同志的安全而担心呢！

第二天，阳光普照大地，山下没有了枪声。四周静悄悄的，母瑞山像是疲劳的母亲要睡觉了。远方，处处椰林成荫，宽大的亚热带植物，婀娜地摆着叶子；稻田郁郁绿如绒毯，微露的村庄隐现在椰林之中。可是，这如画的春色，却再也看不见放牧的牛羊，找不到耕作的农夫……

坚守山顶的红军战士把希望寄托在突围部队的身上，期待着

好消息的到来。5天过去，10天过去了。每天，太阳从东海边升起，到被西山吞没，山顶上都有翘首企盼的战士。然而，椰林山岗，稻田村庄，甚至连万泉河流水也越来越显得暗淡无光，母瑞山像一个负伤的巨人，偎依着五指山，在悲愤沉思。

三个月过去了，主力部队没有派人回来联系。可山下的村庄却一村接一村地腾起了滚滚浓烟。村旁、路口，到处是一队队如狼似虎的白军。他们用刺刀威逼着一群群扶老携幼的乡亲，离开他们祖辈生息的家园——敌人企图挖掉红军的根！

同时，大批的国民党军穿林攀岩“搜剿”山上的红军。他们又鸣枪又呐喊，到处都是恶魔的嗥叫。然而，红军熟悉这里的沟沟坎坎，每块岩石，每条小径和那不见天日的椰林深处，都是他们的天地。敌人被红军拖得山前山后打转转，却对红军无可奈何。

有一天，山涧传来走动的声音，越来越近。

“谁？”红军哨兵压着嗓子问。

“我……是三爹。”

“三爹？”战士们一拥而上，迎着这位随主力突围的老同志。大家迫不及待地问：“师长和政委他们呢？”

三爹不答话，用手捂着脸，无声地哭了。大家都熟悉这个铁汉子，多少年来这是第一次看见他哭。

好久好久，三爹才低沉地叙说起来。原来红军主力突围未能奏效，途中被敌人前阻后击，一部分被打散了，一部分突不出重围牺牲了。政委冯国卿下落不明，师长王文宇突围到乐会后，不幸被俘，壮烈牺牲了……

这是大家最不愿相信的事实，却真真切切地发生了。

为了改变与外界隔绝，被动挨打的局面，冯白驹、符明经、王业喜等一致决定派少数同志分批下山，了解情况，收容失散人员，同各地隐藏的党组织取得联系，重新聚集革命力量。

第一批被派下山的是冯裕深和他带领的十多名精悍的战士，

但时间一天天过去，却得不到他们的消息，这样只好派第二批人下山，可是一个多月过去了，仍然杳无音信。特委领导只有横下心，派出第三批，第四批……黑夜里，山上的同志常常静静地谛听着周围的动静，但除了敌人打更的怪声和野兽的嚎叫，根本听不到自己人的口哨声，击掌声。

再也不能派人下山了，100多人的队伍，到年底只剩下冯白驹、符明经等26人。

这26个革命战士，在椰子肥豆蔻香的宝岛上，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过起了人类史前的生活。

首先是粮食的变化，起初每天每人分一个拳头大的饭团。后来逐渐变成每人一椰壳碗稀饭，稀饭又变成锅巴煮的清汤，以后，清汤也没有了，分到大家碗里的只是飘着几片野菜叶的汤水。

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大家找到一块苗家人“刀耕火种”的番薯地，薯藤已被野草和灌木淹没了，看来是很久没人来料理。从此，每天夜晚大家都去挖番薯。放好警戒，挖了就跑，不留一点痕迹，这样熬过了两三个月，大家都觉得那是段快乐的时光。

番薯吃完了，三爹带着两位女同志——炊事员李月凤和冯白驹的妻子王惠周漫山遍野寻找食物，凡是能进嘴的，他们都尝尝，能填肚子的就挖起来。没有敌人搜山时，大家就分散到山沟里去摸鱼虾，捞青苔和浮萍，爬到树上采野果，掏鸟窝，采蘑菇，摘木耳，割野笋等等，大家的的生活似乎在一月之间倒退了好几千年。

战士们发现一种茎软叶嫩，类似于蚕豆的植物，味道很好。以后它就成了红军的主食。大家天天采它，顿顿吃它，26位干部战士一致同意给这种野菜取个名字，叫“革命菜”。原因就在于在最艰苦的时候，它挽救了大家的生命，支持了革命的事业。

秋天来了，这是海南的台风季节，台风次数频繁，风势狂猛。每当飓风刮起的时候，雨借风势，风助雨威，大家盖的茅草屋一下就倒了，飞得无影无踪。这个时候，大家便紧紧地抱在一起，挺

立在狂风暴雨中。

秋去冬来，饥寒交迫，由于长期的磨难，每个人身上的衣服成了不打结连不到一起的破布条条。恰如古人说的“串得钱，包不得米”。大部分人的肩膀露在外面，有的光着屁股。王惠周和李月凤更是难为情，只穿着男同志给她们的裤衩。实在没有办法，大家就像千年老祖宗那样，摘树叶剥树皮，连在一起，披在身上。男同志披的树皮像古代骑士的盔甲，女同志穿起名符其实的“百叶裙”。大家走动起来，又笨重又刷刷响，好像是一群穿山甲。

但是偏偏在最冷的日子，火柴用光了，火种也被雨淋熄了。关键的时候，大家又一次捡起祖先的方法——燧人氏钻木取火。总算是天不绝人，火被钻出来了。从此，保存火种就成了大家重要的任务。

有谁会想到呢？在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里，在开化最早的 中国，会有这样一群手擎红旗，顽强地活着的“现代野人”。

### 笛声悠悠

愈艰苦，大家就团结得愈紧，母瑞山上的26个人就像兄弟，26颗心紧紧连在一起，没有一个人感到害怕，也没有一个人灰心，在冯白驹等人的领导下，生活得苦中有乐。每天上午是学习时间，由冯白驹系统地讲说中国革命问题。中午，女同志动手做饭，此时王惠周和李月凤成了最忙的人，打柴、挑水、淘米和挖野菜，还要用芭蕉叶把锅灶圈起来，以免暴露火光。

森林里到处湿漉漉的，火不容易生着，冒着刺鼻呛喉的白烟，就是不起火苗。李、王两位女同志，一边一个，两腿跪在地上，曲起身子，把头伸向用三块石头架着的铁锅下，鼓着腮帮子，呼呼地猛吹，火吹着了，她们的眼泪也流干了。

饭做好了，炊事员李月凤就成了指挥员。她要大家拿出椰壳碗，站好队，挨个分。分到最后，她和王惠周用勺子刮得锅底刷

刷地响，没有任何东西了，就兑上点水。她们常常这样，用刷锅水来哄自己的肚子。

下午的时间，有时采野菜，有时讲故事，主要由符明经负责。这位学问渊博，读过大学的革命战士，肚子里总有讲不完的故事，古今中外，应有尽有，时间就这样悄悄地打发过去了。

黄昏以后，是大家的文娱活动时间。王业喜自上山那天，就一直带着一只笛子，最紧张的时候他也没有丢。夕阳西下，他往地上一坐，背倚大树，就吹了起来。笛声清脆悠悠，动人心魄，使人感受到对胜利的向往和对生活的热爱。

警卫战士环忠和冯白驹、王惠周，都会唱几句京戏，伴随着王业喜的笛声，情不自禁地引吭高歌起来，符明经连忙用竹棒敲击椰碗，打起了节拍。有时，不会唱戏的他也会被大伙推上台，南腔北调地唱起来，逗得大家捧腹大笑。大伙总是有许多唱不厌的歌曲，唱着唱着，全体帮腔和声，载歌载舞，尽兴而眠。

### 东山再起

1933年春，冯白驹、符明经、王业喜等琼崖党政领导人，为了摆脱越来越险恶的困境，决定突围下山，另谋发展。

春节期间，趁敌人疏于防备之机，冯白驹一行在夜幕的掩护下，成功地穿越了敌人的封锁线，向澄迈县转移。经过两个晚上行军，队伍到达李月凤的家乡。按照事前商定，大家躲在山林里，派李月凤去联络好，然后再出来。

李月凤理了理自己散乱的长发，充满信心地进村去了。那天正是元宵节，大家都幻想着月凤找到党的组织，然后举杯庆祝一下。

但是从日出到日落，从黄昏到深夜，总看不到李月凤的影子，为防止意外，队伍只好向深山地区转移隐蔽。留在原地等候的同志再也没有等到自己的战友；原来，月凤被坏人告密，不幸被捕

遇难了。

情况骤然变得严峻起来，冯白驹当机立断，马上带领队伍重返母瑞山。

在山上又过了一个多月的原始生活，1933年4月的一个黑夜，这批革命志士依靠北斗星的指引，历经四个艰难的夜晚，终于到达琼文县长泰村——冯白驹的故乡。

村中的革命群众见到他们，有如喜从天降。这一夜，冯白驹他们吃到了一年多来的第一次饱饭。在群众的掩护下，他们安全地在村外潜藏下来。

当时，琼文县委领导人，连同机关干部、勤杂人员和区、乡干部共20多人，主要活动在塘内、锦山、加丙、昌城等村庄。他们藏身山村，每人一支手枪，一张毛毯、一把雨伞、一条缠腰水布，供避雨防风御寒之用。他们昼伏夜出，忽东忽西，与敌人周旋。自李汉等下山到琼文后，县委知道山下的情况，推断冯白驹等必将脱围下山，因此也在不断探听情况。

半个多月后，通过冯白驹的两个堂弟四处联络，冯白驹等终于同当地党组织会合，革命的火炬又燃烧起来了。

1933年6月，琼崖特委在琼文县塔市乡茂山村召开临时会议，确定当前的中心任务是：一方面尽快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另一方面分头到各地，寻找失散的同志，恢复党的组织和红军队伍，开展武装斗争。会议还作出四条决定：“一、把20名武装同志组成四个小组，分散到各县去活动，查找失散同志，恢复革命工作，并找机会打击反动派。二、派一些同志，以各种职业为掩护，到琼崖西边的新区各县去，开辟新区工作。三、琼崖特委由冯白驹和琼山县二三位同志坚持在琼山指导工作。四、注意在群众中组织地方武装队伍，看具体情况以村或联村为单位，组织班、排、连，在必要时也可以集中起来，打击国民党区乡反动武装。”

这次会议之后，琼崖特委首先在琼文地区开展恢复工作。琼

文邻近府（城）海（口），紧靠着敌人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敌人控制得很严，反动势力十分嚣张。加上当时经常有敌人冒充革命干部和红军，蒙骗杀害群众，使群众一时难以区分真假，不敢轻易和红军联系，给恢复重建党组织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为此，特委反复强调，在恢复工作中，一要大力揭露敌人的阴谋，做好群众的宣传发动工作，二要把恢复工作同武装斗争结合起来，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镇压国民党反动军官、民团团丁、土豪地主、反动区乡长等，狠狠地打击敌人的反动气焰。冯白驹用“不是山藏人，而是人藏人”的道理来启发教育大家，认清党和群众建立鱼水关系的重要性。

派往各地工作的同志，遵照特委的指示，白天潜伏在山岭、森林中，夜间出来开展活动。他们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宣传发动群众，联络隐藏在各乡村的党员和红军战士，积极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活动。他们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看准了时机，就给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游击队积极活动，使革命群众看到红旗没有倒，信心大增，失散各地的革命同志也闻讯归来，还不断有群众要求参加队伍。到年底，琼文县就先后恢复和建立了3个区委和30多个支部。

为了开辟琼西南新区的工作，符明经、王业喜等人亲自参加临时工作委员会，赴琼西南指导工作。根据特委的决定，各人以做生意、当裁缝、收购旧银器等职业为掩护，收拢失散的同志，组织武装力量和发展党组织，逐渐打开了局面。

与此同时，中共琼崖特委还想方设法与乐万地区的党组织接上关系。特委派出的工作人员以开设杂货店、饭店为掩护，设立联络站，联系失散的干部战士。

琼崖特委与中央的联系，也历经了许多波折。1932年，琼崖和党中央失去联系后，特委就多次派人渡海北上寻找中央和省委，直到1935年春才辗转与党中央接上联系。同年夏天，特委接到中



央“关于抗日讨蒋工作指示信”，针对形势的变化和中央的精神，琼崖特委确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恢复和发展党的各级组织，努力开拓新区，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号召群众起来抗日讨蒋，扩大红军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到1936年初，全琼各县的党组织大都恢复起来。

随着琼崖革命斗争的恢复和发展，全琼急需有一个统一的坚强的红军战斗指挥机关。1936年5月，在中共琼崖四届五次扩大会议上，琼崖红军游击队司令部诞生了，由朱运泽任司令，王白伦兼任政治委员，下辖七个支队，每个支队七八个人，多的十余人，都是勇敢善战的骨干队员。到1937年5月，全琼游击队发展到60人，还有“在业红军”约200人。这支队伍的建立，为琼崖党组织和红军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全琼人民投入伟大的抗日战争，作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 三 为复兴民族而抗争

#### 谈判桌上的较量

1937年6月，冯白驹赴香港向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请示汇报工作。南委负责人薛尚实和中央派驻广州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云广英会见了冯白驹，介绍了当前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系统地传达了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指示琼崖特委结合当前形势，为在琼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同时告诫琼崖特委，在战斗中要提高警惕，不要轻易下山露面，以防止红军被国民党吃掉。

根据这个指示，琼崖特委就国共两党团结抗日问题向全琼人民发表了公开的《团结抗日，保卫琼崖》的告同胞书。同时，主动向国民党当局写信，提出以民族利益为重，停止内战，团结抗

日的主张，表示在此前提下，愿为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取消琼崖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地方抗日部队，以致力于琼崖抗日保乡事业。信中建议双方派出代表谈判，要求琼崖地方当局在报纸上作公开答复。在中共琼崖特委反复催促和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压力下，琼崖国民党当局在报纸上公开答复，同意共产党的倡议。1937年8月，琼崖红军派出乐万县委书记黎民（即李黎民）为代表，前往府城与国民党代表一五二师政训处主任林序东进行谈判。

谈判一开始，黎民就明确说明了琼崖特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方针和决心，诚恳表明我党我军积极要求参加卫国保乡的殷切愿望，并具体提出了琼崖特委关于改编红军游击队的具体条件，即：（一）国民党停止进攻红军，停止逮捕共产党人；（二）红军改编为地方性抗日部队；（三）红军改编后，保持独立性，不同国民党军队混编；（四）红军改编，有单独的防区；（五）红军改编后，当局应视国民党军队一样发饷、发粮、发被服和各种军需用品；（六）给改编后的红军补足枪支弹药和各种装备；（七）改编后的红军旨在琼崖抗击日本侵略者，当局不得以任何借口将其调离琼崖。由于国民党方面对谈判缺乏诚意，在听取了黎民的几条后，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回答便宣布休会。

不久，琼崖国共两党举行第二轮谈判。在谈判中，林序东提出要冯白驹先把部队拉出来点验，待确知琼崖红军的人员、装备情况后，才能谈条件。黎民当即批驳了国民党当局的无理要求，严正声明：要先谈妥主要条件，双方签订协定，红军才能出来接受改编。在举行第三轮谈判时，林序东老调重谈，坚持要红军先拉出来再谈条件，并公然造谣说有人控告红军抢劫，扰乱社会治安，如果红军再迟迟不出来，国民党当局就不能置之不理，等等。

黎民针锋相对地批驳了对方的无理要求，并驳斥了国民党的造谣诬蔑，重申红军对谈判的态度：（一）中共琼崖特委对贯彻中

共中央关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对国共合作抗日是真诚的；（二）必须先谈妥条件，双方同意并签订了协定，琼崖红军才能拉出来改编；（三）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红军愿意与当局继续谈判，当局什么时候改变无理要求，郑重其事地谈判，红军就什么时候来谈，随时等候通知。

为了及时掌握谈判情况和指导谈判斗争，冯白驹于9月间从特委所在地迁到琼山县塔市乡演村的一位农民家里。10月间，国民党当局闻讯，竟然逮捕冯白驹夫妇，妄图以此为压力迫使琼崖特委让步，以获取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

国民党非法逮捕冯白驹的真相公诸众后，舆论大哗。中共中央也迅速采取营救措施。周恩来、叶剑英亲自与国民党中央和广东军政当局交涉，要求无条件释放冯白驹，恢复谈判。琼崖各阶层民众和海外琼侨也对这种卑劣行径异常愤怒，纷纷举行游行示威，提出强烈抗议。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在12月命令琼崖国民党当局无条件释放冯白驹。

冯白驹出狱后，1938年1月，被委任为全权代表，同国民党重开谈判。谈判一开始，双方又围绕着红军改编后独立自主等问题展开了争论。国民党提出要把琼崖红军改编为一五二师陈章部下属的一个特务营，直接受该师指挥，企图将红军“溶化”掉。继而又提出把琼崖红军改编为他们守备司令部属下的一个大队，接受他们的指挥，目的仍然是吞没红军。冯白驹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据理反驳了对方的无理要求。由于国民党当局坚持顽固立场，双方谈判久拖不决。

1938年下半年，侵华日军的矛头已经指向琼崖。9月24日，日机轰炸了海口、府城，9月30日，日本军舰窜犯海岛南端的榆林港。就在日军入侵迫在眉睫的紧要关头，国民党把驻琼正规军调离琼崖，由广东省保安第五旅接任防务。旅长王毅深知琼崖守备力量十分薄弱，因此，当冯白驹再次与之直接谈判时，在琼崖

红军的改编问题上，他同意了琼崖特委的原则要求，红军在独立自主的大前提下也做了一些让步。

1938年10月22日，琼崖国共两党终于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其主要内容有：（一）琼崖国共合作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抗日；（二）琼崖红军取消番号后，编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在政治组织上保持独立自主；（三）独立队为一个大队建制，下辖三个中队，冯白驹为独立队队长；（四）独立队队部设一政训处（室）；（五）国民党当局按一个营的编制每月发给独立队军饷8000元。协议文稿由琼崖国共双方最高领导认可后，由冯白驹和杨永仁代表双方签署。

至此，经过一年多复杂斗争的琼崖国共两党谈判宣告结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琼崖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

## 出 征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日本飞机军舰频繁地窥视海南岛，琼崖危在旦夕。琼崖特委积极进行红军改编工作，决定按一个大队300多人枪的建制来改编红军队伍，队员以原琼崖红军游击队为骨干，不足部分由各县委输送地方武装加以补充。

12月5日，各地红军游击队集中在琼山县云龙墟，举行隆重的改编暨誓师抗日大会。部队番号正式称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队长冯白驹，副队长马白山，政训室主任张兴，政训员黎民。琼崖特委选择琼（山）文（昌）公路干线的云龙墟及其附近乡村为独立队驻地。这一天，云龙墟上热闹非凡，到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独立队的全体官兵，全副武装，精神抖擞，在六月婆庙堂前的宽大场地上排成三列横队。来自各地的上万名群众和各界爱国人士，纷纷携带慰问品、锦旗，敲锣打鼓前来祝贺。写着“抗日先锋”、“人民救星”的锦旗彩匾挂满了一路，爆竹声、锣鼓声、欢呼声彼落此起。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王

毅、副司令杨永仁和琼山县县长云振中也参加了大会，并向独立队队长冯白驹授军旗。冯白驹代表全体指战员讲话，他激昂地说：我们决不辜负琼岛 300 万同胞的期望和重托，誓死抗日，保卫琼崖。

从此，独立队在琼崖特委的领导下，执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方针，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发动群众，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广泛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战胜利时，这支由 300 人改编的队伍发展为一支拥有 7 000 人枪的劲旅，成为琼崖抗日的先锋和中流砥柱，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

## 第八章 红旗不倒

大别山，绵亘于鄂豫皖三省交接处，从这里南控大江可威逼宁汉，北向豫皖而俯瞰中原，历来是兵家囊括大江南北，逐鹿中原的必争之地。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鄂豫皖优秀儿女，把红旗牢牢地插在大别山上。其间，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如同一幅巨型画卷，每一个角落，都用热血谱写着生命的辉煌。

### 一 艰苦的历程

#### 相拥送别主力军

1934年11月10日傍晚，在河南光山县西南的花山寨，出现一幅不同寻常的景象。从四面八方奔来的红军首长，满脸的严肃，连平日里最爱逗乐的警卫员，此刻也不苟言笑，紧跟在首长后面，匆匆跨进一栋不起眼的瓦房。

略显拥挤的房间里，赫然坐着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人物：徐海东、吴焕先、郭树申，还有中共鄂豫皖省委的其他领导人：省委书记徐宝珊，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中间，还有一位不远千里从中央苏区赶来的贵客：程子华。待大家稍事安静后，身患重病的徐宝珊宣布中共鄂豫皖省委第十四次常委会开始。他略微镇定了一下情绪，向大家介绍说：“这位是中央派来的程于华同志。他给我们带来了党中央的新精神和重要指示，这关系到我们今后斗争的方向和出路。今天主要的任务就是讨论这个问题。先由子华同志传达一下中央的精神和指示。”

大家的目光集中到一直沉默着的程子华身上。他站起来，迎着大家坚定的目光，说道：“中央派我到苏区来，送来了两个文件：一是《关于组织抗日先遣队的通知》，二是《致鄂豫皖省委的训令》。临行前，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对我说：‘中央决定了，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样，部队就能得到发展，同时也就能把敌军主力引走，减轻苏区的压力。根据地的敌军减少了，留下的部分武装就能长期坚持，也就能够保存老根据地。’”说到这里，程子华顿了一下，环视了一下他未来的战友们，然后接着说：“关于新的根据地如何选择，周副主席强调，要选在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我党在群众中有较大的革命影响，或者那里的群众容易争取，要具备便于我军作战、防御的地形和较充足的粮食及其他物质条件。”说完，他依旧平静地坐下。

听完程子华的传达，徐海东和吴焕先对视了一下目光。他们对这个决定并不感到突然。今年开春以来，省委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实施开辟边沿地区的方针，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经验，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鄂豫皖苏区被层层包围的形势。因此，中央对鄂豫皖形势的分析，对保存老苏区创建新苏区的指示，无疑给他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会议经过认真讨论，一致拥护中央的决定，认为鄂豫皖主力红军当前的任务是“保全我们的活力，保全我们的队伍，创造新苏区、新的根据地，整理、锻炼、巩固我们的力量，创造出新的主力红军，同时扩大开展游击战争，为恢复原有苏区而斗争。”会议决定省委率红二十五军相机突破平汉线，离开鄂豫皖，实行战略转移。

11月13日，红二十五军西行到达罗山县何家冲一带，省委又召开会议，为战略转移做最后的准备。决定将鄂东北道委的西路军（原罗山独立团）补入红二十五军，部队进行整编，撤销师一级建制，部队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程子

华为司令，徐海东为副司令。同时对坚持鄂豫皖苏区的斗争作了重要安排：决定留下红二十五军手枪团一个分队，原七十四师两个连队，豫鄂边红八十二师两个营及各地方武装约2000人，由高敬亭（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领导，于适当时机重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苏区斗争。由于高敬亭尚在豫皖边工作，所以省委会议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工作还安排了第二套方案，以备一时找不到高敬亭时，能够使省委精神得到及时贯彻。

11月16日，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由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次日，于东双河与柳林之间全军越过平汉铁路。鄂豫皖人民又一次送走了自己的主力部队，苏区开始了历经千难万险的游击战争。

送别子弟兵的第二天，即1934年11月17日，鄂东北道委在罗山县金竹林一带的深山沟里召开干部会议。会议由省委临行前指定的道委书记王福明主持。看着大伙凝重的脸色，年过半百的王福明笑呵呵地问道：“同志们，红二十五军长征走啦，不过地方上还有很多同志。你们害怕吗？”愿意陪着我这个老头子坚持下去吗？”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愿意。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王福明接着说：“对。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要把红色的尖刀，插在敌人的心脏上！”“今天，红二十五军离开我们，是执行党中央的命令，是为了北上抗击日寇。大家都应当正确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胜利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这次会议，揭开了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的序幕。

会后，道委停留在天台山到凌云寺一带的大山里，领导地方武装在豫东南和鄂东北地区，特别是在罗山至汉口的公路沿线袭击敌人，进行反“清剿”斗争。为了策应二十五军西进，道委命令罗陂孝特委组织力量，牵制敌人。为此，罗陂孝特委将罗山、经扶两县仅有的地方武装组织成三个游击队，破路袭扰，目标就是把东北军两个师钉在罗（山）汉（口）公路上。在特委副书记何



耀榜的率领下，游击队取得当地木工的支援，破坏了罗汉公路上的发模墩公路桥，并击毁敌军卡车 12 辆，国民党军被迫从信阳抽调一个骑兵团驻守公路南段，以保护交通运输。

鄂东北道委和罗陂孝特委，还根据省委的指示，将罗山教导团、光西战斗营及部分轻伤员和革命群众，共五六百人，第一次组建罗山独立团，从而使鄂东北道委有了直接指挥的基本武装。1934 年 12 月下旬，这支组建不到一个月的红色武装，在少共道委书记方永乐和团长陈守信、政委徐成基的率领下，从经扶的茅草尖出发，踏上了转战皖西寻找高敬亭，向他传达省委指示的征程。

与此同时，作为留守边区，坚持游击战争的两支骨干队伍——红二十五军手枪团一个分队，七十四师两个连、担架队、八十二师两个营及三路游击队，也历经艰辛向皖西靠拢，寻找党的组织。

七十四师的两个连队和担架队，是护送伤员后与主力失去联系的。当时正值红二十五军与敌四十七师在英（山）太（湖）交界的陶家河进行激战，当他们完成护送任务返回驻地时，敌人已占领陶家河。

军队转移了，主力不知去向。此时战士们拼命向南追赶主力，但走出 50 余里，也不见主力的踪影。于是，这支部队以三个连的建制合成完整的一个营，在凉亭坳一带打游击。一个星期后，返回皖西苏区。

指战员们怀着急切的心情，越过重重山岭，穿过道道封锁线，经鹞落坪、团山、莲花山等地，转战七昼夜，历程数百里，最后渡过史河，在南溪附近的蔡家祠堂找到中共皖西北道委，见到了道委书记高敬亭。高敬亭当时并不知道红二十五军北上长征的事，所以他对七十四师的战士们说：红二十五军转移到鄂东去了，你们暂时就地坚持斗争，等候主力回来再归队。也许谁也没有意识到，坚持大别山红旗不倒的重任，就要落到这群肩膀略显稚嫩的指战员身上。

留在皖西的红八十二师，当时配合主力部队在霍邱、卞安一带作战，然后将80名伤员护送到赤城（今金寨县境）熊家河老苏区安置。到达目的地后，高敬亭召集八十二师师长周世觉和三路游击师师长高克文一起开会研究，决定由周世觉指挥部队前往霍（山）舒（城）潜（山）地区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三路游击师随同行动。

在动员会上，面对坚毅的红军战士，周师长说道：“现在敌十一路军，二十五路军和张学良的一〇六师、一〇八师数万兵马，在我们赤城、赤南两县南北百十里，东西四五十里的一块苏区周围修筑碉堡，设下层层封锁线。敌人天天进攻、清剿，把整个老苏区烧、杀、抢、掠一空，剩下少数的乡亲没有饭吃，没有房住。我们的伤病员和后方机关人员也缺粮少药。形势紧张，斗争艰苦。现在我们就是要打到敌人后方去，一是为了牵制和分散围困皖西苏区的敌人兵力，二是要开辟新的游击战争地区。”听到这里，部队群情激昂。干部、战士纷纷表示：“打到敌人后方去，多消灭一些敌人，为苏区父老兄弟姐妹报仇！”

经过一天的休整，士气高昂的八十二师出发了。在周世觉师长的率领下，经狮子口渡过史河，突破老牛背封锁线，穿过霍山县境抵达潜山县衙前、天堂畈、小河南地区。

这一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是，地主的暴敛横征，使广大农民生活无着，矛盾十分尖锐。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红军一举攻克衙前街（今岳西县城），接着又歼灭潜山县保安团的一个中队，俘虏中队长以下30余人，缴枪30余支。衙前街的街头巷尾热闹非凡，人们沉浸在一种从没有过的欢乐之中。

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部队在天堂畈地区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建农会，反动势力为之一扫。

11月中旬，部队挺进舒城县境，攻克晓天镇，所获甚丰。红军战士个个喜笑颜开，满载胜利的果实，回到熊家河老苏区。

12月初，部队进抵霍山县长山冲。长山冲位于大别山南麓，四面环山，东西南北大约七八里的平畈，比较富饶。周世觉师长命令部队休息两天，打土豪，筹粮食，每人要带7至10天的粮食回苏区。第二天下午，潜山地下党组织派来两名交通员追赶到八十二师驻地，向周师长报告敌情：敌十一路军有两个团正在红军后面追击，先头部队已进入西界岭号房子。周世觉立即召集三路游击师师长和二营营长、政委来师部研究行动计划，决定部队把粮食装好（那时每个指战员都备有一条能装15至20斤粮食的布口袋），抓紧时间休息，准备撤离。

不幸的是，部队在离开长山冲不久，就遭到优势敌人的围歼，伤亡惨重，周世觉师长阵亡。突围出来的战士，与三路游击师和手枪队会合，由高克文接任指挥。清点人数时，三路游击师只有130多人，八十二师只剩100来人了。大家站在山顶上，望着远处黑幕弥漫的山冲，怀念倒在血泊里的战友，默默地向他们致哀、告别，大家都在心底里发誓：“一定要为死难战友报仇！”

疯狂的敌人妄图彻底扑灭突围出来的红军，半夜调动了三十二师九十五旅，第二天赶到前后畈、横溪山等地区，包围搜剿。鄂豫皖“剿总”还特意颁发了一道“围剿”令，谓“伪八十二师残存主力约二三百人，在长山冲受重创后，溃退至前后畈方向，特饬各路追堵部队限本周内聚歼。”此时，红军早已突出敌人包围圈，转至龙门冲与莲花山之间的地区，重与高敬亭部会合了。

### 凉亭坳：重新燃起星星之火

1934年12月下旬，高敬亭在熊家河召开道委会议，决定整编部队，将长山冲突围归来的部队，与七十四师的两个连队，组成红二一八团，下设一、二营和担架队，由罗成云任团长，熊大海任政委，全团约800人。选择熊家河作为开展游击战争的立足地。

熊家河地处大别山北麓，四周群山重迭，史河穿流而过，十

分偏僻。国民党有重兵屯驻金家寨、商城等地，但要进攻熊家河，须翻越层层大山，困难很大；而叶集、开顺街的驻敌，与熊家河根据地又有一河相隔，没有个把旅的兵力，他们是不敢轻易出动的。二一八团正是利用群山和河流的天然屏障，与敌人周旋，凭借山河之险，导演出一幕幕生动、壮烈的活剧。

12月25日，二一八团到下洛山一带打粮，开顺街驻敌独立十四旅约两个营迎面扑来。下洛山并不险峻，但在周围小山丘陵的衬托下，也算得是山高林密，漫流河横贯山脚，向皖西丘陵延伸，这是敌人进山必经之地，二一八团隐蔽在山上丛林中，居高临下，待机破敌。

下午，一营设在背阳山上的排哨，发现敌前卫营跨过漫流河，立即开火，并以轻机枪封锁住桥头，隔断敌军后续部队。敌先头部队向一营阵地发起冲锋，一营用火力压住敌人，然后一个反冲锋，把敌人压缩到山沟里。这时，一营、二营、手枪队、扁担队的战士像一支支利箭，嗖嗖地飞下山，冲进敌阵，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白刃格斗。担架队的战士抡起扁担左右开攻，上下翻飞，小小扁担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只砸得敌人七零八落，大部被歼。敌后续部队见势不妙，慌忙逃回了开顺街的剿穴。

这一仗，红军缴获了敌人大批武器。担架队的战士也甩掉了扁担，换上钢枪，正式成为二一八团第三营，这个“扁担换钢枪”的故事，在时隔60年的今天，依然是当地人民津津乐道的一段历史佳话。

1935年1月21日，东北军一〇六、一〇八两师，偕第二十五路军独五旅前来进犯熊家河。高敬亭率二一八团，经过三天激战，杀出一条血路，撤至熊家河以东小南金的荒山上，次日又连续翻越几座大山才摆脱敌人。当部队到达赤城县的麦园时，已弹尽粮绝，每天只能靠野芹菜填肚子，好在没有一个人叫苦，没有一个人掉队。高敬亭率部队继续向东南方向转移，到达英山陶家河、岳

西来塆河、霍山黄栗杪等地，开展游击活动。

2月1日，红二一八团在立煌县的抱儿山，与转战皖西传达省委指示的罗山独立团会合了，独立团的领导捧出那封沉甸甸的信，交给高敬亭。此时，高敬亭才知道省委已远离苏区，领导苏区人民继续坚持革命斗争的重任已责无旁贷地落在了自己肩上，艰难的历程才刚开始呢！

为了找到活路，高敬亭立即率部向东南方向转移，2月3日到达太湖县凉亭坳。

凉亭坳是个偏僻山镇。高敬亭在金家大屋主持召开干部会议，讨论并做出了两项重要决定：一是将皖西二一八团和罗山独立团合编，重建红二十八军，高敬亭任军政委（无军长），统一领导鄂豫皖的党政军工作。下设八十二师，辖二四四团三个战斗营和一个特务营，并成立军直属手枪团。原红二一八团团团长罗成云任师长，少共鄂东北道委书记方永乐任师政委，熊大海任师政治部主任，余雄任手枪团团长（后为詹化雨）。二四四团团团长徐贤才，政委徐诚基。全军共约1400人。二是发展地方武装，成立四路游击师，在太湖、潜山、霍山、英山四县交界地区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

这次会议使鄂豫皖人民在茫茫黑夜中，看到了星星火光，红二十八军的重建，在危难关头为革命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时逢春节，建军的欢庆，会师的喜悦，使山镇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蒋介石原以为红二十五军一走，就可以在大别山区“砍尽山上树，挖绝红军根”，没想到革命的烈火没过几天就呈燎原之势。面对红二十八军这面重新竖起的旗帜，蒋介石绞尽脑汁，先后派出十多万军队前来围剿，梦想趁红二十八军立足未稳，一举歼灭。这使新的红二十八军一诞生，就遭到敌人残酷的“清剿”、“追剿”、“堵剿”和“围剿”，面临着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

1935年2月13日，一个大风雪天，红二十八军去霍山县境开

辟游击根据地。一路上，敌二十五路军九十四旅在后面穷追不舍。在太阳（地名）又遭到敌十一路军的堵击。前有拦路猛虎，后有跟踪恶狼，仰望南边是千仞雪山，俯视北边是万丈深渊，红二十八军近2000名指战员，被上万名敌军围困在一条狭长的山谷中，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

眼前唯一的生路，就是从南翻越白马尖，突破敌人的重围，从绝境中杀出一条生路。

白马尖海拔1700多米，白雪皑皑，雪天相连，极为险峻。在这种暴风雪的天气里，翻越白马尖，简直比登天还难。但是，已经没有迟疑的时间了，追、堵的敌人在渐渐合围，轰轰的枪炮声也愈来愈密，现在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精神、人的毅力、人的勇气。

一接到号令，后卫营立即改作先遣队，向雪山突围。山上的积雪齐没膝盖，一踩就是一个坑，只有依靠山上的树枝，才能费劲地一步一步地前进。

部队还未全部爬到山头，追兵就到了。子弹、炮弹泼水般倾注在雪山上，炸得山崩地裂，积雪飞溅，留下一个个雪坑。不少战士负了伤，在战友的搀扶下，忍住巨痛，继续登攀。后卫营的战友，依托山间的岩石和树林，阻击敌人，掩护部队突围。这是一场殊死的战斗！风声、人声、枪炮声，汇成一片；白雪、红旗、人流，交织一起，使这场战争显得格外壮烈。而红军战士在突围中表现出的大无畏气概，更是惊天地、泣鬼神！

傍晚时，红军部队突破了重围，全部上了白马尖，一位云游千里的方丈，告诉红军：白马尖是大别山最高的山峰，天晴登上主峰，可望到周围好几个县。看到天鹰般突上峰顶的红军战士，这位世外高人也表现出难以克制的惊异和钦佩。

一会儿，主峰上响起军部联络的号声，部队很快聚集起来。看到战友们身上的硝烟和血迹，回想着刚才突围的情景，许多同志

都激动得哭出了声。在苍茫的暮色中，回望山下敌人蠕动的身影，好像是在哀叹自己的无能为力。

红二十八军在冰雪中连夜疾行 30 里，翻山到达马家河，留下伤病员后，部队又日夜兼程 150 里，于 15 日清晨，到达潜山王庄。在王庄，二十八军顺手牵羊，端了国民党科学管理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余谊密的老巢。2 月 16 日晚，转移到驼岭附近的白果树，高敬亭主持召开军政会议，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红二十八军重建以来，天天遭到敌人的“追剿”和“堵剿”，消耗得不到补充，伤员得不到安置，部队也摆脱不了困境。因此决定成立中共皖西特委，由红二四四团政委徐城基任特委书记，并以二四四团一个连和手枪团两个班为骨干，加上红二十八军部分小战士，共 200 余人，组成二四六团，徐诚基兼政委，留在潜山、舒城、霍山、英山一带创建游击根据地，并统一领导皖西各地便衣队。

白果树会议后，红二十八军转战到霍山县西界岭一带，兵分两路：一路由高敬亭率领二营和手枪团一部分返回赤南、赤城苏区检查工作，一路由八十二师政委方永乐率领一营、三营和手枪团一部分，由霍山、潜山、舒城、太湖一带活动。

连续的突围，不停的行军，战士们最大的奢望，就是能够好好地休息一下。然而，敌二十五路军九十五旅这个红军的死对头，总像疯狗一样跟在屁股后面，非常被动。这种敌迫我走的局面一直维持了一个多月，才得到一个杀回马枪的好机会。

4 月 20 日，重新会合整编的红二十八军，转移到汤池畈东侧的桃岭。高敬亭、方永乐站在岭上一望，觉得这个地形很利于伏击：山高岭险，便于我军阻击，地势狭窄，敌人兵多却无用武之地。他们决定：就让桃岭作为埋葬敌人的坟场吧！

红军战士隐蔽在山间松林里，在大柳树旁架起两挺机枪，专候二十五路军的到来。

敌军骄横轻敌，其先遣部队一到，就想贪头功，根本不等后

续部队的到来，就仓促发起冲锋，当即被红军打死一大片。

敌人错误地认为在正面阻击的部队是红军主力，听到正面阵地上的火力渐渐减弱了，以为红军的子弹打光了。督战的军官挥舞着手枪逼着士兵往上猛攻，可是山势狭窄，敌兵力无法展开，只好密密挤在半山腰上，统统暴露在红军的火力之下。忽然，犹如晴天霹雳，桃岭上杀声骤起，军政委方永乐指挥主力从两侧杀将出来。正面阵地上，高敬亭手执大刀率众与敌人白刃格斗。被围在桃岭上的敌人顿时成了瓮中之鳖，霎时间，鬼哭狼嚎，横尸遍野。

桃岭伏击战，大伤了王牌军第三十二师的元气，打垮了敌第三十二师的3个团，全歼两个营，缴获大批武器装备，不仅给追围堵剿之敌以沉重打击，而且也使蒋介石在三个月内消灭红军的狂妄企图成为泡影。1935年4月24日，蒋介石急电“鄂豫皖剿总”：“查鄂豫皖边区残匪，迭令肃清，现匪流窜如故，日见猖獗，若不速予扑灭，贻患无穷。”同时重新部署两个月“清剿”计划，调集13个师，一个独立旅，共61个正规团，分为三个防区，采取分兵负责的划区“驻剿”和竭泽而渔的“追剿”、“堵剿”手段，对红二十八军加紧“清剿”。重点放在潜山、太湖、舒城、霍山地区，即第三防区。

面对新的严峻形势，高敬亭率领红二十八军千里跃进桐柏山，实行山地游击与平原作战齐肩并进的方针。

### 从山区到平原的游击作战

1935年5月初，高敬亭率领队伍在霍山县黄尾河与徐诚基领导的二四六团会合。面对残酷的形势，军政委决定将主力部队转移到外线，越过平汉路，西进河南桐柏山，待机北上与红二十五军会合，红二四六团则留在皖西坚持战斗。

5月19日，部队经六安、霍邱、固始边界到达罗山县长岗的白石山，与中共鄂东北道委及罗山独立团五六百人会合，编成红



二十八军二四四团，任命梁从学为团长，张生先为政委，并将道委特务一营和二营也编入红二十八军手枪团。稍事停留后，5月22日，红二十八军在礼山县阳平口附近越过平汉铁路，继续西进。这意味着突破敌人的围困，打乱整个“清剿”部署。敌军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调头追赶，其中担任“追剿”主力的是郑廷珍的独五旅。这伙骄兵悍将最为卖力，跟随红二十八军长途跋涉，妄图夺得一个头功。

经过一段时间的行军，西进的红军指战员，认识到北上陕南寻找二十五军困难重重，而且，对于主力长征时，赋予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苏区斗争的艰巨任务，大家也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认为：鄂豫皖濒临长江，是南京之咽喉，二十八军的斗争，犹如插在蒋家王朝心脏上的尖刀，拖住了蒋军十多万正规部队，可以大大减轻主力红军长征的压力。所以，军政委召开紧急会议，确定部队由桐柏山东返鄂豫皖边区。

1935年6月1日，当队伍行进到桃花山棺材沟时，军师首长决定利用险要地势痛击追敌。

棺材沟是个百来户人家的小集镇，是出入桐柏山的门户。它三面环山，一条小路从东南向西北伸进谷底，两侧悬崖峭壁，犹如刀切斧砍，山势险要。这时正值初夏时节，山上浓荫蔽天盖地，是个天然的伏击场所。

6月1日拂晓前，二十八军按计划进入阵地，静候独五旅的到来。早上8点多钟，敌人以一个团的兵力，沿着山谷小道，进入谷底，他们搭人梯、攀悬崖，妄图偷袭红军阵地。二四四团和特务营的战上，镇静待敌。敌人还当没被发现，一个劲地往上爬，直至爬到距二十八军阵地只有二三十米时，二十八军的机枪、步枪猛然开火，手榴弹劈头盖脸向敌群砸去。刚刚爬到陡峭悬崖上的敌人，遭到突然袭击，既无力还击，又无处躲藏。在红军密集火力的打击下，一个个滚下悬崖，葬身谷底，死伤过半。

敌人偷袭不成，妄图依仗优势兵力和装备，不顾极为不利的地形，又以一个团的兵力，顺棺材沟的小街向右侧山梁爬来。刹那间，红军的重机枪吼叫了，敌人一排排倒下去。求胜心切的敌军长官，视士兵生命于不顾，从谷底深入，采取强攻，连续多次冲锋，都被红军两面的交叉火力击退。

下午3时许，不甘心失败的敌军，在督战队威逼下，组织残余兵力，再次向红军阵地猛冲，当敌人前进到距前沿阵地30米时，师政委方永乐一跃跳出掩体，高声喊道：“同志们，消灭敌人的时机到了，冲呀！”

顿时，各种火力一齐向敌人打去。二四四团团长江从学一连甩出五六十颗手榴弹，炸得敌人哭爹喊娘，死伤无数。善于近战的手枪团战士们，一齐杀向敌群，展开了白刃搏斗，终于将疲惫不堪的敌人压到谷底，再也无力组织进攻了。

这时已近黄昏，二十八军趁夜色撤出阵地，迅速转移。

独五旅在棺材沟死伤600余人，二十五路军总指挥梁冠英得知东北军没有派兵增援，为了逃避罪责，竟向蒋介石告了东北军一状：“……六一四团奋勇向棺材沟进击，五十七军何柱国却观望不前，以致……”蒋介石马上电令东北军：“竭力堵击回窜皖西之匪军，否则以纵匪论罪。”东北军和二十五路军之间的矛盾因此而加深。

6月15日，独五旅跟踪红二十八军至光山境内的赛山寨。当时天气异常炎热，敌六一三团扛着笨重武器，一路尾追，又饥又渴，疲惫不堪，途中热晕累死的就有近百人。当他们来到赛山寨南部山脚下时，红二十八军一营先敌猛烈开火，埋伏在小山梁后面的主力部队，立即发起冲锋，以泰山压顶之势，将敌压在山脚下河滩内，歼其大部。敌军团长曹兴文，参谋长刘长荣及营、连军官许多人魂断赛山。

6月18日，不甘心失败的郑廷珍，带着已遭受两次打击的残

兵败将，又追上来了。这时，高敬亭、方永乐等军师首长已选好滕家堡以西15华里处的殷家园作战场，决定三战独五旅。

殷家园地处大别山腹部，山峦重叠，古树参天。红军于头天晚上进入伏击阵地，以逸待劳。这天清晨，郑廷珍率独五旅残部，闯进了伏击圈。红军战士一个冲锋，又将独五旅打得溃不成军，狼狈而逃。

从5月底以来，独五旅被红二十八军连拖带打，三战三败，所属三个团以及配属该旅的一八七团，损失过半，不成建制。梁冠英为此大发雷霆，一怒之下，将该旅残部合编为潘、曹两支队，划归九十四旅高国钧指挥，独五旅从此消失，蒋介石的“二个月清剿”计划也告失败。

红二十八军回到鄂豫皖边区后，1935年7月2日，在安徽省太湖县店前河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会议总结了长途奔袭，调动敌人，打破敌人“清剿”计划的初步经验，这就是：

第一，敌情不明不打，地势不利不打，伤亡过大不打，缴获不大不打的作战基本原则。

第二，鉴于敌人“驻剿”和“追剿”的矛盾，作战指挥的不统一，各部装备和兵力诸方面存在差异的实际情况，红军作战应该以“拖垮二十五路，相机打十一路和东北军，向保安团要补给”为指导方针。

第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作战形式应以游击战为主，辅之以必要的伏击战。在战术手段上要集中比较优势的兵力，利用有利地形，或截其头，或断其尾，采取突然迅猛的手段，穿插分割围歼敌人。

会议还肯定了二四六团和四路游击师在皖西特委和徐诚基领导下，在舒城、霍山、潜山、太湖边界山区，发动群众，扩大武装，打击民团，筹款筹粮，安置伤员，建立党的组织等方面的工作。

店前河会议后，红二四六团仍在原地坚持斗争，巩固和扩大

游击区，主力部队则向潜山、太湖一带主动寻机歼敌，以外线作战来保卫游击区。

1935年8月13日，二十八军进抵霍山县燕子河地区，侦知敌十一路军之一九五旅驻守霍山、诸佛庵、流波碓据点，其三九〇团一个营刚刚由流波碓进驻花凉亭，意在阻击红军。花凉亭离敌各据点较远，敌人处于分散孤立之地。若以长途奔袭战术，星夜赶赴花凉亭，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多胜少，是有取胜把握的。一个月来，二十八军屡歼民团，却未与敌正规军正面交锋，指战员们求战心切，士气高昂。军师领导权衡利弊，决心抓住这一难得有利战机，消灭花凉亭之敌。

当天下午，队伍从燕子河出发，急行军40余里，黄昏前秘密进入花凉亭南侧银矿岭。师政委方永乐作简短的战斗动员，分配任务，规定标记后部队开始向敌运动。花凉亭地处霍山县城与方家坪之间的交通大道上，是一个仅有二三十户人家的小集镇。大道两旁山峦起伏，草木丛生，西南西北各有一道山冈，复杂的地形为红军的隐蔽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晚10时，红二十八军各部按计划分头向敌军靠拢。特务营首先向凉亭坳东北侧高地之敌发起攻击，手枪团和一营在西南侧高地打响，战斗非常激烈。黎明时分，进攻各高地均已得手，继续向镇内实施突击，正值扩大攻势之时，得知敌人驻军是一个整团，河对岸还有两个营。敌情突变，二十八军立即主动撤出战斗。这次夜间攻袭作战，歼敌300余人，缴获迫击炮一门，轻重机枪7挺，步枪200余支，子弹1000余发。

自二十八军重建以来，一直处在敌人重兵围追之中而流动游击，与敌作战方式多为伏击、阻击和遭遇战。而花凉亭一役，红军大胆实施夜间长途奔袭，主动向敌正规部队发动进攻，是敌人始料不及的。在战斗的第一阶段，红军隐蔽接敌，部置得当，准备充分，敌人未能觉察，仓皇应战。第二阶段，红军各部队分别歼敌外围，而敌人仍不知红军进攻意图。第三阶段，红军三路突

击，成猛虎掏心之势，敌人不能组织有效抵抗，被各个歼灭。花凉亭奔袭战表明，红二十八军的游击战争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敌人在力图寻求红军主力作战而屡屡扑空，到处奔波又多次受挫的情况下，加强对游击根据地周围的全面封锁，各“追剿”部队与增修的碉堡封锁线互相策应，又给红军造成很大困难。高敬亭和方永乐不迷恋集中兵力的成功经验，把集中行动与分散游击结合起来，决定分兵活动。高敬亭在病中借二营与敌人在内线周旋，方永乐率主力去外线游击。敌人刚刚摸到了红军主力集中游击的线索，至此又变得一筹莫展，数十万敌人虽遍及大别山区，但对红军却堵截不遇，追击无着，依然被动。

1936年春，红二十八军各部在蕲春县三角山再次会合，军部决定由詹化雨率手枪团一、二分队及师政治部工作人员，由内线转到外线，出击英山、麻城白区。方永乐率两个分队在黄梅境内活动。一营在营长林维先率领下到黄梅苦竹口以北山区，三营和特务营则在丁少聊的率领下赴宿松、太湖一线活动。

四面出击的平原之行，捣得白区驻敌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在这一时期，部队分散活动后，军政委要求定期集合部队进行休整，加强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整个队伍紧密团结，以饱满的斗志和坚定的革命信念，迎接着每一个困难和挑战。

### 血染战旗旗更红

连年的转战，日夜的周旋，锤炼了红军将士革命的意志，然而，残酷的战争也夺去了许多优秀儿女的生命。历史，也许难以真切地记下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的品格，他们的业绩，却令依然活着的战士们永远难忘。

1934年12月8日，红二一八团在关山河伏击敌人运送物资的毛排，在这次战役中，二营失去了三位重要的领导——营长、营政委和副营长。

当时，红二一八团侦悉敌二十五路军独五旅六一四团，护送30多对毛排，装载大批粮食、食盐和冬装，溯史河而上，运往金家寨。战士们连夜埋伏在石灰岭山梁上，准备打他个措手不及，截取敌人的物资装备。

上午8时光景，一队衣衫褴褛、蓬头赤脚的纤夫，迎着凌厉的河风，踩着河岸的乱石，肩背纤绳逆水而行。渐渐地，河面上出现了一长溜毛排，当毛排一进入伏击圈，营长便率领战士们发起进攻，冲向岸上押排的敌人。受击之敌纷纷向山上、河里、草丛中逃窜。营政委发现前而草丛里闪着刺刀的亮光，知道那里藏有敌人。他一边喊“捉活的”，一边带领战士们冲上去。突然，草丛中射出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肺部，当战友们把他抢救下来，送到曹家荒田红军医院时，他的呼吸已经十分困难了。营政委是史河岸边的人，平时行军转战，总和战士们在一起，给大家讲当地的斗争故事，启发战士们的阶级觉悟，环境再恶劣，他也是有说有笑的。临终前，他还鼓励战友们坚持下去，战胜敌人，还盼望着自己能早日伤愈重返战场！

在争夺毛排的搏斗中，副营长的双目被子弹击中。副营长作战骁勇，身先士卒，与战士们情同手足。当他不得不离开战场时，他让营部通信班的战友站成一排，用那颤抖的双手，将每一个战友从头摸到脚，他的嘴唇哆嗦着，欲言又止。他是多么渴望能够再看一眼生死与共的战友，多么难舍与自己骨肉相连的部队！然而，这一切都不可能了。分别的时候，副营长拄着棍子，转身向山上走去，他走走停停，一步一回头……就在这次战斗的第二天，副营长竟被“左”倾领导无辜怀疑为暗藏的“反革命”，他没有倒在对敌斗争的战场上，却不幸牺牲在自己人的枪口下！

15岁就参加革命的小李子，原是红二十五军的连通讯员，后随部队留守苏区。平时他不多言语，像个女孩子，可一打起仗来，就好像一只小老虎。在陶家河战斗中，他跟随指导员坚守阵地，打

退敌人的多次进攻。敌人的手榴弹成串地落到阵地前，小李子和指导员又一个接一个地捡起投回去，在敌群中爆炸。然而，这位勇敢的战士，在一次部队打粮归途中，不幸腰部负了重伤。途中没有担架，战友们硬是沿着崎岖山道，把他背上1000多米高的仰天凹，甩掉追敌。仰天凹上，风雪茫茫，积雪填平了沟壑，已经分辨不出哪是路，哪是沟。战友们用刺刀掀起一块块冰雪，直到露出黑乎乎的土地，又拾来柴火，点火取暖，几位战友蹲坐在小李子的周围，都想用自己的身体为他挡一挡风寒。此时，大家多么想看到小李子腼腆的笑容呵。可是，年仅17岁的小李子再也不能微笑了。大伙用岩石为他垒起坟墓，向他默默致哀！那漫天风雪的呼啸，山间松涛的喧嚣，仿佛和同志们一起呼唤这位可爱的革命战士。

更让人刻骨铭心的，是红二十八军的“小师政委”——方永乐同志。

方永乐出身在六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党的培育下，他从一个农家少年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1935年2月，在太湖县境的凉亭坳重建红二十八军后，他出任红八十二师政委，年仅20岁。他那生动而又严肃的神态，矮小而又坚实的身躯，粗犷而又沉着的性格，令人想起大别山上正在生长的斗子树，枝干虽然稚嫩，却很坚硬、强壮，堪负重荷。战士们都敬重他，信赖他，亲切地称他“小师政委”。

在艰苦的岁月里，“小师政委”成为高敬亭坚实的臂膀，和他一起担负着远离中央，独自领导着鄂豫皖革命斗争的重任。在“小师政委”的率领下，主力红军纵横驰骋在大别山区的山山水水。

方永乐有一匹黑骡子，是队伍中少有的几匹牲口之一。但在行军途中，他总是让给年老体弱的战士骑，自己徒步走在队伍前面。每到一地，他常常是仰面躺在地上，久久地沉思，沉毅的脸上让人感觉到他那肩上沉甸甸的分量。有时打了胜仗，“小师政

委”便会流露出他那青春的一面：部队在岸上走，他在水里行，还踢得水花乱溅。每当看到“小师政委”带点孩子气的活跃行动，战士们都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小师政委”熟知各类敌人的特点及其矛盾，利用高山、丘陵和平阪等不同地形，带领部队进行巧妙的斗争，显示其娴熟的军事指挥才能。他的枪法百发百中，敌人一听到方永乐这个名字就会不寒面栗，多少敌人丧生在他的枪口下。

1936年5月14日，方永乐在麻城护儿山不幸阵亡，用青春的热血谱写了人生乐章的最后一个音符。

这天，部队在护儿山东北的雾露塘坳口，遭遇敌一〇三师三团的堵击。方永乐率手枪团三分队抢占制高点阻击敌人，掩护主力转移。

在这紧急关头，“小师政委”率领部队奋不顾身冲向山头，终于先敌一步占领制高点，向着蜂涌面来的敌人猛烈扫射，打退敌人接连数次的进攻，使主力红军得以安全转移。不幸的是在小分队撤离阵地时，山下敌人碉堡里的火力，突然击中了方永乐，几个战士冒死把他抢下火线，抬到坳口，但此时，年轻政委的脸上再也不可能有灿烂的微笑了。战士们不相信这是事实，高声呼喊：“小师政委，小师政委……”但是只有空谷的回声，松涛的呼啸。“小师政委”永远离开了他的战友，离开了他日夜奋斗的部队。

军政委高敬亭见到方永乐同志的遗体，一下子把他抱在怀里，为失去了自己得力的助手面悲痛欲绝。“小师政委”牺牲的噩耗，直到晚上，他才向全体战士宣布，全军顿时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

三年游击战争，鄂豫皖边区有成千上万优秀的儿女血洒山河。烈士的鲜血，使飘扬在大别山上的战旗更红，更艳！



## 二 战斗在敌人心脏

### 老苏区的新斗争

党和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之后，昔日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不见了，人迹所到之处，只是一幅劫后的景象：荒草护坡，荆棘遍地，十室九空，渺无人烟。党组织极不健全，中共鄂东北和皖西北两个道委仅剩罗陂孝特委和罗山、光山、赤城、赤南、新集与黄安、麻城、河口、陂孝北等零星县委及一部分区、乡基层党组织，残存的几块小苏区夹杂其中。

为了有效地开展地方工作，1937年11月17日，即红二十五军长征后第二天，鄂东北地委书记王福明主持召开了干部会议，决定由王福明、徐诚基、何耀榜、吴光陆、罗厚福五人组成常委会，各县县委书记为委员，原有的各县组织不动。会议还决定组织地方武装和便衣队，积极开展活动，打击敌人，掩护红二十五军西进，并迅速安置红二十五军留下来的300余名伤病员。在道委的直接领导下，鄂东北地区三次组建罗山独立团，为以后红二十八军的艰苦奋战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第一次组建罗山独立团是在1934年11月底。当时，配合敌人正规部队“清剿”的反动民团，其头子都是当地的地头蛇，受过革命打击，最恨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他们人熟、地熟，情况熟，占领碉堡炮楼，看守封锁线，带路搜山，利用叛徒追捕中共党政工作人员，残害无辜百姓，拍卖红军家产，真是无恶不作，严重威胁地方党组织的工作。为了集中力量，镇压和威慑反动分子，鄂东北道委和罗陂孝特委，根据省委临行前的指示，将罗山教导营、光西战斗营及部分轻伤员和革命群众，共五六百人，组成罗山独立团（亦称鄂东北独立团），熊先春任团长，徐诚基任政委。

罗山独立团的组成,使鄂东北道委有了直接指挥的基本武装。12月中旬,敌一个团和反动民团,由叛徒刘庆梦带路,向凌云寺一带搜山“清剿”。独立团埋伏在山上,待敌人进入伏击圈后,将敌击退,歼其100余人。12月下旬,罗山独立团转战皖西,向高敬亭传达省委指示,并编入红二十八军。于是,鄂东北道委又有第二次组建罗山独立团之举。

1935年1月上旬,为重组罗山独立团,鄂东北道委书记将光山独立团留下一个营,河口特务营和部分游击队、便衣队集中,与部分已痊愈的红二十五军伤员合编,又一次组建一支完整建制的队伍,熊先春任团长,梁从学任副团长,张生先任政委。与此同时,道委还组建特务一营,由罗厚福任营长,两支队伍共约400人,他们与各地便衣队密切配合,昼伏夜行,避实击虚,经常给敌人以打击。到5月19日,红二十八军转战桐柏山,为补充有生力量,军政委高敬亭将第二次组建的罗山独立团,编为红二十八军二四四团,任命梁从学为团长,张生先为政委。同时,将道委直属的特务一营和二营也编入红二十八军手枪团,为西行桐柏,转战千里打下坚实的基础。

1935年5月底,鄂东北道委在罗山县四区周家岗召开会议,结合豫鄂边境地区对敌斗争的实际需要,决定将道委、罗陂孝特委的警卫队和一部分轻伤员,再动员一部分革命群众,第三次组建罗山独立团。仍由熊先春任团长,原特务二营政委洪益万任政委,下辖两个战斗连和一个手枪队,共300余人。同时,道委还将特务一营编入红二十八军,以留下的三个班为基础,组建鄂东北特务队。从此,在鄂东北道委领导下,独立团、特务队及各地便衣队相配合,在东西大山一带,采取内线、外线穿插作战的办法,广泛游击,不断打击和牵制前来“围剿”的敌人,为保卫苏区而斗争。在大雪封山时,他们为防备敌人“搜剿”,白天三五人一组分散隐蔽在天台山的山间石洞里,夜晚就用暗号联系,集中

行动。为了防止敌人发现脚印，他们就一边走一边用松枝扫干积雪。没有饭吃的时候，就采集野果、野菜、草根、树皮充饥；医院没有医疗器械，他们就用竹片当镊子，用剪刀、菜刀作手术；没有药品，敷料，他们就用衬衫、棉絮蒸煮消毒后当药棉、纱布，用盐水代替药品，用南瓜瓢当敷料。

1935年2月下旬，由于敌人步步紧逼，鄂东北和豫东南罗、经扶、光山地区的形势更趋恶化，红军游击队、便衣队无法在敌占区活动，只好向深山区转移。这时，罗山独立团被围困在罗山县的大、小鸡笼山。鄂东北道委、罗陂孝特委及罗山县委机关和群众300余人，被围困在经扶县的高庙山上，时值严冬，缺衣少食，处境极为困难。不久，鄂东北道委书记王福明不幸被捕，坚贞不屈，在新集被敌人杀害。同时被捕的道苏维埃主席詹以景，经不起考验，叛变投敌。他领着敌人，将红军埋在经扶县的千余支长枪和埋在黄安三冲门、建筑河等地的银元挖走。叛徒还带领敌人四处搜山，破坏了箭丁河一带的党组织。在这种情况下，道委与罗陂孝特委和各县县委研究，决定由原光山县委书记卢崇珠接任道委书记，主持道委工作。并将高庙山上的便衣队员、轻伤员和愿意参加的群众共七八十人，编为特务营，命营长易元鳌、政委洪益万率领部队突围，以调动敌人给山区解围。

即使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鄂东北道委依然保持高昂的斗志，满怀信心地继续坚持斗争，他们不断调整充实党的各级组织，建立地方武装，为主力部队筹款，解决急需的问题，使天台山地区成为一块打不烂、摧不垮的游击根据地。

在皖西，1935年2月，中共皖西特委和二四六团在驼岭同时成立。驼岭位于皖西舒城、潜山两县接壤的大别山东部，是一座骆驼形状的奇丽山峰，东南西北连接着十余座气势雄伟，沟壑纵横的高山。皖西特委一成立，就利用这一带有利的地形，把根深扎在群众之中，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开创游击战争的新局面。特

委书记徐诚基富有政治经验和军事素养，他带领队伍摸索着山间小道，转移到驼岭西南山坡下的村庄，开始筹划特委工作。另外，抽出十多个同志组成便衣工作队，深入山区发动群众，设法把伤员安置到贫苦农民家里休养治疗；又派红二四六团转到外围打游击，打击地方反动势力，筹粮筹款。徐诚基还带领手枪队到马家河一带活动，与红二十八军留下的便衣队接上关系。继而又向南到了小河南地区，与中共潜山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并领导他们开展工作。

3月初，由二四六团抽出部分人员在潜山、太湖边界地区配合潜山县委成立了有300余人的四路游击师。他们和二四六团分别在舒城、霍山、潜山、太湖边界山区，打击国民党的民团、“铲共队”等地方反动武装，牵制敌人部分正规军，保护特委和便衣队。同时积极开辟新区，把党的工作扩展到蕲春、黄梅、宿松等县山区。

徐诚基还与皖西北白区党组织——中共皖西北特委取得联系，开展了一个时期的工作。1935年5月14日，皖西特委书记徐诚基通过皖西北特委与中共中央作过一次联系，就有关皖西特委和部队的情况，向党中央写了一份工作报告。皖西北特委书记刘敏在给上海中央局的报告中，曾转附了高敬亭和徐诚基给中央的两份简要报告。后来因斗争形势的恶化，皖西特委与皖西北特委的联系也就中断了。

1935年初至1937年2月，特委领导下的皖西地区与皖西交界的鄂东地区几个县，形势大为好转，特别是以大岗岭、鹤落坪为中心，纵横二三百里的地方连成一片，工农群众以及中、上阶层的进步人士，都发动起来了。他们掩护与支持特委和便衣队的斗争，送情报、抬担架、安置伤病员，妇女做鞋，缝衣服慰劳红军，那情景就像老苏区一样。一段时间，便衣队和地下党可以半公开活动，伤病员、红军指挥员可以着军装公开单独行动。

### 巍巍金刚台

金刚台，位于鄂豫皖三省边陲，金寨县的西北部，是一座高入云端，巍峨险峻，满是奇峰怪石的石磨形大山。在金刚台上，6月炎天要穿棉袄，十冬腊月更是寒冷异常。它不仅是“采茶、割漆、挖草药，一天出三宝”的宝山，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一面砍不断、拖不垮的革命大旗。1934年秋，红二十五军长征后，在这人迹罕至，野兽群居的大山上留下的革命火种，面对饥饿、寒冷、流血牺牲的严重威胁，坚持斗争，留下了“金刚台红旗不倒”的传奇。

1935年初夏，赤城县委机关工作人员和部分红军伤病员由县委书记张泽礼带领，从熊家河根据地转移到金刚台。熊家河到金刚台只有90里路，这支队伍却走了好几个昼夜，因为上山的羊肠小道都被敌人封锁了，大家只得披荆斩棘，攀藤爬岩上了金刚台。

上山第二天，张泽礼就给大家作了报告。他讲了坚持金刚台斗争的重要意义和艰苦任务，讲了开展游击战的许多办法。最后他说：“要坚持金刚台当然是有困难的。不说山下敌入围剿搜查，就是饥饿，寒冷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大难题。但我们是钢铁般的红军战士，是难不倒拖不垮的，只要我们坚决跟党走，设法和山下的红军家属取得联系，团结周围受苦受难的阶级一道奋斗，我们就能在这里树起一根旗杆，使革命的红旗在金刚台上高高飘扬。”县委书记的报告鼓舞了大家的信心。

当天，金刚台上就建立了党组织，在县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分工，80多人分别组成第一、第二两个便衣队，化装成药农、樵夫，在金刚台周围联系群众，侦察敌情，打民团，除恶霸，筹粮饷，搞武器，配合红二十八军和山下游击队作战。妇孺老弱也组成了一个坚强的集体——金刚台上妇女排，负责搞后勤，办起了小医院和被服厂。

金刚台一带人烟稀少，又加敌人封锁严密，山上与群众的联系就变得十分困难，吃的穿的住的都成了问题。山下敌人发出狂叫：“砍尽山上树，斩断红军根。”三天两头前来搜山。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否坚持下去，对这支革命队伍是个严峻的考验。开始，山下的便衣队打土豪供给山上一些粮食，周围红军家属和革命群众也想方设法送粮上山。有时粮食接不上，就摘些野果，挖点野菜，勉强对付过去。没有鞋子，就用葛藤、茅草编织草鞋，没有被子就割把茅草盖在身上。山上80多个大小山洞，是大伙最好的住房。

到了冬季，山上的野菜、野果吃光了。敌人搞并村移民，实行焦土政策，山上烧山，山下烧房，到处是残垣断壁，满目疮痍。周围的群众有的被杀了，未杀的被赶到老远的阪上大村里，受到敌人的严密监视。敌人妄图采取这些法西斯暴行来困死山上的革命者。

在山上，队伍和群众暂时隔绝了，行动也更加困难，坚持金刚台斗争开始进入最艰苦的时期。

县委号召大家群策群力，出主意，想办法。大家认为，在目前暂时和群众隔绝的情况下，吃的，穿的，药品，武器……一切都只有靠自己的机智勇敢从敌人手里去搞。一场争生活，度难关的夺粮斗争就这样开始了，其中负责筹集粮食的冯眯睇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老冯是个胆大心细，智勇双全，办事麻利的人。他看到同志们忍饥受饿，常常急得睡不着觉。想到县委交给自己的任务，他决定冒险下山去摸一摸情况。于是，他化装成国民党军队连长模样，趁着黑夜下山，悄悄摸到联保主任家门口，适逢联保主任和几个保长在谈话。冯眯睇计上心来，大模大样地破门而入，没等联保主任开口，他就冲联保主任说：“昨天叫你们办的事，办好了吗？”联保主任连忙弯腰打躬地说：“啊！是连长，什么事？请吩咐。”老冯不耐烦地将催粮事数说一遍，并厉声斥道：“你胆敢违

抗军令！”旁边几个保长慌忙求情说：“请连长息怒，我们正在商议派夫到高城那边运粮的事，你请坐，搞饭吃。”老冯说：“运粮要紧，你们都下去给我抓人，明天中午粮食要运到。”说罢，他叫一个保长做向导，朝国民党驻军营房走去，快到营房了，他对这个保长说：“行了，你回去抓夫运粮，明天粮食先送给我们营，就在这里交，不然小心你的脑袋。”保长唯唯点头离去。冯腓膪转身飞步上山，同志们连夜作好劫粮准备，在敌人运粮必经的挥旗山下埋伏以待。第二天，果然有数百人的运粮队，从商城方向而来，前后都有敌军押送。红军游击队一开枪，敌人措手不及，慌忙四处溃逃，大批麦面和副食品就成了红军的战利品。

熬过了寒冬，到了春夏天，山上一片青绿，野菜野果也长出来了，有了吃的，有了更好的隐蔽场所，金刚台上的游击队也就更加活跃了。

开始，敌人以为封住了山下的几处通道，就可以困死红军游击队。后来看到不见效，就经常搜山。敌人来搜一遍，游击队就在山上转一遍。敌人山路不熟，胆小怕死，又有险岩陡壁阻隔，上山后必然要分股活动，这股过去了，那股又来了，游击队就利用自己山熟路熟爬山快的长处和敌人兜圈子，避强就弱，声东击西，调动敌人满山跑，一有机会就揍它一下。还把自制地雷、手榴弹埋在敌人必经的路口处，杀伤敌人。有时遇到敌人多，躲避不及，大家就钻山洞。有一次，一个战士的子弹打光了，遭到敌人追击，他转身钻进山洞，藏在洞口边的石缝里。敌人追至洞口不敢进洞，其中一个伸头向洞里探望，这个战士顺手摸一根栎树棒打得这个冒失鬼脑浆涂地，并得到一支枪。他立即向外开枪射击，洞外的敌人以为洞里人多火力猛，就逃开了。

敌人经常几万人上山搜查，看得见游击队，就是打不着，气得大骂“游山鬼”。久而久之，敌人被金刚台上的战士搞泄了气，开始时的那股疯狂劲也渐渐地消下去了。

在白色恐怖下，金刚台上妇女排这个战斗集体，在排长袁翠明，县委委员史玉清的带领下，也与敌人展开了巧妙的较量。

1935年秋，妇女排在东河上面大山沟里活动，遭到敌人的团团包围，密集的子弹把这群妇孺老弱全部压到山沟里。

夜幕降临，大家都在想办法突围出去。有位同志灵机一动，说道：“办法有啦，你们看，敌人的枪声这么密，为什么伤不着我们？这是因为山上树林稠密，子弹都打到树上去了。要是我们都顺着地皮往上爬，动作轻些，姿势低点，敌人不也打不着我们吗？”

使用这个方法，队伍居然全部爬出了这路敌人的包围圈，但很快又陷入新的包围。这时天已大亮，敌人看到妇女排没有武器，就以为好欺负。一个当官的“哈哈”一阵狂笑后，得意洋洋地叫道：“弟兄们，不要打枪，要抓活的。谁抓住这些娘们，就给谁做老婆；要大洋赏大洋，要官升官。”

当兵的听到当官的命令，都不打枪了，漫山遍野追来。这样，倒给了这些妇女突围的希望。别看他们都是女流之辈，爬山穿林，敌人却赶不上，累得在后面干哼哼。

同志们牢记着共同立下的誓言：“团结一致，坚持到底，打伤了不叫，打死了拉倒，宁可牺牲自己也不出卖同志和组织，直到最后一个人。”她们在丛林中巧妙地和敌人兜圈子，从这座山爬到那座山。最后突围出来的30多个人，除了一嘴牙齿是完整无缺外，衣服、皮肤、头发全被树枝挂烂了。

到1936年冬天，金刚台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鹅毛似的雪片一个劲地落了几天几夜。金刚台变成个大雪堆子。冰冻如铁，几把粗的大树被大雪连压带冻一折两截，到处听得见“咯嚓、咯嚓”的响声。那时，妇女排住在跑马场一带几个大山洞里。她们常常一个星期吃不上一点儿东西。实在饿极了，就从雪地里挖些草根嚼嚼。

恰在这时，曾少甫的妻子张敏又生了一个女孩。到第六天早



上，大伙正准备看望张敏，却看见那个幼小的生命静静地死在母亲的怀里。大家从张敏的表情上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孩子是母亲给捂死的！

大家非常难过，排长袁翠明虽知张敏内心的痛苦，也忍不住要责备她：“大嫂，你在干什么！我们大人再吃苦，总不能对不起孩子呀！”

张敏悲泣地说：“孩子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我怎忍心？可是……眼下这情景……大家都活不了啊……”

是啊！眼下的情景是大雪封山，敌人声言要冻死、饿死、困死这支革命队伍。山上一粒儿粮食也没有，大人都饿得起不了身，哪有孩子的活路呢？

张敏又说：“就是熬过了今冬，往后怎么办呢？孩子一哭叫，还不要给大家带来灾难？”

坚持金刚台的三年，是艰辛战斗的三年。三年中，金刚台上的革命者们几乎每天都要和敌人打交道，每天都要跑山路；他们没有穿过棉衣，没睡过整夜觉；他们打赤脚，穿草鞋；吃野菜，咽稻糠，但是，革命的意志从未消沉。经过三年艰苦环境的锻炼，同志们的革命胆略更壮，无产阶级觉悟更高了。一些同志光荣地加入了党的组织，一批批伤病员恢复了健康重返前线，一批批精壮战士补充到主力部队。金刚台满山上的足迹和弹痕，记载着每一个革命者生命的辉煌。

### 打向南京政府的拳头

环绕着皖西苏区东北外围的皖西北白区，是党中央通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一大通道。坚持在这一地区的中共皖西北特委和皖西北独立游击师，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以苏区为依托，以同苏区接壤的纽带地区为活动中心，积极向淮南铁路、淮河南北和长江北岸发展，在极为艰险的条件下，开展了艰苦卓绝的三年

游击战争。

1934年4月25日，寿县中心县委遵照党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新苏区，支援老苏区的指示，曾制定《红五月工作计划提纲》，要求所属的各县委“要用最大的注意力把群众斗争深入与扩大起来”，实行游击战争或武装暴动。5月，中心县委将寿县游击队扩编为皖北游击大队，任命孙瑞训为大队长，曹广海为副大队长，张如屏为政治委员，曹云露为参谋长。全大队100多人，长短枪100多支。

皖北红军游击大队一成立，就初试锋芒，成绩显著。第一仗打开开荒集，击毙寿县“剿共”司令毕少山，缴长短枪20多支，将缴获的粮食、衣服、食盐、布匹等分发给贫苦农民。第二仗袭击众兴区政府，打死打伤数名敌人，缴枪20余支。在武装斗争迅速开展的同时，各县委发动群众，掀起了抗捐、抗税和扒粮斗争的高潮，国民党当局大为恐慌。寿县国民党党部的一些反动头目联名致电蒋介石，称“党国元老屡遭杀害”，请求“尽快除尽土共”。蒋介石连忙从“围剿”鄂豫皖苏区的东北军中，抽出一个师进驻寿县。同时，地主反动势力也纠集起来，成立“剿共”大队，配合正规军“进剿”红军游击队。在反动派的进攻下，寿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寿县中心县委委员兼保义区委书记王道舟被捕后，敌人以高官厚禄诱其叛变，遭到拒绝；后又在刑场上逼他的9岁幼子劝父叛变，亦遭到痛骂。王道舟坚贞不屈，最后英勇就义。

皖北游击大队在保义集和石家集之间的洪家油坊，被东北军包围，敌人的火力很猛，游击队坚持到天黑才突围。大队长孙瑞训突围时重伤被俘，在抬往寿县途中，毅然从担架上翻落河里，壮烈牺牲。

这段时期，敌人气焰非常嚣张，“剿共”大队长路奎汉在瓦埠、小甸集、双庙方圆数十里内，到处设立盘查哨，搜捕共产党和游击队。面对强大的敌人，皖北游击队既无巩固的根据地，又不能

得到主力红军的援助，加之皖北平原地区，对开展游击活动极为不利。为了求得生存，摆脱困境，游击大队决定向合肥方向转移。

合肥、寿县两个中心县委，早在1931年8月就奉命合并为中共皖西北中心县委，统一领导合肥、寿县、凤台、颍上、阜阳、庐江、舒城七个县的工作，直到1932年6月才又重新分为合肥、寿县两个中心县委，但分开后仍保持密切联系。当时游击队考虑到队伍转移至合肥后，可以进一步向舒城山区行动，与苏区靠近。

1934年9月下旬，皖北游击大队与合肥中心县委书记刘敏在合肥南乡取得联系。刘敏听了报告后，说：“我们可以再联合起来，好好干！”原来，合肥游击队1934年8月在庐江县鸡鸣山附近的草塘冲，遭到庐江县常备队和白石山、盛家桥等地方民团的围攻，突围中，队长赵大有牺牲，副队长沈基德带枪投敌，队伍全部被打散。中心县委火速派出颜文斗等同志前去收容失散人员，经过扩充，形成一支三四十人的游击队。但在转移途中，又几次遭到敌人围攻，大部伤亡和失散，颜文斗被俘，解往六安，被活埋于西门外。这支游击队幸存者仅有孙仲德、奚业胜、马家兰、侯光国、马家庸等五六人。

1934年10月6日，中共上海中央局致信中共寿县、合肥两中心县委，指出皖西北白区的党面临的最迫切任务是：“动员广大劳苦群众，领导他们的扒粮，反对苛捐杂税等等的斗争，开展游击运动，壮大游击队的本身，为保存鄂豫皖苏区，粉碎敌人的进攻，建立新的苏维埃区域而奋斗！”为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加强整个安徽白区的工作，中央局决定撤销寿县、合肥两中心县委，成立中共安徽省委，由合肥中心县委书记刘敏任省委书记，统一领导合肥、寿县、阜（阳）太（和）、凤台等七个县委工作。中央局的这一指示，犹如及时雨，滋润着白区革命战士的心田，为白区的革命斗争指明了道路。

在刘敏的领导下，两个中心县委召开联席会议，共同研究下

一步行动。鉴于白区各地党组织都受到程度不同的破坏，尤其是寿县、合肥两县损失严重，大家一致认为目前成立省委的条件暂不具备，决定将寿县、合肥两中心县委合并，成立中共皖西北临时特委（也叫皖西北中心县委），由刘敏、叶守春和张如屏三人组成，刘敏任书记。同时决定将皖北红军游击大队和合肥游击队合并，成立皖西北游击大队，共130余人，下设两个中队。曹广海任大队长，孙仲德任副大队长、曹云露任参谋长，张如屏任政治委员。特委一面将这两项决定速报中央局，一面积极开展游击活动。

根据临时特委的决定，皖西北游击大队立即转向舒城县山区，10月19日，到达舒城四大名山之一——春秋山。

不料，队伍上山后，庙里有个和尚悄悄跑到舒城向敌人告了密。第二天是重阳节，天刚麻麻亮，安徽省保安第八团、舒城保安队和东北军的队伍就打来了。游击队且战且走，在突围中，大队长曹广海、中队长颜礼国等都牺牲了，队伍从130多人减至40多人。

回到合肥西乡缺牙山根据地，刘敏召开了中共皖西北临时特委会议。大家认为，在强敌“围剿”的情况下，游击队遭受严重损失，不宜再集中行动，应暂时化整为零，分散发动群众，打击敌人。会议决定，由刘敏带一部分人到庐江、无为一带开展活动，张如屏带一部分人到舒城北乡、南乡，曹云露仍留在合肥西南乡。

1935年元月底，中央派李德保赴皖工作。中央交待的任务是：部队要持续发展扩大，打通与老苏区的联系，在可能条件下建立新苏区。在组织上，中央同意把寿县和合肥两中心县委合并，成立中共皖西北特委，由刘敏任书记，张如屏任组织部长，李德保任宣传部长，王天云任妇女部长，张士发任农运部长。在军事上，中央要特委在部队壮大后，成立“皖西北独立游击师”，领导干部由特委自定。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皖西北特委一面加强武装斗争，一面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到6月，特委领导的党组织已有合肥、阜阳、颖上、凤台、庐江、繁昌等县委及无为县工委等，共有党员320余人。同时，重新聚集的皖西北游击大队也不断打击敌人，取得显著成绩。到6月中旬，特委决定将游击大队正式编为皖西北独立游击师，由孙仲德任师长，张如屏任政委，曹云露任参谋长，全师三个连。

游击师成立后，转战江淮，连连告捷。他们每到一地还配合地下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经济斗争。以往扒粮都在夜晚进行，震动不大。现在游击师白天开展扒粮活动，群众开仓分粮，影响很大。作战一次，就“赤化”一片，总有一批青壮年参军，游击师很快发展到四五百人，实力大大增强。

与此同时，中共皖西北特委三次派了部队到苏区寻找红军，打通了与苏区的联系，与红二十八军并肩战斗。

第一次是在1935年4月，游击师一路苦战进入苏区，在舒城、潜山交界的主簿原、黄麦园找到中共皖西特委书记徐诚基及其领导的二四六团，转达党中央指示，并协同二四六团歼敌一个连。当时，皖西老苏区遭受敌人连续三个月的“清剿”，生活极端困苦。经研究，游击师不得不回到合肥地区开展斗争。

为了更好地支援苏区，中共皖西北独立游击师拨出一个连，共130人，全副武装，补充到红二十八军。还决定游击师轮流到苏区进行整训，向主力红军学习战略战术。

6月14日，孙仲德带领第二批整训部队去苏区，一边训练，一边与红军肩并肩作战，在潜山、舒城边境打了几次胜仗，直到1936年初，才离开苏区回白区活动。

在特委的领导下，独立游击师有时在白区游击，有时到苏区配合红二十八军作战，搞得皖西北的反动派坐卧不安。蒋介石责备安徽省主席刘镇华“剿共不力”，增调主力部队入皖，由原来的

10万兵马猛增至30万，企图一举扑灭家门口的红色烽火。面对强敌，皖西北特委又将部队化整为零，隐蔽力量。

此后，刘敏带着杨银声到巢县，以教师身份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孙仲德带五六个同志，买了一条大船，将枪支隐藏在船舱夹底，以贩卖大米和布匹作掩护，活动在安庆至芜湖的大江两岸，有时也到巢湖，一方面为党筹集活动经费，一方面配合各地下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扒粮斗争。

1936年夏天，刘敏、张如屏去上海寻找党组织，得知主力红军已经会师陕北。回到安徽后，他们在长江边的木船上找到孙仲德，派人把分散在各处的负责人找来，就在大船上，听取一位来自上海的朱同志关于“当前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的讲话，大家都觉得很新鲜，受到很大鼓舞。

会后，特委决定派孙仲德到陕北找中央组织。1937年春，孙仲德从庐江麻石桥化装出发，奔赴延安，一路上，他帮人家打短工，做零活，还给马戏团拉大车，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组织上派车把他送到延安。中央组织部听取了他关于皖西北白区和大别山苏区的军事、政治、民运工作的汇报后，作了发展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指示，交待了方针、政策和具体任务。中央组织部还决定：要皖西北白区的领导人刘敏、张如屏、曹云露等到延安抗大学习，派出宋天觉接替皖西北特委的工作。

1937年6月，皖西北白区的革命者分成几路，顺着津浦、陇海路徒步去延安，成为鄂豫皖地区第一批到达中国抗日中心的战士。

### 三 便衣队：红色革命的摇篮

#### 鄂豫皖第一支便衣队

便衣队这一组织形式，是鄂豫皖根据地的一个创举。它在党的领导下，利用其短小精干，行动秘密，机动灵活，人地两熟，便于隐蔽等特点，积极活动于敌占区，发挥了共产党组织、地方政权和革命武装的各种职能，成为共产党的前哨，又是主力红军的后方。它完成了许多主力红军所不能完成的任务，是一把插向敌人心脏的利刃。

鄂豫皖边区最早的一支便衣队，成立于1933年秋，地点是在黄安县的河口地区和仙居区。

河口地区当时是一个县委组织，根据鄂东北道委的意见，在1933年9月改称河口特委（实际上是苏安县二程区区委）。在特委领导下，成立了一个由60多人组成的武装工作队。当时正值红二十五军攻打七里坪失利，苏区笼罩着白色恐怖。敌人在各个乡村建立联庄会，组织反动民团，到了夜晚就巡逻打更设路卡。

10月间，道委要求各县、区干部设法回到本地区去坚持斗争。河口特委接到指示后进行了讨论，大家总结武装工作队在原地坚持斗争人多目标大的教训。认为只有组成小型便衣队，缩小目标才便于活动。于是特委决定派徐海珊、李世焱、钱运华三人回二程区工作，由徐海珊任队长。三人都换上便衣，带上短枪，大家便叫这支小小队伍为“便衣队”，从此这名字就传开了。特委当时交待的任务有四项：（一）做群众工作，与革命群众保持联系；（二）打击反动分子，镇压反革命活动；（三）收集敌人的情报；（四）散发宣传品。

这支便衣队回到二程区时，敌人正在推行移民并村，把山区

的独户人家和偏僻小村的群众赶到平畈上的大村子里去，实行五家连坐，一家通共，五家问斩。反动民团每天四出清查，气氛非常紧张。一些外逃回来的地主、富农，以百倍的疯狂向农民反攻倒算。弄得许多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惨不堪言。便衣队员白天不能活动，完全靠夜晚去找群众。当时群众都不敢接近，有时队员一整天都难寻到一餐饭吃。

便衣队需要尽快建立立足点，可是到哪里去找立足点呢？经过反复研究，认为龙王山上的龙王庙比较合适，庙里的老和尚在土地革命时被划为地主，现在又有一个小和尚在民团里当兵，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

一天晚上，队员摸上山去，找到和尚向他讲明来意，和尚开始很害怕，经过大家一再晓知以利害，才答应掩护便衣队。为了保证安全，便衣队员采取昼出夜来的办法，对和尚观察了几天，觉得还比较可靠，才决定以龙王庙为立足点。

队伍隐蔽下来以后，和尚反映了很多情况，如哪些村庄的地主，反攻倒算的很厉害，谁在民团的据点里睡觉，谁在河口镇里住宿，民团和联庄会常到哪些地方搜山、设卡，哪些道路不能走等。后来和尚对党的政策有了进一步了解，与便衣队员的关系也就更融洽了，甚至替大家出谋献策。他说，要开展工作，首先要设法镇压联庄会。若不把联庄会的反动气焰打下去，要想开展活动是很困难的。

和尚所反映的情况和提出的看法，得到便衣队的认同。

镇压联庄会的行动开始了。便衣队化装成联庄会的人，带上一面锣，到最反动的村庄有意暴露一下目标，联庄会一发现，首先敲锣，接着鸣枪放土炮，叫喊抓共党。这个村庄锣声一响，其他村庄也照样敲起来。便衣队员趁机敲响锣混进联庄会的人群中去。因是夜晚，谁也看不清谁，便衣队便掏出枪来，逢联庄会的反动家伙就打。



经过几次镇压，群众知道是共产党回来了，纷纷退出联庄会。有些村庄的联庄会自动解散了。各村的反动分子晚上不敢在家蹲，都跑到河口镇上去。被强迫迁移的山村居民返回家乡，群众也敢和便衣队接触了。很快，便衣队便在龙王山周围建立了十几个联络点。为防止敌人破坏，便衣队与群众采取单线联系的办法。先打暗号，联系人看到暗号后再去隐蔽点。这种方法群众很满意，他们既能为革命办事，又不致于暴露自己。

联庄会被镇压下去了，但反动民团仍很猖獗。他们白天强迫群众协同搜山，晚上又在交通路口设卡。便衣队的活动经常遭到民团的伏击，尤其是西张家、大畈两个据点，设在便衣队从二程区回特委所在地君山的交通要道，对革命妨碍极大。

1934年5月至6月，特委组织力量，采用化装袭击与引蛇出洞的办法，将这两个反动据点的民团悉数歼灭，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许多村庄的民团慑于便衣队的威力，都自行解散了。反动分子纷纷龟缩到河镇，便衣队的活动范围一天比一天大。整个二程区的革命局面重被打开，树立了白区工作的典范。

二程区便衣队在鄂豫皖苏区是个首创。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便衣队是群众工作与秘密组织工作的一种最有效的极为适宜的游击武装组织。为了推广二程区便衣队的经验，郑位三还在罗山卡房多次举办训练班，亲自给学员讲课。他强调便衣队首先要做好群众工作，指出：“群众是水，是眼睛，为了坚持下去，必须要有群众。”他给便衣队确定了“游击战争，昼伏夜动，两面政策，统一战线”四位一体的方针。以后，便衣队在鄂豫皖苏区进一步发展起来。

## 大展鸿图

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和根据地党的组织十分重视便衣队的重要作用。由于斗争环境的需要，在红二十八军的掩护和扶助下，

在豫东南、鄂东北、皖西等山区，相当于地方基层政权作用的便衣队已经普遍产生，非常活跃。

在鄂东南，共有19支便衣队，约200余人，他们活跃在平汉铁路东西两侧，“秘密发动群众，为红军扩充兵员，掩护伤员，提供物资装备和敌情，并为建立苏维埃政权创造条件。”

在鄂东北，红二十五军长征以后，仍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其中多数是乡苏维埃政府负责人，他们与群众一起，继续坚持着当地的斗争，实际上是日降夜不降，口降心不降，明降暗不降，后来，乡政府的工作人员站不住脚了，就带着枪和苏维埃政府的印章到处游击，镇压反革命分子，照顾红军家属，掩护伤病员，为游击队提供情报，购买生活用品和药品，这样就在实际上成了便衣队，共有10支，约100多人。

在皖西，活动于舒城、霍山、岳西、太湖、蕲春，宿松等县广大山区的便衣队的产生，多数是红二十八军或当地游击队有意留下的人民，主要以掩护伤病员为目的。以后便衣队发展了，不仅掩护伤病员，而且还为红军筹粮筹款，提供情报，组织新兵，扩充主力部队，掌握两面政权，镇压反动分子，接济老苏区等。每支便衣队都建立了党支部，归中共皖西特委领导。鹞落坪便衣队，活动于鹞落坪一带99个山洞，方圆60余里的高山峻岭中，多次粉碎敌人的“清剿”，打击了反动势力，武装了自己，支援了红军。他们曾在山村中设立棚子，建立山林医院，安置红军伤病员七八十人。另外，他们在孙家湾设有一个仓库，保存粮食物资，在鹞落坪设有一个修械所，可以修理一般枪支；在包家河、青天畈、沈家桥等地，还开设红军地下商店，由红军出钱群众办，经营红军需要的油、盐、布匹、电池、药品等。

到1936年初，便衣队的活动更加扩大，打击敌人，建立“两面政权”，支援红二十八军的斗争，搞得有声有色。

1936年3月上旬，高敬亭在太湖县召开柴家山会议，除了研

究红二十八军的行动方针外，还强调了加强便衣队的建设，决定要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从红二十八军中抽调骨干，放到地方上去，建立和发展便衣队组织。

5月28日，高敬亭率领部队到达黄冈县大崎山，从部队中抽调了10名骨干组成黄冈便衣队，任命汪少川为队长，张金月为指导员，并给便衣队全部配备了短枪。高敬亭给便衣队规定了五项具体任务：

（一）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打土豪、开仓分粮。

（二）扩大红军游击队，打击反动民团。首先要镇压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为人民出气、撑腰。

（三）安置红军伤病员，使他们早日康复归队，筹款筹物供应红军，作红军的后方。

（四）搜集敌人的情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

（五）建立和发展共产党的组织。

除此之外，高敬亭还要求这支便衣队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游击队紧密结合，把黄冈建设成为红军游击区。

这样，便衣队的任务扩大了，由过去主要搞武装斗争逐渐向党政军一体化过渡，成为建党、统政、发展武装的主要力量。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便衣队就必须由单一向多元发展，由点到面，由孤立的便衣队向便衣队与地方武装和主力红军互相支持、协同作战的方向前进，使每一个便衣队员成为既能搞宣传，又能作战的能文能武的红军工作员。此后，鄂豫皖便衣队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便衣队的规模达到82支之多，活动范围东迄霍山、潜山，西跨平汉铁路至应山，南抵蕲春、黄梅、广济和黄冈，北达信阳、固始。其中豫东南地区的便衣队人数最多，力量最强。

在信阳、罗山交界处，有黄锦思领导的灵山便衣队，威震敌胆，多次出色完成任务，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在蔡宗帜、杨兴民领导下的罗陂孝便衣队四队，活动在罗山

县以铁铺为中心的地段，为主力红军筹款筹粮，在一个月內就购得大米 5 000 斤和相当数量的油盐，按期超额完成任务。

高城县便衣队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当地斗争，在 1936 年春天，组织武装在挥旗山一带伏击敌人的运输队，击溃护送的国民党军两个连，缴获了大批白面、大米、枪支。稍后，红二十八军手枪团三分队和商南便衣队配合行动，一夜之间打掉敌人碉堡 11 个，取得辉煌胜利。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便衣队配合了分队，横扫了苏仙石、皂鞋河、双河、汤家汇周围数十里的敌据点，连拔 60 余座碉堡、围寨，给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

便衣队还模范地执行统一战线的政策，他们对一些比较开明和没有劣迹、群众意见不大的保长、民团头子和地主做了大量的工作，使他们表面上维持国民党，暗地里却给共产党帮忙。

在经扶县，便衣队与郭家河的开明绅士王闯才、叶柏台和郭永臣合作，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红军家属和便衣队员。

灵山便衣队从土匪手中救出了黄家湾黄保长的孙子，他感激不尽，多次为红军办事，还帮助三个便衣队员活捉了五个敌探。

高城、西河桥的保长，被红军教育释放后，为红军购买了不少粮食和物资，在情况紧急时，便衣队员们就驻他的碉堡隐蔽。

这样的例子，在皖西和鄂东北边区到处都有，很多便衣队建立了“同情区”，造成“两面政权”，帮助红军。

从 1935 年底到 1937 年初，便衣队的活动从山区发展到平原地带，在广大的白区扎根，开辟出一块块全新的游击根据地，成为坚持鄂豫皖苏区游击战争的重要支撑点，成为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的摇篮和第二主力。

### 难忘军民鱼水情

便衣队在斗争中处处想着群众，关心群众，把群众的疾苦放在心上，人民群众也热爱便衣队。

贫农曾少山在敌人搜山时，幼小的孩子被惊哭了，为了伤员和便衣队的安全，他忍着泪水闷死了自己心爱的孩子。

在经扶县的夏青区，一次敌人别动队看见便衣队队员进了村，就将全村的人集中起来审问，老百姓坚决不讲，连小孩也守口如瓶，敌人恼羞成怒，当场杀了三人，但屠刀并没有使人民开口！

也同样是在经扶县，有一个普通群众，家里藏着便衣队的银元和 100 多条枪，这天还有三个便衣队员在他家楼上休息，被叛徒发现，敌人即派人前来搜捕，这个群众本来可以逃脱的，但为了掩护便衣队，他主动迎向敌人，引开敌人的视线，使便衣队员安全脱险，银元和枪支也保住了。

商南县委刚上金刚台时，带着一批战斗中负伤的红军战士，贫苦农民吴春风得知伤员急需食盐清洗伤口，他便冒着生命危险，东挪西借，买了 20 块钱的盐送上山来，敌人发现后把他捉住抛下山涧，连妻子儿女也未能幸免于难。

红二十八军特务营营长林维先，在一次战斗中和几位战士一起受了重伤。这时，部队急于西进，前后又都是堵兵追敌。师政委方永乐决定把林维先等三位重伤员送到附近山区一个姓王的独户人家。王大哥夫妻两人，30 来岁，带着一个小孩，毫不犹豫地接受下来。

山下有敌人的一个据点，敌人经常上山搜查。王大哥为了安全，天天一早就把三个伤员一个一个背上山，放在山洞或山沟里隐藏起来。天黑后，再一个一个背下山，住在家里。王大哥家里穷，突然增加三个人，生活更加困难。但是，王大哥夫妻俩总是想方设法给伤员搞吃的，宁可自己挨饿。他们家里养着几只鸡，自从伤员到家，他们就把鸡全都煮给伤员吃了。三位伤员痊愈归队后，部队送给他们家 10 元钱，王大哥说什么也不肯收下。

红军战士刘经安，在一次战斗中负伤，被几个老乡抬到一个山洞里养病。负责照顾他的刘大爷，一连六个月，不论刮风下雨，

天寒地冻，每天都要送来两次饭，像待亲儿子一样来细心照料。

战争的残酷，环境的恶劣，不允许红军有正规的医院，固定的病房。正是千百万勤劳、善良的人民群众，用自己的乳汁浇灌了革命的胜利花朵，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谱写了军民骨肉相连、生死与共的壮丽诗篇。

## 四 曙光在前

### 鹞落坪来了个姜术堂

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鄂豫皖边区人民时刻盼望能够听到党中央的声音。但是在敌人铁桶式的包围下，只能偶尔从缴获的敌人报纸上获得一鳞半爪的消息。在历史转折关头，红二十八军无法了解到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这种情况，直到一个名叫姜术堂的人到来，才得到改观。

姜术堂，原是国民党十一路军的少尉排长。早在1936年秋天，他就从潜山率领20多名士兵向万山便衣队投诚。当时因便衣队本身力量较小，无法收编这支队伍，经过一番说服教育，姜术堂等人自愿放下武器，领取路费各自回家了。

到了1937年春，姜术堂独自一人又找到便衣队，要求参加革命。当时，国民党正加紧对游击根据地进行“清剿”，斗争非常残酷，便衣队对他这样来历不明的人，不能不有所警惕。但鉴于他有上次投诚的积极表现，特委决定再次动员他回乡。姜术堂临走时，请求特委给他一个身份证明，以便返回河南老家，寻找机会再投身革命。谁也不曾料想，正是这样一个偶然的事，使红二十八军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

原来，姜术堂在返回河南老家时，途经郑州，听说发生了“西安事变”，国共两党已经达成停战协议，便径直前往西安，在

七贤庄找到八路军联络处，出示了特委给他的身份证明，也就在这段时间，党中央多次派人前往鄂豫皖地区寻找红二十八军。终因敌人的严密封锁，红军的辗转游击，一直没有联系上。听说姜术堂来自鄂豫皖边区，联络处的负责人林伯渠热情接待了他。4天后，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召见他，仔细询问了边区的情况，并给了他一份党中央的《告全党同志书》和《论民主共和国口号》的文件，指示说：蒋介石用了很大的努力，想把红二十八军和大别山区游击队歼灭，歼灭不了也想打垮一部分。他要姜术堂回去转告何耀榜（时任中共皖鄂边区特委书记），尽量设法与国民党谈判，谈判的条件文件上有。在谈判中，首先要停战，把部队散在外围，不要集中起来，防止敌人暗算。谈判时，部队不能接受国民党的任何名义和任务，谈判后部队集合地点一定要找群众基础好和交通方便的地方，一切重大问题，由中央最后决定。西安联络处还给了姜术堂一些阐明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的宣传品，并要他迅速回边区交给何耀榜和高敬亭。

一个月后，姜术堂第二次出现在鹞落坪根据地。由于打过几次交道，便衣队员大都认识他。不过此人三番五次的出现，使便衣队怀疑他是受敌人派遣，前来刺探军情。姜术堂极力申诉说：“我是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来的，给你们的上级带来了重要指示。”但是，没有人相信他。姜术堂满怀委屈地说：“我在这座山里爬了两三天，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你们。既然来了，想跑也跑不掉，你们带我去见特委，那时再杀也不迟！”

特委书记何耀榜正在沙僧河一带活动，离鹞落坪有七八十里地。便衣队员带着姜术堂，连夜越过敌人封锁线，找到何耀榜。何耀榜首先询问了姜术堂到西安的经过，继而叫人把党中央的文件仔细地念了一遍，听完之后说：“这两份文件不是假的，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我们在国民党的报纸上也看到这个消息。”

这时候，高敬亭还在鄂东，何耀榜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以

“中共皖西特委会”的名义，将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后，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边区游击战争的情况，用密写的方法，扼要地报告中央，并要求中央派人前来联系。这份报告仍由姜术堂送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1937年7月13日，高敬亭率领手枪团二、三分队从鄂东北来到岳西县南田村，与何耀榜领导的皖鄂特委会合。何耀榜把姜术堂带回的文件及材料交给高敬亭。高敬亭从午饭后一直读到深夜，反复研究了十多遍，确定文件及材料符合中共中央的精神，是中央来的文件，在经过十分慎重的考虑后，高敬亭作出了与鄂豫皖边区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的决定。

### 邀卫立煌谈判

中共中央的文件和上稼祥的指示，给边区的革命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卫立煌（时任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督办）及其指挥下的部队对红二十八军及地方武装久“剿”不灭，又见全国抗战爆发，无心再战，这就为鄂豫皖边区的和平奠定了基础。

1937年7月14日，红二十八军军部秘书胡继亭以高敬亭的名义，给卫立煌写了一封信，要求实行停战谈判。信封是横书的，写着“岳西县第三区公所速交卫督办立煌收”。落款为“红二十八军缄”六个字。

按当时国民党的官场文牍往来，不但信封不能横写，而且“速交”应该写成“转呈”，“收”要写成“钧启”才行，更讲究的是还要忌名讳字，这封信竟然把“立煌”二字端将出来，且完全乱了规矩，使收信的区公所区员王汉臣大惊失色，火速将信转送县城。

当天中午12点钟，何耀榜便接到了回信：“高敬亭先生：我方愿意形成谈判。并派我方代表前往蛇形岗炮楼，请你们也最好派人到蛇形岗炮楼里来作第一次交谈。”落款是“鄂豫皖边区督办



公署岳西办事处。”

尽管这个时候，到处还贴着“活捉高敬亭者赏洋5万元，活捉何耀榜者赏洋2万元”的悬赏布告，但高、何二人分析了形势之后，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决定派何耀榜出任代表与之谈判。

由于谈判内容是红军主动提出来的，搞得敌人措手不及，他们派来的岳西办事处赵参谋根本没有准备，一开口就装腔作势，以金钱、官位作引诱：“你们交出一挺重机枪奖500元，交出一挺轻机枪奖150元，交一支盒子枪奖100元，交一支长枪奖80元。你们的官，到我们这里还当官；你们的兵，到我们这里都当排长……”

“这不是谈判，是做买卖。”何耀榜站起来，打断赵参谋的话，“你回去问问卫立煌，他是真心谈判，还是假谈判？是想当亡国奴，还是想团结抗日？”赵参谋呆头呆脑地听着，谈话不得要领。正在这时，岳西办事处打来电话，把赵参谋召了回去。区公所李区长跟何耀榜约定下午6点钟再联系。

高敬亭一直等在村头，见何耀榜回来，迎上去说：“我一直用望远镜看着你，那里每个人进出，我都看得清清楚楚，身上汗都湿透了。直到你上了山，我才放心。”说罢，两人一同走进屋子分析谈判形势。

当天下午6点，李区长前来回话：卫立煌已派他的随身少将高参刘纲夫和政训处丘处长来同红二十八军进行正式谈判。

第二天，岳西县派来了一位民政科长，敲锣打鼓地送来100多担酒、肉、鸡蛋等，名义上是来慰问，实际上是来探听红军的虚实。尽管如此，遭受过无数次“清剿”、“围剿”灾难的岳西人民，听说不打仗了，两党要和谈了，还是高兴的。

可是，善良的黎民百姓，都不知道在正式谈判之前，鄂豫皖红军游击队还处在一个极大的危险之中：国民党军王学森三十二师的三个旅，以及安徽省的四个保安团，利用红军下山谈判之机，已悄悄开到附近，将游击队里外包围了四层；并在各山岭上准备

了柴草，以便在发起攻击时用来照明。四周的山坡上、山头上，到处是敌人的篝火，影影绰绰可以看到晃动着的人影。庆祝和谈的锣鼓之声，在人们的耳际还没有消失，四野就响起了隆隆的炮声、手榴弹的爆炸声……

高敬亭和何耀榜彻夜难眠，广大指战员也枕戈待旦，准备应付最困难的挑战。

7月17日，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介入谈判事宜的郭副官，先于卫立煌的部下与何耀榜作了交谈。在会晤时，诚意可嘉的郭副官表示：“我是为了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存亡，真心实意来谈判的，抵御外侮是全国军民的共同心声，无论如何，我将搭桥到底。”

谈判开始有了转机，在郭副官的协调下，根据卫立煌的命令“在发起谈判的地区不得随便打枪，并且不允许对谈判代表有任何侮辱和伤害”，7月19日上午1点，包围红二十八军驻地的三十二师和保安团开始后撤。当晚，何耀榜就随同李区长、郭副官到达三区区公所歇宿，准备前往岳西与卫立煌的代表正式谈判。

7月20日上午8时，何耀榜骑着马，从三区出发，11点多钟，到达岳西县城外的一个沙滩上，县里的工、农、兵、学、商各界人士，早已列队迎候。

在欢迎宴会上，何耀榜与刘纲夫和政训处的丘处长正式会面。下午，双方代表在县政府后面凉棚里，就停战、部队集合地、番号、供给等问题，作了初步交谈。5点30分，卫立煌与何耀榜直接通了电话，卫立煌在电话中说：“第一，关于停战问题，我立即下令我军在各地停战；第二，关于贵军集合地址问题，我认为九河一带较为中心；第三，贵军的番号，是两党中央决定的问题，以后再讲；第四，贵军集合后的供给，暂由当地负责，以后仍由两党中央解决；第五，为了实现谈判和停战，我的意见是双方组成代表团，共同组织停战委员会、起草委员会，所有谈判中达成的协议，都要录成文字，由双方同意后签字……”

最后，何耀榜和刘纲夫确定，在青天畷上青小学正式举行谈判，由何耀榜、刘纲夫、郭副官三人为停战委员会和起草委员会的委员，具体条款的执笔和谈判记录由李区长执行，誊写由小学校长汪恭颖担任。

从7月22日起，双方在上青小学一共谈了六天，终于达成协议。为了庆祝谈判成功，双方决定在红军临时集合地点的九河，举行签字仪式。

1937年7月28日，九河的宋家大屋，门前悬灯结彩，稻场上搭着高大的戏台，四面八方的人们络绎不绝地赶来，一片欢声笑语。

上午8时整，双方代表在经久不息的锣鼓鞭炮声中，步入宋家大屋的客厅，正式举行了签字仪式。

红二十八军提出的主要条款是：（一）红军集中地点以湖北黄安县七里坪为中心，另有礼山县的宣化店、黄陂站，罗山县的张家湾等一带村镇；（二）红军在鄂豫皖三省设三个办事处，分驻河南确山，湖北黄安和安徽立煌县；（三）允许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红军所需的武器弹药和供给要与国军相同；（六）红军开赴抗日前线所需的交通工具由国民政府负责；（七）红军驻地如有土匪扰乱或违犯社会秩序者，有权予以镇压；（八）红军进驻七里坪途中，友军不得堵击、追击，如发生冲突，由国民党军负责；（九）红军若有老弱病残或探亲人员返乡，友军和当地政府应保障他们生命安全，如认为可疑者，应该送红军办事处处理；（十）红军家属一律按抗日军人家属待遇，过去鄂豫皖三省被国民党强卖之妇女等，愿回原籍与原夫团聚者，当地政府应予以协助，使之达到目的；（十一）过去凡国民党没收红军家属之财产或罚款，均须如数退赔；（十二）上述条款仅限鄂豫皖地区，凡全国性的问题，以及部队所属番号的最后确定，应由两党中央决定。

国民党提出的条款，主要有：（一）不打土豪；（二）不破坏交通；（三）不得在国民党军队中发展中共党员；（四）不经统一战线许可，不准扩兵；（五）军事行动要事先呈报；（六）友军集合后，不能在各地保留便衣队；（七）鄂豫皖的友军，集中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

这天，高敬亭以红二十八军政治部李主任的身份在协议上郑重地签了字。至此，艰苦卓绝的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降下了帷幕。

### 东进！东进！！

停战协定虽然签订了，但是纸上的东西要变成现实还有很长的路程，这里面既有来自国民党的刁难和破坏，同时也有革命队伍内部的不理解和误会。

在岳西，红二十八军一部分部队集合起来准备到黄安七里坪集中，出发前高敬亭向战士们作了动员讲话，谈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共同抗日的意义。突然，一个战士站起来，气愤地说：“军政委，我们和国民党打了这么多年，现在倒和它签字，我们同志的血不是白流啦？把枪交给你吧！我回家去了。”平时，大家都非常尊重首长，现在激动的战士突然冒出这段话来，大家都静静地看着军首长。

高敬亭冷静而又耐心地对这个战士说：“同志，你把枪拿着，听我讲下去，好不好？”这个战士坐下后，高敬亭接着说：“国共合作，目的在抗日，决不是不革命，更不是投降妥协。我们革命战士不是责任更轻了，而是更重了。在革命没有成功以前，革命战士的枪能放下吗？我们永远不能放下。所以你那支枪还是扛着，扛到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扛到革命彻底胜利！”高敬亭耐心细致的讲话，提高了战士们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那个要走的战士也被说服了，他当即表示：“这枪，革命需要我扛到什么时候，我就扛到什么时候。”

从岳西到黄安七里坪集结，中间要经过几个县，行程数百里。卫立煌要求红军走南线或北线，并说沿线已做了欢迎、慰问准备。但是，为防备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高敬亭选择靠近游击根据地的山路走中线。他还亲自部署战士们远出侦察搜索，百十公里内，便衣队不断，敌人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即使这样，高敬亭仍不放心，他命令部队分散行军，严防落入敌军陷阱。待一切安排妥当，高敬亭才率部队从8月下旬开始，由岳西经罗田北界岭、麻城乘马岗，经扶箭河、闵家山、高山岗、卡房等地移驻七里坪。红军所需给养、被服、弹药和关防等由国民党代表刘纲夫办理。在部队行进沿途，高敬亭还向各地区游击队和便衣队讲解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方针政策，传达到黄安七里坪集中整编的指示，要求大家在集结过程中要提高警惕。

与此同时，高敬亭还派出许多交通员和干部，到边区去寻找队伍。各要道口上还贴了布告：

当此国难日亟，民族危亡之际，凡本部同仁愿意抗日者，一律到黄安七里坪集合。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高敬亭  
一九三七年八月

这张布告，揭穿了国民党反动分子散布共产党投降归顺的谎言，使各界爱国人士都知道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

由于国民党对苏区军民实行残酷的屠杀政策，无数革命志士牺牲在国民党的屠刀之下，一些指战员的思想一下子转不过弯来，有的甚至误认为是上了国民党的当，是妥协投降。在金刚台上，就演出了这样惊险的一幕。

派往金刚台向商南县委传达指示的是手枪团三分队队长李世焱和石裕田、雷文学。临行前，高敬亭说：“我们和商南县委有半

年多没有联系了。敌人的‘清剿’很残酷，不知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过去你们和张泽礼同志一起战斗过，彼此熟悉，所以派你们去。找到后，要他把便衣队集中起来，由你们带到七里坪去。”

对张泽礼，大家都比较了解，他出身贫寒，早年参加革命，对反动派怀有刻骨仇恨，现在一听国共合作，思想弯子会不会转过来，为防备万一，高敬亭当即写了一封信致商南县委，盖上印章，又叫秘书拿来好几张布告，一并交给三位同志，并嘱咐说：“将这封信亲手交给张泽礼。记住，虽说国共合作了，一些反动家伙还想搞阴谋，你们的任务就是要到商南县委，不要和敌人正面接触。”

不出所料，当李世焱等三人日夜兼程找到商南县委时，双方都十分兴奋，张泽礼笑着说：“上级到底没有把我们忘掉啊！”

“我们找你找了好久，军首长有信给你。”李世焱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递给了张泽礼。这时，几十双眼睛一下都集中在那封信上。

张泽礼双目炯炯，一边小心地拆信，一边问道：“你们从什么地方来？”

“潜山。”

“路上可遇到什么情况？”

“现在国共合作，有卫立煌的通行证，路上可以畅通无阻。”

“什么？”张泽礼拆信的手停住了，脸上的笑容也敛住了，眼里闪过一道怀疑的目光。

李世焱掏出护照，说：“这是卫立煌签发的护照。”

“卫立煌？”便衣队的同志差不多一齐叫出声来。张泽礼一把夺过护照，怒视着“卫立煌”三个字。这三个字，大家太熟了！几年来，许多缉拿共产党和红军的通令上有他，各种夺去被俘战士生命的判决书上有他，各种禁令上有他……张泽礼怎能一下理解印有这个名字的护照，竟会在一个红军干部身边带着，并且在大别山通行无阻呢？

张泽礼抑制着怒火，将信递给了小秘书徐其昌：“念！”他昂首挺立，像是要承担什么重大变故，便衣队的其他人也相互交换着警惕的目光。李世焱的心跳猛地加快，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这时候，小秘书在大声念信：“……目前国内政治形势已经起了重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已全面发动了侵略我国的战争。国难日亟，民族垂危，我党为拯救中华民族的生存，已同国民党……”小秘书念到这里停了下来，用惊疑的目光扫了李世焱他们一眼。张泽礼迫不及待地追问：“下面说什么，快念！”

小秘书结结巴巴地念道：“信上说，我们……不，他们和国民党合作，叫我们停止……停止活动，到黄安七里坪集中。”

张泽礼一把夺过信，厉声问道：“你们说，这是怎么回事？”跟着，便衣队员们也一齐喊起来：“要我们同敌人合作，你们这是搞什么鬼！”“你们究竟是什么人，是谁派来的，快说！”

刷——便衣队一下散开了，在李世焱等人身边形成一个包围圈；哗——队员们一个个端起枪，拉开枪栓，推上了子弹。霎时间，气氛紧张极了，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

“不准开枪！”李世焱对同行警卫的战士们说：“便衣队是不会打我们的，他们为革命吃尽千辛万苦，对党对人民是有深厚感情的，对敌人是有深仇大恨的。主要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道理没讲清，一旦讲清道理，他们是会理解的。”听李世焱这样一说，战士们的情绪镇定下来，便衣队员也放下枪，空气开始缓和。

李世焱开始耐心地向张泽礼讲解党的政策，张泽礼听罢，下了命令：“干部集合，队伍原地不动！”几个短枪队员立即把李世焱他们严厉监视起来。

张泽礼和干部们围坐在一棵大树下，开始审查信件的真伪。张泽礼拿出以前军政委写给他的信加以对照，发现图章一个鲜红，一个暗淡，便认为信是伪造的，即刻就要发作，小秘书赶紧提醒他：

印油变色是信件久存的缘故。张泽礼又细细核对两封信的笔迹，一模一样，找不出什么疑点。

但是，张泽礼的疑虑仍未消除。他跑过来，气冲冲地说：“到底国共怎么合作法呀，你们说说。”李世焱就把谈判的经过，军政委的指示，详细地说了一遍。见他渐渐地冷静下来，李世焱便进一步对他说：“客观形势发展很快，我们共产党员要适应新的形势，服从党的决定。你们一定要下山，到七里坪集合。”

看到张泽礼没有什么反应，李世焱有些激动了：“张书记，我们不是反革命、叛徒。你们可以找国民党的报纸看一看，有没有‘西安事变’的事，有没有国共合作的事？要是你还不相信，我们可以把枪下掉给你，就是把我們当作犯人看管起来也可以，请你们自己选择路线去七里坪，到了那里，一切就清楚了。”

石裕田也说：“县委书记，三分队队长说得很坦率，很诚恳，请你多从大局着想！目前的形势变化很快，要相信党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

雷文学平日为人老实，不多话，这时倒有点沉不住气了：“军政委的信是伪造的吗？你们不去是你们的事，请打个收条给我们，让我们好向首长交待。”

几个便衣队员也活跃起来，从一旁劝说道：“张书记，他们三人曾跟我们同过生死，共过患难，可不能把自己人当作仇敌啊！……”

张泽礼听了大家的议论，开始用征求意见的目光环视了一下周围的干部。指导员雷维先站到他的身边，说：“怕什么，我们手枪队还有七八十条枪，出了问题，还可以打嘛。”张泽礼终于被说服了，果断地说：“好，既然是上级的决定，我们坚决服从。马上下通知，集中便衣队，开赴七里坪！”

几天以后，商南的队伍就开到了七里坪。跟着就有人来找张泽礼，其中一位是窑沟便衣队长杜立保。原来，他们根据张泽礼



的安排，装扮成茶叶贩子，跟在队伍后面观察情况。而在金刚台上，他们还留了一支便衣队，以防万一呢！

.....

由于高敬亭、何耀榜等领导人的严密安排，鄂豫皖边区的革命力量迅速地、顺利地集中起来，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当时部队的驻防分布在七里坪一带地区：其中，手枪团进驻七里坪，二四四团一营进驻礼山县宣化店，罗山独立团进驻礼山县黄陂站，各地来的便衣队进驻黄安县两道桥。10月下旬，特务营回来后进驻枣林岗，总人数约1800人。红二十八军各部队集中后，在七里坪设立招兵站，积极扩大武装。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尽快地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由中央派来的代表郑位三、萧望东、何伟等同志负责，从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对部队进行了全面的整训。并在七里坪附近的福德乡秦家祠堂举办红军干部训练班，培训红二十八军排以上干部，郑位三、郭述申（郭树颖）、方毅，以及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等专门给学员讲课，大大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

在党的领导下，七里坪，这块红色的土地，掀起了抗日的高潮。

1937年12月底，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了关于各地游击队的工作汇报和部队整编工作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王明、博古等出席了会议。高敬亭代表鄂豫皖边区作了汇报。最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长江南北的红军游击队统一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江北这两部分红军（鄂豫皖和豫南桐柏山）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由高敬亭任支队司令员。

高敬亭从汉口回来后，向红军指战员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命令。他在会上讲道：“我们虽然和国民党合作了，但大家不要以为我们和他们一样，我们还是我们。发饷他照上下等级发，我们不分，还是和过去一样。”郑位三接着说：红军改编为新四军，名义上是在国民政府的统一指挥下，但我们仍然是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不

受国民党领导；不允许国民党派人到我们部队兼指挥；跟日本侵略者作战，不受国民党的制约；我们到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同样不受国民党的领导；改编后，虽然穿国民党军队的衣服，戴国民党军队的帽子，但我们还是共产党的军队，人民的子弟兵。

1938年1月18日，叶剑英、吴克华、余立金等从汉口到七里坪视察，检查部队整训工作和东进抗日前的准备情况。在视察过程中，叶剑英详细分析了皖中、皖东地区的作战形势，具体部署了东进抗日的作战意图和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

2月中旬，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红二十八军和豫南游击队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东进前肖望东因病离队，由戴季英接任），经理部主任吴先元，军医处阮汉清，医院主任汪浩。支队下辖七团、八团、九团、手枪团和直属队，共3100余人。

鄂豫皖边区人民在为革命输送了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这两支英雄部队后，3月8日又送走了自己的子弟兵——新四军第四支队。这一天，在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的率领下，七、九团和手枪团从七里坪出发，八团从确山县竹沟出发，东进皖中、皖东、淮南地区抗击日寇。

当部队告别七里坪人民，出发抗日时，七里坪群众扶老携幼赶来送行，乡亲们久久地站在“欢送四支队开往前线杀敌寇”的横幅下，直到出征的队伍隐没在群山深处……

这支光荣的队伍，肩负着父老乡亲的期望，脚踏着祖国的大地，开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纵横驰骋于江淮之间，杀敌寇，惩汉奸，开创了抗日民族战争灿烂的新天地。

## 五 豫鄂边的红旗

豫鄂边的红旗，是由党在豫鄂边留下的仅有的几颗种子——张新江、张望丘、王国富、王国华等人高高举起来的。

中央红军长征后，王国华奉命由瑞金中央党校回到了河南。当时，河南和鄂豫边的党组织，已遭到大破坏，许多党的负责同志和优秀党员，有的被捕，有的被害。白色恐怖，像一块浓重的阴云，笼罩着豫鄂边区，工农群众重新陷入人间地狱。

阴历5月间，王国华在豫南找到老战友张新江、张望丘等人。同志相见，千言万语说不尽心中的喜悦和悲愤。张新江说：“瓜儿离不开秧，孩儿离不开娘，受苦的人们离不开共产党，咱们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把党的红旗高高举起来，也要烧红豫鄂边。”大家一致赞同他的意见，成立豫鄂边区省委，推选张新江为省委书记。省委成立之后，第一个步骤就是到信阳县铁幕山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铁幕山，地跨四个县份，是个“四不管”地带。这里地瘠民贫，群众多以卖柴为生。张新江等人来到驼里，隐蔽在卖柴人中间，白天砸树挖瘩，挑到集上换来红薯维持生活；晚上挨家逐户向群众进行宣传。辛勤的劳动有了结果，很快，吴家尖山东坡的小王庄，这些靠打柴糊口的穷庄户，秘密组织扁担会，开展了抗缴柴税的斗争，党的组织随之建立起来。革命的种子，像铁幕山上的蒲公英，随着阵阵春风，迅速传播开来，并在肥沃的群众土壤中扎下了根。

1935年腊月初，省委在信阳吴家尖山以北的石岭村，组成了7个人的游击队。人员少，武器更差。全部武器只有借来的一支八音手枪和两粒子弹，一支土造步枪和用5块钱买来的一支镗子，还没抓子钩。八音枪很快又被要回去了，实际上只有一条半枪。这

支小游击队的第一任队长是王国富。

游击队成立的第一天，便以战斗的姿态，同敌人展开了斗争。

小石岭的联保主任，是个无恶不作的大坏蛋，群众都叫他坏货，早就想除掉他。游击队成立的当天晚上，便决定向他开刀，搬掉压在群众头上的这块大石头。几个队员悄悄跟踪，没费大劲就解决了他，喜得一支手枪和几十发子弹。紧接着，在群众的帮助下，游击队又搞到了方寨富农的三条枪。旧历年三十晚上，又冒着大雪，干掉了保家庙破坏过革命暴动的地主何怪世，又搞到了一支枪。到1936年秋，游击队已发展到有30多人枪的一支可观的武装力量。

随着形势的发展，武装斗争的规模也扩大了。平氏镇夺枪，是豫鄂边游击队一次影响较大的斗争。原来，阴历三月初三到初五，是桐柏乡平氏镇庙会的日子。庙会期间，三台大戏对唱，附近的人都来这里赶会烧香，十分热闹。土豪劣绅也要趁此机会骑着马，带着爬牙，来这里摆威风。镇上驻着土霸王别廷芳的民团和两个保安连。省委开会研究了这种情况，准备趁此机会大干一次。平氏镇离根据地100多里路，当天赶去，当夜必须赶回来，有的同志认为游击队脱离游击区是个大问题，但大多数人主张去。

三月初四这天，游击队和配合作战的近百名群众分两路出发，一路由张新江带领在外围接应，一路由王国华带领，扮着香客混进镇内。长枪带不进去，就带了仅有的两支半短枪。

这一天的平氏镇热闹非凡，人山人海。游击队一到街上，就看到一家货棚里一排挂着四支手枪，真叫人眼馋。王国华派四名队员暗暗地盯住它，自己扮着“会头”，领着乡亲们烧过香，丢罢馨钱，吃了顿饱饭，随后便到货摊上买了80根结实的木棍和80条白毛巾，分给大家，要大家把白毛巾扎在脖子上作联络记号，并规定每人找一个对象跟上，4点半钟鸣枪为号，不许打枪，一齐动棍。这样，大家一路走，一路四下察看，遇上个带枪的，就给他

派上个“护兵”。庙会上的人群来自好几个县，熙熙攘攘，拥挤不堪，80个游击队员，神不知鬼不觉地每人跟上了一个拿枪的敌人。

4点半钟，王国华的信号一响，就见数十条大棍，朝着那些背枪的人砸下去，等候在货棚的四个队员，迅速把四支枪夺到了手。这时候，一个腰挂手枪，后边跟着两个护兵的官儿，背着手，挺着肚子叫喊起来：“呃！呃！怎么打架呀！”话音未落，背后三条大棍突然劈头盖脑地砸来，三个家伙一声没吭就瘫在地上。顷刻间，庙会乱成了一团。有的队员夺了一支枪还不甘心，继续撵着打，个个满头大汗。保安团丁弄不清到底来了多少游击队，吓得躲在屋后乱放枪。趁着混乱，所有的队员都夹在四散的人群当中，安全地撤出了平氏镇。

平氏镇夺枪胜利之后，极大地震动了敌人。第二天，在国民党军队包围的形势下，省委书记张新江镇静地组织突围，他留在最后面，担任掩护。从上午12点开始，一直激战到天黑，才冲出包围圈。游击队是冲出来了，可张新江却在突围中壮烈牺牲了。

此后，根据地进入困难时期。敌人天天“搜剿”，游击队活动地方越来越小，补充越来越困难。经历一番曲折后，省委改组，王国华任书记。新省委提出保存力量，发动群众，打击敌人，尽量缩小打击面的方针。

在省委的领导下，游击队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帮助组织自卫队、防匪委员会等各式各样的群众武装。对于一般的土豪，只要他们按时缴粮缴款，不和敌人串通起来破坏游击队，欺负群众，游击队就不予打击。

由于豫鄂边区省委和游击队把根子深深扎在群众的土壤里，不但在敌人交通便利的平汉线附近站住了脚，保存了力量，而且不断给敌人以打击，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直到奉命改编为新四军，这支由七人游击队而发展成上千人的革命武装，又肩负着抗击日寇的重担，走向抗日的前线。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 = 红军长征全史 第五卷 星汉灿烂——北上抗日先遣队和南方红军游击区战史

作者 =

页数 = 468

SS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